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



序

郑伯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能反映整整一个时代的风云。

一九二六年，党参与组织北伐战争，已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对于是否独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还在摸索争论之中。而当时华蓥山区的共产党员们在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下，已开始意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本书中所描写的由我党策动并参与的武装起义——以“军团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川北民军起义。这次起义，成为我党直接组织武装斗争的最早尝试之一。

在这次起义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初，华蓥山区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起义。它联合了各派进步力量，在华蓥山区建立了地下苏维埃，大量牵制了军阀杨森进攻红军的兵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抗战后期，为对付步步进逼四川的日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王若飞同志曾布置了在华蓥山地区着手加强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准备日寇一旦入侵四川，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华蓥山区又燃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数千人参加的华蓥山游击纵队以英勇的战斗和重大的牺牲，沉重地打击了蒋家王朝最后的巢穴，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主战场上的大进攻，迎来了最后的解放。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却逐渐被历史的烟云所掩隐，只有在当地民间的传说中，抹上了越来越浓的神秘色彩。幸好，我们有陈联诗同志留下的这部回忆录。在这里面，她以一个女性的细腻，详尽地叙述了这二十多年里华蓥山地区发生的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叙述了她的亲人、她的战友、还有那些关心她帮助她支持她的人们的许多故事。今天的朋友们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革命的真实态度，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陈联诗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离开了她那温柔书香之家，走上了一条今天的一些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看了这部书，人们会知道陈联诗的光彩之处，不光是那手好枪法，也不光是传说中的那种“女侠”的风貌。她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德，又有一个特殊时代优秀女性的特征。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目睹了那么多的人在她的身边默默倒了下去，可是她还是走完了她的征程，也完成了她人生的追求。

陈联诗这个人物，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如今那个时代不可能再现，可是陈联诗和她的战友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德，却通过这部书永远留给了我们。

列宁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关于青年团的任务的讲演里谈到，对青年们，以他们父母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经历和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历史来进行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相信作者写了三十多年、今天终于和读者们见面的这部书，对于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懂得过去，懂得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历史，懂得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是会有帮助的，是大有裨益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序言

韦君宜

六十年代初，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朱叔和同志到四川出差，两次回来都对我说起四川省作协正在组织力量整理一部书稿。这部书稿是一位叫陈联诗的女同志留下来的自述回忆录，她从一个大家闺秀走上革命道路，亲身经历了四川华蓥山区我党领导的三次武装斗争，人称双枪老太婆；她的丈夫叫廖玉璧，是革命烈士，夫妇俩的经历都非常丰富，传奇性也很强。朱叔和同志再三提出要抓这部稿子。一九六二年夏秋，我到了成都，见到了书稿的整理者——陈联诗的女儿廖宁君和女婿林向北。我觉得书稿很有特色，决定由我社来抓，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同志作责任编辑，书稿就由林向北执笔来写。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了沙汀同志，和他也谈起过陈联诗同志的事迹，他是非常赞成的。以后王仰晨同志也多次到过成都，和廖宁君、林向北同志磋商书稿的有关事宜。

可是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接到好几封告状信，其中一封自称还是廖玉璧的同学，说廖玉璧上山是当的“土匪”，烈士是假的；还说华蓥山游击队根本不存在，后来江青也持这个观点。一时关于这部书稿和陈联诗同志的是是非非，闹得纷纷扬扬，事情就这么搁了下来。后来听说廖宁君同志因此忧愤成疾，不幸去世；沙汀同志在“文革”中也受到牵连。“文革”后期，沙汀同志来了北京，又和我谈起这件事情，茅盾先生也曾专门找我问过这部书稿，可是当时由于事情本身没弄清楚，不可能出版，只有等待机会。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文革”之后，四川的地方党组织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对陈联诗夫妇的革命斗争历史作了公正的评价，追认廖玉璧同志为烈士。最近又听说他们的外孙辈已将书稿整理成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作品，并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推出，我的心里非常高兴。陈联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她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农大众一起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丈夫牺牲之后仍然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不妥协低头，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读过之后，能够从中受到深深的人生启迪。

功垂青史光照后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黄友凡

我是一名长期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早在三十年代末就认识了陈联诗同志，并和她的孩子们一样尊称她为“诗伯”。多年来，我和她及她的全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战斗友谊，也和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志一样，一直关注着她留下来的五十多万字的口述回忆录。现在，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终于由她的后代写成传记文学出版了，我手捧书稿，反复阅读，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一九二六年，我党正是幼年时期，对于武装斗争还处于摸索阶段，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廖玉璧毅然接受了党组织的派遣；带着妻子陈联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华蓥山下的岳池县。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揽当地的民团武装大权，和同志们一起抓住群众和中小地主痛恨反动军阀的心理，发动了以抗丁抗粮、地方自治为旗帜的“川北民军”起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极其险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二十多年游击战争，这在四川和全国都是罕见的。他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制定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牵制了反动军阀“围剿”红军

的大量兵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尖锐复杂的斗争将廖玉壁从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锻炼成我党杰出的模范先锋人物和当地群众爱戴的领袖，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紧紧依靠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这个法宝，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使华蓥山区这个毗邻重庆的战略要地，一直成为插在敌人心腹之地的一柄利剑。

我相信看完这本书的人们，也一定被陈联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所征服。她在丈夫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总是抢着去完成那些既重要又危险的任务。她没有经历过战争，却一次又一次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胜利归来。她没做过生意，但为了游击队的生存，她开服装店，当船老板，办运输行，每次也是大有所获。敌人几次将她逮捕入狱，她都没有屈服，还在狱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和孩子，可为了革命却长期骨肉分离……尤为可贵的是当廖玉壁牺牲，游击队主力被打散、又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毅然重上华蓥山清理整顿队伍，发誓要将丈夫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陈联诗的经历，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女性成长的足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会使年轻一代了解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了解当时四川的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一批伟大的、崇高的人，并为我们的党培养出这样的人而自豪。

豆蔻年华

从西南重镇重庆，沿嘉陵江北上，经合川、武胜，就到了一个叫岳池的县。嘉陵江和渠河两条大河，分别从这个县的西边和东边流过，紧邻着的便是盆地东部突然隆起的华蓥山脉。这个县的平坝和浅丘地区，盛产稻谷，早年的“黄龙米”，曾被朝廷列为专供皇帝老儿吃的贡米，一直是本地人的骄傲。因为粮食丰足，自然也出肥猪和鸡鸭禽蛋之类的副业。勤快的人家再养些桑蚕，编些竹席草席，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东南和邻县广安连界的华蓥山上，林木丰茂，庙宇嵯峨，山上不但出各种名贵药材，还产煤炭和石灰。这些农副土产，大都经过渠河运到两百多里之外的重庆，再经重庆运往长江沿岸的各省大小城市，若是顺了春夏天的水势，从渠河岸边的两个小镇罗渡溪和黎梓卫出发，到重庆不过两天的路程。

过岳池再往东去，翻过华蓥山，便是连绵不断土地贫瘠的高岭低谷，一直连着大巴山区，于是当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县的岳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银岳池”的美称。

因为富足并且不偏僻，这里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小小的士绅子弟们便不只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八股文章，也经重庆，出夔门，到汉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东洋日本留学深造。回来之后，也有就在地做官，尔后衣锦还乡买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难离，立志服务桑梓，发誓在家乡建一番功业的；当然也有仕途不顺，便学陶公挂冠归隐，闲居乡里的……这种风气代代相传，到了本世纪初，越是兴盛起来。

早年县城里出过一些大人物，别的可以省略不说，而康家吊楼子却是城里妇孺皆知的。

这是一座很有点气派的大宅子。在这里，出过清朝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为此城里专门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纪念这位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说得起话的名门世家。可是渐渐地，这个家庭便不大景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来也只挣了个候补秀才的名分，两个儿子却连这点功名也没有，就废除了科举。眼下家中虽然还硬撑着书香门第的气派，却是明显地中落了。

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 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痲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 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

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哟！”

我一听这话，心想正找不到是哪个在作怪呢，原来是你这个假正经，连忙把几个表姐妹都喊上，跑到他家大门口指名道姓地把他喊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吵大闹：“我们在街上走，关你什么事？”

“你守规矩？你咋不把清朝的袍子穿出来呢？表嫂出门咋不拿块布把脸遮起来呢？”

“男女授受不亲？你那天咋跟一个女的亲亲热热、又接又送的？”

“男女授受不亲？你屋里也有女人嘛，你咋就要喊些男的到屋里来呀？”

“你和表嫂……”

表嫂在屋里听到了，气得眼泪花花的，出来委委屈屈地说：“你们说他，莫要牵扯我嘛，我又没惹你们。”

这个老表，没想到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却让几个小姑娘堵在自己的大门口当场揭短，看着门外围着的那么多人，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的，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大舅在旁边，急得不知咋办才好，我们却得意洋洋，乘胜而归。

后来，有好心的人对我大舅说，别看你家那陈三姑娘，才呀貌的在这几个女儿中间数得上人尖子，可是心气太高，生成了个男儿的命，将来是要吃苦的。

就这样，我一边带领姐妹们胡闹，一边又以优秀的成绩一年读完了初小，又一年半读完了高小，接着进了岳池女师读书。那时，早有张澜先生在顺庆开办端明女学的先例，而后建立的岳池女师作为“男女平等”的榜样，为渴望自由的闺秀们开出了一方天地，在川北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在女师读书的那几年里，除了康家姐妹外，我还和一位叫陈德贤的女同学十分要好，每到假期，都要到她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

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

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悦。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煞”们。

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午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

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二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成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C 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2 1 双枪老太婆

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

棍走到我面前说：“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退得好，退得好。”

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代邮快电”，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打倒刘灼山”、“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偻着玉璧轻声地说：“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口气，说：“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

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了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船，玉璧却突然说：“我不坐这趟船了，你们和远光大哥先走，我要到成都去会一个朋友，然后再来南京。”

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什么不得了的朋友，比我还要紧？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就放心我一个人走？你那朋友的事情，给他写封信去不成吗？”

一向让着我的玉璧，这次却只是温柔地笑笑，一边继续收拾他的东西，一边说：“那咋行？我跟人家约好了的，总不能不守信用嘛！再说也去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说着悄悄地吻了我一下，真的就一个人走了。

我在大舅家，历来都是大家听我的，没想到结婚才几天，玉璧就这样对我，气得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人，是我顶着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自己选定的，一结婚就吵架，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咬咬牙，只好和玉洁表姐他们一起起身了。到了宜昌，我们在旅馆里等着换船，忽然听见楼下闹哄哄的，就跑出来扶着栏杆看热闹。只见楼下站着一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其中一个在哭，另一个气势汹汹地挥着鞭子要打她，其余的人拉着那个在哭的女人，拿着几朵珠花劝她戴上，旁边围着一群歪戴帽儿斜穿衣的烂丘八。我们正在奇怪，不料其中的一个兵猛一抬头，突然指着我们大声喊道：“嘿，这上面还有两个好的！”说着便一窝蜂挤上来一二十个，七手八脚就要拉我们下去。

我和玉洁吓坏了，一边挣脱一边大声喊救命。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远光大哥和岳刚听见喊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来，冲进那些烂兵堆里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老板带着两个伙计也赶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半是推拉半是劝的，才把我们救了出来。老板松了口气，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和玉洁说：“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子，怎么敢出来到处露面？这些烂兵，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委屈，要是玉璧在我身边，我怎么会受这样的

欺侮。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玉璧在高师读书时就已经参加了C Y（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次丢下新婚燕尔的我，也实在是不得已，他是去成都转组织关系的。

一个黄昏，船驶进了下关码头，南京终于到了。看着江面上那些飘飘扬扬的外国旗，想着一路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的心头沉重得很，只是觉得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真是该改造。可是怎么改造，由谁来改造，我却不知道。古书上有过“移风易俗，君子之德为风”的说法，我真希望什么时候出来个圣人，一夜之间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南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我期望一切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到南京快一个月了，玉璧和他的两个朋友才到，大家投入全部精力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半钟，我们就到东南大学农场里去读书。这个农场在东南大学后门的北极阁，树林茂密，青草绿茵，一条小溪向东流去，溪上一座小桥，桥下的荷花开得很好，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来这里读书的人很多，我和玉璧认识了黄明、何超腾、何幻生等一批好朋友，这年秋天，我们几个一起，都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虽然很多人劝我学美术，我自己还是想教书，就考入了教育系；黄明在文学系，超腾在政治经济系，远光和玉洁表姐则转到上海考美专和文科去了。只有玉璧不知道发什么疯，那么好的成绩，却去考了体育系，说是中国人身体太差，学体育把身体练好了，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进了大学，学习更紧张了。我和玉璧白天各上各的课，晚上要做功课，余下的时间玉璧他们还常关在黄明和超腾房间里开会，忙得连夫妻俩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黄明是学校共青团的书记，只知道他家里很穷，没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办了个刊物叫做《学诗》，就靠这个刊物卖点钱来维持生活。黄明这个人，平时对人热情谦和，可一旦争论起什么问题来，却是水清见底，不由得你不佩服。见他常和玉璧、超腾一起开会争论，我也想听听，但每次他们都把门拴上。

有次不知咋的，一推门就开了，我便走了进去，他们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书呀本子的。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们在开什么会，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支支吾吾说是在开读书会。我一听很高兴：“读书会呀？我也来参加一个吧！”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口里说欢迎欢迎，可是接下来一个个都不开腔。我哑坐了一阵，玉璧不高兴了，瞪了我一眼：“你今天不做饭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出去，心里却窝火得要命。看来他们是有事情瞒着我，可是我哪一点又不值得他们信任呢？他们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难道我就不进步吗？我和你廖玉璧自由恋爱，和刘灼山作斗争，这些都不算进步？做饭做饭，你廖玉璧和我结婚，就想找个做饭的？！

寒假，玉璧接到岳池县邮政局长熊尧奠的信，回了一趟家，正月间还没回来，一封上海的邮件又到了。我想一定是玉洁表姐和远光大哥来的，就把信拆开，谁知里面是两本《向导》杂志，还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简文兄，上次委托之事，不知办妥否……老肖大哥问你好”，剩下的文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心里更奇怪了。这廖简文，是玉璧在家乡的小名，在这里是没人知道的，何况这人的签名我也不认识，还有什么老肖大

哥。

没两天，玉璧回来了，我把信交给他，还没说话呢，他就火冒三丈：“你为什么拆我的信？”

我莫名其妙地说：“信有什么拆不得？又不要你的。”“你今后不要拆了。”

我想起他平时对我东躲西藏的样子，一赌气说：“我偏要拆，拆了又怎样？”

“拆信不道德，你不知道吗？”

“嗨，这就算不道德了？那天下不道德的事情多得很呢！我问你，这信是谁写给你的？老肖大哥又是哪个？你成天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还说我不道德，我怎么不道德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玉璧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仅仅是因为拆了一封信。我委屈极了，气得哭了一场。半夜里，玉璧把我摇醒了，好言好语劝了半天，最后说：“今后除了家信之外，朋友来的信你不要拆。这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又不知道轻重，万一说漏了嘴，泄露出去了不好……”

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知道他的事情。我翻身坐起来，瞪着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组织？”

玉璧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追问你，如果真有这事，我要参加。”

玉璧听了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该问的事情，你不要问；到时候条件够了，我们大家会通知你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条件不够！我气得眼泪花花的，钻进被窝里不理他了。

玉璧没办法，用指头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二五年初，我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宁君，小名江宁。有了孩子，又要读书，由于产后没休息好，我身体不大好，虽然请了保姆，还是觉得应付不过来。多希望玉璧帮我一把，可是他更忙了，常常是半夜三更不回家。不久，上海的日本人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传单很快发到了南京，学校好几天没上课。紧接着，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又遭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反帝高潮。六月三日，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玉璧、黄明和何超腾都是学联的重要人物，成天忙着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给罢工的工人募捐。我把才三个月的宁儿交给保姆，揣上几个烧饼，也参加了游行募捐的队伍，和何超腾、何幻生他们编在一个组。南京街头，愤怒的人流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口号声惊天动地，不断有商人、工人和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街口，我们的同学就要站上长凳去演讲。群众涌进大大小小的商店，把里面的洋货统统拖出来，当众烧掉，整个南京城到处烟雾腾腾，火光冲天。

九日早晨，玉璧很早就起身了，要和超腾、幻生、黄明他们到下关合记洋行开办的工厂里去，那里被日本人看得特别紧，直到现在还没罢工。玉璧叫我这天别去募捐了，中午准备六七个人的午饭。当时街上什么也买不到，我把存着的腊肉和豌豆、海带煮了一大锅，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几个才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见他们满头大汗，连忙倒茶倒洗脸水，这时才发现两个陌生人。一

位穿着海苍蓝的洋布长衫，另一位外穿半新旧的毛蓝土布长衫和长裤，里面穿着白土布汗衫，长着麻子的脸上满是汗水珠子。玉璧叫他把衣衫脱了凉快凉快，他直说不热不用脱。幻生说：“你真不愧是个‘处女’，脱了长衫怕人家笑话吗？”他看看我说：“我怕密司陈说我没礼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明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呢，你就开起玩笑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不肯脱长衫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萧楚女，刚从四川来。我在家乡读过他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玉璧对他也是很推崇的，没想到今天竟成了我家的客人。

刚刚才三个月的宁儿，看见屋里这么热闹，也手舞足蹈地在摇床里咯咯地笑。萧楚女走到摇床边把她抱起来，和几位客人嘻嘻地逗着，一边对我说：“密司陈，老廖他们挺厉害啊！我和老刘从上海赶来，还准备帮着组织一些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们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对萧楚女很钦佩，觉得他既风趣又有才华，还是玉璧他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说不定那封神秘的信里的那位“老肖大哥”，就是指的他。可是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很快地就回上海了。

萧楚女他们走了之后，形势很快就紧张起来，学联的成员很多被指名通缉，也有同学失踪，出去就没见回来。眼看风声一天天紧了，玉璧要我着手准备，随时都可能转移。一天，我到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催促家里寄点钱来，柜台里照例递出一张挂号单，我也照例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门的时候，一个军官盯了我两眼，我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家，然后换了件衣服，准备去学校。

刚刚走出大门，一辆汽车就在外面刹住了，一个兵从车上跳下来，对我说：“请陈玉屏小姐上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反问他：“你找谁？”

“找陈玉屏。”

看样子这个兵还不认识我，我往巷子深处一指：“陈玉屏没住这儿，在那边。”

那个兵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料定他两口子住在这里。”

我赶紧抱出宁儿，七弯八拐穿小巷到了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又来了，可我们已经人去屋空。

这以后，我们连续搬了两次家，都不安全。眼看南京是不能呆了，玉璧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家，然后转移到上海去。”

我问是不是“老肖”的意思，玉璧点点头。

不久，我们回川了。这时，何幻生已经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黄明也准备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大约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吧，玉璧在合川县遇见何超腾，才知道幻生已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听说是被“腰斩”的，死得很惨。超腾还告诉玉璧说，几乎在幻生牺牲的同时，萧楚女也在广州被杀害了。超腾自己，后来在万县死于刽子手王芳舟的屠刀下。

我们在南京的几个好朋友，都这样壮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耕耘播火

八月初，我们离开了南京。

天刚亮，黄明和其他几个同学赶来送行，一起到了下关码头。码头边一大群人围着一男一女两个英国佬，守着一大堆行李发愁。平常这点行李，两毛钱就可以搬上船，可是今天出了五块钱也没有人给他们搬。一个工人抄着手说：“在咱们这群人里啊，你出五百元也买不出个卖国贼。还是去找吴佩孚吧，别说是这两件行李了，就是叫他的那些警察给你们舔屁股，也是没得二话说的！”

两个洋人没办法，只好弯腰合抱起一只大皮箱，很吃力地向围船走去。女的穿的高跟鞋，踩到刚落过雨的跳板上，脚下一滑，差点摔进水里。岸上的人看了，都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们上了围船，看见苍蝇蛆虫爬得满地都是，腥臭味熏得人直是想呕。一打听，原来是英国太古公司的鸡蛋，打算运到上海，可是码头工人不准搬上船，就在这围船上放了两个月。南京天气这么热，鸡蛋生了蛆，一些人见了直说可惜，我却说了声活该坏了这些臭鸡蛋，也叫洋鬼子晓得咱们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汽笛拉响了，旅客与送行的人互相道别，码头上一阵呼喊，黄明拿着一张手帕，不断地在空中挥舞。轮船破开浊浪，在江面上行进，风渐渐大了。我把宁儿抱进舱里，哄着她喝了牛奶，又拍着她乖乖地睡着了。待我走出舱来，玉璧还站在船头，一动也不动。

我递了块饼干给他：“呆了？想什么呢？”

“我在想一句话，一句从前我最不愿听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说：“你今天怎么自卑自弃起来？孙中山先生说，要唤醒民众，没有我们书生，民众怎唤得醒？”

玉璧说：“你又在宣传你的教育救国了。”

我说：“是啊，我的教育救国没有用。中国人体弱多病，挡不住丘八警察们的枪棍，要是个个身强力壮，打不赢也跑得快，看来你的体育救国才有道理！”

玉璧笑笑说：“都没用，我们都没有用。除非手头有了枪，枪杆子才有用。”

一说起枪，我就想起军阀的烂兵和警察，我不喜欢那黑洞洞冷冰冰的东西。望着水天交融的远方，我的心还留在南京，留在中山陵，留在玄武湖，留在东南大学农场的小桥边。此刻，桥下的荷花开得正是时候，那清香越过烟波浩淼的江面，一直飘进了我的心里。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从此我再也没能回到南京，生活为我铺开了一条路。

一个黄昏，轮船驶进了朝天门码头——重庆到了。刚靠拢围船，一群力夫就涌上来，挤进我们的房间抢着要搬行李。我紧紧地抱着孩子，玉璧忙去招呼，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廖大哥。我抬头一看，原来竟是夏林。他头上包一条蓝布帕子，身穿一件没有袖子的麻布汗衫，腰间拴根棕绳子，脚上穿双草鞋。玉璧一把拉住他：“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夏林推开一个力夫，伸手抓住我们的皮箱和铺盖卷：“嗨，一言难尽。走，上岸去再说。”

夏林和玉璧是偏毛根儿朋友，同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小时候一起放牛割草，后来又一起读了几年私塾，像亲兄弟一样。玉璧在南京时常叨念他，今天竟意外会面了，自然是很高兴。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豆花馆子坐下，玉璧破例地要了一瓶酒。

一阵寒暄之后，夏林叹口气说：“大哥大嫂你们走了两年了，不晓得现在的世道有好乱，捐啊税的多得吓死人，连那些军阀烂兵揩屁股的草纸钱也要我们出。原来来收钱的是保甲长，本乡本土的，说点好话塞几个鸡蛋说不定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干脆派个兵把你跟着，还要你管吃管住管草鞋钱。你们晓得我老爹不在了，我老娘靠帮人把我们拉扯大。前些时候我在广安新街帮我的寡妇么婶跑腿，她老人家喜欢我，要收我做儿子，继承她那点家产。哪晓得夏家祠堂的族长夏三公想占她的家产，就暗地串通人要整我，害得我跑了回来。现在我屋头，糊三张嘴都不得了，哪里还有钱来交捐呀款的。狗东西的王尧！大哥你晓得的，现时是阳合场的团总，又是资马十二场的民兵大队长，他站出来说话了。说老太婆你没得钱，你屋头两个大成人的儿女就不是钱吗？要么你那姑娘跟我做小，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王尧一天有吃的你也有吃的；要么你那儿子就去当兵，还可以卖几个钱，等二天当官发财回来讨婆娘，免得遭土匪拉了去，落个人财两空。”夏林接着说：“我老娘听了吓得发抖，一趟子跑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打发我们姐弟两个跑了。我把姐姐送到合川姑妈家，求她看在我死去的老爹份上，给我姐找个厚道点的婆家，我自己就到了重庆，凭着力气挣碗饭吃。”

玉璧听了，好久不开腔，最后说：“不要紧的，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以后自有报仇的机会。”说着他付了饭钱，我们一起到千厮门找了个旅馆住下。

孩子受热，整夜没睡。第二天我们同夏林起了个早，由千厮门码头坐汽划子到合川，然后找了个力夫挑行李，我抱着孩子坐滑竿，走旱路。玉璧腿长，和夏林说说笑笑的，总是走在我们前面，到太平场口，两个人跑得影子都见不到了。场口的栅门边守着两个兵，看见滑竿就喊检查。我说学生回家，有什么好检查的。一个兵眼睛一瞪，说学生是专门捣乱的，回来也要捣乱，更要检查。说着三下五下把我的行李打开，一阵乱翻，我抱着宁儿站在旁边，气得不得了。

挑夫默默为我收拾好行李，招呼着重新上路，一路上只是摇头说：“糟啊，先生娘，这年头儿比从前更糟。上个月英国人在重庆‘开红山’，打死了四个，伤了一大坝。王芳舟那狗日的烂军阀还护着洋鬼子，重庆的工人和学生闹得好凶，他们自然是恨你们学生的。”

太阳升高了，滑竿又没有凉篷，宁儿受不了热，在我怀里只是哭闹，我们便赶到前面一棵大黄桷树下歇脚。玉璧和夏林早到了，像细娃儿一样在树丫上坐着。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肚子的委屈。夏林听了连忙问丘八们抢了什么东西没有。玉璧听了只是冷笑：“他们还晓得学生是专门捣乱的么？”

我还在生气，玉璧却朗声说道：“玉屏，你看，快拢家了，青山绿水的，还是家乡好。”

我没好气地说：“好什么！吃的是苞谷红苕，看的是石头泥巴，恶霸当道，土匪成群，我讨厌这个鬼地方。”夏林在一旁，帮着玉璧逗我高兴：“大嫂，你不晓得，这两年有些变化呢！尤其是华蓥山那边，闹热得很。山下的大溪口、枳子沟和毛垭口都开起了炭厂、窑场和碗厂，工人和运力都有好几

千；每逢场天，那些炭啊碗啊石灰的都从我们黎梓卫的码头上船，场上会挤得你脚都立不稳哟。还有，华蓥山上也好嘛，去年冬天我约了四个人去打猎，两天工夫就打回三头野猪、一头豹子，差点拖不拢屋。那野鸡野兔多得撞脚，我们理都不爱理得。”

两个抬滑竿的也听出了神，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说：“山上好是好，就是土匪多。”

夏林说：“嗨，要看你撞到的是哪一伙。要是打散了的烂兵或者是那龙背上成了器的浑滩弟兄伙，当然是说不得了。可是这两年，那些实在是活不出来逼上山去扯棚子的，也不少。说来你们不相信，今年我就碰到过一回，青天白日去卖了柴回来，半路上就遇到土匪。”

两头路口一卡，就喊过路人站成两边，一边是入了袍哥的，一边是没有干系的。我不想冒充，心想这几天的辛苦钱还不够他们填牙缝的，搞不好不死也要脱层皮。哪晓得他们挨一挨二地搜身完了，又把我的一块钱还给我，喊我快走，却把那一堆说是入了袍哥的人抢了个精光。那中间有人直叫唤，说咋个不认簧，我们是拿了言语‘善服’，亮了底的哟。那个为首的土匪头子说：你们有‘善服’，走到哪里都好说；他没得这份福气，走到哪里也没办法，就给他留些吧……”

夏林绘声绘色的，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离开家乡两年了，真可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这两年四川遇上了特大的旱灾，川北一带还遭暴风冰雹，庄稼只有三四成收获，灾民们饿死于路野，甚至有杀子而食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而此时的四川，军阀们已拥有十七八万条枪，拉起九个大山头，人人都想作四川王，为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岳池县今天过狼，明天过虎，有个月竟换了好几任“县长”，换朝官儿刮层地皮，别说是县城了，就是许多乡场也被搜刮一空。

许多亲戚朋友来看我们，说起自家的情况，都直摇头。二姐夫说：“有这些军阀在啊，我们老百姓就不得安宁。眼下守着这一方的罗泽洲，更坏。两兄弟都抽大烟，强迫全县人民种鸦片；一年要征几年粮，稀奇古怪的捐啊税的多如牛毛。莫说是没家没业的，就是我们这些小户人家，也实在是交不起。说别人你们不晓得，石埡场的杜海金该有耳闻吧，交不起粮款被先关后吊，现在一家人不敢落屋。”婆婆抱着宁儿，也过来插话说：“晓得你们在京城读书开销大，是该早些寄钱去，只是屋里头实在是没得钱，留下的三十多石谷子，全遭烂兵们挑走了，还说没抵够粮款。你们还不晓得哟，院子里傅三爷一家，断了粮只有去吃观音土（白泥），五口人胀死了三口，现在傅三娘睡在床上，靠九岁的么女儿每天讨饭回来养活……”

夏林也扶着他妈妈来看我们。老人家这些日子又是呕气，又挂念儿女，眼睛都哭瞎了，一进屋就拉住我的手说：“还是你们好，读着书，走得到大地方，莫回来，我们这昏晃留不得人，留下来的都活不出来……”

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的蹂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乱得不成样子。我却眼睁睁地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起玉璧在船上说的话，心中乱极了，只想早早离开这个鬼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我没法走。回家的第二天，玉璧就带上我在南京买的一块呢料，说要上县城去看熊尧奠，还要到顺庆去办点事情，原说几天就回来，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不见人影。眼看快开学了，黄明也没有信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我急得不行。婆婆一个劲地安慰我，说你们在城里朋友亲戚多，就

多等两天吧。我想也是，比如说大舅家，还有二伯家，我拖着宁儿出不了门，他总该去走走看看的。另外听说任正格先生也回来了，才任了岳池县的县长。

玉璧在成都读书时，任先生是高师教授兼附中的主任，很器重他，师生有两年没见面了，这两年的变化又这么大，总该好好谈谈的……好不容易等到中秋的前一天，玉璧才回家了，一见面就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半身像，粗眉毛，大嘴巴，蓄的拿破仑头盖过了耳朵，深色的西装里面，领带没有打正，白衬衣也还看得出皱纹。我正要笑他，他却指着照片上的字说：“你看看这个！”

照片的左边，有一行字：勇敢奋斗；右边也有一行字：再勿怯弱。下面还有一行字：是年乃余人生之大转变也。民国十四年摄于岳池。

玉璧看我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又把照片翻了过来，我一看，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革命意志从此确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一弃以前梦想的爱的生活、怯弱意志，以我之身献诸人类社会，不复为一个人而牺牲矣。”后面的落款处写着：“于民国十四年摄于岳池。是年乃人生之大转变时期也。”

我看看这张照片，再看看兴奋不已的丈夫，更莫名其妙了。

玉璧在屋里走来走去，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给你的一张纪念照片。我是要你知道我今后人生的目的。革命工作是艰苦的，也是变化莫测的，今后也许我在外面的时候很多。到那时候，你就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以慰悬念……”

我越听越糊涂，甚至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他在南京那些最紧张的日子里都没对我说过这些话，怎么像告别辞似的？玉璧走到我面前，把我按在床边坐下，说：“我们不走了，留在家里。”

我听了非常意外：“为啥子不走了？”

他诚恳而委婉地说：“玉屏，你听我说，我们在家乡有许多事情要做。地主恶霸和军阀这样凶恶，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我们走了，倒可轻松自在，可是……”“可是可是，可是我们外出读书也是为了救国，大学毕业之后再回来服务桑梓也不迟，何必忙在今天？再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不拆你的信，不开你们的会，可是这件事你为什么就不听听我的意见？”

当时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走了”，这三个字他说出来倒是挺轻松，可是对我该有多沉重。刘灼山被我们起事赶走之后，我在岳池教育界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现在又不出去读书了，一个女人，在这乱哄哄的穷乡僻壤，能做什么？做廖家的大少娘吗？那才该叫人家笑掉大牙呢！我觉得女人也真是的，无论结婚前多嘴硬，结了婚还是得事事听男人的，就是这个命……

玉璧说不服我，也就不说了。没两天熊尧莫坐着滑竿从城里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骑马的中年人。这位邮政局长矮胖胖的，身穿一件青花缎的马褂，头戴一顶博士帽，一进屋见我抱着宁儿，就打着拱直喊道喜。

“拿礼信来嘛，孩子都这么大了，才来道喜。”我心里不痛快，再说玉璧一回来就往他那里跑，这不回南京的主意十有八九跟他有关系。

“这个礼信不小哟，廖大哥当官了。”熊尧莫说着，打开了手上的委任状。我接过一看，一张是政府发的，上面写着：“兹委任廖玉璧为黎梓卫团总。”另一张是团练局的，上面写着：“委任廖玉璧为资马十二场民兵大队长。”我一看心头鬼火直冒，只是当着一位生客不好发作，顺手将委任状丢在桌上，

进屋去了。

我端了两碗茶出来，熊尧莫说：“你看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刘铁大哥，玉璧的好朋友。”我听了一愣，这才仔细打量这位陌生的客人。他三十来岁，大个子，穿着青哔叽中山服，抹了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说话声音很响亮，眼神有些刺人，精精干干的像个军人。我想起玉璧前两天回来说起过他，说这是个像黄明一样的朋友，有能力，有学问，还说我见了也一定会佩服。

此时的刘铁正朝我点头微笑，那笑容本本朴朴的，看不出什么学问或者能力，只是玉璧既拿他和黄明相比，自然就引起了我的敬意。

我忙说：“刘大哥，你莫见外，我是生玉璧的气，难怪他不想出去读书了，原来是想回来做官哟。”

熊尧莫笑着说：“这个官不比那些官，不简单得很呢。”

我说：“这官那官都一样，都是给军阀当走狗。”刘铁说：“大嫂，你这话就差了，我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各有各的打算。”

我说：“你们能有什么打算？‘五卅’运动闹得那么大都烟消云散了，难道你们还能把遍地的军阀地主怎么样？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玉璧他自己说的。”

正说着，玉璧从场上回来了，刘铁说：“快来解围，不然我们下不了台。”说得大家都笑了。

中秋刚过，月色很好，吃罢饭大家在院子里赏月。刘铁又接起刚才的话头，他说：“大嫂你说的不全对。‘五卅’运动是过去了，可是全国整个革命形势在发展。你看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军举行东征成功，打垮了陈炯明和滇桂军阀。重庆、万县……我们四川的工人和学生运动现在还轰轰烈烈啊。至于老廖说的话，我看也不全对，只有那些光是咬文嚼字的酸秀才才没有用。你们满肚子学问，工农满身的气力，还有的人手里有枪，还有的手里有印把子，想法子大家合在一起，还愁什么事情干不好啊？”

我说：“你们到底要想干什么？真想去改造社会？”刘铁反问说：“这个社会这样糟糕，你就不相信它终究要被我们改造？！”

我说：“不是不相信，而是地主和军阀的力量太大了。”刘铁说：“那就一个一个地来嘛。你看现在，军阀都是大地主，可是地主不一定是军阀呀。现在军阀派捐税，首先就敲榨地主，一敲就是几十石，地主拚命向农民加租加佃，可是农民骨髓都被榨干了，军阀还在一层一层地加，地主受得了吗？”

我想了想，说：“刘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先联合地主去打军阀？”

刘铁一拍大腿说：“大嫂你真是聪明人。现在为了防范军阀和土匪，许多地方都修了碉楼寨子，各乡各场都组织了民团，置办了枪支。你想想，一支步枪就是百多块，一支快慢机手枪五百多块，整整一石黄谷，有了这两张委任状，这些枪不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吗？嗨，资马十二场的民兵大队长，管了渠河两岸的这大大片风水宝地，一千二百多人和枪啊！”

剩下的原因，不说我也知道。一来是玉璧在大学里专门学过的军事体育，多少算是进了“科班”，懂点行。二来呢，是刚回乡上任的县长任正格和团练局长陈徙南，对玉璧都很器重。这两位既是同学又是同乡的老先生，都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携手出山，不过想服务乡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那年月，像任、陈二位老先生那样，想做个青天大老爷的人，多。可是军阀们横行乡里，哪里容得他们自己作何打算。他们也不灰心，只想培

植点自己的力量，做事妥当一些。玉璧在高师的时候，任先生对他的印象很好。而陈徙南，又是我陈家的叔叔，喜欢我，也喜欢玉璧，当年我们订婚的时候，多少人打破，他却极力在我母亲面前打保票，以后还给我们寄过学费。眼下，正值岳池各乡场改选，两位先生一商量，就把这两张委任状，给了他们当年的这位高足。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那就是当时以熊尧莫为首的中共岳池临时支部，把玉璧列入了他们掌握民团武装的最佳人选，还因为他在南京“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已经正式由团转了党，那张照片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和熊尧莫一起到顺庆去接转了组织关系时照的。

我对刘铁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看人家说起话来水清见底，在行在理的，哪像玉璧那样吞吞吐吐。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于吴玉章熟悉顺庆，而刘伯承又在军阀何光烈的部队里当团长，我们党曾一度将军运的重点放在驻守顺庆的这支军阀部队里，策动了一些中上级军官投身革命。我只是不明白像刘铁这样痛恨军阀的人，为什么还要在何光烈的部队中当炮兵营长。

按当时的惯例，担任团总的人，不但要有学历（起码是秀才）财产，还应该德高望重才行，可是这次任命的，却是个当过放牛娃的才二十三岁的廖玉璧。遗老遗少们立即闹得纷纷扬扬。资马十二场那些有声望的士绅们联名陈述，派代表到县里请愿，说玉璧乳臭未干，不堪重任，同时呈上保举名单，请县长另派贤人。谁知任县长却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年轻不碍事，我不年轻就行了。”

有了县长撑腰，玉璧便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士绅们不出费用，玉璧便动员母亲将祖父存在洋行里的股本退出，垫了民团的伙食费；他们又支使一个奸商，在场上抢购大米，致使米价陡涨，玉璧立即带领民兵们到了码头，将米全部没收，73双枪老太婆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我党著名军事家，十大元帅之一。早年参加四川讨袁军，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和杨闇 e* 澜等人一起发动了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策应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次年八月参加并领导南昌起义，历任我军高级将领。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训练总部部长等职，并曾当选为党的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逝世。

48

在市场上原价抛出，既平抑了米价，又为兵团赚回了伙食费，还去重庆买回一批枪弹。

几个死硬分子见硬的不行，就去罗泽洲处告状，说廖玉璧拥兵自重，总会成了气候。罗泽洲最怕的就是这一着，连忙来调玉璧的人去大溪口一带“清剿匪患”。玉璧一打听，才知道这股“土匪”的头儿叫金积成，是夏林的好朋友，这回是杀了罗泽洲下去收款的“提款委员”，拖棚子上的山。于是一边派夏林前去“招抚”，一边去给罗泽洲回话，说是本乡没有土匪。没几天，金积成带着十多个弟兄投奔而来，和夏林一起，成了玉璧的左右二臂。

几个月过去了，玉璧的工作很有起色。资马十二场的民团势力不断扩大，渐渐成了气候，和罗泽洲对立的架势也日益明朗，风声开始紧了起来。

开年了，刚刚破五，熊尧莫和刘铁便轻装前来拜年。三个人在屋里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说是要到华蓥山上去赏雪，一去就

是两天。那年冬天，冷冻极大，华蓥山凝着两三尺厚的积雪，等到他们泥糊糊地回来时，人都快冻成冰棍了。

我去场上买了些下酒菜回来，推开紧闭的房门。他们正围着圆桌上摆开的一张图，见我一进去，捏着铅笔的玉璧就顿住了口。

我不高兴地走过去，说：“你们在画什么？”

玉璧连忙支吾：“喔，我们不回南京，就是为了在华蓥山办个大农场。你看，这里是果园，这里是养猪场，这里是罐头厂……”

我瞪了他一眼，没开腔。

刘铁看看我，又看看玉璧，忙上来解围说：“大嫂，这怪不得玉璧，我们有规定……”

我哼了一声，说：“早就听说你们有个啥子了不得的组织，你们都够格，就只有我是个外人，只配为你们跑腿。不过你们也不要小看了我。在南京，我不敢说大话，人生地不熟的，只有跟在他廖玉璧的后面跑。可是一回到这岳池，就有了我的用武之地了。这县里县外哪个不晓得，我们陈家是个大族，亲戚朋友中，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要办个什么事情，我陈玉屏也不比别人差呢！”

刘铁和熊尧莫一听，都哈哈大笑，口里直是说：“好一个厉害的陈三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足见我们廖兄的福气了。来来来，从现在起，我们也不把你当外人，你当我们的后勤部长兼外交大臣行不行？”

大家正笑着，门外的狗咬起来。我从门缝一望，来人穿一套黄呢军服，与玉璧一样高大个子，蓄一点短胡子，便有些惊惶地说：“不好，有个军官来了！”

玉璧凑过来一看，笑起来，打开了大门说：“来得好，来得好，你们看是谁来了。”

来人叫杜伯乾，他带来一个消息，说是罗泽洲要预征五年粮，同时发行一元、五元债券，还有原来摊的户口捐、壮丁费、冬寒费、清乡费、指名费、特别捐……每县都是几百万元。资马十二场要缴四十多万元，农民与地主三七分摊，限定两个月内缴清。他还说，吴玉章也到了顺庆，和刘伯承一商量，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所以最近，川北十四县民团首领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量起事反对罗泽洲和李家钰。被罗泽洲逼迫得走投无路的陈徙南，在会上慷慨陈辞，众望所归，已出任广岳方面川北第五路民军总指挥。

杜伯乾还说，这次全川都有行动，川北方面由于陈徙南的活动，刘湘从自身利益考虑，已令王芳舟的部队驻合川，除了给予军事、物资等支持外，必要的时候还要以武力配合。广安、合川、武胜等地的民团武装也联合起来了，陈徙南还与邻水县团总商定，两边一起行动，同时攻打邻水和岳池县城。杜伯乾对玉璧说：“陈徙南要起事，恐怕在岳池城里不行，他打算把团练局移到你这儿来，你们准备得怎样了？”

刘铁抖开玉璧刚才对我支支吾吾的那张图，边指边说：“旅长，你看，这是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华蓥山脉绵绵六七百里，东接万县巫山，西连陕西秦岭，我们背靠的这一段是主峰。山上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地形复杂，还有五个大庙子，山顶上最大的宝顶寺，有七大殿，少说也可以住千人以上。这些寺庙在山上都有庙产，完全可以自耕自食。山上每年十月开始下雪，积雪三四尺厚，第二年三四月才开始融化，这期间除了烤火守夜的和尚外，几

乎是人烟绝迹。这华盖山上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作战的好地方。”

熊尧莫也凑上来，在地图上比划着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听我这个跑邮政的说几句。”

华盖山水陆交通都很通畅。一条大路联通大竹、邻水、渠县、广安、岳池、合川等县，直达江北重庆，只要卡住这条路上的枳子沟和大溪口，就卡断了这几个县的陆路交通。至于渠河，那更重要。渠县开始到重庆这一截，水势平稳，河面宽阔，军需民用的物品，多靠这条黄金水道，沿河两岸码头很多，像黎梓卫、罗渡溪、马头溪、石龙场，都是些繁华口岸，若是在沿岸码头设上联络站，做好船夫和各处袍哥的工作，今后我们便会畅通无阻。”玉璧拿一根筷子，边指边说：“我来说说资马十二场的情况。渠河经广安流过岳池，把东南角切下来，这就是河东七场。我们黎梓卫是首场，附近的米粮、肥猪、鸡鸭蛋和山区的药材，还有枳子沟、百子洞出的煤炭，都要由这里运往重庆，由重庆运来的盐巴、百货也要由这里分散到后山。别看黎梓卫从场头到场尾仅两三百丈长，街上除了茶馆烟馆楼房和税务机关外，没几家住户，一到逢场天水泄不通，是个繁华的地方，加上守住这里就可以切断后山各场与外界的联系，向来为军阀官吏地主恶霸所眼红。由黎梓卫往前走，地主的石碉楼很多，其中的天宝寨和苏台寺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大溪口是上山的要道，现在军阀都有兵把守。”

这河东七个场，是岳池与广安、合川几县交界的地方，又靠山边，山高皇帝远，是我们活动的好地方。至于河西五场，也很重要……”

我听得入了迷，盯着那张图说：“刘大哥你们真了不起，说得比我这个华盖山下长大的人还清楚。”

刘铁说：“大嫂你这份夸奖我担当不起，这是玉璧在山上山边转了两个月，还到县里查了资料才画出来的。我们这位年轻的团总还有一套，把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全用上了。杜旅长你看看这张图，画得多准确多仔细，简直是个内行。”杜伯乾拿起图，边看边说：“了不起了不起，我们当了多年的参谋，专吃这碗饭还不一定画得这么好呢。你这个民兵大队长，对那些团总团政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玉璧说：“资马十二场的民团完全能调动，团总中有一半靠拢我们，两三个见风使舵，有两个土豪王尧和尹元亨靠不住。这两个家伙都是恶霸，王尧还是刚被我顶下的资马十二场民兵大队长。”

大家谈了很久，最后由杜伯乾正式确定了起义计划。这次起义的口号是：打倒军阀罗泽洲，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地方自治。起义以军团冲突为名义，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以玉璧领导的资马十二场的民兵为基本队伍，加上何光烈部队中已经入党的中校军官屈元亮拉出的四百多人，还联络一些反对罗泽洲的地方势力参加，包括袍哥和绿林武装。起义军对外称川北民军第五路军，陈徙南任总指挥，杜伯乾任参谋长，屈元亮任副参谋长。玉璧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但不公开露面，以便在黎梓卫这个水陆码头稳住阵脚，保证民军的军需供应和情报侦察。刘铁负责队伍中党的工作协同军事作战。熊尧莫和我负责后勤和交通联络。

四月初八这天，黎梓卫街上水泄不通。调来保卫会场的资马十二场民兵们，穿着杂色衣服，带着长短不一的武器，在关帝庙内外驻得满满的。到会的有各乡民团团总、团政和地主乡绅及公口袍哥大爷，还有从广安、岳池四十八场赶来开会的士绅和民团代表共八十多人。

在此之前已将县团练局迁到黎梓卫的陈徙南，在会上一口气数落了罗

泽洲的十大罪行，声明由于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困苦，实在无力筹办苛捐杂税，只有拿起刀枪驱逐军阀罗泽洲，实行地方自治，才能死里求生。接着陈徙南提出了和我们事先商定的计划。一个叫李元金的大绅粮，屡受罗泽洲敲榨之苦，当即在会上就出了四万元，作为民军军费。其他各场代表纷纷响应，又认了三万元，只有王尧、尹元亨几个劣绅，有的怕事，有的哭穷，一个子儿没出。

当天晚上，代表们喝了血酒，赌了咒，各自回去作准备。出于通盘考虑，玉璧在这次会上没有露面。

黎梓卫会议之后，川北第五路民军的旗帜打出来了，打倒军阀罗泽洲的传单四处散发。

屈元亮带着他的四百精兵强将，在岳池、武胜、合川连连打胜仗；黎梓卫和好几个乡场上的税务所都被砸了，票据扯得漫街飞舞；大溪口炭厂的工人和农民一起，还打死了一个提款委员……眼看一场大风暴就要到来，罗泽洲慌了，立即派了他驻扎在岳池的旅长刘瑞文，率两个团直扑河东七场。由我们党策动并参与领导的华蓥山区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在军（阀）团（阀）冲突的旗帜下拉开了战幕。

初露锋芒

仗，一打就是好几个月，双方互有胜负，相持不下。于是罗泽洲沉不住气了，在广安召开了团以上的军官会议，商量对付我们的办法，最后调来了大军，把我们团团围住。

时间一长，枪弹粮钱都成了问题。玉璧和刘铁、陈徙南一商量，就让我下出去搞粮食。

我化妆成大地主张玉如家的大少娘，坐着滑竿带着人，星夜赶到小龙山，把张玉如仓里的一百多石谷子下得干干净净。然后混过了渠河上的好几个关口，把粮食运到了岳家溪。

起事以来，我东奔西跑，不是催粮碾米，就是传书送信，实在是太累了，这次又跑了一夜，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是金积成带我们的人，装作赶场的，早已在河边等候。他告诉我说，现在急需一笔钱买子弹，陈徙南写了信，要我找几个地主借钱。这些地主有的与陈徙南私交很好，有的起义时很倾向我们，有的则是有钱又没出过钱的户头。金积成说，刘铁刘大哥特别叮嘱，要我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我接了信，二话没说，把运粮上山的事交给同去的陈亮佐，自己同金积成一起，直奔赛龙场。

最近，我们的仗打得不好。岳池城没有攻下，队伍被敌人团团围住，给养发生了困难。

队伍中一些地主和土匪出身的头领各生异心，各县的民团也见风使舵，按兵不动，没有按预先的约定来支援。一些本来就嫉恨玉璧的家伙不顾陈徙南和刘铁的招呼，故意在两军阵前打出玉璧的招牌，致使玉璧被罗泽洲通缉，家产也被查封……局势变了，这些原先想从民军起义中捞好处的人，态度也会有变化，我心中无数，先到赛龙场二姐家，让二姐帮我摸摸底。

陈徙南指名的这些地主，有的认得我，有些认不得，住得又分散。二姐吃了晌午饭就出去了，夜深才回来，一看她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的心就凉了一半。

二姐说：“我路过张玉如家门外，听见他在屋里发脾气，说廖玉璧的女人当真这么凶啊。我本来不想进去，又想到了屋门口不进屋，人家撞到了更要多心。张玉如一见我，气更大了，不请坐不倒茶，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你这个当姐姐的来评评理，陈玉屏昨晚带了几十个人到小龙山，把我仓里的谷子下得干干净净，一颗都没留，硬是比棒老二还要凶。’他的管事在旁边，说你们把他绑在灶台边，还塞了一嘴的棉花，塞得他气都出不来。

我当时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说不拿给玉屏他们挑起走，还不是要被军阀来挑起走，反正都一样，说完就借故出来了。

“我又到徐龙吉那里去。他一听说你要去就吓慌了，直至说来不得来不得；又说，廖玉璧起事时在他那里借了两支枪的事，县府正在追查，他脱不了手呢。边说边喊他女人拿了十块钱出来，就是给你作路费，请你走远点。我说了句我们玉屏又不是来要饭的，转身就出来了。

“最气人的是尹元亨，他本来就与你们不和，一听说你要去，就愣眉瞪眼地说：‘现在到处都在捉拿他们，还敢来向我借钱，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跟陈玉屏说，知趣点远方发财，不然莫怪我对不住人……’”

二姐顿住话头，叹了口气劝道：“算了吧，玉屏，有衣穿有饭吃的，还去革啥子命哟。”

正在生病的姨妈拄个拐杖出来，咳咳喘喘地说：“屏儿啊，你们那伙十个人九条心，谨防有人把你们卖了哟。再说你年轻轻一个女子，成天抛头露面在外头跑，现在到处大布告出起要捉拿你们，这样闹下去如何是了哦！”

当时我想到的倒不是如何是了，而是任务完不成回去无法跟刘铁和陈徙南作交代，在玉璧面前也直不起腰。不到黄河不死心，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我决定亲自去找大地主周怀堂。他是陈徙南的好朋友，陈徙南给他写了一封信，找他借一万元，愿拿自己的田作抵押。

吃过晚饭，我穿上二姐的一套雪青色的细毛葛衣服，和金积成、二姐一起去顺梁寨。二姐喊开寨门，我们拐进了周怀堂的黑漆门大院。这是一座走马转角楼的房子，厅房里燃着明晃晃的煤气灯，老远就听见搓麻将闹哄哄的声音。我问二姐他家什么喜事，二姐说没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这样。

我们走进周怀堂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听说我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又见我穿得很阔气，连忙站起身来，让座叫茶。这时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二姐说：“周大老爷，玉屏有话跟你说，人多了不方便。”周怀堂吼开了门外的人，顺手关上了门。

我拿出了陈徙南的信。周怀堂看完了信，黄泡脸顿时塌了下来，摇着头长叹一声：“这次仗打得不好啊，岳池没有攻下来，罗泽洲又派来大军包围。原想你们起事成功了，大家少缴些款子，现在我看算了吧。再打下去，劳民伤财，你们受不了，我们更受不了……”

周怀堂说话的时候，口水几乎溅到我脸上，鸦片烟的臭气冲了出来，我直想发呕。我装作喝茶，移到桌边坐下，正色说道：“周先生，去年罗泽洲派你六万元的指名捐，你没出过一分半厘，请问这是谁的功劳？”

周怀堂脸上一阵尴尬，换了口气说：“当然当然，我没有受到军阀的敲

榨，应该感谢廖大队长；这次罗泽洲预征的所有粮款、债券和一切苛捐杂税，也由于廖大队长和陈徙南起事而归罢免，这些功德我们资马十二场的士绅和百姓们都是感恩不尽的。如今民军有困难，我们当然应慷慨捐助，只是我眼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当卖，也得找个主嘛！”

金积成在门外早已听得不耐烦，闯进来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周怀堂你少罗嗦，干脆一句话：是要命还是要钱？”

周怀堂吓呆了：“这……这，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你自己明白，老们在外面拚命都受得了，你躺在这屋里吞云吐雾，还说什么受不了……”

二姐连拉带劝，把金积成拉出去了。有道是水不激鱼不跳，像他这种老滑头，金积成这一下也有好处。我说：“周先生，你别怪这位弟兄火气大，他们为了你们免受军阀敲榨，在前方挨饥受饿，你们却在家里大吃大喝，还有说不完的风凉话。不过你也是个明白人，要是起义军真的撤走，罗泽洲回来知道了你和陈徙南的关系，那时候莫说是六万元，就是倾家荡产他也不会饶了你。”

他听了一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接着说：“有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可能也听说了。

天宝寨的士绅林太昌你知道吧，为了缴纳捐税，挨打受气，当尽卖绝，最后连妻子也成了抵押，被罗泽洲派人拉走了，现在只好沿街讨饭。周先生，到了那时候，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周怀堂的老爷气派没有了，连连说：“我晓得我晓得，只是眼下，眼下手边实在是没有现款啊。”

我见他还想拖延，一下子站起来说：“谁不知道你周大老爷的底细。谷子堆得山样高，十年以上的陈土少说也有万把两，只要你肯开口，要不了一杆叶子烟工夫，就这寨子里少说也要送个三万五万来。你若是信不过陈徙南，我拿田来抵押；若是信不过我，就用我二姐的田来抵押，我的田给她。”他被逼得没法，只好说凑凑看，说着就要往外走。金积成用枪一挡，指着门口围着的那些男男女女说：“周老太爷，这点小事，就让他们这些奴才去办吧，我们大嫂难得来一回，你老太爷陪着，好好摆一会儿龙门阵。”周怀堂听了眼睛一愣，半天才一顿足：“都是些死人吗？还不快去给他们拿来？一万！”

第二天，我叫二姐找了几个可靠的人来，将周怀堂送来的银元分散装在两副挑子里，表面放些小菜，装着赶场回家的样子。剩下的银元绑在身上，滑竿里面也放了些，等到天黑才上路。赶到苏台寺，已经快三更天。我将款子交给了陈徙南，谈了全部经过。陈徙南很高兴地说：“劳苦功高，劳苦功高，我这个侄女硬是不简单，两件事情都办得漂亮！”

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飘飘然，得意洋洋地看了一眼玉璧，不料他却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还要学会打枪才行，不然太冒险。”

这个廖莽子娃！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不会打枪又怎么样？难道我就一辈子不会打枪了？

天气渐渐冷了，雪下得很大。罗泽洲的大军步步进逼，义军却连连败北。原来答应支援的刘湘不但不出兵，反而趁机扩大地盘，占领了邻水县；罗泽洲放出了空气，说只打陈徙南和廖玉璧，其余的概不追究，带人带枪反水过去的有赏有官做，撒手不干的保证生命安全。

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那些地主、土匪出身的首领中间活动，队伍中心开始涣散。十一月，在玉璧等人的一再催促下，陈徙南和刘铁在华盖山

下的大溪口举行会议，召集团参谋以上的几十个首领商量对策。会上玉璧和屈元亮几个党员主张坚持到底，而一些土匪出身的首领闹着要散伙，还有的主张“顺水推舟”，与罗泽洲议和，接受招安……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几天以后，义军中一直按兵不动的何生在西关叛变，投降了罗泽洲；攻打岳池一战中损耗最大的龚冠一把他的队伍拉到顺庆、蓬溪边境，又扯起了他的“棚子”。在起义中屡屡坏事总是嫉妒玉璧的黎梓卫两个豪绅伍建中、骆雅洪，拉上陈徙南去重庆投了刘湘，不料他们手下的民兵，大多是资马十二场的人，谁也不愿背井离乡去为军阀卖命，其中有个叫陈仁勇的既是陈徙南的侄儿，又是玉璧的干将，他在民兵中一鼓动，一下子就有九十多个民兵带枪跑了回来，以后又阴一个阳一个地溜走。兵都跑光了，刘湘认为自己受了捉弄，下令捉拿。

结果骆雅洪被关了监，伍建中逃到万县，陈徙南深夜化装出走顺庆，后来被罗泽洲杀害。

眼看大势已去，手中已有千把人并且武器精良的屈元亮，带着他的人马到长寿县范绍曾处暂且安身，以图后计。曾经轰轰烈烈、震动全川的川北民军起义，就只剩下玉璧带着他那二百多人的基本队伍，坚持在华蓥山上。

十二月初，吴玉章和刘伯承策划已久的顺（庆）泸（州）起义在顺庆发动了。罗泽洲趁起义部队立足未稳，出动大军占领了顺庆，并把大本营也迁了过去，可是围在华蓥山的敌人并没有撤走，随时都可能上山围攻。玉璧带着弟兄们在冰天雪地中坚守，子弹、药品、粮食都快没有了，就派人拿着我从周怀堂那里要来的款子，急着到重庆去买子弹。

不过十来天，子弹买好了，已送到石龙场，来信叫山上赶快派人去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玉璧自言自语地说：“派谁去呢？”

我站出来说：“我去！”

玉璧看看我，没开腔。

我说：“怕什么，还要带上这么多的人呢。你要是不放心，就把你的那支德国造给我。”说着一伸手，把他腰间的枪扯了出来。

玉璧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忙说：“你怎么能这样！”夏林在一边说：“大哥你就放心吧，有我和老金在，还轮得着她去动枪动炮吗？”

玉璧没办法，只好同意了，盯着这支自己最喜爱的枪，嘴里唠叨着什么我们的枪来得不容易，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它呀；什么人在枪在，人亡枪毁，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呀……我拿着那支精巧的“德国造”手枪，翻来覆去地看，高兴极了，嘴里直说：“晓得了，晓得了，你这个人，话咋这么多啊？”说着就忙去换衣服。

我仍然是大少娘的打扮，穿一件团花缎子短袄，和金积成、夏林一起，带了二十多人，一起下山了。自己带枪下山，还是第一次，我兴奋得不得了，坐在滑竿上，走啊走的又把枪摸出来，用手帕把它擦得亮晃晃的，巴不得迎面来几个敌人打上几枪。快到石龙场了，金积成看我还在玩枪，就招呼我快收起来，说是让人看到麻烦。我说：“那有啥了不起？碰到就打嘛，打倒几个算几个，免得你们那廖大哥看不起我。”说着又做了个瞄准的动作。

夏林笑我说：“你那样子就想打仗了？硬是爬都没学会就想飞，看打到自己的脚哟。我可是在大哥面前下了保证的。”我一边瞄准一边说：“莫说得那么神秘，打枪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成天乒乒乓乓的，看也看会了嘛。”

金积成听了，一笑，正要说什么，夏林接过话头，转过身去对他说：“就

是就是，老金别看你我都是队里数一数二的双枪手，等大嫂练神了，说打你老金的鼻子就不打你的眼睛……”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走到石龙场，天已经黑尽了。我们把一万五千发子弹装好，鸡就叫头遍了，上山还有五十里路，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过敌人的卡子。漆黑的夜，虽然没人说话，但我们二十几个人的脚步声也够响的，惹得一路上院子里的狗汪汪直叫，一家的狗叫起来，家家的狗便叫成一片，叫得人心里发紧。眼看天已经粉粉亮了，过了前面那个山坳，就是我们的地界，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觉得这一趟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过来了，真有些可惜。

突然，路边窜出两个兵来吼道：“啥子人？”

“是赶场卖苞谷的。”前面的金积成答道。

“赶场咋会这么早？”

“老板叫我们早点卖了，还要回去做活路。”

那两个兵看见我们这么多人大摇大摆地赶路，手一挥，就让我们过去了。夏林紧紧跟在我后面，小声叫我不慌，说着就和我一起，埋着头从那两个兵面前走过。

“站住！”

一个兵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夏林连忙凑上去，点头哈腰地说：“长官，这是我大嫂，我哥这两天忙，叫我顺便把她从娘屋里接回来。乡下女人，没见识，你哥子抬个手……”

一个兵怪眉怪眼地说：“乡下女人？我看比城里的少奶奶还嫩气呢。你那大哥也是，把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交给你这样标致的小叔子，就不怕她跟你跑了？”

此时我已经走出了十几步远，一听这话，心头火起，突然想起身上的枪，一撩衣襟拔出来，扬手就是一枪。

枪没响。我一愣，才想起没有开保险，连忙用拇指一顶上了红槽，接着就抠动了扳机。

枪响了，后挫力震得我手臂一麻，我惊叫一声，就要丢枪。说时迟那时快，赶上来的金积成一下子捏住了我的手连同那支枪，连抠了两下扳机，然后拉着我转身就跑，喊了声：“老夏，你掩护！”

夏林是何等眼快的人，此时早已几枪放倒那两个兵，指挥大家撤退。枪声惊动了山坳那边我们的人，连忙火力掩护，把我们接了过去，两边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夏林和金积成将我安排在一个山崖边，叫我莫出来，就参加战斗去了。我才没有那么老实，随手抓起一支枪，也伏在一块石头后面打了起来。

我们居高临下地正打得热闹，忽然听得身后一阵呐喊，我们的队伍赶到了。玉璧举着一杆红旗，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左右挥舞。我一看急了，忙跑上去拉住他：“哎呀，打得这么凶，你还站在这里舞旗子，不要命啦！”

玉璧回头一看是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这是指挥！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半罐水，只晓得给我惹事！”

我心里委屈，一转身又拿起枪，狠狠地打了起来。半罐水半罐水，难道我陈玉屏就只是个半罐水的料？这打仗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就要打个痛快……敌人被打退了，山坡上到处摆着死人。大家都去捡枪，收子弹，有的还去剥死人身上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我看着地上的几十具尸体，突然觉得有些害怕，想起那些吊古战场的诗文，不由得说了一句：“活

生生的人被打死了，好残酷啊。”

这话被刚刚下来的玉璧听到了，他冒火连天地说：“这是战场，你不打死他，他就要打死你！起事以来，他们打死了我们多少弟兄，你还在为他们发慈悲，真是小人恩惠，白白耗费了我两夹子弹！”

当着那么多的人，我哪里受得了他的态度：“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打了你的子弹有啥了不起，我去捡来赔你就是。”说着就壮起胆子，要到死人身上去扯子弹。

夏林背着三支枪过来，一看见我就说：“哎呀，大嫂，你是咋个在打仗的哟，一身尽是稀泥巴。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像你？”

我正在气头上，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什么大嫂大嫂的，今后一律叫我大姐！”

果然，以后他们都叫我大姐了。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半罐水半罐水”的。半夜里，我悄悄爬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玉璧的那支枪，轻手轻脚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就听见玉璧问了一声：“你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站住了，半天才赌着气说：“我要去练打枪。”玉璧听了，不说话，坐起来穿好衣服，拿上另一支枪，说走吧，跟我一起出了门。我们一起来到营地后面的小树丛里。四面死一样寂静，漆黑，一只“鬼灯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嚯嚯嚯地阴笑，吓得我身上一层一层地起鸡皮疙瘩。

玉璧带我走到一片空地上，叫我站住，自己却走到前面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前，点上了一支香，然后过来，指着鬼火一样忽闪闪的香火头对我说：“呶，手这样伸直，别抖，眼睛从这里穿过这准星看出去，三点一线，瞄准。”

那一夜，我瞄得头昏眼花的，这才晓得夏林、金积成和玉璧他们的枪法都是苦苦练出来的，而不是赌气赌出来的。战场上的事情，不是他打死你就是你打死他，来不得半点虚的。

可是再苦，我也得练，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再说，话都说出来了，总不能让那么多人看笑话。我咬紧牙，先是伸着一只手练，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在枪上绑块石头练；先是练手枪，后来就练长枪；先练右手，后来又练左手，练得手臂肿了又消了，消了又肿了，终于拿着枪不抖了。可是不抖是回事，打得准又是一回事，既打得准又打得快更不容易。我练着练着，慢慢悟出了这其中的道理：这打枪和画画，看起来是一文一武的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其实其中都只有一个奥妙：心要沉，手要稳，开枪的那一瞬间就好比画画儿画到了关键之处，一定要屏住呼吸，千万慌乱浮躁不得。看来古人所说的万物相通于心这句话，真是有道理。

我们的子弹宝贵，瞄准练得八九不离十了，才开始练实弹。没多久，我就宣布可以考试了。那天，夏林、金积成和双枪队的好多队员都来了，玉璧在一边远远地站着，抱着双手也不说话。

夏林问：“大姐，你今天打什么？”

我说：“随便你。”

于是夏林就开始在几个小树桩上摆石头。我退到百步之外，叭叭叭几枪，那几个小石头便飞得无影无踪了。有人不服气，直喊退远点退远点！于是我又退，又打，又把石子打飞了。人群中“轰”地一下子炸开了，有人说她没练几天嘛，怎么就……又有人说其实也不算什么，我们平时都是打香火头，只是这大白天，香火点着了也看不清；不过一个女人，又没有练多久，

能打成这样也不容易了。

我一听，回过头去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心里窝火得要命。一抬头，看见枪声惊起的一群麻雀，正绕着树林子飞呢，一抬手，“叭叭叭”三枪，便打下一只小麻雀来。人群里“哗”地响起了一阵掌声。我却急了，顿着脚说：怎么三枪才打下一只！说着就换了左手，大声说：“不算不算，再来，夏林，快帮我轰麻雀！”

夏林伸手按住我的枪，说：“算了吧，大姐，早就晓得你的左手比右手打得好。你要是再三枪打下四只来，叫我们这些男子汉的脸往哪里放嘛。你看看大哥，眉毛都笑弯了。”我一回头，玉璧在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手一挥说：“行，今天我们大家给你开个庆功会，庆祝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女神枪手！”

我的枪法，就这样练出来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使我受益匪浅。

不久刘铁回来，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我们大队人马在山上，以后的困难会更多，因此除了少数骨干之外，其余的都要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那天晚上，一大批起义中表现突出的骨干举行了入党宣誓。刘铁在宣誓仪式上宣布：华蓥山农民自卫队正式成立，刘铁任政委，廖玉璧任队长，下面三个分队，由金积成、夏林、谭之中分别任分队长，陈亮佐协助玉璧工作。刘铁还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华蓥山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成立了。我们不再依靠地主士绅们来打天下，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我们自己。我们这支队伍以党员为核心，党员们一部分随下山的群众一道，分散到各乡各场去开展农民协会工作，另一部分和玉璧留在山上，以图后计。

坚持在华蓥山区的最后一支起义部队，就这样遣散了。北风吹着遍地衰草，我们目送下山的弟兄们，谁也没说话。起义以来，他们跟着玉璧出生入死，打岳池，攻邻水，打得军阀焦头烂额。可是现在，他们却这样默默地走了，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还是负责后勤供应，因工作的特殊性，不能暴露身份，没有参加那天的宣誓仪式。

罗泽洲占了顺庆以后，又忙于刘湘和刘文辉叔侄的“二刘混战”，听说廖玉璧把剩下的几百人都遣散了，正无后顾之忧，于是把围山的队伍也撤走了。

吃茶评理

仗火虽然停了，但对玉璧的通缉令和封产令还没取消。最近听说黎梓卫新团总刘月波伙同一个土豪团政江豪元，把玉璧的母亲捉去关在碉楼里，扬言要三千大洋才放人。玉璧成天阴着脸，人都急瘦了。

一天，我正和夏林、金积成在树林里练打枪。刘铁把我叫去，说有一个重要任务给我：下山去把婆婆和家产夺回来。我听了觉得有些不妥当，现在山上这么困难，咋能先去顾我们个人的家产和老母亲？刘铁说：“玉屏，你们别以为这是你们的私事，这也是我们的一着棋啊。你想，现在好多人都跑了，躲了，山上剩下的这些人，多数都是扯红了的，长期孤守在深山古庙

里，就会变成聋子瞎子，只好等着挨打。我们都想好了，玉璧被通缉虽然对你有影响，但你毕竟没有完全扯红。你的关系多，做事胆大心细，如果这次能借救母之事，想办法在黎梓卫站住脚，争取今后的公开活动，我们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变。”

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问怎么办。刘铁说：“查封令通缉令都是刘瑞文逼着前任县长干的。现在刘瑞文被罗泽洲撤走了，县长也换了，听说新上任的县长是一个封建礼教很重的老头子，对情况不熟悉。再说救婆婆，争财产，也是作媳妇的本分，一定会得到乡亲们的同情。只要你沉住气，不惊不诧，他们摸不透你的虚实，谅他们也不敢对你咋样。”玉璧听了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老刘啊，你真不愧是个摇鹅毛扇的孔明。”

我望着玉璧，就冲着他多日不见的这一笑，冒这个风险也值得。

第二天，我带着谭之中等六个兄弟，坐滑竿下山了。玉璧送了我一程，然后去了重庆。

农历三月的华蓥山，夜风依然寒气逼人，满山竹木茅草在风中此起彼伏，滚出阵阵涛声。我由两个兄弟抬着，大家飞快赶路，午夜时分才赶到太阳坪。

自从去年下了张玉如的谷子之后，有好几个月我都没回家了。罗泽洲的队伍来抄过好几次，婆婆被刘月波他们拉走以后，屋里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弟弟不敢回家，弟媳一见我就哭着埋怨。院子里的人都来了，见面就数落罗泽洲的队伍和土豪劣绅们是如何张狂。

参加过起义的年轻人在家里蹲不住，都想上山去找廖大哥……我强压着心中的火气，送走了乡邻们，然后打起火把，和谭之中一起去找邓大爷邓百光。这位黎梓卫街上义字号的袍哥大爷和我沾亲，出身倒也贫寒，手下一百多个兄弟伙，也还有点正义感。去年起事时，他也在关帝庙赌了咒、喝了血酒的。

我找到他，只说这次回来是替玉璧交割当团总期间的帐目，还要请邓大爷就我婆婆被“拉绅士”（绑票）的事情说几句公道话。邓大爷听了，有些迟疑。我知道他怕担风险，就说：“我还有事情找刘月波呢，县上都撤消了对玉璧的封产令和通缉令，他故意压着不宣布。”

“当真？”邓大爷似信非信。

“当然嘛，要不然我今天还敢坐在你面前吗？”邓大爷这才放下心来，满口答应。

我们接着又走了几家，请出了替玉璧管帐的唐光明和一些地方上的三老四贤。由于玉璧在任时很得人心，我又说得理直气壮，都愿出来主持公道，至少也可以看看风头。

一切安排妥当，天已经大亮了。我匆匆用过早饭，坐着轿子一路威风地赶到黎梓卫街上。我在场口下了轿，让谭之中到轿行又喊了两乘轿子，先去茶馆里喝茶，自己正大光明地直奔乡公所。

街上认得我的人很多，看见我回来都很惊诧，三三两两地在议论。

“她怎么回来了，不是在通缉她和廖团总吗？”“胆子这么大，真是自投罗网。”

“恐怕已经撤消了通缉令了吧，要不她有这样大的胆子？硬是不要命了，我才不肯信。”

乡公所门口杵着“烧火棍”的乡丁们，看见我竟目瞪口呆，没有阻拦。

我大模大样闯了进去，一脚跨进刘月波的房门，大喊一声：“刘团总！”

刘月波正在抽大烟，连忙丢开烟枪，翻身从床上坐起来：“你，你，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回来了，刘团总，我是来投案的。”

“哪里哪里……请坐，请坐，有事慢慢谈。”

“莫稳起。刘月波，我问你，县府已经撤消了我们的封产令和通缉令，你为啥子不公布？”

“这……这……”他想了想说：“我没收到公文呀！”“没收到？你装疯！我问你，你把我母亲拉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呀！这……这不是我，是江豪元拉的。”“哼，你不知道！我母亲有啥子罪？就是犯了法，自有衙门管，你为啥私自关人，不送县府？你们拿刑罚给她受，还要罚她三千元才放人，这不是拉绅士是啥子？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是哪个叫你们这样做的？走，我外面预备了三乘轿子，一同到县府去，非跟我把话说清楚不可！”

刘月波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我一阵痛骂，气势汹汹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要他跟我一道去县府说理。

他战战兢兢地说：“啧啧，廖大嫂……本地人，有话说得清楚的嘛！你记不记得你们下张玉如家的谷子，我都是打了让手的哟！”

“那好嘛，你通廖家的人，脱得了手吗？走走走，轿子我是备好了的，地方上的人我都请到茶馆里坐齐了，你今天不给我说明白，休想走路！”

我拉着刘月波出来，正好迎面碰到江豪元，便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起拉到茶馆里。我们一路吵吵闹闹惊动了整条街，茶馆立即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看了看，邓大爷他们都已经来了。黎梓卫所有的团政也基本上到齐了，其中有的是参加过起义，未曾暴露潜伏下来的，当然倾向我；有的见风使舵，见我理直气壮公开出面了，也表示向我靠拢。管帐的唐光明过去垫了几百元，一直出不了头，听见我出面报帐，当然乐意；只有青万福最坏，但他过去收款时吞过几百元，屁股上夹了屎，量他也不敢说啥子。

我打开帐簿，对大家说：“今天惊动各位乡亲近邻，不为别的事，玉璧他到上海去了，他作了半年多的团总，还没有向大家报帐。今天他来信，叫我请地方上主持公道的老前辈和乡亲好友，出来评评，看看廖玉璧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是土匪。”然后我就把罗泽洲的五年借券由二十多万增加到四十多万元，玉璧力争减免，以致引起军团冲突；以及在团总任内，不增加地方负担，自己卖田垫了二千八百余元办公益事业等等情况谈了一遍，最后说：“请大家评评，廖玉璧在任团总期间，究竟派过多少款，收过多少税，地方上发生过抢案盗案没有？现在的情况又怎样？”

除了青万福鼓起一双鹞子眼望着我外，很多人都边听边点头，有的说：“是呀，那半年我们是过了点安稳日子。”“廖团总人虽年轻，办事就是公道。”

“廖团总是一个好人，就是一根肠子杵齐天，办事不晓得转弯。”

我看同情我的人多了，胆子更壮了：“可是，有人还说他是土匪，说他贪污，刘团总还私自把他母亲扣押起来，逼她出三千元。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廖玉璧犯了法，又与他母亲有何相干？这不是公开抢人是啥子？”

刘月波看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话，非常着急，连忙说：“这是江豪元拉的，

与我无干，与我无干。”江豪元看势头不对，急忙说：“我是奉县府命令。”

我心里非常冒火，说：“你奉县上命令，为啥子不送县府，却要关在你的碉楼里？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啥子说的？走，这里说不好，我们到县府去说。”我又对旁边的谭之中说：“老谭，再去叫十乘轿子，请大家一起到县府去对质。”刘月波紧张起来，连忙说：“马上，我马上派人把伯母送回家。”

“不行，到县府。”我的口气更硬。

唐光明对刘月波说：“这个事你们亏理啊！”

邓大爷此时也站起来说：“刘团总，这事你们到不得县府啊！到县府对证我们只有说实话哦，你们就是想敲榨嘛！玉屏，我看地方上的事就在地方上解决，何必到县府去……”我看他们全都垮了，便说：“好，我看在邓大爷和在场各位乡亲们的情面上，暂时不到县府，但今天非得解决不可。现在马上把母亲送到这里来！我看要是脚拇趾破了一点皮，都非告你们不可，不弄清楚，这官司打到哪里都可以。”

隔了不多久，婆婆抬来了。我把老人家从滑竿上搀扶下来。她又黄又瘦，一副病容，一见到我就眼泪汪汪地哭起来。我赶上去抓住江豪元说：“不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青天白日拉绅士，把我母亲整成这个样子，大家看看究竟谁是土匪……”

江豪元连忙解释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信你们问老太婆。”

婆婆一包眼泪一口气地说：“刑罚倒没有受，受了不少狗气。你们骂我的儿子，骂我的媳妇，不给我饭吃，逼我要出三千元才放我，你们这些不是人的东西！”

我气急了，将江豪元一拖，撞在桌子上，打破了桌上的盖碗茶。大家都站了起来，我说：“不行，你们这样对待我的母亲，简直欺人太甚！走，轿子早就准备好了，到县府打官司去！”

江豪元在旁边吓得不敢开腔，刘月波苦苦要求不去县城，其他人也劝我就在地方解决。

我松了口气，可又想到起义后，王尧代替玉璧作了资马十二场的大队长，无恶不作，大人细娃都恨他，有些地主团总也怕他。他是这一带的土皇帝，也是我们的死对头，要是刘月波这些人去报告我回家的活动，那就麻烦了。我先发制人，壮起胆子说：“好！不到县府也可以，那就到王尧大队部去。”

江豪元听了，果然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刘月波也拉着邓大爷的袖口直扯，叫邓大爷跟我说情。好几个团政都站起来为刘月波、江豪元说好话。我看个个都软了下来，就说：“今天看在大家的面子上，不去也可以，那我母亲怎么办？”刘月波说：“马上派人送回去，马上就送。”

邓大爷说：“就这样随随便便送回家去？恐怕要挂红放鞭炮吧？”

“对对对，”刘月波对江豪元说：“你快点去办！”

江豪元跑到街上买了几柄千子头的大鞭炮，扯了一丈二尺红绫挂在轿子上。我定了定神，觉得事情还不能就这么算了，便站起来说：“大家为我的事情忙了一天，先吃了饭再说。走，到馆子里去，我招待。”

“江豪元，恐怕不能让玉屏招待啊。”邓大爷慢条斯理地说。

“江豪元，这个你不能推辞啊。”唐光明也补充了一句。“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你招待，江豪元……”刘月波又装出一副假正经的样子，向着江豪元把嘴巴朝门外一呶。

江豪元站起来，准备到外面去包席。

我说：“不忙，你招待，普通席不行，要好的。”“对，参席、参席。”刘月波很大方地说。江豪元低着头，慢腾腾地出去了。

席桌摆好了，我的主意也打好了。

这江豪元是地方上一大恶霸，老百姓恨透了他，比起那些大军阀大恶霸来虽然算不了啥，但杀鸡吓猴，长长我们的志气，灭灭敌人的威风，也有好处。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今晚非要扫尽他的面子，硬要他磕转转头。

刘月波请我坐上席，又叫放鞭炮，我说：“不忙，还有事。”“还要怎样？”

“要磕头，头磕了才放鞭炮。”

我这一说，满屋子顿时清风雅静的，一个个你望我，我望你，像哑巴一样，都不开腔。

江豪元的脸马上变成刷白，“咚”的一下，坐在板凳上。

沉默了一会儿，邓大爷才说：“玉屏，这样使不得！江豪元几十岁的人了，儿女都成人了。”

刘月波也说：“不要过分了。”

我本来气就没有平息，一听更是火上加油。我指着刘月波的鼻子说：“啥子过分？我们拼死拼活卖田卖地为地方服务，现在整得我们一家人妻离子散，几乎家破人亡，到底谁过分？几十岁的老母，在家安分守己，把她捉来关起，还要敲榨勒索，是谁过分？！刘月波，你今天非给我说清楚不行！”刘月波苦笑着连忙解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些都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狐群狗党，狼狈为奸！”

邓大爷忙来转弯：“刘月波这话说得不恰当，将心比心，你们做的那些事，是叫人想不过。我看，玉屏，话明气散，算了吧。”

“不行，非磕不可，不然就到县府去，或者到大队部去。”“他几十岁了，你又是女的。”

“女的怎么样，男人不是女人生的呀？几十岁又怎么样，我又不要他给我磕，是要他给你们磕，你们帮了他的忙，他不该领情吗？”

邓大爷听说要给大家磕头，不开腔了，只是抽他的水烟。

江豪元一张黄裱纸脸色，泪水在眼眶里滚来滚去，哭兮兮地说：“我江豪元五十多岁了，连爹娘面前都没磕过头呀！”扯了好久，邓大爷等得不耐烦了，站起来说：“好好好，不磕算了，扯不好到县衙门去扯！你们要我们作证，照实说就是了。饭也不吃了，我们走了。”说着带头就往外走。

刘月波赶紧把他们拉回来说：“慢慢商量嘛，走了怎么行。”

唐光明在旁边站了好一阵，没开腔，此时对刘月波说：“我倒想了个办法，叫雷青轩来磕头，拉老太婆他也在场。”“对，叫雷青轩来磕头。”刘月波忙将雷青轩拉到我面前。我说：“不行，你们半夜三更吃桃子，拣软的捏。他是个甲长，你们逼他去，他敢不去？这事与他无干。江豪元，你平时仗势欺人，磕头还是便宜了你，不然就去打官司，两条路，由你选一条。”

江豪元逼得没法，又在刘月波的拉扯之下，万般无奈地磕起头来，他随着我的手，指向哪方就磕向哪方。厨房里的大师傅和帮厨的人，都赶出来看稀奇。

我的手指着看热闹的大师傅和帮厨的人，江豪元迟疑疑的，显然不愿意。我说：“哼，你看不起大师傅是不是？他们不做饭，饿死你！”

他没法子，只好又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头。大师傅弯下腰要扶他起来，被我挡住了。在场的人都忍不住要笑。

最后轮到我了，我看着他在我的面前慢慢地跪下去，指着他的头说：“江豪元，你几十岁的人了，今天来给我磕头没想到吧？告诉你，不要说磕三四个头，就是磕三四百个头，我也受得起，头也不会昏。”

江豪元一脸土色，鼓起一对牛眼睛，气得吹胡子，一头跑到茶馆外面去，像黄牛一样嚎哭起来。

后来听说江豪元回去就病了，好几个月都没去赶场。

六路追捕

我今天是出了口恶气，杀了劣绅们的威风，可通缉令和封产令都没有真正取消。黎梓卫离岳池城不过几十百把里路，这掩耳盗铃的把戏玩不长久，下一步必须假戏真做，弄假成真，越快越好。

我从床上爬起来，喊醒了谭之中，把罗泽洲发的债券、清乡费等等帐据都清齐，由他挑了一大挑，连夜赶进城去。

进了城，天色尚早，街上的人也不多。我坐的轿子在康家大院的门口停下，谭之中上前去叫门。大舅一向有早起的习惯，亲自开门出来，一看是我，吓了一跳，忙把我拉进书房，压低嗓子连连说：“你好大的胆子，怎么跑到县城里来了？你没看见到处都贴着通缉玉璧的大布告。”

我笑了笑：“大布告又怎么样？总得讲个道理嘛。玉璧离任了，我来替他办移交，还要去见县太爷呢！”“哎呀，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觉得好笑：“大舅，我不出来未必叫玉璧出来？难道我们就一辈子不露面，永远出不了头吗？”

在大舅家好好睡了一觉，下午我就到了邮政局找到熊尧莫。他一直没暴露，还是稳稳当当地当他的邮政局长。我把这次下山的任务和进行的情况告诉了他，请他拿个主意。他沉吟了好一会才说道：“这位毛县长不是本地人，来岳池就任的时间也不长，平时深居简出，加上前一段时间罗泽洲在这里横行霸道，他基本上无所作为。按理说嘛，这通缉令和封产令都是前任县长下的，与他无关。他又不大了解情况，你若是说得他相信，做个顺水人情是有可能的。只是如今兵荒马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他连自己这顶官帽儿能戴多久都不知道，完全可能……”

我急了，说：“完全可能不理我，是不是？如今事情已做到这地步，难道就前功尽弃，罢手不成？不行，来都来了，横竖我得见他一面再说。”

熊尧莫又想了想才说：“这事忙不得，这样吧，你先回大舅家去写张呈子，我去探个虚实，今天晚上你等我的消息。”当天晚上，熊尧莫到大舅家来了，说是毛县长愿意见我。

只要他说了这句话，事情就有了希望。第二天上午，我换了身学生装，带着写好的呈文，让奶妈抱着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宁儿，到了县衙门，把一张写着“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学生陈玉屏”的名片递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中门打开了，一位副官模样的人满脸恭敬地出来对我说：

“毛县长有请。”

走进中门，两边站着法警，都穿一身黑皮，像城隍庙里守门的小鬼，其中有认得我的，一脸的惊诧。我跟着副官走进小花园，来到厅房，毛县长弓腰驼背地接待了我。看上去，这位县太爷五十多岁，留着仁丹胡，时令虽已到三月，还穿一件青丝葛的皮袍子，上面套一件深灰色粉团花马褂，戴一顶黑瓜皮帽，手上还提着一个铜烘笼。客套几句之后，他坐到太师椅上，把铜烘笼放到脚下，抱了根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呼噜呼噜地吸起来。

我悬起的心顿时落下一半：原来是个老朽。

我把呈文交给他，又照呈文的大意说了一遍，最后说：“毛县长，你是一县的父母官，是维持正义主张公道的，这件事情请你秉公执正弄个清楚。”

“你放心，我尽力维持。”

他看到呈文上写的玉璧怕事，早跑了，便说：“啊！原来是个误会哟。”

我接上去说：“是啊，你老人家想想，去年起事的时候，这五路民军司令陈徙南是我叔父，玉璧是资马十二场的大队长兼黎梓卫的团总，不仅地盘是在叔叔的范围之中，情面上也是推脱不得。只是玉璧毕竟是个读书之人，回乡任职不过是为了服务桑梓，为民众做几件事情。虽说这件事情确因罗泽洲横征暴敛、搜刮百姓而激起众怒，酿成冲突，但玉璧不愿卷入战乱纷争，只得一走了之，去了上海。毛县长若是不信，请看最近才从上海写回来的家信。”我说着，从身上摸出一封熊尧莫造的假信来，双手递了过去。

毛县长瞟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点了点头道：“这倒不必要。不过廖玉璧一走倒不失为上策，不然要受牵连的。”“可是走了也要受牵连啊。”我愤愤地说，“玉璧人虽年轻，但是牢记长辈及师长教诲，上任后体恤民情，打击奸商以平市价，招抚游勇服务地方，不过半年光阴，偌大个资马十二场，即无兵患又无匪祸，士绅不受敲榨之苦，百姓亦能安居乐业，这些四方民众都有口碑，想必毛县长也是有所闻的。”毛县长摸摸下巴，默默地点着头。

“古人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玉璧书生意气，使得许多人不能像从前那样横行乡里，早就心怀不满，只是当时他上有长辈们的信任，下有百姓拥戴，奈何他不得。战事一起玉璧一走，这些人就跳了出来，一则为了报复，二则为了那两顶官帽，纷纷对他造谣中伤，甚至说他在华蓥山聚众为匪，最后致使罗泽洲听信了谣言，威逼前任县长对玉璧下了通缉令，查了我家的财产。这还不算，最近那些劣绅们还私设公堂，将玉璧五十多岁的老母拉去关在自家的碉楼里，要我家出三千大洋才放人，还说这是奉了县府之命……”我说到这里，满腔的仇恨不知怎么的，好像真化成了委屈，不由得眼圈发红，鼻子发酸。

毛县长将手中的白铜烟袋往茶几上一放，背着手在花厅里踱来踱去。

我停了停，继续说：“毛县长，我本是书香人家的女子，又随玉璧到南京东南大学读了书，多少见过一些世面，本不该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可他们实在是逼得我一家人走投无路啊。眼下这通缉令还四门高悬，许多人都说这衙门是来不得的，来了就出不去。可是我想，自古道罪不及亲，即使玉璧犯了该杀该剐的罪，也不应株连他的妻儿老少，更何况他是冤枉。现在他上有五十多岁的老母亲，下有我和他的孩子，全都生活无着，我只得四处奔走呼吁，让上上下下都了解这段冤情。今天我斗胆来见县长，一是带来了玉璧任职期间的各种债券和票据，替他办离任的移交，澄清他贪污公款的谣言，二来也是请县长为我们全家作主，救出婆婆，发还家产，也让我们夫妻团圆。”

毛县长一边听我的诉说，一边抽着水烟，好一阵才说：“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可通缉令和封产令都是前任下的，我怎么好……”

我赶紧接上话头说：“是啊，前任县长任老先生本是玉璧的恩师，玉璧是他亲手提拔重用的，下通缉令和封产令实在是迫于罗泽洲的淫威，不得已而为之。如今罗泽洲的军队已经走了，任县长已离任数月，过去的不过是军团冲突，混战一场而已，更何况玉璧根本就没有介入呢。”

毛县长把水烟袋往茶几上一放，说：“这样吧，你在一两天内做好一个请求撤销封产令和通缉令的呈文交来。这事要快，尽量在我的任期内解决，现在事情变化很快，我今天走明天走都不晓得……”

我想不到会这样顺利，忙站起来从奶妈手中抱过宁儿，朝着毛县长深深鞠了一躬，道了谢就要告辞。

毛县长客套了几句，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们乡上的团总说，你们把枪全部拿走了，可有此事？”

我听了一愣，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件东西，连忙镇定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递给了毛县长，然后愤愤地说：“玉璧在任时，为了防匪防盗，地方自卫，筹建了民团武装。后来战事一起，他便只身远走，身后一切事务都由后任接管，就连他贴身两人用的两支枪，也由我亲手交刘月波。不信你看，这是刘月波亲手打给我的收条。”毛县长看了收条，很生气地说：“这还了得，谎报军情，非把他捉来关起不可。”

我赶快告辞出来，一直走到街上才站住，心里还扑通扑通乱跳，没想到当初硬塞给刘月波的那两支破枪，竟在今天派上了大用场。

吃过晚饭，熊尧莫和谭之中赶紧清理帐目，我则忙着起草请求撤令的呈文，三人几乎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下午才清理停当。我写好呈文，带上帐目送到县府去，请毛县长派人核查过目，然后又带着债券税单，到征收局去办移交。找到征收局的林局长，将毛县长写给他的条子递了过去。那姓林的看了条子和我写的呈文，瞟了我一眼说：“你来办这个移交？”

我说：“是啊，廖玉璧到上海去了，我来替他办。”姓林的拿起一扎债券在手中翻了翻，不阴不阳地说：“这些都是上面派下来的粮款，你们拖欠一两年了，到现在一个子儿都没收起来，又原封不动拿来还我，有这么便宜的事？恐怕要拿点话来说吧？”

我知道他话中有音，但装起没听懂，正色说道：“林局长，话不能这么说吧！你们发的这四十万元债券，是向老百姓借款，说是从民国十四年借到民国十九年。借与不借，还要看老百姓愿意不愿意，我们只不过是帮你们去借而已。现在人家老百姓不愿意借，难道要叫我们去抢？还要叫帮忙的人拿话来说，天底下怕没有这种道理吧？”

林局长一时无话可说，瞪了我一眼，拿起那些债券清点起来。等清点完了，他又翘起二郎腿，得意洋洋地说：“这里面差了几千块票面，总是你们收了，一定得赔出来。”我站起来说：“林局长，你戴这顶帽儿不是一两天了，好多事情心里都明白。军团冲突时罗泽洲派了一团人到黎梓卫来，把场上抢劫一空，我家也是多次被查抄，票据当然凑不齐了。不信你把老百姓叫来对质，若是说姓廖的收了老百姓一文钱，我当家什卖土地都赔给你，赔不起还有条命！”

正说着，熊尧莫一脚跨进门来，看到这情景心里就明白了大半，问道：“怎么啦，玉屏？毛县长亲自打的条子，还不管用么？”

姓林的知道这好处是“榨”不出来的了，黑起脸打了收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从桌上拿起收条，抖了抖才揣进包里，咕噜了一句：“真是官都好见，狗难打整。”然后才和熊尧莫一起走了。我又写了个呈文，直接去找毛县长，并对他说：“这次承县长的情，还了债券，交清了帐。只是廖玉璧是离任团总，我又是个女的，我家垫款二千八百余元，没有着落，请县长勒令现任团总征收，还给我们。”

毛县长听了我的话，又看了呈文，便在上面批着：“廖本人所垫出之款项二千八百四十五元，勒令当地团总摊派偿还。”

我们告别时，毛县长又说：“你们的封产令和通缉令，我已下令撤消了。”

回到黎梓卫，我在街上公布了玉璧任团总期内的帐目。街上顿时围得水泄不通，这个说：“盖了朱红大印，该他们出头了。”那个说：“哪有当团总不捞几个的，像廖团总这样自己垫钱出来的，硬是少有。”邓大爷在人群中大声说：“公事公办嘛，人家垫了钱，当然应该还……”

我和谭之中挤出了人群，走进乡公所，一眼就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法警，正押着刘月波出来，我说：“刘团总请留步，这里有毛县长亲自批的呈文，说我们垫的那笔款子，请你从公款中扣出。”

刘月波看了我一眼，垂头丧气地说：“我这官儿怕是当不成了，你去找后任吧。”

我心里明白，都是因为那两支破枪，这个专门欺软怕硬的东西，关他几天也活该。

新任团总王守义，是个阴险毒辣、爱钱如命的家伙，要从他嘴里掏出钱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若是想吃掉我们这笔钱，也没那么松活。我和谭之中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找到王守义，他正在和地主青万福坐在一起喝茶，愤愤然地在说啥。

我拿出毛县长的批文对他说：“王团总，我们垫出的那笔款子，县府批的由地方上付还，请你帮忙收一下。”王守义拿着批文看了又看，一副为难的样子：“哎呀！这么大一笔款子，又不是我经手的，你最好……”坐在一旁的青万福说：“是嘛，这种事情，谁欠谁还，你最好找前任去。”

“谁戴了团总这顶官帽儿，我就找谁；谁不愿戴这顶帽儿就滚下台，我就不找他。”

青万福把水烟袋往桌上一顿，站起来就要发作。王守义虽然脸上白一块红一块的，却拦住了青万福，干笑两声说：“廖大嫂，万事好商量嘛，何必动火气呢。早先那些事情都是刘月波他们干的，我可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哦。我看这样吧，既然这事毛县长也说了，让各地摊派归还，总还要把大家叫拢来说一声，商量一下嘛，你看是不是缓两天？”“我家里被罗泽洲抄过好几回，现已无隔夜之粮，这钱是缓不得的，你们先从公款里扣给我，再慢慢去摊派吧。”“那……也得让我清理交结清楚了再说吧？你是看到的，刘月波刚刚离了任……”

我想也是，逼紧了反而显得不近情理，就说：“那好吧，明天早上我听你的回音。”

晚上，山上下来了人，说队伍要转到渠河边的石龙场，叫我和谭之中赶快回去。我让老谭先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向刘铁汇报一下，让他心中有个

底。可谭之中横竖不干，非要和我一起走，他担心地说：“大嫂，那些家伙丢了脸，决不会就此罢休，现在又找他们要钱，等于虎口夺食，要比让江豪元磕转转头难得多啊！”

我说：“这个我心中有数，你老跟我在一起，人多影子大，反而不好办事。再说你今晚上走，明晚上就可以回来，看你刘大哥怎么说，我等你的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起床，就来了个团丁在门外喊：“陈先生，我们王团总说了，请你去领款子。”

我在屋里应了一声：“知道了。”心里很有些得意。这些人都是属狗的，还是怕恶人，江豪元、刘月波都被我治住了，你王守义未必有三头六臂！

我匆匆吃完早饭，正在换衣服，外面又来了团丁在喊：“陈先生，我们王团总把款子都收齐了，叫你赶快去领。”前两个团丁恐怕还没走拢场上，第三个又气吁吁地跑来说：“陈先生，王团总说的，你再不去拿款子，丢了不负责哟！”

昔日一毛不拔的王守义，今天却如此慷慨起来，难道他真的怕了我不成？这里面恐怕有名堂！想到这里，我便装着满不在乎地说：“王团总有兵又有将的，钱在他手头都会丢吗？你回去跟他说，我人不大舒服，刚吃了药，下午才得上街。”

团丁走后，我在家坐卧不安，一时倒没了主意：若是去吧，这帮子地头蛇可不比毛县长，许多底细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随便被他们安一个罪名抓起来，款子拿不到不说，反而要给山上添许多麻烦。可山上那么多弟兄，吃的用的哪一样不等着要钱？眼下封产令虽然撤了，但兵荒马乱的，谁也不敢买我们家里的田地，想来想去，也就只剩下向王守义要钱这一条路了。这次任务完成不好，别说自己，就连玉璧的脸也没处放。起义后我哪被任务不是做得圆圆满满的，难道这次还败在王守义手中了？

我越想越不服气，拿起衣服就准备出门，却听见有人在敲后门。我拉开门栓，一个女人闪身进来，反手把门关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屏姐，你赶快走，他们要害你呢！”

我定睛一看，这人瘦瘦弱弱的，剪一头短发，原来是我中学的同学，后来嫁给地主段泉的蔡月娥。听到她的话，我心中已明白了大半，却一边让座一边倒茶，漫不经心地问：“谁要害我呀？”

“还有谁？就是王守义、青万福、江豪元他们几个坏心肝呀！”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开腔。

月娥知道我信不过她，停了停才说：“昨天你前脚刚走，王守义、青万福他们就在后头商量，说是黎梓卫码头都被你和廖大哥干吃净了，眼下廖大哥自己不出来，就支使你出来，把江豪元气得到现在还起不了床……”月娥偷看了我一眼又说：“他还说世上只有男州，哪有女县，你把阴阳都颠倒了，一定要为江豪元出这口恶气。”

我已经是怒火中烧，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是段泉亲自听见的。昨天散了场，王守义、青万福到烟馆抽大烟，段泉正在床上睡着。他们一进去叫了段泉两声，又推了几下，段泉装做睡着了，动也没动，他们就开始商量：先叫你去领款，领款回去经过盛家院子时，预先躲在里面的人出来抢了你的钱，然后把你暗杀了。若有人来查，就说是土匪谋财害命。”

他们又商量，要是你不回家，不经过盛家院子，就在黎梓卫四周埋伏

人，只要你出场口，就要整死你……”

现在我明白了，为啥上午接二连三地派几道人，但是我还是不敢完全相信她的话。她虽然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和我还沾点亲戚关系，过去也相处得不错，起义时还与我们送过信，但一年多未见面了，人心隔肚皮啊。现在我的处境又不好，她会不会和那帮人串成一伙，把我骗出去，找个地方黑整了呢？我说：“不会吧，王团总还在帮我维持呢，再说县里都盖了朱红大印，我就不信他们吃了豹子胆。”说着就站起来，拿过手边的衣服披在身上。

月娥见我真要走，连忙上来死死拉住，带着哭声说：“屏姐，你去不得，去不得呀！我晓得你信不过我，你恨我嫁了段泉，但我心头一直是记着你、佩服你的。我不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你不晓得我心里多着急，生怕你中了圈套，好不容易扯了个谎，说找鞋样子才跑了出来。屏姐你要相信我，赶快想法子走……”

她眼泪巴巴地哀求着，又慌慌张张地走了。

蔡月娥刚走，又来两个团丁在大门外干嚎。我让婆婆出去说我吃了药正在发汗。那团丁说：“早晨不还是好好的吗？我们团总请她看戏呢。”

“回去给你们团总说，刚才医生打了招呼，说吃了药敞不得风，今天不去啦。”

团丁又走了，事情也真相大白了，看样子迟疑不得，真的要快走。可他们到处都设下了卡子，怎么个走法？想来想去，只有绕过黎梓卫，过白茄河到罗渡溪。我急忙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邻居何家的孩子何明轩放牛回来，我连忙把他喊过来，耳语了几句。这娃儿挺机灵地点点头，放下牛草背篋转身就跑了。

由我家到白茄河只有八里路，不到一个时辰，明轩就回来了，对我说：“表嫂，不得了，河中间有只船没有开，船上六七个人在摆龙门阵，河那边有两个人背着手走来走去，我看都不是好人。”

我说：“好，你再到黎梓卫去看看，看场上两头和路上有人没有？”

他走后，我连忙收拾东西，今晚决不能在家住了。我把衣服刚清理出来，明轩又跑了回来。

我问他：“你咋跑得这样忙？”

“心急得很。表嫂，黎梓卫也不对，我看先来喊你的那两个团丁换了衣服坐在场口的一块石板上闲扯，还向四周东张西望。”

我忙从锅里铲了一块麦把放到他手里，一边叮嘱他莫要对外人讲，一边又把剩下的麦粩放在衣服包袱里。明轩狼吞虎咽地咽下一口麦粩，歪着头说：“我晓得，你和大老表都是好人。二天等大老表回来，我还要去投他呢。”“投他干啥子？”

“干啥子？打恶霸和军阀，二天穷人才有饭吃。”我连忙捂住他的嘴：“娃娃家莫乱说，这种话说出去要砍脑壳的。明轩，走，跟我一起上回龙庙。”

“要得，我给你背包包。”

天都黑了，谭之中还没有回来，我却是无论如何也等不得了。我简单向母亲交代了几句，就和明轩一起出了门。三月初，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我又很少走夜路，只得在又窄又滑的田坎上一步一步向前摸着走，好不容易看见前面明晃晃的，我想一定是大路了，没想到一脚踩进一块水田里，水花溅起多高，鞋袜和裤脚都糊满了稀泥。明轩忙把我拉起来，牵着我的手，一

步一步摸到回龙庙前。庙门关了，我们又不敢喊门，就只好坐在庙门口。

乌云密布的天空，三月初头的寒气，夜风呼呼吹来，明轩光着一双脚板，身上穿得又单薄，冷得直发抖。我打开包袱拿了件夹衫给他披起，又递了块麦粑给他，却不见他伸手来接，我摇了摇他，发现这孩子已靠着我睡着了。

天渐渐亮了，庙里的鸡叫了头遍，我摇醒了明轩，从走马岭背后摸下河滩，叫住了一只船。船夫用篙杆往岸上轻轻一点，小船漂向河心，我一边挥手让明轩回去，一边长长出了口气，心里在说：“再见了，我的对头门……”后来听婆婆说，天刚亮就有个团丁来叫我，婆婆说：“走了。”气得那家伙跺着脚骂：“好大的本事！六路捉拿她都逃走了！”

我千辛万苦连夜赶到石龙场，满以为会得到嘉奖，却不料挨了一顿批。刘铁说我不该只顾一时出气痛快，忘了此行的目的，结果不但没在黎梓卫站住脚，反而使劣绅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任务没完成，还差点丢了命……我一连两晚都未睡好觉，唉！看来这革命真是不容易啊！

血溅渝州

我刚回到石龙场的第二天，熊尧莫就风风火火地赶来，说他接到重庆打来的电话，玉璧在刚刚发生的“三·三一”惨案中受了重伤，伤在头部，正在设法抢救。

我听了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一阵头晕。伤在头上，正在抢救，这还有啥话可说？他这么年轻，万事都才刚刚开头，难道就……我不敢再往下想。熊尧莫见我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的，忙安慰我说：“既然是重庆老袁大哥来的电话，那边组织上会尽力照顾他的。只是现在重庆驻满了军警，刘湘派他的部下王芳舟和兰文彬四处抓捕共产党，要在那边隐蔽下来很困难。我已经电汇了三十元钱去，还说只要病势一稳住，就让他们派人送回赛龙场你姐姐家。”

我一听如梦初醒，连忙赶到二姐家，屁股还未坐得稳，玉璧就由重庆那边派了六个人四支枪一乘滑竿送回来了。他头上包了块白帕子，面无血色，昏迷不醒。我想到二姐家既不安全又不方便，连忙又叫抬到彪子山寨上我叔父陈祝武家去。

彪子山寨，在一座小山梁子上，面临渠河，修得倒也牢固。听说当年闹辛亥革命时，也是一个战略要地，寨子里的火药库里，至今还藏着十二门牛耳大炮和几千斤火药。只是由于种种不便，后来许多住户都搬下山来照顾自己的田土，寨子里的房子很多都空着。寨里寨外，一大半住户都姓陈，也算是个陈家寨。叔父陈祝武，虽然知道我和玉璧都是“危险分子”，但一向对我们都极好，再加上这里山高皇帝远，又是个没有油水的穷寨子，不大招惹风险，养伤是个极好的去处。

我们赶到他家里，玉璧一上床，就一口一口地咳血。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只是淡淡一笑，然后吃力地对我摇摇手，表示没关系。我急坏了，连忙与叔叔商量，一边派人去上马寺请专治外伤的康和尚，一边又叫人去请治

吐血病的陈炳基叔叔。康和尚与我外婆家挂着亲，我叫他和尚舅舅，他仔细看了玉璧头上的枪伤，双手合十地说：“阿弥陀佛，还好还好，没伤到要害。”说着就开了处方，让一直守在旁边的陈仁勇去捡药。

不一会儿，陈仁勇满头大汗地提着药赶回来。和尚舅舅将药捣成细末调上水，敷在玉璧的伤口上，然后和炳基叔到堂屋里商量了一阵，对我说：“玉屏，你放心。玉璧是干啥子的，我们心头明明白白。刚才我和你炳基叔商量的，这两天我们都守在这里，只要不染风寒杂症，不出个把月，病情就会有起色。”

玉璧吃了炳基叔的两副药，咳血止住了，精神也稍好一些。重庆来的人休息了两天，临走时玉璧叫我拿了四十元钱与他们作路费，又托他们给老袁大哥带了几斤腊肉，还给一个叫周汤圆的人带了五十元钱感谢他。我送走他们回来，看到刘铁、熊尧莫也来了，他们坐在玉璧的床边，问东问西的。玉璧打起精神安慰他们说：“这点伤不算啥，事情没干完，回不了老家的。”

大家见玉璧的脸色好了一些，都松了一口气。熊尧莫问：“听说那天我们的人和老百姓牺牲都很大，难道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玉璧说：“准备倒是有的，事先也对学生和老百姓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就是没想到刘湘、兰文彬会这样下毒手。”

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三·三一”惨案的前后经过。

就在我下山去逼江豪元磕转转头的同时，玉璧也接到上级的指示赶到重庆，并和老袁同志接上了头。他汇报了山上的情况，老袁鼓励安慰了他一番，告诉玉璧目前的情况有些变化，蒋介石已和帝国主义及四川的军阀勾结起来，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老袁还说，调玉璧下山，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 e* 镜囊懂肌 5 笔彼拇 T 殉闪 司 匠铍 oe 公、朱德、刘伯承三人为委员，杨闇 e* 婢 榷牵 籽怠 跽和参加顺泸起义的一批同志，关系都直接掌握在闇 e* 擲铎三月二十七日，玉璧见到杨闇 e* oe 公说：“现在城市工作担子很重，考虑到你原来在南京搞过学生运动，把你调下来，以教书为掩护，主要搞学运。山上的事情就交给刘铁，待时机成熟以后你再回去。”闇 e* 垢罄晒籽担 焯埃 匸 露十四日)，北伐军攻下南京，英美帝国主义为掩护军阀孙传芳的败退，炮击南京下关，使千余名和平居民伤亡。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但不提抗议，反而加快反共部署，已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公愤。我们决定“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于刘湘已公开投靠了蒋介石，估计会场将有特务捣乱，你现在要全力投入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玉璧按照闇 e* 陌才牛 撕眉柑欤 ； 鹾翘煊置 虐老袁维持会场秩序。到会的各界人士群众有万余人，维持会场的纠察队不断发现有便衣特务混入会场，气氛很紧张。约十一点钟，主席台的人和群众团体差不多都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会场的入场口突然响起枪声。主席团的漆南熏连忙趋向台口，企图安定秩序，没想到一群举着刀枪棍棒的暴徒向他扑来。玉璧见势不好，正要冲上前去，不想自己却被一群乱兵捉住，扯下他腰间一条打算改装用的黑丝带绑了，七拖八扯地押出了会场。

刘湘的师长兰文彬，指挥着警宪特务在会场中大砍大杀，一时枪声大作，惨叫四起，满地横着群众和学生们的尸体。玉璧被那四个兵押到一条背静的小巷，这里的铺面全都关得紧紧的，一个人也没有。兵痞们突然叫玉璧站住，让他把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脱下来。玉璧低头一看，才想起身上穿的

是临行前二姐夫送的里外一身新，这才明白几个兵为什么当时没有砍死自己。他坦然地说：“脱衣服可以，总要先把手给我解开嘛。”一个兵迟疑了一下，上前把丝带解开了，玉璧先解开了上衣，然后又弯下腰去脱鞋子，突然摸到了腰上的钱袋，里面有二十多块银元，也是临行前二姐夫送的。他灵机一动，将袋子扯了下来，哗地一声，银元就滚了一地，两个拉着他衣袖的兵痞看着，当时就呆了，手一松，玉璧趁机将手从衣袖中抽出，拔腿就跑。

“人跑了，人跑了！”抓住玉璧两只空衣袖的兵惊慌地猛喊，既想去追又舍不得地下的银元。犹豫的瞬间，玉璧已经跑了好几十米远，才听见后面噼里啪啦的枪声。玉璧在东南大学就是学体育的，腿快，他拐进一条死巷，一个纵步跳上墙头，低头一看，下面是临江门，城门上有卫兵把守。后面的枪声喊声已紧紧跟来，玉璧突然觉得头皮一热，一股血水就流了出来，他用手胡乱一抹，一鼓气跑上城墙，又从城墙上跳出城外，渐渐感到呼吸困难，心里发慌，偏偏这时裤腰带也跑断了。他赤着一条身子跑着。转过官山，看见一座茅草房，他便一头撞进去，随手把门关上。这是一家卖汤圆的小店，店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姓周，人称周汤圆，见一个人光着身子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吓了一跳：“先生你……”

玉璧说：“让我躲一下，后面有兵追我。”

周汤圆一听，连忙把门关上，把玉璧拉进里屋，又把棉袄脱下来给他穿起，玉璧坐床上不住地喘气说：“我们今天在打枪坝开民众集会……”

周汤圆一听，什么都明白了，连忙扶着玉璧躺下，又把鼎锅里煮的汤圆水舀了一碗递上来。玉璧刚喝下一口，就觉得心头一热，头上的伤口涌出了一股血水，疼得不得了，要爆炸似的。周汤圆一眼看见，忙解下自己头上一条白布帕子，紧紧给他扎着。

玉璧在床上坐了一阵，便忍着疼痛站起来，对周汤圆说：“老兄，麻烦你了，我不能久呆在这里，等一下大搜索的兵来了会连累你的。”

周汤圆一听慌忙说：“先生你走不得，你听外面还在打枪，你先躺下，我去去看看动静再说。”

“不，你不能去，外面乱得很，看飞子……”

“哎呀，先生，我不怕，我挑起担子，这官山一带没得哪个认不得我周汤圆的。”

玉璧一急，吐出几口鲜血，好一阵才缓过气来，对周汤圆说了声“冷水”。

“先生，冷水要不得。你在吐血，心头一遇冷的，二天不好医。这阵天都要黑了，你这个样子还能走到哪儿去？你要听我的话，安安生生躺在这里，我去给你请医生来。”

正说着，就听见外面有几个人大声武气地在说话，周汤圆忙把铺盖给玉璧塞紧说：“先生你装成病人，千万莫开腔，我就说你是我的大哥……”

外面已经有人拿枪托砸铺门，一个兵在喊：“周汤圆，周汤圆！他妈的，死人！”

周汤圆口里喊着来了来了，坐在床前没有起身。另外一个兵又喊：“还有汤圆没得？”

周汤圆这才过去，慢吞吞把门打开说：“哎呀你们来得不巧，我今天生意都没做成，你们看嘛，这鼎锅头只剩了些浆水，倒还是热的。”

一个兵不满意地说：“不卖汤圆，关起门来做什么？”“先生，人身都

是肉长的，全靠一口气，这外面炮火连天的，关起门来都还怕挨飞子呢。”

一个年轻点的兵骂道：“豌豆子滚屁眼，没得那么遇圆（缘）儿！不拿汤圆来吃，废话倒是一大箩。”说着几个兵就要走。

周汤圆跟上去问：“请问诸位，今天啥子事打枪？这阵街上有人走动吗？”

“你问这个做啥子？”

“嘿，嘿，我们做小生意的，总是巴望有人来光顾嘛。”

正说着，后面过来一个军官，一脸的凶相，见了这伙兵就吆喝：“哪个喊你们在这里吃汤圆？还不给老子追，跑脱一个共产党，就要你们脑袋搬家，看你们有几个脑袋！”那几个兵吓得连忙走了。

夜里起更时分，周汤圆找了一乘轿子，把玉璧抬进城里找到了组织。后来我们听说，地委的许多同志，都在这场大惨案中牺牲了。漆南熏当时就被砍死在重庆两路口；第二天，重庆地委组织部负责人冉钧被打死在重庆天主教堂附近；四月四日，杨闇 e* 驹诳M 嚟诟拇 媳徊叮 腥送 怖 严刑拷打，都没达到目的，终于在六日晚上，在重庆的浮图关将他秘密杀害。闇 e* 谛坛 喜欢系馊吆麟诤牛 腥司拖用刀割去了他的舌头；闇 e* 楠 员牵 腥撒钟玫陡钊于忒的鼻子；闇 e* 慷 樱 檬种复料虻 腥耍 腥撒滞谏于他的双眼，砍掉他的双手。他最后身中三弹，才倒了下去。这时的闇 e* 杲韶 潘辘 姆蛉苏宰诳 俏谎 度似都非常好的年轻女子，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消息传来，玉璧一连几天都不吃不喝，我红肿着一双眼睛，在昏昏的油灯下守着他，想了很多很多。从前，只觉得“革命”很时髦，很合我的口味，只要由着性子闹下去，就会把旧世界闹个天翻地覆。可是现在，我才感觉到“残酷”这个词的含义，而革命就是要在这种残酷中行进。我看着昏睡不醒的玉璧，又想起了他刚刚回家时照的那张照片，和说的那些当时叫我莫名其妙的话，知道无论这条道路多么艰难，他都是要走下去的，哪怕有朝一日也会像闇 e* 骄 钦度 可是万一他真的有了个什么好歹，我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恐慌。事情到了今天，我已经不可想象生活中没有他，宁儿和即将出生的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决不能没有了爸爸。我这个从来认为和所有女人不一样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对还是不对，只是想起就哭，哭了好多次，最后横下了一条心：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着他走到底！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了玉璧，不管他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要跟着一起去，哪怕有一天会像杨闇 e* 的夫人一样我也不后悔。而在这条路上，他也不能没有我，他不能没有我支持，没有我陪伴，没有我帮他分担；他从事这种事业的能力、勇气和决心，我也应该有，就像闇 e* 姆蛉一样。

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川的大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转入了低潮。革命力量削弱了，工农兵学商都不“闹事”了，军阀们腾出手来，又忙于争地盘去了，华蓥山区反而清静下来。黎梓卫有一伙死对头守着，暂时还回不去，我干脆租下叔父的两间房子，对外就说玉璧在上海得了吐血病，由我陪着在彪子山上养息。消息传出去，陈家的姊妹和往日的同学亲戚们，纷纷给我送来枕头被面帐沿门帘之类的东西，要我

给她们画上花呀朵的，拿回去绣花，尤其是那些待嫁的姑娘们，硬要守着我，画好才走，逼得我常常晚上也不得消停。画画，尤其是画工笔，是我平生的爱好，这些年来丢得生疏了，现在难得有了几天空闲，趁着画上几笔，倒也是件好事。

这几日，天气极好，玉璧搬了张竹躺椅在院子里，津津有味地看他的《水浒传》。我正画得兴起，便将桌子抬到屋檐下，拿出几幅白绢，画张良拾靴，画王充计献貂蝉，还画了一幅姜太公稳坐钓鱼台。我仔细地调色着墨，一笔笔地勾勒，正画得废寝忘食的，突然听一阵狗叫。刘铁和熊尧莫走了进来，一见我就指着后面的两个人说：“玉屏，你看是谁来了？”

我抬头一看，走在前面的，是这次起义的策划者之一杜伯乾，后面跟着的那位很年轻，我仔细看了一下，才认出来是金华新。金华新也是岳池党支部的，因为起义期间暴露了，便去了武汉，后来听说在全国学生总会里工作。我连忙放下笔，一边招呼，一边进屋去张罗茶水。

待我出来，一行人正在看我的画。但见那画上溪水漾漾，修篁萋萋，一老翁正安详垂钓，身旁倚着一男一女两个童儿……杜伯乾一边看，一边点头说：“好，好，好一幅姜太公垂钓图！你们来看，这竹林的每一片叶，还有这老翁头上戴的笠帽，肩上披的蓑衣，脚下穿的麻履……啊，还有这些山石水草，画得多细，一丝一缕都清清楚楚。对了，你们再看，还有这些远山，色彩调配得多好。那《封神榜》上不过寥寥几笔带过的渭水，被画成了这水天一色、烟波浩淼的景色，足见作者其胸怀也。”

杜伯乾说着，越发感慨起来：“不容易啊不容易。我听行家说，这工笔画，即功夫画。

真得心细如发，心静如水，悟天地之灵感，观四时之变化，才得融会贯通，看出真功夫来。

玉璧老弟啊，你这夫人，以前只知道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今天见了，方知道还是有这般功底的一位丹青妙手！看这画，真想不到几个月前，她还在战场上奔走闯荡呢。”刘铁听了，一边插嘴道：“岂止是奔走闯荡！杜旅长，玉屏现在可不得了呢。她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敢拿天上的小麻雀当靶子，双枪队里的那些小伙子们都不敢小看她呢！”杜伯乾一听：“哦？那不成了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了吗？加上这生花妙笔，那穆桂英也不能望其项背啊。

玉璧老弟啊，你要小心哦，若是再敢小看我们这位红粉英雄，说不定哪天演一出《点将责夫》，四十军棍下来，把你这个杨宗保的‘架子’，拆得一干二净的！”

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拿我开玩笑，满院子哈哈声冲破了天，惊得雀鸟都不敢在房顶和树梢上落脚。却不料熊尧莫在一边说：“我倒是记不清了，这姜太公身边，哪来的一男一女两个童儿啊？”

正说着，奶妈一手牵着宁儿，一手抱着才满月的彬儿过来了。刘铁看了一拍巴掌：“嗨，这不是那两个童儿吗？有意思有意思，你的这幅姜太公，把你一家人都画上去了。”

杜伯乾和金华新这一来，就整整住了三天，每天都在开会。我就在外面画画，逗孩子，给他们看着。事后玉璧告诉我，这次会议由金华新传达了刚刚在武汉闭幕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把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宣传发动群众，在贫苦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上来。玉璧叹着气说：

“我们这次起义，就是这件事没有做好，只是盯着那些地主团总手里的人啊枪啊，他们怎么会跟我们是一条心？一看好处捞不到了，就一哄而散，使我们腹背受敌，吃了多少苦头。幸好，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一批骨干，今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基本队伍，靠我们自己来打天下。”

我说：“那你们商量了没有，眼下怎么办？”

“眼下先把我们的人撤出去，摸摸情况再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玉璧头上的伤好了，身体也渐渐复原，只是医生嘱咐他不要作剧烈活动，要好生静养。可是他却急于要开展工作，到各地去宣传和组织民众。要干事，离不得钱，我们的人要撤出去，拿什么做经费？和刘铁他们商量，组织上也穷；再找那些地主借吧，根本不可能。玉璧为这事苦恼了许久，最后找来两个木匠，说要打一台新式的纺纱机子，纺洋线。

玉璧对我说：“不要以为这是婆婆大娘做的活路，这是一种新式机子，要比乡下的纺车快好几倍，一天要葛两饼纱，一饼纱线要赚十多块钱，让我们的人来纺，我们的人去卖，既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可以掩护许多人的工作。”

我说：“说得倒轻巧，你这洋机器，哪个会使？”玉璧说：“这个不用你担心，我在重庆就学会了，机器图纸就是我带回来的。”

这下子倒说神了：他三月二十三日下山去重庆，三十一日就受了伤，就那么忙天忙地的几天，就学到了这门手艺？再说买线子要本钱，钱呢？

玉璧说他已经跟母亲说好，把圈里的肥猪卖了，再加上老母猪下的奶猪儿，凑的钱够买四饼洋纱，等木匠把机子一打好就开干。

我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和神采飞扬的样子，长长叹了口气。

机子很快就打好了。大清早的，玉璧就喊了两个人，把它搬到寨子后面的广场上，在摇车对面五六丈远的地方钉了几根木桩，然后牵上线子干起来。他一手撑着摇车，一手摇动车轮，随着摇车慢慢向前移动，三根洋纱便葛成了一根洋线。玉璧看着这些洋线，心里高兴极了，苍白的脸上大颗大颗地淌着汗珠。我连忙上前去说，我来干一会儿，你歇歇。他抹抹汗水放了手，却说：“这活儿你帮不了忙，你撑不动摇车。”我试了试，摇车果然纹丝不动，就只好坐在一边倒线了。几天下来，玉璧显得很疲倦。我心里着急，怕他累垮了身体，就说：“你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我们撤出去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干活，葛出的洋线够几个人卖？”

玉璧听了，没说什么，接连几天早早收工，吃了晚饭就寨里寨外到处去转，夜深了才回来。

一天晚上，天气闷热，恐怕要下雨。我去找玉璧，见他在寨门口和守寨门的几个农民说得正起劲。见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连忙一边随我往回走，一边向我解释，说是这一向五黄六月，正是农闲时候，他邀约了寨子下面的一些贫苦农民来帮忙葛线，说好每人每天一升米，大家都很高兴。

果然第二天，我们葛线的坝子上来了二十来个人，大家纺线的纺线，摇车的摇车。玉璧教罢这个又教那个，大家嘻哈打笑的，引得一些婆婆大娘也来看热闹。寨子上一个叫屈二嫂的女人，三十多岁了还梳着刘海，穿红着绿，成天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这天她也扭着腰来了，一见这场合就打了好几个啧啧：“哟，廖大哥，在外面读那么多书，洋学生还回来葛洋线啊？啧啧，亏你妈妈在屋里辛辛苦苦喂的那糟肥猪儿，拿给你来搞这种名堂，有好大个赚头嘛？”她边说边捡着地上的断线，直往腰包里塞。

玉璧心头正高兴，一边摇车一边说：“二嫂，我们叔嫂家说笑，哪里说哪里丢，不兴翻脸哦。你嫌我赚钱不多，养不活你是不是？你还想我做官，去压迫人剥削人是不是？养不活吗，你就另外去嫁个当官的嘛，大丈夫能伸能屈，你当个官太太我决不怩气……”

满坝子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的徐大嫂插嘴说：“二妹，你好姘是个嫂嫂，莫要不知趣。人家廖大哥是客，你在这里东说西说的，看陈三姐不依你的。”

屈二嫂受了奚落，过来跟我说：“不是我说他，三妹，你说像你们廖大哥这种知书识理又跑过大地方的人，成天干这种婆婆大娘的活路，未必是长法吗？”

我笑笑说：“他养病没事干，葛线子混混日子。”屈二嫂顺着我的话下了梯坎，说：“这还差不多。”便又抓把断线一扭一扭地走了，想必她那张快嘴，日后四处串话时也这么说的。

葛线子的人多了，玉璧腾出手来，又捣鼓别的花样。他在寨子上买了些竹子，劈成篾条，找人编些筲箕撮箕什么的，我们的人出去，手里又多了样买卖。这还不算，几天之后，他竟然找了个姓文的叫化头到寨子里面来，跟他学打莲花落。这个文叫化头，口齿出了名地伶俐，见什么唱什么，心里装了许多套头。玉璧将他的唱词记下来，意思不好的改动一下，然后叫我抄好，一抄抄了好几十首。

闲下来，玉璧也跟文叫化头聊天：“你老说穷人受苦受穷是天生的，是命中注定的，这就不对头。连《增广贤文》上都说过：黄河尚有澄清日，岂有人无得运时。你就把穷人看定了？万一时来运转，看穷人都团拢来，又真的都翻了梢呢？还有你唱的这一段也不对头：老大哥行个善，添碗稀饭送个钱，好事做了好事在，二世不再作长年。依我看啦，这世上只要有地主恶霸在，就不太平，总有人穷，有人富，这个不作长年那个也要作长年，把衣服裤儿脱光了施舍给你文叫化头也没有用。”

文叫化头笑着说：“我唱了这么多年，只图顺口，讨人喜欢，哪里想到这些道理？廖团总，你的字墨好，今天我倒拜你为师，二天你编我来唱好了。”

倒拜师傅玉璧担当不起，却真的把文叫化头留了下来。一次我回家料理事情，住了两天才回来，屈二嫂一见我就挤眉歪眼地说：“三妹看你的廖大哥呀，又不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堂堂的洋学生，倒拜了个叫化子头儿学打莲花落不说，还做了一大箩叫化子用的莲花落片片。你快过去看看，正拿你的绣花丝线拴帽花儿呢。”

我走过去一看，地上当真摆着两箩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刮得光光生生的莲花落竹板子，都钻上了五梅花，有的还用红红绿绿的丝线拴成了漂亮的帽花儿。我走近去说：“玉璧，你那叫化子板板用麻绳拴就满可以了，哪有用丝线来拴的？人家不怀疑才怪呢。”

玉璧瞪了屈二嫂一眼，冲着我说：“这是大家卖完了线子篾货讨生活用的，麻绳子倒是便宜，叫人家打断了又到哪里去找？用你点丝线就心疼了，真是自私自利！”

我一听“自私自利”几个字，哪里肯依他，三言两语吵了起来。玉璧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这个人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屈二嫂的话都听得么？实话跟你说，这红绿丝线拴帽花儿的莲花落板子，是自己人用的联络记号，在外面只要拿出这种板子来，便知道是自家人，可以说情况，若是在外

面出了事，叫人带回这种板子来，也好组织救援。”我扑哧一笑，说：“看不出你这个廖莽子娃，鬼名堂还真多。”

玉璧把脖子一扬，说：“没得点名堂，还敢干这行吗？”说着打起莲花落，大声地唱起来。那边屈二嫂见我们两口子转眼之间又说又笑的，气得一扭脖子走了多远。

七月初，我们召齐了各路的负责人，借口分派活路，四周放了哨，在寨子后面葛线的坝子里开会。大家先是七嘴八舌地汇报情况，完了玉璧就开始分派人马：“大家要注意，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宣传组织群众，为以后的时机作准备。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渠河沿岸的船夫船老板的工作要抓紧。陈仁勇，你带上四个人，装成算命看相跑江湖的，到赛龙场、石龙场及合川、武胜沿河的各个码头去活动，了解敌人的卡子和来往船只的情况，建立起可靠的联络点。一定要争取一部分船夫和船老板站在我们这边。谭之中，你带上十个人，装成收荒匠和叫化子，打起莲花落到乡下去，做那些贫苦农民的工作，尤其要说服那些德高望重、有号召力的中老年农民，让他们去发动大家参加农民协会，抱成团来对付地主恶霸。

金积成，你跟炭厂的工人都熟，那里还有我们从山上退下来的一些人，你们一起去把工人都动员起来，那里的工人也苦得很。夏林，你还是跑黎梓卫、罗渡溪这一片，这里我们撤下来的人多，有了什么事情一定要团得拢来。另外肖家场、阳合场那边靠着山边，工作也要加强，特别是那个碗厂，很有几个工人跟我谈得来，都是靠得住的人。还有向老大，你的担子很重，你们几个到重庆磁器口二十四兵工厂去学习造枪和修理枪械，学好了回来，我们自己开个兵工厂，就解决了个大问题；重庆那边都已经联系好了，有人和你们接头……”

会一开完，大家就分各路去办。为了接头方便，由我们出钱，叔父陈祝武出面，到罗渡溪街上开了个栈房，来往的人就在栈房里领货接头，由我或者陈亮佐出面应付。只有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才到彪子山寨上来，免得人多嘴杂影子大，惹出些不必要的麻烦。

玉璧的身体慢慢复原了，常常把烂衣服破草帽和莲花落等改装用的东西装在背篋里，和夏林、金积成甚至文叫化头一起出去。有一次他化装成一个卖线的小商贩，刘铁装成个卖羊子的，金积成抱一捆崭新的洗脸毛巾和手帕子，先说到地势险要的广安观音阁看看地形，后来就越走越远，干脆到渠县、邻水、大竹东山西山一带走了一大转，走一路画一路的地图，还到乡间串院子，在河边找船夫。回来时又黑又瘦，衣服挂得襟襟纽纽的，连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一天小晌午时分，守寨门的跃光叔跑上来，说来了两个陌生人，穿得烂兮兮的，死活要见玉璧，还说是从炭厂来的。我和跃光叔一起出去，其中一个老远就冲着我直喊表嫂，走到跟前一看，竟是上次送我逃出虎口的何明轩。这娃儿长高了，只是又黑又瘦。我拉着他一边走一边问：“你怎么会到炭厂里去的？到那种地方，你爹妈就放心？”

明轩说：“我没办法啊。上次你逃脱后，王守义气坏了，后来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是我把你送走的，就派人来捉我；哪晓得派的人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暗地里送了信来。我当天就跑了出来，进了炭厂。”明轩满不在乎地像在摆别人的龙门阵，完了露出整整齐齐的牙齿朝我笑笑，拉过身旁的一个大汉子对我说：“表嫂，这位就是唐俊清唐大哥，我们的头儿，专程来找大

老表的。”

我仔细打量那人，高大个子，黑脸，一双英雄眉下，两眼挺有精神。我记起玉璧曾多次跟我提起过他，说他侠肝义胆，在工人中很有威信，这次来得这么急，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玉璧见到唐俊清，一开口就问：“你们干起来没有？”唐俊清说：“干起来了，你走的第二天就按你说的干起来了，把龚静之围在炭棚子里，说这次塌窑压死这么多弟兄，总得拿话出来说。龚静之狡猾得很，说半山的那股水，年年夏天都要发的，时不时是要冲垮炭洞子压死人，这都是天意，来挖炭的人哪个不晓得？工人死了是损失，未必对我这个老板不是损失？你们问问华蓥山上那么多炭洞子，没听说要老板发棺材发抚恤金的。我们不依，把你讲的道理都搬出来，把条件也一款一款提出来。后来龚静之软口了，喊我们先把死人从洞子里拖出来再说。我们说若是不把棺材买好摆起，决不进洞子。他没法，只好喊人到场上去买了二十一口棺材。现在啥子条件都答应了，就是抚恤金没说好，我们要二十元，他只认十元。”

金积成还在那里，带着大家跟他磨，喊我来问问你，下一步咋办？”

何明轩也说：“大老表，大家看见压死的弟兄太惨了，炭老板又这么可恶，都说愿讨口也不愿在这口血盆里抓饭吃。现在有二十多个人在黎梓卫街上，死也不回去。”玉璧在屋里走来走去，好一会儿才说：“龚静之答应了大部分条件，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我们就在抚恤金上退半步也行。下一步吗，那些出来的弟兄，老在罗渡溪街上逗留也不是办法，我看那些家中没牵挂的，态度又很坚决的可以留下来，我们想想办法，其余的还是回去，等待时机。”何明轩嘟起个嘴巴：“大老表，我不转去了，我要跟你在一起。”

玉璧对唐俊清说：“老唐倒是莫转去了，你这回领了头，龚静之是不会放过你的。明轩你还是去给老田作个帮手，把大家都团拢来，有事也好送个信来。”

明轩不高兴，转过身来愠气。玉璧笑笑，拿出一百发子弹两支枪来，把子弹和其中一支枪交给唐俊清，让他转给老田，以防万一，另一支递给明轩：“这下子没意见了吧？”明轩摸着枪憨笑了一阵，突然一个马蹲，双手举着枪，咬牙切齿地说：“龚静之，谨防你的脑袋！”

唐俊清带来的人，很快都安排了。玉璧和我想到陈仁勇联络渠河码头这一路的任务很重，就让唐俊清去看看，顺便带上工人中两个会拉二胡的，也跟着学学，就算打帮手。不几天，唐俊清回来了，一见面就说：“陈仁勇算命出拐了。”

我听了吓了一跳，催他快说。哪晓得唐俊清并不着急，慢条斯理地一一道来。

“我那天到了石龙场，把两个弟兄安顿在茶馆里，在河边上找到了陈仁勇。他拉着二胡，坐在一根长板凳上，板凳头上插了把撑开的破纸伞遮太阳，一个木盒子里面放了些测字用的小纸卷，木盒下面压着张旧红纸写的‘赛诸葛’三个字。陈仁勇的那副样儿，倒是装个舅子像个舅子：剃了个光头，穿件灰布长衫子，还戴了副眼镜，拉着二胡，正尖声尖气地唱《孟姜女哭长城》。我问他算了几个了，他说这阵才把摊子摆起，还没开张。我说你手艺到底咋样啊？他说笑话，保证没问题。正说着过来一只小船，船老板四十来岁，含了根叶子烟杆，看样子是做完活路收早工的。我背过身，说你看财喜来了，我给你守摊子，你去给这个老板算一算，保证有搞头。”陈仁勇果然就去招

呼，人家也果然就请他上了船。船老板问：你看我这个相，饿不饿饭啊？

“陈仁勇一摇头说：饿啥子饭哟？老板你莫要自暴自弃，我看你就是个英雄相。你看你，龙眉虎眼，宽额大耳，活像梁山泊里的英雄好汉李逵。只要你肯干，好日子在后头呢。”

“船老板一听就笑了：你这个算八字的倒有趣呢。实话跟你说吧，我撑了这么多年的船，腰也干弯了，背也干驼了，从来就没见过什么好日子。”

“陈仁勇说：一个人干不行，要大家一起来干。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看了什么相，才说什么话。我赛诸葛在渠县、大竹一带，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今天初次来到贵龙码头，还靠你老哥传个名，来来来，报个生庚，帮你算个八字。”于是船老板就报，说是丁卯年六月十九子时生的。陈仁勇一边用手掐算，一边自言自语地念着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一直念到额头上冒出颗子汗，八字还没排出来。船老板一边看得好笑，递了杆叶子烟给他，说赛诸葛先生，我看你的万年历还没背熟，算了吧，先抽杆烟。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背过身走上去。船老板一见我，老远喊唐大哥好久来的，快过来烧杆烟；接着又给我介绍陈仁勇，说在上这位是赛诸葛八字先生。我听了扑哧一下笑出声来。陈仁勇先是一愣，接着脸红到耳根子，跳下船来扭住我不放，倒把人家船老板搞得莫名其妙。”

我听到这里，也觉得有名堂，就问唐俊清：“你认得那个船老板么？”

唐俊清哈哈一笑，说：“岂止我认得？说出来你们都认得，你还在人家手里接过一万八千发子弹呢，就是渠河上的老杨杨巨百嘛。”

我和玉璧一听，说：“果然是你老唐耍弄人家陈仁勇。老杨的关系只有你我三个还有谭之中晓得，这下子陈仁勇出丑了。”

唐俊清说：“自己人手里算什么出丑，要是惹起外人的怀疑就麻烦了。事后老杨跟我说，他真的以为陈仁勇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正要想将计就计问他一问，说不定等天黑将他灌醉了，装个麻袋丢进渠河里呢！”

我们笑了一阵，说陈仁勇这个快乐神，真是大意失荆州。唐俊清说：“他现在不敢大意了，带着两个弟兄，正儿八经在场上的算命先生‘活神仙’那里讨见识呢。”

晓兰解约

常言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九二八年的中秋就要来到了。大清早起来，天高气爽，秋风吹过山梁子上那棵桂花树，满寨子都是甜滋滋的香气。彪子山寨上的人家，都在打糍粑、做月饼准备过节，玉璧却叫我带上葛好的线子进城去一趟，说熊尧莫、金华新他们找我，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我走得晚，到熊家，晚饭都摆上桌了。熊尧莫见了，也不说什么，只招呼吃饭，等家里人都出去赏月乘凉了，才将我喊进里屋，打开一口箱子，把里面的衣物翻出许多来，然后从箱底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纸。平日里挺随和的熊尧莫，此时却不说笑，那格外认真的样子，使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双手接过那张纸，却见是一张油印的表格，排头上写着几个字：“党员登记表”。

我心里一阵狂跳，连手都在发抖，竭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却办不到。

我退到一边坐下，好一阵才轻轻地说：“玉璧也是，又不跟我说清楚，只叫我多带点线子进城来，说卖了的钱交给你们有用处。”

熊尧莫这才笑笑，说：“这就叫组织纪律。”

我在熊尧莫那里把表填好了交给他，说好了明天晚上来宣誓。回到康家吊楼子大舅家里，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就常听玉璧他们在一起说什么“组织组织”的，跟玉璧说我要参加，可是不理我。于是我就悄悄问黄明：你们那个“组织”是哪个承头的，我也来参加一个要得不？可是黄明却半真半假地说：“你要参加也不难，把那小姐脾气丢掉就行了。”回家以后，虽然为这事也和玉璧拌过两次嘴，但刘铁、熊尧莫他们从来就没把我当外人，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商量。有一次，我又跟刘铁提到这事。刘铁说我们讨论过了，只是玉璧对你很严格，说你还有些任性，再考验段时间再说。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提起要加入组织的事情，心里只是想：我就做给你廖玉璧看看，样样工作都拼着命去完成，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话说……现在真的要入党了，心里竟全然没了这样感觉。入了党，就和玉璧、刘铁他们一样，要称同志了，千斤的重担，从此就压上了肩头。革命不光是苦、累、危险，遇事还要能像萧楚女、何幻生甚至杨闇公他们一样，视死如归，哪里是耍点小姐脾气赌气就能行的。我现在是党员了，玉璧也是党员，我们就算把自己的这一生都交给了党，今后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能退缩，这条路，可是再难也得挺起腰杆走到底的啊！

快天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好像到了一座大厅，里面有许多人，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支蜡烛，缓缓地从我面前走过。我看见了黄明、超腾、幻生和许多南京的朋友，也看见刘铁、熊尧莫和金华新他们。忽然又好像不在大厅里面了，举着烛光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蜿蜒闪烁在天地之间……

第二天晚上，在熊尧莫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我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遗像面前，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可是预先想好的许多誓言，此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默默地站了好一阵，才说出两句话：“一心一意为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宣誓下来，大家坐在一起，介绍人金华新、段前迪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也提出了我在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刘铁代表党组织对我说：“你的入党问题，去年初就批准了，考虑到你今后的工作关系，没有跟撤退隐蔽的同志们一起宣誓。从起义以来，你做了不少工作，表现很好，因此没有入党候补期。”刘铁还告诉我，我在党内的化名叫梅溪，这个化名一直没有对外使用过。

开完会，我们在熊尧莫家吃晚饭，他们几位打伙为我办了一桌。熊尧莫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玉屏的大喜事，同时也是我们岳池县的第一位女同志入党，一定要好好庆贺一下！”

正说着，门外闯进两个人来，一个是党员龙之一，另一个是党的积极分子黄维存，他们一进来就说：“嗨，什么事情这样热闹？”

金华新说：“给玉屏过生日，刚好差两个人。”“那好，我们也搭两个股子。”

熊尧莫说：“已经凑齐了，快坐下吧。”

我的政治新生命，就从这天开始了。

第二天下午，岳池县特支的同志都在熊尧莫家里开会。特支书记金华新、委员刘铁和罗方域都来了，我第一次以党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也算正式

和大家见面。我把卖线子的一百二十元钱交给了组织，组织上决定将这笔钱给金华新扩建“学生书店”，正缺经费的老金高兴得不得了。会上大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决定在宣传组织农民的同时，把城里的工人、学生、妇女工作也开展起来。金华新说由于我以前在女师教过书，在反封建的妇女中很有威信，决定调我进城来接替罗方域搞妇女工作，先把妇女协会组织起来。再说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玉璧的伤势也基本上痊愈了，现在发动群众的工作要全面开展，我老是呆在山上也不是办法，要出来活动活动，压压扯红了的空气。

我对组织上的决定没有意见，只是不知道如何接手，就请教罗方域，问他以前是怎么做的。谁知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我莫名其妙地说：“有啥事给我说清楚嘛，你们大家都笑啥子？”

熊尧莫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花说：“他呀，搞糟了，第一次就把招牌打烂了。他妹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些女校学生请到他家里去开会。他老先生一开口就对人家说：你们不要害羞，要反对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要自由选择，自由恋爱，还有什么男人女人，丈夫爱人地讲了一大堆，说得那些女学生满脸通红，头都抬不起来。他又不修边幅，一边说一边脱了鞋子捏脚指拇，第二次开会就没人来了，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还得了个鸳鸯圣母的外号呢。”

熊尧莫边说边学着罗方域的姿势，逗得大家简直要笑破肚皮，连罗方域自己也一边笑，一边用烟斗敲着熊尧莫的脑壳。

正是暑假期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就在大舅家住了下来。康家的一个表妹康玉英还在女师读书，常约些同学到家里来玩，过去的一些同事也来看我。妇女们你串我，我串你的，都来找我摆谈，争着向我诉苦。从我和玉璧闹“自由恋爱”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岳池城的女人们还是出不了头，还兴缠脚留辫子，还是关屋里不准上街。军阀们还常来女师拉女生作姨太太，老师、校长还当媒人。东街黄家的丫头汪端芳被逼着为重病的少爷填房冲喜，可是少爷还是死了，她婆婆硬说是她的命大克死了儿子，成天打骂拿她出气；王晓兰还在娘肚子里就许给了樊家少爷，现在那二流子成天催着接亲，急得晓兰差点没去上吊……我看汪端芳和晓兰在一旁眼泪汪汪的，就安慰说：“你们莫着急，光是你们自己是挡不住封建势力的。要大家团结起来，帮你们去讨个公道才行。”

玉英一旁听了这话，拍着手跳了起来，直喊：“三姐你说得太好了，干脆你来承个头，给我们出主意，带着我们出来闹他个天翻地覆，要不然我们这些女人，永远也翻不了身！”岳池城里的妇女协会，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我吸取了上次在黎梓卫的教训，这次不敢由着性子来，跟组织上汇报后，决定先做老年人和上层人士的工作。初先我们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到各家轮流吃“转转会”，专门请那些婆婆大娘，我给她们讲南京的妇女活动，还讲现在人家苏联的妇女也和男人一样，社会上什么工作都可以参加，还和男人一样被选成领导人。大家都是女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从古戏文里的秦香莲摆起，一直说到身边的苦命人儿，说到悲苦之处，一个个都是泪水涟涟。

有的大娘说：“哪个又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出来，像你陈三姐这样学本事，有出息嘛，就是怕那些怪物说怪话，二天招惹是非。你们现在结了会，出来改变一下这些压死女人的风俗也好。”还有的老年人背着我说：“现

在世道变了，再莫说女人家生来就没出息。你看去年子廖家老太婆遭那些挨刀的‘拉绅士’绑票，连家产都被查封了，还不是人家陈三姐出来打官司找县长，硬是把一家人都救了出来……”

舆论造起来了，同情的人多了，来参加妇女协会的人增加了好几倍，我的胆子也壮了起来。先是带着姐妹们到汪端芳家，夺下了她婆婆打人的棒棒，告诉她若是再要虐待端芳，我们妇女协会就要扭她到衙门里去打“活人命”。接着我们又约了三四十个妇女协会的会员，手牵着手走上大街，到戏园子里去看了场京戏《桃园结义》。

妇女们兴致高得很，闹着要将王晓兰从绝路上救出来，要帮她打官司解除婚约。刘铁和熊尧莫也认为帮王晓兰解除婚约，不是一般地反对封建婚姻。对方樊家是一个势力很大的恶霸地主，仗着和军阀有些瓜葛，平日里就横行乡里，这一仗若是打赢了，不仅仅是在妇女中间，就连中产阶级的士绅，也会看重我们的力量。

果然，听说我们要为晓兰解约，平日里不沾惹是非的大舅也来出主意，那些订婚没订婚的姑娘们更是积极，成天围着晓兰给她打气。

我带着玉英先到晓兰家去做她父亲的工作。晓兰的父亲是个封建意识很重的老头子，六十多岁了，老来丧伴，只有晓兰这个聪明文静的女儿，平日里百依百顺，爱如掌上明珠。对于晓兰的婚事，他自然是不满意的，可是又觉得樊家是当地的面子人物，自己招惹不起，再说订了这么多年的婚约，如今作为女方的家长却要悔亲，也实在是不体面。眼下樊家要接亲，晓兰在家里成天寻死寻活的，把个老人急得不得了。我和玉英见到他，开门见山地说：“王伯父，晓兰的婚事，你也着急，现在我们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要站出来，帮晓兰解除婚约，你看怎么样？”

王伯父沉着脸，只摇头不开腔。

玉英在旁边大声说：“王伯父，你老人家也要替晓兰想想嘛。事情闹到这一步了，你还不退婚，不是把独生女儿往死人坑里推吗？”

我也说：“是呀，王伯父，你想想看，晓兰是指腹为婚，双方都还在娘肚子里就把婚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合理。现在那姓樊的公子哥儿，歪戴帽儿斜穿衣，不读书不学好，成天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茶馆进酒馆出，狂嫖滥赌。你把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送过去，也于心不忍嘛！”

老人家重重地叹了口气说：“玉屏呀，不是我不疼爱女儿，像我们这种人家要悔婚解约，那我王家祠堂的匾都要倒挂起，为世人所不齿啊，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啊！”

我听了觉得好笑：“王伯父，依我看哪，做父亲的理直气壮为女儿作主，解除不合理的婚姻，二天再帮她选个有前途的好女婿，这才是堂堂正理。要是真的叫晓兰嫁到樊家去，让那个不学好的樊家少爷给你做女婿，那才是你们王家的耻辱，丧了你们王家的德呢！”

玉英说：“就是嘛，你们王家世代代清清白白，正正派派的，如今拿个鲜花样的女儿去配个臭狗屎样的男人，就有好光荣么？知者呢，说你为自家的面子毁了女儿的幸福，不知者还以为你家晓兰有啥不对，嫁不出去呢。”

玉英这话也说得过了头，晓兰听了，在一边嚶嚶哭出声来。

王伯父脸色极难看，想了一阵又摇头：“可是人家樊家，有钱又有势啊。”

“怕什么，如今讲婚姻自由，他樊家总不能强逼成婚，再说还有我们这

么多人，帮着晓兰嘛！”

王伯父没话说了，长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去办吧，这是要上大堂的事情，先要写个呈子，起张诉。”

玉英听了拍着双手一跳多高：“王伯父，你答应了？”晓兰转过身去，扑哧一声破涕为笑。

一连几天，我们忙着为晓兰起诉做呈子，玉璧却进城来了。他先前就写了好几封信来，说是家里忙得很，人手又少，各路人马来来往往的，他和陈亮佐实在应付不过来，何况有些事情还要我出面才行，催着要我回去，只是刘铁他们没答应。现在他亲自进城来找我，看样子实在是拖不得了。

晓兰听说我要走，急得要哭，玉英陪她一道来到康家吊楼子找玉璧说情。晓兰见了玉璧，一双脚像钉在地上一样，一步也不敢前进。玉英猛地把她推了过去，她的脸一下子变成了朵红鸡冠花。玉璧装得很正经，不开腔也不笑。晓兰没办法，硬着头皮说了声：“廖大哥，你做啥子定要叫三姐回去嘛？”

“家里有重要事情呀！”

“廖大哥，我就要过堂了，等我的事解决了再回去吧。”玉璧看她急得那个样子，端了一条凳子给她：“晓兰，你坐下，我跟你说。”

晓兰不好意思地坐下，头埋得低低的。

“晓兰，你看你这害羞的样子，怎么过堂呢？这是正大光明的事，要拿出勇气来！我们南京的一些女同学，哪像你这样啊，都是大大方方的。妇女要翻身要解放，像你这样咋行。”正说着，熊尧莫一下子闪了进来。表姐妹见来了个男人，都想躲起来。我说躲什么，是你们廖大哥的朋友，又是常见的熟人，不是才说了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么？大家才不躲了。又说笑了一阵，熊尧莫对玉璧说：“怎么样，让玉屏多呆几天吧？”

玉璧说：“照理是应该走的，不过这件事也重要，就多呆两天吧。”

熊尧莫叫我们不要怕，胆子放大点，这场官司一定打得赢。他说新任司法官是他的老朋友，才由成都政法学校毕业，脑筋有点新，法律上既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规定，再加上熊尧莫私下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得卖个面子。

过堂那天，王家的人都不愿陪晓兰去，我就和熊尧莫的夫人熊小如、康玉英等五个人陪她。这天大堂门开得特别早，大堂下面人山人海，数不清的看热闹的人。樊家的一大群人坐在左边，在那里交头接耳指指戳戳的，不知谈些什么。那樊家大少爷，歪戴一顶瓜皮帽，一件满是褶子的灰布衫子上面，还看得出纸烟头烧的几个洞，领子不扯起，扣子也没扣完，向着我们这边一瞟一瞟的，一副十足的二流子相。按当时问案的规矩，谁向着哪一边就坐在哪一边。樊家那一边的座位挤满了人，有的还在旁边站着；我们这边的座位上，就只有我们五个人，一些妇女协会的会员见我们势单力薄，也只敢远远地站在后面。

大约九点钟光景，开始过堂了。大堂两边站着威风凛凛的法警，一个四十多岁的法官，把戒方在桌上“啪、啪、啪”地连拍三下，就问道：“原告王晓兰，你为什么提出与樊家解除婚约？”

这时的王晓兰，埋着头脸通红，好一会儿才慌里慌张地说：“请法官作主，媒妁之言，父母包办……”说了两句她就说不下去了。那法官说：“王晓兰，有话慢慢讲来，本司法官自有公断。”

王晓兰平静了下来，才说：“这门亲事我本人不同意……”

大堂下面哄地一声炸开了，那些老头老太婆扁嘴饶舌地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是啥子话？只有她才说得出口……”

我们叫晓兰不要着急，不要怕，继续往下说。她又说：“我们这门亲事是指腹为婚，全是父母包办，至于男家什么样子我从来不认识。后来才知樊家公子是个二流子，不读书不务正业，整天放荡。我想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岂能儿戏。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他根本不配与我结婚，所以提出解除这不合理的婚约，望司法官作主。”法官听了晓兰这番话，觉得有道理，忍不住点了几下头，接着又转过脸去，问樊家少爷。谁知这家伙正死死地盯住晓兰，那眼睛从晓兰的脸上瞟到脚下，又从脚下瞟到脸上，司法官的话他竟全然没有听见。那司法官使用戒方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大声怒斥道：“樊文本，你在干什么？本司法官问你有何意见！”

樊文本这才猛省过来，却又被司法官的斥责吓呆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没有意见！”

“什么？脓包，你没有意见？”樊家的人群中一个白胡子老头，把手头的拐杖在地上重重一击，气得吹胡子。司法官又把戒方一拍：“未经本司法官允许，旁听人不得开腔。”

那老头只气得在下面来回踱步。樊文本停了一会儿，又恢复他那副流氓相说：“禀告司法官，阎王要命，本夫要妻。”大堂下面又是一阵议论。有人大声说：“这哪里是在过堂，分明是胡闹嘛！”晓兰的脸气成了紫色，好一阵才骂出了两个字：“胡说！”

此时，晓兰的羞涩相一点没有了，一张嘴不晓得咋变得这么伶俐，说得理直气壮，头头是道，说得堂上堂下的人都只是点头。最后，司法官拍拍戒方，大声说：“根据民法第二十五条男妇平等、婚姻自由的规定和婚姻必须征得本人同意的原则，本司法官为王晓兰作主，同意解除婚约。”司法官在卷首上批了几个字之后说：“王晓兰，你有何意见？”

晓兰说：“感谢司法官，我没有意见。”然后就在公文上画了押。

司法官又问樊文本，他还是说：“阎王要命，本夫要妻。”

大堂两边旁听的人又是一阵喧嚷。司法官狠狠地骂了他几句，他才没声没响地画了押，回头一见我们，气势汹汹地挽着袖子，就要上来和我们打架，却被那白发老头子用拐杖指着鼻子骂道：“你这个脓包，把我们樊家的德都丧尽了！”一个老太婆也骂道：“你娃娃也是啊，平时喊你读书，你不读，今天人家就是看不起你嘛，这么漂亮的女人都跑了。”

我们从堂上下来，高高兴兴地手牵着手，大摇大摆走出了衙门，听见走在后面的一个驼背老头子颤颤地说：“是啊，这包办婚姻害死人。我也是指腹为婚，可是没法子，害了我几十年。”

王家的族人和一些亲朋好友，听说官司打赢了，都来贺喜。晓兰的父亲高兴得胡子直翘，对我们说：“我过去错了，错了，多亏你们妇女协会，帮了我家晓兰的大忙。”

晓兰的婚约解除了，妇女协会的威信也树立了起来，可是我又成了当局的眼中钉。他们说我带头生事，有伤风化；还说我是赤化分子，要通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梁山去教书，暂时避一避，也兼做一下那里学生中的党的工作。

我带着两个孩子，先由水路到重庆；玉璧送我们，一直送到合川才回

去。初春了，天气晴好，透过清浅浅的渠河水，看得见鱼儿在石缝里游，时不时两只阳雀子相逐着从头顶上飞过，清婉悠悠的叫声，让人的心情跟天气一样好。玉璧抱着才一岁多一点的彬儿，用胡茬子扎着孩子嫩嫩的脸蛋儿，爷儿俩嘻嘻哈哈地打闹，逗得宁儿在一边直笑。我在一边看着，觉得结婚这几年，我们夫妇俩一直都是在风风雨雨紧紧张张中过着，像这样一家人融融乐乐在一起的时候，实在是不多。玉璧逗了一阵孩子，抬起头来看看我，问我在想什么。我笑笑说：“我们这两口子也真是的，一不缺吃二不缺穿的，守着一双儿女，安安稳稳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偏要去闹革命，亲戚朋友都跟着担惊受怕不说，夫妻俩还得劳燕分飞。”玉璧听了，一直腰说：“那好啊，我们这就回去，到县衙门去写个悔过书，不干了。然后呢，把夏林、金积成、陈仁勇他们这一大帮子弟兄们都遣散了，枪啊子弹的也都卖了，再把我们的田啊土的都买回来，剥削穷人，当地主去，让彬儿、宁儿也成天轿子来轿子去的，享享当少爷小姐的福！”我看他越说越是神气，忍不住扑哧一笑，推了他一掌说：“那我当初还犯得上来跟你？！”

玉璧趁势把我拉进他的怀里，轻轻地拍着我说：“是啊，我要是那些公子哥儿，你也看不上我了。我这辈子，没别的路了，入了党，宣了誓，这条路是要走到底了。前面还不晓得有多少急流险滩呢，只是要连累你和孩子们了。”我看着他说：“什么叫连累啊？我不也入了党，也宣了誓吗？九死一生，我们也要一起走到底。咱们这一辈人完不了，还有孩子们，看到最后，谁斗得过谁！”

玉璧眼睛一瞪，伸出小指头：“此话当真？”

我一本正经地也伸出小指头，和他拉上了勾：“当然当真，我陈玉屏说话，哪回没作数啊？”

旁边的宁儿一看我俩孩子似的拉勾儿，连忙叽叽喳喳地伸着小指头扑了上来，还在伊呀学语的彬儿看见姐姐上来了，也跟着扑上来。我们一家人在舱里嘻哈打笑地滚成了一团，小船立即东摇西晃起来。外面船老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连忙探进头来，一看这情景，悄悄地打了个抿笑。那时候，我想得真是简单。

智闯山口

直到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我才又回到岳池。

这时候川北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早些时候，穷困潦倒的军阀杨森，趁着罗泽洲军中内讧，趁机出兵抢占了广安、岳池、顺庆等县，囊括了罗泽洲的防地，并派人称“向屠户”的向廷瑞驻守岳池，任“精练司令”。杨森绝处逢生，立即野心勃勃着手拉丁派款，搜刮地皮，一年预征十年十二年田赋，捐税多得吓死人。农民穿草鞋进城，要抽草鞋捐；打赤脚要抽赤脚捐；种了鸦片的要收罚款，不种鸦片的要收“懒捐”；还滥造铜钱祸害百姓……一时间，防区内百业萧条，官逼民反，“匪”患如蚁，仅华蓥山区的绿林武装数得出来的就有十七八股，还不算那些毛毛“土匪”。

一见面，玉璧就告诉我，我们的工农红军在两湖江西一带打得热火朝

天，现在全国上下提起“朱毛”的游击战，没有不赞叹的，眼看又一次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了。上级组织已派人到岳池来开了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省里的精神，要求我们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现在组织上已正式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玉璧、刘铁、金华新、罗方域，并由玉璧具体承办，还决定调我回来继续搞后勤工作。

接受任务之后，我们在彪子山召开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召集了原先分散在各地活动的四十多个小组长，县委的刘铁、金华新、罗方域都参加了。会后，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完了自己名下的田产，用作筹建队伍的经费；又在广安开了一个“悦来医社”，兼营电筒、电池等杂货，以保证起义后的医药等用品的供应，由我们的一个积极分子齐吉轩负责。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来往吃饭和住宿方便，我们又由组织上出一部分钱，在罗渡溪、赛龙场、肖家场等地开了栈房和饭馆。罗渡溪就由马福林负责，原则是除了自己人的吃住开销外，赚多少都是开店人自己的，但是不能开垮。两年多来玉璧所做的深入扎实的群众工作，此时已见成效。他从魏家沟、阳合碗厂和炭厂的骨干分子中，拉出了一支基本队伍，成立了华蓥山游击队。由于杨森极端仇视共产党，游击队决定以打富济贫的灰色面目出现，对外称华蓥农民自卫军。

我们在华蓥山麓一打响，整个川北地区的绿林好汉和农民武装都起来响应。组织上趁机派人渗入这些队伍之中，做了大量的争取和促进工作。各处农民纷纷起来抗捐抗粮，打恶霸开谷仓。地主们有的躲在石碉楼里不敢出来，有的直往县城里逃，连一向自以为“处变不惊”的杨森，也为这种遍地烈火的局面感到大为恼火。

场面拉开了，枪支和弹药的供应又紧张起来。向老大和他带去的人在重庆二十四兵工厂还回不来，我们只能简单修理一些枪支，再搜些铜钱制作些老土枪的子弹。于是玉璧让我带着夏林、唐俊清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到重庆去找李荣华大哥，抢运一批枪支弹药回来。

玉璧正儿八经地对我说：“过去你也运过几次枪，但是都没有这次走得远，要得急，又是第一次走旱路，路上的联络站都还没有建起来。近来风声很紧，沿途关卡林立，一路上有事要多和大家商量。一定要抓紧时间，三天去三天回，派给你的五个人都是强手，一切由你招呼。”他停了停又说：“抽空到曾三姐那里去看看孩子。”

当时两个孩子的安排，最令我们为难。宁儿快读书了，彬儿也正是麻烦的时候，我这两年去梁山教书，都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可是现在不行了。放在家里让母亲照管吧，不放心，怕敌人抓不住大人来抓娃娃。再说我那兄弟媳妇势利得很，总是埋怨家里受够了我们的牵连。于是我和玉璧商量，觉得以后运枪运子弹搞军需，我在重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干脆就把孩子寄在重庆曾三姐家。这个曾三姐，是我近两年来来来往往在重庆认识的，是个寡妇，守着个独养儿子过活，虽然不大识字，却是古道热肠，肯帮忙，和我已经换了金兰帖子做了姐妹。她家房子也宽敞，除了一个没出嫁的妹妹敏言之外，平素没有旁人来往，把孩子放在她家，将来这里就是我们设在重庆的联络点。只是两个孩子太淘气，于是就请了一个叫韩嫂的保姆，和她住在一起。

这么久没见到两个孩子，怪想的，我看了玉璧一眼：“我是当妈的，这事还用得着你说？”

正是腊月二十头上，雨雪交加，路上不大好走。唐俊清和另外三个人扮成鸡鸭贩子，挑着装满鸡鸭和蛋的箢挑子走在前面。我扮成一个小地主家

走人户的大少娘，上身穿了件团花袄子，脚上不敢穿胶鞋皮鞋，就依当地的习俗套了双麻窝子草鞋在布鞋上，有点不伦不类的。夏林背了个细篾背篋，里面放了一封粗壳纸包的糖食，装成我的长年。一路上，他们几个说说笑笑，我却没有那么好的兴致，心里只是思忖着，怎么去见李荣华。

李荣华是木匠出身，以后进了绿林，由于慷慨好义，打富济贫，被人称为“义匪”，在川北特别是在广安、岳池、合川、武胜一带，很有名气。江湖上的人，不管闯了多大祸事，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取得李大哥的一张片子，包你通行无阻，走到哪个码头，住下有饭吃，走时送路费。广岳一带的“下层人”每到穷途末路时，只要拜在他名下作一个兄弟伙，就可以遮风躲雨，沾到一些便宜。这位“义”字号二杆旗的大爷，号召一两千人千把条枪没问题，军阀杨森好几次想吃掉他，都落得损兵折将。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杨森委了他一个广（安）、岳（池）、合（川）、武（胜）四县联防司令官的空头衔。他识破了这个耗子精的奸计，假装有病，一直住在重庆，不去上任。我们第一次起义时，他暗地派了二百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坚持下来。这几年他一直利用刘湘部下欺上瞒下的倒卖武器之风，在重庆给我们购买枪弹。我听过不少关于他各式各样甚至十分离奇的传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

船到千厮门码头，已是半下午了，我们就到行街悦和旅馆住下。这旅馆的余老板，是李荣华的兄弟伙，对山上下来的人有些照顾。夏林找到余老板，说要会李司令。余老板说李司令原来住在这里，近来感到这里不清静，在水巷子租了一间屋住着。我就和夏林一起去找他。这水巷子是从嘉陵江担水过路的巷子，路上一年四季都是湿漉漉的，我走不了几步，裤脚和一双布鞋都沾满了稀泥。找了好久，才找到门牌号数。进了大门，发现这是一个砖木结构的旧式平房；天井里有一个条石砌成的花台，台上放了三盆兰草；堂屋的神龛上供了一张关二爷的画像，古铜色的香炉里还燃着三炷香。我正在打量屋里的陈设，左厢房里走出一个人来，穿一件酱色的毛衣，一条马裤呢的青色西装裤，手上拿了一条花毛巾正在揩脸。夏林喊了一声李大哥，他连忙取下毛巾打招呼说：“老夏是你们呀，进屋来坐，进屋来坐。”

这个人，四十来岁光景，很清瘦，却红光满面，两只眼睛奕奕发光。我们走进他的客房里，夏林放下给他带来的土产礼物：五斤赛龙场的挂面，六斤合川桃片，两坛黎梓卫的醋。

夏林指着我说：“这就是廖大嫂，姓陈，陈玉屏。”

李大哥连声说“幸会幸会，你们啥子时候到的，吃了饭没有？”

我把玉璧的信双手递给他，他扯出来晃了两下就揣进衣袋里。我心里奇怪，却见他女人从厢房里出来了。这妇人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矮胖胖的身材，眉毛画得弯弯的，站在那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李大哥板起脸，叫她去倒茶，待那女人进厢房去了，他才低声对我说：“我都晓得了，进货的事情，等一阵再讲。”

一会儿，他女人捧着一个茶盘子出来，递给我和夏林一个人一杯茶，又挨着厢房站着。

李大哥看了我一眼，见我穿得不洋不土的，脚上糊满了泥，就立刻拿出二十块大洋递给他的女人说：“去，小梁子百货铺里有做好了的衣服，快去买一套来，比你穿的要小一点，长一点，还要买双皮鞋，向大嫂比个样子。”

我想刚到这里，怎好麻烦别人，就说：“李大哥，不要紧，我在李子坝

还有衣服。”

他女人接着说：“我这里有衣服鞋子，大嫂恐怕穿得。”边说边往内房间走。

李大哥有点生气了，喊了一声：“转来，说买就买，你那衣服大得不得了，人家怎么穿得！”

我看在眼里，心里想：看样子这位李大哥脾气不大好。不料待那女人走出去以后，他才换了口气对我说：“大嫂，你不晓得我那女人的嘴巴，不稳当。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说的话她听见了怎么办？”他这才又把信从衣袋里摸出来，问我说：“廖大哥在信里说些啥子？”

我说：“李大哥，你看信嘛。”

他把信纸看了看，笑着说：“大嫂，不瞒你说，我不认识字。”

我这才明白，赶紧把信接过来念给他听，说：“玉璧问候你好，又问这次皮头货进了多少，还差多少款子，上面需用很急，特派我们来取，还要请李大哥大力协助。”李大哥听了，摇摇头说：“抱歉得很，这次没搞到多少货，总共只有一打手枪，三千多发子弹；人家倒答应了我六十支步枪，但是要一个星期以后才能扯回销。至于款子嘛，请转告廖大哥说，请他放心，上面能找多少算多少，不够的由我拿出来就是，我这里还扯得动。”

我听了心里想，六个人跑一趟，冒着风险运这点货，是少了点，可是看样子人家李大哥也有难处，总不能过于难为他。我说：“李大哥，这几年来你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我们山上的弟兄们都是感激不尽的。这次货少一点也不打紧，我们还要常来常往，只是上面催得急，你看怎么安排。”

李大哥想了一下，问我来了几个人，我说连我六个。他又问走水路还是走旱路，夏林说走旱路可以早两天到。他说，那就后天走吧。

我急了，问明天行不行。李大哥沉吟许久才说：“大嫂你不晓得，这一向你们北路打得很凶，江边上和沿路对上去的人货都防范得很紧。我看你们最好从临江门码头上船，到头塘再下去走旱路，这样稍微好出城一些。我本想找雷忠厚雷旅长派两个兵送你们这一截，偏偏他又不在家。不过这次廖大哥这么急，万一贻误了军机，就坏了大事。这样吧，我这里马上分派两个弟兄去办，明天找人送你们上船。”

说了一阵，天都快黑了，我和夏林起身告辞，约好明天在旅馆里见。我们刚要出门，李大嫂提了一个纸盒走了进来，说走了多少铺子都找不到一套合适的衣服，只是买了一双皮鞋。我从身上摸出五块银元来，她半推半就的准备接受。李大哥白了他女人一眼，对我说：“廖大嫂你这样见外，我要多心了。”

我只好把钱收起来，心想二天买一节衣料子送他女人就是。

出了水巷子，夏林把我送到小什字，伸了个懒腰说：“大姐你安安心心去看娃娃，这阵老唐他们恐怕把货卖得差不多了，我们今晚上要好好生吃顿馆子，再到又新大舞台去看场川戏。”

我说：“你就晓得耍，若是出了事情，你大哥要拿我是问的。回去跟大家说，看戏进馆子都可以，就是不能吃酒。”

夏林吊儿郎当地答应着，转身回旅馆去了。我坐着黄包车到李子坝曾三姐家去，看望两个孩子。从小梁子到李子坝，很有点路程，黄包车夫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埋着头一路小跑。

冷冷清清的大街小巷只有些卖烧腊的小酒馆和杂货铺亮着灯，一些穿

黑制服的警察沿街走来走去。行至牛角沱，我在一家小店子跟前喊住了车夫，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两斤花生，算是给两个孩子的见面礼。

车到李子坝，已经二更天了，一进门曾三姐就拉着我高声叫了起来：“你这个背时的，舍得下来呀！”她这一叫，惊醒了刚入睡的宁儿，翻身起来坐在床上，喊了声妈妈，哇地一声哭着从床上跳下来，抱着我就不松手。我蹲下来捧起宁儿的脸，问她是不是想妈妈了，她抽抽搭搭地点头，我一下子觉得鼻子发酸，眼里也湿浸浸的。半年不见，女儿长高了，也比在乡里时白净了许多；再看看睡得正香的彬娃，脸儿红喷喷的，嘟着个嘴巴像在跟谁生气。这时候，韩嫂打了盆热水过来，说：“莫喊醒他，这娃儿受了点凉，今天还有点咳。”

我脱下满是泥浆的鞋袜，把脚伸进热水里，舒舒服服地嘘着气。曾三姐一边打发韩嫂给我找衣服，一边笑也不是气也不是地唠叨：“看你穿些啥子哟，不三不四的，堂堂康家屋里的表小姐，泥呀水的糊得眉毛鼻子都看不清楚。你这个人呀，说也说不听，屋里不缺米不少盐的，硬要往外头乱跑，自找苦吃不说，还要让别人替你担心。”

吃了韩嫂煮来的一碗鸡蛋酸辣面，浑身都暖和了，偎着被子坐在床上，和韩嫂、曾三姐摆些女人家的龙门阵。其实她们都晓得我和玉璧是干啥子的，可是又觉得这个党那个派跟女人家又有啥子关系，只是图着姐妹间人缘好，大家互相帮个忙。韩嫂说：“彬娃调皮，爱往马路上跑。宁儿倒听话，就是有点小气，有一次听说你到了化龙桥，大清早就悄悄地跑出去，从化龙桥街上一直到河边的每一条船，天黑尽了，才饿着肚子哭哭啼啼地走了回来，真把我们急死了。”摆了一阵娃娃，曾三姐又问我：“上回给你做的那件夹旗袍，可是上好的锦锻料子，这回到重庆咋不带来上街穿？”

我说，那件衣服倒都说好看，只是过于富贵气。曾三姐一听这话，沉下脸说：“你这个死女子，当时那么欢喜，这下又说什么富贵气，莫不是又拿去送了人吧？”我笑着说：“不瞒你老姐子说吧，在梁山教书的时候，一个学生的父亲死了办不起丧事，我就把那件衣服让给了一位平素很要好的官太太，钱给了那个学生回去买棺材。”曾三姐听了，叹口气说：“你这大手大脚的德行，啥子时候才改得了哦！”

我拉着她说：“三姐，你莫叹气，我当时就给那个学生说，衣服不是我的，要谢就谢你，人家当真趴在地上给你磕了三个头。不晓得你那晚上搓麻将，赢了好多钱咯……”

大家说笑了一阵，各自去睡了。宁儿紧紧抱着我，扳都扳不开。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梦里隐隐约约全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号子声，睁开眼睛一看，天都亮了，韩嫂已经做好了早饭，筷子碗都齐齐崭崭地摆在了桌上。

我匆匆吃了饭，正要出门，彬娃醒了。小家伙揉揉眼睛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我张开双臂呼唤他，他也不过来；我去抱他，他慌慌忙忙地直往后缩。韩嫂见了，生气地说：“这娃儿咋连妈都不认了？”

彬娃扁扁嘴，要哭的样子。我看宁儿还在睡着，怕惊醒了她要绊脚，忙说：“韩嫂你莫骂他，过些天我还要下来的。”说着咬咬牙，一扭头出了门。

到了旅馆，李大哥已连夜把雷忠厚找了回来，一起在房间里等我。雷忠厚是杨森的一个旅长，早年也是穷娃儿，后来生活无着，在河上当过纤夫，扯棚子进了绿林，最后被杨森改编，在杨森办的军政学校当过朱德和陈毅的学生。此人不但是一员骁将，而且以讲义气著称，在四川泸州之战和湖北打

仙桃镇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救过杨森的命。可是杨森只重视他的“杨家军”，对雷忠厚反而疑心重重，最后只给了他一个旅长的空衔，一直让他在重庆“坐冷板凳”。雷忠厚苦闷之后，也就看淡了，和李荣华成了最好的朋友；也和玉璧认识了，非常敬重玉璧的才学胆识，第一次起义时就帮我们买过枪。

雷忠厚一见我，就打着拱直说：“久仰久仰，不知道大嫂来了，饭也没请你们吃一顿。”我们寒暄了几句，雷忠厚告诉我子弹都装进了子弹带，和十二支手枪一起，大家都带在身上，保险一些。还直说给廖大哥带个话，这次的货不够，下回一定多搞一些。我们谢过雷旅长和李大哥，赶紧收拾停当，趁着天色尚早，由雷旅长派的两个弁兵护着，由临江门坐船到了头塘。

唐俊清戴顶瓜皮帽，穿件灰布长衫，外面套件青布马褂，仍是个贩鸡鸭的行商；其余的人在空篾箩里放了些红绿花纸、年画和纸糊的笑罗汉头，像是赶回家去过年的力夫；我装成一个农妇，夹在他们中间。上了路，才下雨，我的一双布鞋糊满了稀泥，怪不好走，慢慢地就落在了他们后面。在离罗锅凼还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凉亭，夏林他们坐在凉亭里等我，看样子都等得有些着急了。唐俊清老远就迎上来说：“大姐，不好了，罗锅凼住了连大连人，卡子守得很紧，进出的人都要检查。”

我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在凉亭歇气时，听到过路的一个老大爷说的。”“前两天从这里过，都没有军队嘛。”

“是呀，昨天才开来的。”

“是哪个的队伍？”

“听说是杨森甘军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住了。罗锅凼是重庆到广安、上华蓥的必经之路，这里两边高山环抱，中间一条独路经过，在这里设了卡子，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今路上行人稀少，我们这一行人十分打眼，处在这眉毛底下，迈不过，躲不了，连往回走也不行了。

大家在凉亭里商量了一阵，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最后只得让唐老六到前面去打探一下再说。

唐老六解下了身上的手枪和子弹，挑了副空篓子，大摇大摆向场口走去。我从篾篓上拆了根竹片子，装着在路边撬草药，静观场口的动静。不一会儿唐老六走出场口，假装在田坎边小便，直是朝我们摆手，意思是不得行。大家一下子把头都转过来，你看我我看你的，半天没得人说话。唐俊清闷不住了，把手中的半截烟锅巴一丢说：“大姐，我们与枪共存亡，怕它啥子，冲过去！”

夏林也说：“就是，跟甘军又不是没打过，打它个出其不意，请他几爷子过个热闹年。”

我说：“你们说得倒轻巧，事情哪有这么简单。你们想想，现在下雨路滑，对面是山，即使我们冲过了卡子，敌人使的是步枪，我们使的是手枪，他打得到我们，而我们打不到他，不是要吃大亏吗？何况一打响，人家连大连人，场里场外一下子围拢来，恐怕要把我们全都煮在这锅里头！”大家又不说话了。唐俊清低着头，在凉亭里踱来踱去。夏林眉头一皱，凑上来对我说：“大姐，硬冲不行，我倒想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行不行。先叫唐俊清和唐老六将卡子上那几个哨兵招呼到场口边那个饭馆里去吃酒，我们设法

从馆子后面绕过卡子混过去，如不行，就只有老办法，冲！”“大姐呢？”唐俊清问。

夏林接着说：“大姐就装成本地人混过卡子，只要你爬到对面那座山坡，我们就动手，不然你跑不赢。”

我想了一下，说就这样办吧，接着招呼大家将身上的枪弹捆紧点，谨防跑落了。

唐俊清敞开马褂，解开长衫的扣子，露出一件蓝色点点花的夹衫，急步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夏林他们才挑着竹篓子，慢腾腾地吊在后头。

唐老六站在饭馆门前，看到唐俊清过来，大声喊：“王大哥，走快点，菜都冷了。”馆子门口站着四个兵，都唏哩哗啦一阵地拉着枪栓，大声喊：“是啥子人？站住要检查！”唐老六掉转头去对那哨兵说：“一起的，是我们一起，由重庆卖鸡回来。”说着上前几步，拿出一包烟来向四个哨兵各散了一支，然后拍着一个哨兵的肩膀说：“天气冷，走，喝二两。”

那几个哨兵一听说喝酒，馋得喉咙里伸出了爪爪，你望我我望你地迟疑了起来。

唐俊清也走向前去打招呼：“出门人，四海之内皆兄弟。

一回生，二回熟，走，不要客气，吃点耍酒。”

唐老六与唐俊清边说边拉，一个戴上等兵领章的对另一个哨兵说：“你守着，等一阵来换。”然后向其他两个把嘴一翘，跟着唐老六走进了饭馆。

我蹲在饭馆侧边的田坎上，手上在扯草药，耳朵就在听饭馆里的动静，然后随手扯了一把“泥鳅串”拿在手里，大大方方地向卡子走去。

“干啥子的？”那哨兵有气无力地问。

我漫不经心地说：“扯草草药的，细娃病了。”“你是哪里人？”

我知道这一带姓罗的很多，就说：“我姓罗，是那边湾湾头的。”

“检查。”那家伙嘴在说，手脚并没有动。

“先生，我就这一身，有啥检查的？”

唐俊清听见一声检查，就走出饭店，假装在一个摊子上买花生，不转眼地瞟着我。那哨兵见我一手拿个竹片，一手拿把草草药，把手一扬，就让我过去了，唐俊清才放心地回到饭馆去。

我走进场口，在一个草堆上扯了一把谷草，胡乱做了一双草脚码子绑在脚上，又捡了一根竹杆，拼命地往山上爬去。雨越来越大，山上的黄泥，一见雨就硬头溜，真是爬一步，滑一步，心越急路越滑，一连跌了好几交。

我爬上半山腰，忽听得啪啪几声枪响，回头一看，夏林他们丢了空篓子直向山上跑来。

敌人的集合号不住地吹，大人细娃在街上东闯西碰，家家户户忙着关铺门，口哨声、呼喊声、啼哭声混成一片。不一会儿，场上的敌人已经召集人马，四五十个人散开，向山上围了过来，子弹呼呼地从我头上飞过。好不容易看到夏林他们追了上来，却不见唐俊清。夏林拉着我边跑边说：“老唐在后面掩护我们，快跑！”

我拉着夏林的手爬过一个陡坡，还不见唐俊清的影子，心里越是着急，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忽然，唐俊清包着青丝帕子的脑壳从陡坡下冒了出来，我心里一阵惊喜，刚喊出一个“唐”字，那脑壳又不见了。我忙喊夏林快下去救他。这时候唐俊清抓住了山崖边的野草，眼看就要爬上来了，脚下一滑又不见了。眼看敌人已经追上来了，不住地喊：“捉活的，捉活的！”夏

林一看万分危急，连忙打出了一梭子弹，跑上前去扯着一棵小松树，将唐俊清拉了上来。

我们又往山上爬了一阵，在一个山崖边隐蔽起来，唐俊清说：“同志们，沉住气，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对打一双。”一个同志没有经过火线，有点胆怯地说：“大姐，我们跑吧。”

我说：“路这样滑，跑不动，敌人在后面追着打，危险得很。”

夏林有点不耐烦地说：“不要罗嗦了，准备好，叫这些狗日的到阎王那里去过年。”

不一会儿，敌人追上来了，像狗一样的，两手撑在地上，一步一步地爬着走。他们人多拥挤，前面一个刚到唐俊清跌交的那个地方，脚一滑就滚下去，后面一长串人像坛子碰坛子，唏哩哗啦滚了一串串。

山下出现一个穿黄呢军服的家伙，骑在一匹黄色的高头大马上，挥着手枪老远地指着半坡上的那些兵骂道：“妈的，都这么不中用，还不给老子冲，冲上去！”

那些糊了一身泥巴的兵只得转过身来，又往山上爬，嘴里叽哩咕噜地发着牢骚。就这样爬上来又滚下去，滚下去又爬起来，好容易上来了十多个人，站在那里指手划脚，得意得不得了。唐老六见了，有点沉不住气，扯出枪来就想打，我一把按住他说：“不要慌，等人多一点，一枪一个，不能浪费子弹。”

敌人又上来了好几个，我们每个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死死地盯住各自的目标。敌人向我们围了过来，眼看只有五十来步了。唐俊清用手拐子撞我一下，我喊声“打”，六个人都是双枪，噼里啪啦连打了两槽子弹，敌人立即慌作了一团，掉过屁股就往山下滚……兵败如山倒。不管那个骑马的家伙在下面怎样打枪怎样乱骂，丘八们还是泥糊糊地落了魂一般往下跑。夏林收起枪哈哈一笑：“妈的，这些草包硬是不经打，可惜了老子这么金贵的子弹！”

已是黄昏时分，雨还在下，枪声却停了。山下的坝子上空无一人，出奇地冷清。我站起身来，催促大家收拾上路。夏林却盯着前面摆着的几具尸体，说哪有送上门的财喜都不捡的道理，说着就和唐老六一道，到死人身上去扯子弹，一边扯一边说：这回我们这么多人才运了这点枪弹，拿回去怎么喂得饱杨森的那些草包兵……正说着他突然唉呀一声，大家连忙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死人爬了起来，翘起个屁股直喊饶命。唐俊清一脚踢去说：“你狗东西装死，把老子吓了一跳。”那丘八连忙说：“不是装的，硬是挨了枪子儿呀。”夏林过来看看，觉得奇怪，走上去用枪口点着他说：“你起来指给我看看，到底伤到哪儿了？”

那人连忙爬了起来，浑身上下一摸，愣了，连忙再摸了一遍，声音颤颤地说：“天啊，我没有挨枪子儿，好好的，老天真是有眼睛！”

大家都笑了。夏林用枪点着他说：“说老实话，我不打你。你们到底有多少人？”

那家伙捣蒜一样地磕头：“没得好多，没得好多，我们那个连长心凶得很，说是一个连，其实连老弱病残炊事兵加上一共才五十来个人，平日里都像我一样，连枪都很少摸过，其余的编制和省下来的子弹都叫他狗日的吃了空额。”夏林又说：“这附近还有没有你们的卡子？”

那家伙说：“本来上面都喊要设卡的，可是今天都腊月二十八了，尽都

懒心无肠的，只有我们这个狗日的连长想升官讨好，拍着胸口说只要我们来守着这罗锅函，就可以确保这一方平安……”

夏林问完了看看我，然后把他身上的枪弹搜光了，撕破他身上的棉袄，扯出一团棉花将嘴堵了，捆在一棵大树上，然后说：“等你的狗连长来救你嘛。”说完我们就扬长而去。

我们一行人爬到一个山崖边，钻进崖腔里坐了下来。雨越是下得密了，打湿了衣服也打湿了我的头发，我这才想起一天没吃东西，真是又冷又饿。唐老六摸出一串东西递给我，说是专门在馆子里为我买的白糕。我听了心里一阵欢喜，可是往嘴里一塞又连忙吐了出来：那白糕面上尽是泥巴。夏林见了又要笑我，忽听得远处有人说话。正在外面放哨的唐老六伸了脑壳进来说：“大姐，有一群人从后山上来了。”大家立即扯出枪来，上好子弹，在崖边找地方隐蔽好，唐俊清和夏林摸到前面去看动静。又过了一阵，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还夹杂着鸡鸭咯咯的叫声，接着听见唐俊清在说：“伙计们，去不得，前面在打仗，我们都在这里等着呢。”那群人停住了，叽哩咕噜商量了一阵，一个年长点的说：那我们也歇一下吧，反正路不好走，等天亮了再说。说着这十几个鸡鸭贩子就和唐俊清、夏林一道走过来。放下箢挑子，也在崖边上坐了下来。

夏林看着笼子里那些肥溜溜的鸡鸭，露出一副馋相，摸出几块银元凑过去说：“老板，我们商量一下，把你那些鸡呀蛋的卖点给我们如何？”

我们的一个同志说：“老夏你莫多事，这半山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肯信你把那鸡鸭就生啃了？”

唐俊清说：“大活人一大堆，未必拿着这些东西就没法子了？烧堆火来烤嘛，烤鸡烤鸭鲜得很呢，我听说洋人就专门爱这样吃。”

唐老六说：“你们就光晓得顾嘴巴，那山下还有几十个丘八等着的，烧起火来不是给人家报信指路吗？”夏林听了一拍大腿：“怕他个s*！刚才那兵说他们连伙夫打杂的在内才五十多个人，我们连死带伤又敲掉他们十多个，剩下还有几个是硬肘的？还不如烧堆火把他们引上来，敲一个够本，敲两个成双，也好多捡几支枪。”

大家觉得夏林说得在理，都一起看着我。我想天黑下雨，路不好走，前面即使军阀没设卡子，村村寨寨晚上也都有民团守夜，现在是没法走的了。再说大家又冷又饿，敌情还这么重，不吃点东西也不行，倒不如按夏林说的办。至于敌人嘛，谅这几个草包也干不了大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整就整痛，也让杨森尝尝我们的厉害。

夏林一看我同意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的，连忙招呼大家一起，四处去寻柴禾。下了一天的雨，树枝树叶都湿淋淋的，整死点不燃；唐俊清跑到山边上那家人的屋后扯了干谷草来，才把火点燃了。我们燃起三个火堆，一堆在崖腔后面，我们和鸡鸭贩子围在一起烤，另外两堆隔了十多丈远，作为诱敌之用。

听说我们要买鸡买蛋，鸡鸭贩子们倒是很殷勤，一个小伙子嘴里直是说大家都是出门人，患难兄弟，说着就从鸡笼里逮出两只七八斤重的大红公鸡。夏林把钱递给他，年轻人硬是不要，推来推去，银元落在地上。一个长着八字胡、大家叫他张大爷的鸡鸭贩子，捡起银元放在夏林的衣袋里说：“算了算了，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们的一点敬意，看样子你们打了一天一晚，也太辛苦了。那些龟孙子今天遇到了硬火，打得好，我心里像喝了两碗糖水，

安逸得很。”我说：“张大爷，这钱你们是一定要收下的，我们一不是杨森手下估吃霸捺的烂丘八，二不是乱抢人的土匪，你们若是不收钱，这鸡我们就不要。”

夏林趁势拉过张大爷的手，把银元放在他的手板心里头。

张大爷看看我们大家，张着大嘴：“请问你们是……”唐俊清说：“不瞒各位了，我们就是华蓥山农民自卫军。”

张大爷惊奇地问：“你们是不是廖大队长的队伍？”夏林望了我一下，连连点头。

贩子们站了起来，张大爷摸着八字胡笑着说：“啊！廖大队长的队伍，好得很！好得很！他才不睬祸事哩，专门和军阀恶霸作对，杨森那个耗子精的屁股他都敢摸，土豪劣绅听说他的队伍来了，三魂就吓脱了二魂，跑得光溜溜的。凡是廖大队长他们驻扎的地方，啥子捐呀税款的，免得干干净净的，老百姓算过了几天伸抖日子。唉呀，真是我们穷人的队伍……”

张大爷喋喋不休地说着，鸡鸭贩子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那小伙子不声不响又从鸡笼里提出两只鸡来，用手将鸡脑壳一拧，然后三扒两抓扯去鸡毛，两手抓住鸡腿，啪地撕成两半，架在火上烤起来。夏林、唐俊清一看，也忙着杀鸡扯毛。又有贩子用长衫子兜来一包鸡蛋，也放在火灰里烘了起来。两个年轻人说：“我们早就想投廖大队长了，就是打听不到方向呢，今天……”夏林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今晚不就碰上了吗？”

鸡肉的香气在雨后的山林里飘荡，鸡蛋也在灰堆里爆得啪啪作响。夏林撕了块鸡腿子给我，我只觉得还没嚼烂便吞下了喉咙，今天实在是饿狠了。大家正吃得起劲，忽听得啪啪两声枪响，鸡鸭贩子们一听有点作慌。夏林却啃着个鸡脯子说：“怕啥子，我们躲在这崖腔里，大炮也打不着，等他几个爬上来再去理抹。”

大家不开腔了，只听见山下有人在说话，话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听得很清楚。

一个声音在骂：“妈的，打死这么多人，咋个跟上头报盘？去，都去！把枪给老子捡回来！”

接下来几个叽哩咕噜的声音，一个老点的声音说：“连长，等一会儿天亮了喊几个民团弟兄一起去嘛，我们这几个人顶啥子用，上去了还不是送死……”

“胡说，你们硬要等到天亮了，让万多人都晓得我老王手下一连多人，在几个跑单的共老二手下吃了败仗吗？万一漏到团长耳朵里去了，就把你几个的脑壳拿去抵！都过了大半夜了，那些共老二早就跑了，跟老子上去把枪捡回来！”“哪里跑了嘛，你看山上还烧起火的……”

“多嘴，那是虚张声势，诸葛亮哄司马懿，这点计谋都不懂？”

几个丘八不开腔了，一会儿，山下燃起十多支火把，慢慢地朝山上爬来。唐俊清把夏林手上的鸡脯子扯来丢在一边，拿过一支从敌人那儿缴来的马枪，随我一起摸到离敌人近一点的地方，各自找好地形。

火把到了半山腰，在我们打了一仗的地方停下了。夏林说：“大姐，你看他们挤成了一堆，正好一锅端。”话还没说完，唐老六的枪响了，一支火把晃了一下落到了地上，接着大家噼噼叭叭地响枪，火把撒了一地，只听得一片哎哟连天的叫唤。这时天已麻麻亮了，透过蒙蒙雾气，看得见那连长骑着马在山下边跑边吼叫。我将两支手枪插回腰里，从唐俊清手里拿过马枪，

推上一夹子弹，瞄准那连长的影子，啪地就是一枪，那家伙叫都没叫得出来，就栽下马去。

我收起枪来，说了声：“你想升官，干脆升天去吧！”

鸡鸭贩子们在一旁看呆了，那张大爷半天才说出一句：“嗨呀呀，不得了，好枪法好枪法！真是穆桂英转世，梁红玉再生。廖大哥的队伍中连女将都这么厉害，真是吉人天佑，硬怕要登金殿坐龙廷！”

夏林和几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去捡枪，一边说：“张大爷你还不认识吧，这就是华蓥山谁个不知哪个不晓的……”我打断夏林的话头，说：“还不赶快打扫战场，硬要等那些残兵败将把民团伙起来，扭到你走不了路么？”

夏林吐了下舌头，不说了。一个小伙子悄悄地扯着唐老六的袖子，说：“请问你们那位大姐贵姓？”唐老六瞟了我一眼，说：“姓陈，陈三姐。”

后来，双枪陈三姐的龙门阵传得越来越神乎，我想跟这些鸡鸭贩子们多少有些关系。

顺手牵羊

在罗锅凶耽误了一天，我有些着急，催着大家赶了一百多里路，天都黑尽了才到一个小镇。

我们身上都带得有枪，又挑着两副挑子的货，不能到镇上去住，商量了一下，决定绕道去玉宝观借宿一夜。玉宝观离镇上有五里路，只有一个守庙的老者，我们人多，只要看守得紧，不怕他去通风报信。

敲开大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一跛一跛地走了出来，见我们这么多人有点诧异。唐俊清前去办交涉，老者直是摇头说：“你们到前面镇上栈房里去住嘛，这里就是我一入，铺盖也没有一床多的。”

我说：“老师父，我们是广安杨老太爷家里的。今年老太爷满七十岁，要做大生日，到重庆去办了一些干杂货回来，有一个力夫病了，走不得。”我转脸把唐老六盯了一眼，他就唉啊连天地叫唤起来。我接着又说：“你老者行个善嘛，我们坐一夜都要得。”

庙老者仔细打量了我们一番，见都是粗布长衫老老实实的庄户人，就勉强答应了。我当时就给他两块银元，向他买两升米给我们煮晚饭，剩下的就作柴火钱。他喜欢极了，点了一盏香油灯，将我们引到客房里。这个房间像是很久没有住人了，扬尘吊得多长，满屋都是灰尘，两间大床铺满了乱谷草，各放了一床烂草席，一股霉气使人发呕。我们用扫把简单地打扫了一下，将挑子放好后，决定分班放哨。唐老六是第一班，他先出去了，其余的到灶屋去烤火洗脚。

我在灶边烧火，同庙老者摆龙门阵，问场上那些甘军的人，常不常到这里来。庙老者摇摇头说，“来做什么？什么都抢走了，连碗都抢走了，就剩下这几间屋。”说着就把锅里的水舀在一个木盆里，招呼大家先烫个脚。

夏林一边烫脚一边说：“大姐，今天太累了，昨晚又没睡觉，是不是到场上去买点肉打点酒，大家好生吃一顿？”唐俊清和唐老六都说：“要打酒，就该你老夏去跑路。你今天偷奸耍滑的，我们都轮流挑担子，你光是打着用

手走路。”“只要有酒吃，跑路有啥关系。”夏林三下两下揩了脚，在碗柜里找了个酒罐，抬脚就要出门。

我往灶里添着柴说：“夏林你还是忍点嘴，眼看都要拢了，莫出去惹麻烦。”夏林一听这话，提着酒罐愣在那里。满屋的人都看着我，不开腔。

庙老者端着一升米进来，见夏林提着酒罐，忙说：“要打酒么？方便得很，前面么店子就有，不过半里路。”唐俊清走过来说：“大姐，大家确实是累了，明天还要赶路，若是不放心，叫老夏就在么店子里打点酒，你看要不要得？”

我看看大家疲惫的样子，也就不好再坚持，只是给老唐做了个动作。唐俊清笑笑，过去把夏林推到房间里去，下了他身上的枪和子弹，叫他快去快回。

水要烧开了，庙老者又去打了一升米来，一齐倒在锅里，又从地里扯来一些青菜萝卜，洗干净了倒在一个大砂锅里，放在火边煨着。隔了一阵闷锅饭好了，夏林还没回来；又过了一阵，青菜萝卜都煮烂了，夏林还是没回来。大家早已饿坏了，我说不等他的酒了，先吃了再说。可是饭都吃完了，老者连锅碗都刷洗归一了，夏林还是不见影子。大家就有点着急了。有的说这家伙莫不是到场上吃耍酒去了，有的说恐怕是喝醉了倒在冬水田里了。唐俊清看看我：“该不会出事吧？”我闷了一会儿，实在是放心不下，正要出去看个究竟，就听见唐老六叫门的声音。他一进门来就说：“大姐，不好了，场上过来了一个人，看样子背着长枪。”

我说声准备，大家撩开长衫，从胸前扯出枪来，咔嚓几声响，所有的枪都上了红槽，各自找好了隐蔽的地方。庙老者吓慌了，站在灶边发抖，只是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一会儿，隐隐约约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门口停止了，接下来是打门的声音。庙老者战战兢兢地边走边问：“哪一个嘛，这样晚来做啥子？”

外面不回话，仍在使劲打着门。老者一边应着，一边吃力地取下杠子，拉开门栓，只听得哗啦一声响，庙老者唉哟一声跌倒了。我心里格登一下，心想今晚上莫非硬要干一场？就凑近木板缝隙，看见一个人跨进门来，肩上挂着两支长枪。他弯下腰去，放下手里的罐子，用双手扶起老者，说了声：“对不住，老师父，你受惊了。”

大家都从旮旯里走出来，又好气又好笑地望着进来的人。

我冒火连天地说：“夏林，你搞些啥子名堂？”这个扯客吃得醉醺醺的，嬉皮笑脸地说：“啥子事嘛，我今天立了一个大功，你不奖赏我，还要骂我。”唐俊清气冲冲地说：“立啥子功？害得我们饿了半天，又受这一场虚惊。”

“你看嘛。”夏林将手上的长枪放在桌子上，又从肩上取下另一支长枪交给唐老六。唐老六接过枪一看，高兴地笑起来：“嘿！这还是点广货，你是在哪里偷来的？”

“啥子偷来的哟！是场上李团总的正大堂皇送我的。”

我一看他带了这样好的两支枪回来，越是起了疑心，问枪是怎么来的。夏林说：“忙啥子，我还没吃饭呢。”说着就拿碗去添饭吃，还顺手从怀里拿出一包用粗壳纸包着的猪肉烧腊，用筷子向大家一挥：“来来，味道还不错。”唐老六说：“你打的酒呢？”

“唉呀，你不提起，我还搞忘了。”夏林边说边走向大门口，将酒罐提过

来。

“不忙，说清楚了再吃。”我将酒罐抢在手上，放在一边。“要得嘛，我说了你一定要赏给我一个人吃。”夏林一面吃着饭，一面指手划脚地说开了。

“我走到前面的么店子，酒卖完了。心想已经走了一截路，再多走几步，让大家喝几杯也好，于是就直往场上走去。场口上，有一个小酒馆，快要收堂了。我进去，叫堂倌打了半斤酒，买了两块豆腐干，一个人慢慢地吃。斜对面四五丈远的栅子门口，有两个乡丁，一个坐在栅子跟前打瞌睡，另一个也是没精打采地靠在栅子上，枪放在右手弯弯里，手上提着一个烘笼。栅子门半开半闭的，场里边清风雅静，场口上也只剩下这一家酒馆还开着。我问堂倌啥子时候关栅子，堂倌说这一向不大清静，二更过后就要关。我边吃边想，这送上门的财喜要不要呢？正在捉摸不定，堂倌走上来说还要不要啥子，我说称两斤猪肉烧腊，明天好在路上吃。”堂倌听说我要带在路上吃，就跟我摆起龙门阵来，说这里很不清静，经常是捐呀款的；前一场还在打锣，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要抽去打华盖山的共老二。

“我问他山上的‘共老二’到底有多少。他说多得很，听说有好几千人；我们的乡丁都抽调完了，找来他妈的一些大烟鬼来守栅子，枪都拿不稳，还要去防‘共老二’，真是见他妈的鬼。

“我耳朵在听，心里就在打主意。”

夏林吃完了饭，燃上一支纸烟，左脚踩在板凳上，又比又划地说下去：“我叫堂倌打了两斤酒，把切碎了的猪肉烧腊包好，算了帐就出了酒馆，走进栅子旁边一个茅房，假装解小便，暗中观察动静。不一会儿，酒店的铺面门关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守栅子的两个乡丁比先前更蔫，瞌睡硬是上来了。我拿出一支纸烟，哼着《月亮弯弯照楼台》的小调，偏偏倒倒地走到栅子门前，放下酒罐，找那个站着的乡丁接火。那家伙把手上的烘笼向怀里一拖，偏着脑壳望了我一眼，要理不理地说干啥子的。我说你看老子是干啥子的！一步抢上前去，将枪夺了过来。坐着的那个家伙还在伸懒腰，我用枪对着他，顺手又将那支枪夺过来。我手里拿一支，另一支背在肩上，问他们要死还是要活。这两个草包乖乖地跪在地下，不住地作揖磕头，连声说要活要活。我说要活就不准声张，解下子弹带，回家种田去。边说我边解下两个家伙的绑腿，将他们捆在柱子上，还从他们身上撕下一块布，塞在他们嘴里并说委屈一下，不然你们的长官见了，不杀头也要坐监。随后就提着酒背着枪……”夏林说到得意之处，将左脚从板凳上放下来，嘴里哼着咚咚锵锵的锣鼓点，在屋里走了一圈，然后一个抚掌亮相，摇头晃脑地唱道：“打道回府——”

大家一阵哄笑，都松了口气。有的说老夏这个精灵棍儿脑壳就是灵醒；还有的说这次回去，大哥一定会好好嘉奖。夏林说：“这点本事算啥，不过是跟大哥学来的，顺手牵羊而已。那回我跟着大哥到顺庆，遇到了敌人设在小坝子跟前的一个卡子，足足有一个班的人守着。大哥一边说：老弟，把胆子放雄点，一边装着怕冷的样子把手揣在怀里摸着枪，不惊不诧地走过去。那班长走过来喊检查，话音还没落地就挨了枪子儿。我们两个就把那一班人的枪缴了，还有五百发子弹。后来上山去，把这些枪弹送给小坝子游击队作了见面礼，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就靠着这些广货色起了家，那回劫了敌人一大笔粮款呢。”

夏林像个细娃样，把下巴扬起多高，说得眉飞色舞的。周围听的人一

片嘘声，连庙老者也吐着舌头说：“我活了几十年，还没看见过这么胆大的人。”

夏林看看我，洋洋得意地说：“大姐，这下该让我吃个醉吧？”

我沉思了一下，说：“赶快走。”

全屋的人都望着我。唐俊清会意地点了点头说：“对，要走。”

夏林还是不以为然：“不要大惊小怪的，场上的乡丁都走了，剩下几个临时拉来的烟灰儿，谅他也不敢来，就是来了，也不要你们操心，包在我身上。”

我火了，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说：“啥子叫大惊小怪？你知道不知道这样打草惊蛇，会弄得因小失大？你只晓得这个场上没有兵，你知不知道离这里只有十五里的肖家场就有杨森的一连人？山上都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枪弹，要是出了事，你有几个脑壳？”

夏林不开腔了。唐俊清说声快去准备，大家都回到房里忙着收拾担子，赶紧上路。

我叫唐老六拿出一包米花糖和一斤白糖，送给庙老者，说老人家打扰您了，以后有人来问，不要说我们来过，不然要惹麻烦的。老者忙说不会的不会的，我晓得你们都是好人，菩萨会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说话间，大家已经将夏林带回来的两支长枪和子弹都拆装好了，放在挑子里。我们辞别老者，又开始了紧张的夜行军。

整整两天一夜没好生睡一觉了，人困得不行，没担挑子的人，走路都迷糊的。我不断提醒前面的唐老六，不要带迷了路。好在天放晴了，星星繁亮得好，大家硬撑着，都后半夜了，才赶到大溪口我们的联络站唐二嫂家。唐二嫂披衣起来，刚拉开门栓，夏林就一个踉跄扑进去，差点没扑在二嫂子身上，吓得她唉呀一声，待看清了，才上来把我拉住说：“你们终于回来了，今天下午廖大哥带了二十多个人，来打听你们的消息，我家唐老二也跟着，像是很急的样子，连水都没喝一口，又跟大哥走了。”

我听了没说什么，心想出门由路，哪里是想好久回来就好久回来。就指挥大家，把挑子放进屋里，然后和二嫂一起从外面抱了捆干谷草进来，将就铺在地上。几个小伙子话都没说上几句，倒在上面就呼呼地睡着了。这一带已经是我们的地界，可以放心睡觉，明天好上山。我拦住要想去烧锅的二嫂，也进屋去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大天白亮，浑身都在痛，骨头像散了架一般，怎么也爬不起来。我就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的雀鸟儿，叫得婉悠悠清亮亮的。又躺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唐二嫂说的昨天玉璧带了那么多人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了，会不会真有什么事情？我翻身起来，走到堂屋里。夏林、唐俊清他们在干谷草上睡得正香。唐二嫂已煮好了饭在锅里焖着，坐在灶边帮唐俊清补那件挂破的长衫子，见我要想叫醒大家，连忙站起来说：“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嘛，都到了家门口，何必忙这一下。”

我叹了口气，还是把他们叫醒了。待到把地铺收拾了，唐二嫂给每人舀了碗苞谷糊糊。

又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瓦钵，一钵是油炸海椒凉拌萝卜丝，一钵是华蓥山区的特产血圆子。唐二嫂还拿出一罐酒来说：“打这点酒走了二十里路，本来是留着昨天晚饭给你们解乏的，晚饭没吃成，就早饭吃吧。反正都小晌午了，要不是夏林兄弟又有意见。”

我把酒拿开，说：“二嫂你莫惯坏了他，哪有早上喝酒的道理，一会儿上山他大哥闻到酒气，又要怪我管教不严了。再说若不是他昨晚上贪杯，我们就歇在玉皇观了，害得大家一天跑了一百五十里路。”

夏林叹口气，做出恼气的样子，呼呼地喝着苞谷糊糊。大家又取笑他一阵，三五下就把唐二嫂精心准备的饭菜吃个精光，然后收拾着上路。山坡上做活路的农民，都在歇头道气了。大家一路说笑，走到猫儿寺脚下。猫儿寺里，除了几个年轻的和尚外，空荡荡的。正在疑惑，玉璧带人来了，一见我就气势汹汹地说：“你为啥要误一天的期？”我莫名其妙地说：“啥事这样严重？我们平平安安地把枪弹运回来，不说有功，你还要训人？”

他一听更火了：“你啥子功？误了期，按规定要杀头！”我上下看着他，拖长声音说：“杀——头？谅你还不敢哩。”

“按军纪办事，我就有权杀你的头，你是领导！”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我是领导，领导又怎么样？总不是神仙吧？我们在路上，命都差点掉了，还白白地给你缴了十多支步枪千多发子弹回来，不过就迟了半天，你就要杀我的头？你杀嘛！我不信，没死在罗泽洲、杨森的刀下，倒死在你廖玉璧的手头！”

唐俊清在一旁，闷了好一阵没开腔，见我们越吵越凶了，才站出来说：“大哥，这确实怪不得大姐。我们在罗锅冲敌人的卡子，几乎打了一天一夜，打垮了敌人半个连，昨天又一点没耽误整整赶了一百五十里路，才在唐二嫂家里歇脚。”

我看唐俊清把情况说清楚了，更不服气，转身就走，一抬眼看见夏林和刘铁进来了，我冲着刘铁大声说：“我不同他一起工作，我也不要他领导！”

刘铁说：“玉屏你不知道，这几天敌人又在动了。我们把队伍都从猫儿寺撤了出来。玉璧怕你们在路上遭遇了，昨天专门带人去接应，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打了一仗，唐老二还挂了点彩。他是担心你们啊。”

我愣了愣，可一时还是服不下这口气，就冲着他说：“你为啥不早说？！”

刘铁在旁边哈哈一笑：“这下子话明气散了吧？”

运枪接枪

从重庆运枪回来，就过年了。接连几场大雪，把山路封得死死的，杨森的队伍行动不了，就把兵撤回去了，扬言开了春再来较量。玉璧把队伍集中在半山的猫儿寺，开始休整和练兵，我在山下料理完其它事情，也到了猫儿寺。

华蓥山上，竹林深茂，流水潺潺，历来为佛教圣地，山上山下五个大庙子，平素香火都盛得很。每到寒冬，五个庙子的和尚，除了烤火守庙的都集中到山腰的猫儿寺里，听主持方丈徐老和尚讲经说法，也顺便做些腌咸菜、霉豆腐之类的杂活，等开了春再分散开去，接待香客。这些寺庙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修建的，大都依山傍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浓荫掩映的高坡上，那些精致的画栋飞檐，为沉寂的山林平添了不少神秘。再看寺内大殿里的菩萨、

罗汉，都是鎏金彩塑，一个个面目鲜活，衣裙飞动，在川北一带都极有名气。从南京回来，玉璧就常来走动，和徐老和尚已经熟识；这次带了队伍上山来，借住庙里，大家闲下来常帮着和尚们挑水劈柴，开荒种菜，相处得不错。再说有我们的队伍在，杨森和向屠户也提不了庙产，徐老和尚也就不再说什么。

猫儿寺前面，有个大坝子，天气一放晴，坝子里就满是弄枪舞棍的队员们。有的头上包了白布蓝布撕成的帕子，有的戴着遮阳帽、瓜皮帽、灰军帽，身上还是乡下人穿的短滚衫、长棉袍，脚上大都是自己用蓑草或棕丝打成的草鞋，也有在脚上包野兔皮的。他们东一堆西一堆，有的在枪筒上吊块石头练瞄准，有的拿着梭镖、木棍在练刺杀，还有一个脱得只穿件单褂子舞三节棍，舞得那铁链挂着短棍上下翻飞，引来一片喝彩之声。我穿过人群，来到坝子的一角，见一群年轻娃娃正在这里打拳翻跟斗，我穿着棉滚衫都还觉得冷，这群年轻人穿着单衣还在冒汗，那头上的戒疤一看就知道是平日里烧香拜佛的那群小和尚。我正看得出神，听得旁边一阵哄笑，原来是夏林正带着几个小和尚，在一块两丈多高的岩石边往下跳，一个小和尚不得要领，跳了个脸扑黄土背朝天，正在一边呸呸地吐着满嘴的泥巴。夏林纵身跳下岩去，将那小和尚扶起来，双手揉着他的光头念叨：“包包散，包包散，回去莫给爹妈看……”

正闹着，金积成过来了。二十七八的人，头发蓄起卡多深，加上满脸黑蓬蓬的络腮胡子，活像个鲁智深。他拉过小和尚对夏林说：“老夏，你这细娃脾气，啥子时候才改得掉哦。法慧，你莫理他，听我说，打仗不光在平坝上打，不会爬山跳岩是要吃亏的。跳岩心头莫慌，身子要缩成一团，腰杆向前倾，脚尖先落地，像我这样，看懂了没有？要是像你先前那样，饿狗抢屎，若是栽到石头上，定是磕掉门牙，脑壳开花。”

金积成的话还没说完，小和尚又爬上岩边，蜷缩着身子一个箭步跳下来，当真稳稳当当地站在我们面前。他高兴得口里直叫着：“我会了我会了，夏队长光晓得耍弄人家，还是金队长好！”说罢蹦蹦跳跳爬上岩去了。

我看这小和尚，大约十四五岁，瓜子脸，双眼皮，圆眼睛，眉清目秀的，说话尖声尖气像个姑娘家，精精灵灵地怪招人喜欢。我问夏林：“这小和尚叫什么？”

夏林笑着说：“他呀，姓僧名和尚，外号人称小电棒。”我说：“你莫跟我扯嘻嘻的。”

夏林这才正儿八经地说：“他叫僧法慧，大哥这次在和尚中收了十二个弟子，他是十二圆觉中的头一个呢。”我问什么叫十二圆觉，夏林摸着脑壳说：“这都是佛家的话，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都是猫儿寺、黄龙寺、宝顶寺的和尚，有十二个早觉悟的先入了党。就这么回事。”

正说着，那小和尚走过来，夏林喊过他来，指着我说：“法慧，你还不认识，这就是我平时常跟你们提起的大姐，外面也有人叫她陈三姐，听说过么？双枪陈三姐，百发百中呢。”我打断夏林的话，笑着说：“法慧你不去烧香拜菩萨，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法慧说：“我来锻炼嘛。大哥说的，锻炼好了二天好去打恶霸地主、反动军阀。”

“那你是参加革命了哦？革命又苦又危险，你清清闲闲的和尚不做，为啥要来干这个？”

这可把他难住了，他望着地下，半天才脸红筋涨地抬起头来，结结巴

巴地说：“我，我也说不清楚，我要去敬香了。”说着转身跑开了。

晚上，风很大，弟兄们在殿里烧起柴堆烤火。我才上山，跟大家还不大熟识，玉璧就带着我到处走走，算是见了个面。大家烤得周身暖和，进去睡觉了。我直走进厢房，见地板上铺了厚厚的茅草和自己打的草席，几个人打伙盖一床铺盖，挤得紧紧的，都说夜晚好睡得很。

晚香都烧过了，我又在各处走了一圈，怕刚才的火堆没处理妥当，就转到殿里去看看。

才走到大雄宝殿背后，见夏林抱了床铺盖，正准备爬到守护神韦驮像下面的神柜上去，见了我嬉皮笑脸地说：“嘿嘿……今晚上冷得很，找韦驮菩萨给我保镖，睡这个避风的地方。”

我一看急了，说：“夏林你简直不成样子了。你大哥不是常跟你说要尊重宗教信仰，爱护庙宇菩萨吗？身为小队长，带头破坏纪律，你就不怕受处分！”

夏林已经在神柜上坐稳了，铺着被子满不在乎地说：“大姐，你莫要大惊小怪的，这里的和尚跟别处的和尚不同，都变成革命和尚了。不信你把僧法慧喊来问，看他有没有意见。”正说着，法慧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细声细气地说：“问我啥子？”

夏林说：“法慧，你来得正好，我问你，我在这里睡要不要得？”

法慧说：“要得要得，这里又避风又热和。”

夏林故意看了我一眼，又说：“可是有人说我侮辱了菩萨，和尚不答应呢。”

法慧也笑了起来，说：“管他的，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让我师父当面看见就行了。他这几天正吃药，不得出来的。”我招呼法慧坐下，他便打起盘脚坐在我对面的蒲团上，一对圆溜溜的眼睛望着我。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十八岁。我愣了一下，又问他上山几年了，他说十二年了。我更吃惊了，心想这么一个机灵的娃娃，就有三分之二的生命在这深山古庙里度过，这十二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啊！

法慧拣根柴棍，拨开了用灰闭严的火堆，细声细气跟我摆龙门阵。说他很小的时候，叔叔为了独占家产，逼死了他父母，又将他赶了出来，流落街头，后来被乡里当遗弃的孤儿，送上山来。有一年清明，他回去给父母上坟，走到半路被一个远房叔伯叫住，说娃儿你回去不得，你叔叔怕你回去清理家产，会整死你的，结果他又一路哭着回到庙里来了。法慧说，在庙里这些年，每天一早起来，就是抹屋扫地，挑水打柴，他个子小，做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但久了也就习惯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做活路都不怕，最怕的是念经。我人生得笨，记性又不好，光是念那个大悲咒，就不晓得挨了多少打哟。”

我问大悲咒是什么经文，法慧就给我念了一段，我也跟着念了几句，什么南无密多的，确实不好念又不好懂。我们笑了一阵，夏林说：“你们和尚这么迷迷糊糊地一天念到晚，到底有啥子用处嘛？”

法慧说：“我师父说，硬是很灵验呢。若是哪个坏人想害你，你念动大悲咒，就会有神灵来保护你，一个拿着钢铲，一个拿着神鞭，把那要害你的人吓得跑都跑不赢。我的师父说，这就叫做人有诚意，神有感应。”

法慧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正经经的，很虔诚的样子。我问他念了这么多年的经，到底见到什么神没有。他才像醒过来，长叹一口气说：“啥子神啊，

大哥说了，都是虚的。我们天天念经，受苦的还是受苦。那些不念经的，享福的还享福。佛法上说要普渡众生，我看你们这些共产党带我们穷人闹翻身，打军阀，打土豪，这才叫普渡众生呢。”

火要熄了，手脚有些僵，法慧站起身来，到灶房去抱了捆干松枝，三拨两拨就噼啪燃起来。我看着他单薄的身子说：“法慧，你现在参加革命了，革命工作苦得很，要有思想准备才行。”

法慧笑着说：“苦就苦嘛，不苦哪来的甜？原先我挑水觉得恼火得很，现在挑起来跑得跟飞一样。我们白天要跟夏队长他们一起练武，还要种地做咸菜，做庙里的打杂活路，晚上一样要站岗放哨，还抽空带着鸟枪出去打些野物，又练了枪法又给大家改善伙食。大姐你不晓得，我们腌的斑鸠和野兔香得很呢，明天请你尝尝。”

我听了大吃一惊，说：“你们和尚不是吃素戒杀吗？咋敢拿枪到山上去打野物？”

法慧嘿嘿一笑：“吃啥子素啊，早就开斋了。说到戒杀，我觉得还是廖大哥说得对，不能滥杀好人，可是对那些坏人，该杀，杀一儆百，把他们杀绝了，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这不就是普渡众生了吗？我二天把枪法练好了，就要去杀我的那个幺叔，给我爹妈报仇！”

我禁不住站了起来，看着法慧那张被火光映得红闪红闪的脸膛，觉得这个下午还像姑娘一样的和尚，咋就变了个人呢！

天气渐渐暖和了，沉闷的山林之间，浮出了若有若无的轻烟一样的绿色。我们召集了队里的干部，在大殿旁的厢房里开了一天的会。大家议论了一阵，觉得我们眼下住在庙里，跟和尚关系不错，吃住都暂时不成问题。可是我们的队伍不能就这样养着，要拉出去跟各路武装一起配合行动，要和杨森的甘军打仗。这几个月来，县委的同志们都跑了各个绿林山头，交了不少朋友，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队伍就准备和武胜刁仁义的队伍联合。玉璧对我说过，这位刁大哥，早先出身也很贫寒，还当过长年，后来被迫投身绿林，因为为人正直，也诚恳厚道，手下聚集了三四百兄弟伙。他请过金华新在他的队伍里作报告，也和玉璧谈过好几次，说共产党里的人才多，学问大，尤其对玉璧推心置腹，愿意给玉璧当副手，联合起来打天下。

队伍扩大了，当然是好事，可是给养也得跟上才行，尤其是枪支弹药。到重庆买吧，由于刘湘和杨森关系紧张，防范得很严，加上我们手里的款子也有些紧；最近李大哥又有事情回广安了，那边也不好进货，恐怕一时还去不了。想来想去，还是得冒个险，到阳合场的马盘山去找周子善，把第一次起义后放在他家的那一批枪弹运上山来。

第一次起义之后，我们把枪支大都分放在一些关系不错的地主的碉楼里。如今时过境迁，我们一直处在蛰伏之中，杨森来了之后，他派驻岳池的“精练司令”向廷瑞向屠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很多地主都不敢再与我们往来。有些不怀好意的，干脆就把我们的枪一口吃掉，来个不认帐，更有的还与敌人串通，捉我们的人去邀功请赏。就在年前我们去重庆运枪的同时，玉璧派何明轩去天宝寨取枪。那晚明轩走进放枪的李玉如家，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叛徒李老幺带了几个人，将房子团团围住。明轩冒着弹雨翻墙跑了出来，从寨后的崖坎上跳了下去，跌断了腿，被李老幺捉住，要他供出我们的驻地。明轩将李老幺大骂了一顿，一掌将他推出去多远，当即被打了几十枪，牺牲的时候还不到十九岁。

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难受了许久，晚上一闭眼就看见明轩露着整整齐齐的牙齿，满不在乎地跟我说着什么。

事情是有难处，有危险，可是也不能不去做，没有枪支怎么打仗扩大队伍；再说这些枪不收回来，落在敌人和反动地主手里更糟糕。好在这几个月冒了种种风险，都收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周子善这一家。大家又把情况好好分析了一下，觉得周子善这个人虽然是个中等地主，但念过几天书，也读过些进步刊物。第一次起义时，和我们的关系很不错，还帮着我们出过些主意，尤其佩服玉璧。他在寨子里人缘不错，这两年也没听说有什么风险的传言，无论如何去打探一下总是可以的。但是，从他住的马盘山到山上，必然要经过我们的死对头王尧管辖的地界。这两年跟周子善毕竟没有往来，不敢贸然行事，更不能多带人，决定由我独自先去探个虚实，再想办法，不管事情办得如何，让陈仁勇隔天下午带人，到山边来接我。

已是早春时节，天气晴和，路边的小院里，偶尔有一株两株白的粉的李树桃树，傍着哗哗流淌的溪水开得天天灼灼。我穿了件素花的夹旗袍，面上罩了件墨绿色的短呢大衣，提了个藤包，就成了一个从外地教书回来的女教员。这一带，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怕碰到熟人，一直是走背静的小路，在罗渡溪的下面过了河，走到马盘山时，天色已经擦黑了。马盘山的左边，有一个大寨子，地势险要，三面是悬崖，只有右边一条靠寨门的路才能上去，周子善就住在上面。我走到靠寨门的山脚下，在一个卖甜醪糟店子旁边歇气。从卖醪糟的老太婆口里知道周子善在家，平安无事，就写一张条子请老太婆的儿媳妇送去。不到一杆叶子烟的工夫，从寨门走出一个人，矮胖矮胖的，穿一身老蓝布衫和一件半新旧的青花缎马褂，老远就打招呼：“大姐，你好久回来的？”这就是周子善。

我笑着站起来，说刚从梁山回来，走到这儿了，顺便来看看你。他连忙接过我的藤包，说你真是稀客，走走走，到寨上去休息。

我们沿着石梯走进寨门，经过一些破破烂烂的茅草棚棚，绕到右边一幢青砖瓦房里，这就是周子善的家。跨过一个小天井，在他的堂屋里坐下，周子善进去烧茶水，我坐在一张楠木雕花的椅子上，思忖着怎么向他开口。一会儿，周子善端了茶出来，接着又端来一个火盆，放在我脚边，开口就神秘地问：“大哥他，有话么？”

我一愣说：“不是跟你说了，我才从梁山回来么？连家都还没拢呢。现在外面嘈得很凶，说华蓥山又打起来了，我实在有些担心，先到你这里来打听点情况。你晓得的，我到梁山教书好几年了，难得回来一次，这大半年，你大哥连信也不写了。”

周子善把茶送给我，很兴奋地说：“打起来了，是打起来了。从去年冬月间打起，到今年正月，前后打了几个月哩。我们打退了几次围攻，还消灭了好几百敌人，杨森的队伍始终上不了山。大姐，我们这次的打法，不像上次啊，不硬打，分散活动，敌人多，就避他一下，敌人少，就这么……”他用手比了一个喇叭形，“把它吃掉！人家都说，这是发明的新战术呢。”

周子善说话粗声粗气的，边说边比，说得我也笑了起来。这时候，他女人从外面回来了，见了我很亲热。周子善忙叫他女人去弄饭，我们在火盆边坐下来继续摆谈。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

他说：“当然知道，当然知道。杨森开兵去搜山，抬伤兵回来都要从寨门口过，唉哟连天叫唤的声气也听得清清楚楚。”

他越说声气越大，我作手势叫他轻一点，谨防外面的人听到了。他笑笑说：“怕啥子，我这屋子是石头墙，缝子都是用石灰糊了的，耳朵挨到墙也听不到。”

我又问：“驻军和王团总他们，不找你的麻烦吗？”“不会不会。要钱吗，人家出好多，我出好多。上个月派了五次款，说是要去围剿华蓥山的共老二，见他妈的鬼，又是那些龟儿子揣了腰包！”

我又问他同山上有联系没有。这一问他不笑了，叹了口气说：“没有，就是没联系上。”

冬月间一打起来，我就派人上山去找过廖大哥，可是他们神出鬼没的，影子都找不到。”他反身出去，关了门，回来凑近我低声说：“大哥还有东西，放在我这里的哟。”

我看他自己把话说出来了，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就是来取货的。”

他一听，又惊又喜，大大出了一口气：“啊呀呀，好得很，我马上准备，啥子时候走？”

“越快越好。”

他有点为难地说：“今晚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准行。”

我说：“决定明天走，你想办法吧，我没有。”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地说：“找啥子东西装呢？”“有箱子没有？”我提醒他一句。

“对，对，我有几口板板箱，把枪全部下了，放在箱子里，装成搬家的样子。”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周子善叫他女人在门外放哨，自己在楼上翻了半天，取下来五口箱子。有两口是柏木挑箱，另外三口是朱红漆的大衣箱，抹去了箱子上的灰尘，像才从铺子里买回来的一样，新崭崭的。我笑着说：“这恐怕是大嫂的嫁妆吧？你同她商量过没有，舍得拿出来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她最怕祸事，只要说把东西运走，再叫她拿啥子，也没有二话说。”

周子善点一盏清油灯，和我一起走进一个小房间。他把灯交给我，顺手把门关上，推开杂物，用火铲将地下的石板撬开。我拿着灯向下面一照，这是一个五六尺宽、一丈多长、半人深的地窖，周围是细石条砌成的，活像是有钱人埋死人用的石外棺，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排的长枪。周子善踮起脚，轻轻下去，将枪一支支地拿出来，最后取出一个小木箱说：“这是一箱步枪子弹，还有一百发手枪子弹。”

我拿着枪检查了一下，由于下窖时机油擦得多，两年多了，五十四支枪中，除了挨着石壁的几支生了一点锈外，其他都是好好的，我不由得夸奖了他几句。他却长叹了口气，说：“贡献倒是说不上，没出事就是了。只是这两年，为这点东西倒也担了一些心，特别是我女人，做梦也是挂牵着的，有一次梦到有人来抄家，查出了枪，把我捉了去，她吓得哭醒了。

但愿这次，能顺顺当当地运上山。”

“这就要看你的哟！”

“想办法，想办法，一定不能出拐。”

我们一面下枪，一面研究要哪些人抬，走哪条路。下完枪后，我叫周子善找来一些糠壳，在箱子底下撒了一层，又用破布将零件包好，怕抬起有响声，每口挑箱里还各塞了一床棉絮。

第二天清早，我们又把要找的人一个一个地审查一番，有的是他的自

家人，有的是参加过第一次起义的贫苦农民，大都认得我。我叮嘱周子善不能向他们事先说明这事的来龙去脉，又约定今晚上约会的地点，然后就急急赶到罗渡溪，悄悄地到了我们的联络点马福林家里。我叫马福林准备了一只只有篷的小船，自己头上包一条蓝色的印花布帕子，装成一个农妇，坐在小船里。马福林拿起篙，他的女婿周老么背着纤绳，撑的撑，拉的拉，路上没歇一口气，赶到渡口上，天快要黑尽了。

这里是渠河的一个支流，从罗渡溪走旱路到黎梓卫，就要经过这条小河。第一次起义时，这条河的渡船，一直是我们的人所掌握，来去很方便；去年杨森大清乡，被坏人告密，渡船上这个同志不幸牺牲了。眼下这个渡船上的老头，是个不爱管事爱酒如命的醉汉。我们的船在离渡船三丈多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马福林上了渡船，对老头说，“老辈子，到街上喝酒去，周老么在小船上，有人过河，叫他帮一下忙就是。”说着就将渡船划过了河，插上了船桩，同老头上岸去了。

我坐在小船的后面，抽开船棚，望着前面的小路。一会儿，远远传来几声咳嗽，是周子善来了。再一会儿，八个人抬着四口箱子直向小船走来。待他们放下箱子，我连忙给每个人点了一支纸烟，对他们说：“麻烦你们了，我没有烟，还要请你们送一程路。”

周子善也说：“这是大姐过去寄在我那里的东西，熟人熟事的，你们再帮一下忙吧！”

一见面，好几个人都认得我，周老四说：“原来是大姐的东西，好说好说。”周癞子更是拍着胸脯说：“为啥不早说嘛，再走个百八十里也没话说。”

小船过了河，我们气也没歇，又抬起箱子，绕过黎梓卫，直向后山走去。

眼看靠近了王尧的老窝子。自从第一次起义后，王尧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他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们也曾派人去打他几次，都没有成功。天已黑尽了，四处看不见一点灯火，只有夜风吹动麦穗沙沙作响。我走在前面，拿着一把点燃了香的香头，弯着腰，边走边甩，九个人借着这一线微弱的光亮，缓步地向前移动。

眼看到山边了，我刚想松口气，却看半里路外出现了几支火把，后面跟着一群黑影朝这头移动，还听见叽叽咕咕说话的声音。我招呼大家别动，心想是我们的人来了吗？可是看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对头。我们的人在这种境地，哪里会这么一群群地走路，还大声武气地说话？一定是敌人！我立刻把香灭了丢在水田里，对大家说：“前面是敌人，快，抬到麦土里去。”

几个人莫名其妙。周癞子说怕啥子，我们是抬家当过路的。我低声说：“弟兄们，不能再瞒住你们了，你们抬的东西，不是我的家私，是山上自卫队的枪支弹药，出不得问题。”

周老四一口接过去说：“快，癞子，抬到麦土里去。”

大家连忙把四口箱子抬进麦土里，然后小心翼翼扶起踩倒的麦子。麦秆都半人多深了，刚抽出的麦穗上，长长的麦芒刺着人的脸，叶子上密匝匝冰凉凉的露水，一碰就直往人脖子里落。地下是湿的，不能坐，也不能站，只好半蹲着，大家挤得紧紧的，连气也不敢出一口。

不一会儿，敌人就走到我们前面的一块麦土边站住，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说：“妈的，咋个在那头看到有香火，走拢来就不见了呢？”

另一个中年人说：“你怕是看花了眼。”

“怎么会看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莫不是在麦土里躲起来了？”

“不会，恐怕是朝前面倒拐的那条小路走了。”一个破喉咙的声音恨恨地说：“这一定是华蓥山上廖玉璧的人，他以为我们晚上不出来了，哼！”停了一下，他又大吼一声：“给老子出来，不然，老子要开枪了！”这些家伙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地乱骂，我把手枪扯出来，静听敌人的动静。

天边露出白晃晃的光亮，大约是四更天了。空旷的野地里刮起了大风，刮得麦浪一波又一波地翻滚，冰冷的露水雨一样簌簌地落下来。我们全身都被露水湿透了，冷得直发抖，半蹲在麦土里动也不敢动。那几个家伙在田坎上站了一阵，没发现什么，其中一个不耐烦地说：“这么冷，鬼都没见一个，走吧。”

那个破喉咙说：“不忙，不忙，我们倒拐去看看，等天亮了再走。”

那几个家伙走远了。我对周癞子他们说：“冷得很，你们把箱子里的棉絮扯一床来搭着吧。”他们都说不要紧，怕那些家伙转来了又麻烦。

天色慢慢地又转黑了，一片漆黑，像锅底一样；哪家农舍里的公鸡开了个头，四周的公鸡一声接一声地叫起来。我心里一阵发冷：完了，天要亮了。这么一大群人，就我一个人带着两支枪，等会儿敌人回来了，如何是好？打吧，倒是很简单，凭我这枪法，说不定也是个办法。可是这里离王尧的窝很近，一打起来我们就会被包围，这八个帮忙的弟兄都没有经历过战火，要是丢了人又丢枪，叫我如何交代呢？

老天爷不容商量，东方现出了鱼肚白。我咬了咬牙，叫大家弯腰起来活动活动，准备冲出去。

忽然，我从麦秆的缝隙里，隐约看见对面来了一群人，在离我们不远处张望。接着后面的人停住了，一个不高不矮的，手拿一根竹条子，边走边哼着小调：“春景春游，春风摇动春杨柳，春水池中卧春牛，青春女子梳春头，看花女子上春楼……”

那尖溜溜的声音和春来春去的调子，一听就很耳熟，像是陈仁勇。我正要站起来看个究竟，忽听得破锣一声：“啥子人？”只得又蹲了下来。只听得陈仁勇不慌不忙把尾音拖得多长，说了一个“我”字。

“干啥子的？”

“回家。”

“你家在哪里？”

“你跟老子闹啥子，就在前面院子。”

他已经走到我前面的一块土边了。我把麦秆摇了几摇，压低声音轻轻地喊：“陈——仁——勇。”

他弯着腰，脖子伸得像鹅颈项一样，直往麦田里钻，低声回答：“喂——来了——在——哪里？”

“这里——麦土里——”

“人呢？——东西呢？”

“都在这里，那边有敌人！”

“不怕，我们后面来了人。”说着，就直起腰来高声唱起山歌：

“妹儿嘞，哥唱山歌走远方，情妹山上接一腔。”在不远的地方，一群人答腔：“哥儿嘞，妹妹的山歌接上腔，我来相会你不忙。”唱着唱着，一群人走近了。破喉咙对几个乡丁说：“清晨八早，山歌唱得这样热闹，怕不对头

吧？”

这时，陈仁勇对着麦土喊了声“抬走”，大家一齐站起来，抬着箱子就上了路。这一下，后面的那几个乡丁慌了，扑爬连天地边跑边喊：“干啥子的？干啥子的？”

唱山歌的一群人，一齐扯出枪来对准乡丁。陈仁勇也用枪指着破喉咙说：“站住！”

那几个乡丁摸不着头脑，破喉咙连忙说：“啥子，不要开玩笑，是我们。”

我也把枪扯出来，对准他们的脑袋，厉声说：“哪个开玩笑，就是要收拾你的。”

抬箱子的八个弟兄，拉的拉，扯的扯，把那几个家伙的枪和子弹都全缴了，一共七支枪，只有一个是打空手的。周癞子把枪背在身上，走到那个破喉咙的面前，啪啪啪就是一顿耳光，边打边骂：“狗杂种，你把老子吓惨了，躲在麦土里动也不敢动，老子牙齿都在打架。你要等到天亮，现在亮了，你敢把老子怎么样？”说着又是一阵耳光。那几个家伙站都站不住，浑身发抖跪在地下，有一个不断地作揖磕头说：“你们做点好事，饶了我吧！一家老小都靠我奉养，做做好事，饶了我吧……”

我叫周老四他们不要打，然后对乡丁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干啥子的？”

“不知道，不知道。”

陈仁勇提着枪，点着那个破喉咙的脑袋说：“老实告诉你们吧，我们是华蓥山的自卫军，是穷人的队伍，老百姓的子弟兵。军阀杨森欺压我们广岳的老百姓不说，你们那个狗团总王尧，也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整得这一带的老百姓死活不得。回去告诉他，要是再不改过自新，谨防过不成今年的端午节。”

那个破喉咙连声答话：“是，是，是，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陈仁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对跪在地上的几个喊道：“起来，你们愿死还是愿活？”

那几个家伙爬起来，又刷地跪了下去，哭哭啼啼地大嚷：“我们愿活，愿活。”

陈仁勇说：“那就饶了你们，只是现在不能让你们走。拿绳子来。”

那几个听说拿绳子，不知要干什么，又不敢叫，只是不住地作揖磕头。

周老四他们很快地把绑箱子的绳子解了几根下来，七手八脚地把那几个家伙绑得扎扎实实的。周癞子跑到麦土里抓了两把泥土回来说：“不忙，不忙，请他们吃几个泥巴汤圆。守了我们半夜，大概都饿了。”说着就将泥土一把把往那个破喉咙的嘴巴里喂。那家伙被捆得紧紧的，动弹不得，翻着一双大白眼，噗噗噗地往外吐，但终究抵不住周癞子的一双手，不几下，两个腮像猴儿包，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癞子、周老四又把他们抬到麦土里，说是请他们也尝尝露水的味道。

我看天色大亮了，怕节外生枝，就催着下山来的同志们收拾箱子，然后转过身说：“弟兄们，你们受累了，不麻烦你们了，请转吧！”

周老四转过身去大声说：“癞子，回去跟我家里说一声，就说我上山跟廖大哥去了，空了我晓得回去看她。”周老四这样一喊，好几个人都想跟我们走。我对大家说：“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当然很欢迎，可是你们总得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把家里安排好了再来。比如周老四，听说你老婆

有病，还拖着两个孩子，你说都不说声就走了，叫人家一个女人家咋办？”

周癞子站出来说：“就是嘛，还是我说话硬气，妻室儿女都没有，没有牵挂。老四回去跟我老娘说，请她老人家迁到我妹妹那里去住，我不回去了。”

我们又劝说了一阵，周老四他们才答应这次不去了，但又说等家里安排好了，一定要上山来的。

雾气已慢慢散去，春天柔和的阳光撒下来，竹木田舍和山上发白的小路都明朗开来。我催着大家赶快上路，待我们已在山路上转了两个弯，还看见一群人眼巴巴地站在那里，不断地招手。

我单枪匹马地闯进王尧的心窝里，把五十四支步枪运了出来，这事的确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回到山上，正值队里的同志打了一头几百斤重的大野猪。刘铁舀了一碗红烧野猪肉，把玉璧、夏林、陈仁勇和我喊到一起，说是给我庆功。席间，又自然说到枪弹供应的情况。刘铁说：“已经给向老大他们带信去了，现在把人扯回来倒容易，但是沿途查得这么紧，修理枪械的机器设备运不回来，也等于零。听说杨森为了建立自己的兵工厂，组织了四十多个人，还伙同沿途的袍哥势力武装强运机床，主机遇到卡子便一手拿钱一手拿枪，经过几多险情才闯过刘湘设置的道道关口。”玉璧说：“我们原先用的土枪多，这种枪乡里好一点的工匠都可以造，子弹也可以自己用铜钱铸。可是现在杨森的兵工厂里，连捷克式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都仿造得出来，我们老用土枪咋行，看来还是得把向老大他们叫来商量一下，大家想想办法。”

夏林听了，从旁边拿过一支手挽子枪说：“我们造枪不行，改造一下可不可以？像这种枪，是广货，又便宜，就是子弹装得少，打一发装一发，如果能够改装一下，像那种能装上五颗子弹的新式枪就好了。”

陈仁勇一旁听得兴起，一拍大腿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好枪太少了，好久把人马扯齐，找个机会跟杨森的主力好好打上一仗，让他送两挺机枪过来耍下子，那才叫过瘾。”我在一旁不开腔，等他们扯得差不多了才说：“我倒是巴望你们早点把枪械所建起来，把那些破损的枪支好生修了再用，免得我们打霜落雪都在路上，还诚惶诚恐地紧张死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装什么大少娘了，就当个战斗员，只顾打仗就是了。”

玉璧瞪我一眼：“你以为当个战斗员那么轻松？你看夏林、陈仁勇，哪个不是又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

我说：“当指挥员就搞不好。我这个人，又任性，又不守纪律，又是小姐脾气，爱和领导顶嘴。我当个战士，叫进就进，叫退就退，叫怎么打就怎么打，保证听话得很。”刘铁一听就笑起来：“嗬嗬，那不成了马福林耍的那些木脑壳了吗？谁说你不会指挥？罗锅凶那一仗，还有这次到马盘山运枪，指挥那八个从来没打过仗的农民兄弟，那么惊险的场面都过来了。我和玉璧后来听说了，都替你后怕呢。”大家说笑了一阵，又扯到正事上。刘铁说：“李大哥不在重庆，枪是不好进货了，但徐清浦带信上来说，最近进了些子弹。玉屏，你可能还要辛苦跑一趟。”

我放下筷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刚才不过是几句笑话。参加革命以来，哪一次任务我推脱过？只是听说自从我们打了罗锅凶，敌人的防卫更紧了，几乎场场镇镇都派了兵守卡子，再走旱路恐怕不得行。”

玉璧说：“我们商量过了，旱路不行就走水路。由重庆坐船到合川，绕过大路，到太平场就好办了。太平场的罗平精，已经正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你这次把运回来的枪弹分一半给他。要是有什么难处，他会想办法。”他接着又说：“李星北、陈伯斋、刘昆仑、王道纯等进步人士和绿林武装，现在都和我们联手了，武胜刁仁义刁大哥的人马，已准备调一部分到山上来，和我们一起打，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呢。”

话是这么说，可是玉璧下来还是为我担心，背地里对我说：“玉屏，运枪这工作，是太危险，又累。你要是吃不下饭，就说一声，我们另外派人。只不过女的去方便一些，敌人不防。”

我说：“算了吧！这条路，我熟了，关系都建立起来了，别人去反而摸不着头脑，要出事的。再说常跑这条路，我也能常去看看两个娃娃，我们这样当妈当爹，实在是……”玉璧不说什么了，长长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和夏林、金积成等五个人，还是扮成鸡鸭贩子，运枪弹去了。这次乘的是一只运猪的船，虽然臭哄哄的，但是不受检查。春水发了，路上没有耽误，一天半就到了重庆。我们从化龙桥上了岸，跟船老板说好：回去还是赶他的船，夏林他们几个帮他拉纤。

这时，重庆已经有公共汽车了。我就坐着公共汽车去找徐清浦，和他一起去见他的侄儿徐明生。徐明生此时在刘湘名下做参谋，见了我很高兴，说：“货早就准备好了，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

我们寒暄了几句，知道这次进了一批步枪和手枪子弹，还有十二支手枪。我说路上紧得很，步枪下次再说，这次就光要手枪和手枪子弹吧。徐明生问好了路，就约定第二天一早在磁器口交货。

第二天，还不见亮，货就送到了。可是我一见就傻了：没有送子弹来。眼下关卡盘查这么紧，船上藏不住货的，只有让夏林他们把子弹绑在身上才行，可是没有子弹带怎么办？眼看天快亮了，我没办法，只好让夏林去喊开一家布店，扯了几丈白布来。

我们将手枪和子弹装在一挑篾篓和一个细蔑背篋里，面上盖了些糖食海带，挑到了河边，船老板早就等在那里了。因为说好夏林他们四个人帮着拉船，船主可以不请纤夫，所以对我们很是客气，直喊把海带糖食放到后面的棚屋里，说里面把稳些。我背着背篋进去，发现这里是船老板自己住的一间小屋，的确很谨慎，只是太小，两个人都转不开。

启程了。我推说自己不舒服，呆在小屋里不出去，夏林他们在岸上拉纤，我在小屋内飞快地用白布缝着子弹带，然后把子弹装好。等夏林他们轮流上船来歇气时，我就出来“透气”，让他们一个个在小屋里把子弹捆在身上。等他们全都收拾好了，我把盖面的海带糖食都装进背篋里，然后把那挑篾篓悄悄沉下河去，又将剩下的白布撕成几条，给夏林他们作了包头的帕子。

船到中渡口，喊到岸边检查，那岸上的兵问船里装的什么货。船老板说没有货，只有一个女客。岸上又问女客是哪人，船老板转过头来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合川人，船老板又照原话回了。一会儿，听见咚咚两声，跳上来两个兵，说：“既然没有货，又没客，咋会有这么多人拉船，要查查。”说着就前前后后一阵乱翻，又到小屋内，把我背篋里的海带糖食全都倒出来，盘问了我一阵。这时候夏林他们几个，坐在离船头丈把远的岸边摆龙门阵，嘻嘻哈哈的声音传了多远。

两个兵没翻出什么名堂，悻悻地上了岸。船老板一个手势，夏林和金积成拍拍屁股站起来，喊了声号子，又把纤绳搭在肩上。

我看着满地乱七八糟的海带和白糖，长长地松了口气。船到合川，我

们谢过船老板，上岸了。天已经黑尽了，合川盘查很严，我们不能住，赶了一截路，到了新店子一个熟识的栈房。老板娘也算是江湖上的人，热情地打来洗脸水，又招呼上饭菜，先端出来一大碗猪脑壳肉和红烧豆腐。几个小伙子晌午吃得简单，此时早就饿了，筷子打架般在菜碗里进进出出。

正吃得高兴，外面闯进来一群人。

我抬头一看，进来的都是便衣，为首的那汉子长得矮杵杵的，头上的青布帕子遮了半边脸，穿一件黑呢大衣，手一摆，袖子里便掉出一节枪穗子来。我递了个眼色，大家哗地站了起来，手把在枪把子上迅速散开。几乎在同时，进来的那一群人也把枪扯出来，把住了大门。唯有我仍然坐在桌子上方，没有动。

为首的那人把我们逐个看了一圈，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上前两步，拖长声气说：“请问这位大姐，做什么的，到哪里去呀？”

我不露声色地说：“过路的，回家去。”

“对不起，兄弟公务在身，要检查。”

“可以，拿手续来。”

那汉子叭地一声，将枪拍在桌子上：“手续在这里。”我双手一扬，也把两支枪扯出来，拍在桌子上，冷笑着说：“莫吓人，我也有，不找你借。”

那人一看，愣住了。夏林和金积成乘机上前一步，将他夹在中间，两支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的前胸后背。他身后的那群人急忙要想上来抢人，但已晚了一步。一时间，只听得哗喳哗喳，双方的枪都上了红槽，屋里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老板娘端菜出来，一见这阵势连忙大声说：“哎呀，是李大爷啊，快请坐请坐。你怕不认识，这就是廖大嫂嘛，又不是外人，咋个就动起武来咯！”那李大爷眨巴着眼睛问：“哪个廖大嫂？”

“嗨，说起你就晓得，华蓥山廖大哥嘛！”

那李大爷一听，连忙拱起手来对我说：“误会误会，我李某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廖大嫂和诸位弟兄，大家受惊了！”说着向他的那群人一招手，都将枪收了起来。大家围着桌子坐下，互相通了姓名，原来他就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李志成。我记起原来玉璧跟我说过，这位李大爷要带人来投奔我们的队伍，只是因为他野性太大，名声又不太好，所以没有接受。

大家寒暄了几句，李志成说：“我们早就想要投奔廖大哥，还望大嫂引个路。”我正色说道：“农民自卫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能欺负老百姓。”李志成听了，说只要廖大哥肯收留，小弟一定是听招呼的；还说今晚要带着兄弟们去打一个地主的碉楼，请廖大嫂和众位哥子莫要出去，谨防飞子。说完就带着一群人走了。

夏林问我，走还是不走。我想了想说，恐怕还是得走，要不然一会儿打响了，把军队引了过来，我们就要被夹在中间，那才冤枉呢。正说着，前面的枪声就响了，我叫大家赶快把子弹绑紧，猫着腰跑出店门。

刚出场口就碰到跑过来的敌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直喊：“是什么人？站住！”

夏林大声说：“我们是乡公所抓土匪的，那些土匪好凶啊，我们打不过，正要来请你们呢。”

一个军官听了，很得意地把枪一挥，喊后面快点。我们站出来等他们转过路口，拔腿就跑。

一口气跑到太平场。夏林把大家引到场口大黄桷树下的草房外。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夏林请他去通报罗大哥一声，就说货到了，请罗大哥来点个数。

我坐在草房里，等着回话。罗平精这个人，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他和玉璧是同学，一起去成都读书，也在高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慷慨热血过一阵。我和玉璧去了南京之后，他家老人怕他在外面惹事，就将他召回来了家，把偌大一份家产交他主持，不去读书了。

罗平精这个人，本来就好朋友，重义气，读了几天洋学堂，便有了兼济天下的豪气，干脆仗着他家老人的财势，操起袍哥，当上了太平场仁字号五爷——红旗大管事。附近四乡八场甚至外县外州的公口弟兄，不管是认得认不得，只要找到太平场罗五哥，总是受到礼遇，有一顿饭吃。尔后又买了些枪支，养了一些家丁，名气越发大了起来。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名气大了也麻烦。凡是过往的军阀驻军，派指名捐总少不了他家的份，一年到头捐呀款的没有了结过，土匪们也常来找他家的麻烦，害得他父亲常常躲在碉楼里不敢出来。他虽然年轻气盛，出门却也是家丁们前呼后拥，心中暗暗气闷。上次起义时，他虽然被老人挡着，没有跟着玉璧一起打出杏黄旗，但暗地里却派人送了枪来，不料后来被人告密，罗泽洲派兵来抄了他的家，还把父亲捉去关起来，敲榨了一大笔钱财。

正想着，那汉子回来了，说是罗大哥有请。我们跟着他，走进场口，进了一个大院子。

院子里林木参天，黑森森地有些砣人。还在堂屋外面，就有人打着哈哈迎出来：“是大嫂吗？我一猜就是你，真是久仰久仰，不晓得你们今天到，有失远迎——”

我们被迎进屋里，分宾主坐定，这才看清罗平精。只见他中等个子，胖胖的，紫色脸膛，卧蚕眉，说话像打雷一样，震得瓦格子都像在响，在这夜深人静之时，不晓得传出去多远。

罗平精看出了我的担心，就说：“大嫂你莫怕，这场上尽是我的人，我现在袍哥一个，又没扯红，他们哪里晓得我上过华盖山，跟廖大哥挂上了呢。”

这人真是，越是不该大声说的话他越是要大声武气地说。我啼笑皆非地看了夏林一眼，夏林忙说：“罗大哥，正是因为你没扯红，所以还是谨慎些为好。人多话杂，杨森、向屠户的耳朵长得很呢。”

罗平精还是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免得玉璧二天要刮我的胡子。

大嫂你们这次都带了些什么货来？”

我说：“有一打手枪，还有些子弹。”金积成在一边插嘴说：“大哥说了，分一半给你们呢。”

罗平精听了，一拍蒲扇般的巴掌说：“嘿嘿，我就等这句话。玉璧这个人就是够朋友，这才是些好东西呢。”

当天晚上，我们在罗平精的大宅院里吃饱喝足，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都要上路了，他才对我说：“杨森的队伍已经开过来，黎梓卫和山边都已经开仗了，你们恐怕要小心，绕着走才行。”

石炮大战

我把人分成两组，金积成和夏林在前面探路，我们在后头远远地跟着。来到华盖山脚下，看见敌人已经设下的许多营房，我们就从山边的小路绕着走，擦黑的时候，到了猫儿寺。往常这时，庙内充满了笑声歌声，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却冷冷清清，静得怕人。山门前横七竖八地尽是伐倒的树木，一片破败景象。我们走进大殿，一个小和尚正在烤火，听见声响转过身来，呆呆地望着我们。

我一看是法慧，连忙问：“人呢？我们的人呢？”法慧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刚走，敌人就来了，廖大哥带着队伍撤到天池那边去了。敌人一上来，就抓住我们毒打，砍了庙前的许多树，还在庙里到处乱翻，问我们哪里来的这么多被盖。我们说是做香会用的，他们不信，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几百床被盖全抢走了……”“全抢走了？妈的，这么冷的天气！”金积成跺着脚，愤愤地说。

法慧又说：“我们苦苦要求，说老和尚年纪大了，请他们留下一些。他们不干，我就去拉，结果挨了一枪托，才给徐老师父抢了一床薄被子下来……大姐，我身上还在痛呢。”他把薄薄的袈裟撩了起来，我们看见他身上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许多伤痕。

天完全黑了，夜风呼呼地吹，飘着小雨，正是冻桐子花的倒春寒天气。我们带着法慧，点起香，燃着火把，直往黄龙寺走去。没走多远山下的敌人就打起枪来，我们只得把香和火把都熄了，摸夜路。

山林里静悄悄的，风声里夹着几声野猪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想起下山的时候，玉璧就对我说过周二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已经实验成功了的地雷，现在会不会就安在这山道上？想着想着脚下一不留神，踩滑了一块石头，吓得我冒了一身的冷汗。

到了黄龙寺，还是半个人影都没有。庙子已经被敌人打得稀烂，连墙都垮了，只剩几副光架架。我们愣了一阵，夏林说：“管它的，又冷又饿，还是烤暖和了再打主意。”刚把火点燃，就听见外面有响动，大家连忙扯出枪来，找地方隐蔽。还没有藏好呢，就见大摇大摆走进一个人来，我借着火光仔细一看，不禁长长出了一口气：“你这个鬼呀，可把我们吓惨了！”

进来的是陈仁勇，他笑着说：“吓惨了？差点要送你们回老家去见阎王爷呢。”说着一招手，后面跳进来四个队员，大家围着火堆坐下来，七嘴八舌问我们吃饭了没有。

夏林苦笑，摇摇头。陈仁勇他们连忙把包里的炒豌豆胡豆抓出来，让我们快吃。

我说：“这是你们明天的伙食吧？”

“明天再说明天的话。你们没回来，大哥不放心，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在上面看了你们好一阵了。先还以为是敌人呢。老张说，把地雷点了吧，我说慢点，山下在打枪，我们的人还没回来，看搞错了。接着看见香和火把都熄了，枪声也停了，又看到有人到黄龙寺来了，还烧起火来烤，这就费猜度了：是敌人吗？没这么悠闲；是老百姓吗？没这么大胆；是自己人吗？又不敢肯定。再说敌人的鬼名堂多得很，还是把细点好，于是决定悄悄地过来看看。

还没摸拢，就听见夏林的声气，我这才放心了。要是听老张的话点了

地雷，我这炒豌豆你们也吃不成了。”

夏林听了一拍大腿：“啥子吃不成了，二十年以后再吃嘛。嗨，说说你那地雷是咋搞的？”

陈仁勇眉飞色舞地说：“前些天，大哥找了几个过去当过石匠的同志，同周二先生一道满山转，整天到处都在叮叮当当的。我们去一看，才知道是在石崖上打炮眼。打好之后，把炸药装在里面，一根引线牵出来，把它点燃就是。大哥说是地雷，我说那名字不好听，就叫石炮好了，又干脆又响亮，一炮响了把敌人炸得五马分尸，比开花炮还关火呢。”金积成听得一拍手说：“嗨，这家伙这么凶，你们这里有几个？”

“我们安了四个，不过其他沿路都有，凡是大哥划了白圈圈的地方都安了的。”

“安了多久了？”

“都好几天了呢。原来听说敌人这几天就要来搜山，大哥他们安好之后就撤走了，留我们在这里等着。可是我们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我天天都要来看看，只求老天爷莫下雨，打湿石炮里的火药。”

金积成一听，更高兴了，一拍大腿说：“你这家伙，这么精灵的，怎么一下子就糊涂了？你们走的走了，剩下的又不露面，明明是一座空山，鬼都不见一个，他们怎么会来？敌人现在晓得我们山上有人了，明天我们就再想点办法，把他请上来，打他一家伙过过瘾，大姐你看？”

我想了想，点点头。

我们这华蓥山，是四川盆地东部隆起的第一道山脉。从这里往西，渐次递减为浅丘和平原，形成了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而从这里往东，则是重重叠叠的高岭低谷，沿着著名的大巴山脉，逶迤延伸。我们所处的这一段主峰宝顶，高不过一千五百米，地势却非常复杂。从进山的大溪沟开始，便是森森对峙的石壁，抬头只见一线青天，阴寒时节，常有山风呼啸其中，使人胆战心惊；再往上走，一条山路在石峰中大弯大拐地蜿蜒蛇行，形成了兵家必据的“二十四个牛掉尾”；人行山中，正欣赏山中松竹滴翠、百鸟婉鸣的景色，眼前却会突兀地耸起一壁陡崖，势如刀削，草木不生，相传这本是天上神将的一块磨刀石，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混战中一脚将它蹬了下来，落到此山，故名“磨刀岭”。而在这磨刀岭下，又有一处绝壁，猿猴愁攀，仅有鹰鹫在崖缝里筑巢，人称“鹞子岩”……山上涧流处处，石洞丛多，且洞中有洞，洞连着洞，往往是山穷水尽之时，眼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若是不熟悉此山地形，是万万不可随便在此闯荡的，所以从来绿林中人，多于此啸聚，而官兵却奈何不得，真是个好打游击的好地方。如今玉璧既在山道上安了石炮，大家又想过过瘾，我觉得打一下也行。再说我们总不能老是这样被动地等他们上来打我们，想个办法把敌人引上来，我们也好试试这“新式武器”的厉害。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同志到山上送了个信。我们就在山上走来走去，从这座山翻到那座山，对着敌人的营房，啪啪啪地打了一阵枪。敌人就开上来了，拉起一长串，有几十个人。

陈仁勇引着金积成他们几个，把二十四个牛掉尾路上的三个石炮点燃，然后我们故意暴露在敌人眼前，朝磨刀岭那边爬。敌人一看我们就在前面，得意了，喊着闹着直追了上来，子弹嗖嗖地在我们头上身边飞过。我一看危险，就连忙拉着大家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一看，敌人都快到石炮跟前了，

那些石头还稳稳当地立在那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金积成看看陈仁勇：“怎么搞的？”

陈仁勇不说话，只是盯着石炮，眼看前面的敌人已经过了第一个石炮，又过了第二个石炮，那三块大石头还是动也不动。

陈仁勇急得满头是汗：这石炮怎么哑了？金积成却端起了枪，一边瞄准一边说：“大姐，打吧，再不打，敌人就到我们跟前了！”

忽然“轰——轰——轰”三声，三个石炮同时响了，一时间像山崩地裂，大地都颤动起来。前面的敌人被抛入半空中，随着石头泥块哗啦啦掉下来。后面的敌人不知咋回事，哭爹叫娘地滚下山去了。石碴儿还在落呢，陈仁勇首先就跳了起来，拍着巴掌一蹦多高：“哈哈，我说嘛，我做的石炮，把它当心肝宝贝一样，梦里都惦记着的，怎么会不炸呢？那不是当儿子的给当老子的丢脸了吗？”

山上的同志们听说我们打了胜仗，又缴获了敌人许多武器，都跑下宝顶寺来欢迎我们，看见那些枪便拉呀扯的，高兴得了不得。有两个小伙子为了一支枪，差点红了脸。我走过去看看，说你们别争了，这支枪是坏的，你们看枪筒子都炸弯了。那个小个子乘机一拖，把枪抢过来，背在身上得意洋洋地说：“坏了有什么关系，吓吓那些龟孙子，过过瘾也好嘛。”

刘铁和玉璧听说了，连忙从天池那边赶回来，也很高兴。刘铁说：“看来玉屏很有运气呢，每次出去，都要顺手牵羊，捡些便宜回来。”

玉璧说：“那当然咯，我们把石炮刚安好，她一回来就点燃了，不是捡便宜是什么？不过还有缺点，首先你们还不沉着，还有些慌；第二，石炮不能同时点，应该错过时间，这样敌人才会先后挨，头一个没炸着，第二第二个也会炸着的。”接着他又说：“同敌人打仗，不要老一套，要随机应变，多动脑筋想办法。”

我说：“又是你的孙子兵法吧？”

玉璧说：“你就晓得孙子兵法，现在要讲朱毛兵法了，这叫做‘麻雀战’！人家朱德、毛泽东在江西，这一套灵验得很呢。”

玉璧在天池那边还有一大队人，我说：“你就过去吧，这边要是放心的话，就交给我和夏林他们好了，反正我们守着这些石炮，也就守着这山，谅这点敌人也干不了多大个事情。”

哪晓得敌人挨了一次打，就不来攻山了，死死守在营房里，想把我們困死。我们就天天在山上打野猪、打兔子，满山遍野地跑。可是敌人还是不上来，也不打枪，只是在山下张望。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到天池那边去找到玉璧。他说：“敌人吃了亏，聪明了，你们换一个办法。”

我们商量了一阵，当天晚上就在去枳子沟、百子洞的路上，沿路都密密麻麻地插上许多点燃的香，晚风一吹，香头忽闪忽闪的，闪着红光。敌人看着满山都是香头，第二天果然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开到枳子沟来了。我带着大家，分期分批地沿着山势点燃了十二个石炮，然后拔腿就跑，跑到对面山上的花园洞时，只听得几声巨响，石炮一个接着一个炸了起来，炸得地动山摇，石碴儿在空中乱飞，敌人的衣帽枪支也在空中乱飞，夹着哭爹喊娘的叫声。

我和大家站在山崖上，又跳又喊的，高兴得不得了，想起初次上阵时那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自己都觉得好笑。

这两次石炮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连山边的老百姓也带了粮食和鸡蛋来慰劳祝贺我们。我们派人到重庆去买铁砂子、火药，又在邻水、大竹各县去收购烂铁锅，准备满山安起石炮，再炸它个呼儿嗨哟。可是满山的石炮又安好了，敌人死活就是不上当。两场大雨一下，火药都打湿了，我又有些沉不住气了。

玉璧从天池那边过来，说：“人家上一回当，学一回乖，看来我们也别傻等了，他们不上来，我们就下去吧，下去登门拜访。”

没几天，他就从天池那边调了二百多人过来，分别安插在山边的群众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又没过几天，擦黑时候，唐二嫂气喘喘地跑来报告，说山下大溪口张家院子，昨天开来了一连敌人，只有两个兵守门，其余的这阵子都在打牌压红宝，闹得乌烟瘴气的。

我们马上集合队伍，分几组向大溪口进发。唐俊清和夏林打头阵，装成农民，拿一把点着的香，走到敌人营盘时，卫兵问：“做啥子的？”唐俊清说：“收活路了，回院子的。”说着走上前去，用香在那卫兵的眼上一晃，趁卫兵一愣，就顺手把把枪下了，接着由金积成、谭之中带领大队人马冲了进去。这一连敌人，糊里糊涂就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把敌人的枪弹粮食全部运回猫儿寺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从此，敌人有好长时间不敢开兵到华蓥山来。

因为几场战斗都是我出面指挥的，加上夏林、陈仁勇这两张嘴，把我们在路上运枪的故事加油加醋地摆得活灵活现，队伍里一下子就传出我的神话来；这些神话在老百姓中间口口相传，我就成了身穿白绸大褂、骑着高头白马、腰上别着两支红绸手枪、神出鬼没的“双枪女侠陈三姐”。还说我能点石为将，撒豆成兵，一挥袖，巨石漫天而降，地动山摇；一抬手，双枪百发百中，说打你鼻子就不打眼睛……我在路上偶尔听老百姓说起，真是哭笑不得，回来跟玉璧说：“怎么成了这样？其实这几场战斗，大都是你在后面出的主意，大家出的力嘛，我自己还经常沉不住气呢。”

玉璧笑笑，说：“你不是时时都想学梁红玉、穆桂英吗？怎么真的成了还不敢承认了？我们队伍里出了个如此厉害的女英雄还不好哇？二天看哪个还敢来招惹我的这位夫人！”

正是春耕季节，山脚下的豌豆、胡豆都收成了，我们却进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组织上指示，要把山上荒了一季的田土都赶快进水，插上秧，作长期坚持的准备。可是敌人还驻在山下，我们去打他，他就是不出来，又不走，时不时来骚扰，实在是讨厌。夏林烦了，说：“这些龟儿子，打起来也没劲，干脆叫他们滚吧！”

于是我们把磨刀岭下面的一个山洞，开成了一个隧洞，派了二十多个同志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晚上举着火把，从隧洞出来，朝邻水方向走，再穿过邻水地界的一个隧洞，转过山以后，又回转来，把衣服换一换，再穿过磨刀岭的隧洞走第二圈。这样打着转转，天天都在走，夜夜都在过，就像戏台上“火烧赤壁”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一样，老是走不完，一直走了好几天。山下的敌人被搞糊涂了，都说廖玉璧在华蓥山的队伍到底有多少啊，怎么那么多天还没过完？

这时候在组织的统一调配下，邻水那边打起来了，武胜这边也打起来了，岳池、广安……四处都在打，敌人到处吃紧，而我们这边反倒清风雅静的。这就给敌人一个错觉：廖玉璧的队伍真的开走了，开到外面去打天下去

了。没几天，山下敌人的营房不见了，我们的诱敌计划成功了。春耕正要开始，困难又来了。此时虽然已是三月天气，可是山上积雪还没有化完，晚上冷风吹来，寒气逼人。我们没有被盖，晚上只有烧火烤。许多同志病了，山上没有药，没有医生，只好扯些草药，在砂锅里熬些药水来吃。不几天，病情很快蔓延开来，肚子痛和拉稀的人特别多，有的在山上帮着农民春耕，突然晕倒在田里。

看来老是这样下去不行了，玉璧和大家商量后，派人用滑竿把山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医生毛老先生请上山来。我们扶着头发胡子都白了的毛老先生，到各个山洞去看病人。老人家看见我们没有穿的，也没有盖的，围着火堆在取暖，不禁满腹疑惑：“你们过得这么苦，到底是干什么的？”金积成在一边说：“老人家，不说您老不知道，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就是当年带领大家赶走了军阀罗泽洲、如今又带领我们和杨森打仗的廖玉璧廖大哥。”

老人一听，后退半步，眯着眼睛把玉璧打量了好半天，才连连点头说：“哦哦，是廖大哥呀，久仰久仰……哎呀，你们处境如此艰难，还在为老百姓打仗，真是威武不能屈，令人钦佩，令人钦佩！”说着，他一一给同志们看了病，个个都开了药方，总共要捡三四十副药。

我说：“下山去捡这么多药，恐怕人家要起疑心。”毛老先生说：“没关系，我去买，就说我自己买的药。同样的药称在一起，你们拿回来自己分。”

大家听了这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夏林才说：“老人家，不怕你笑话，我们这些人中间，恐怕没有懂药性的。”老人沉吟片刻，说：“这样吧，我的幺儿跟着我在药铺里混过几年，还懂点医，明天我叫他上山来跟着你们，顺便带些药上来。你们这么多人，生活又这样苦，没个医生怎么行。”老医生这话一出口，我们都喜出望外：山上要有医生了！

第二天，他的幺儿就带人挑了三挑药上山来，还带来了四床铺盖，一把称药的戥子。为了照顾他，我们就喊他同老和尚一道吃伙食，怕他扯红了，以后取药不便，就喊他彭老幺，不喊他的本姓。

彭老幺带来的四床铺盖虽说很大，两头挤着盖，也只能盖二十个人，只能让重病的盖。

但他们你推我让，没有一个人肯盖。我说：“你们不晓得找个医生好不容易，你们把病拖厉害了，怎么办？重病的盖。叫谁盖，谁就盖，服从命令。”这才把一个个安顿下来。

病人将息要营养，可是我们连饭也没得吃，到哪里去找营养？彭医生说上山的时候，看见猫儿寺一带遍山野生的爬地四季豆，那是除湿的好东西。我赶快就派人摘来，给病人掺米煮稀饭吃。

等同志们的病渐渐都好了，已经是四月间了，按时令插下的秧子有的已经薅过了头道，更多田土受了前段时间炮火的影响，还荒着。玉璧就派大家下山去找秧苗，先找几担回来栽着再说。可是秧苗找回来了，田还没犁，要边犁边栽秧，还得去找犁头。有的田是干田，要灌水，就把山上的楠竹砍来，对剖开，一片一片地连起来把山泉水引到田里。一时间满坡上砍的砍，剖的剖，绑的绑，到处都是竹子和人，真是“人多好种田”。

那边的犁头找到了，可是没牛，要用人拉。大家都站在田坎上不动，说这活路恐怕要个角色才拿得下来。唐俊清一挽袖子说：“拉犁头，当老牛，你们都不愿意，我来！”说着就脱了鞋跳下田去。把绳子拉上了肩。可是唐俊清毕竟身子单薄了些，那犁头动也不动。大家正在七嘴八舌，金积成过来

了，一见唐俊清那脸红筋涨的样子，就发火：“你们怎么光在田坎上说风凉话，又不下水？”

我说：“金积成，你这个大块头，怕得行！”

金积成二话没说，跳下水去接过唐俊清手上的绳子就上了肩，一使劲，犁头就走起来了，而且走得很快。田坎上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喊着号子为他加油。按着几支犁头都下水，两个人拉一副，你追我赶地使劲。这边一犁过，那边就用人拉着耙，耙平了就下人栽秧子，其余的人挖旱地。

按当地的习俗，栽秧要唱栽秧戏，唱得越热闹秧子发得越好。马福林唱过木偶戏，有人就喊：“马福林，把你的木脑壳戏唱起来！”马福林果然就把戏台子搭起来了。玉璧一看，兴头来了，拿出了笛子，悠悠地吹了起来。陈仁勇拿把三弦坐在石头上，陪着夏林唱主角。

夏林遇到这种场合，哪里还有不尽兴的，他一会儿唱小生，一会儿唱花脸。有人在一边起哄：“夏林，来个青衣！”他果然把嗓声一变，扭扭捏捏地唱起青衣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笑完了，夏林做了个怪相，说：“大姐，你把耳朵蒙上，我们要唱幺妹了。”

我说：“唱什么幺妹？”

“就是元宵节耍彩船的车幺妹。不过嘛，栽秧子是野地里唱的，稍微要怪一点。”

我说：“不行，不能唱怪的，要尊重女性。”

“嗨，唱幺妹就要像个唱幺妹的样子，不怪有啥唱头？”正吵着，陈仁勇不耐烦了，一亮嗓子唱了起来：“哥在坡前把秧栽，幺妹绣房不出来……”

有人在喊：“不要听他们唱的那些怪眉怪眼的，我们欢迎廖大哥唱一个，唱个《目连救母》！”

玉璧被众人拉了出来，也不推辞，一昂脖子吼道：“我们是——铁打的臂，铜铸的肩……”

满山遍野的人都给他打和声，唱得映山映坳的，真是热闹极了。

一连几天，我们白天晚上都在抢种，没有月亮，就打火把。田里的黄鳝见了火光都出来了，大家就拿着竹片去夹黄鳝，七手八脚地剔去骨头，又到坡上找了鱼香草来，煎了几大锅。

徐老和尚念完经，也走出庙子来看我们。我们栽种的这些田土，大多是宝顶寺和附近几个庙的庙产，眼看要因为战火耽误了，现在叫我们满载满插了，喜得和尚和佃农们都闭不上嘴，连给我们做的菜，油水也放得足足的。夏林见了徐老和尚，连忙喊道：“老师傅，多谢你的菜油，快来尝尝我们煎的鳝鱼。”

老和尚一本正经地说：“我看分明是黄鳝，你们硬要说是鳝鱼。阿弥陀佛，老僧不吃。”

你们在这里为革命流血，是大慈大悲为众生立大功的人，吃了不碍事的。”说着就在玉璧身边坐下来，很感慨地说：“廖大哥，我们出家的人，本应跳出三界之外，可如今也是在劫难逃。你说说，自古以来，我们和尚就不问红尘中事，不服劳役，也不完官税，更没听说要提我们寺庙的庙产的。可是现在，他杨森就要提，还容不得你说个不字。这还不说，你廖大哥也是见多识广的人，该没听说过哪朝哪代的香客们上山来烧香，连香烛都要交税的事吧？可是现在就是要交！唉，这世道，也太不像话了，连和尚都不得安宁。”

细细想来，这‘自古天下无义战’的话，也不完全对。只要人间有了劫难，上天总是要有对策的。你看，秦亡之后列国纷争，天下大乱，上天不是派了赤龙汉高祖下界，斩了白蛇，平定了天下吗？金兵进犯中原，佛祖不也是将大鹏神鸟遣下凡界，投生为岳飞大元帅，轰轰烈烈干了一场么？这些都是正义之师！就像你廖玉璧，你陈玉屏，本来生在富足之家，书香门第，却放着好日子不过，出来住岩洞，吃蕨根，为老百姓浴血奋战，你们不就是和岳元帅一样的正义之师吗？廖大哥，你们的难处，我都晓得，你们帮了我的忙，我也记在心里。我老和尚在山上几十年了，过去不管什么军队来，尽量地吃喝玩乐不说，还要抢些东西走。你们才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这样吧，不仅是这一坡的田土，今年所有的庙产收的租子，我都不要了，全给你们作军粮！”玉璧和我听了，连忙说：“这怎么使得，山上山下这五个庙的这么多和尚，一年都不吃饭了么？”

老和尚犟不过，就说：“好吧，我替你们保管，要吃来拿就是。”

金积成说：“这不行，我们几百号人光吃你，不是要坐吃山空了吗？我们自己还得多想些办法。”

坐在一旁没开腔的医生彭老么突然说：“我们喂猪好不好？我哥哥喂的老母猪要生了，我去要奶猪儿。”忠厚的向老大连忙说：“要得要得，我在屋头喂猪就在行得很，像我们这片山上，放他妈一百只猪儿都没问题。”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出主意，这个说可以喂鸡，那个说鸡爱害瘟，还是喂鸭喂鹅的好，长得快，又有肉吃又有蛋吃……老和尚听了，呵呵地笑着，说：“办法还多，办法还多啊。比如每年六月，我们都要办香火会，一个香会赚的钱，可以让你们的人敞开肚皮吃个半年一年没问题。等天气暖和了，不办香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出去讲经说法，募功果，宣传华盖菩萨的灵验。我们还要到外面领皇经来念。念皇经，施主要出供果钱。我们说，供糖供果要天天换，不然不新鲜，菩萨吃了要生气的。”

夏林听到这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玉璧瞪了他一眼，他连忙捂着嘴，怕老和尚生气。

老和尚大度地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们佛法普渡众生，你们也是为人民造福，只不过我们是虚无的，你们是实在的罢了。夏林兄弟，你莫笑，常言说穷算命富烧香，你看那些抬着九品大香上山来的人，有几个是慈悲心肠的好人？为富不仁嘛，不使劲敲他一下怎么行？只是这话不能拿出去随便说就是了。”

这下子连玉璧也忍不住，和大伙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香火盛会

农历五月，华盖山上真正的春天来到了。山绿了，水绿了，满山遍野都是色彩缤纷的野花，香气扑鼻。我们种的庄稼，也都快成熟了，苞谷一根根长得粗粗壮壮的，吐着红须，墨绿肥大的叶子在风中摆来摆去；块块梯田里的秧苗，绿得要滴出水来，也含苞吐穗，齐崭崭的叫人真喜欢。

一年一度的香火会也要到了，各个庙子里的和尚也正在忙碌着，准备

接待香客。

其实啊，老和尚说的那许多办法中，办香火会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民间相传每年的六月十九，是观音菩萨得道的日子，华蓥山的香火会，就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办到六月三十，在当时全川北是出了名的。届时不但附近的几个县连同重庆的香客都来进香，连周围团转的叫化子也要来个一百两百的，不愁讨不到饭吃。一个香火会下来，光是香烛钱，山里的和尚们除了留够积蓄，吃个一年还有余有剩的。如果我们再想点其它办法，参加进去，不但可以解决这么多人的生活，还可以做好多工作，问题就在于这么多人，怎么去才能不出事。

我们正商量，徐老和尚来了，闷闷不乐的样子，一坐下来就说：“廖大哥，香会快了，你们的人，恐怕要让一下啊。”玉璧笑着说：“老师父，我们正商量这事呢。要让呢，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有我们在，你的香会恐怕还要兴旺些。你看，你们不是人手不够吗？我们的人可以装成老百姓，在山上摆摊卖小吃，唱戏凑热闹，把你的香会搞得红红火火的。香会红火了，说山上‘闹共匪、毁庙子、砸菩萨’的谎言也不攻自破了，以后不论是上来烧香还是请你们去讲经的不也就多了吗？这‘山上太平’的话一传出去，敌人也就不来骚扰了，我们不就可以平平安安忙秋收了吗？更重要的是，香火会办好了，我们的人化装成小商、小贩就能多赚钱，就能增加一部分收入，解决生活问题。当然对于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摸清敌情。比方说吧，那些抬上山来的九品大香上，不是有出功果的名单吗？”

“有的有的，凡是出了钱的，上面都有名字，前面是会首，一架香总有好几百个名字。”

“对呀，那些会首好多都是地方上的恶霸地主，这名单对我们的用处大得很呢。”

老和尚听了，一下子也悟了过来，满心欢喜地说：“对呀，我们抽签的签条上还要说劝世文，今年我们把劝世文也换个新调调，把穷人们都团拢来。”

还在五月二十几上，香客们就陆续上山了。沿山的路上，虔诚的人们抬着九品大香，那香架上扎着一层层漂亮的莲花，莲花心里插着九根小碗粗的大红烛。每抬香架后面，都跟着一大群香客，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或者端着装满了香烛的香盘，或者手里举着三支一炷袅袅燃着的香火，人人心中念念有词，亦步亦趋，在平时冷冷清清的山路上，牵起了一条从早到晚不间断的长龙。香烛撩起的烟雾中，还响着阵阵热闹的锣鼓声，响亮的喇叭吹得一家赛过一家；还有那些更图喜庆的，请来了耍狮子龙灯的班子，引得一路上的香客们，大声地喝彩……刚刚忙过了春耕的人们，把一个虔诚的宗教节日，注入了欢乐鲜亮的色彩，在其中尽情地舒展着疲惫的筋骨。

玉璧在彪子山上训练出来的那一大批人，这次全都派上用场，各自化装成算命的、看相的、打莲花落的、说劝世文的以及力夫，在香客中活动。马福林在宝顶寺外的大坝子上唱起了他的木脑壳戏，戏文都是诸如《林冲夜奔》、《武二郎痛打西门庆》、《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之类的“造反戏”，香客们看得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就在宝顶寺的大殿内，香烟袅绕，佛幡高挂，木鱼声声，徐老和尚带着徒弟们，正抑扬顿挫地念经做法事。

我自己则带着一批人，包括队员们的家属，把冰粉儿凉粉儿汤圆醪糟……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儿，沿路摆得密密麻麻的，叫卖声伴着四处飘逸的

香气此起彼伏，馋得那些上山下山的香客们吃了这家又奔那家，不是夸着川北凉粉儿如何辣得过瘾，就是说醪糟汤圆的味道怎么醇正，还都说今年的香会怎么比往年都热闹啊？是不是佛主诏示天下要太平了？

只有玉璧不露面，住在山下的唐二嫂家，每天听取我们的汇报。

陈仁勇自从几年前在石龙场算命出了洋相之后，扎扎实实用了点功，现在变得老练多了。他没事就坐在我卖凉粉的摊子边，弹着三弦，拖声扬气地唱着《劝世文》：劝世文，劝世文，领着一张回家门；人生在世不一等，富的富来贫的贫；贫富相差是何故？不是瘟疫不是神；军阀恶霸和地主，派款拉丁活吃人。

他一唱，后面跟来一大串，有的问：“香客，你是哪一路的？”他头也不回，仍然眯着眼，弹着三弦，抬着头望着天唱道：

高高山，欢喜坪，草根泥巴胀死人；穷人要想吃干饭，万万不能万万不能！

星星亮，月亮明，华盖出了救命人，穷人要想吃干饭，早打主意早投奔……

他唱着唱着，转过山头不知去向了。

那年春天，川北各县正大闹饥荒，许多老百姓吃观音土、芭蕉叶度日，陈仁勇这一唱，引起许多人的心事，坐在我的凉粉摊旁边，你一语我一言地议论起来。

这一边，唐俊清换了装，装成一个烧香的农民，跟一个三十七八身穿蓝布衫的香客边走边谈，走到我们的凉粉摊子旁边，把手一比，我就打两碗粉。唐俊清说：“老兄，今年菩萨灵验哩，像知道我们的心事一样。我去抽签，和尚说是翻身签，你去抽了没有？”

那个中年农民向四周看了看，像是怕人听到了，说：“我也是一匹好签，和尚也说是翻身签。”

“翻身签上写的什么，说给我听听。”

那农民又把四周看了看，悄悄凑着唐俊清的耳朵说：“我抽的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不晓得是啥子意思。”“和尚怎么跟你说的？”

“和尚说，‘事在人为’吗，就是一切事情，只要人肯去做，就有办法。比方说，我们穷人一年苦到头，还是吃不饱饭，要想吃饱饭就要站起来，翻个梢。唉，说是说啊，穷人要翻梢，谈何容易，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哟！”唐俊清吃着凉粉，说：“老兄，这就奇怪了，我抽的也是这匹签，起初我也不肯信。那和尚说，信不信由你，这是菩萨显灵，不过两年，穷人就要翻梢了。我还是不信，就问他怎样才能翻梢。和尚说是天机不可泄漏，可是又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恐怕要动刀兵。”说到这里，唐俊清看看四周，凑近一步说：“老兄，我看这刀兵二字，正应在那‘事在人为’上，你想，只要穷人起来，拿起枪杆子，还怕谁？不是就胜了天，有好日子过了吗？”

正说着，旁边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张字条，伸手递给唐俊清说：“老兄，请你帮忙念一下。”

唐俊清打开一看，连忙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轻轻念：打垮“罗烟灰”，又来“耗子精”，富人酒肉臭，穷人吃草根，要想不饿饭，去找救命星。

唐俊清念完后，忙将纸条还给小伙子说：“我看这救命星哪，怕指的是自卫军。”

那小伙子轻声说：“自卫军在哪里呢？我们好多都想去。”唐俊清说：

“唐僧取经遇了那样多劫难都取回来了，只要你诚心，哪有找不到的？”

几个人正在我们的凉粉摊子边说着，就听见一阵喧闹，抬头一看，一架好阔气的九品大香抬来了。为首的身穿马褂，头戴一顶红结瓜皮帽，气势昂昂，后面跟着几十个抬着东西、穿得很褴褛的香客，看样子是他的佃户。这位肥头大耳的老爷走上殿来，伸手要抽签。僧法慧上前拦住他说：“施主，请把马褂脱了，这是对菩萨不礼貌。”

这位老爷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将马褂脱了，然后法慧递给他一个签筒。几个抬东西的佃户也上前来抽签，法慧笑笑，又给他们一个签筒。佃户们有的求六畜兴旺庄稼好；有的求人口顺遂，诸事平安；也有的求爹妈长寿、为儿女免除病痛。法慧拿着抽出的签取来签票，他们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个个都高兴得很。有一个掩不住，就拿着签票上去，小心地对那会首说：“老爷，我抽的是翻身签，您呢？”

那位会首板着一张铁青的脸，不说话。法慧上前去，双手合十说：“施主，签好签坏，菩萨莫怪，请到‘知客室’里面去休息。”

那会首哼了一声，恨恨地把那签票揉成一团，甩在地上。一个抬东西的捡起来，边看边念：混世魔王作恶多，灾难临头跑不脱；如不丢刀成佛果，死在眉睫徒奈何！

佃客们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互相看了一阵，然后轻声规劝起来。一个说：“是呀，会首，你怕你的侄儿分家，就把他卖了壮丁，还估奸了你的侄媳妇，这事不对呀！”一个说：“你用火钳烧人家王老汉的女儿的下身，这事菩萨也晓得了。”

“还有，今年天旱，你催佃户交租，颗粒不少，逼得人家……”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会首，你还是在菩萨面前悔悔过，减轻点罪吧！”

这会首勃然大怒说：“什么菩萨？什么混世魔王？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看我回去就死了？！”

法慧走上去对他说：“施主，你莫在菩萨面前吵。菩萨说的话，信不信由你。不过，花园洞的菩萨最灵验，你再去求个签看看。”

“求什么？我不信，胡说八道！”说着就气呼呼地走了出去，在殿前停了一下，还是朝花园洞去了。

这花园洞，就在陡峭的磨刀岭上，下面便是鹞子崖。洞门口很小，一个人要侧起身子才能勉强通过，可是一旦进去，就不得不惊叹天地造化的神奇。这里古树参天，奇草遍地，铺满了苔藓的悬崖上，挂着大青大紫的藤蔓，各色野花点缀其间，清风吹来，异香袭人，是华蓥山上一个很有名气的好去处。花园洞内，也有一处庙宇，传说其中的菩萨特别灵验，只是为了验其诚心，前去朝拜的人必须通过一座索桥。这索桥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哪些人，用几根野藤扭成的，下面便是黑沉沉的深渊；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心术不正的人，是过不了这座索桥的。

我看那会首愤愤然的样子，连忙把陈仁勇和金积成喊了过来，说：“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你们赶快抄小路到花园洞去，在那道索桥上做做手脚。”

他俩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可是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了？

陈仁勇笑笑，说：“行了，他升天了，到菩萨那里去悔过去了。”

我说：“是你们俩干的？”

陈仁勇说：“这号东西，造了那么多的孽，还用得着我们动手？他身后

的那些佃户们，谁都恨他恨得咬牙，见他在索桥上走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干脆在后面一扬巴掌，把他打了下去。唉，也好也好，免得在这大斋大忌的日子里脏了我们的手，菩萨怪我们心不诚呢。”

这一下，满山上进香的人都轰动了，都说是华盖山上的菩萨显灵了！如今这世界上，作恶的人太多，通通要现世现报，菩萨决不会饶恕他们的！这话在山上山下的香客中越传越神，恰好杨森的太太姨太太们叫人抬着富丽堂皇的九品大香来朝山，刚走到山口，就被香客们拦住，半是劝阻半是威胁地说了一大通，吓得太太小姐们面无人色，硬是连山都没进就回去了。

我们听说了这事，暗暗高兴了好几天。

又过了两天，都半下午了，趁着香客稀少了些，我和夏林在寺庙里走走，忽然听见后面的藏经楼有吵闹的声音。这藏经楼，修在宝顶寺大殿后面的一个避风处，里面藏着古寺历代方丈收集流传下来的经书，寺中僧侣们一直视为珍宝，平时也不准闲人进去，每逢香会和大型佛事，都要派人把守。我们转过回廊，赶到藏经楼前，只见守楼的法智正和四个人闹得不可开交。再看那四个人，说是进香的又没有拿香，说是抬滑竿的又不像是下力人，流里流气的只是往经楼上闯，慌得法智把住大门，直是说：“施主，楼上装的是经书，没有看头，真的没有看头。”

有一个人说：“没有看头？偏要看看。”

“这上面不能进去。”

“为啥不能进去？里面安的巧机关？藏了‘共老二’？”“施主，不能乱说啊！我们佛门之地，向来清静悄悄的。”夏林一看，连忙带了两个人上去劝架：“老兄，算了吧！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跟和尚都吵得架啊？走，吃酒去，我招待。知道吗，重庆上来的素席，办得好呢。”

几个人被半拖半劝的，到了殿前的饭馆里。夏林大手大脚地要了些素鸡素鸭，和他们大吃了一顿，天就黑了。宝顶寺不留宿，夏林带着那几个人，要到猫儿寺去住。我喊过唐老六说：“你跟着。”

天刚亮，唐老六回来了，说那些人带着枪。

“几支？”

“不清楚。夏林昨天晚上故意少租了一床被子，就自己出了租金，和其中的一个搭铺合睡在一个被窝里，夜里故意把脚往那人的腰间一伸，就碰到了他腰间的短枪。”我又问：“夏林有什么打算？”

唐老六在我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我想了想，说：“四个人太麻烦，要是拿不下来，就会把事情闹大，你去跟夏林说，只留住一个，留住那个带枪的就行了。”

唐老六答应了一声，走了。我连忙喊上金积成，再带上几个人，赶到花园洞的一个岩洞子里等着。

都半下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金积成耐不住了，正想出去看动静，却一下子缩回头来，悄悄说了声：“来了。”

我连忙挤到洞口，看见夏林正和那人站在索桥边。那人不肯走，夏林一边说着什么，一边伸出手去，牵着他，一步一晃地过了索桥，然后朝着我们的岩洞走来。走到离洞口两三丈远的地方，那人站住了，说不对吧，这里好像不是大路。话还没落音，金积成早像一只豹子样蹿了出去，把他拖进洞来。

一审，他们果然是杨森的师长夏炯派来打探消息的，还不止这四个，

前后一共十六个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天黑，把他押到山下唐二嫂家，交给玉璧好好审一审。谁知这家伙一出洞口，拔腿就跑，金积成赶上去一个绊脚，那家伙一个踉跄，就栽下了万丈深渊。

唐老六看了，半开玩笑地说：“老金啊，你敢在菩萨面前杀生？回去好生给法慧说点好话，让他给你念本经，烧炷香，在菩萨面前好生悔过，要不然啊……”

金积成嘿嘿一笑，：“我哪里动了手啊？不是他自己栽下去的吗？再说我这是替天行道，菩萨只有嘉奖我，悔什么过啊！”

这次香火会，整整闹了一个多月，香客们口口相传，都说山上既热闹又太平，还说菩萨如何灵验。后面来进香的人就越来越多，各个庙里共收了九千多元香火钱，将近一万斤菜油，还不算我们摆小摊唱木偶戏赚的钱。我们利用各地的会首名册，初步掌握了恶霸地主们的情况，也找到了一些基本群众。香会过后，我们就和徐老和尚商量，除了一些老弱和思想还不开通的和尚留在庙里之外，其余的都分散下山，到各县去化缘念经，既可增加收入，又可探听敌情，还可以适当做些宣传工作。

法慧探营

进香会刚过，我们就把各个山口封锁起来，召开了华蓥地区整编会议。这是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各路“诸侯”的首次聚会，大竹、邻水、武胜、岳池、广安及附近各县的领导人都来了。会议地点设在华蓥山顶的宝顶寺，我带着四十多人组成的双枪队，负责从山脚到山顶沿途的警戒和会场保卫工作。

上级组织派了老袁同志专门从重庆赶来主持了这次会议。自从“三·三一”惨案玉璧受伤回来，就忙着队伍上的事情，好久没去重庆了，和老袁大哥见了面，自然很亲热，也介绍我认识了。罗平精和罗方域从太平场赶来，两个人在平坝上住惯了，走不惯山路，偏偏又刚下过雨，爬上来竟滚得泥菩萨一般。连好几年没露面的屈元亮，也和徐清浦一起来了，大家见了面都跟他开玩笑，问他什么时候跟范傻儿范绍增打了“脱离”。来开会的许多人，我早就熟悉，像金华新、王道纯、唐虚谷等等，都是自己的同志；另外一些人，虽然只是些绿林首领，但长期跟我们协同作战，有的还直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像刁仁义、刘昆仑、陈伯斋、姚生荣等等。

趁各县的代表还没完全到齐，我们党内的核心成员开了个小会。会议由老袁大哥主持，他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全国人民都在呼吁莫打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可是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反而集合了六十三万大军来“围剿”中央苏区，看来也只好打下去了。现在我们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已经打败了敌人的三次大“围剿”，红四方面军也在鄂豫皖打得轰轰烈烈。上面说了，我们四川也要动起来，准备成立红军，这次整编会议就是要把川北地区的地下武装都团拢来。

大家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议论纷纷。刘铁挥挥手说：“大家静一静，听我来说几句。”

这次整编的队伍，除了我们手中的一支外，其余的大都是绿林袍哥武装，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些队伍的首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许多人只是出于对我们个人的钦佩前来投奔，要把他们改造成识大体、顾大局的革命武装，还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初步研究了一下，总队要成立特别支部，十个支队的领导中都要有党员。陈亮佐、罗方域分别到刁仁义、罗平精队伍中任支部书记，王道纯作为支部书记要下去。”

刘铁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说：“陈玉屏带着夏林、金积成、唐俊清等人，成立一个特别小分队，平时负责军需运输，打起仗来就作机动队伍。总队成立之后，仍以华蓥山为根据地，广安、岳池、武胜、铜梁、合川、顺庆等县为活动地盘；邻水、大竹、梁平县为后备潜伏地区，中心任务仍然是打军阀杨森。”

大家议论了一下，表示没有意见。刘铁又说：“我们还有件事情和大家商量一下，眼下杨森见我们岳池、武胜、广安三县的队伍都在联合行动，力量很大了，感到自己实力不足，也在想办法，打算采用三县联防的办法，先把岳（池）武（胜）广（安）三个县的地主民团武装联合组织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现在得想个对策。”

徐清浦说：“我摸了一下情况，敌人要组织三县的民团武装搞联防，可是现在没有人取出来领头。一来是没有当年陈徙南的魄力和威望，团不拢；二来也不愿夹在我们和杨森中间受气，弄得现在杨森的师长夏炯很为难，他负责这件事情，不好向杨森交差。这事我倒有个想法：他们不干，我们来干。”

听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我们来干？像夏炯这样的人，肯让我们来干？

徐清浦说：“那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们老廖，不就身兼二职，又是团总又是大队长，管了渠河两岸资马十二场一千多条人和枪吗？”

罗方域不耐烦了，说：“徐老兄，智多星，莫这样拐弯抹角的了，到底哪个去合适，你明说嘛。”

徐清浦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说就让屈元亮去。他和夏炯早年是同学，私交不错，虽然参加了上次起义，但毕竟只是和罗泽洲之间的冲突，再说失败后他就投奔了范绍增范傻儿，至今没有扯红。夏炯倒是知道他和老廖关系好，还想用他来套老廖，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反过去套夏炯。”陈亮佐说：“这个计，好是好，只是听说夏炯杀起人来眼睛都不眨，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可不得了。”

罗方域也觉得太冒险，再说成天在敌人鼻子底下小心翼翼的，也憋气。我们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队伍，怕他几个团丁做啥子，若是谁敢来承这个三县联防的头，就干脆先打了他，杀鸡给猴子看看。

屈元亮见大家争执不下，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就站起来说：“大家倒不必过于为我担心，变了牛就不怕拉犁头，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只要是对我们组织有利的事情，我赴汤蹈火也要完成。夏炯这家伙是毒辣，疑心重，动不动就要杀人，不过他不像向廷瑞向屠户那样莽撞，还是有心计，晓得厉害的。我倒有心跟他智斗几个回合，他那把马刀，倒不见得能砍动我这铁脑壳呢！”

大家议论了一阵，刘铁说：“我同意这个办法，不过元亮一个人去，的确令人不放心。

这样吧，我们最近听说岳池县的团练局长罗洪明，因为贪污糖款引起

了公愤，又有人告他通共通匪，挑起他与夏炯不和，现在准备要撤换。我们不如参加竞选，把团练局长也抓过来。”

“人选呢？”

“人选倒是现成的，清浦就挺合适。他是留日学生，在岳池县里还有些声望，又进过杨森办的军事学校，与现任岳池县长严定礼又是世交，只要我们去活动，保证十拿九稳。”大家争着发表自己的意见，都觉得这两件事情若办成了，许多事情会顺利得多。老袁大哥叫大家静一静，说：“今天的事情，关系到我们整个部署的成败，就在座的几个人晓得，泄露了要受纪律处分的。”接着，他又决定屈元亮和徐清浦莫再抛头露面，立即从小路下山。

第二天，各路首领都到齐了，三十多个人的会议，就在宝顶寺的玉皇殿里举行，由玉璧和刘铁主持。刘铁一挥手，一个闹哄哄的大殿，立即静了下来，只听他提高声音说：“诸位弟兄，自从上次我们联合打罗泽洲以来，又有好几年没见面了。现在罗泽洲倒是跑了，可是杨森更不是个好东西，看来我们对这些军阀只有一个办法：打。不打他他就不肯让步，以为老百姓太好欺侮。杨森的力量，当然比罗泽洲大多了，这更需要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大会，惊动大家天远地远地赶来，就是要商量怎样联合，再推选出承头的人，大家好一致行动。”

会上的几十位代表，顿时闹哄哄的。刘昆仑首先站起来说：“老刘大哥，我想问一句，这回我们该不会像上回那样，只打军阀不打地主吧？我们早就听说人家江西那边，打土豪分田地，热火朝天的，农民的劲头大得很呢。依我看哪，先打他妈十多二十个作恶多端的大土豪，粮也有了，钱也有了，气也出了，仇也报了，再拿着这些粮钱枪支去打军阀，那才叫一举多得。”

刘铁说：“怎么能像上次那样。上次是认枪不认人，只要有枪就入伙。现在我们在座诸位都是和军阀恶霸有深仇大恨的人，队伍里也多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只是现在军阀的势力还很强大，我们如果先打地主，他们就会倒向军阀，给我们添麻烦，到时候分了田农民也不敢要。等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就不像现在这样打土豪了，要像江西一样吼开打，发动大家来打土豪分田地，到那时候，我们也要成立红军。”一听说要成立红军，大家都兴奋起来。

陈伯斋一拍巴掌：“到那时，先打下岳池，再打下广安，看他杨森往哪里跑！”罗平精扯着他那大喉咙，大声武气地说：“打哪里我都没意见，只是这次上山来，看见廖大哥和弟兄们太苦了，没吃没穿的，把身体搞坏了，这仗怎么打？干脆，把总机关设在我的太平场，我把房子都捐出来，我们都到坝子上去扯伸了打，也图个痛快。”

大家都笑了，陈亮佐说：“罗大哥，干我们这一行，不能光图痛快哟，还是得有个吃苦的思想准备。杨森又不是十天半月就垮了台的，目前敌人的势力这么大，全扯到平坝上去要吃亏的。”

金积成说：“是要有个吃苦的准备，大手大脚要不得。现在我们都联合起来，成一家人了，我还是要给罗大哥提点意见。昨天他在山上打猎，不用火药枪用步枪，现在我们搞点子弹多艰难，这样浪费不应该。”

大家趁着话头，又给罗平精、罗方域提了不少意见，说他们身为领导人，这两天不该带着人随随便便到坝上去逛，万一被敌人发现了，不但个人危险，也会暴露这次大会。罗平精先还满不在乎，后来见大家都认真了，自己也认真起来，表示以后一定要改。现在参加革命了嘛，不能再像从前只是

在家里操袍哥，还是要像个革命的样子。

刘铁和玉璧见他们已经表了态，就顺着说：“我们现在整军，不只是为了联合起来，扩大力量，还要整顿组织纪律，首先是领导人自己要做好，再是要管好下面的弟兄们。要是真心来打恶霸打军阀求翻身，就要守法纪，听指挥，更不能骚扰老百姓。实在不听的就请他们出去，免得一颗螺蛳打坏一锅汤……”

会议开了一整天，最后作出了决定，宣布原华蓥山农民自卫军经过扩充整编，正式更名为华蓥农民自卫总队，以廖玉璧任大队长，刁仁义、罗平精、姚生荣、刘昆仑、蒋老六、陈伯斋、秦熬、吴绍先、谭之中等十个人分任支队长。刘铁任书记的事情没有公开，但是下去的各支部书记的工作范围是明确了。吃晚饭的时候，刁仁义站起来，端了只大酒碗高声说：“诸位弟兄，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是个粗人，没读过书，和在座的有几位老弟一样，也不在党。这些年来，我带领弟兄们，冒着十恶九险闯荡江湖，也打了些劣绅，打了些军阀，但终究没闯出个名堂来。现在承蒙共产党看得起我们这些绿林江湖中人，邀约我们一起来干，还望廖大哥、刘大哥和在座诸位多多赐教。我不懂共产党的规矩，只晓得这次大会很重要，我们是不是也要赌个咒发个誓，有个具结？”罗平精听了，大声说：“对对对，提公鸡来，我们要喝血酒！”正说着，夏林不晓得从哪里捉了只大红公鸡，一刀抹了，往每个酒碗里滴了鸡血。罗平精端起碗来，说：“我若是暴露了组织，死无葬身之地！”说罢一口干了。刘昆仑也站起来，说：“我若是泄露了秘密，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说完也一口干了。刁仁义把酒碗捧在手上，说：“莫说那么多，谁暴露了打死谁！”说罢也一口干了。其他代表都站起来，重复刁仁义最后一句话，干了酒。

老袁、唐虚谷他们在一旁笑着只是摇头，玉璧说：“没办法，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就算旧罐子里装新酒吧。”说罢也举起酒碗大声说：“刁大哥的话说得对，凡叛逆者，不管在党不在党的，都要按纪律，严格处分！”说罢捧起酒碗，也一口干了。

这天晚上，酒席一直吃到深夜才散。

华蓥会议之后，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出半个月，徐清浦就当上了岳池县的团练局长，屈元亮当了岳、武、广三县联防司令。各支队的负责人回去之后，都磨拳擦掌，遍地开花地打了起来。杨森恼火了，将他的部队分布到各县，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切断我们各个支队的联系，然后分而治之，再集中“围剿”我们驻在华蓥山上的总部。我们研究了形势，决定选择桂花场为突破点，先打通到渠县和大竹后山的通道。

晚上，夏林把法慧叫到我们的房间里，玉璧对他说：“要给你派任务了，到桂花场去侦察一下，敢不敢？”法慧一下子站起来说：“大哥，入党宣誓那天我就说过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玉璧拍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来，说：“不怕死当然好，可是还要有智有谋，圆满完成任务回来才是目的。这次所以要你去，是因为你具备这个条件。桂花场，是杨森第六混成旅罗润德的驻地，现在由一个叫林向侯的团长在那里驻守；他是梁山人，信佛。你先到你师父那里去，将梁山的双桂党的情况摸仔细打听好，然后就装成双桂堂的和尚，去桂花场化缘，把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和地形摸清楚。记住，这是我们打破杨森包围的第一个缺口，又是你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千万大意不得。”

法慧脸上泛起红光，很兴奋地使劲点着头，拉着夏林去商量具体细节去了。我看着他蹦蹦跳跳的背影，孩子似的，心里总不大踏实。

玉璧说：“让他试一试吧，我们的人，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第二天清早，法慧身披袈裟，斜挂一个化缘用的劳什子口袋，手中敲着木鱼，念念有词地走到我跟前，很认真地说：“大姐，你看我像不像？”

我说：“像什么？”

他说：“和尚呀。”

我听了忍不住笑了：“本来就是和尚嘛，咋不像？快去吧，快去快回，一路要小心。”我一边说，一边送他出了山门，直到他的影子消失在密林中，我才回来三天过去了，法慧没有消息，我由担心变得有些焦躁，连夏林和玉璧都到山门外望了好几次。晚上，门外落着倾盆大雨，玉璧和夏林、陈仁勇他们伏在一张军用地图前，准备拟定攻打桂花场的第二套作战方案。都半夜了，我疲倦得很，站起来想去给他们弄点什么吃的，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轻轻喊了声：“报告。”接着就没有声音了。

我心里奇怪，以为是听恍惚了，过去试着把门打开，没想到猛地扑进一个身来。这人满脸是泥，浑身上下的泥水直往下淌，只有两只眼睛在转。他见我怔怔地盯着，忙用袖子揩了下脸，我一看，高兴地叫起来：“哎呀，是法慧呀！”玉璧和夏林他们都站了起来，七手八脚打热水拿衣服，忙了一阵才把个清清秀秀的法慧打整出来。他穿了陈仁勇的干衣服，拿了两个苞谷馍，边吃边谈侦察的情况。法慧说：“那天我下了山才晓得，敌人在桂花场周围到处都设了卡子，费了许多口舌才到了桂花场。我敲着木鱼，从场头走到场尾，从正街走到偏巷，发现一个大院子门口，站满了卫兵，我就这么敲着木鱼念着经走过去。还没走拢，一个胡子拉碴的卫兵就喊我滚开。我不慌不忙地一躬身说：‘阿弥陀佛，长官你们行个善，和尚向你化个缘。’另一个愣眉估眼的把枪托子一拦，不耐烦地说：‘啥子长官不长官的，哪个不晓得我们是丘八。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团部重地！你和和尚进来的么？’

“我一听是团部重地，更不得走了，赖着他两个只是要化缘。那个胡子兵有些发毛，说老子都没得吃的，哪还有给你的？再在这里罗嗦我就要……他边说边举起枪托，要打我的样子。正在这时，有人喊团长来了团长来了；我一看，那团长已走到我面前。他头戴顶博士帽，身上穿了件银灰色长衫，戴了副金丝眼镜，右手还拿了串佛珠。他后面跟了个女人，三十来岁，浓妆艳抹，穿红戴绿，金耳环金戒指闪闪发光，胸前却不伦不类地也挂了串佛珠。

这一男一女走过来，两边的卫兵全都昂起下巴站得端端正正的。林向侯环视了一眼说：“刚才是谁闹啊？”那个胡子兵连忙立正说：“报告团长，这个和尚不知趣，跑到这里来化缘。”林向侯偏眼瞪了我一阵，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吊起来！”

我们大家听到这里，心中一惊，想来法慧必定是吃苦了。却见他一伸脖子，咽下最后一口苞谷馍馍，绘声绘色继续往下说：

“那几个卫兵一听，拥上来就要捆我。我急了，大声说：‘长官！行不行善由你，我和尚生在三界之外，不问红尘中事，又没为非作歹，为啥要捆我打我？’”林向侯冷笑两声，说：“你分明是华盖山的和尚，难道还瞒得过我不成？”我不慌不忙笑笑，说：“长官，我看你面红体胖，定是官门中大人物；你又手拿佛珠，信仰佛法，难道不晓得诬赖好人是一大罪么？”林向侯大吼一声说：“那么我问你，你到底是哪里的和尚？”

“我说：‘长官，不瞒你说，我是梁山双桂堂出家的，不信你看我口袋里的化缘簿。’一个卫兵忙从我口袋里摸出化缘簿，那女人接过来翻翻，对林向侯说：‘团长，真的是双桂堂的，还是家乡人呢。’“林向侯瞅了我两眼，又说：‘我问你，你是双桂堂的，你可知道双桂堂坐落何处，离梁山多远？’

“我不慌不忙地答道：‘双桂堂在梁山西面三十多里的人和场境内，庙宇占地七十多亩，四周竹林茂盛，古树参天，香客终年不断。’

“双桂堂方丈是谁？庙产多少？和尚多少？”“双桂堂方丈是慧宗长老，庙产有八百多亩，和尚有七百多人。”

“林向侯见没有什么破绽，又说：‘和尚，我再问你，双桂堂特产是什么？哪一个菩萨最灵？’我看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女人在旁边脸色飞红，心中就有了数，说双桂堂特产是油炸锅巴，送子娘娘最灵，三州五府四邻八县的香客，要来朝贺求签，都是有求必应，添子添孙！

“那女人一听，喜上眉头，就在林向侯的耳边说了几句。林向侯点点头，独自朝外走了，女人叫卫兵把我的手解开，嬉皮笑脸地说：‘和尚，团长军务在身，不得不问你。走，快进去，我有事要求你。’“我说出家之人，是不问红尘的，太太有事就在这里吩咐，营盘之内，哪能乱去？那女人马上陪着笑脸说：‘哪里话，有我担保，不打紧的。’说着就领我穿过营盘，进了她的房间，请坐倒茶，又端出一盘糖果；说她和团长都晓得双桂堂的菩萨最灵验，几次都想去求签，只因路上不清静，团长不同意。这回请我帮她许个愿，保佑团长高升，保佑她人财两旺……她停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还求送子娘娘保佑我今年添个喜，我一定亲自去替她穿金挂袍唱大戏。’“我忙说：‘阿弥陀佛，人在宫门正好修，太太只要肯做好事，功德积在儿女身上，包你多福多寿，多子多孙。’我讲经说法，大摆了一气。眼看天都擦黑了，那女人心头高兴，说和尚你用了斋再走，说完就到厨房里吩咐去了。

“我这才敢睁开眼睛，看她的房间：墙上挂着如来佛的像，还有些字画，看样子都是有些根底的人物写的。我再转过身来，却眼睛一亮，你们猜看见了什么？是华蓥山的地图！那上面用红笔蓝笔画了些箭头，都直指我们猫儿寺、宝顶寺，这不正是他们的进攻路线吗？我狠狠地盯了那张地图一阵，把那些线路记牢了。见那女人还没进来，就装着要小便，出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到院子后面的左右两角都有碉楼，楼上架有机枪；右边厢房是弹药仓库，左边厢房是营房……”法慧说到这里，歪着头对夏林说：“嘿嘿，夏队长，莫看你平时光取笑我，这回去打桂花场啊，没得我这个小电棒就不得行咯！”

法慧的任务完成得好，不仅是敌人的团部，连周围团转的设卡布防情况都说得十分详尽，当时就一一标上了地图。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一向口紧的玉璧还嘉奖了他几句。夏林摸着他的光脑壳，直是说我们的小电棒，还真的有点出息。情况侦察清楚了，可是什么时候行动还没定。这些天，同志们都忙着擦枪，加紧操练，法慧把庙上的和尚组织起来，一天到晚炒豌豆、胡豆、苞谷。我和夏林与另外几个同志又赶到重庆去，提前两天运回七千多发子弹，还买了两挺机枪，只等上面发布命令就行动。

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地里淋菜，远远看见刘铁和王道纯边说边笑走进了山门。我心里一高兴，手里动得飞快。夏林说：“大姐，看你咋一瓢一窝地泼，硬要把这些豇豆、茄子都胀死么？”我说：“夏林，搞快点，没看见刘铁刘大哥跟王道纯一起回来了吗？说不定要打桂花场了。”夏林伸长脖

子一看，也来了劲，说：“大姐，我来挑你来淋，我们今天早点收工。”

我们急急忙忙淋完了那块菜地，挑起粪桶往回走，刚走到唐俊清住的屋子旁边，就听见他在屋里大吵大闹的。唐俊清这次和我们去重庆运枪，在路上闪了腰，又淋了雨，回来就发高烧，由医生彭老么守着，莫不是病又重了？我和夏林忙放下粪桶进屋去，见他还在喊：“我能够上，我要去——”夏林摸摸他的额头，说：“老哥子，你今天松点了么？不好生听话吃药，像细娃样在闹啥子？”

唐俊清不理他，拉着我的袖子说：“大姐，我跟你和大哥几年，哪次脓包过，这回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瞒我一个人？”

我摸摸他的额头还滚烫，担心他在说胡话，就问：“我哪有什么事情瞒过你？”

他一拍床沿说：“你当我真的不晓？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打桂花场了，这回是打大仗，陈仁勇都准备去了。”夏林一听这话高兴得跳起来，说：“老兄，你安心养病吧，病好了少不得你打的！”话还没落地，人就没影子了。我也连忙说：“俊清，我和夏林才从菜地回来，真的不晓得这件事情。你这样子哪能出去打仗！现在形势这么好，等你病养好了，还怕没有仗打么？”我边说边扶他躺下，给他盖好了被子，也急急出来了。

这回打桂花场，的确是一场大仗。我们集中了二百多人的兵力，其中先头部队八十人，分成四个小队，我就带领第一小队，跟在玉璧后面。我们穿着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军服，带着干粮和火把，擦黑时分从山上出发，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急行军。半夜时分，天空亮开了，满天的星星清朗朗的，前面传来的口令，说已到了敌人的警戒线。我们熄掉火把，踮起脚尖，飞快地朝前走着，想到这是一场大仗，对方可是正正规规的一个团，心里都有些紧张。

可是玉璧和夏林一路上倒是不慌不忙的，轻而易举地端掉了敌人的两个卡子，鸡叫头遍时，我们到了桂花场。玉璧迅速分派了人马。我们第一小队和第四小队一起，由法慧带着，直奔敌人的团部。我们冲进那个大院时，敌人还睡得直打鼾。陈亮佐、谭之中他们直扑两边厢房，只听见几排枪声，刹时间桂花场内外我们的枪声爆豆样响了起来。法慧带着我们，来到林向侯的房间，几个同志立即散开，将房间包围起来。夏林飞起一脚，将房门踢开，冲了进去，只听得里屋一声女人的尖叫。

我一步跨进去，用火把一照，见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在床上缩成一团。我走上前去，掀开被子，一把将那女人提起来，问：“林向侯哪里去了？”

她披头散发只是干嚎。法慧急了，一步上前去，大声说：“问你那个团长哪里去了？”

那女人一见法慧，猛地不哭了，眼睛死鱼样一翻，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玉璧冲了进来，一见我们几个呆呆的就急了，指着大敞开的窗子说：“人都跑了，还不快追！”

我一看那窗子，才恍然大悟，连忙翻身跳出窗外，和夏林、法慧一起追了出去。我们追了好远，都不见人影，大家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法慧说林向侯短脚短手一身肥肉，怕跑不了这么快，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赶快往回走。这时我们的大队人马都赶到了，桂花场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亮杆火把，枪声密集，杀声震天，满街都是急急奔跑的人影。我们回到院子里，金积成、谭之中、陈仁勇他们正把俘虏一串一串地押在院子里集中，其中好

多浑身上下光溜溜的，站在那里浑身哆嗦。原来只是听说杨森的兵晚上不准穿裤子睡觉，说是怕他们逃跑，我还不相信，现在才晓得是真的。

法慧在俘虏中走了一圈，没有找到林向侯，大家都有些着急。玉璧说一定藏在院子里，快搜。我们围着院子走了一转，走到左厢房侧边，忽然听到后面有鸡群在咯咯乱叫。玉璧一挥手，和夏林各走一头，两面包抄穿过厢房，直向后院奔去。我跟在玉璧后面，高举着火把照路。后院屋檐下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石头砌成的大鸡笼，老远就听见鸡在里面乱飞乱扑。我们走过去，见一只人脚露在鸡笼外面。玉璧上去踢了一脚，喊了声：“出来！”

那人不动，夏林双手抓住那只脚使劲一拖，那家伙死蛇一般被拖了出来，长条条地躺在那里。玉璧踢了他一脚，那人哎哟一声翻过身来。我举着火把一照，只见他脸上黑一团黄一块糊满了鸡屎，臭气冲天，熏得夏林打了两个喷嚏，捏着鼻子将他提起来。那家伙低着头，耍死狗，不说话。夏林气极了，两脚尖踢去，他还是不开腔。正在这时，法慧赶上来了，一见这人就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大哥！这就是林向侯！”

那家伙听了浑身一颤，连忙说：“不是不是，你们认错人了。”

法慧说：“嘿嘿，林团长，我没认错人，你也没认错人。我的确不是梁山双桂堂的和尚，的确是华盖山上赤化了的红和尚。你不是求菩萨给你添个喜吗？我们今天就给你送喜来了！”

林向侯怔怔地看着法慧，垂下头去，长叹一声，不说话了。夏林用枪点着他的脑壳，冷笑着说：“林团长，再打不过我们，也不要钻鸡笼嘛！你看你堂堂一个大团长，今天变成了个鸡屎王！”

天色大亮了。玉璧将几百个俘虏集中在大院里，照例训了一场话，叫他们回家去好生种田，养家糊口，莫要再给军阀卖命；然后根据一些士兵的揭发，当场枪毙了两个作恶多端的营长连长，背着大批的战利品，押着林向侯回山了。

法慧和我们一起，背了一支缴来的枪，得意洋洋地走在前头。陈仁勇逗他说：“法慧，你要看相还得跟我学习！你那天说林向侯面红体胖，是大官相，就没看对嘛，这才十来天，他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法慧一摇头说：“你晓得啥子哟，我是哄他的，要不然咋个进得了营房？其实那天哪，我一看就晓得他大祸要临头了：头顶上冒黑气！我师父说过，华盖青黑必主暴灾，这种黑气你们是看不见的，硬要我们这些年打坐的和尚才看得出来。”

夏林听了一瞪眼，说：“糟了，我正要和大哥商量，这回法慧立了个大功，回去给他说他乖乖巧巧的小媳妇，哪晓得你原来是个多年打坐的老和尚！完了，这个媳妇说不成了！”

大家哄地一声笑了，法慧羞得满脸通红，跺着脚直喊：“夏队长你这个挨千刀的！”

强夺界牌

打了桂花场，活捉了林向侯，好戏就开了场。屈元亮和涂清浦带信来，

说近来杨森不甘心屈居广岳，又打算把队伍扯出去参加军阀混战，广岳的治安就完全交给了夏炯。元亮叫我们再热热闹闹打上几仗，最好迫使夏炯和我们讲和，以便我们抓紧时间进行整军，扩大队伍。

我们又把地图打开，大家把目光一扫，不约而同都对准了界牌这个地方。

界牌在华蓥山的背后，属邻水县管，是广安、岳池、邻水三县交界的必经之地，一边是悬崖，一面是高山峭壁，只有中间一条独路；敌人又在附近大修卡子，企图阻断我们通往邻水的后路，断绝我们车需粮食的供给，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打界牌和打桂花场不同，地势这么险要，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这就用得着早就安过去的一个钉子——唐二嫂一家。

唐二嫂的家，原来是我们在山边大溪口的联络点，我们运枪来去都在她家里歇脚；她也常常上山来，要么看看唐二哥，帮着大家缝补浆洗，要么送个信通点情况。队员们都夸二哥好福气，娶了个这么贤惠的女人。几个月前，敌人来搜山，听人密告，烧了她家的房子。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既然已经暴露，还是迁远点为好，干脆就让她迁到界牌街上，开了个鸡毛店卖点小酒菜，又到敌兵营里接点衣服来洗，成为我们从山上到邻水的一个联络站。现在要打界牌了，我们就把唐二哥派了回去，让他和二嫂抓紧收集情报。又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突击队，悄悄移到靠近界牌的山边上，密密地放上岗哨，等着二哥二嫂的消息。

天气热起来了，大家轮流放着哨，剩下的要么听玉璧上军事课，要么抓紧早晚凉快的时候操练。我趁着有些空闲，粗针长线地帮着大家缝补一下衣服。这些小伙子成天猴儿一样，衣服不是拉个洞就是撕条口，再说是干革命条件艰苦，总不能让人家说廖玉璧的队伍拖衣拖食的。俗话说，笑脏不笑补，洗干净补结实，让这些小伙子们精神些也好。

这天下午，太阳大得很。我和陈亮佐、陈仁勇、范永安几个坐在一个岩洞里边摆龙门阵，边给夏林的一条破裤子膝盖上重补丁。陈亮佐自华蓥会议后，被派到刁仁义刁大哥的队伍里，担任了支队书记；这次带了刁大哥的一个小队，也来配合作战。我问起他在那边的情况，他说幸好我读过几天书，刁大哥自己不大识字，就是佩服知书识理的人。他之所以愿意来投奔我们，就是说廖大哥和你都是上过京城太学堂，家里又不缺吃穿，还来和这些穷弟兄一起打军阀打恶人，这就了不起。还说大哥没得半点架子，打起仗来计谋多，神机妙算的，打一仗胜一仗，便是像诸葛亮一样。我笑笑，说刁大哥就是待人厚道，绿林中像他这样的人委实不多，只是他手下那几百弟兄五花八门的，不晓得服不服你管。陈仁勇说，大姐这你就不晓得了，绿林中的人看重排把。你不记得当年亮佐在罗渡溪的公口里，是红旗大管事，排行第五把的陈五哥吗？来往的英雄豪杰跑滩兄弟，若是越城翻墙，不经陈五哥引见招呼，莫说接驾留客吃喜钱，恐怕还要走不到路，拿话来说的。

大家正说得热闹，远远看见夏林来了，押着个浮虏，背了两支长枪。陈仁勇一见来了精神：“老夏，又在哪里捡了财喜”夏林一摆手：“嘿嘿，精彩得很，等我把这个家伙安顿了回来慢慢摆。”

过了一会儿，夏林空着手转来了，往青石板上一坐，扯起架子说：“来来来，听我来摆一段夏二爷打虎的龙门阵。”陈仁勇斜了他一眼说：“大热天这深山老林的，你又到哪里去吃了酒？”夏林说：“吃酒？我还差点做了下酒的菜呢。唐老六今天偷奸耍滑的，燃完了两根香都不来接班，害得我差点

喂了老虎。”

我一听他说真了，一颗心立即吊了起来，心想这一带人烟稀少，常有野兽出没，若是真的遇上了老虎，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可是再看夏林，只是拿顶草帽扇着胸膛，还是吊儿郎当地卖关子。我白了他一眼，说啥子过场那么多，要说就快说，不说我就走了。说罢将裤子往他手上一塞，站起来就要走。夏林忙起来挡住：“大姐，你就是性急，等我喘口气嘛！听评书，也要让人家开头扯几句把子嘛。”

我们大家又坐下来，听夏林扯开架式，慢慢说来。“今天下午，太阳火辣火辣的，我戴了一顶草帽在崖边上放哨。这地方很险，下面是万丈悬崖，上面是个大石头，我就坐在大石下面的窝幽幽里。眼看第二根香燃了半截，肚子也饿了，心想唐老六快来接班了吧，也不晓得今晚黑吃啥子。正想着，忽然感到头上的草帽一歪一歪的，不像风吹，又不像是什么打在草帽上。我初先不警觉，一连歪了三下，我才觉得不对头，往上面一瞅，唉呀！你们猜是啥东西？老虎！这东西坐在我头上那块大石头上，正在用爪子刨我的草帽。我只觉得浑身的肉皮子一麻：咋办？打吗？怕枪一响，惊了营，敌人的卡子就在山下面，岂不是暴露我们的目标？再说，我这一打，老虎势必要扑下来，把我扯下悬崖，那就只有同归于尽了。打既不能打，跑又不能跑，怎么办？一时拿不定主意，干脆稳起，来个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坐着不动，看它搞个啥名堂。老虎停了一下，又抓起来。我怕把草帽抓走，现了相，就把草帽上拴着的绳子紧紧拉着。它东抓，我头就向东倒，它西刨，我就向西偏，它不抓，我就不动，连气也不敢出。老虎不知道是啥东西，就在石头上蹲着。香快燃完了，唐老六还没有来接班，我心里只骂他混帐，要是多个人，也好助我一把。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人，万一老虎抓掉了草帽，不是送它饱餐一顿吗？不行，得自己打主意。武松在景阳岗赤手空拳都打死了一只老虎，我身上有枪又有刀，难道就等死不成？

“想到这里，我心一横，悄悄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打算先下手为强，先站起来吓它一跳，若是老虎往下扑就对它来个开肠破肚。忽然老虎一声嚎叫，向山崖下面猛扑过去，接着就听得几声人的惨叫声。我立刻跳下崖，跟着人声追下去，跑了一阵就听到前面有人在喊救命。我赶忙跑上前去，见地上一滩血，侧边的一棵大松树上，有一个人抱着树枝在打抖。我连忙掏出枪来，叫他下来。那家伙才乖乖地下来，说和他一路的还有一个人，被老虎拖走了，他吓慌了，才爬到树上去。亏他龟儿子手脚快当！”

“我又在前面的一个草堆里捡到一支枪，四下看看，唐老六还不见影子。那个死里逃生的丘八，还在哆哆嗦嗦地打抖，抖得我心头也有点发虚。我心想管它的，今天是特殊情况，犯纪律我老夏就这一回，要是一会儿老虎没吃饱找了回来，我岂不是成了它的肉点心？我背着枪押着俘虏回来，都要走拢了才碰到唐老六去接哨。他还嬉皮笑脸地说，今天天气太热，蝉子叫得好绵人，不晓得咋个睡过了头！”

陈亮佐问夏林：“碰见老虎的事情跟唐老六说了没有？”夏林说：“我才不得跟他说呢，等他也去见见老虎，跟老虎好生耍一下子。人家说大难不死有后福，我们都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人，山神菩萨既保佑了我也要保佑他。哼，我现在脚杆都在打闪闪！”

我抹下脸，说：“夏林，你又不是细娃儿，这种事情都赌得气么？这一带出现了老虎不是开玩笑的事，从现在起放哨一律要派双岗！”没着就叫范

永安赶快带了干粮，去跟唐老六同站一班岗。范永安答应一声，转身刚走，金积成就来了，说大哥叫大家都过去，要开个紧急会议。

我们连忙赶到玉璧那里，原来是唐二嫂来了，正在给玉璧汇报情况，说得又详细又清楚，玉璧满意得直是点头。等她说完了，我递了一碗水过去，说：“唐二嫂你打听到这么多情况，一定费了不少神。”唐二嫂接过水笑笑说：“对付这些贪嘴好吃的东西，用不着费神。卖的酒呀菜的便宜一点，又准赊又准欠的，都爱往我们的店子里跑，二两黄汤一下肚，问什么说什么，哪有打听不到的事情。”唐二嫂带来的情况表明，敌人驻在界牌的只有百把人，其余的二百人都散在外面设防清乡，现在去打正是时候。可是敌人凭借天险，在五里外的山口就设了卡子，平时场头场尾都有哨兵；营房在场东头的关帝庙内，又是个制高点，要像桂花场那样硬攻，显然是不行的。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先混进一部分人去，作内应。于是当场就点了将：唐俊清病好了，不去是不行的，他和陈亮佐带一批人，先由唐二哥安排，到界牌附近的群众家潜伏下来；我、陈仁勇、夏林几个人随后进界牌，听唐二嫂安排。界牌在要道上，又是大场，逢场天热闹得很，进出几十个人不惹眼。等我们进去之后，玉璧、金积成他们再带上队伍，装成去邻水的炭挑子进来，以三声枪响为号，攻下敌人营房。

商量停当，便各自行动。金积成带人到山上砍了些百英竹来，十多个会篾活的队员连夜编炭篓子，都打的夹层底子，好藏枪，然后又拿些锅烟灰和泥巴，抹成很旧的样子。陈亮佐、唐俊清带了二十多个人，分别装成算命的、看相的、讨口的、帮短工的、卖针头线脑的……陆陆续续来到界牌附近的乡村，住在我们的队员和当地群众家里。我装成一个农妇，手上提了个竹篮子，两支枪装进竹篮的夹层里，面上放了十几个鸡蛋；夏林和陈仁勇挑了两挑水淋淋的小菜，和我一起顺利地进了界牌赶场，然后由唐二嫂安排隐蔽起来。

我住在二嫂家，夏林和陈仁勇安排在另一家。晚上，先到的陈亮佐、唐俊清都过来了。

我们用张抹了烟灰的黑纸罩住灯，开了个会。现在潜伏在场内及周围的，大约有三十多个人。这里隔天赶场，算来玉璧、金积成他们后天到，我们明天晚上就要把人员全部调进来。

我说这么多人，选的人家要可靠才行。唐二嫂说：“没有问题，这些丘八在这里驻了几个月，穷吃霸赊的，逢场天还出来抢人家的青春小女，又抓了那么多年轻人去修卡子，修得那么牢实，活像要驻个天荒地老的样子。场上的老百姓好焦心咯，早就巴望你们打过来呢，住两天算什么！”

第二天上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下午我正打算好好睡一觉，却被唐二嫂从梦中叫醒，说她才得到消息，明天在外面驻的敌人都要回来，说是换防。

我一下跳下床来，问：“回来多少人？”

二嫂说：“将近二百人，听说还拉着大炮呢。”我一顿足说：“糟糕，这事也来不及通知玉璧他们了，他要是懵懵懂懂带人撞进来，岂不是自己撞进了敌人的口袋里么？敌人这么多，我们咋打得过……”

过了一会儿，几个负责人都到了，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都吃了一惊。讨论了一阵，觉得不外两个办法：一个是今天晚上我们就撤；一个是今天晚上我们就打，就这三十多人把界牌端下来。反正要赶在明天上午敌人的大队

人马回来之前，我们的人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今晚上撤，大家都不甘心，说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怎么就不声不响地撤了？不但老百姓很失望，将来也会被其他兄弟支队笑话。可是不撤，我们这三十多人，怎么打他们一百多人，还要拿下制高点，赶在天亮前结束战斗？万一我们被敌人拖住，等他们的大队人马一赶到，岂不是把自己也白赔了进去？

最后，大家一致主张要打。可是我却犹豫了。这个“打”字，说起来倒容易，可是万一……我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打仗若不能凭借实力，就得凭借天时地利，而今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三倍，而且武器精良，地势又占着制高点，我们唯一占着的，只是天时：黑夜出击，趁其不备。

可是万一我们被咬住，这场战斗在天亮前结束不了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去，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唐俊清急得不得了，一顿足负气地说：“要撤还不容易吗？可是只要我们这一撤，日后就再也别想进来，界牌这颗钉子，就别想再拔掉了。”

是啊，这界牌，本来就是易守难攻，敌人再增加这么多的兵力辎重，我们日后是更难打了，于是我心一横，说：“打，是可以打，可是不能硬打，要筹划一下。唐俊清和陈亮佐先上关帝庙，用手榴弹把敌人赶出来，我带着另一批人在外面堵住，打它个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天一黑，我们的人都悄悄地集中了。刚起二更，我出来看看，满街黑寂寂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只有场头的哨兵，魂一样荡来荡去。夏林和陈仁勇顺着墙根溜过去，用两把匕首把敌人的哨兵摸了。我喊了声“上”，唐俊清他们带着二十来个人往关帝庙飞奔而去；我带着剩下的人退到两头，各自找地形隐蔽起来。不一会儿，就听见关帝庙内打了起来，手榴弹炸得轰轰直响，火光冲天，夹着敌人的狼哭鬼嚎。突然一声巨响，关帝庙的大门被炸开了，敌人潮水一样冲了出来。我喊了声：“打！”两头埋伏的人一齐开火，涌出来的敌人三面受敌，出不来又进不去，缩成了一团。

夏林一旦打顺了手，就得意忘形，欠起半截身子，提起手中的冲锋枪喊：“大姐，快冲。”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一种很清脆的枪声，忙喊了一声“机枪！”拉着夏林就地一滚，跑到一个坟堆后面。就在这一刹那间，敌人以机枪开路，冲了出来，我眼快，两枪点倒那个端机枪的，几个人一齐开火，打倒一排敌人，其余的还是跑掉了。

夏林问我追不追，我说别追了，快去增援关帝庙！说话间，陈仁勇、范永安捡起敌人丢下的机枪在后面跟着，一路冲杀到关帝庙前，唐俊清和陈亮佐都在收缴残兵了。大家都会齐了，只有范永安和另外一个同志受了点轻伤。我们几个负责人赶快碰头商量。陈亮佐说：“这关帝庙虽然是个制高点，但没有退路，不能死守。”

我说：“敌人一定以为我们要死守，再说丢了营房，明天不好向上面报帐，他们一定会纠集人马杀回来。我们给他唱出空城计，封在里面打。”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很好，连忙把枪支弹药都搬到外面埋伏起来。夏林说要装就装像，搬了两个死人拿着枪站在门口，又捆了好几个手榴弹，做成个绊马绳，安在庙下面的石梯上。

四更时分，天色转黑了，锅底一样。放哨的同志悄悄跑回来，说敌人来了。话刚说完，就听见一阵脚步声，一进场口就一路冲锋，直杀关帝庙。敌人冲到关帝庙的台阶下，绊住了夏林安的绊马绳，炸倒了好几个，爬起来

又冲，三两下就扑了进去。谁知前面的进去一看，是座空营，知道上当了，又惊呼呐喊地退了出来。我大喊一声：“打！”陈仁勇架起刚才捡来的那把机枪，封住大门，我们的人一齐开了火。

敌人被拦腰截断了。陈仁勇、陈亮佐他们和庙里的敌人粘成了一团，我带着夏林、范永安等七个人追着退出来的一部分，打得十分激烈。天慢慢亮了，敌人看清楚我带的人不多，就想赶上来包围我们，把我们逼回场内去。我和夏林连忙靠住一道土坡，背对背，对着后面上来的几个家伙就是一阵打。正起劲，突然听见夏林的冲锋枪不响了，接着是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我没回头，大声问夏林你怎么了。夏林骂道：“他妈的，没子弹了……”

我一看天色大亮了，这仗是不能再打了，连忙一个点射打倒一个敌人，就叫夏林：“你赶快通知老唐他们撤出来。”正说着，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冲锋号，接着枪声四起，一个高大个子挥着枪指挥队伍冲了过来。夏林一愣，叫道是大哥和老金他们来了，几个同志一听，立即欢呼跃起迎了上去。只有我没动，一软身就靠在了土坡上。

玉璧听完我简单的汇报，指挥大家赶快结束战斗，立即撤离。然后用手指头点着我的鼻子，小声说：“你呀，胆子也太大了！要是我们来迟了半步，看你咋办！”

我一撇嘴说：“嘿嘿，我跟陈仁勇都算过命了，这一仗，顺天时，合地利，应人和，自有贵人相助，你会及时赶来的。”

虎口救人

界牌一仗，我们以少胜多，神出鬼没，确实把敌人打痛了。接下来我们把队伍化整为零，四处出击，声势造得很大，连一些绿林武装，也自称是华盖山廖大哥的队伍去打杨森。

屈元亮趁机找到夏炯，说：“你委我个空头司令，要人没有人。那些大地主们都被廖玉璧打怕了，谁也不来了。他们不来，我就没有枪，这一没人二没枪，三县联防的治安怎么搞？”正说着，徐清浦进来听见了，说：“屈司令你手中没有人，难道我手里就有人么？一个顺手的都没有，难怪从前的团务搞得不成样子，土匪成群，人心惶惶的。眼下乡绅们给我推荐了两个人……”说着当着夏炯的面，说出刘汉民和段前迪来。屈元亮说：“段前迪我倒不清楚，这刘汉民我熟，当初我们一起在何光烈名下干过，他是炮兵营长，打仗可行呢。就看夏师长的意思怎么样。”

夏炯才到这里不久，不熟悉地方上的事情，还不是听他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着急到处都在打，他这四面合围、分而治之的办法怎么就起不了作用。

屈元亮说：“夏师长，你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说。廖玉璧这个人，你不了解。那年军团冲突打罗泽洲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他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连我们这些专业军人都自愧不如，要不是当时有些土豪劣绅和土匪在里面扯拐，说不定他倒真可以拥兵自重，成就一番事业了呢。”

夏炯听了，沉吟不语。屈元亮说：“当然，按身份我是个军人，如今投

在你和杨军长名下，叫我打哪里，就是亲弟兄也不能推辞，常言道，慈不带兵嘛。可是要说私人感情，你和玉璧都是我的好朋友，两个都是要强的人，我看最好是不要互相为难。若是你有这个意思，廖玉璧那头我派人去说合，你呢也不要把愿许重了，就许他个三防副司令，在我名下，若有个什么不测，我来从中化解担待，你看怎么样？”夏炯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说：“恐怕不得行。听说他是个真资格的共产党，杨军长是最恨共产党的。再说共产党也不像我们收编的那些土匪队伍，不好笼络。”屈元亮说：“现在谁说得清楚谁是什么党？你没听说范绍增范傻儿在长寿办学校，十几岁的学生娃儿问他地球是圆的，人为什么不掉下去？他答不上来，一拍巴掌就骂那个学生娃是共产党！廖玉璧就是廖玉璧，他有本事，拖出了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四处的人都服他，又打富济贫深得人心。自古以来，对这样的人吃得掉就吃掉，吃不掉就要招安，否则要酿成心腹大患。你想想，杨军长现在一心盯着要参加刘湘、刘文辉两叔侄争地盘，他是想把实力保存下来占大头呢，还是想就在这华蓥山里不明不白地消耗掉？拿你来说，如果不消打仗就能保得这一方清静，又扩大自己的实力，你又何必去耗粮耗钱地费那个神？”

夏炯用手卡着下巴，许久才唔了一声，说：“像廖玉璧那样的人，上次我叫你去说，你都说他不愿意，现在未必就肯干么？”

元亮说：“那阵恐怕是担心他的实力不足，要不起价钱，反而被你吃掉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你放心，他是大学生，最终图的还不是个建功立业，有个正当名分！就像现在各派军阀队伍中的许多人一样，未必还山林草寇了此一生！清浦你也是大学生，还留过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一直没说话的徐清浦，在旁边点点头，说：“依我看嘛，这事还是要看师长的意见；师长若是点了头，元亮兄就去试试。说得成当然极好，夏师长你也用不着给屈司令派兵了；说不成嘛，就怪他自己不识相了，再打也不迟，先礼而后兵嘛。”

就这样，夏炯点了头。没几天，刘汉民和段前迪就到徐清浦手下报了到，一个当了县团练股长，一个当了庶务股长，把团练局的枪和钱都抓住了。夏炯哪里晓得，刘汉民就是刘铁，廖玉璧队伍中的刘政委，而段前迪也是岳池县的共产党员呢。

又过了几天，屈元亮找到夏炯，说：“廖玉璧那边回话了，要收编可以，三防副司令也没得意见，可是有一条，队伍不能改编，要保持原班人马，而且要拨出地盘来整顿队伍。”

夏炯听了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怎么行？”这话传了过来，玉璧听了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行就打嘛，打他个口服心服。”

于是四处又热热闹闹打了起来。敌人被打得火起，又抓不到我们，就故技重演，又把玉璧的母亲抓了去，关在广安城的监狱里。

玉璧听到这个消息，咬咬牙，没吱声。我连夜赶到广安，用钱买通了管狱婆，给她老人家买了些被子、衣服和吃的；又告诉她，现在杨森、夏炯不比当初江豪元、刘月波了，玉璧现在一时还不能来救她老人家，请她别着急。

母亲流着眼泪说：“屏儿，我晓得，玉璧不能来，你也莫来。我反正一把老骨头了，再随他们咋个办。你们的路还长，该咋走还是咋走。”

我听了母亲这话，再看看阴暗潮湿的牢房，觉得鼻子发酸，便转过头去，拿了几块钱给狱婆子，请她好生照看，将来还有重谢；然后给母亲深深

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玉璧咬着牙，拼命地找点子打仗，打敌人的卡子和驻防部队，常常拖着队伍一晚上跑几十百把里路。有一次，半下午才开饭，然后带了八十多个人，赶到一百多里路以外的广安观音阁，第二天上半夜回来，每个人身上都背了好几支枪。

大家打仗都起了瘾，听见打仗就来了精神。这天，徐清浦带信来，说何冬瓜何生带了一营人来阳合场，想在那里驻营，扎断我们下山的路。大家一听是这个第一次起义时的败类，一点没客气，在阳合场前面一个叫懒板凳的地方狠狠教训了他一顿，然后大摇大摆下了山，转移到合川的石龙场去了。

我带着小分队的同志们到罗渡溪，准备再到重庆去运一次枪弹。一到叔父开的饭馆里，就听见几个喝酒的客人正在扯开场子摆“飞毛腿巧打何冬瓜”的故事：说是何冬瓜的脚都被打跛了，还几乎被活捉了去，滑竿抬回来从罗渡溪过，惨兮兮的样子，街上的人都暗自好笑。那摆龙门阵的人摆着头很感慨的样子，说人家才十几个人打了他一营人，来无踪去无影的，你说那飞毛腿有多厉害，不晓得是哪条梁子上下来的好汉！

叔父一见我来了，连忙让进里屋，抿嘴笑着问我：“又是玉璧干的事吧？”

我也笑笑，问：“何以见得？”

叔父说：“人家不晓得，我还不清楚么？他人又高大，腿又长，他走一步，别人要走两步，他在前面慢慢走，我用跑步都跟不上。前年大年三十，他由重庆回来，二百二十里路，清早动的身，晚上还赶上我们家吃团年饭呢。只是这回何冬瓜没有服这口气，昨天他又带了兵从这里过，下巴昂起多高，说是要开进阳合场去大清乡。你晓得的，他和阳合场王尧那狗东西勾得紧，你要告诉玉璧和亮娃子，叫他们小心哟！”

叔父说的亮娃子，就是指陈亮佐，因为和我们家挂着近亲，全队只有他叫我三姐，叔父也特别关心一些。我不好告诉叔父队伍的行踪，只说是我们又不傻，等在阳合场挨打么？何冬瓜要清乡，就等他去清嘛，只是老百姓们又要遭殃了。正说着，朱老么气喘喘地跑了来，一见我就结结巴巴的，半天才说：“大姐，不好了，陈亮佐被敌人捉去了，今天上午遭的。”

我忙问：“是怎么遭的？人在哪里？”

“不晓得，听说在阳合场被何冬瓜的人捉到的。”

唉呀！落到这个死对头的手里，一定是凶多吉少了。亮佐已是我们很重要的干部，现在又身负重任，他可是万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我急得直跺脚：“你说清楚嘛，究竟是怎么回事？队伍都撤了，他还到阳合场去做什么？”

朱老么见我急成这个样子，忙说：“我也不清楚，大哥叫我赶快给你送个信，叫你一定拼命也要把人救出来。”

正在着急，夏林和金积成进来了，夹着个哭兮兮的亮佐的弟弟陈老二。我说：“你哭啥子，赶快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好商量个办法。”

陈老二抹了把眼泪，抽抽搭搭说了原由。

陈亮佐自从派到刁大哥的队伍里，工作很有起色，除了在界牌配合打了那个大胜仗之外，还在刁大哥所在的合川、武胜地区频频出击，搞得敌人也很头疼。本来按计划，他这几天要回山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可是我们打了何冬瓜之后，队伍撤到合川的石龙场去了；玉璧就让陈老二到刁仁义那里去一趟，叫陈亮佐别回山了，直接到石龙场碰头。陈老二叹口气说：“哪知

我到合川，会到刁大哥，就听说哥哥转阳合场去了。我急得要命，赶忙转身，本想对直去追哥哥，又怕廖大哥着急，恰好在路上碰着周癞子，我就给哥哥写了条子，叫他藏在衣角里，让哥哥快转来。谁知我回到石龙场，就听说我哥哥遭了……”

“周癞子回来没有？”

“就是没有。”

“哎呀，糟糕！”

同志们都气得说不出话来。既不晓得遭的原因，又一时想不出如何营救的办法。正在十分着急的时候，唐俊清又跑来了，眼眶红红的，见我就说：“大姐，陈亮佐被何冬瓜捉去了。听说明早上就地枪决。”

我头上像挨了一棒，看着屋子都像是在打转转，好容易镇静下来，问：“你怎么知道的？”

“马福林马大爷回来说的。”

“周癞子呢？”

“也遭了。”

“是怎么遭的？”

“周癞子到阳合场，满街找都没有看到陈亮佐，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的便衣侦探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买窑货的；问帮哪个买的，他说帮他的老板，罗渡溪的朱队长买的。

本来就没有事了，他不走，呆头呆脑的，提着衣裳角角，还在那里转。敌人就怀疑他，把他捉去，将衣服脱了，在灯下一照，就把信照了出来。敌人审问周癞子，他说是路上一个人给他的。以后敌人严刑拷问他，他还是没有说。敌人就将他押起，又派人到离阳合场五里路的地方，将陈亮佐捉住了……”

我们听了又气又急。周癞子太死心眼，没有人就该走嘛，呆头呆脑露了相。

陈老二捶着胸哭着说：“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叫周癞子去送信，是我害了哥哥，我该替他去死！”

金积成一跺脚，说：“莫说那些没出息的话！亮佐是我们一同起事的老同志了，哪能这么轻易死在他何冬瓜手里！我这就跑一趟，把队伍调回来，要不然，就我们这些人去劫法场！”

我摇摇头说：“你硬是个闯王，就晓得打！人家那么一大营人，我们这几个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若是真的用得着劫法场，你廖大哥他们自己就带人来了，还要我们在这里着急？”

大家不说话了，夏林在屋里走来走去，金积成双手抓着头发坐在小板凳上，唐俊清只叹气。朱老么一看这场景，急得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大姐，要赶快设法啊！”

我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是啊，是在设法啊……”

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各种方案。我想组织上既然叫我设法营救，一定是有什么线索，可是这线索到底在哪里呢？我见陈老二还在嚶嚶地哭，就说：“情况如此紧急，后悔着急都没有用，大家快想办法吧。老二，你哥哥在城里还有什么亲戚没有？”

陈老二哭着说：“有啥子亲戚啊！现在哪个还认你。”“你嫂嫂呢？她也出来打听一下嘛。”

“哎呀，你不要说她了，她一天只晓得做活路，带娃儿，是个用根棒棒也打不出两句话的老好人。她徐家娘屋里听说我哥当了共老二，还不让她回娘家呢。”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听他提起徐家，我心头突然一亮：徐清浦已接了团练局长，组织上叫我设法，恐怕就是指的这个路子。因为组织上派徐清浦打入敌人内部的事，是绝对秘密的，一般同志都不知道，玉璧没有说明，他一定想到我猜得着。我往桌子上一捶，大声地说：“有办法了！”

大家听说我有了办法，一个个把颈子伸得多长。我说：“城里新上任的团练局长是我的亲戚，我去找他。”夏林说：“好，马上进城。”

唐俊清旋风一般跑出去，片刻工夫就把滑竿收拾好了。我忙着到里屋去换装，穿了件白府绸的上衣，下面拴了条果绿色的裙子，又叫婶婶拿把剪刀三下两下修齐了短发，咋看上去就像城里读书回来的女学生。收拾停当出来，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可我一看天色都擦黑了，心里就冷了半截：“这里离县城还有八十里路，恐怕来不及了……”

唐俊清说：“啥子来不及！我们四个人，换班抬你，拼出命来也要救出人来。”说着不由分说，将我拉上滑竿，没等我坐稳就起了轿。

天快黑尽了，闷热得很，天边升起了一朵朵乌云，看样子要下大雨。路上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墨墨蚊一团一团地在路上飞来飞去，挡住我们的去路。夏林、金积成脱成了个光膀子，汗水像河沟里的水一样，沿着背心流。他们一手把着滑竿，一手甩得齐脊背高，张着嘴呼呼地出大气，后面唐俊清唐老六拿着衣服，一路小跑跟着。我直说：“夏林，让我下来走一截吧？”夏林累得话不成句地说：“不……不……救人……要……紧……”

就这样，八十里路，不过四个钟头就赶到了。走拢城门口，已经过了二更，城门关得紧紧的，怎么叫也没有应声。难道这唯一的一点希望，就被这该死的城门化为乌有，陈亮佐就这样白白地死了不成？我心头火起，拉开叫门的金积成，对着城门不顾一切地大喊道：“开开门！我要找你们团练局徐局长！”

这一喊，城门里果然有了响动。我掏出两个银元，从门缝里递给守城的卫兵，对他说：“请你带个口信给团练局长，说他的女儿从学校里回来了，路上因为轿夫生病，耽误了时间。”

那卫兵一见到白晃晃的银元，眼睛就亮了，连忙说：“好吧，你等一等。”

一个卫兵在城楼上用电筒乱照。我问他：“你照啥子？”“我看是不是……”

我说：“放规矩点，谨防背时！要认，喊你们局长来认。”

过了一会儿，徐清浦果然来了，后面跟了一个卫兵。他从城楼上往下一看，我立刻仰头叫他一声“爸爸”。

他惊了一下，我又喊一声：“爸爸，我回来了！”徐清浦醒了过来，马上说：“啊！快进来。”说着就走出城门，一见是我，还穿着一件白色上衣，一条绿色裙子，忍不住笑了。

我瞪了他一眼，让夏林他们在城外歇栈房，然后同徐清浦一道进城去了。

徐清浦把我引到一个旅馆里，对老板说：“这是我的女儿，刚由学校回来，在团练局不方便，暂时在你这里歇一夜。”

店老板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连忙给我安了一个上等房间。我同徐清

浦走了进去，一坐下他就问：“有啥子要紧事？”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要紧事，不会在深更半夜来找你。”接着就把陈亮佐被捕的事说了一遍，然后又对他说：“事情很严重，看你想什么办法营救。”

他马上焦急起来，两手不停地搓着，慢慢地说：“时间这样紧，想什么办法呢？”

我说：“明天早上陈亮佐就要遭枪决，是不是先把他们两个提到县城里来再想法子。”

我这一说提醒了他，他沉思半晌后说：“对，先把人从枪口下抢出来，再说下一步。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口供。”我说：“听说都没有口供。陈亮佐一身被打得稀烂了，周癞子也受了刑，都没有说。”

他说：“没有口供就好办，我马上给县长打电话，说这是一个要犯，叫何生解进城来问口供。”

我说：“这事要快，不然保不住。”

他说：“当然，我马上回去就办，明天清早来回信。”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我回忆起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一支由地主掌握的武装叛变，在投降敌人前，想打死玉璧去请功。一个深夜，玉璧查哨回来，在路上被叛徒打伤了，是陈亮佐背着他，在一个雪地的刺芭林里躲了两天两夜，最后才脱险上山。我又想起在山上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陈亮佐冒险去找粮食，替伤病员熬药，坚持晚上放哨……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年靠他的一个叔叔供养，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又考上师范学校，没有毕业就出来教书挣钱，养活一家五口。参加革命后，吃得苦，没私心，作战勇敢，办事稳重，上次打界牌若是没有他，我真的不晓得要撞出什么漏子。这样好的同志和兄弟，可千万不能……好容易我才迷糊了一会儿。朦朧中觉得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睁眼一看，天已蒙蒙亮，赶紧跳下床，把门打开，一看正是徐清浦。

徐清浦一进来，随手把门关上，然后说：“唉呀，好险好险。我回去摇电话，摇了三遍都不通，又亲自去找县长严定礼，知道何生送来一个呈文，说陈亮佐是共产党，要求明天就地枪决。”

“严定礼怎么说？”

“同意了。我看情况紧急，就对他说：对于共产党，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我们要从一个人身上了解线索，一网打尽。说了半天，县长才同意把他押进城来，起初说明天早上打电话，我说明天早晨人已经枪毙了，还有什么用？最后我把电话接通了，严定礼找何生讲了半天。何生不同意，他说陈亮佐是个要犯，怕廖玉璧带队伍在路上来抢人。严定礼也有点犹豫。我说叫他多派人押送，我也派队伍去接。这样，严定礼才叫他明早一定送进城来，现在问题不大了，放心吧！”

听到这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千斤大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出了城门，夏林他们早已在栈房外面等我了。徐清浦看看左右无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女儿，以后要注意，不要叫我爸爸，此地人要叫爹啊。”

我说：“现在我不是你的女儿了。”

徐清浦笑着说：“怎么？翻脸不认父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出了城，赶了三十里路，到了跳石桥，在一个饭馆里吃早饭。忽

然看见从场口进来二三十个敌兵，拥着一架滑竿，滑竿上绑着一个人，中间又押着一个人，一跛一跛地走着。

夏林说：“陈亮佐来了。”

陈亮佐脸朝下地绑在滑竿上，光光的背上烧起了血泡，听不见一声呻唤。周癞子上着五花大绑，还勉强一步一步地拐着走。我紧紧地看着，心里像刀刺一样的痛。

队伍走近了，我猛醒过来，叫大家都转过身来，警谨碰上了惹起麻烦。可是他们都像没听见，一个个用手摸着腰里揣着的枪，看着街上的敌兵一动也不动。

金积成恨恨地说：“妈的，这几个龟孙算得了啥，我们干掉他，把陈亮佐抢走算了。”

我生气了，低声说：“都给我转过身去，不准胡来！一切我都自有安排！”

大家默默地转过身来，听着身后的杂乱沉重的脚步慢慢走远了，我才松了口气。要抢人当然容易，可是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对徐清浦起疑心。我们打进去一个人不容易，暴露了会坏大事的，好在已经把人从枪口下救出来了，慢慢再想办法吧。

过了两天，周癞子释放回来了。陈亮佐在几次审讯中都没有口供，把死刑改为四年有期徒刑，收了监。

救了陈亮佐，我们又赶到重庆去运枪弹。这时候，四川军阀又开始混战，杨森卷入了刘湘和刘文辉的争战之中，把队伍开到川西资中一带去了，路上的警戒松了一些。我又带了厚礼，到重庆北碚拜见了袍哥大爷、当时的三防司令陈兴奇。陈兴奇佩服玉璧的为人胆识，拍着胸膛说要给沿路的毛毛土匪打招呼，为廖大嫂做“毛呢绸缎”的生意提供方便。这样加上我们一年多来所做的大量工作，由重庆到山上的水陆交通都基本上打通了。当然，后来陈兴奇也慢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个知书识理的年轻人靠拢我们，后来还入了党。

这次到重庆，接货很顺利。收拾停当，我叫夏林他们先回去，自己陪着两个孩子和曾三姐多玩了几天，一晃就过了中秋。这期间，听说红四方面军已从湘豫皖根据地往川北陕南移动。我们的人在川北各县越是打得起劲，不但打甘军的驻军哨卡，还打通风报信作恶多端的土豪。为了尽量争取当地的一般士绅，我们大家就交换着地区打。玉璧把队伍扯到大竹和渠县去打土豪，打得热火朝天。

待我回到山上，才知道形势已经半公开了。岳池、广安城里，一夜间就贴满了“打倒杨森”、“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连岳池城内县衙门的墙上，也贴满了捉拿杨森的“悬赏布告”，吓得县长严定礼每天半下午就关了城门，二更过后街上就不准人走动。我们又派了很多同志打入了敌人内部，有的在甘军中当了营长，有的甚至给夏炯作了副官，连县长严定礼的衙门里，也有我们的人。这样一来，我们的情报很灵通，敌人则处处被动。

屈元亮见时机差不多了，有一天就拿了一块江西苏维埃政府发的银元去见夏炯：“你看吧，当初我说去把廖玉璧拉过来你不干，还把人家老母亲抓来关起。现在听说红军要来，人家越是憋着气要报这个仇，连这种刻着镰刀斧头的银元都在广安、岳池流传起来了。唉，听说向廷瑞向司令也要到渠县营山去布防，我手头又没有兵力，团练局那几支破枪能顶什么用？要是二天廖玉璧和老百姓们联起手来，和红军来个里应外合，你咋个向军座交

代……”

夏炯半天没开腔，最后咬咬牙，同意谈判。于是由屈元亮出面，徐清浦又说动了县长严定礼和禁烟处处长尚贤生，给玉璧作保，作中人，约定夏炯和他的副旅长叶济，在岳池县府里进行谈判。

那天双方都没有带兵。谈判的结果，夏炯全部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委了玉璧作三防副司令，和屈元亮一起负责岳池、武胜、广安三县的治安联防。三防司令部设在河东五场之一的余家场，还把渠河两岸资马十二场重新划入我们的势力范围，甘军的哨卡全部撤除，由我们派人守卫。夏炯还专门划了粮库，拨了军粮，说好了不干涉我们的内政；而对我们的要求，则是保证三县境内平平安安，不给他找麻烦。玉璧谈判回来之后，立即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把岳池、武胜、广安、顺庆、合川的农民武装集聚在余家场附近的五个地方，分别由王道纯、刘昆仑、姚生荣、杜仁杰、周敬成等十个人负责。我们自己的基本队伍大部分驻在华蓥山上的各个庙子里，由谭之中等人负责，只调了一小部分到余家场，和刁仁义、罗平精的队伍会合。加上铜梁一个叫吴绍先的党员带来的五十多人，渠县唐虚谷带来的八十多人，还有大竹来的近百人，共一千多人，守卫在余家场。

就这样，三防司令部的牌子，正儿八经在余家场街上一座叫做楼外楼的大院子门口挂起来了。这座当地大地主的宅子，成了我们川北苏维埃政府的地下机关。玉璧、罗方域、罗平精、刁仁义几位领导在这里办公接待群众来访，唐俊清调来作机关的保卫工作，其余近千名队员分散在场内场外的老百姓家里。

不久，党的中心县委的同志来到余家场，召集岳池、广安、邻水、顺庆四个县的地下武装举行会议，确定当前的总方针是积极行动，打杨森，迎红军，还给我们送了一麻袋刻有镰刀斧头的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银元来，我们就拿它作为奖品奖励有功人员。我因为长期运枪弹没出过事，得了十个，当时惹得好多人眼馋。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的人都动起来了，队员们除了平时操练学习之外，还帮助老百姓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余家场的周围，俨然成了我们的“小苏区”，大家把自己编的迎红军的歌子都唱上了街，一批优秀的队员和骨干群众还入了党。其中一个姓罗的木匠，是我们地下苏维埃农会的主席。我们刚到余家场不久，一直抗拒我们的大地主吴老肥连夜收拾细软，要带老婆逃出去向夏炯告密，就是这个罗木匠带人捉住的。我们研究之后，觉得这吴老肥一直是我们的老对头，民愤又极大，这样的土豪劣绅老不打，以后我们的工作不好做。于是就开了个斗争诉苦会，群众扬眉吐气地斗地主，烧田契，然后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吴老肥枪毙了。

一天，屈元亮带信，把我和玉璧叫了去，一起在徐清浦家里研究工作。玉璧说：“我们在余家场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只是声势太大，各县来的队伍也渐渐在增多，夏炯恐怕早晚要察觉。我看等各路人马基本到齐了，我们就正式成立地下红军，等红军进了四川，就把旗帜亮出来，打它个首尾不相顾。”

屈元亮说：“我就是想商量这件事呢。向廷瑞的队伍正式开拔了，到渠县营山挡红军去了，岳池城里很空虚，广岳两地只有个夏炯守着。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乘机起事，攻下岳池，给红军作个见面礼。”大家议论了一下，都觉得这倒是个机会，就先把起义的时间定在年关前后。

屈元亮又说：“还有一件事，于公于私都很要紧，得赶紧办了才行。现

在看来，我们的时间很紧张，玉屏是不是要出个面，到广安去把你母亲接出来？”

玉璧听了，有些犹豫，说：“夏炯虽然同意收缩我们，但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有戒心的。现在余家场铺了这么大个摊子，下一步的准备工作又很紧张，我们手边正缺人，若是把玉屏也当成人质扣在广安，我们的工作更难开展。”屈元亮说：“如果你不去把母亲接出来，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我在夏炯面前多次说过，你本来无所谓什么党什么派的，就因为母亲被押进了监狱，才憋着一口气和他打。现在看来事情都化解了，你还不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让他生疑心，怀疑你别有所图，六亲不认了？”

清浦也说：“危险是有的，可是玉屏去了，名义上是救你母亲，实际上也是做给夏炯看，你廖玉璧的妻子都去见了夏炯，还是诚心诚意相信他的。”

元亮看玉璧还是拿不定主意，就说：“这样吧，我去找县长严定礼商量，他是夏炯的老部下，最好连他一起去，还拉上给你作保的那个禁烟处长尚贤生。我们都去给玉屏保镖，还可以再摸一下夏炯的态度。”

玉璧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也就同意了，只是叮嘱我，处处要小心。

第二天，由我出面、屈元亮作陪，办了一桌酒席，请来了县长严定礼和尚贤生。屈元亮向严定礼介绍说，这就是廖玉璧的夫人，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教书，最近专程回来办理她婆母的事情，请严县长从中玉成。

严定礼一听，连忙站了起来，拱着手直说幸会幸会，一边偷偷打量我的眼色。

大家又重新坐下。我说：“严县长，我这几年不在家乡，听说玉璧和政府之间多有些误会。可是我婆婆在家老老实实居家过日子，你们男人之间一旦有什么事就在妻儿老小身上做文章，我们可是冤枉得很咯！”

徐清浦给严定礼送了个鸡头，又给尚贤生送了块鸡腿，坐下来对我说：“大嫂，你莫生气，现在误会都解除了，廖大哥已经都成了我们的副司令了嘛，严县长会给你办理的。”

尚贤生也在一旁凑合，说：“应该放，当然应该放。”严定礼连忙说：“是的是的，我的确催问过这事，不信你问问尚处长，还有清浦！只是嘛，你母亲是夏师长关的，即使军部答应了，他夏炯不同意也不得行。这样吧，我就给夏师长修书一封，你拿了去找他，跟他求个情如何？”清浦说：“严兄，这恐怕不得行。俗话说打水要到井边，修书不如身到，你老兄最好亲自跑一趟。”

严定礼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我和屈元亮一早到了县衙，只见门口荷枪实弹站了一个排。屈元亮问这是干什么。严定礼斜了我一眼，说：“路上不大清静，带点人方便些。”

屈元亮听了，哈哈一笑，说：“县长真是谨慎，有我这个司令，还有副司令的夫人给你保镖，哪个敢来打扰？这一截截儿路都保不了险，还敢保三县的治安？”

严定礼尴尬地笑笑，和尚贤生一起带了随身的两个兵，与我们一起坐着滑竿上路了。

到了广安，天色已经不早了。严定礼说要到衙门里去歇，我和屈元亮

坚持在街上栈房里写了号。第二天一早，他们在一起商量，谁先去见夏炯。严定礼说：“屈司令，你和夏师长有交情，你去一定说得通。”屈元亮说：“不行，抓老太婆是县里出的面，人家廖大嫂先找到县里父母官，你再找上面，才合乎程序。”严定礼还要推辞，说：“夏师长脾气不大好，你们是同学，好说些。”屈元亮说：“我是他同学不假，可你长期作他的部下，若是不信任，咋会派你这个旅长到岳池来兼县太爷……”

我听得不耐烦，正色说道：“严县长，我求你帮个忙这么难么？我是犯人的媳妇都不怕，你是集军政于一身的大员，还怕什么？这样吧，请您和尚处长先走一趟，我坐在这里等你的消息；夏师长若是发了脾气，你们就带着大镣捉我进班房去，我一点也不会怪你们。”

严定礼和尚贤生面面相觑，最后一起去了。我问元亮怎么临阵怯场。他摇摇头说：“玉屏你不晓得，那夏炯脾气古怪，又生性多疑，风平浪静的，说翻脸就翻脸。余家场虽然离广安不近，可是最近闹得太红，要是夏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不是送进虎口里去了么？等他们去探探口气，也有个商量的余地。”

小晌午时分，严定礼和尚贤生来了，说：“夏师长要见见廖大嫂。”

元亮问：“你们是怎么对他说的？”

尚贤生说：“严县长说，脑壳都进去了，还留个耳朵做什么！人家廖大嫂亲自来了，说明相信你师长，有诚意的。若是我们再不放人，就怕廖玉璧要起二心，还给人家留下话柄。”屈元亮问：“你们还说了什么？”

尚贤生说：“还说你和廖大嫂晚一步才到。”

屈元亮又问：“夏师长怎么说的？”

他俩摇摇头，都说夏炯什么也没说。然后严定礼站起身来，一拱手说：“廖大嫂，我们的忙帮到这个地步，也算尽心了。今晚看你去跟夏师长怎么说，我们公务繁忙，就不奉陪了。”

严定礼他们回岳池了。我们捉摸了半天，也不晓得夏炯安的什么心肠，但是事情到这个份上，总得硬起头皮去见他。

冬天天气短，吃过晚饭，天就黑尽了。我仍旧教师打扮，和屈元亮一起去见夏炯。我们穿过一个军警林立的大院，来到后厅。元亮叫我站一站，自己先进去了。我四周看看，院子里黑森森的，只有一个哨兵在阶下一动不动地站着，枪刺上的寒光，冷浸浸地逼人。

一会儿，元亮出来，做了个手势，我便跟他进了客厅。夏炯穿着便装，见我进来，用一种犀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立即换上笑容，客气地让座叫茶。我也笑笑，欠身谢过了茶，就在楠木雕花的太师椅上坐下，没有言语。

屈元亮说了两句寒暄的话，就转入正题，说：“廖大嫂今天是特地为她婆母的事情，来求师长高抬贵手。”夏炯听了一笑，说：“廖大嫂，你别多心，这事都怪我一向太忙，忘了，明天叫他们把老人家送出来就是了。”屈元亮忙说：“就这么件小事，何必等到明天。”

师长你不知道，她在外面听到很多谣言，有人说她婆母受了刑，打断了腿，有的干脆说来迟了就见不到人了，把廖大嫂急得老远从梁山那边赶回来……”

夏炯听了这些话，又摇头又摆手，说：“那些都是乱说，我夏炯再下得手，也不犯于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出气。”说着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开口说：“廖大嫂……”

我微微欠起身子，说：“夏师长，我姓陈，陈玉屏。”夏炯一听：“哦？哦，陈老师，陈老师！听说陈老师出生于岳池县里的名门世家？”

我笑笑：“不敢说是名门，不过是多了几缕书香。母亲祖上，曾中过晚清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父亲这边，也还算是小县里的一支望族。”

夏炯一边听我说，一边点头：“我还听人说，陈老师年轻的时候，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名媛才女，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倾倒了这一方多少风流人物。”

我又笑笑：“夏师长言过了。其实那都是小城里那些没有见识的人编出来的流言。要说琴棋书画，这琴，我倒不会，棋也下得不好，不过是略知道些‘马走日、相飞田’而已。只是这书画，倒是一直爱好，教书之人生平淡，全靠它添些情趣。”

夏炯一听，立即来了兴头，站起身来连连说道：“好、好、好！我夏炯虽说是来此地不久，却对陈老师的画早有耳闻，不知道陈老师今天是否肯赏个面子，让我这行伍中人也开开眼界？来人！文房四宝侍候，为陈老师备案！”

不一会儿，画案便收拾出来。我站起身来，款款走上前去，用笔尖蘸蘸砚中的墨汁，问道：“不知道夏师长喜欢什么？”夏炯一挥手：“我们军旅中人，图的就是一份豪气，画个关羽张飞或者梁山水泊里的好汉，看你的方便！”我说：“夏师长，我们当年习画，不过花花草草，哪有闺阁女儿画那些舞枪弄棍的角色？这样吧，我想你们成年在外拼杀，图的还不是个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这就画一幅水墨牡丹，愿您前程似锦。”

说着，便饱蘸墨汁，或酣畅走笔，或细心点染，不一会儿便大功告成。夏炯在一旁看神了，伸手便要来揭画，我轻轻挡住，在画上落了款，放下笔，这才说：“夏师长，忙不得，这宣纸吃墨，得晾一晾才行。”

不知道这夏炯是真的懂点字画，还是在附庸风雅，不绝口地只是称赞我画得好，然后双方重新落座。夏炯话锋一转，突然说道：“听说你们武器很差，子弹也不够？回头我拨点款子去置办一些。现在局势乱得很，装备不齐怎么行。”我欠了欠身，很斯文地说：“夏师长，我这几年都在外面教书，跟廖玉璧连书信都少有往来，这次是为了婆婆的事情才赶回来，办完了就要回去上课。你们公务上的事情，还是直接找屈司令和廖玉璧谈谈才好。”

夏炯看了我一眼，笑着点点头，又扯了些闲话，然后一挥手叫来卫兵：“看我只顾了跟陈老师说话了，正事还没办呢。去，去把廖家老太太请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卫兵带着母亲进来了。老人家一见我，就眼泪汪汪地扑了过来。我连忙起身扶住，说：“妈妈，你快谢谢夏师长。玉璧现在和师长都是一家人了，叫我来接你回家的。”

母亲听了，看看我，又看看夏炯，一脸的疑惑。夏炯在一旁得意地点着头，说：“陈老师你看，老太太不是好好的吗？”我说了些道谢的话，就对屈元亮说：“屈司令，你和师长还有公事，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不料夏炯喊了声：“等等。”我一惊，回过头来，却见他叫过勤务兵，拿了二百块钱来，对我说：“陈老师，今天我们初次见面，多谢你的画了。这钱，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是给老太太补补身体；另外呢，外面的栈房不干净，你们今晚上就在这里安排了吧。”

我一听，松了口气，忙说：“不麻烦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把栈房订好了。”说着就扶着母亲出了大门，在街上拐角处叫了两乘滑竿，一口气抬到罗渡溪

一个亲戚家住下。

听说我走了之后，夏炯颌首不语，若有所思，最后长叹一声说：“没想到啸聚山林的廖玉璧，娶了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看来此地民间关于她舞枪弄炮的那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了。”

屈元亮后来说起这件事，还直摇头说：“简直是到老虎口边去办交涉。亏得玉璧稳得起，要不然别说是救老太太，只怕是她自己也走不了路的。”

风云突变

从广安救了母亲回来，我又到重庆去运了一趟枪弹，因为路上受了些风寒，一回余家场就病倒了。这天已经是腊月初四，夏炯的一个参谋长结婚，派人送来了请帖。罗平精见了很高兴，说我们该去吃喜酒咯。刁仁义刁大哥在一旁没开腔，玉璧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最好莫去惹事。我们派人送份厚礼去，就说改天再去祝贺。”初五，我烧得厉害。玉璧很着急，要我到元亮家去养病，说他那里清静些，屈大嫂也好照看一下。

我说：“没关系，是太累了，歇两天吃两剂药就好了。”玉璧有些着急地说：“最近有些情况你不晓得，夏炯对我们的意图可能察觉了，昨天请我去吃喜酒说不定就是试探。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们要提前起事，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够留在队伍里？”正说着，屈元亮和刁仁义的女人都来了，是听说我病了，专门来照看的。玉璧松了口气，说那也好，转身又忙他的去了。屈大嫂和刁大嫂围着我转来转去，我吃了两副药，又喝了点稀饭，昏沉沉地睡了两天，觉得好多了。

腊月初七的晚上，已经打过了十二点，组织上派段前迪同志送来两份党的重要文件：一份是党中央的政策指示，用白连贰纸石印，字极小，四寸长三寸宽的样子，有六七页；另一份是组织上给玉璧的密令，指示迅速整训好队伍，作好准备，以配合徐向前司令对通、南、巴的进攻。

第二天中午，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玉璧正在拿着昨晚段前迪送来的文件看，忽然一个人气喘喘地跑来说：“城里变了！”

玉璧吃了一惊，手上的文件一下掉在桌子上。

“大哥，真的变了！屈元亮险些被捉，已经跳城墙跑了。他身边的几十个人全被抓了。”

玉璧站起来，两手撑着桌子，望着对面的那张作战地图。这时又跑来一个人说：“大哥，事情不好！徐清浦叫我送信来，昨晚上城里抓了几百人。现在夏炯、罗润德带了四千多人，马上就到。”

“马上集合。”玉璧叫我赶快收拾好东西，又把文件交给我，就出去了。

立刻，军号声哨子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余家场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知道大祸要临头了，都惊慌起来，痛哭流涕地跑来送行。玉璧把队伍集合在场口的一个坝子里，站上一个土堆说：“弟兄们！现在敌人已经从城里出发了，想一网把我们打尽。我们目前准备不够，粮弹缺乏，不能同敌人硬拼，要暂时撤回山去，再找机会狠狠地打敌人。弟兄们！赶快回去把住地打扫干净，不要留一点痕迹，以免老百姓遭害……”

弟兄们回到驻地，急忙地收拾行李，打扫院坝，归还借老百姓的东西。忽然，我们的警炮响了三下，顿时枪声四起，敌人已经赶到了。我连忙和屈大嫂、刁大嫂一起，由八个战士护着，随着队伍往外冲，跑着跑着，就和队伍冲散了。我病还没全好，这一跑一急，就直冒虚汗，脸色苍白，靠着屈大嫂只是喘气。刁大嫂急得不得了，带着哭声说：“大姐，我们冲不出去就回去。他杀人总杀不完，男人们做的事和我们女人有什么关系……”

我四处看看，队伍已经走得很远了，枪声也渐渐稀疏，已听得见敌人吆喝老百姓回去的声音，看样子是跑不出去了。我再看看手里的两支枪，子弹也打完了，只好由屈大嫂、刁大嫂扶着，转回去在后街上一家老百姓家里藏了起来。屋里的人都跑光了，一锅饭焖在锅里，发出一阵阵香气。我四下看了看，将我的两支手枪和川陕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二百元纸币，放在床底下的一口烂铁锅里，然后叫屈大嫂和刁大嫂到楼上藏好，自己也找了地方藏了起来。

半下午了，街上只听到一声声零落的枪响，敌兵开始搜索了。一批走了二批又来，在楼上搜出屈大嫂，一脚将她踢下楼来。屈大嫂滚在地上，口里鲜血直流，两个敌兵伸手在她身上乱摸。我实在忍不住了，从灶屋里走出来，大喊一声：“不准动手动脚的！”

那几个敌兵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这屋子的主人。”

这时候，几个敌兵不知从哪里拉来一个老太婆，指着我们问她认不认识。

老太婆看看我，又看看屈大嫂，一时愣在那里。这时候，刁大嫂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下子跪在老太婆面前大声哭喊：“妈，我是你的媳妇呀，你跟他们说，我是你的媳妇……”

老太婆扶起刁大嫂，点了点头。那些敌兵转过头来，盯住我和屈大嫂，两把雪亮的刺刀顶住了我的胸膛。我用手一挡，手上立即被划开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一个敌兵说你恶呢，抽出通枪的铁条子就向我打来。另一个领头的一挥手，说：“给我检查。”两个兵挽起袖子就要上来。我两手一推，说声莫忙，接着就自己动手，解开棉袄，敞开衣服说：“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姊妹，你们看可以，不能动手脚，我一没有银子钱，二没有违禁物。看嘛，检查什么？”

几个兵你看我我看你的，没有人敢上来。那领头的说：“这两个婆娘恐怕不简单，押到罗旅长那里去！”说着就先出门走了。我掠了下头发，趁机转过头看看刁大嫂，又看看床底下。她憋住哭声，微微地点着头。

我们被押到楼外楼我和玉璧住房兼办公的那间屋，一进门就看见肖心如毕恭毕敬地站在屋里，绑都没绑，当时心里就格瞪地一下子。听唐俊清说，这人是队伍到了余家场才参的军，先在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因为他吊儿郎当，表现不大好，就下到支队里去了。看他这样子，莫不是出了问题。

正想着，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转过头来。我一看，那人被大烟熏得黄泡肿脸的，一口黄牙，还安了两颗金牙巴，一对耗子眼睛，总是偏着脑壳偷着望人。

他一见我就死死盯住，问这问那的。一个敌兵说搞不清楚，这个女人歪得很。

肖心如立即弯下腰去，在他耳边说：“旅长，她姓陈，陈玉屏，廖玉璧

的女人。”

罗润德贼眉贼眼地向我打量了一番，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说：“啊，是廖大嫂，请坐，请坐。”他又指着屈大嫂问肖心如：“这位是谁？”

“屈元亮的女人。”

“哼，跑了男的，捉到女的。”

一个兵走进来对他说：“旅长，外边营长有要事找你。”罗润德站起来，死死盯住我说：“我马上就来，先把她们带到关帝庙去。”

我们被押到了关帝庙，看见上殿下殿关了三四百人，老头、妇女、年轻人、小孩都坐在地下。外面飘着雪，天气很冷，一个老头子就把殿上的菩萨打来烧火烤，一边打一边骂：“谁说菩萨保佑，放他妈的屁。老子几十年来向它磕头，脑壳都磕肿了，还是穷，还是受气。妈的，我早就想把这个庙烧了，来，打！都打了，我心头才舒服……”

一下子，庙上的“二十八宿”都打烂了。庙内升起了浓浓的烟雾，烟气呛人。那个老头子见我和屈大嫂坐在冰冷的地上，冷得发抖，就招呼我们坐过来点，好烤火。我们坐了过去。老人往火里添着柴棍子，叹口气说：“这年成，太不像话。他妈的，把青杠木当成泡桐树来整。这么好的队伍，说是共老二，是匪，要撵走。他们正派？正派个s*！到处杀人放火，抢女人……”

旁边一个老头也说：“李老头，我一篮子油炸麻花，也被那些穿二尺五戴乌龟壳壳的抢去吃完了，一个钱不给。我说了两句，就说我‘通共匪’。我不晓得啥子叫共匪，我只看见他们戴乌龟壳壳的，到处抢人。”

我看四周都站着敌兵，就说：“老大爷，你们少说一句，谨防吃亏。”

“怕啥子？我还要说，人家自卫军的人借了一根线都要还，杨森的队伍一来，见东西就抢，到底谁是匪？”

一个敌兵走过来，大声说：“不准闹不准闹！”那个李老头又站起来说：“要说，怎样？你拿针来给老子把嘴巴缝起来？”

下面的人见我们上面闹哄哄的，又烧了一堆堆的火，都走了过来，围着烤火，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时，人群中出来一个女人，走拢来悄悄问：“陈先生，你怎么没走？”我看是我们机关包饭馆的老板娘，就说：“生病，往哪里走。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哼，他们说通共，把我拉来的。我不懂啥子‘共’，只晓得他们一拢，就翻箱倒柜地乱抢，把老娘的一对陪嫁瓷坛都抢走了。他们才是‘老二’。”

我轻轻地问她：“你的老板呢？”

她看了周围一眼，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走了。”我说：“那就好，你不要乱说啊！”

她把嘴一撇：“我一个老娘，怕他什么？”

一个卫兵进来找到我，说罗旅长有请，然后把我带到罗润德住的房间里。屋里放了一个行军床，床上放了一床锦缎的被盖；侧边有一个网篮，篮里尽是些酒瓶子、罐头、画报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床边一个小木凳子，歪斜地摆着。罗润德一看见我进去，只是嬉皮笑脸地打招呼，拍着床沿让我坐。我一手把小凳子拖过来，背朝着他坐着。

罗润德说：“廖大嫂，你不要着急，岳池夏师长来电话，决定要放你。”

“放不放随便你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要你……”他离开床边，走到我的面前继续说：“夏师长说，只要你说出你们下面哪些是共产党，就放你。”

我说：“我是在梁山教书，为了母亲无故被关的事才回来的。这次才来余家场几天，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丈夫可是‘共匪’的头子！”我听见他说“共匪”二字，心头一股股的火直往上冒，说：“什么共匪不共匪，我只知道他是杨森委的三防司令。”“哼，三防司令？明明是想骗我们的人和枪来打我们，想得倒周到，我们的军长没有这样蠢。”

我不开腔。

“好，好，不谈这个。我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楼外楼。”

“你认得哪些人？”

“我才来几天，只认识我丈夫。”

罗润德呼呼地出了两口气，瞪了我两眼，把门外的肖心如叫进来，问他：“她是不是才到这场上来？”肖心如对罗润德说：“她是才来，她在害病。”罗润德又问我：“你不晓得其他情况，经常到廖玉璧那里去的人你总认识。”

我说：“在他那里一天是进的千千，出的万万，我怎么认识？”

罗润德刷的站了起来，气呼呼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愣眉愣眼站在我面前，从牙缝里挤出两句话来：“你……你……你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一下站起来说：“我比你清楚。”

正在这时，一个兵在门外喊：“报告！”

罗润德说：“进来。”

那个兵进得房来，向罗润德立正说：“报告旅长，廖玉璧的人正在文昌寨造饭。”

罗润德命令道：“立即集合，追！”

那兵出去以后，军号立即“哒哒哒”地吹了起来，罗润德亲自带了两团人去追赶。临出门了，他又把脑袋伸进来说：“廖大嫂，识时务者为人杰，廖玉璧跑不脱咯……我走了，你就在我的床上睡。”

夜深了，寒风在窗外呼呼地吹。我在小凳子上坐着，心里焦急得很。玉璧他们怎么样了？不会被敌人追上吧？忽然想起还有两份文件揣在汗衣的小荷包里，现在不毁掉，敌人发现了，不但对自己不利，也会给组织上带来很大的损失。我看看门外的守兵，把文件掏出一份来，喂在口里，嚼烂吞进肚里，再吃第二份。可是胃里翻滚得难受，实在吞不下去了，我就把文件悄悄吐在手里，搓成一团，然后往外走。卫兵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吐。守兵就把我带到厕所，监视着。病还没好，天气又冷，刚吞下的文件连同昨天吃的稀饭，一齐吐在厕所里，顺势把手心的文件再嚼烂，扔进粪坑，心里才稍微安稳些。

文昌寨离余家场只有二十里路光景。天亮时，罗润德转来了，一进屋就怒气冲冲的高叫着：“他妈的，给老子谎报！把报的人捉起来，枪毙！天气这么冷，让老子挨了一夜的冻。”然后，他又出去问一个营长：“你说，他们会朝什么方向跑呢？在文昌寨问老百姓，都说一个也没有看见。”

那营长说：“我看总是没跑远，不然就是上华蓥山了。我们昨天追赶时，听见廖玉璧的队伍在吼：有胆量的，上华蓥山！我看上山的成分居多。”

罗润德说：“上什么华蓥山，冰天雪地，他们就不怕冻了？”

你看，我们一来，他们就跑了，经不起打嘛！”那营长说：“罗旅长，话不能这么说，在广安桂花场我们就吃了大亏。”

“那是林向侯那草包大意嘛！罗营长，我们的队伍在附近分散驻下，把步哨放远点。廖玉璧的诡计多得很，凡是来往行人，都必须严格检查……”

罗润德把营长打发走了，一进屋来就同我胡扯，说：廖玉璧是个亡命之徒，他的队伍是些乌合之众，我已派兵追击，要不了几天就会捉来杀头，你跟着他没有好下场。你不要走，做我的秘书，我保你做岳池女中校长……我没有理他，心想真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

“你这样年轻漂亮，又有才学，真是啊，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我闭上眼还是不理他。

他嬉皮笑脸地把头伸过来，说：“有啥关系嘛，共产党，共产共妻。”

我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气极地说：“那你不共你的么妹？”

他退了两步，说：“你……你……你，我要杀你的头！”“我现在好似你砧板上的肉，横切也好，顺切也好，枪毙杀头，随你的便。我头可断，志不可灭。”

罗润德被我这一骂，气得直在屋子里打转转：“好！你不识抬举，你还硬，看你硬到什么时候。刚才接到师长的电话，说廖玉璧已经全军覆没，你还不死心。来人！”

几个兵站在门口，罗润德瞪了我一眼，大大地出了一口气，说：“去把关着的人，通通提出来审问，把那些通共的通通枪毙。”

不一会儿，罗润德走到隔壁的房子里，一阵阵鞭打声和惊呼呐喊的惨叫声就传了过来，又听到罗润德说：“把那老头子吊上去。”接着就听见刚才那个李老汉的声音：“你们这些畜牲，要我的命，就把我枪毙算了！”

只听罗润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要枪毙你还不简单？我问你，你院子里扎的什么人？什么队伍？”

“我院子里扎的是三防司令，没有抢人，好得很。”“你认得哪些？”

“军队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认得？”

“有多少人？”

“人多得很，到处都是人。”

“哼，妈的，不打不招，给我吊。”又听见一阵“哎哟”的惨叫声，一下就没有声音了，只听见一个人在喊“松下来，松下来”。过了一阵，又听见李老汉微弱的声音在说：“你们吊死我还是这样。三防司令是你们派来的，没有抢人，不是匪。”“你是不是共产党？”

“啥子党，我不懂，我几十岁了，世世代代都是做庄稼。

你们说他们是共产党，杀人放火，我没有看见。”

罗润德又叫吊上另一个老头，那老头惊叫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于是罗润德狂叫：“拿火来，烧八团花！”

不一会儿，听见香火在老人背上烧得吱吱的响声，一阵肉焦的气味穿进我的心。我跳了起来，冲到门口，被守兵挡了进来。我用拳头捶着门板大声喊：“你们……总有一天……”

以后，我又听到吊打了很多，除了“不知道”而外，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罗润德又叫人把肖心如叫来，软板凳上一压杠子，他就像猪一样嚎叫起来：“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罗润德问他：“谁是共产党，说了要钱做官都行。不说，就要你的命。”

肖心如一口咬出了六七十个名字，我们党的好多负责同志他都说了。我在这边听着，气得巴不得一枪打死他，不断地骂着：“叛徒，叛徒！”

罗润德又问他：“这里的机关叫啥名字？”

“华蓥苏维埃政府。”

“有多少人？”

“一两千。”

然后，罗润德把关着的老百姓叫了一些来，问认不认得肖心如供出来的人，老百姓个个都说不认识。肖心如着急了，大声说：“王老板你不认识呀？那天我们去你的茶馆里吃茶，对面那个就是廖玉璧，我左边那个就是罗平精……”那茶馆老板说：“有良心的人就不会乱咬人害人。你是哪个？我连你也不认识。”

我双手捏着拳头在屋里走来走去，心想我们受苦受累就是死了，也不能让老百姓受活罪啊，总得想个办法把老百姓救出去才行。正想着，罗润德进来了。他卷着袖子，手里拿根皮鞭，黄泡皮肿的脸上显出条条血丝，活像一个从屠场里下来的屠夫，一下子倒在行军床上，对士兵说：“网篮里有酒，弄点菜来！”

罗润德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着鸡腿，坐在床上，背靠墙壁边喝酒边啃鸡腿，还眯着眼，听着隔壁老百姓的惨叫声，不时点点头。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早已气得头昏脑胀，转身就往外走。他连忙跳下床来拉住我。我转过身来，一掌掀了他个四脚朝天。

罗润德没防到我这么大的劲，指着我说：“你你你……”我双手一抱，倚在门边，说：“我怎么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像你，抓不住廖玉璧就拿老百姓出气！你把老百姓都放了，有天大的事情，我陈玉屏一个人顶。”罗润德听我这一说，从地下爬起来，埋着头想了好一阵。也许是捉来的老百姓，整了一晚上也没问出名堂；也许是那么多人，关着倒要人守，要饭吃，反而增加他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放了那些没用的，抓住我这个有用的，说不定就名利双收呢。他喊进两个士兵来，说：“你们都别闹了，劳神费力的！看在廖大嫂说情的份上，把他们全都放了！叫他们快滚！”

就在那天晚上，捉来的几百老百姓都放了，屈大嫂也混了出去。想到临死前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我心中安稳多了。

接下来，罗润德叫来一个老太婆，把我带到她家里，后面跟着两个兵。她弄好了饭，叫我吃，我不吃。她说：“这是我家的，不是罗旅长的。”我才喝了一碗米汤。老太婆说：“罗旅长叫我来劝劝你，说只要你承认他的要求，他就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我问什么要求。

“就是要你同廖玉璧离婚，跟他当小老婆。”

“你告诉他，说我吃素，吃长素，要我重新嫁人，万万不能。”

老太婆很感慨地说：“对，对，你是我们陈家的好女儿，有出息，有出息。我去给罗旅长说，劝一个吃素的人开斋是有大罪的。”

陈老太婆把我送回罗润德屋里。罗润德摆了一大桌菜等着，见我去了，忙从网篮里拿出了茅台酒和葡萄酒。我看也不看他一眼。他见我敬菜不吃，敬酒不喝，问话不答，又露出了他那副凶相，说：“不要不知好歹，先前隔壁的情况，你没有看到也听到了，没有拿刑罚给你受，就是把你当人。你要放人，老百姓都放了，这都是赏你的面子。廖大嫂，识相点，这样下去，对你没有好处……”

“随便你，一死了之。”

他敲着桌子磨了半天，突然说：“好，好！不谈这个了。我这次全旅人开来打廖玉璧，子弹打得太多，还有邻水界牌那一营人的枪也是廖玉璧缴的，只要他赔我三万元的损失费，我就放你。”

我说：“放不放随你，赔不赔与我无关。不过我要告诉你，廖玉璧的家产早已卖光，我则是以教书为生。谁不晓得教书教书，十年不富，一日不教书，就要饿肚，我想捏三万个泥巴坨给你，连泥巴都不是我的……”

罗润德听了，气得脸红筋涨，一歪一歪地只是灌酒。

我被押到隔壁的一间屋里。天快亮的时候，对门罗润德的屋子里电话铃不断地响，我只听到他的声音：“是，是，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我想：这时候来电话，一定有要紧的事。说不定见我软硬不吃，要拿我祭刀了。

果然，天一亮，一个兵来押我走。我问到哪里去，那个兵说进城。我说：“去对你们的旅长说，我有病，你们又把我打伤了，走不动，要枪毙就地枪毙！”

罗润德走出来了，笑嘻嘻地说：“枪毙什么呀！今天一早来电话，夏师长提你进城，走不动，就用我的轿子抬。”

同我一道押进城的，只有一个误当作刁大嫂的江胡氏两娘母和叛徒肖心如。

我坐着罗润德的四人大轿，门帘子遮得紧紧的，后面跟着荷枪实弹的一连人。我坐在轿子里，一点劲也没有，昏沉沉的，却又睡不着。想到革命还没成功，想到玉璧和同志们安全，想到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没了妈妈，今后托谁照顾……轿子走到石埡场歇气，几个无赖围过来，其中一个伸手来扯轿帘子，说：“我们来看看，共老二的老婆是个啥样子？”

我气极了，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看你祖先人！”那家伙捂着脸，连忙退出去，说：“好歪好歪！”一个兵瞪了他一眼：“自找的！莫说是你，我们旅长还挨了她的耳光呢。”

晚上，进城了，两个士兵扶着我，说是到师部去，却往后山走。后山下面，是个大操坝，远远看去，黑压压地一坝人，荷枪实弹的士兵围着操坝站了一圈，个个枪都上了雪亮的刺刀。几个士兵横着枪，把跟在我后面的一大群人拦住，说：“挤什么挤什么，也想去挨枪子么？”

我一听，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停下脚来，使劲把两只胳膊从士兵手里抽出来。两个兵问：“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自己走！”说着不知怎么一下子来了精神，挺起胸膛，一步一步走进了操坝。

偌大的一个操坝，顿时静了下来。人群中开始了涌动，从小到大，到大起大落。涌到我跟前的人们停住了，又悄悄地往后退，后面的人又一潮潮地涌了上来……我看见那些士兵横着枪，拼命地张大嘴在吼，也看见人群中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挥着手在向我喊。可是我却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这汹涌的人的浪潮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突然想起那年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梁山去教书，玉璧随着小船送我。天气很好，两只阳雀相逐，叫得婉悠悠的。玉璧把我拥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说他这辈子要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只是要连累我和孩子们了。我说我也是入了党宣了誓的，这条路，我也要走到底。我们走不完，还有孩子们，我们子子孙孙跟他们斗，看谁斗得过谁！

现在，我正走在生命的最后路程，前面不远，就是我生命的尽头。我

看看四周，看着这退下去又涌上来的人潮，看着那些荷枪实弹声嘶力竭的士兵们，还有那些寒光逼人的刺刀，不禁笑了笑。我陈玉屏，一无顶天立地之躯，二无经天纬地之才，不过当年闺阁中一个习书绘画的弱女子；这些年和那些置天下黎民于水火之中的军阀们东拼西战，文也斗过了，武也斗过了，没想到他们大都败在了我的手下。如今，又设了这么大的阵势来送我，人生能够如此，值得！想到这里，我真想仰天大笑，想大喊一声：“我的玉璧和孩子们，记住我们那次在船上说的话，看我们和他们，谁斗得过谁……”

我继续往前走，只见土台上站出一个人来，对我喊了声站住，接着把手一扬，阴惨惨的号声就响了起来，是杀人号。我转过头去，黄昏暮色中，看清了那个扬手的人正是夏炯。一个提手枪的兵拉过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和我并肩一排；那人还没站稳，就哼哼地软成一摊，听声音就知道是今天和我一起押进城来的肖心如。那个兵见他瘫在地上，又跑上来提着他的衣领，喊他跪好，摆了好一阵他才跪稳了；那兵接着转过脸来，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跪下！”

我看了他一眼，没动，只是把胸膛挺了挺。

那个兵愣了一下，转身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两声枪响，肖心如哼都没哼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又是那个兵跑了过来，大声叫我跪下。我瞪了他一眼，恨恨地说：“要打就打，下跪不行！”说完又昂着头站在那里。

不一会儿，又是一声枪响，肖心如抖动了一下。接着听见一个声音长吆吆地喊：“带廖大嫂进去！”

另一个兵走上来，抓住我的手膀子往外走，悄悄地问我：“你吓倒没有？”

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是绑我来陪杀场的！这些混帐东西！！

三堂会审

我被带到夏炯的师部，押进一间小房子。一眼就看见县委的刘铁、金华新、段前迪和另外几个人，都用五花大绑绑着，金华新和段前迪脸都是肿的。他们见我进来，都吃了一惊，我只是微微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再扭头一看，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清浦的前任团练局长罗洪明，鼻子里出着粗气；再一个是教育局长陈建秋，垂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江胡氏还有她的小女儿被一个弁兵押着，收进了女监。那弁兵把我交给狱婆，说了声：“好生照顾，你们要钱，以后晓得。”然后转身就走。

我连忙转过头去，只看见他瘦瘦的一个背影。

这弁兵的话，显然起了作用，狱婆收起了要去开门的钥匙，带我走过了那间闹哄哄的大屋，进了旁边的一个小间。这小间也关了五六个女犯，只有两个床，地上连草都没有。狱婆说监狱里有铺盖，可以用钱去租的。可是我们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就只有背靠背地在床边上坐着。江胡氏把她不满五岁的女儿用衣服包着，紧紧地抱在怀里。

夜又来了。牢房里跳蚤虱子多得串起串，咬得我全身奇痒。墙外的寒风一阵阵刮过，呜呜地作响。我手脚冰凉，思想却像脱缰的野马，漫无边际地奔驰……此时玉璧，正在山上查哨吧？金积成和夏林一定在商量，又要去偷袭敌人哪里的营房……是谁出卖了组织呢？金华新、刘铁他们怎么也……就这样恍恍惚惚的，到了下半夜，突然一个女人翻身坐起来，哭叫着“报仇啊！我要报仇啊！”我一惊，立即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眼前一黑，就从床沿上栽了下去……等我醒来，牢房里已是一片混乱。江胡氏紧紧把我抱在自己怀里，轻轻地哭喊着：“大嫂呀，你不能这样啊，你还有好多事要做啊！”我勉强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听见旁边有一个很浑浊的声音在说：“醒了么？过来吃口鸦片吧，吃一口就会好的。”

牢门哗哗地一阵响，管狱婆进来了，边走边在吼：“闹啥子闹啥子嘛，深更半夜的！”旁边有人说：“新收进来的，倒了，要点开水。”

管狱婆听了，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一会儿便提了开水来。有人把破碗里鬼火一样的桐油灯拨亮了，我喝了一口热开水，心头好受一些，就靠着江胡氏坐着。管狱婆拿着灯碗照照我，见我脸色苍白，直冒虚汗，就问江胡氏：“这位陈先生，是啥子罪？”

不等江胡氏开口，就有人在旁边说：“啥子罪？真正有罪的，会进这里来么？看这年纪，早该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总是心头着急嘛。”

江胡氏点点头说：“是的，她又在害病，四五天没吃东西了。”

管狱婆长叹一声说：“陈先生，我看你是个斯文人。这年月要想开点，万事都急不得的。你倒是进来了，不晓得外面闹得何等地糟糕。初八那天，城里上上下下逮了好几百人，南街、东门、北门那一带，砍死那么多，到今天尸首都没有收得完。你想想，你好歹还有条命，只要想办法，还能活着出去嘛……”

管狱婆还在那里罗嗦，我心里一阵发紧，又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在黑暗中，横七竖八全是那些没有人收殓的血淋淋的尸首。

天亮以后，管狱婆送饭来了，见我醒了，又挨过来坐下，轻轻地说：“陈先生，你好些么？我虽然婆家姓袁，娘屋里也姓陈，说起来都是一家人，有啥事你尽管说就是。看你病成这个样子，我去给你找医生看看吧？”

我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袁大娘，不用看，过两天会好的。”

她说：“那，我去给你买只鸡，炖了补一下吧？”我说：“我吃素，吃长素，不吃鸡。”

她点点头，说：“我也吃长素，那我去给你熬点冬苋菜稀饭吃。”

过了一阵，稀饭送来了。江胡氏端着碗，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想起她昨晚上的话，咬咬牙坐起来，勉强吃了一碗，心里熨帖多了。我谢过了袁大娘，心想这狱婆对我这样好，一定是因为那个弁兵打了招呼，可是那天我连他的脸都没看清楚。这弁兵是谁呢？

养了几天，自己觉得好多了，这才开始熟悉周围的环境。这是座和衙门一起修建的旧城监牢，和大堂正成一个直角，靠在前头的女监连大堂上审犯人的呵斥声都听得很清楚。牢房里四周高高的烽火墙一直接到房顶，终年四季一片漆黑，只有门上一个小风洞开着，那个洞仅容得下半张脸。从洞口望出去，外面有个小天井，放风的时候犯人就在这走道上和小天井里活动。

川北的冬天，常常是雨雪交加。外面一下雨，牢里就返潮，湿得不得了，听说春夏天还会长出菌子来。冬天屋里一阴湿，越是冷，可是牢房里的

人越关越多，后进来的人不但没床，连草都没有一根，就在地上坐着，冷得发抖。狱婆狱卒见了，就来告诉你说监里可以租铺盖，还开得有如当铺，于是犯人们就搜尽自己身上值钱的或者是一时用不着的东西低价当了，去租了脏兮兮的棉被来。监里的饭食也一定要在这昏暗的牢房里才吃得下去，里面的沙石杂物多得很，偶尔还会吃出虫子或小孩子的鞋袜之类的东西。每人每天十六两囚粮，发到牢里就只十四两，典狱官再扣一层，即使你吃得下也吃不饱。当然，也可以叫狱婆帮忙到外面买来吃或到馆子里吃包月，还可以像住栈房一样去住单间牢房，可是那都需要钱，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好说。我和江湖氏都是两手空空，还带着个孩子，尽管狱婆子袁大娘很殷勤，可是也不知道她和那个弁兵安的什么心肠，我们只是每顿向她要点开水，把饭淘一下再吃。

牢房里每天晚饭后要放风一次，难友们都要出去换换空气。这天我人不大舒服，还没有收风就进来了，刚躺在床上，就听见隔壁男监一个人悄悄在喊：“三姐，三姐。”这声音像很熟悉，但又听不清楚。是谁呢？我正在猜想，就看见墙上一根香火棍伸过来，我这才发现墙上原来有个小洞，连忙走到墙边，对着那个小洞细声地问：“你是谁呀？”那声音说：“陈亮佐。”

啊，陈亮佐，原来是陈亮佐！我真是又惊又喜，连忙靠着墙洞问：“亮佐，你怎么样？你刘大哥呢？还有金华新和老段他们怎么了？”

陈亮佐说：“他们都很好，这事是叛徒咬的，可是那家伙只知道名字不认识人，让夏炯一气之下砍了。现在没有人证，刘大哥叫我转告你，不要着急。那天叫你陪杀场，是敌人对你的恐吓，要沉得住气，要小心，说话要谨慎。”我说：“这个我知道，就是不了解情况，让人很恼火。”他说：“以后我们多联系。刘大哥决定在监狱里成立临时支部，他作支部书记，指定你和我作小组长，你负责女监的斗争。”

我高兴极了，忙问：“有什么任务给我没有？”陈亮佐说：“听说刁大嫂没有被捕，怎么又来了一个刁大嫂呢？”

我说：“这是刁大哥手下一个营长江万顺的女人，叫江湖氏，是叛徒肖心如乱咬的。”

“她表现怎样？”

“还不错，过去经常帮我们做事。”

“那要注意，她的口供要改变，不然弄假成真，说成刁大嫂就难办了。”

我考虑了一下，就说：“对，改变她的口供。就说她是我请的保姆，武胜人，她丈夫姓李，她姓江，她外婆在赛龙场，敌人不信，就叫她外婆来认，你看怎样？”

“对，我给你找点笔墨过来，你给她做个呈文递上去。”不一会儿，我从墙洞里接过笔墨，用瓦片磨了些墨水，写好了呈文，然后对着墙洞念给陈亮佐听了。他说可以。我就给江湖氏说明白，叫她改姓李。孩子也这样说，问案时不能对不起。

这天晚上，我高兴极了，睡得很好。

腊月十五这一天，我和江湖氏与刘铁他们七个人一起，提出过堂问案了。

大堂上坐着县长严定礼，脸上黑得像戏台上的周仓，怪不得人家喊他叫严煤炭。

严定礼翻了翻我给江湖氏做的呈文，指着江湖氏喊“刁大嫂、刁大嫂”，

江胡氏没有答应。

他又喊了一声，江胡氏才说：“我不是刁大嫂，我姓李。”严定礼把惊堂木一拍，说：“你不是刁大嫂，捉住你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他们不听嘛，还说啥子？”

“哼，你还这样刁嘴。”

我站出来说：“她根本不姓刁，是我的保姆，如果你们查出来姓刁，就杀我的头。”

“带小孩来问。”

这孩子被士兵一拉，惊叫唤哭起来。严定礼问她：“你姓什么？”

小孩子只是哭，严定礼又叫人拿了一块糖给她，把她哄着，然后又问：“你姓什么？”

“姓李。”

“你爸爸呢？”

“没有爸爸。”

问了一阵，没有结果，把江胡氏喊在旁边，又提刘铁他们来过堂。严定礼指着他们七个问我：“你认不认识？”我说都不认识。

严定礼又问他们：“陈玉屏你们认不认识？”

罗洪明说：“陈玉屏在岳池女中教书时听说过，没有见过面。”

严定礼又问他们七个互相认不认识。金华新说：“我开书店，陈建秋经常来看书，我只认识他。”

段前迪也说：“罗洪明是本县的团练局长，谁不认识。”严定礼气势汹汹地说：“你们都通共产党。”

刘铁昂着头问：“你有什么证据？”

陈建秋连忙辩解：“不不，我一向都反共的，严县长可以调查。”

“你呢？罗洪明，照直说，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呀，共产党不要。”

“说明白点！”

“我吗，一是地主，二是团阀，是他们打倒的对象，要我做啥子？”

罗洪明这一说，两旁看问案的人都嗤嗤地笑了起来。严定礼很狼狈，他用惊堂木拍了一下，又吼起来：“你们都通廖玉璧！”

大家都没有回答。

“好，陈建秋，我问你，你不通廖玉璧，为什么要他当教员？”

陈建秋连忙说：“报告县长：我事先不知道廖玉璧是共产党，聘他作教员，是别人介绍，县府批准的，以后发现廖玉璧有越轨行为，还是我当面跟向司令报告的。后来向司令派人来拉他，也是我找人带的路，怎么说是我通廖玉璧呢？”

我这才知道我去梁山教书以后，玉璧以合法身分在岳池中学教书，好好的却突然被追捕，一直找不到原因，原来是这个坏蛋告的密！正恨不得吐他两口唾沫，却又听严定礼在拍惊堂木：“陈玉屏，廖玉璧在哪里？你要交人出来！”“他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他不是你保荐的吗？你们派那么多兵都没有捉到，我到哪里去交人？”

“你同他在一道。”

“我何曾同他在一道？什么时候同他在一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外面教书四五年了，这次回来，一是为救婆母，二是为了同他打离婚，这事严县长

你不是清清楚楚的么？”严定礼噎了一下，说：“你既然同他打离婚，为什么又要救他母亲？”

我说：“严县长，这事太简单了。结婚这些年来，他母亲待我很好，他现在又是你们的死对头，我不出面来救谁来救？”他又把惊堂木一拍，说：“你强辩。”然后，把头掉过去，问江胡氏：“你是不是她请的人？”

“是她请的保姆。”

严定礼问了半天，也没审出个名堂，没有办法，只得又把我们关了起来。

回到牢房，心里很纳闷：若是叛徒出卖，咋严定礼东问西问的，像是一点也没有底；要抓共产党，怎么会把罗洪明和陈建秋也抓了来？还有刘铁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受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问了陈亮佐，他说组织上没派人来，很多事情不大清楚，但是有一点他知道：段前迪的舅娘王胡氏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忠的丈母娘，组织上正设法通过这个关系，花上一万二千元把我们的几个都活动出来。

腊月二十上午，牢房里嘈得很厉害，说杨森开了大队人马到山上去，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玉璧、刁大哥、罗平精都被打死了。男监的同志听了很着急，都来问我消息实不实在；我也不知道，也不敢问袁大娘，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腊月二十三晚上，过小年。家家户户正忙着敬灶王菩萨，却听见后山一片哭声。袁大娘去看了看，转来对我说：“华蓥山打得好凶，官兵开去的人打死了那么多，后山上埋了个连长，他的女人在哭，哭得好伤心啊！”

我听了，心里才安稳一些。

腊月二十八，下午放风时，陈亮佐在墙洞口对我说：“大姐，范永安来了，他是装成一个抬轿子的混进来的，他听说你还在，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他在什么地方？快叫他来会我！”

“他上午来看过我，我叫他明天来会你。”

“叫他来会江胡氏，就说江胡氏的亲戚，仔细点，谨防出漏子。”

第二天，范永安果然来了，趁着放风进来看我。永安看着我，我看着他，好大一会儿他才说：“大姐，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了呢。大哥气昏倒了，金积成、夏林和陈仁勇他们都哭了。”

我听了，心里酸楚楚的，说：“回去转告同志们，我死不了，我这条命还要留着，找敌人的麻烦。永安，上面的情况怎样，快给我说说！”

范永安笑了一下，说：“那天撤出了余家场，在文昌寨吃完了饭后，就一夜扯上了山。”

后来听说罗润德带人到文昌寨来，扑了个空。在路上听说你遭了，我们都说要打回余家场，大哥坚决不同意，说罗润德追我们都没追到，回去不正是钻进了他的口袋吗？这么大一支队伍，怎么能够感情用事……队伍扯上山以后，夏炯用重兵包围，又放火烧山。上面的环境是困难，风雪大，又缺粮食，你看我们的手脚都冻烂了。”范永安伸出他用破棉布包扎起来的双手，棉布上浸出了暗红的血迹。

我双手接住，轻轻地一扒，永安就颤抖着噓了一声，连忙缩了回去，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大姐，我们从第一次起义起，就在山上过惯了，也不觉得苦。只是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领导人，像罗平精、罗方域他们，都不愿意住在山上，要扯到平坝子同敌人硬拼。大哥说上级党有指示，为了配合通

南巴红四方面军作战，我们一定要在这边打，牵制敌人，这样才喊住了。我们现在采取麻雀战术，安地雷，设埋伏，敌人多了就跑，少的就吃掉，打得罗润德很伤脑筋，听说他们晚上瞌睡都不敢打。”

说着说着，江胡氏进来，说收风了。范永安起身告辞，第二天放风时又来了，我们接着说。

我说：“这么冷的天，你们的粮食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范永安说：“是困难。夏炯他们封锁渠县，从黎梓卫到阳合场大溪口一带的卡子堵得很紧，又放火烧山，我们不能从这边下来，老百姓也无法上去。可是邻水那边有路可走，支援我们，我这次就是从邻水那边来的，还准备带点盐巴回去。山上人多，活动困难。廖大哥他们开会决定把唐虚谷的队伍扯回渠县，刁仁义的队伍扯回合川，以便分散活动，四面打击敌人。”

我又问：“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到底是咋搞的？”范永安叹了口气，说：“事情很复杂，首先是我们内部的人不谨慎。顺庆中心县委派刘迪到广安去传达迎红军的指示，他粗心大意的，文件和笔记本没收藏好，在岳池杨柳铺被清乡队搜了出来，金华新他们都暴露了。”

虽然上面没有廖大哥的名字，但余家场声势这么大，夏炯就起了疑心。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派一个叫邵录吉的，到夏炯那里去为余家场的队伍领一千套棉军服，夏炯就叫一个妓女去勾引他，把他灌醉了，打听出我们驻在余家场的队伍，就是地下红军的游击队，而且趁着广岳空虚，要去攻打岳池城。夏炯听了说：‘这还了得，原来这廖玉璧真的拿我当猴儿耍了，也不打听我夏炯是什么人？！’一拍桌子，就派罗润德到余家场来了。夏炯抓了刘大哥金华新他们，就叫邵录吉当场来认，可是邵录吉是顺庆人，和刘大哥他们从没见过面，一个也认不出来。夏炯就毛了，叫人把他拖到后山去，砍成了几大块，当时就挖了个坑窖在那里。”

范永安叹了口气，又说：“这次夏炯真的气惨了，不但剿了余家场，还带人剿了我们驻得有队伍的清溪场、黄龙寺、骑龙场……死了好多人啊，许多人抓来问都不问一声就砍了。”

现在老百姓给夏炯起了个外号，叫‘夏马刀’，他专用马刀砍人。听说有个信佛的老太太，跪着劝他，说：‘夏司令啊，你不能这么杀人啊，菩萨说连杀猪都是在造孽，何况是人呢。’

杀人是报应的，不报在今生，就报在来世；不应在你自己身上，就会应在儿女身上……夏炯却说，我不信佛，信了就不会来干这一行。他廖玉璧敢来骗我，我就得杀个样子给这里的人看看！’现在剩下你，是因为想抓廖大哥，剩下刘大哥、金华新他们，是因为我们在积极活动，也因为他们是重要人物，不好轻易就处决了。”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又问：“既然是抓共产党，怎么又把罗洪明、陈建秋他们也抓来了？”

范永安笑笑，说：“他们狗咬狗嘛。陈建秋自恃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回来后又在罗泽洲的部下王元虎那里作秘书，到处趾高气扬的。有一次夏炯到岳池，召集地方上的士绅开会，一上台就在黑板上写了‘赤化岳池’四个字，本来想吓一吓这些不大听话的士绅们，然后好派丁派款，清匪剿共。哪晓得陈建秋一听不买帐，清清嗓子站起来说：‘师长，你这样说不对啊，谁说岳池都被赤化了？我就是岳池人，我就一向坚决反共，我就没被赤化。’当时夏炯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陈建秋还很得意，可是当天晚上就被捕了。罗

洪明呢，则是因为一直想保持自己的民团势力，不愿被向屠户改编才遭的。”

范永安还说，现在敌人动不动就以“共产党”的罪名抓人。听说夏马刀在广安要强迫一个业余话剧团的女演员同他演《苏州夜话》，剧团不同意，夏马刀就以“共匪”的罪名把这个剧团领导人王国昌逮捕了。其实王国昌是一个不过问政治，只爱唱川戏的教书先生。后来王国昌的女人到处磕转转头，花了两百挑谷子，哭天煞地地恳求夏马刀的新夫人，还用了一百五十多个地方士绅的名字才保了出来……范永安走后的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组织上又派了徐魏氏来看我。徐魏氏是我二姐夫的亲戚，为人忠厚谨慎，经常为我们跑路送信。她先去见了陈亮佐，亮佐就把袁大娘喊过去，说陈先生有个亲戚，要说几句话。徐魏氏一见我就又是哭又是笑地说：“三姐呀，都说你在岳池城被枪毙了。你二姐哭得死去活来，派人来收尸，也找不到地方，说他们把你埋在坑坑里了，又说把你丢下河了。二姐家里还请人正给你做道场哩。”

我说：“莫花那些冤枉钱了，快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很好，免得他们着急。”

徐魏氏给我带来了二十块钱，我拿了十块给袁大娘。她高兴死了，拍着巴掌乐颠颠地说：“天哪，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管狱婆，还没有人这样大方，给我这么多钱！我今年要过个热闹年了。”

剩下的十块钱，托袁大娘给我们买了些棉衣棉裤进来，好过冬。

没几天，有几个犯人出去了，袁大娘打紧安排，把那几个女犯人都移了出去，小屋里就剩下我和江胡氏，以后就方便多了。

开年的这几天，外面闹得很凶，说是徐向前司令的队伍进了川，打到了通南巴，又说华蓥山也打得厉害，又谣传玉璧要来劫狱……杨森出了布告，不准老百姓放鞭炮，岳池、广安天没黑就关城门，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大年初五的早上，刚吃过早饭，袁大娘说严县长的那个弁兵要会我。

我说：“什么弁兵不弁兵，我认不得，不会。”

袁大娘说：“就是那天送你进监的那个弁兵。”

这一提，倒引起了我的注意，不过转念一想，敌人的鬼名堂多得很，还是不会。

袁大娘出去回话，一会儿又转来对我说：“他说你不会，他也要来看你。”

话还没有说完，走进来一个人，穿一套灰布军装，斜背一把盒子枪，二十多岁的样子，瘦高个，看去很精干，一进来就喊廖大嫂。

我把脸转开，假装没看见。

这弁兵看看我，想说什么又停住了，转身说：“袁大娘，你不出去照看，在这里守着我干什么？”

袁大娘笑了笑，一脸的诡秘，走开了。

他这才移过来，说：“哦，廖大嫂，你还不晓得，我叫李仲生，专门来告诉你：现在华蓥山打了胜仗。廖大哥的队伍打垮了夏炯两团人，师部现在恐慌得很，各个卡子都增派了队伍。徐向前司令又进了川，看样子，四川立刻就要红了……不过，我们这边牺牲的人也不少。”

我还是没理他。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到这里，还没有人来看你吧？不要紧，以后有我照顾。你缺不缺钱用？我这里先拿点去用吧。”说着，随

手摸出了十块钱来递给我。我说：“我不要。”

他说：“大嫂，我真的不是外人。”

“不要。”

他慢慢地将钱放进衣袋，又说：“牢房里的伙食不好，我给你在外面包好了送来。”

我不耐烦地回答：“不包。”又把脸掉在一边。他看我仍然冷冰冰的，只好强装笑脸说：“那，我以后再来看你。”

第二天晚饭后，我在走道上放风，李仲生又来了。我一见他，心头烦得要命，掉转头就往回走。他跟着我后面，很着急地说：“大嫂，大嫂，我有话跟你说。”

我进了牢房，背对着他站着：“你有什么话就快说。”他很委屈的样子：“请你不要多心，我真的是上面派来照顾你的。”

上面派来照顾我的，为什么组织上没有和我联系？自己说是就是了？也不看看眼下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把戏哄三岁的孩子，还差不多！

我把头一摇，还是不理他。

他紧跟在我的后面，不停地说：“真的，我真是上面派来照顾你的，你以后就会明白。”接着上前一步，轻声地对我说：“屈元亮那天跳城墙逃跑，还是我放的信。年前腊月二十那天，我从严县长那里探听到他们又要想抓徐清浦，就在深夜装着查号去放信，徐大哥当晚就跑了，师部把徐大嫂弄来问了几次，正在四处探听哩。”

李仲生见我仍然不动声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嫂，我知道你不信，这是徐大哥临走时交给我的任务，叫我照顾你，保护你。我的事只有刘政委、廖大哥和徐大哥知道，不信，你找人去问，我不是坏人。”

李仲生停了停，又继续说：“前一向风声很紧，怕背嫌疑，我不敢露面，这两天松了一点，才来看你的。外面传说华盖山死了好多人，你不要信那些……”

他还要说下去，袁大娘走进来了，说：“李仲生，你也该走了，我们收风了。”

他站起来对袁大娘说：“你不要把廖大嫂当一般犯人待，要好好照顾啊。”

袁大娘说：“我晓得，谁要你多嘴。”

李仲生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仍然充满了疑惑，决定找个时间，向陈亮佐和支部汇报一下。第二天吃过早饭，李仲生又来了，同行的还有两个人，说是严定礼要见我。

我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洗了脸，梳过头发，又换了件干净衣服，就说走吧。走出监狱，李仲生说：“大嫂，这两位弟兄你恐怕不认识。这是周辉同，这是黄锡成，都是严县长的内弟。”

我瞟了两个人一眼，只见那周辉同团团的脸，矮个子，很年轻，很结实。黄锡成三十岁左右，像农民，也不开腔，只是盯着我。我横了李仲生一眼，心想：你这话问得奇怪，严县长的内弟我怎么认识，又哪里犯得着去认识。这两个人也是，看上去老老实实的，怎么别人的内弟不做，偏去给那个万事莫抓拿的严煤炭作了内弟！

我只顾往前走，周辉同赶上两步说：“不要怕，他们要恐吓你。”李仲生说：“今天县长要在三堂上审问你，还有些师长、旅长，要你交廖大哥。”

他们现在恐慌得很，杨森要把队伍开去打徐司令，廖大哥又在山上拖住了他们后腿，杨森急得双脚跳。夏炯派队伍去清剿，可是小队伍去，总是有去无回；大队伍去，又找不到影子，他们最怕廖大哥的麻雀战术。夏炯天天找严县长商量，谈来谈去，就在你身上想办法。今天摆的是鸿门宴，装好装坏都有，你要察言观色，随机应变……”

走进三堂，空空荡荡的。李仲生端了一把椅子来给我坐着；周辉同给我倒了一杯茶，就同黄锡成一道进去了。屋内一个人也没有，透过窗花格子，西厢房里传来一阵阵搓麻将和大声武气说话的声音。李仲生想进去报告，我摇摇头，暗示他等一下，听听他们说什么。

“嘿嘿，自古英雄爱美人儿，陈玉屏年轻漂亮，能说会画，我就不相信廖玉璧这样心狠。我们这叫做愿者鱼儿上钩来！”李仲生说：“这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忠的声音，是个师长。”“看牌，二筒！早就听说廖玉璧和陈玉屏感情很好，上钩倒是一定会来上钩的，只是上面催得太急，光是等不行。今天要说动陈玉屏，硬是要她开口动手，把字签了。”李仲生说：“这是张旅长张俊昌，对这个人要小心，一贯笑里藏刀。”

“唉，你们莫把陈玉屏看简单了。我跟她打过交道了，这女人，嘴巴犷得很，搞不好，恐怕还得放长线钓大鱼。”这无可奈何的声气，一听就知道是严定礼。

“严老兄，你这人就是窝囊！一个女人都斗不过，还当什么县太爷。叫他们把刑具都给我搬上来，嘴犷就打板子！”李仲生悄悄说：“这就是向廷瑞向屠户。”

我听了，只觉得自己的牙齿已在格格作响。

我给李仲生使了个眼色，他放重脚步，走进西厢房，大声报告说人已经带来了。

里面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一个穿呢子衣服的人首先走了出来，眼睛一瞅一瞅的，看那样子就知道是杨汉忠。他走到我面前，对着我的脸看了又看：“你就是陈玉屏？”我一转身，不理他。

他又跟着转过来，死盯着我的脸说：“你老实说，廖玉璧在什么地方？”

我又转过身，还是不理他。李仲生在旁边，瞪了他一眼，他才觉得自己有些失态，没趣地走开了。这时，几个士兵走进来，把老虎凳、羊橛凳、绳子、杠子稀哩哗啦摆了一屋，然后站在一旁。严定礼咳了一声，从屋里走了出来，拖着声问我：“陈玉屏，那个铁窗风味——好不好受啊？”我不开腔。

“你——受够了没有啊？”

我还是不开腔。

他连续问了三四遍，我把头转过来，用背对着他。他叫李仲生端把椅子，坐在我的对面说：“你——怎么不开腔？”“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的这个问题，军长的意思是要你交人，要把廖玉璧交出来。不然，就对你不客气！”

我说：“你们把大队人马开去都抓不到，我关在牢房里，有脚无路，到哪里去找人？”

“我把你放出去找。”

“我有病走不动。”

“抬你去找。”

“抬去也找不到，天地这么大，脚长在他身上。”杨汉忠又叼着纸烟走过来说：“陈玉屏，莫装疯，廖玉璧就在华蓥山的毛桠口一带嘛。”

“你既知道，何必来问我。你自己去找就是。”“这个这个……”瞅瞅眼一愣，把大半截纸烟用力往地上一丢，又走开了。

严定礼又过来说：“那你写封信去好不好？”

“我不会写。”

“哼！大学生，教员，还不会写信，真是滑稽。”“滑稽的事还多呢。无凭无据，我犯了什么罪，要弄来关起？”

“算了吧，不谈这些大道理。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廖玉璧好、大家好！张旅长你说是不是？”

这个张旅长，显然就是张俊昌了。他手里捏着一串佛珠，笑吟吟地说：“陈玉屏，陈老师，你莫误会嘛，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来跟你商量，想在夏师长面前给你和廖玉璧作保的。只要廖玉璧肯下山，我们保他作旅长。杨师长，夏师长，叶旅长，还有向司令，你们都可以具结是不是？再不信，可以找地方上的士绅和团总出来担保。我们已经把廖玉璧围在华蓥山，打不死，也要饿死冻死。我们不为廖玉璧着想，也要为你着想，年纪轻轻的活守寡，那时候呀，我看你才受不了……”

我站起来，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呸！无耻，下流。”“你好大的胆子，敢骂人？拿板子来，打嘴！”向廷瑞捋着袖子，朝着我大喊大叫。

张俊昌连忙上来，一边把向廷瑞往厢房里拉，一边说：“廷瑞兄，息怒，息怒，不要与女流一般见识。”“不行，拿抬盒来，我杀死那么多的共匪都不手软，不信制服不了你陈玉屏！”

“哼，莫说你拿抬盒、杠子，就是杀我的头也就那么回事。你们只有强权，不讲公理，杀死我这样一个无辜的女人，算不了你们有本事。”

“一个无辜的女人？说得好轻巧。哪个女人有你这样泼，有你这样硬？你就是共产党。”

“你们都是当大官的人物，抓不到廖玉璧，就拿我一个女人来出气。我也不可能帮你们去哄他来投你们的圈套。你们要杀就杀，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算了吧，陈玉屏，”向屠户挣脱张俊昌走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的脸，声音发抖地一字一顿地说：“啥子瓦全不瓦全，我要一刀一刀地剥你的皮，割你的肉，叫野狗扯得你五马分尸！”

向廷瑞暴跳如雷，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进厢房，在里面叽叽咕咕商量什么。李仲生看了我一眼，长长出了口气。一会儿，向廷瑞出来了，狠狠瞪了我一眼，冲出门走了。张俊昌捏着佛珠，踱到我面前，不紧不慢地说：“陈玉屏，听说你也吃斋信佛？好，好，我们志同道合。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唉，你看你们两口子，鼓动那么多老老实实的老百姓，闹什么革命，讲什么共产主义，死了这么多的人，徒使老百姓遭受劫难之苦……”

我转过身来，看着张俊昌，也不紧不慢地说：“张旅长，张善人，我是女流之辈，不懂什么革命、主义，也听不得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劝世文。我只想问一句，今天这么多师长旅长济济一堂，来审问我，无非说我是共产党，是廖玉璧的同伙。只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出来作证？”严定礼过来，摊开两手说：“嘿嘿，真是奇谈，这还要人作证么？廖玉璧是共产党的头子，这是没话说的了。你呢，是他的女人。他把岳池县都赤化了

大半边，未必就没有赤化你？你不是他的同伙是什么？”

我说：“严县长，你老人家好健忘啊。廖玉璧作三防司令，是你出面作的保人，这才几天，我们还是一张桌子上劝酒吃饭，你还同我一起到广安，在夏师长面前帮我说好话，放了我的婆母。难道你就忘了我在外面教书，就那两天才赶回来的吗？我跟廖玉璧早就断了关系，哪件事情给他做过同伙？”我这一说，那些师长旅长都不开腔了，只顾看着严定礼。严定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陈玉屏，你莫在这里混淆视听，这些都是屈元亮、徐清浦和你勾结起来哄骗本官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我站起来，盯着他慢慢地说：“是啊，我听说了。你的三防司令是共产党，副司令也是共产党；老团练局长是共产党，新局长也是共产党，还有底下的脚爪爪都是的！那么你呢？你就是好人了？你们合起做了些脱不了手的事情，到头来却在我这个几年没回岳池的女人身上打主意，到底是要哄骗哪个，只有你心头明白……”

严定礼两只眼乱瞟，揣摸周围那些人的脸色，黑黑的一张脸成了猪肝，口里叫着：“押下去，快给我押下去！这个该死的共产婆……”

李仲生押着我往监里走，很高兴的样子。我问他：“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坐在一旁没开腔，那是谁？”李仲生回想了一下，忙说：“那是叶济，叶旅长。”

晚上放风的时候，我悄悄找到刘铁，汇报了今天的事情，特别问到李仲生的情况。刘铁说：“李仲生，他确实是我们的人，是通过徐清浦介绍给严定礼背枪，打入敌人的内部探听敌情的。周辉同、黄锡成是严定礼的舅子，通过李仲生做工作，也是我们的人了。为了不出岔子，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看来他们这次出力不小。”

我说：“这个李仲生也是，也不通过组织上接个线，莽莽撞撞的就跑来找我，我还以为是敌人玩的花招呢。”刘铁说：“我现在是扯红了的，太打眼，他哪里敢通过我。不过你这样谨慎，是对的。”

后来杨森听说了这次审讯的经过，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她陈玉屏会说，我杨森会关，看我们谁犟得过谁！”于是我就不审不问地被关了起来。

长歌当哭

日子过得很快，论季节已是早春，只是牢房里潮湿，仍旧像冬天。当初为了摆脱罗润德的纠缠，说自己吃斋吃长素，没想到袁大娘当了真，每到初一、十五，还帮我到庙里去烧香还愿。我索性和她一起，半真半假做起了居士，每日里吃些清淡的饭菜，身体居然慢慢地恢复了，只是久没吃肉，心里痒得不行。牢房里的日子太难熬，组织上这一阵子又没有派人来，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只有等袁大娘来了，间或打听一点消息，摆些婆婆妈妈的龙门阵，只觉得自己这辈子，难得这么清闲过。

一天，袁大娘对我说：“外边有人要会你，说是姓唐。”姓唐？是谁呢？是唐俊清吧？不会。唐老六吗？也不会。他们都是战斗中得力的人，听说山上近来打得很凶，不会冒险到这里来。再说组织上指定和我联系的，只有范

永安和徐魏氏，哪里又钻出一个姓唐的来了呢？我对袁大娘说：“不要开门，就在牢洞口看看再说。”

袁大娘出去，把牢门关上了。我走到门口，见牢洞口露出了半边脸来，一顶博士帽还把眉毛都遮了。那人大声武气地说：“我是廖大哥派来看你的，他很担心你。”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姓唐，叫唐德彬，是广安的。大哥叫我给你带五十块钱来，请你打个收据。”说着就伸出手，递进一大包东西来，还故意抖得哗哗作响。

我想我们广安是有一个唐德彬，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为什么组织上派他来呢？再说，现在山上很困难，怎么会给我这么多钱。我白了他一眼说：“你拿回去，我不要，我已和他断绝关系了。”

那人一听急了，大声说：“那怎么行，廖大哥把任务交给我，我冒了好大的风险才进来的啊。”

他这一喊我更怀疑了，我们的人哪有这样莽撞，在敌人的监狱里大喊大叫的？正要再说点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悄悄地说：“人长得还漂亮。”

我心里全明白了，伸手接过他递进来的那包银元，照着那半边脸揍出去。他一让，银元落到外面的地上，滚得叮叮当当的遍地都是。外面的人直说：“啊啊！好歪好歪。”那个自称是唐德彬的人还不死心，又扑在牢洞口说：“你不收吗，就写个‘退还’，落上你的名字也要得，要不然叫我回去，咋个扯回销？”

我说：“你手头有钱，还怕扯不了回销？你还不走，我就叫人抓你进来关起！”

他还想说什么，江胡氏说：“你真的还不走么？”说着就直起嗓子，直喊袁大娘。

那家伙一听慌了，连忙说：“我走我走。”说着就和外面的两个人一起慌慌张张把钱捡起来跑了。我和江胡氏在屋里，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来。袁大娘进来，问我们笑啥子，江胡氏说：“袁大娘，你二天没钱花了就找陈先生要，她的名字值钱得很，人家给五十块大洋请她写一个都不得行。”袁大娘听了愈是莫名其妙：“刚才那些人来找你写字了？出了五十块钱？”

我哼了一声，说：“陈玉屏三个字，现在是一文不值，千金难买。老虎凳、大杠子摆在面前都没落笔，这五十块钱算什么！”

第二天上午，陈亮佐对我说，刘铁、金华新他们要解到广安去释放了。我听了觉得奇怪，问：“释放为什么一定要解到广安去？”

亮佐笑笑，神秘地说：“哄你做什么，人家王胡氏把杨森周围的人都说通了。除了王胡氏的女儿去找杨森几个宠爱的老婆说情外，凡是与杨森挨得拢的人，像杨森的老丈人刘老太爷、朱彩壁参谋长、杨汉忠等都去说情。王胡氏光是请客送礼活动费就花了好几百元。听说杨森的口没有先前紧了，说可以考虑考虑，带到广安来审讯后再说。人家王胡氏，今天也要跟着去。”

正说着，有人喊收风了，接着外面一阵嘈杂。我连忙走到牢洞口，见刘铁、金华新他们都出来了，个个都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不能暴露和他们的关系，不能喊，不能和他们告别，只是噙着眼泪笑。刘铁、金华新走过我的牢洞口，也停下来，笑笑，然后高兴地举起带着镣铐的手，大声说：“再见了弟兄们，多保重……”

监牢里的每个牢洞口都打开了，伸出许多枯瘦的手，向他们挥动。

刘铁他们走了。江胡氏叹口气说：“刘大哥他们这一去，也不晓得是凶

是吉？”我听了想安慰她，说我们有关系，说我们的人在活动，又想说吉人自有天佑。可是我却什么都没说，只觉得心里有些空空的，说不出。

日子度日如年般地过去，刘铁他们走了好几天，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天中午，李仲生慌慌张张地走进牢房，见了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说：“大嫂，遭了。”

我问谁遭了。

李仲生说：“刘大哥他们遭了！”

我心里咚地一下：“不是说要释放吗？”

仲生说：“先前是说好要放的，可是人一解到广安，就关到教育局。大嫂，你想教育局那是啥地方啊，那是夏马刀的队伍驻扎的地方。就在刘大哥解到广安的那天晚上，夏马刀亲自审问，要刘大哥他们交出岳池、广安共产党组织，要交出廖大哥，要咬你是共产党。刘大哥狠狠地痛骂了夏马刀一顿，骂得夏马刀像疯狗样，直喊给我打，给我烧，于是那些爪牙们就给刘大哥‘背火背篋’。刘大哥的声气都骂哑了，昏倒在地上，他们又用冷水泼在他的脸上。等醒过来，夏马刀又要他咬那个广安演戏的王国昌是共产党。刘大哥说：‘夏马刀，你休想利用我的口，去杀别人的头。我认不得这些人，你要杀就杀，休想在我口里得到一个字。’夏马刀就叫人拿洋油来灌鼻子。那晚整到半夜，用洋油和海椒面灌鼻子、坐抬盒、撬杠子……所有的刑罚都用尽了，夏马刀还是一无所获。”我心碎了，摇摇手，不忍再听下去。牢房里轻风肃静，只听见江湖氏轻轻的抽泣声。

好一阵，我才颤着声音问：“以后呢？”

李仲生用手帕擦干了眼泪，坐在我的床边，又继续说：“就在刘大哥受刑的第二天，杨森召开会议研究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杨森问夏马刀审讯的情况，夏马刀摇了摇头说：‘不招。’杨森接着说：‘日前徐向前进了川，一来就占领了通南巴，又向达县、渠县进发。田颂尧的守卫部队一触即败，望风而逃。我们的驻地营山、渠县眼看也很吃紧，马上要抽调部队去驻守。这次拉来的这些人，都在地方上有些声望，要是没有口供就杀了，恐怕民心动荡。再者，华蓥山的共匪四处骚动，若不立即设法对付，将来腹背受敌，更不堪设想。依我意见，应该软硬兼施，清剿与诱敌双管齐下。听说刘铁与廖玉璧情如手足，若能说服刘铁投降，再用刘铁去招降华蓥山廖玉璧的共匪，当不费吹灰之力。这样不用一枪一弹，就能除掉心腹之患，当是上策。’

“夏马刀立即站起来说：‘军长，不行呀，刘铁口很硬，我用毛铁也撬不开他的嘴，昨晚上啥子刑罚都用尽了，他一个字也没说。’

“向屠户也说：‘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杀、杀、杀！其实，捉来的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像陈建秋、罗洪明之流，他们也恨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要他们。不过，他们是地方上的一些不稳分子，不管派粮派税经常爱同我们捣蛋，一齐用共匪或通匪的名义杀掉，也好杀一儆百。’“最后，杨森叫再用软套子试一试再说。于是，夏马刀就把刘大哥他们从教育局迁到杨森军部考棚里面关起。在这几天，刘大哥又受了两次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一个字没说；金华新、段前迪和其他两个同志也像刘大哥那样豪气，始终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名字来。可是陈建秋、罗洪明就不同了，他们见到刑具就吓垮了，特别是陈建秋，还没坐上抬盒，就叫喊起来，愿意交待。可是他说什么呢？共产党认得他，他认不得共产党。敌人是要廖大哥下山啊，他们有这个本事吗？敌人想要开口的不是他们，而是刘铁、金华新这些同志，可这些

人又偏偏不开口，真把这些混蛋气惨了。听说向屠户和夏马刀到杨森那里去奏本，一个说不杀这七个人，我的司令官不当了；一个说不杀这七个人，我的师长不干了。

杨森见刘大哥他们软硬都不吃，部下又这样恼怒，也就点了头。”

刘铁、金华新、段前迪他们在广安牺牲的事，当时非常轰动。从被关押的考棚出来，经过小东街、龙头街直到刑场白花山，沿途街道两旁都是人山人海。听说要押赴刑场时，陈建秋哀求堂上的监斩官，他要留个遗嘱；一个士兵给他拿了一张白纸和笔墨。他泪流满面，不住地摇着头，战战抖抖地写道：“我一生反共，其结果反以共匪污我，实因我读书太多，有时言语不慎，致遭今日惨祸。誓愿陈氏子孙，今后以务农为本，或可免于乱世……”

罗洪明则要了两碗酒一饮而尽，对监斩的人说：“把标子拿过来看看，我罗洪明是犯的何等罪。”监斩的人将标子抽下，甩在他的面前，他看到“私通共匪罪犯一名……”的字样，就哈哈大笑地说：“这还差不多！共匪倒还认得几个，说我是共匪，那就死也不瞑目。”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又说：“夏马刀呀夏马刀，去年此时，我是你的座上客，今日此时，我就成了你的刀下鬼。”说着一面摆头，一面泪流满面。

只有我们的五个同志挺起胸，昂起头，唱完了《国际歌》，就呼口号，呼了口号，又唱《国际歌》。一路上很多看热闹的人都悄悄地走了。到了白花山快临刑时，刽子手叫刘大哥他们跪下。刘大哥正气凛然地说：“我生为正义人，死为正义鬼。要想我在你们军阀反动派面前跪下，万万不能！”就这样，我们几个同志，都站着牺牲了。

这一天，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广安城内，贴满了勾满红笔的布告。

一连好几天，我都昏沉沉的，回乡八年来的许多事情，都一幕幕地从眼前浮起，搅得我的头好痛好痛。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江胡氏在喊我，说：“大嫂你醒醒，你看谁来了。”我睁开眼睛，看见刘铁坐在我的床前，温温和和地笑着看着我。我说：“刘大哥你来了，我就晓得他们乱说的，红军都进川了，你怎么会去死……”

江胡氏在一旁哭着说：“大嫂你再好好看看，看看这是哪个？”

我说：“哦，你不是刘大哥，是老金，金华新嘛，我咋个认不得！你刚才叫我念入党誓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唉呀你看我，昏的，你是老段嘛，昨晚半夜还送文件来……你放心，文件我都处理了，嚼烂了，吐在茅坑里了……”

我心里有许多话，都想说，可是说不出来。坐在我床前的那个人，呜呜地哭出声来，使劲摇着我说：“大姐，你不要这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永安哪……”

我猛地坐起，一看真是范永安。他抓住我，边哭边说：“大姐，你不要难过，大哥比你更伤心，我跟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他这样伤心过，吼呀吼的大哭大嚎……山上的弟兄们开了追悼会，大哥带头发了誓，说是此仇不报，决不生还……刘大哥，他是个好人……”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又倒了下去，恍惚中仿佛听见江胡氏在说：“大烧大热的……三天了……”

天气渐渐暖和了，在江胡氏的精心照料下，我咬着牙，让身体一天天在恢复。看见她带着孩子整天忙上忙下的，我心里过意不去，说：“你真的成了我的保姆了。”她说：“保姆就保姆嘛，免得成天闲着，心慌的。”

六月的一天，牢房里突然嘈杂起来，人们都在说敌人开了大队人马到太平场，把罗平精抓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着急：罗平精明明在山上跟玉璧一起，又跑回太平场做什么？早先是听范永安说他不安心在山上，经不住磨，一心要想把队伍拉回坝上去硬打，可是玉璧的话他一直都是听的啊。这个人作战勇敢，在山上进步很大，若不是总有点爱自由行动，连党都入了，怎么又出拐了？

正在揣想，李仲生匆匆进来了，一见我就跺脚说：“罗平精遭了，在太平场遭的，都已经解进城了。”

我们听了，都沉默不语，牢房里静得连掉根针都听得见。忽然，外面急急忙忙跑过一群人，李仲生说：“来了！”我连忙从牢洞口往外看，只见前后几十个兵端着枪，不住地喊“让开让开”。罗平精那矮胖的身子被五花大绑着，挺胸昂头地边走边骂：“你们把老子逮住，充其量就是杀头。老子死了儿子会报仇，我儿子死了孙子会报仇，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批王八蛋杀干净……牢房？你们以为进牢房就把我吓倒了吗？不得行！这是老子的栈房，老子是来休息的！”

隔壁男监一阵喧哗，罗平精被推进去了，接着又听见叮叮当当锤脚镣手铐的声音。李仲生连连跺脚说：“这是在上重镣，他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大嫂我们要赶快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也很着急，嘴里却在安慰他说：“罗平精家里有的是钱，说不定严定礼这家伙瞎子见钱眼开，他现在不是正催不齐粮款吗？”

仲生说：“那我再去打探一下，听听严定礼的口气。”说着往外走。我忙说：“仲生，你要小心啊，我们的人，遭了这么多，你不能……”

仲生点点头说：“大嫂，我晓得。”

李仲生走了之后，我守着牢洞口探望，只见走廊上的守兵跑来跑去的，人数足足增加了一倍，那些管监的也很紧张，在男监里进进出出。过了一会儿，人声稀疏了，典狱官和男监的管狱头李老尧大声说什么，又听见陈亮佐的声音在说：“为人嘛，瞒上不瞒下，你们给罗大哥维持一下，把镣铐给他下了，我相信你们要的钱，他是出得起的。”

罗平精说：“你们要多少？”

有个家伙说：“二百块！”

罗平精笑了两声说：“就这点钱？没问题，我喊人拿来就是。典狱官，另送你一百块！”

只是我罗平精还没有吃饭，你们给老子买些来，我就是明天死了也不能成个饿死鬼。还有酒，拿酒来，好，算我的。一齐招待！”

第二天放风，陈亮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哥开会去了。”

原来玉璧接到上级指示，到阆中开会去了。罗平精和罗方域就扯了一部分人回太平场，说是要给刘大哥报仇，要同敌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可是刚拢屋，就被发现了。敌人把他家团团围住，他和罗方域赶快进了家里的地道。敌人进来搜了两次，都没发现，后来都出大门了。两个人偷偷爬出来，不料罗方域因为紧张，枪走了火。罗平精看见敌人折回来，自己跑不掉了，连忙把地道口隐蔽好，就这样，他被捕了，罗方域躲脱了。

罗平精被逮捕后，罗家和他的丈母娘家到处活动，说要钱有钱，要多少给多少，这可喜坏了县长严定礼。本来这些天，红军在通南巴打得厉害，连刘湘那个叫做刘神仙的军师，都差点被红军捉了去。而夏马刀的队伍，此

时已开上了前线，严定礼驻守岳池的兵力，不过一团人。他最怕的是廖玉璧的队伍来攻城，最大的奢望是替杨森把粮款收齐，好交差，因此极力主张不杀罗平精，既可以敲榨一大笔钱，又不惹怒廖玉璧。

可是消息传到夏马刀那里，他不干。说是前次被罗平精和廖玉璧在山上把他打得好惨，不杀不足以平心中之恨。如果严兄怕杀了罗平精在老百姓中间引起骚乱，那就不以共产党的罪名，以土匪的罪名杀就是了。

罗平精进来的第三天，被提出去过堂。严定礼坐在大堂上，看罗平精来了，就把惊堂木一拍：“罗平精，你家是大绅粮，为什么当土共？你为什么通廖玉璧？招来！”罗平精走上去，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放屁，什么土共不土共，什么通匪不通匪，我不懂！廖玉璧与我的交情是众人皆知的，你逮到我一个罗平精，还有一个廖玉璧！你杀了我罗平精，我们还有无数不怕死的人，你抓得完、杀得尽吗？”

严定礼黑起一张脸，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个不谈，你们为什么在外面乱抢人？”

罗平精又冷笑了一声，说：“哼，你简直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抢了谁家，抢了谁人，抢了你家么妹吗？”“这个！”

严定礼气得暴跳如雷，站起来把惊堂木狠狠地一拍，咬牙切齿地说：“打嘴！”

那些士兵就围上来，用绳子去绑罗平精。他飞起一脚，踢倒一个士兵，双手叉在腰间说：“妈的！你们要打？要打老子就打滥！”

严定礼又在桌上用力一拍说：“罗平精你这样耍刁，不是土匪共老二是什么？给你父亲派的指名捐，为什么不缴？”“前帐未清，新帐又来，我父亲都被你们整死了，还拿什么来缴？”

“你为什么把枪送给廖玉璧，把谷子送给他的队伍吃？”“我不送给他，你们还不是要抢去？送给他还有个人情，你们抢去，反转来整我！”

“你为什么……要跑上山去当土共？”

“啥子土共洋共的，我不懂。你们抄了我的家，还要通缉我，逼得我无路可走，我不跑上山去，还在家里等死不成？”严定礼见他如此嘴硬，跺着脚大吼：“你要晓得，逮你的不是我！是军部，军部！”

罗平精下堂来，一路骂着回牢房，声音震得瓦格子都像在抖：“你们大家听着，说我罗平精抢人，是土匪，真是笑话！我罗平精三千多担田土，历来只有土匪抢我！我又不缺吃又不缺花的，还用得着去抢么？……”

袁大娘正在我屋里，叹口气说：“就是嘛，岳池县里哪个不晓得罗大爷，罗大肥猪，大粮户，他会去抢人？鬼话。”晚上，周辉同来了，说起罗平精，只是摇头：“像他这样一点都不肯下软着，甚至不肯闭一下嘴，恐怕真的是没办法救了。”还说罗平精今天下堂来，看见他家里的人，就说：我是活不成了，莫把我的钱拿去跟军阀办交涉，我还有大用场。我死了你们不要收尸，让大家都来看他们的罪恶……“刚才严定礼还跟我说，他当了这多年的官，审过也杀过不少人，没见过罗平精这样豪气的。还说这些人也真怪，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怎么一跟共产党沾了边，就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这样轻……”

正说着，袁大娘捧了一捧银元走进来说：“陈先生，这是罗平精叫我给你送来的。我说你吃素，不用钱。他说：‘吃啥子素哦，我晓得，你给她拿过去，就说是我叫你拿的。’”

我心里直是叫苦：罗平精你好大意啊，叫管狱婆给我送钱来，不是暴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吗？我说：“袁大娘，你给他送过去，说我有钱用，叫他注意身体。”

不一会儿，袁大娘又来了，她说：“罗平精多心了，问你为什么不要他的钱。又说，不要钱，叫我给你买成东西。”我无可奈何地把钱收下，顺手给袁大娘两块。

袁大娘接了钱，低声问我：“罗平精和廖先生很好？”我说：“是呀，他们过去是同学。”

我找了个机会告诉陈亮佐：“叫罗平精不要叫管狱的送东西来，我的案情这么重，会牵连他的。还叫他不要光骂人，在这里骂没有用，还不利于我们为他做工作。”

亮佐说：“我都跟他说过了，他说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给你钱，可能对你有帮助，还说自己反正是活不成了，都是没听大哥的话，死得太憋气，骂一骂心头才好受。”亮佐叹了口气说：“罗平精这个人，啥都好，就是太鲁莽。”

又过了两三天，监里正在吃早饭，忽然来了一队兵，径直往男监走去。我立即放下碗筷，把耳朵贴到墙洞边，先听见开锁的声音，又听见牢门哐地打开了，一个人高声喊道：“罗平精，给你道喜！”

罗平精一下子跳起来：“道你妈的喜！老子晓得死期到了！给老子把脚镣砸了，让老子自己走！”

接下来是砸脚镣的声音，一群人拥着罗平精走出了牢房。我连忙扑到牢洞口，只见罗平精在牢门口站住，对管狱的李老尧说：“莫忙，我有个亲戚在女监里，我要去看她一下。”说完用手扒开一个兵，向我的牢房走来。

我看着他，心里难过极了，闷了半天，竟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罗大哥，今天脱法了。”

他摇摇头，说：“脱什么法哟，玉屏，我死了不足惜，只是……”

我觉得鼻子发酸说：“罗大哥，你有什么事，尽管说。”他抬起头来，眼圈有点红，说：“玉屏，我是有事情要托给你。一是现在我们很困难，我的财产都交给上面。再是你今后出来，去看看我的女人，常开导开导她，把娃娃带走，交给上面，不要留在岳池……”说着声音发哽，几颗泪水流了下来。

那些兵见他还不走，就过来不耐烦地说：“什么上面下面的，快走快走！”

罗平精一下把头昂起来，气势汹汹地说：“妈的，你凶什么？你们这批走狗，你们今天拿到刀把子，可以杀我的头；二十年后老子会拿刀来杀你们的头！”

我说：“罗大哥，放心吧，你托的事我一定给你办到。”罗平精回过头来，说：“谢谢你，玉屏。”接着被一群士兵推着，边走边喊：“岳池县的父老们，他们今天以土匪的罪名来污我，杀我罗平精，明天会同样以“匪”的名义来杀你们的，快快起来！把杨森军阀土皇帝赶出广岳去……”

阴惨惨的杀人号声响起来了，夹着罗平精断断续续的叫骂声。后来听李仲生说，有士兵想拿布去堵他的嘴，他头一摇就挣开了；到了刑场，刽子手叫他跪下，他不跪，那些兵上来拉他，他就用头撞，用脚踢。那刽子手慌了，挥起刀一阵乱砍，砍了几刀才砍掉了他的头……罗平精牺牲的时候，才二十九岁，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暴露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狱中运筹

一天，徐魏氏给我领来一个人，我在风洞口一看，禁不住吃了一惊，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来人竟是曾三姐。

曾三姐进来，我们姐儿俩拉着手掉了好一阵的眼泪，我才问她是怎么知道的，我的两个孩子可好。曾三姐强作笑脸说：“两个娃娃都好，这回是夏林兄弟下来给我带的信。我把宁儿托给韩嫂，带着彬娃上来的，又怕那些黑心肝晓得，不敢带来给你看。”

我听了很感动，说：“不但彬儿和宁儿不要来，你也不该来！托你带孩子本来就够麻烦你了，你专门上来看我，更会受牵连。”

曾三姐说：“我才不管什么牵连不牵连。我是来救你的，你该记得我家五妹敏言吧，她常听你摆龙门阵，佩服你不得了。现在，敏言要嫁人了，男方叫雷青成，听说是个什么官儿，和刘湘熟得很。敏言逼着他要把你救出来，说要不然就不过门；雷青成现在正找刘湘设法呢。你看这是他给你写的信。”

曾三姐说着，摸出一封信来，上面写着简短的几行字，大意是说：屏姐你不要着急，我听敏言说过你，心里也很钦佩。我救你就如救我自己，一定尽力设法，希望你为国家前途保重身体……字写得不错，文辞也很流畅，连国家前途也写上了，看样子是个有点血气的人。

可是他到底当的什么官呢？怎么会和刘湘很熟？我问曾三姐，她嘿嘿一笑，说：“我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个什么官，只要他能救你出来就行。要不然敏言就不嫁给他。”

曾三姐在岳池住了些时候，常来和我摆龙门阵，说起她的独生子曾繁彬都十六岁了，学了无线电技术，现在邻水电台工作。我听了心里一动，就说：“我二姐的女儿魏祠照，也快十六了，人长得怪水灵的，还没说人户。三姐你要是不嫌弃，我们打个亲家怎么样？”

曾三姐到了我二姐家，看了姑娘，觉得很满意。可是我二姐却不大愿意，一是觉得曾繁彬没读过什么书，二是嫌她家里孤儿寡母，过于贫寒。玉璧就给我带了信来，叫我劝劝二姐，成就了这门亲事，对个人对革命都有好处。二姐倒是很听我劝的，就这样我成了繁彬和祠照的媒人，和曾三姐朋友之上又成了亲戚。

曾三姐说成了媳妇，高高兴兴地走了。接着我的牢房里又增加了一个常客，这就是彭杰。

彭杰是个贫民，因为姨妈是杨森的姨太太，他跟着叫杨森姨爹，在杨森名下当了个小勤务兵，一年到头只有一碗饭吃。他父亲六七十岁了，还给杨森看公馆的后门，却常常连饭都没有吃的，吃管家倒给他的喂猫狗的饭食。为这事彭杰很伤心，说自己怎么这样没出息，连老父亲也供不起，一气之下就到严定礼这里来背枪。严定礼看他是杨森的内侄，就叫他做了副官。他一到岳池，听说我在牢房里，就邀周辉同、李仲生来看我，一见面就说：“大姐，你不认识我，我的女人也姓陈，我常听炳秀哥提到廖大哥，我们就认个

亲戚吧。”

他提到的陈炳秀，是他的舅子，也是我陈家的族弟，要论亲戚，还是扯得上的，只是我怎么会和他这样的人随便认亲戚。看着他那张很认真的娃娃脸，我觉得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就没有开腔。周辉同在旁边说：“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穷朋友，我们都是一色人物。”

彭杰觉得这“一色人物”用得很恰当，立刻笑着说：“对，一色人物，二尺五，背枪。”

大姐，说真的，我很想到廖大哥的队伍里去。我在广安听到人说，有人在南部、顺庆看到他；也有人在武胜、大竹看到他；还有人在渠县、三汇也看到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吃紧，听说他在花桥还打死一个恶霸乡长。这次我从恒望场来，专门到桂花场去找过他，可是没有打听到。”

周辉同说：“你做你的副官，去找他啥子，是去逮他的吧？”他立刻嘟起嘴巴，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说：“啥子逮捕他，你把我说成这么不值钱。”

李仲生故意笑着说：“虽说你不是逮捕他，也不是去投他。你有那么好的一个姨爹，军长啊。”

“哼，啥子亲戚，狗日的烂军阀，我姨妈都气病了。”

县衙里，事情本来就不多，严定礼又不敢吩咐彭杰做那些杂事，他就更清闲一些，没事就跑到我这里来摆龙门阵。因为他是杨森的亲戚，谁也不敢管他，让他在我屋里随进随出，加上李仲生、周辉同、黄锡成都常来常往，袁大娘白天里干脆连我的门也不锁，也不来过问。

这几天，徐魏氏进城来，住在康家祠堂里，来看了我好几回。她说自从玉璧打阆中回来，我们的队伍又开干了，岳池、武胜、广安、顺庆、合川，几乎乡乡都有战斗，还把双桂场的恶霸尹元亨的碉楼也烧了。后来彭杰来看我，也说起这件事，尹元亨还来报过官。严定礼叫他去找团练局长王司义，王司义派了一连人去，连廖大哥的影子都没见到。赶场的老百姓都说尹元亨这个坏家伙，自己不小心把碉楼烧了，还去诬告别人。为此严定礼大发脾气，罚他六百块钱外加团练局的出差费；后来尹元亨一再说好话，才改罚了六千套军服。

这件事过了没几天，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袁大娘正要锁门，彭杰突然慌慌张张跑来，把袁大娘赶了出去，然后说：“大姐，糟了，听说廖大哥他们有三十多个人在魏家沟魏连周家里开会，团练局要派人去捉呢。”

我看了他一眼，说：“你怎么晓得的？”

他说：“是尹元亨刚才跑来向严定礼报的。”

我又问团练局派了谁去，他说派的黄楚奎，要去一个连。

我一听是黄楚奎，就转身到床边去理被子，做出要睡觉的样子说：“管他的，我和他没有关系。”

彭杰见我不理睬，着急地说：“怎么能不管？如果他们开完会都睡着了咋办？总得找人送个信嘛。”

我听了这话，心想也是的。尽管黄楚奎是我二姐夫的表亲，和我们也算是表兄妹，但他毕竟是公务在身，又无法给玉璧放信，万一真的碰上了，他不打手下的人也要打，那就被动了。

彭杰见我还是不言语，就问：“魏连周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二姐夫。”他听了一顿脚，说：“那恐怕硬是真的了，一打起来，至少你二姐家要受损失……怎么办呢？我到外边喊个人去？要不然，我骑严县长的马自己

跑一趟！”我说：“你回来。你去跑一趟？你认识谁？谁又认识你？你不要头功没抢到，反而先挨了枪子儿，你没听说，他们打仗厉害得很么？”

彭杰一听这话，急得结结巴巴的，半天才说：“大姐！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信不过我，要真的出了事情，我咋对得起廖大哥！”

我看他很急的样子，又想到李仲生也向我说过彭杰这娃娃还正直的，的确是倾向我们，可以找他做些事情。再说现在事情这么紧急，只好试一试了。

我说：“那好吧，你能不能打开城门？”

他说：“咋不可以？我去给县长说，谣传城外有一股人在活动，要出去看一看。”

我说：“那好，你先到城里康家祠堂，找一个叫徐魏氏的女人到这里来。”

彭杰听了，口里念着，转身就跑，不到一刻钟就把人给我叫来了。我把情况给徐魏氏大概说了一下，最后吩咐她赶紧回魏家沟去报信，越快越好。

正是月黑头，外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彭杰说：“没关系，我把电筒给她，我去拿县长的。”说完转身又跑了。一会儿，彭杰腰间挂了一支手枪，手上提了两个手电筒，威风凛凛地走进来说：“我把马都弄出来了，她骑马走。”我说：“不行，马是你弄出来的，等会儿你交不了差怎么办？”

他说：“那我就带她出城去，严县长还叫我多带几个人出去呢。”说着就把电筒交给徐魏氏，跟她一道出去了。过了好大一阵，彭杰回来了，说：“大姐，人我已经给你送出城了，守兵问我是谁，我说是我的一个亲戚，住在城外的。我出去，骑着马在南较场跑了一圈，回来就对严县长说查清楚了，是来了些人，不过都是些做生意过路的。严县长还说我辛苦了，叫我赶快去休息。”

我松了口气，说：“你是该去休息了，忙了这大半夜了。”他却说：“这算什么，我再到团练局看看，看他们走了没有。”说完一溜烟又跑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彭杰又跑回来，悄悄跟我说：“现在都十二点了，黄楚奎的人还在慢条斯理捆绑腿、吃宵夜，怕要一点钟才走得出去。”

我听了心里暗暗高兴，魏家沟离岳池城不过六十里路，徐魏氏走了怕有两个钟头了，看来黄楚奎他们是赶不上了。我们正说话，袁大娘披着衣服过来，看见彭杰就说：“又是你，彭副官！一夜跑几趟，精神哪有这么好，你不休息人家要休息嘛。”

彭杰横了她一眼，说：“袁大娘，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你莫管这么多，有我这个副官在，你还真的怕廖大嫂跑了不成？”袁大娘不高兴了，嘟囔着边走边说：“我哪敢管你彭副官，这门，我也不爱锁得了，随便你们说到好久……”

后来我听说，那晚徐魏氏跑到魏家沟，都三更过了；玉璧他们真的在开会，立即把全体队员连同魏家大院的男人都撤走了。等黄楚奎带人慢慢赶拢，天都快亮了，整个魏家沟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黄楚奎命令他的士兵去挨门挨户喊门，结果一二十户人家的大院子，只有二姐一个人在家里。黄楚奎就问她魏连周在哪里，二姐说到岳池城里看病去了。

黄楚奎又问她：“你们沟里的男人呢？”

二姐说：“这沟里的男人都是石匠，到各场去做活路去了。”

这一下，黄楚奎和士兵们一起骂了起来，都说是尹元亨这个家伙又捣蛋，他妈的和廖玉璧有什么仇，又来谎报，头一次还没有把他罚够吗？害得

我们觉也没有睡，深更半夜地白跑一趟。一行人一边骂着，连饭也没捞到吃就开回城来了。黄楚奎一进城就对团练局长王司义说：“尹元亨这东西混帐，又谎报敌情！我们跑了大半夜，连鬼都没找到一个，真是拿我们当猴儿耍呢。这回非把他关起来不可！”

王司义把这情况向严定礼报告了，严定礼真的把尹元亨和他的管家一起关了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天气渐渐热了。范永安来了一趟，说现在我们四处出击，人手不够，能不能设法把陈亮佐弄出去。范永安走了之后，我找陈亮佐、李仲生商量一阵，决定让陈亮佐做张呈子，找彭杰出来作保。

第二天，彭杰来看我，我说：“彭杰，找你保个人，你干不干？”

他连忙问：“保哪个？怎么不早说？”

我说：“男监的陈亮佐，是我远房的一个兄弟，家里有妻室儿女，全靠他教书挣点钱过活，现在弄得衣食无着的，你不如做点好事。”

彭杰问：“他是什么案情？”

我说：“是去年赶阳合场在路上捉来的嫌疑犯，你就说是你女人的堂哥，从前不晓得，昨天碰到他家里来人看他，你才知道的。”

彭杰直是点头，说：“我去试试看。”

周辉同说：“什么试试看？大姐托的事情，你要努力办才行啊。我们都可以证明，人家关了一年多没出过事，规规矩矩的。”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陈亮佐的呈文还没有送上去，彭杰就笑嘻嘻地来了，说：“有把握！严定礼问我是不是真的，敢不敢担保，我说当然担保，他就答应了。”

陈亮佐把呈文写好递上去后，严定礼第二天就提案过堂。陈亮佐照着编好的一套说了一遍。严定礼就说：“你找一个保人。”

陈亮佐看了一下周围，指着彭杰说：“啊，彭大哥在这里，我找他保。”

严定礼就问：“彭杰，你保不保？”

彭杰说：“我当然保，我的亲戚。”

就这样像做了个过场，陈亮佐就被释放了。

事后，我送了件衣料给彭杰作为酬谢。起初他不要，推辞了好一阵才收下了。李仲生说：“彭杰不错，讲义气，两件事情都办得漂亮。”

彭杰很得意地晃晃脑袋，又看了我一眼，故作委屈地说：“就是嘛，人家巴心巴肝的，还信不过人家，这下子该不会说我要去抢什么头功了吧！”

周辉同说：“看你得意的样子！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都是撞上的，你不过顺水推舟、举手之劳罢了。若是去说动你那个军长姨爹，让他把你大姐放出去，才算你娃娃真的有本事。”不料彭杰被周辉同这么一激，倒认起真来，说：“明天我就回广安去，去跟我姨妈说，保不准会起点作用呢。”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彭杰以为我们笑他说着玩的，越是着急地说：“不是开玩笑，我真的要回广安去。听说现在形势紧得很，徐向前的队伍打得很厉害。杨森在广安四处招募新兵，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开拔。我去打听点消息，要点钱来给大姐用也好。”

我说：“彭杰，你莫为我费心了，没有用的。”一边看了黄锡成一眼。黄锡成就说：“大嫂你莫管那么多，我也跟他一路，搭个伴儿。”

过了六七天，彭杰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大姐，不得了！”我问：“啥子事不得了？”

他说：“红军啊！红军不得了。红军打垮了不可一世的田颂尧，又收复了一度失守的通南巴三县，正以破竹之势攻进廿军驻守的营山、渠县。夏炯和杨汉忠跟红军一接火就溃败下来，一个团长被俘了，一个团长被打死了。接着杨汉域和李朝信在营山的防线也被红军击破，兵败如山倒，连营山县城都丢了。红军打进了渠县和蓬安，听说先头部队已直抵离广安城九十里的花桥！现在军长正在成都开会，电报一个接一个地打回来。广安城里紧张得不得了，那些军政长官的太婆们都吓慌了，正在找船，要跑重庆！”

我说：“你姨妈呢？她跑不跑？”

彭杰摇头叹气地说：“她敢自作主张吗？还不是要等杨森回来。我趁机把你的事情说了，让她给自己留条后路。她说军长这两天就要回来，她一定去说。”

我听了彭杰这些话，心里好高兴，又问：“黄锡成呢，怎么没看见他？”

彭杰听了，有些惊讶：“黄锡成还没回来么？他说是有点事情，从我姨妈家出来就分手了啊。”

第二天，彭杰又来说：“大姐，罗渡溪打了一仗，是廖大哥带人去打的。”

我一瞪眼：“你莫乱说。”

彭杰说：“哪个哄你？严县长接到电话，喊派兵。我和周辉同就说，岳池城里就这点队伍，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派出去了，你这县城还要不要？严县长就没有管。我们又劝他说，还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凡是廖玉璧的队伍，就莫去管。他说就是，陈玉屏还关在这里，怕要加些人守。李仲生说守什么，二天廖玉璧打进来了，你把陈玉屏一放，保准没得事。”彭杰说得摇头晃脑的，逗得我也忍不住笑了。

又过了两天，范永安来了，说起罗渡溪那一仗，还打得不小，只是可惜了。我问他可惜什么，他说：“可惜信来晚了，敌船没拦住，老谭谭之中也牺牲了。”

我心中一惊，叫他快说。

范永安说：“大哥接到黄锡成送的信，就赶快调集队伍，准备在渠河沿岸袭击敌人运送家眷的船队。殊不知刚把队伍带到河边，船队就来了。这时对岸的队伍又没赶到，只有我们不多的一些人，就动员了一些老百姓沿途追着打。在罗渡溪打了一仗，没拦住，我们又赶金山寺，打烂了一只船。眼看水面宽了，敌船只要下了滩，我们就没办法了，这时有人在喊：中间那只大船上装的就是夏炯向廷瑞的老婆，他妈的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让她们都拿命来抵！老谭一听这话急了，跳上一只小船就向敌人冲过去，这边夏林连忙组织机枪掩护。眼看老谭一个箭步跳上了那只大船，那船上的人哭爹喊妈，直朝水里跳，可他自己却被船上的护兵一梭子弹打倒了，一晃几下，栽到河里……”

大家沉默了一阵，江胡氏轻轻地问：“老谭他人呢？找到没有？”

范永安点点头，说：“找到了，抱到岸上，才发现中了不少一枪，好密的子弹哟。夏林和屈由路见老谭死得这么惨，敌船却跑掉了，气得不得了，带了几十个人回去把罗渡溪打了，把那个什么市镇管理处打得稀烂，巡官汪海洋打死了，还打伤了两个巡警。这一带四乡八场和邻近几个县的豪绅巨富们忙着跑重庆，听说水路保险些，都带了金银细软住在罗渡溪的栈房内等船，也通通被我们轰了出来，财物全部没收，听说东西还不少呢。”

罗渡溪一仗，使敌人成了惊弓之鸟。我们的人又和各地党组织一起行

动，一夜之间，在乡乡场场都贴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军阀”“欢迎红军消灭杨森”“工农红军万岁”的大标语。这些标语都用鸡蛋清作浆糊，多少年之后也撕不掉。听说我们的河东支部还动员了学校的师生，不仅将标语写上了墙壁和铺板，还用粉笔写在大路上。标语也贴进了县城，岳池城里传廖玉璧的队伍要来攻城，闹得一日数惊。我的牢房里也突然热闹起来，提着礼信的各色人物牵线般地进进出出，许多人我根本不认识。还有的穿得花枝招展，一来就三姐长三姐短的，说二天廖大哥的队伍进城了，麻烦你当姐姐的关照一下，就说我们那口子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去吃那碗饭，请他枪口下留条活路。我莫名其妙地说，你的那口子是吃什么饭的呀？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在廿军里当什么长。

我烦得要命，就对袁大娘说：这些人我一律不见。可是她拦不住，说都是有头面的。我说那就麻烦你把门钥匙交到李仲生那里。可是那些人还是不走，在牢洞口守着说。我把牢洞口也关了，他们就把礼信堆在门口。晚上袁大娘开了门，抱着一堆礼盒问我咋办。我看也没看，一挥手说：“分吧，你捡两盒去，其余的，都分给男监女监的难友们。”

袁大娘抱着那堆礼盒直摇头，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恐怕还没见过你这种犯人。

形势如此紧张，在成都开会的杨森坐不住了，连忙赶回了广安。杨森在成都参加的是刘湘主持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此时的刘湘刚刚击败了他叔叔刘文辉，被蒋介石封为四川省主席，又有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的田颂尧拥戴，气盛得很；他将各路军阀召集拢来，提出了六路围攻川陕苏区的计划，给杨森封了个第四路总指挥。杨森回来，立即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轮流开赴前线，同时又抓民夫修碉堡，清查户口，保甲连坐，办什么政治军事训练班，培训特务和反共爪牙。听说叛徒范子奇就在他的什么大队里任少校教官，秘密处死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学员和两个分队长，还带着人四处搜捕我们的同志。

严定礼的县衙里也忙起来了。要打仗，就要粮草，要借“剿匪”的名义，增加苛捐杂税，大量搜刮民财，这一年光是农民的田赋，就预征了十二年。严定礼还额外被指派了十万元军饷，要限期送到广安。县衙里的人都出动了，连李仲生、彭杰他们来得也稀疏了些。

一天下午，周辉同匆匆到监里来，说严定礼的十万款子收齐了，军部的提款委员也来了。严定礼踌躇了半天，觉得别人都不可靠，就决定派周辉同和李仲生带上一个手枪排，和提款委员一起押送到广安去。

周辉同说：“大姐，时间很紧急，我们又脱不了身，就先商量了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说着就对着我的耳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

我想了想，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太冒险。

周辉同说：“不冒险咋行，十万粮款哪，怎么能让杨森拿去打红军？再说这一向杨森到处强收粮款，逼得好多农民弟兄都来投奔我们，我们山上正差钱用呢。”

我说：“就你们两个人，再加上你说的那两个兵，万一拿不下来咋办？就是拿下来了，恐怕也没办法运上山去……”他说：“这个我们也商量了，黄锡成托词他要下乡催款，早就起身报信去了，到明天晌午的时间差不多，我们拖着走嘛。”

这一仗无论打得怎么样，周辉同和李仲生都不可能再回县城来了。我

们处了这么久，一起干成了好几件事情，想到要分手，心里都挺难受的。周辉同拿了一包糖果出来，说：“大姐，仲生忙得很，又有那提款委员守着，就托我来一同告别了。我们走了，你自己要保重，要再有什么事情，就只有找彭杰了。”

我点点头，说：“我晓得，你们一路谨慎，祝你们一帆风顺。”

周辉同点点头，眼睛里泪光闪了闪，连忙扭头走了。我守在牢洞边，好久没说话。

第三天上午，彭杰急冲冲进来，见我就说：“大姐，不好了，听说李仲生和周辉同押送的军饷，昨天在岳门铺被劫了。也不晓得是什么人劫的，跟去的那一排兵和民夫，一个都没见回来！”

我听了心里好高兴，就问：“你们严县长呢？这么多款子不见了，总要派人去追查嘛。”

彭杰说：“追查？现在到哪里去追查？到处打电话，都没有下落，只听说那个提款委员被打死在岳门铺的茶馆门口。现在严县长正急得团团转，骂周辉同和李仲生是瘟猪！唉，也不晓得他们两个咋样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过了两天，范永安来了，给我带了二十块钱，说：“大姐，你也用点杨森的军饷吧。”

我和江胡氏都笑了，叫他好生摆下事情的经过。永安摆着头说：“这回简单得很，大哥说，就像《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那样。”

那天，太阳大得很，脚夫们挑着银元爬坡上坎在山沟里走，都喊恼火。周辉同就叫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可是担子还没搁下来，就被那提款委员一鞭子打过去，嘴里只是骂着：“你们骨头造痒了么？挑着这十万元款子，在这山沟里歇脚，出了事情怎么办？”

周辉同一步上前拦住，说：“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这么大的太阳，你来担嘛。你咋不把人当人啊？”

那提款委员提着鞭子，盯着周辉同说：“你反了！你晓得这十万款子有好重要？军部等着要，出了事情你负责？”李仲生走过来，慢条斯理地说：“提款委员，你说话要有个轻重，你口口声声说十万款子十万款子，本来旁人还不知道我们挑什么，你这一闹岂不是有意地给别人放信，你还吵谁反了？出了事我看就是你负责。”没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那家伙气得脸发青，一对眼睛鼓得猪卵子一般。

就这样磨磨蹭蹭，晌午都要过了，才走到岳门铺。这是从岳池到广安的中点，两面高山，中间一条狭路，常有土匪出没，商旅都要结伴而行。周辉同一看，士兵中的两个大汉，已早早跟在了提款委员背后，就说：“李副官，就在这里吃晌午嘛，天气太热，这路硬是赶不起走。”

那提款委员一看，场口的大树下坐了好些人，连忙喊了声：“枪上红槽！”就要指挥手枪排的士兵散开。

李仲生白了他一眼，大摇大摆走上前去，摸出纸烟对着一个汉子说：“大胡子，接个火。”

这大胡子正是金积成，把扁担横在篾篓子上坐着，悠悠闲闲抽着叶子烟，身后同样坐着好几个人，像刚刚送完粮歇气的农民。金积成把火递给李仲生，轻轻说了声“带到前面茶馆里”。李仲生站起身来，对着后面的周辉同把手一挥，径自进了场口。

脚夫和士兵们都巴不得歇下子，跟着李仲生鱼贯而入。提款委员自讨没趣，只好随着，周辉同走在最后。眼看队伍都进了场，忽然从茶馆里出来十多个人，为首的夏林提着两支枪，大喊一声：“什么人？挑的啥子，检查！”提款委员说：“军部的，谁要检查？”

“老子们就要检查。”夏林走到提款委员身边，用枪抵着他的胸口，喊声：“举起手来。”提款委员着慌了，忙说：“打！打！打啊……”话没说完，就被一直跟在他后面的两个士兵绑了。这时上下左右都是我们的人，个个拿出手枪把押送的兵和脚夫团团围住。李仲生站出来说：“弟兄们，不要惊慌！这粮款是我们岳池老百姓的，不能让杨森抢去，我们要送给华蓥山上的农民自卫军打军阀，打土豪。”

一个脚夫大声问：“自卫军，不是廖大哥的队伍么？要得，要得，我们巴不得呢！”

周辉同又说：“农民自卫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弟兄们哪些愿意上山的，就跟我走。”

那些士兵见带头的副官都反水了，个个都丢了枪。一些人说愿意，跟着上了山；还有些人说屋里头离不开，就叫他们脱了衣服走了，一人发了十块钱，大家都高兴得很。只有那个提款委员急得跺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你们反了！”

周辉同用枪点着他的脑壳，说声“是反了”，砰地一枪，他就像根桩子一样倒了。

岳门铺的团防听见枪声，赶忙端着枪出来，被金积成两枪打在脚跟前，连忙哎哟一声缩了回去。

不久，严定礼被杨森撤了职，说是因为他掉了粮款，释放了政治犯（这当然是指陈亮佐），有通“匪”嫌疑，调回广安，听候处置。岳池县长由张俊昌来接任。

彭杰来看我，唉声叹气地说：“大姐，这次我跟着严县长回广安，还不知是凶是吉。听说周辉同、李仲生他们两个跟廖大哥上了山，我想跟他们一道去！大姐，你开个条子给我，我去找廖大哥嘛！”

我看他眼泪汪汪的样子，心里很同情，但是哪能轻易开条子。这年轻人的确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但是毕竟嫩了些，很多事情想得很天真，没吃过苦，社会关系又过于复杂，不适合到那么艰苦的山上去。我说：“彭杰，听大姐好生给你说，这条子我不能写，一来你廖大哥到处跑，你找不到他；二来万一被发现了，对你也不利。再说革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有这么好的关系，回广安去立稳了，将来有什么事给我们透个消息，用处大得很呢。革命嘛，工作多得很，哪里光是行军打仗……”

彭杰听了我的话，晓得条子是拿不到了，抬起头来无可奈何地说：“大姐，我一走，你连个使嘴的人都没得了。你和江大嫂，各自要小心啊，有什么难办的事情给我捎个信来，今后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说：“彭杰，你也要小心，到了广安嘴巴要牢靠，莫乱说。你那姨爹说起共产党连亲娘老子都不认，莫暴露了你和我们的往来。”

彭杰点点头，抓住我的手说：“大姐，你要相信我啊！”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大姐相信你，你为革命做了这么多事情，大姐当然是相信你的。”

第二天，彭杰和严定礼一起回广安了。以后就一直没见到他，再后

来就音信杳无了。

孤雁归群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俊昌一上台，就干了三件坏事：一是把恶霸尹元亨和他的管事放了；二是撤换了许多乡长保长，重新安排了一批自己的爪牙；三是大量逮捕人。几天工夫，监狱就装满了各处新来的犯人，有的没有铺位，就睡在地下。

我的牢房里不得清静了，先后关进了好几个人，一问，都是我们的家属。一个是分队长秦敖的女人，因为秦敖最近在新场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的一个团长，敌人就到他家里去，把他的女人抓来了。我问了她被捕的情况，对她说：“你原来的口供要改，先把姓改了，说秦敖是你的姐夫，你是来给姐夫做生期酒的，被抓错了。”还有一个叫谭江氏的女人，连同她九岁的小儿子也被抓进来了，他们是贵州的少数民族，到四川来做生意亏了本钱，就加入了刁仁义刁大哥的队伍，也是新场那一仗中打散了抓进来的。我也叫她改口供，让她说一家子从贵州到武胜、岳池来进货物，碰上了打仗，打散了，不知道男人躲到哪儿去了，自己和儿子被糊里糊涂抓了进来。

我给她们两个都做了述呈，叫她们过堂的时候去喊冤。

还有一个女人，姓罗，叫罗玉贤，穿得很好，还镶着颗金牙。开始我们大家都看不惯，处处避着她，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周复初的女人。周复初、梁百川和范子奇一起，都是我们打入甘军的营长。他们十来个人组成了秘密军事小组，范子奇是组长。余家场事变之后，范子奇暴露了，不久叛变；周复初和梁百川也都被捕了，还把他女人也抓了进来。罗玉贤没经过世面，经不住吓，一抓住就认了梁营长，说常到家里来。我怕她嘴巴不稳，再上敌人的当，就紧紧嘱咐她：“你不能乱说啊，供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咬一个，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当证人，出不了监狱。即使他们拿大刑给你受，你咬紧牙挺过那一下，也就没事了。”她听了我的话，再提审的时候，敌人追问还有哪些人和周复初好，哪些人常在她家里进出，她都说不知道。

后来，周复初被押到广安，途经岳池时在这里借监关了两天，到广安后，没两天就被押上刑场，牺牲了。

熟悉的人都走了，范永安和徐魏氏也好久没有来。天气渐渐冷了，新进来的几个人都只穿了单衣，又没钱，我就拿了两块钱，叫袁大娘帮着买了些鞋面布和什字花线，画了些花呀朵的教她们绣些鞋面子，叫袁大娘拿了到外面去卖，挣下几个钱来做棉衣穿。

一天，监门外一阵嘈杂，江胡氏跑到牢洞口一看，立即叫声：“天哪，怎么连和尚也抓进来了？”我听了连忙跑过去看。那和尚正从牢洞口走过，尽管一张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还是差点喊出声来：是法慧！法慧的袈裟被撕成了条条，走路也一跛一拐的，像是虚弱得很，只是脸上很平静。

这一下我可急坏了，怎么连他也被抓进来了，山上到底怎么了？陈亮佐呢？周辉同和李仲生呢？还有玉璧……情况一点都不了解，真是急死人了。

一会儿，袁大娘进来了，我说：“袁大娘，你快去问问那和尚是怎么遭的？真是造孽，怎么连和尚也抓啊？”袁大娘叹了口气，悄悄说：“陈先生，你不晓得，张县长比严县长凶，凶得多。听说这个和尚是在阳台场化缘时遭的。还有两个跟他一路，想跑没跑脱，打死了。还不是那个黑心子王尧，说杨军长早有密令，华盖山的和尚没有一个好的，不是共匪也是通共，一个都不准放过。”

晚上，袁大娘照例来念经。我念了两句觉得无心无肠的，突然心头一动说：“袁大娘，你是信佛的，我也是信佛的，可是我们没有经念。现在男监有了个和尚，不如请他写点怎么样？也好积点阴德啊。”

袁大娘听了很高兴，说：“那我们找他写啥子经呢？”我想了想，说：“就写‘心印经’吧。听说这部经书是解冤解仇的，这监狱里，冤死鬼好多啊！”

袁大娘听了，直说“要得要得”，转身就要走。我说：“莫忙，你这样突兀兀的，人家怎么会写。我给你写个条子，写几句客气的话，礼仪要做到嘛。”袁大娘忙说：“还是你们识文断字的人想得周到。”

我写了两句话，后面落上“陈玉屏”三个字。袁大娘连忙喜颠颠地拿走了。过了一阵，她过来对我说：“和尚看到了，点了头，只是他伤得很重，看样子要过两天。”

两天过去了，没看见法慧抄来的经书。又过了两天，刚刚吃了早饭，就听见男监那边有人在喊：“提僧法慧！”我连忙走到牢洞口，法慧已经走过了，看着他的背影，想到他那本来就很弱的体质，我心里一阵阵发紧。一会儿听得大堂内一声惊堂木响，接着是张俊昌的声音：“僧法慧，你见了本官为什么不下跪？”

僧法慧说：“我们出家人，只能跪在佛爷面前，不跪官。”张俊昌发火说：“哼！不跪就给我打！”

一阵劈劈啪啪的皮鞭声，传了多远。江胡氏的孩子吓哭了，紧紧地抱着妈妈；江胡氏默默地低下头，没有说话。张俊昌又一拍惊堂木：“我问你，华盖山有多少和尚参加了共产党？哪些人和你是同党？宝顶寺上的红旗是谁插的？”“我们和尚，跳出三界之外，不问红尘中事，不晓得你们这个党那个派的。”

“不晓得？廖玉璧打桂花场，就是让你们和尚做的探子。”“谁做了探子，要有证据，不能平白诬栽我们。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不做亏心事？你们那两个和尚为什么要跑？”“你们处处诬栽好人，要害死好人，好比狗撵兔子，为什么不跑？”

“胡闹！给我上刑！”

接下来就听见搬老虎凳和上杠子的声音，后来听见法慧“哎哟”叫了一声，一下子气没有了，一个士兵就喊拿水来。歇了一阵又听见法慧哑嘶嘶地叫了一声：“张俊昌，我认得你！”张俊昌拍着惊堂木直叫用刑，法慧又昏过去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法慧被两个士兵抬了回来，一双脚杆完全被打烂了，糊满了血迹，看见的人没有不流泪的。

晚上我睡不着，点着一盏油灯，望着墙壁出神。袁大娘走过来，轻轻地说：“陈先生，都打三更了，还不睡？”我说：“睡不着，不想睡。”

袁大娘在床边坐下，叹口气说：“早先听说，张县长也是信佛的，怎么敢把一个吃斋把素的和尚捉来，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怕佛主降罪，现世

现报么？”

我咬着牙说：“他们这帮子人都要遭现世报的，一个都跑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法慧的经书还没有写过来。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有点怕听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又过了十来天，袁大娘惊慌慌地跑来，说：“不好了，军部来了命令，说华蓥山的和尚不管是好人坏人，逮到就通通要枪毙。陈先生，那和尚分明是活不成了！”

第二天，法慧又被提去受审了。他脸色灰白，被两个兵架着，显得很衰弱。我看见他的背影，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大堂上，只听得张俊昌拖长声气说：“僧法慧呀，你看，军部的命令都来了，要枪毙你。你这么年轻，何必一定往死路上走？招了吧，啊？”

又听见法慧也慢慢地、声音很清晰地说：“对我们和尚，不消用死字吓唬。死就是生，生就是死。生为普渡众生，生而无愧，死为弘扬善德，我决不后悔。只是佛门有句话，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和师兄弟逃不出这个劫数，你们这些恶人也一定没有好下场的。”

“好你个小和尚，看你年纪不大，嘴头倒硬，死都到眉毛尖了，还不肯招么？！”

“我佛门中人，不打诳语，宁死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这一次，没有动刑，可是法慧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了。他被人架着从我的牢洞口经过时，回过头来笑了一笑。吃过午饭，我对袁大娘说：“和尚伤得那么重，我们不能光是请人家抄经书，还是给他送点钱过去，看他需要些什么，补补身体。”

袁大娘拿着钱过去，一会儿又过来，说：“和尚说了，多谢你陈先生，请我用这些钱，给他买些檀香。”我说：“那他一定是要烧香敬佛了，也算是替我们许个愿。你就帮了这个忙吧，剩下的钱，还帮他买点糖果，敬神也要用的。”

檀香和糖果都买回来了，法慧又请袁大娘帮他打了一桶水，洗了脚，擦了身，接着又点起亮，抄经书。袁大娘过来说起，感动得不得了，说这个和尚这么虔诚，来世一定要大富大贵的。

我听了，也松了口气。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我就被袁大娘摇醒了，她哭丧着脸说：“和尚死了！”

我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差点栽下床去，慌得江胡氏一把抱住我。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江胡氏失声痛哭，心里喊着：“法慧，你还是个孩子，还是孩子呀……”

几个女犯人，都陪着我掉眼泪，女监里一片唏嘘之声。好一阵江胡氏才问袁大娘：“不是说昨下午好了些，在帮你们抄经书了吗？怎么又……”

袁大娘叹息一声，在我床头坐了下来。

听管男监的李老尧说，昨晚和尚把经书抄完，就请人扶他起来，从随身的褡裢里找了套干净的袈裟出来换了，又把檀香点燃，放在长凳上，接着把糖果也放了几颗在长凳上，余下的都分给了难友。一切收拾停当，法慧又请人帮忙，吃力地打着盘脚坐好，然后朝大家笑笑，很感激的样子，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就闭上了眼睛。

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在拜佛烧香。后来一炷香都燃完了，还见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一个大胆的就去摸：周身已经冰凉了；只是脸上带着笑容，跟活着的时候一样。

袁大娘说着，把一个白布包递过来。我打开一看，是法慧给我抄的“心印经”。娟秀的姑娘一样的笔迹，立即使我想起在猫儿寺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泪水止不住又流了下来。忽然，我发现那“心”字成了“ ”字，好像在心字上面加了个廿头，可一细看又不大像。我觉得奇怪，再往下看，发现好几个这样的字，我把这些字联贯起来，一揣摸，就成了一句话：我为共产党至死不变。

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十八日。天气阴沉得很。一个年轻的和尚死在我隔壁的监狱里，他还不满十九岁。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张俊昌用严刑打死了一个和尚的事，马上在监内外传开了。人们把法慧的死愈传愈神，都说这是个虔诚的好和尚，如今天下大劫，佛祖派他下界来体察民情，现在成了正果，乘着高香升天去了，哪里会等着来挨那一刀之苦。还有人说，杨森、张俊昌冒犯了佛祖，怕是立马要遭报应了。听说人家红军就是佛主派下界的天兵，正月间在通江打败了田颂尧，刚刚又在达县、宣汉打败了刘存厚，什么制币厂、兵工厂、被服厂都落在了红军手里，这下子啊，该杨森去挨刀了。他张俊昌还说自己是信佛信教的，大家睁大眼睛看他的下场吧。

张俊昌的老婆听了这话，心里害怕了，找到袁大娘问情由。袁大娘也添枝加叶地说着法慧的好话，着实把她吓唬了一番。那女人直是求着袁大娘想个办法。袁大娘就说女监里的陈先生，得了和尚升天前传的真经，一定是位能够逢凶化吉的贵人。听说她会画佛像，你不如去求她画上一幅，挂在屋里天天朝拜，说不定佛主见你心诚，会发了慈悲呢。张俊昌的老婆就提着礼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求我。我想着法慧的死，心里怎么也消不下这口气，不理她。后来袁大娘帮着说好话，我转念一想，利用这个机会，让这女人管管那张俊昌也好。于是就给她画了一张，还在两边写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几个字。那女人高兴得不得了，果然拿回去挂在堂屋里，一天三炷香，还拉着张俊昌一起磕头作揖。

张俊昌的女人出去一宣传，县府里一些幕僚的太太小姐们也来了，或者求我画佛像，或者是画枕头被面鞋面子什么的，牢房里整天油灯通明。大家都趁机做些针线，我也好给那些官太太们摆些扬善抑恶的道理。张俊昌的女人听了我的话，今天缠着张俊昌要放这个，明天缠着他要放那个，没多久就把秦敖的女人、周复初的女人、谭江氏和她九岁的儿子都放了出去。听说还为了放我，跟张俊昌大吵大闹，说若是不放了陈先生这样的贵人，就赎不了打死和尚的罪过。

秦敖的女人出去了才两天，又回来找我，一见面就拉着我哭，说秦敖牺牲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那你还不赶快走？”

她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说：“大姐，我现在没了亲人，你快帮我出个主意，你说我该咋办啊？”我连忙把她扶起来，说：“你莫哭了，莫动声色，咬紧牙关，赶快带上你那几个儿子走，先到你妹妹家，然后走得越远越好。这辈子只要把儿子们养大，就能够给老秦报仇了。”

她点点头，站起来，偏偏倒倒地走了，以后就再没听到她的音信。

转眼间，腊月又来了，牢房里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又只剩下我和江胡氏两个人了。

腊月十一，是我进来一个对年的日子，我几乎一夜没睡，想着一年来在这牢房里经历的许多事情，想着刘铁、金华新、段前迪、罗平精和法慧，又想到李仲生、周辉同还有彭杰……整个脑子乱糟糟的。这一年我如果在外面，不知道运了多少枪弹，打了多少仗了；这一年我们的人牺牲了好多，也不知道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刘铁牺牲了，我又不在，党内党外的事情玉璧都要管，队伍发展得这么快，参加的人又这么复杂，他管得过来吗？那么多人在山上，粮食给养跟得上吗？听说他今年到阆中、顺庆开了好几次会，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说的。前次范永安来说，红军把达县、万源的刘存厚一打垮，川东川北的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还说杨森派出的队伍都在营山吃了败仗，被红军打垮了两个团，现在队伍残缺涣散，风声鹤唳，守着防线动也不敢动，我们的队伍说不定就要正式扯出旗号来，跟红军会师了呢……

正想着，袁大娘走进来，笑嘻嘻地说：“陈先生，给你道喜！”

我和江胡氏听了，都一惊。我随即镇定下来，翻身坐起说：“道什么喜，要枪毙就明说，我进来就晓得有这么一天，不忌讳的。”

袁大娘还在笑，说：“真的是道喜，今天要放你。”

我说：“放我也好，枪毙我也好，我都没得话说。”袁大娘有些急了，说：“真的放你，是军长打电话来喊放的。”说罢便急冲冲地走了。

我瞪了她的背影一眼，心想你这个狱婆都当老了，怎么还不明白事理？现在杨森被我们打得这么恼火，怎么会放了我？

我把剩下的钱清点出来，交给江胡氏。她抓住我哭着说：“大嫂，咋办？咋个办嘛，你快说啊！”

我对她说：“没关系，你要坚持着，就是给你受大刑，你也不要暴露，始终说是我的保姆。这钱给你娘儿俩留下作生活费用，如果有剩，二天就交给组织上。”

我又把仅有的两件衣服递给她：“这两件衣服你拿去穿，好好带着孩子，要爱护身体。如果我们有人来，你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我的尸体收不收没关系，叫他们狠狠地打敌人！”

牢饭送来了，我根本不想吃，到洗脸的地方，把脸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又用梳子仔细梳头。我得把自己搞得伸伸展展的，上刑场也显得有精神，喊口号也才有劲。江胡氏含着眼泪对我说：“大嫂，你吃点饭吧，我另外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笑笑说：“不要乱花钱了。”

外面闹嚷嚷地来了一群人，两个士兵大声说：“提陈玉屏！”

我挺起胸脯，昂着头，精精神神走了出去。

可是一走出牢门，就看见张俊昌的老婆迎上来，把一根大红绸子搭在我身上，笑嘻嘻地说：“恭喜你，陈先生，你今天脱法了！”

我正在发愣，又见袁大娘点燃一饼鞭炮，走到我面前说：“真的，陈先生，是放你。”

江胡氏在牢房里呆呆地看着，突然醒悟过来，跑到门口抓住袁大娘使劲地喊：“袁大娘，你再帮我买点！再帮我买点鞭炮啊！”

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了，炸得红色纸花儿到处乱飞，难友们都站在牢门口朝我挥手。县府的人听见鞭炮声响也跑出来看热闹，有几个熟悉的法警和求我做花画像的太婆，都笑嘻嘻地说：恭喜你陈先生，老天有眼，好人终归有好报的。

我实在弄不懂这是耍的啥子把戏，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堂上，听他们咋个说。

张俊昌坐在大堂上，看见我来了，堆起一脸的假笑说：“陈玉屏，我接军长来电，放你！”

我愣了愣，问道：“要不要保？”

“军长的电要什么保？”

我松了口气，又立即想到江胡氏。我说：“今天是腊月十一，这莫须有的罪名，算起来把我整整关了一年了。现在我出去了，可是我的保姆呢？”

“那不行，军长只说放你。”

我说：“保姆是随我一同被捕的，既然我都可以放，为什么保姆就不能放？”

“军长没有命令，不能放。”

我说：“法律上不是有假释一条吗？我可以保她。”“那非要连环保不可！”

“多少人我都找！”

张俊昌一下就哽住了，他思索了一会儿说：“十家连保。”

这张俊昌明明是在刁难我，我刚刚出大牢，哪里去找十家连保？想了半天，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到烟馆里去找了几个烟鬼，又到江胡氏的侄儿媳妇——开“一品店”旅馆的老板娘王左氏那里去找了两家，凑够了十家，做了个保状递上去。当天晚上，江胡氏就放了出来。第二天我就打发她回到义和场她丈夫那里去了。

正是数九寒天，落着大雪。我一年没见过白天，一下出来身子轻飘飘的，加上替江胡氏找保跑了半天，头晕得不行，就在一品店住下来。我心里明白，现在还不能走动，敌人不会那么轻易就放了我，十有八九是放长线钓大鱼，用我去钓玉璧的。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兵到一品店，守着我说：“你出来了，怎么不走？”

王左氏在旁边说：“她刚出来，受了风寒，要请医生看。”

现在一无钱二无亲的，你们撵人家走哪里去？”有一个兵说：“嘿，她的亲戚不是很多吗？”

我没说话，心里陡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是的，这小小的岳池城，是我从小读书生长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和熟识的人。出了这牢房，转过几条街，就是那座被称为康家吊楼子的大宅子，那里曾住过疼爱我的外婆、大舅和成天簇拥着我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姐妹们，使得这座古老的宅子，在我心里从来都珍藏着一种亲切和温暖。可是这一切，都永远成为了过去。自从我打梁山回来和玉璧一起上了山，大舅家里就担惊受怕。满门的亲戚朋友们都忿然作色，说我一个书香门第的纤纤女子，那么好的天分不去继续读书教书做学问，却去和那些草头王们一起聚众造反，成天被人家贴着大布告四处通缉，左一个共匪右一个共匪的，真是丢尽了康家陈家的脸。大舅软硬兼施，劝说无效，一气之下和我断绝了关系，还不要表姐妹们和我往来。

不过表姐妹们也都四散了。前不久，唯一在家的二妹正芬，背着大舅到牢里来看我，泪花花地问我想要吃什么。我说好久没沾油荤了。正芬回去就悄悄给我炖了一大沙锅腊肉送来，自己第二天就起身去了上海。我不能去

送她，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谢她，她是我姑娘时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表妹。

我看着门外，阴沉沉的街道上，飞着漫天的大雪。姐妹们的笑声从此消失了，这座曾经宠坏了我的小城，对我板着一张冰冷的脸。欢迎我的，是另一个世界，那里艰难、贫穷，却很温暖，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人，正等着我，盼着我，他们成了我真正的亲人。

张俊昌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了王左氏的话，那几个兵还是轮流在店里晃。我就住在店里，也不动，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接。

腊月十三下午，我正在屋子里烤火，忽听得门外来了一帮人，其中一个大声地说：“老板娘，登个号！”

我听出这是陈亮佐的声音，连忙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们来了。

陈亮佐看见我出来，就递了个眼色，然后对王左氏说：“老板娘，我们把扁担放在这里，到街上去吃点东西！”陈亮佐他们出去后，我也对王左氏说：“王大姐，我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王左氏说：“你才出狱的人，要忌风啊！”

我说：“没关系的，不走远，就在这条街上。”

我跟陈亮佐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僻静处，他四周望了望没有人，就轻轻地对我说：“今晚上在南门外麻柳桥等！”说完就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有些为难了。这路怎么走呢？一品店在东门城门口，麻柳桥在南门外，从城外走吧，还有好几里路，从城内走吧，要穿大半个城，被人发现了怎么办？我埋着头往回走，一直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跨进旅店，就见火盆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一看是刘光弟，我们在城里的联络人，心里不禁一亮：他的家就在麻柳桥！我装着不认识，也在火盆边坐下。王左氏一边给我们介绍，一边热心热肠地请他给我看病。刘光弟笑容满面地说：“当然当然，医生嘛，就是给人解病除痛的。”说着就为我把脉。

外边有人进来，王左氏招呼去了。刘光弟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一边细声对我说：“马上从东门外边走，有人接你。”

天已擦黑了，我拿着药单子要出去抓药，可是王左氏死活不肯，说是我要忌风，她去把药给我抓回来。没有办法，又只得在她的店里坐着。等吃了头道药，天已经黑尽了，又涌进来好几个住客。趁王左氏正招呼，我悄悄溜了出来，一阵快步出了东门，见后面没有人跟我，就顺着城墙根儿放大了脚步，在转拐的一个小桥边，见到了陈亮佐和前来接我的二十多位同志。亮佐一见我就说：“快，出北门。”说着就把我拉上滑竿，用被子蒙上头，抬起就是一趟小跑，连夜赶到太平场。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次出狱，确实是雷青成费了不少力，而且是从刘铁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办起的。先是督着刘湘打电话到杨森的军部、军部说没有关这个人；又打电话找到严定礼，严定礼说陈玉屏在这儿是借监，没军部的命令不敢放；甚至还打电话找到了正在营山前线的夏炯，夏炯说要等和红军打完仗回来再说……这些电话都是刘湘亲自打的，据说前后共打了五次。曾三姐不肯罢休，和敏言带着两个孩子三番五次去找雷青成；雷青成又联络了两个要好的军官，趁着杨森最近到成都刘湘那里开会，当面督着他放人，说我是他的亲戚。杨森的队伍最近和红军交锋老吃败仗，听说已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再加上关了我一年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打电话叫张

俊昌放了，多留点心就是了。

谁知道几个兵轮流在店里转悠，也没能看住我。那天晚上，张俊昌派人冒雪追了我三十里，回来就把王左氏拉了去，要她交人出来。

王左氏说：“你们正大堂皇地把人家放出来，怎么又要追人家回去？脚长在她身上，我晓得她到哪里去了。”

张俊昌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听说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我的这件事情，被撤了职。

八儿认母

从太平场到石 场，沿途都是我们的人，见了面都亲热得很。一路上走走歇歇，走到华蓥山下，已经是腊月十九了。山上还和往年一样，积着厚厚的雪。大家听说我回来了，从坡上又跳又喊地跑下来，高兴得不得了。

突然一个男孩一把抱住了我，不住地喊：“妈妈！妈妈！”

我仔细一看，这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棉滚衫，袖筒长甩甩的，腰上拴一根草绳子，一条破棉裤一幅一幅地吊着，头上戴的瓜皮帽外面还缠了一块蓝布帕子。再看脚上，麻窝子草鞋用兔皮裹着，团团的脸上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清亮得很。

我以为是我的彬儿从重庆回来了，一把抱住他说：“彬儿！彬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爸爸呢？”

孩子两眼望着我说：“妈妈，我是八儿。”

我吃了一惊：“你不是彬儿？”

“嗯，妈妈，我是八儿。大爸爸出去开会去了，这些都是爸爸！”他指着夏林和向老大说：“这是夏爸爸，这是向爸爸。”

同志们都笑了起来。我又把孩子仔细看了一下，见他额头上有一颗大黑痣，显然不是彬儿。正在犹豫，就看见夏林又是递眼色又是摆手的，一边还说：“八儿你有妈妈了，就不到夏爸爸这边来了？夏爸爸二天不要你咯。”

八儿紧紧贴在我的身上说：“我跟妈妈在一起。”

我再没说什么了。很显然，这孩子的身世里，也有一个辛酸的秘密。

我拿出手帕，包住他满是冻疮的手，教他说：“八儿，他们是叔叔，不是爸爸。”

同志们就嚷了起来：“八儿，你不喊爸爸，我们不爱你了。”

八儿倒在我怀里，掏出一朵又蔫又皱的红梅花，给我戴在头上说：“嗯，妈妈说的，只有一个爸爸。”夏林笑得更厉害了，说：“大姐，你一来就把八儿占了，我们不依哟。”

我把花别在头上插正了，说：“你们这些调皮鬼，专门捉弄小孩。”

向老大认真地说：“倒不是捉弄。开始是大爸、二爸、三爸、四爸，后来就七爸、八爸分不清了。反正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干脆都喊爸爸了。”

大家又是一阵笑，一起往向老大家里走去。

这屋子我熟。余家场事变以前，是我们上山下山的交通站，现在却只

有屋顶依旧，四壁都成了白茛竹夹成的笆墙，据说原来的房子在余家场事变中被烧了。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边一张竹子架的床，床上放一张弹弓子，一把木铜。八儿对我说：“妈妈，这是我的屋子，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睡吧。”

我看着他那张红通通的小脸，一下子将他抱在了胸前。向老大抱了一大堆柴来，燃起一堆火；夏林一边加柴，一边招呼大家“坐下谈坐下谈”。我四处看看，正要在床边坐下，八儿却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端着个竹凳子放在我面前说：“妈妈，来坐！”然后对夏林说：“夏林叔，我给妈妈拿好东西来，你替我守住妈妈啊！”

夏林笑着说：“八儿放心，有我给你‘放哨’，你妈妈不会走的！”接着对向老大说：“向大哥，今天吃点啥子好的？大姐回来咯。”

向老大说：“你大嫂已经去挑豆子去了。吃豆花和豆浆稀饭。”

朱老么一听，啧啧嘴说：“依我说，要是能够搞点盐巴烧野鸡肉招待大姐，是最好不过了。”

向老大指着朱老么道：“朱老么，我说你不是想招待大姐，是自己想吃，是不是？”

朱老么撅着嘴说：“你乱说，哪里是我想吃？就是想吃又咋个嘛？”

我问夏林这是怎么搞的，夏林说：“几个月没有吃盐了。大哥说，不能乱花钱。”

我说：“这哪里是乱花钱？一个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一两盐巴二两力，不吃盐巴咋行？老么，你带上几个人跑一趟，马上去山边的么店子里买点回来。”说着就将我在狱里省下来的五块钱掏出来，递给朱老么。他接过钱，叫上几个人一道，欢欢喜喜地跑了。

坐了一年监回来，只觉得有了许多新面孔。一问夏林，才知道队伍扩大了许多，光这山上方圆二三十里内，就有二百人。人多了，春天玉璧到阆中开会，又专门招呼不准带枪下山，就没法找秧子回来栽插，到冬天粮食就紧张，钱也紧张。

只是有的是仗打，就这一条，大家觉得很痛快。

天很快就黑了，夏林摆上饭，我一看，果然是豆花和豆浆稀饭，这在我们游击队里，是最上等的饭食了。大家正在高兴，八儿蹦蹦跳跳地抱着三个竹筒进来，倒出许多炒好了的豌豆胡豆、焙干了的斑鸠、野鸡、野兔肉，还有豆腐血圆子，都摆在我面前，喊着叫我吃。

我尝了一块，香得很，就放下了。八儿看着我，惊奇地说：“妈妈，你不喜欢吃？这是叔叔们给我，我没吃，专门给你留着的。”

我说：“八儿，妈妈顶爱吃的，只是我们还有许多伤员叔叔，他们为革命流了血，给他们留着吧，等他们早点好，好了去打坏人。”

八儿听了只是点头，说：“妈妈，那你二天要吃啊！”说着就抱着竹筒跑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彬儿。

正要问八儿的身世，朱老么他们一伙回来了，买了一大堆榨菜、冬菜、海椒和盐，个个都喜笑颜开的。我看他们都瘦成那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就问：“你们在山上，是怎么过的啊？”

夏林眨着眼睛说：“过得好呢。大姐，你在牢房里只能盖被子吧？我们这里啊，盖的是毡毯，垫的也是毡毯。”朱老么捅了他一下说：“不要胡扯了，什么毡毯，我们盖的都是茅草。”

“床呢？”

“卫生床。”

“什么卫生床？”

夏林说：“就是用白茛竹编的，上边盖茅草，下边烤火，热和得很。”

我听了诧异地说：“你们敢在竹床下面烧火？燃起来怎么办？”

夏林说：“怎么燃得起来呢？我们不是明火，是埋的火灰。”朱老么一口接过去，指着那一坝茅草地铺说：“我们还睡连天铺呢，几十个人住在一起，挤热和。”

正说着，门外闯进来十多个人，七嘴八舌问我好久到的。八儿眼快，一下就认出周辉同，跑上去一把抱住他说：“周爸爸……啊，周叔叔。”

“这娃儿，怎么不喊爸爸了？”

大家在旁边笑着说：“现在都是叔叔了，不是爸爸了。”“你这狗东西，怎么改口了！”

八儿嘻嘻地笑着说：“妈妈说的，只有一个爸爸。”“你说谁是你的爸爸？”

“你们喊大哥的那个高大汉！”

“哈，这娃儿是精灵了。来！给周爸爸亲一个！”

周辉同又把八儿举起来嘻笑了一阵，然后跑到灶房里去转了一转，看见买回来的榨菜，高兴得不得了，撕了一块就往嘴里塞：“哈！这榨菜从哪里弄来的？”

李仲生一看，笑着抢了下来，说：“要吃，切成小块大家尝尝，哪有你一人吃独食的？”

大家又是一阵好笑，夏林说：“你们两个啊，真是自找苦吃，在衙门里给严大爷做事，生活多享福，要跑到山上受这份罪。”

周辉同嚼着榨菜大声说：“好个屁，在人家胯底下过日子，那才是受罪！”

大家坐下来，摆了半夜的龙门阵，这才知道周辉同他们在岳门铺带上来的人，改编成了一个中队，他任中队长，李仲生任副队长，现在驻在百子洞那边的炭洞里。夏林又带了些人，住在半山腰的石灰窑里，外面搭了个棚子，条件虽然不好，却比这里暖和。向老大这房子之所以一直没有整治，是因为靠山脚太近，敌人一来人就要撤的。

我看了一转，问：“怎么没看见金积成和唐俊清啊？”夏林说：“他们两个啊，都成了廖大哥的跟班了，跟大哥到顺庆、武胜开会，都好几天了，也不怕狗咬。”我听了奇怪，问什么狗咬，他们全都笑起来。朱老么说：“大哥走一处，狗腿子们就要咬一路，我们都成了打狗队了，不久前还到南部去打了一群。这才清静几天，看样子狗又要上山来了。”

半夜了，人都散了，我还是没有睡意，要夏林跟我谈谈八儿的身世。

夏林叹了口气说：“大姐，说来话长啊。八儿的父亲，说来你也是知道的，太平场的周老大，党员，小队长。去年腊月余家场事变后，敌人到处屠杀我们的同志，周老大来不及撤退，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敌人又来捉他的女人，他女人病在床上，跑不动，敌人来了，把她也打死了。一个最穷苦的蒋婆婆把八儿藏起来，才逃脱了匪军的毒手。匪军走后，八儿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哇’的一声哭倒在尸体上，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后来我听说了那情景，真是铁人也要伤心啊。”蒋婆婆找了乡亲们，把他妈妈埋了。可这孩子不死心，一天到晚在外面到处跑着找妈妈，一面跑，一面喊，声音都哭哑

了。后来，他的叔父周老二下山，才把他带上山来。一上山还是那样，天天跑，到处喊，我们哄也哄不住。没有办法，一次廖大哥来了，我们和他商量了一阵，大哥就去对他说：八儿，不要哭了，我就是你爸爸。打死的是你奶妈、奶爹。要记住，你的奶妈、奶爹是敌人打死的，你长大了要给他们报仇！他望着大哥，还不大相信，又问那我的妈妈呢？我们就说，妈妈被敌人拉去关在岳池城里了；他问岳池城是什么样子，我说，是有城墙围住的许多房子。他又问妈妈怎么才能回来啊？我说，等我们打垮了敌人，你妈妈就会出来的，这才把他哄住。可是他从此就缠上了我。有一天我们在山下打仗，他跑到战场上来了。我说八儿你来干什么？他说打岳池、救妈妈啊！我们听了都很难过，这孩子把我们哄他的话记死心了。

“今天他一听说你回来了，才吃半碗饭就跳跳蹦蹦地跑去接你，看见人就说，我妈妈回来了，我妈妈回来了。”四周静得出奇，我搂着熟睡的八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夏林突然抬头来，看着八儿说：“大姐，八儿是个好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抚养成人。”

我说：“夏林，八儿不仅仅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游击队的儿子。”

第二天，我睡得很晚才起来，走到院子里。夏林正和周辉同商量什么，一见我就说：“大姐，敌人的皮肉又造痒了，我们又要去打狗咯。你和八儿，好生休息两天再说。”我瞪了他一眼，说：“你大姐在监狱里坐了一年，骨头都坐松了，再不打仗，怕二天枪都拿不稳了。”

八儿听了，一旁嘟着嘴，拉着我的衣服直喊：“妈妈，我要去嘛。”我说：“八儿，你莫伙起闹，娃儿家晓得啥子。”说着又和夏林他们商量。八儿不高兴了，仰起头来说：“我晓得的，夏叔叔他们教我爬树跳崖，我还会学八哥儿叫。”

我一听他说学跳崖，立即想到法慧，心头好一阵难过。

周辉同听说我要参加战斗，高兴得很，嘿嘿地笑着说：“大姐啊，夏林他们是打仗的老手了，我还没有‘独立’过呢。这回大哥和老金他们又不在，大姐你就来给我们当个头儿吧。我上山来才听他们说，你打仗在行得很呢。”

李仲生听周辉同这么一说，也在一边乐得合不拢嘴。夏林瞪了他一眼说：“你们真会打主意，大姐现在是我们的总指挥了。”说着就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我们把二百多人分成四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分成两个小组，分布在附近二十多里路的战线上。然后，把山边的老百姓都撤上来，让那些房子空着；再派几个人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装成庄稼人，成天扛着锄头在地里晃，引诱敌人上山来，最后再找机会打。

这一仗，自然是打赢了，敌人的一个连让我们打得丢盔弃甲的一败涂地。而出乎我们每个人意外的是：这次把敌人引上山来的，竟是不听招呼自己抹花了脸、装成叫化子娃娃的八儿！

玉璧他们还没回来。敌人却上了瘾一样，不断地扑上来。我带着大家，选择有利地形，东奔西走，打了好几仗，最后把敌人驻在唐家院子的两个连解决了，除了缴获枪支弹药之外，还缴获了大量粮食、盐，连同敌人蒸饭的甑、铺盖甚至被打死的连长的皮箱，一同搬上了山，真是办足了年货。八儿从敌人的皮箱里欢天喜地拿出半匹洋布，我就用这布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过年。

正在欢天喜地的，玉璧回来了，夏林、周辉同连忙拥着我迎上去。金积成和唐俊清见了，高兴得不得了。玉璧反而红了脸，一把拉过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我来介绍介绍，这位是刘元贞同志，上面派来接替刘铁同志的工作的。大家就叫他老刘政委吧！”

我看这个人，中等个子，和和藹藹的，不禁又想到牺牲了的刘铁。

几个支队长在一起，开了个会，我把这几天的情况谈了，夏林、周辉同作了补充。玉璧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拍膝头说：“打吧，好好再打几仗，过足瘾，很快就要打不成了。”夏林问为什么，老刘政委说：“杨森把大队人马都开去打红军，反而被红军定在营山前线，动弹不得，加上老吃败仗，兵员不足，将无斗志，后方又被我们打得恼火，现在大概又想讲和了，正派人来透风。如果这次说好了，我们再把队伍拉到坝上去，好好休整一下。”

夏林一听，说：“又来了又来了，大姐这才刚刚从牢里逃出来呢，就忘了？上次余家场的亏还没吃够？他龟儿子杨森，打屁都不成气，他的话听得么？”

玉璧听了，瞪了他一眼说：“你老弟，说话就这么粗粗莽莽的！这是大计划，我们要仔细研究的。”

大家说了一阵，要走了。玉璧也站起来，夏林拉住他，一脸惊奇地说：“你干什么，不留下来和屏姐说会儿话？一年了哟。你看，我们给她封了个总指挥，打了这么几仗，称职不称职？”

玉璧说：“大家研究的，我有什么话说，只恐怕她……”

周辉同抢过话头说：“只恐怕她累坏了，是不是？”

晚上，夏林把石灰窑给我们让出来，大家都挤到外面棚子里住。夜深了，玉璧拥着我，我们都不说话。好久，玉璧突然说：“八儿，八儿今晚上，跟谁？”

我说：“大概跟夏林吧。这娃娃，怪可怜，连衣服也没有穿的，打起仗来机灵得很，一会儿爬到树上当‘望远镜’，一会儿又当‘开路先锋’，这几仗，他起了不少作用呢。”玉璧叹了口气，说：“是根好苗苗，只是不能让他老跟着队伍，不方便，也危险。”

我说：“那就找个机会带他去重庆吧，跟彬儿在一起，去读书。”

玉璧没直接回答我的话，只是说：“他是个烈属子弟呢，没爹没妈的。”

我笑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说：“我晓得，就当我给你多生了个儿子。”

祸起萧墙

过了年，杨森前线吃紧，队伍都开走了，岳池、广安几乎成了真空地带。我们一边和敌人谈判，一边陆续把队伍拉下山。到正月二十六这一天，除了留很少一部分人在山上，我们最后一批撤离，将各地的队伍安全撤到了余家场、三块石和魏家沟，重新作了调整。全部人员分成四个支队。一支队由刁仁义负责，在合川活动；姚生荣负责第二支队，在岳池东、西关活动；蒋老六作第四支队队长，在武胜一带活动；周俊成负责金滩、丈八滩以及渠河边上的交通运输和组织船夫的工作。我任第三支队的队长，杜仁杰作我的

副队长，负责肖家场、赛龙场、罗渡溪一带的工作。一切布置好以后，组织上指示我们以贫苦农民为骨干，选择作战勇敢能脱离生产的战斗员，组成基本队伍，吸收优秀分子入党。限期在三个月内作好一切整编工作，听候调遣。

坐了一年的监狱出来，才知道我们的地盘扩大了许多，人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夏林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在几个中队中，扎在罗渡溪的苏连清、苏同久两弟兄不大稳当，恐怕要去看看。

苏同久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父亲是推翻清朝时被打死的，这常常成为他向人夸耀的本钱，他也就凭着父亲的这点声望，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去年为了赌钱，和人发生口角，打死了杨森的一个连长，被迫拖了一部分人上山为匪，被杨森派人四处捉拿。这时，我们的队伍声势扯得很大，他几次想来投靠，玉璧和老刘政委都未同意，觉得我们任务繁重，分不出力量来改造这样一支队伍，若收编过来，他们在外面胡作乱为，弄得个皂白难分，会影响自卫军的声望。后来，苏同久就找他的弟弟苏连清（第二支队的中队长），缠到支队长姚生荣说，姚生荣见他有人有枪，就私下同意了。事后老刘铁政委和玉璧知道了，曾对姚生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又看到苏同久的队伍里虽然成分不纯，但大部分还是贫苦农民，于是就决定派苏连清、范永安去作副队长，重新拨在我这个支队里，叫我和夏林好生管一管。

正月三十那天，我到罗渡溪，把苏家两弟兄召集在离镇上不远的水口店开会。等了好久，苏连清和苏同久才愁眉苦脸地一道走来。

我说：“苏连清，你们现在情况怎样了，有困难吗？”

苏连清长叹了一口气，说：“困难啊，困难多啊！”苏同久昂起脑壳，一口气就数了一大堆困难：“子弹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钱也没有，光叫革命革命，难道革命就不吃饱饭，革命就不穿衣服？”

我看这情绪不对头，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话不能这样说啊。”

我们革命就是艰苦嘛，你们地里头还有青菜、萝卜可以掺起吃，山上连青菜、萝卜都没有，没有吃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苏同久哞地一手把钱推开：“说这么多做啥子？你这二十块钱，拿来打鬼？我这队一百多人，还够不到一天用。”

夏林一听这话，很冒火：“张口就要钱，哪有这么松活的，革命工作就是困难！我们和大哥初次起义的时候，好多困难啊，主要是依靠了群众。像你们这样，没有钱就去骚扰群众，坏了队上的名声不说，到时候群众孤立你们，恐怕哭都哭不出来。”

苏连清在一边叹着气，说：“你们不知道，这队伍都是本地的穷人，又怕扯红，如果不打几个大胜仗，让大家痛痛快快地过几天快活日子，恐怕……”

我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心想这哪里是个党员说的话，分明是他那个土匪哥哥的语气。这样下去，一定会出大乱子的，看来这两弟兄连在一起，够麻烦的。

我和夏林低声嘀咕了一阵，觉得这些情况要在干部会上提出来解决才行，先得给他们借点钱，以防出乱子。

可是现在为了一个整编的安定环境，除了游击队的死对头之外，又不主张动地方上的粮绅们，加上各方人马正在聚集，经费很吃紧，看苏家两弟兄的口气，又不是一百、二百喂得饱的……我想了一阵，决定到广安，找我

大姐夫借一些，顺便去齐吉轩那里，给大家带些电筒、电池和药品回来。

苏连清听说我要去找钱，一张苦脸顿时笑烂了，连忙找了乘滑竿来，说：“大姐你坐滑竿，快一些，我再把唐老八喊来，让他和老六两弟兄抬着你。”

我一听唐老八，心里就不大高兴。这人虽然是唐老六的弟弟，德行却极不好，好吃懒做，又抽大烟，几次缠着唐老六要加入我们的队伍，老六都不理他，最后不知怎么跑到苏同久的手下去了。可是又一想，苏连清总是不放心，要派个人跟着。这涉及到两方的关系，去就去吧。

到了广安，先进城去，到了齐吉轩的药铺里。齐吉轩见了我非常高兴，说：“大姐你好久没有来了，真是稀客。”我说：“是啊，今天来请你去看病的。”

齐吉轩说：“行行行，你们要的电筒、电池都买好了，再不来人，我就要亲自送去了。”

听说现在山上有些同志拖垮了，我还准备了一些补血汁，只要没有受风寒，就可以吃。”

在齐吉轩家里吃了中饭，约定他隔两天上山，我们带着电筒、电池赶到大姐夫家住了一夜，借了六百块钱，第二天清早就往回走。

走到一个叫墩墩坡的地方，唐老八忽然按着肚子，说痛得不得了。我们就到旁边观音阁去休息，拿些救济药水给他吃。谁知他吃了药，反而唉哟连天地叫唤。夏林没办法，就拿过滑竿来，说：“你坐上，我们抬你。”

唐老八捂着肚子直摆手：“不行不行！坐在滑竿上一抖更痛！”

我看他红头花色的，不像是个什么不得了的急症，就说：“那你在这里歇一会儿吧，我们在前面慢慢走着等你。”说完就和夏林要走。唐老八听了这话，一把拉住老六，哀求说：“你们等我一下嘛，我一会儿就好的。”

唐老六听了，为难地看看我，我只好叹口气，坐下来。

眼看快晌午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干脆到前面店子里吃了饭再说。夏林就到店要了一斤凉拌猪脑壳肉，还炒了一大碗猪肝。唐老八见了，喜上眉梢，一口气吃了许多。夏林白了他一眼，说：“你那肚子，闻到肉香就不痛了？”他嘴里包着肉，唔唔地应着，只管吃。

吃完饭，我们站起来要走，唐老八往地下一蹲，又哎哟连天地叫起来。我急了，跺着脚说：“我们回去还有许多事情，老是这样耽误时间怎么行？”夏林也生气了，说：“我们不能老等他，身上带着钱，路上又不清静，走晚了要出事情的。”唐老八听了，哭丧着一张猪脸说：“你们行行好，等我一下嘛，我一个人在这里，出了事情咋办？”唐老六没办法，也对我直说好话。

我们又坐下，等了一阵，眼看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站起来说：“不能再拖了，走！”

唐老八没办法了，跟在后面，哼哼呀呀地拖着。这样走走歇歇，走到水口店天都黑了。

唐老八干脆站住了，说：“我走不动了，就在这街上宿吧，你们在陈义洲屋里等我，我去吃几口烟就来。”说罢一摆手就走了，拦都拦不住。夏林看他风一样跑进了烟馆，转过身来说：“这家伙真讨厌！我们原来说在罗渡溪把钱交了，还要带着药品回三块石寨上去，周辉同他们等着呢。现在住这个地方，怎么行？莫管他，还是赶路吧，起码要赶回罗渡溪才行，那里安稳一些。”我叹了口气说：“反正离罗渡溪也不远了，先到陈义洲家吃了饭再说”

吧。

这号人，遇到了也没办法，反正交道就这么一回。”

陈义洲是我陈家的叔伯兄弟，向来同情我们，现在是罗渡溪的乡长。我们在他家里吃了夜饭，正烤火摆龙门阵，就听见外面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接着便有人打门。陈义洲说：“怕是老八回来了。”就喊佣人张嫂去开门。我一把拦住，说我去，接着抽出枪来。大家一见都警惕地站起来，闪在一边。

我走到门边，把杠子取脱，刚刚侧身子拉开门栓，“啪”地一颗子弹就从我耳边飞过去，接着一群人冲了进来。我一闪身躲在门背后，等那打枪的一进来，拽住他的枪顺势一拖，再抵住墙根一使劲，就把他按到地下，枪尖子抵住他的胸口。那家伙挣扎了几下，爬不起来，只是喘着粗气。我想看清是谁，可是灯光太暗，就说：“你老实说，是谁派你来的？”

他不回答，只是问：“你认不认得我？”

我说：“我不认识你！”

他说：“你放了我，我决不打你，我若是说话不算话，走一步挨一炮！”

我说：“好，把枪放下，我就饶了你。”

那家伙把枪甩在地上，我一松手他就站起来跑了。我看见他那背影，一下就醒悟过来：原来是岳池城南门外卖豆腐的杨老么，是我们培养的一个党员。他来干这种事情，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包括唐老八！也包括苏连清、苏同久两弟兄！

我靠着墙根刚站起来，就被人扑上来按住，动也动不了，这才看见夏林、唐老六都被押起了。屋里已被一伙人造得稀乱，我们带来的钱、药品和电筒之类的东西全部都被他们收拾起，喊了几个人挑走了。接着几个人上来，把我们的枪都缴了，押出了大门外。

我和夏林互相看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敌人的千军万马中我们都闯了过来，没想到如今却落在了几个叛徒的手里。

我站在那里，问道：“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家伙说：“你莫管，自然有你该去的地方。”夏林说：“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要打要杀就喊明，偷偷摸摸算不得好汉！”

另一个家伙恶狠狠地说：“打你撇脱得很，只是现在不忙。”

我们被这伙叛徒押着，在黑夜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我陷在水田里，鞋子也陷掉了。

唐老六忙把我扶了起来，说：“大姐，我牵你走，你跟着我的脚步来。妈的，不晓得老八变得这么坏，等我逮住他，不亲手宰了他才怪！”又走了一阵，走到一个草坪上，只听到前面山包上在喊：“下面是什么人？”

“我们。”

“你们干什么去了？”

“逮敌人。”

我一听问话的是范永安的声气，心里就冒了火，大声喊道：“范永安，你给我下来，我陈玉屏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伙起这些家伙把我当做敌人来整？！”

范永安一听，连忙说：“是大姐吗？是大姐吗？”说着就带了一队人冲了下来，将队伍散开，把这一群叛徒包围住，骂道：“妈的！谁叫你们这样胡搞？”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永安又转过身去问苏连清：“你说，这是怎么回

事？”

苏连清支支吾吾说：“这件事……我……我不晓得。”范永安上来两步，用枪抵住押我的那个家伙：“说！谁叫你们这样干的？”

那家伙一昂头，很气盛地说：“是苏队长，苏同久叫我们干的。不信你去问他。”

范永安说：“你以为我怕去问他？告诉你们，一个个都要给我说清楚。简直是混帐！”

范永安就和我们一起去，回三块石寨上去。

三块石是约定我们几个支队汇合整军的地方，现在各部都已经陆续来了一些队伍，驻在寨子里。周辉同、李仲生、唐俊清、金积成也都在上面，人员有些杂，时不时有些小摩擦。

这里原来的主人，是二支队姚生荣的部下徐月路的队伍。这徐月路也和苏同久一样，是才改编过来的，野性很大，而且原来就和苏同久勾勾搭搭；现在苏同久坐在他的寨子里指挥这件事情，而且玉璧、老刘政委和刁大哥他们几位领导都到一个叫牛角井的地方开会去了。如果闹起来，事情恐怕会弄得很复杂。

我把范永安拉到一边，给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大姐，你先在下面的哨卡上等着我们，免得他们又说是你支使自己在闹事；我带着夏林他们上去，找苏同久问清楚。”

哨卡里的人进进出出，我一个人坐在火盆边烤火，一边考虑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鸡叫的时候，一个家伙进来，在我旁边坐下，摸出枪来摆弄，我看了他一眼，说：“你仔细点，把枪尖子甩过去，谨防走火。”他一瞪眼睛，气鼓气胀地说：“这样就把你打倒了？我就不肯信！”说着就对着我把枪口抬起来。我见事情不对，闪过身子，伸出手顺势将他的枪口往下一按，砰地一声枪响了，子弹刚好打在他的脚上，他抱住脚，唉哟连天地叫起来。

外面立即扑进来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周辉同，一见我忙问：“大姐，是咋回事？”

我拍拍身上的灰站起来，说：“你问他吧，我差点成了他的枪下鬼呢。”

周辉同一把抓住那家伙的领口，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干什么？”

那人先支支吾吾说是走火。周辉同圆瞪着双眼“唔”了一声，那人怕了，忙说：“是苏同久苏队长，叫我装着枪走火来打……打死她的。”

这下子，把周辉同气惨了，一挥手，几个弟兄就七手八脚半拖半抬地架着那个家伙朝寨上走，我跟在后面直是说：“辉同，你别这样，有话说得清楚的，别把风气扯大了。”

周辉同哪里肯听我的，一路不住嘴地骂着，到徐月路的房前，后面已经跟了七嘴八舌的一大群人。周辉同把那家伙往地上一摔，说：“徐队长，如今领导同志们都不在，我们都是客位，你是主人，现在人证物证都齐，这家伙要打死大姐，你说咋个办！”

徐月路摸着下巴，不开腔。苏连清挤了进来，一见那家伙脚上的伤口就说：“周辉同，你们莫要仗着人多，血口喷人，明明是我们这位弟兄脚上受伤了，你却说他要打死陈玉屏，有什么证据？恐怕是陈玉屏要想打死他吧？啊？”地上那家伙一听，连忙改了口，说：“就是就是，是陈玉屏来抢我的枪，想要打死我！”

周辉同一听，气得飞起一脚朝那枪伤踢去，只听得哎哟一声，那家伙就疼得背过气去。

这一下，苏连清带着手下的人扑过来，两边都哗哗地拉着枪栓，眼看要酿成大乱。突然，徐月路大吼一声：“把枪都给我放下！既然承认我这里是这里的主人，就得听我的！来人，先委屈各位一下，把两边闹事的人都给我押起来。王胖娃儿！你跑一趟，到牛角井去把开会的领导同志都请回来，解决问题！”

那个叫王胖娃儿的站出来，答应一声，转身正要走，却被迎面过来的范永安挡住了。他看了我一眼，又对徐月路说：“王胖娃儿，他走得出去吗？现在四面的口子都扎紧了，说的不许任何人通过。还是我去吧，比起他来，我的面子还是要大些。”说完也不管徐月路同意不同意，转身就走了。徐月路看看范永安，又看看苏连清，无可奈何的样子，接着又转过身来，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廖大嫂，委屈你了，你就住我楼上的房子吧，让李仲生陪着你，放心吧？你们都走开！该做什么做什么，莫在这里生事！”

我脚跟脚地跟着徐月路进了屋，说：“徐队长，你处理事情要明辨是非，这样各打五十大板，放过了坏人你要负责的！”徐月路往床上一躺，烧了口大烟才说：“你们都说自己有理，动辄就要动炮火，叫我咋个明辨是非？昨晚上闹了一起，今天又来闹，闹得我瞌睡都没有睡好。”

我一听他说昨晚上闹了一起，就追着他问：“夏林他们呢？你也关起了？”

他把嘴一努说：“都关起的，在隔壁屋里。”

我一顿脚说：“你咋能这样乱整！”

他坐起来，大声说：“怎么叫乱整？你叫我咋个整？范永安不是去请领导同志回来解决吗？等你们廖大哥回来，你还怕说不清楚？你们夫唱妻和，到时候莫把我也扯进去啊。”我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停才问：“那么苏同久呢？你也关起了？”

他说：“当然，我徐某人做事向来公平。呶，你看都看得到，对面楼上。”

我还想说什么，李仲生拦住我说：“大嫂，莫说了，事情总有个具结的，你还是到楼上歇一会吧。”

我转身跟李仲生上了楼，一进屋就指着他说：“你跟我说实话！人都被关起了，为什么没有你，也没有范永安？你们两个搞的啥名堂？”

李仲生关上门，悄悄对我说：“大姐，你不知道，事情变得很复杂，我们的人全都被徐月路软禁起来了。我得装成个‘识时务者’，否则我们一个都动不了。现在他们把各路卡子都扎紧了，只准进不准出，可能有名堂，幸好老范出去了，给大哥老刘政委报个信，也好有个准备。你先睡一会儿，我还要下去打听一下情况，我喊朱老么来守着你。”

我睡了一觉起来，天都要擦黑了，四周清清静静的，一个人都没有。我站在窗口往下看，徐月路拿了两条纸烟，往对面苏同久的楼上走。我立即悄悄下楼，跟在他后面，看他进了苏同久的房间，反手掩上门。我从门缝看去，看见徐月路把纸烟递给苏同久，然后说：“事情都准备妥当了。”苏同久说：“好。一不做，二不休，要整就整干净，把几个头头一锅端了！”

徐月路笑了两声：“苏大哥，你放心，今晚上我们就要下手。已经派了人，在路上去拦截了，这阵恐怕都动手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立刻把鞋子脱了，提在手中，轻轻地跑

下楼，恰恰碰着李仲生和朱老么慌慌张张地跑来。我连忙把他们喊到楼上，把刚才看到的情况跟他们说了。李仲生说：“我也是来告诉你的，领导同志这阵都还没来，是不是老范没把情况估计够，在半路上中了他们的埋伏？大姐，现在情况很严重，徐月路和苏同久他们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今晚上要请你开会，准备打死你，或者把你送到岳池城里去。大姐，你不能去，实在不行，你就走中间，我们保护你，有什么情况，你一听我喊‘趴下’，就跟我一道往地下滚起跑，冲出去。”

仲生说着，就把他的两支枪抽出一支来，交给我。我听了这个消息，愣住了，好一阵才问：“夏林、辉同他们晓不晓得这个情况？”

仲生摇摇头。

我说：“要赶快通知他们，一起作个准备，最好再找几支枪。”

仲生很为难，说：“不容易了，我们现在一动，就会引起他们的疑心，更不好办。”

我听了，把枪拿在手里掂了掂，又还给李仲生，说：“这枪，就给夏林他们吧，现在多一支枪就多几分希望。你们尽量设法，多跑出去一个人，革命就多了一份力量，不要管我了，就算我给你们作了掩护。”

我们三个人，心里都难过，哽哽咽咽的，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仲生才说：“大姐，你不要说这些，有我和朱老么在，就有你。”

大约二更时分，徐月路果真就来了，见我就说：“廖大嫂，总队部请你去开会。”

我说：“领导们都没来，开什么会，我不去。”

他见我不走，手一招，一下就涌进来八九个人，拉的拉推的推，就把我推了出去。李仲生用枪筒戳了我一下，我说：“走就走，徐月路你走前头。”

徐月路说：“不行，你走前面。”

李仲生站在我的后面，对徐月路说：“怕什么，她跑不脱的，我和朱老么在后面。”

我跟在徐月路后面，只恨自己手中没有一支枪。十来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连杨森的杀场都陪过了，没想到今天却栽在这两个叛徒手里……又想到我死了不打紧，玉璧和刁大哥他们，可不能出事啊，否则我们十年来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事业，可真的要付诸东流了。

我们刚走出两道门，就听见外边院坝里“噼噼啪啪”响起了跑步声，一下子火把、电筒把全院子照得通红，跑来的人一个个都气势汹汹的，院子里马上一片混乱。我和李仲生、朱老么闪进门角里，心里非常紧张，不知是谁的队伍，也不知道马上就会打成什么样子。李仲生连忙递一支枪给我，准备杀一条血路出去。

这时，只听见进来的人不断地喊：“全部押起！全部押起！”“三姐呢？你们把她押在哪里了？”

我一听这个叫“三姐”的声音，立即从门角里站出来，大喊了一声：“亮佐！”

院子里一个人答应着，拨开众人跑了过来，我一看真是陈亮佐！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气吁吁地说：“三姐，你没什么吧？老范被他们截在路上，差点丢了命！我和大哥接到信，跑步赶来的。妈的这些混蛋！”

仲生说：“还没什么呢，你们要是迟来一步，大姐和我们说不定就被他们黑串了。这不，都押出来了。”亮佐一瞪眼睛，说：“真的吗？”

我说：“别罗嗦了，快去救夏林和辉同他们，都押在那边房子里。”

亮佐听了，连忙一挥手，带了几个人跑过去，一脚踢开房门，把夏林他们几个放出来。

夏林一见我，拉住我的手叫了声大姐，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陈亮佐过来安慰我们说：“三姐，老夏，谁敢动你们一根汗毛，我们就要他的命。妈的，王八蛋！想不到我们内部还有这么多叛徒。押起来！全部押起来！到下面的坝子里，开大会……”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会场设在寨外的一个大草坪上，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弟兄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石头上，右边是跟他们一起闹事的人，左边是夏林、李仲生、周辉同带着我们的人，气氛很有些紧张。

会还没有开始，徐月路就挨挨擦擦地挤到我身边说：“大姐，你要留情啊！凡事请多包涵，老弟是晓得感激的。”我横了他一眼，没理他。

会议由刁仁义主持，他头上拴了一根白布帕子，身穿一件蓝布滚衫，往大方桌后面一站，闹嚷嚷的草坪上，顿时清风雅静的。他说：“我们闹革命是为了打倒土豪劣绅、军阀反动派，为穷人翻身，现在我们队伍内竟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来了，这成什么话！今天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严肃惩办祸首，不然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接着刁仁义就请我谈一谈事情的原委。

我站了起来，说：“这次组织上给我这个支队长的任务，对我来说是力不胜任的。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坚决服从命令。”接着我就把下去检查工作时，苏同久、苏连清故意刁难，到广安路上唐老八装病，在水口店暴徒行凶抢钱扯枪，晚上烤火时苏同久支使人弄枪走火，以及徐月路和苏同久深夜密谈谋害领导的情况一一都说了出来。我越说越激愤，声音越来越大：“同志们，我个人牺牲不要紧，革命不能失败啊！我们同敌人打了十年，牺牲了多少弟兄！现在声势壮大了，眼看就要与红军会师了，内部却出现了叛徒，想杀死我们的领导同志，去投降敌人。弟兄们！我们能容忍吗？……”

“不行不行，把苏同久、苏连清、徐月路拉出来！”

草坪上一阵骚动，弟兄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大吼大闹。刁仁义把苏同久喊出来，问他：“刚才大姐说的话听到了吗？还有什么说的？”

苏同久很傲慢地说：“怎么说？就是这么回事！革命？肚儿没吃饱，就要闹革命？陈玉屏当女队长，我就是不服，一个女的懂啥子，还要领导我？”

刁仁义站起来，在桌上一巴掌：“胡说！就是因为生活苦，大家穷，才来革命。弟兄们吃草根树皮都没有说过二话，不能让你大吃大喝，不能供你鸦片烟吃，你就要闹？你就要杀人？陈玉屏是我们大家推选的，是组织上委派的，你不服她是个女的，可是这多年来，她同我们一道风里来雨里去，出生入死，从没有叫过苦喊过困难。筹粮款，运枪弹，带兵打仗，文的武的哪行不懂，哪样不行？哼，你不服？我们大家都服，你不服！那我问你，廖大哥你服不服？”“谁给我饭吃，谁给我烟抽，谁给我钱用，我就服谁。”这时会场上又骚动起来，下面有人说：“廖大哥来了。”

我一看，陈亮佐带着玉璧、徐清浦和一个身穿长衫留长发、斯斯文文的客人走来了。刁仁义连忙让座，把开会情况简单地向玉璧谈了几句。玉璧叫刁仁义继续问下去，然后同客人坐在桌子旁边。

刁仁义又问苏同久：“要是没有饭吃，没有钱用，没有鸦片烟给你抽，你要怎么样？”

“我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里住不了，远方发财。”“你要到哪里去？”

“有奶便是娘，高兴到哪里就到哪里。”

苏同久这个土匪出身的家伙，一直秉性不改，今天竟然这样有恃无恐，说话那个傲慢样子，简直让弟兄们气爆肚子。

刁仁义又提问徐月路。这个仗势欺人的家伙，一听到喊他的名字，吓得站都站不起来。

刁仁义问他为什么要扣押我和夏林，问他和苏同久等人密谋的内容，又问他押送我们去“开会”的用意，一连问他六七个为什么。他初先都是支支吾吾地抵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后来就完全推在苏同久身上。刁仁义站起来，撩起袖子，狠狠地在桌上一捶，说：“苏同久，徐月路，你们过惯了地主生活，不如你们的意，就要造反，就要杀人，就要搞垮革命。你们这群叛徒，哪里是来革命的，分明是想来投机抓一把，快说，该当何罪？”“枪毙，枪毙，两个都枪毙！”

“把苏连清也拉出来，三个一齐枪毙！”

我看看会场，夏林、周辉同带头 拳扎袖的，眼睛都红了，大有不枪毙这三个人誓不罢休的样子。再看看右边苏家两弟兄和徐月路的人，个个都显得很紧张，有的还提着枪悄悄站起来，想溜出会场。

不行，这三个人不能就这样草率地枪毙了，搞不好他们手下的人要乱，要跑，还要反水；要杀也得把工作做到家，把他们的队伍安排好再说。于是我站起来，招呼大家安静下来，大声说：“同志们，请大家相信，他们三个人一定是要处理的，可是具体情况还有待调查……”

人群中一阵骚动，夏林猛地站起来瞪着我：“大姐，你……”

这时候，那个一直没话的客人对玉璧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玉璧点点头站起来说：“大家静一下，我来说明一个情况，老刘政委到南部开会去了，组织上派杨云禄同志来协助我们进行整军工作，现在我们请杨同志给我们讲话。”

人群中有人拍了几下，看见没人响应，就不拍了。杨云禄站起来，向大家挥了几下，细声慢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了解情况，刚才听了一阵，才听出了一点眉目。当然我的意见不成熟，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有的人在下面说：“这个人说话咋这么罗嗦。”

杨云禄抖擞了精神又继续说：“我同意陈玉屏同志的意见，杀人的事情，一定要慎重！”

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的革命任务是什么？是打倒反动派。我们革命的敌人是谁？是军阀！现在革命尚未成功，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大敌当前，我们就这样不团结，有什么好处呢？同志们，凡事三思而行，不要鲁莽行事，我们要冷静，冷静，再三的冷静！

要是同室操戈，将来只有同归于尽。至于说到要钱嘛，也许是出于一时冲动，一时的误会，意气用事，是说得清楚的……”

他的话一说完，台下一阵嗡嗡的，大家都莫名其妙。我更是气愤，心想我哪里是这个意思！一个领导说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刷地站起来，正要开腔，忽听见李仲生在我旁边对周辉同说：“管他妈的领导不领导，不对的就要说。”接着把枪托在地下一杵，大吼一声：“刁大哥，我不赞成！”

会场上立刻响起“不赞成，不赞成”的吼声。玉璧和徐清浦都站了起

来，叫大家肃静一下，但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急得刁仁义不断地用双手摆来摆去地说：“不要吵！不要吵！”

有话慢慢说，有意见可以提。”

正在这时，范永安把那个自己打伤了脚的家伙押了过来，往主席台边一掀，说：“这里还有一个。”

那家伙哭哭啼啼地说：“不是我，是苏同久，是他叫我打的。”接着他就把苏同久、苏连清如何设计谋害我的情况说了。这一下如同火上浇油，大家更愤怒了。周辉同跳上一根板凳，粗着喉咙大喊：“不枪毙他们，我周辉同不得干！啥子同志不同志，刚才苏同久说得明明白白，供得起他烧大烟吃酒肉的才是同志，我们都是他的对头！”

李仲生也大声说：“就是嘛，他们明明是要杀死大姐，想整死领导，想叛变嘛。这样的叛徒都不枪毙，还叫什么革命？”“就是，把他们绑了！”

“把苏连清捉出来！”

“枪毙叛徒！”

口号一阵接一阵，徐月路吓得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我该死，我该死！下次不敢了！”

苏同久、苏连清两弟兄，这才把头埋下去了。杨云禄急得一脸通红，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玉璧和徐清浦、刁仁义又商量了一阵，刁仁义没有开腔，玉璧点点头，徐清浦就对大家说：“今天的会，先就开到这里吧。下午党员开大会。”

散会以后，我找到玉璧和清浦，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大家都表示同意；还决定先党内后党外，把意见统一了，然后再研究重新组合队伍的问题。

晌午都过了，同志们愤愤不平地回到寨上，到处都在叽叽咕咕的。我看见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几个和刁仁义逗了一阵耳朵，然后避过我，一个个往外走。吃过了午饭，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弄清了基本事实之后，就讨论对苏连清的处分问题。这个家伙起初耍赖不承认，后来看赖不掉了，又哭哭啼啼地说：“我是受了苏同久和徐月路的蒙蔽，他们想约我一道谋害领导，拖走队伍，我不同意。以后他们干这些事我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我怕廖大哥他们多心，怀疑我。”

刁仁义听了，比先前在草坪上开会的气更大，一挥蒲扇般的巴掌说：“没有说的，一齐枪毙。”只有杨云禄站起来，替苏连清求情，又是啥子团结要紧啊，要给他悔过的机会啊……我看会场上一个个气粗粗的，好多人都转过脸背着他，不听他的。

会议开了三点多钟，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还没有来，正要开对开除苏连清党籍的处分进行表决时，忽听见外面“啪啪啪”响了三枪。玉璧一愣，叫陈亮佐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陈亮佐却慢腾腾地站起来，想去不想去的样子；再看看刁仁义，也瞪起眼睛坐在屋角边不开腔。大家正在疑惑，李仲生、周辉同带头，夏林、范永安几个跟着进来了，一直走到玉璧面前，都把枪拿出来放在他前面的方桌上。李仲生说：“各位大哥，把我们绑了吧。我们把叛徒打了。”

杨云禄站起来惊奇地问：“是苏同久、徐月路？”“不错。”

“你们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刁仁义一口气接过去说：“啥子叫无法无天，难道叫这样的叛徒把我们的人杀完，把我们的

队伍搞垮，就叫有法有天吗？打得好，打错了负责，要杀，杀我刁仁义的头……”

刁仁义的话音一落，场上一片热烈的鼓掌声。玉璧站起来说：“叛徒应该枪毙，不这样，就是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不这样，就不能息众怒，平民愤，若让这些叛徒留在革命队伍里，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将来危害更大。不过，李仲生你们不经组织的同意，就这样擅自行动，先斩后奏，是不恰当的，这样会打乱组织上的部署，给工作带来被动，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了。至于苏连清，应该也要枪毙的，看你稍有悔悟，暂时饶你一条性命，今后要改邪归正，好好为人……”

屋内五十多个党员干部一齐站起来，又是一阵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只有杨云禄一个人没精打采的，苏连清勾着脑壳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

后来老刘政委回来了，我和刁仁义向他打听杨云禄的情况。老刘政委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杨云禄，他也不大清楚，只听说是不久以前才由地方到红四方面军的，开始很积极，可是后来觉得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地吃不消，又因为是知识分子，在红军里面不受重用，就经人介绍，想到我们这里来。老刘政委觉得知识分子刚参加革命，在正规部队里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些年我们和上面的联系一直不通畅，走了不少弯路，杨云禄毕竟在四方面军呆了些日子，行军打仗不行，帮我们找找关系保持联络至少还可以，就同意了。我问：“红军里真的不重用知识分子？”

老刘政委摇摇头：“岂止是不重用，听说还杀了不少人呢。这次开会还传达下来一句话，说是要改变川北地区知识分子掌握党的领导权的状况。我想派个知识分子下来，也许比……哦，不说了，我们现在的关系虽然直属川陕省委和四方面军，但是隔得这么远，又在敌人的心窝里，很多情况不了解，也不好乱说什么。再说我们的情况也比那边复杂得多，主要靠我们自己来处理。杨云禄的事，大家多留心就是了。”

这场斗争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处理仓促，留下了很多后患。

暗渡陈仓

整治了苏同久和徐月路之后，我们把队伍作了短期集训，仍然分散开去活动。刁大哥回三块石，我到魏家沟。这时驻在罗渡溪的一支队伍，也是土匪改编的，很野，怕出问题，就叫周辉同去当队长。周辉同到了罗渡溪，住在马福林的栈房里，见事就做，帮马福林经营栈房，出了不少力，马福林的一个女儿马诚贞就和他好了起来。周辉同把这事跟组织上说了，老刘政委和玉璧商量了一阵，同意他和马诚贞结婚，但不知马福林的意见怎么样。玉璧对他说：“你去找你大姐，她一说就会成。”

周辉同就脚跟脚地缠着我，要我马上去说。

我说：“不要慌，这事我负责。只是没有谈妥以前，你不要过往太密了，罗渡溪的人很封建，怕别人有闲话。”接着，我就把马福林找来，问他：“听说你家诚贞还没有订婚？”

“是呀，没有合适的。”

“你想替她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

“当然要我们的人，党员更好。”

我就说：“搞革命工作要吃得苦，你看周辉同行不行？”他想了想，说：“他这人还好，经常来帮我做这做那，老大老实的。”

我又说：“那你看这个人户放不放得呀？”

他说：“我去问一下廖姑爷。”

我看他说了半天还是要问，就说：“问他不如问我呢。”

“那就行了嘛！”马福林点着头，笑得合不拢嘴。

这事就这样说妥了，周辉同高兴得不得了，一天到黑走路都在笑。夏林几个见了就拿他开玩笑：“看你这家伙憨痴痴的，怎么这事倒抢在我们的前头？你看我们几个，一不缺鼻子二不缺耳朵，怎么就没有妹子看得起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夏林你心慌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下次有合适的我首先就考虑你。”

夏林一见我认真了，忙说：“大姐，你别，我的命不好，脑袋吊在裤腰上干工作。你经手的妹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跟我来吃苦，值不得值不得。”

李仲生推他一把：“你装什么正经，这对革命工作也是有利的嘛。多一个兄弟媳妇，也好给大家缝缝补补。现在大姐顾不得我们了，再下去都要成叫化子军了！”

周辉同自小被后娘逼出来，没家没业，也没什么积蓄，可这毕竟是我们几个骨干中第一个结婚的，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婚事一定不能办得太草率，让人家看不起。我们研究了一下，便挤出一笔钱来，给他置办贺礼，换了一对银戒指，扯了两套衣料，还有铺笼帐被，齐齐全全的，马福林一家都很高兴。

我守的魏家沟，是一个穷乡，加上这年天旱，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们没有吃的，把梧桐树皮、胡豆叶子都采来吃了，山上的黄泥巴也说成了观音土，当作饭吃。这对我们整军很不利，组织上就指示我们迁到长生寨。这是广安境内最富的一个大寨子，上面分大寨、小寨，非常严密，附近的武家乡、严家乡，也是土地肥沃收成好的富地方，糖食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决定把大部分人扯过去，三百人在三块石寨上留守，其余的到岳池文昌寨、姚市桥和广安天池驻扎。

罗渡溪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周辉同在那里又干得很好，我们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点。队伍要开拔了，周辉同赶来送行，眼浸浸的。我对他说：“现在你的身分不是我们的中队长，而是马福林的倒插门女婿了，今后要注意隐蔽，守住这个码头，出不得问题。”周辉同很严肃地点点头，说：“我晓得，祝你们早点把队伍整顿好，我们好早点和红军会师。”说着又凑近我，悄悄地问：“听说大哥和老刘政委他们派仲生去谈判，又要接受杨森的‘招安’了？”我说：“你别乱猜，我们做事，总是有原则的。你大哥和军阀打了十年了，要想去当官，还等今天？”

队伍开到长生寨，老刘政委、玉璧、刁大哥都在寨门口迎接我们，旁边还站着斯斯文文的王道纯，见了我很热情。王道纯出身很贫寒，后来从遂宁师范毕业，当上了岳池县县立高小的教务主任，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就连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也被军阀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扯起棚子，进了绿林。第一次起义时，他就和我们协同作战，后来和玉璧的关系越是密切，

入了党，成了我们一个支队的领导人。

队伍一进长生寨，就召开了一个干部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纪律问题。老刘政委说：“这是个大寨子，过去时常受到杨森的军队和土匪骚扰，现在一听说有队伍来驻扎，群众就有些惶恐，一些人还跟着地主跑了，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群众的关系，任何人不准乱来。”

玉璧接着说：“我们这次整军和往常不同，人多，新战士多，有的干部还带了家属，是夫妇俩。当地老百姓有忌讳：宁愿让人在家停丧，也不愿人在家成双。如果要住在一起，就必须出钱租老百姓的房子，还要敬神。”

大家又讨论了一些条文，第二天就以我和刁仁义的名义出了张布告，写上三大纪律：一不许背枪下寨；二不许骚扰百姓；三不许调戏妇女，违纪者枪毙。另外又通知夫妇俩同住的，必须向老百姓立家约，租房子。

布告一贴出来，就有了规矩。近千人住在长生寨，队员们平时连寨门都不出，操练完了去帮老百姓干活，莫说工钱了，连饭都不吃。寨上有一家大户，主人叫李华堂，和玉璧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原来在成都教书，后来生病回家休养，就做起地主来。因为是熟人，又事先和他联系过，见我们来了很热情，硬要把他儿子媳妇的新房让出来，给我和玉璧住。我们就把机关搬了进来，把他儿媳妇的新房做了机要室，当然由我一个住着；还在房檐下搭铺，住了一百多队员。早晨起来，队员们悄悄地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李华堂打开门出来一看，感慨得不得了，找到玉璧说：“老兄，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队伍，这么多人驻在我的房子里，怎么就这样清风雅静的？好！就是和杨森的队伍不一样。”说着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找人抬了六头大肥猪，还有两缸陈年好酒，敲锣打鼓来慰劳我们，说是表示全寨百姓的一点心意。老刘和玉璧见这么多东西，一定要给钱，推来推去他们只收了三头猪的钱，另外三头李华堂说是他自己的意思，怎么也不收，还把玉璧拉到一边悄悄说：“有一头猪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和玉屏一定要收下。”

玉璧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两口子吃得下一头猪？要吃当然是大家一起吃嘛。”

李华堂急了，说：“你老弟咋这么不开窍，以为这酒这肉是常有的吗，不会腌了以后慢慢吃？”

玉璧说：“老兄你不晓得，我们这队伍上，从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然咋服得了众人？”

李华堂瞪着玉璧，好一阵才说：“这些年不见，你竟带起了这么一支队伍，好得很，我马上就给你们宣传出去，让跑出去的人都回来。”

这些事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像一阵风一样，到处都传遍了。逃出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地回来了，都说：“我们原先不知道是谁的队伍，空跑了一趟。”

可是，过了两天就出问题了。因为寨子小，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厕所不够，弄得寨子周围、屋墙脚下，都拉的是屎。我们赶紧开了一个会，我对大家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客人，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两天，到处拉的都是屎尿，臭熏熏的。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现在要求大家不要乱拉了。没有厕所，自己去打，现在，谁屙的谁去打扫干净。”夏林说：“谁屙的，打谁的屁股！”

当时说得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脸红得像鸡公冠子一样。散会后，各人

就去打扫，马上动手挖了一些坑作临时厕所，既干净又有了肥料，寨上的农民很满意。

又一天下午，夏林从山下上来，押了十二个人回来，说他们带枪下寨子，在店子里吃东西，招摇撞骗。我听了很生气，说：“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吗？为什么不遵守纪律？”他们不说话。我叫夏林检查他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就问他们：“你们吃东西，不给钱？”

“我们赊来吃。”

“赊来吃？啥时候去还？哪里拿钱去还？这不是估吃霸赊地活抢人吗？”

夏林说：“他们还对人家老板娘胡说八道。”

其中一个叫陈士君的，昂着下巴瞪了夏林一眼：“啥子叫胡说八道？她一个老板娘，未必就是金枝玉叶，开个玩笑都开不得了？哼，我们走，等杜队长回来再说。”说着一挥手，带着十二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喊了声“站住”，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站住了。

我走到那个陈士君面前，盯住他慢慢地说：“陈士君，陈家少爷，我听说你也念过高小，想来也是识文断字的人。布告上最后说，不管哪个犯了纪律，查出来都要枪毙。你说这是军令呢？还是儿戏？”

陈士君一愣，哑了。夏林拿了块板子过来，说：“怎么样？大姐的话听清楚了吗？你们是愿挨枪子儿呢，还是愿意受处罚？”

几个吓惯了，忙说：“愿受处罚。”

夏林拿起板子，每个人打了二十个手板。

过了一阵，杜仁杰回来了，没等我开口就说：“我都晓得了。他几个来告我，我一听就说打得好。要是我来，还要多打二十个手板，还要打重些！我还给他们说，在我们三支队里，大姐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连我都要听她的，你们还敢不听？何况这布告，是我们全体领导研究的，谁都要遵从。”说完，我们几个都笑起来。我对杜仁杰说：“这群人当中，好几个都是苏同久手下的，那陈士君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地主子弟，高小毕业没考上学校，他老子骂他没出息，才跑出来的。今天没服气，恐怕要特别注意。”

杜仁杰大大咧咧地说：“未必又蹦出个苏同久来？大不了跑嘛。这号人，跑一个少一个，少生事。”

我的话当真言中了。当天晚上，陈士君就带了其中的好几个人，以换哨为名骗过守寨门的士兵，逃跑了。

陈士君等人的逃跑，在队伍中引起了震动。我们又开会做了研究，决定在队员中展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为什么参加自卫军？

我和杜仁杰、夏林，分别参加小组的讨论。我的那个组，有好几十个人，大多是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听说要开会，以为像军阀队伍中一样，要清查逃兵的同伙，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说了个开场白：“最近我们队伍里，跑了几个人，据说呢是嫌吃得不好，又没有女人，又不自由，纪律太严了，没得在家安逸。我们开这个会，一是要大家给我们当领导的提意见，这些纪律是不是太严了，或者是只管了大家没管我们自己，大家不服气。二是要大家说点真心话，到底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而不去参加杨森的队伍、土匪的队伍。大家把这些问题理论清楚了，要走的，我们决不阻拦，要留下的，就好好干，再不要三心二意的。”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有人举手站起来发言：“不是我在拍领导的马屁，

这些纪律恐怕改不得。要是改了，我们几百上千人都出去抢女人，估吃霸踬，到处乱屙屎，这不跟土匪和杨森的兵一样了吗？我就是被杨森抓了壮丁跑回来的，我不背这张鬼皮！”

还有一个叫杨青庭的小伙子，英俊英俊的，站起来说：“我不晓得人家为啥子来投廖大哥，我是不满意我那女人。”大家一听，哄地笑了起来。他急了，红着脸说：“你们笑啥子，我说的是老实话。大姐，不怕你见识广，我那女人呀，你见了都要打倒退。又丑又老，又歪又恶，还懒，成天要我妈来服侍她。我看到都生气！”

旁边有人说：“既然见不得，怎么又成了你的老婆？”他说：“嘿，你们不晓得，她娘屋里有钱，我家穷，就倒贴陪套田，估倒栽给我。她嫌我大老粗，非要拿钱喊我去读书，好当啥子公事人。妈的，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从小就放牛割草开山挖地，还读啥子书嘛，我一气就跑出来了。到了这里，才听说了自由恋爱这个说法。二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不死，总要去自由恋爱一回！”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家发言就更积极了。有一个说：“保长欺软怕硬，把地主的指名捐都摊到了我家头上，实在交不起，就把我父亲吊起打，我就跑出来了。结果保长听说我投了廖大哥，就不敢来欺侮了，这两年家里平平安安的。”还有人说：“我们佃田的老板，十二万分可恶，见啥子都要，我屋里连鸡娃都喂不大，我是受不了这口气才出来的。等二天革命胜利了，专门去收拾那个可恶的段四老娘。”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我们是不得回去的，我们还要争取入党，从廖大哥的队伍里跑回去，没得脸面见人。

突然有一个站起来说：“报告大姐，我想回去。”大家听了都一愣，齐刷刷地看着他，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人一见，慌了，忙说：“我不是像陈士君他们那样，要当逃兵，是想请假回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家原来有一块田，卖了半边给地主，哪晓得他早就起了坏心，结果我这半边田越种越小，他那半边越种越宽。我不服，就去告他，结果官府把那块田全部断给他了。逼得我这几年，到处拉船帮工，听说廖大哥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就来投了军。今天当着这么多弟兄和同志，我把话说到明处，请大姐队长准我两天假，让我带这支枪回去，把那龟孙子打了就回来！诸位弟兄，我王某人就当众赌个咒：要是骗了大家，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一会儿，有人悄悄地说：“这个假恐怕该准人家，那地主太可恶了。”于是刚才那个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收拾段四老娘的也等不得了，说他也要回去。

还有一个莽汉子站出来大声说：“我投了廖大哥，他们就把我女人抓了，关在武胜城里的监狱里，都一年多了，现在还没出来，丢给我妈照看两个没爹没娘的娃娃。我也不是说这里不好，是觉得不成气候，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又不敢去攻城。实话说吧，我想到通南巴，去投正规红军！”

中午，把那两个支队的情况凑了一下，问题都差不多。王道纯说：“这种情况要开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下来恐怕还要找几个闹情绪的分别做工作。”我说：“王老师，你会说，今天下午开大会，你来讲。”王道纯说：“我讲什么，恐怕是要等老廖他们回来。”陈亮佐说：“王老师，不要等了，有几个地主出身的，闹得凶，莫让他们又兴风作浪。”下午就开大会，由王道纯讲话，他本来就是教师出身，讲得深入浅出的，好懂。他讲了一通要顾

全大局的道理，最后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前年子，余家场事变，我们的陈玉屏陈大姐被敌人抓住了，你们说廖大哥心里咋想？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都喊打回去把大姐救出来。救不救得出来呢？也救得出来的。只是那样队伍就要受损失，敌人求之不得。于是，我们陈大姐就在岳池城里，整整坐了一年的班房，还被绑去陪了杀场……”

下面嗡嗡的，一些认不得我的，纷纷站起来看。突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大家都鼓起掌来，连王道纯、夏林他们也对我鼓掌，弄得我满脸通红，一个劲向大家鞠躬。

下来，我们又分别找几个闹情绪的做了工作。那个要请假回去打仇人的，伤心地哭了一场，最后说：“大姐，我现在心里晓得了，暂时咽下这口气，不回去了，反正这枪子儿，早晚给他狗日的留着的。”

每个中队都准备了笔墨，要留下的自己签字，结果都签了或者找人代签了，只有那几个地主子弟不签，我们也不强留，让他们放下枪，走了。

刚刚把这些事情处理完，老刘政委和玉璧他们就回来了，还带着李仲生，同来的还有广安的李希白和李晓北。李希白，也做过小学教员，和我叔叔陈徙南是挂角亲戚，也和玉璧早有来往，常常帮着我们出些主意，做做联络，现在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队伍里的参谋。

当晚，在陈亮佐驻的庙子里召开了大队和支队干部大会。玉璧说：“有件大事，进行很久了，现在有了眉目，跟大家说清楚。眼下杨森把实力都扯到营山去了，他的侄儿杨汉印，带着手枪团守着广安一座空城，本来就心慌，前线又催着赶快补充兵源。可是现在谁肯去打红军？我们又派人到各乡去做工作，结果他们的招兵旗插了一两个月，鬼都不上门。我们这才请了李希白李参谋去说，现在请他把情况介绍一下。”

李希白说：“我和晓北去找杨汉印，他不识字，又刚从前线回来，不了解情况，就叫我们去找他手下一个叫杨季元的。我们给杨季元说，长生寨住了一支队伍，兵强卫壮，都是本本朴朴的农民，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听说很规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像胡乱肇事的土匪，要是招募过来，简直是事半功倍的大好事。杨季元想当旅长，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忙说快请他们来谈判，看要什么条件。”

李仲生接着说：“谈判是我去的，这回我冒充了个大官儿。谈下来，杨季元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一、招安后，我们的部队改称大队，不能分散整编；二、指挥官自行委任；三、枪弹粮款按月领取。广安河对面的新场划给我们驻扎，连城防也要由我们包下来，说是共同维持广安秩序。这几个条件，杨汉印也答应了。没办法，不答应就招不到兵。”

大家都笑了。老刘政委说：“我们这次接受‘招安’，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他的枪弹粮草来装备我们自己；第二是队伍整军之后，杨汉印要开赴营山前线，我们就能正大光明地大摇大摆地通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如果还没等他们开过去红军就打过来了，更好。反正要两面夹击他，跑不脱的。只是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就我们这几个干部知道，谁泄露出去，要军法处置。队伍到了那边，一律要严守营门，不但是普通的战士，不得到允许，任何人都不得随便出入。”

他们说话的时候，玉璧一直在看两封信，这时候晃了晃信纸严肃地说：“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内部的组织纯洁问题。这次逃跑和上次的苏同久的事情，就是个教训。这不，明天有大竹、顺庆、武胜的人来

联系加入我们队伍的事情，我们要派专人接待，全面了解他们的情况。比如打过几次仗，领导人的情况怎么样。扩大队伍，当然很需要，可是现在形势好了，什么人都可能混进来，审查这一关必须把紧。还有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对战斗员的政治宣传不够，今后要学习江西的做法，一个支队派一个支部书记之外，每个中队还要有一个政治指导员。”

大家说了一阵，就扯到具体细节上。最后决定由我们三支队先去，报一个团的人数，刁大哥是团长；我改名为陈平，作一营营长，夏林作我的副手，当支部书记；姚生荣作二营营长，苏连清拨在他名下，降职当了个排长，陈亮佐去作支部书记。我们打的是“川北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先过去，其余的队伍都留在长生寨，看看情况再说。

事情说定了，干部们各自回去准备。说了好久的要和红军会师，眼看就要实现了。夏林、陈仁勇走路都在笑，回到队里就宣布每人打两双草鞋，把衣服洗干净，枪擦好，准备到广安驻防。出发的时候，大家把为数不多的枪都藏在衣服里。我和夏林他们一样，换成了男装，穿蓝布滚衫，头戴一顶撮撮帽，斜背两条子弹带，腰间插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手枪，脚上打着布绑带，看上去，就像刁大哥的弁兵。到新街，已经半夜了，我们就在老百姓的街沿上坐着，没有一点儿声音。等了一阵，那个想当旅长的杨季元就来了。刁大哥和姚生荣都迎上去，跟他见面，我站在一边，不开腔。他看见刁大哥和姚生荣都老大老实的，很满意，就问：“你们还有一位陈营长呢？”

我使了个眼色，刁大哥就说：“在后面，明天到。”

杨季元又和我们一道去看队伍，看见我们的人一个个年轻力壮，连连说：“都是种田人吗？好得很，吃得苦。这么多人连铺盖都没有？马上叫人去买谷草，铺盖也要跟着想办法。”刁大哥说：“我们后面的人，还在武胜、合川下头，过不了卡子，希望转告杨旅长，赶快把通行证和持枪证发下来。”杨季元连忙说：“刁团长，请不要着急，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要办到。旅长这一两天就要回来，回来我就去禀告。”

我们就在新街驻下来了。没两天就听到一个消息，说岳池送往廿军前线的军饷，又被我们截了。此时向廷瑞正从前线撤回岳池，杨森打电话回来骂他笨蛋；向廷瑞不服，说听说是杨汉印在长生寨招安的队伍，还没上前线就要截军饷，军长您看怎么处理？杨森正在火头上，就喊“清剿”。于是我们就和向廷瑞的队伍又热热闹闹地打了一仗，最后叫已经接替张俊昌当了岳池县长的叶济，亲自带兵打到长生寨来，也被我们收拾了一顿。

接着，玉璧 and 老刘政委就到新街来了。我悄悄拉过玉璧说：“你真是手痒，怎么又去截款子？坏了大事怎么办？”玉璧笑笑，说：“送到嘴边的肥肉，怎么能不吃，截了他又怎么样？向廷瑞不晓得是我干的，叶济后来晓得了，我也不怕他。一来他不是杨森的嫡系，杨森不重视他，二来雷忠厚也找他给我们买过几次枪弹，他有短处被我们捏在手里。”我说：“你们这一截，只怕杨森要起疑心，原计划有变动了吧？”

他说：“变什么？叶济已经去了结了，说人家长生寨的队伍，全都开到新街去了，不信请军长去查问；不晓得是哪股土匪，打着人家的名义去抢的。”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也笑了。

正说着，杨季元派人来，说杨汉印请客接风。我不想去，就让刁大哥和姚生荣去。过了一阵，李希白过河来，说杨汉印有点事情突然又走了，他的老岳母余老太太代请这个客，一定要请陈营长过去，不去不开席。

我看了老刘政委一眼，他说：“去就去嘛，光明正大的陈营长，怕他做什么。我们差这么多东西，正要找他解决呢！”我说：“别的倒没什么，就怕他们看见我们队伍有女人带兵，会不会……”

老刘政委说：“你还怕他看不起？女的就是女的嘛，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佘太君百岁挂帅，不都是女的吗？我们队伍里有了这么个女将，正要叫他们开开眼界呢。”玉璧也鼓励了我几句，我就换了装，穿一件漂白布上装，青长裙子，随着李希白一道过河。一出营门，我们的人看见我，都惊诧的，夏林说：“大姐，你真是孙悟空七十二变，一会儿一个样。”

广安城和新街隔河相望，夏林送我到河边就转回去了。过了河，我同李希白直向广安后街杨汉印的公馆走去。大门口站满了迎接的人，刁大哥和姚生荣也在，一个老太婆站在最前面，手里拄着一根龙头拐棍。李希白在我的耳边说：“这就是杨汉印的岳母余老太太，管事得很。”

门口站着的人看见李希白陪着我，都有点诧异。余老太太说：“叫你请的陈营长呢？”杨季元也说：“客都到齐了，就是等陈营长，怎么还没来？”

刁大哥笑着说：“不是来了吗？”

杨季元四处张望，直问在哪里。

刁大哥说：“你们做官人的眼睛真大，杵倒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

余老太太、杨季元和所有来欢迎的人都惊奇地望着我，看得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杨季元忙说：“啊啊，是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像个教书先生的样子，请问大名是……”

“陈平，耳东陈，平常的平。”

“啊，久仰，久仰！前些天在新街看到你们贴的布告，后面落着陈营长的名字，没想到就是你。”

余老太太非常高兴，拉着我左看右看，突然想起，忙喊：“快进屋快进屋，今天不讲究男桌女桌，都不是外人，一桌吃，一桌吃。”说着就喊上菜。杨汉印的女人只顾看着我，不住口地打着啧啧说：“我们过去只是书上听说有个花木兰、穆桂英，今天倒真的看到了一个女的带兵打仗。”杨季元也说：“只听说共老二的红军里面有女的带兵，没想到你们也有。”刁大哥说：“我们的陈营长还是文武双全哩。在我们那一带真是响当当的，多少歪人都怕她。”

我说：“刁团长，你莫瞎吹，谨防从半空中跌下来。”大家说说笑笑，吃了晚饭，杨汉印还没有回来。我要走，杨汉印的女人无论如何要留我宿一夜。我想也是，还没见到杨汉印呢，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让刁大哥他们先回去。晚上，我替杨汉印的女人画了一对枕头，又替余老太太画了一幅佛像，她们爱得不得了，接下来我们又摆了些女人家的龙门阵，一直谈到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没睡多久，天就亮了。我悄悄地爬起来，不料惊醒了杨汉印的女人，一把拉住我，一定要吃了饭再走。我说：“实在是队伍上有事，昨天晚上就该走的。二天有空，再来陪你。”她还是不放，娇声说：“我们摆了一夜的龙门阵，就像亲亲的两姊妹一样，怎么能连早饭都不吃就放你走了，再说旅长等一会儿一定要回来，你们队伍上的事情，我再帮你说说。”

我只好又留下来，吃早饭。还没下席就听见堂屋里有人在问：“太太呢？”

一个弁兵在回答：“在房里吃饭。”

“为啥子不在堂屋里吃？”

“有客人。”

“谁？”

“陈营长。”

“清晨八早的，哪里来的陈营长？”

“昨天下午就来了，没走，在太太屋里歇。”

“什么？！”那人大吼一声。余老太太听见了，对我说是旅长回来了，放下筷子，捞开门帘说：“我们陪陈营长吃饭，你在外面闹啥子？”

“啥子陈营长？老子认不到。”杨汉印扒开余老太太，冲进房来；我立刻站起来。杨汉印看见我，一惊，站在门口，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说：“旅长回来了么？我就是陈平。”

“啊……啊……啊……”杨汉印不明不白地“啊”了几声。这时，李希白进来了，连忙说：“旅长，不认识？这就是刁团长那边的陈平陈营长嘛。”

杨汉印的脸一下就红了，狼狈地说：“把弁兵喊来，他妈的，话都不说清楚，差一点把陈营长得罪了。”

他的女人在旁边格格格地笑个不停，余老太太哈哈大笑地说：“我当啥子事哩，原来是醋坛子打倒了。”杨汉印也怪不自然地笑着说：“对不住，陈营长，误会误会。”

我看这个人，怪模怪样的，粗鲁得很，左眼睛瞎了，看起人来像木匠吊线一样，一副下流相，难怪外面喊他“印瞎子”。他女人在一边使劲说我的好话，还说陈营长现在有困难，等着旅长回来解决。杨汉印却像没听见，只是用一只眼睛死死盯住我，口里直说：“陈营长，请坐请坐，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会尽力去办。”

我沉住气，在他对面坐下，说：“旅长，现在我们开来的人没有军服、铺盖，没有炊事用具，枪也不齐，最困难的是没有子弹。”

杨汉印说：“没有关系，这些事都容易办，我这里还有十几箱子弹，派人来拿就是。”

已经中午了，他的话还没有完，我说有事要回团部去，他挡住门说：“吃过午饭走嘛，我还有事同你谈。”接着就叫他的弁兵去摆饭。我耐住气问他还有什么话，他说：“军长的命令，叫我马上把这个队伍开到渠县三汇镇去，那边共军打得很厉害。”

我说：“既然这么急，为什么不按我们谈判时的条件做呢？目前吃的、穿的、打仗用的都没有，特别是通行证不发下来，我们后面的人还不能来，这些问题不马上解决，莫说到前线，恐怕要向后转哩。”

杨汉印听说我们的队伍要向后转，心就慌了，忙说：“陈营长，不要着急，只要有人，这些问题都好解决，军服铺盖马上发，枪弹马上配，炊事用具马上找人给你们送来，通行证的事，我马上到军部去办，现在先发一个月的饷。你们哪个负责？打个条子来。”

我说：“刁团长、姚营长，我们三个都可以负责。”“好吧，你打个条子就行了。”

我站起来，说回去开个清单。他又把住门，说无论如何要吃点东西才走，接着就叫他女人去煮银耳。这时夏林进来了，我使了个眼色，夏林会意地说：“陈营长，请你赶快回去，团部来人，说他们还没有米下锅哩。”

我对杨汉印说：“旅长，你看嘛，我们在这里吃银耳，队伍还没有饭吃哩。”

杨汉印转身对他的女人说：“余儿，把你的私房钱借出来，给陈营长带过去，先把今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其余我跟着去办。”

我拿了二百元钱，杨汉印的女人把我送到城门洞。刚走到河边，就碰到李仲生，他一见我就说：“哎呀，大姐，你是怎么搞的，大家都急坏了。”

过了河，回到团部。玉璧气粗粗地说：“你呀，真是老虎胆，廿军关你那么久，一认出来，全都遭殃。”我故意说：“是你们喊我去的嘛。”

仲生笑着说：“喊你去，不是叫你耽误这么久嘛，你看你把我们大哥急成了什么样子？”

我把和杨汉印的交涉过程一一说了，老刘政委听了，满意地看着我直点头，接着斜了玉璧一眼说：“怪不得我们老廖要着急呢，这么能干的一位夫人，出了事情怎么得了啊？他也不想印瞎子这个饭桶，怎么是我们玉屏的对手，这回不是又斗输了吗？”

我马上就叫唐俊清造了一份名册和物资需用清单。陈亮佐念给我们听，啥子军服、铺盖、甑子、锅碗……连洗脸帕都造上了。他笑着对唐俊清说：“看不出你还是个行家哩。”唐俊清说：“什么行家不行家，这些东西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用，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去买？”

名册和清单送去以后，当天晚上就拨了两营人的炊事用具，指定了出粮地点，军服也发了一部分，还送了两千块钱过来。

玉璧和老刘政委正高兴，忽然有人进来，说叶济叶旅长派了一个副官和几个士兵过河来了。玉璧和老刘政委互相看了一眼，说：“仲生，你先出去看看。”

李仲生出去，一眼就看见我们派在叶济身边的郑涛。郑涛没开腔，旁边有两个兵大吃一惊，：“唉哟，李副官，你在这里呀？”

李仲生一看，是原来严定礼手下的两个人，就没好气地说：“有啥奇怪的，看到骆驼就是说马肿了背，我到这里来不得？”

那两个兵见他脸色不对，连忙赔笑说：“哪里哪里，我们是说好久看见你了。你们这里，嘿嘿，你们这里好谨慎啊，在自己的营盘里，还个个都插着双枪。”

李仲生不理他们，只和那个副官搭话，问有什么事情。那副官说：“叶旅长回广安了，请刁团长、姚营长和陈营长过去吃饭。”说着就把帖子送过来。

把几个人送走了，仲生才进来，把请帖递给我，啧啧嘴说：“大姐，你的口福好，这回带上我也去吃一顿吧。”

我看了看请帖，很精致，正儿八经的样子，就递给老刘政委说：“这下子我们都成贵宾了，这个请过去那个请过来的。是不是在长生寨挨了打，来设鸿门宴了？”

玉璧看了请帖，说：“这个礼数不对了，行客拜坐客！叶济才到广安，该我们请他，给他接风嘛。”

老刘政委说：“就是，我们好生铺排一下，请他来吃饭，老廖好趁热打铁，跟他好生摆谈一下子。”说着大家研究了方案，完了玉璧说：“仲生，你再去跑一趟，按我们刚才说的，请叶济过来吃饭。”

李仲生一听，说：“又叫我去呀？要真的摆起鸿门宴，不就把我扣在那

里了？”

玉璧说：“你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驻在这里，连广安的城防治安都是我们包了的，真的扣了就去把你抢出来。”李仲生想想，同意了，刚跨出门又转来，说：“莫忙，夏林你要跟我一路。”

夏林讥笑他说：“你怎么是这胆子，捡个螺蛳也要找个伴。”

李仲生说：“怕我倒不怕，我只担心要是把我扣留了，连放信的人也没有，那才不好哩！我就是捡螺蛳也要找个伴，走，一道走！”

夏林没办法，只好和李仲生一起走了。

叶济听说我们请他，有点害怕，不敢答应。李仲生就说：“叶旅长你放心，你不是请我们廖大哥到广安来吗？就是廖大哥请你呢！”

叶济一听说是廖玉璧请他，更犹豫了。郑涛就在旁边说：“人家廖大哥，是讲信义的。”

我们在长生寨打人家，一说办交涉，人家就停了火，你随口请人家到广安来，人家就来了。

现在请你你不去，二天要遭笑话，何况这儿守在我们家门口，人家现在又是杨汉印的队伍了，未必当真就没个礼数？去吧，我和郑宁给你保驾。”

郑涛和郑宁是两弟兄，都是我们的人，两个枪法都好，平时练武拿天上飞着的小麻雀作靶子，弹无虚发，现在两个都是叶济的贴身保镖，被叶济收成了干儿子。叶济见他俩都极力怂恿，就同意了。

天擦黑，叶济穿了身便服，带着郑涛两弟兄过来了。玉璧迎出营门外，和他手挽手地走进来。叶济一看，门口只有我和夏林，李仲生背起手，走来走去的，都没带枪。他有些莫名其妙，正发愣，老刘政委迎出来，玉璧互相做了介绍，就进屋了。

玉璧今天不知怎么的，装气派，一会喊“瓜子！”一会儿又喊“开水！”就像支使佣人一样。夏林见我烦，他就进进出出地忙，我坐在外面，听他们说。

玉璧说：“叶旅长，对不起，让你受了惊。”

叶济说：“哪里哪里，是我不知底细，冒犯了廖大哥，请多多包涵。你们的人，枪法真好。”

玉璧打了个哈哈，说：“好什么呀，叶旅长，你们受损失了。”

叶济摆摆手，说：“我手下的那些草包，怎么经得起你们打，你们连一个小娃儿都会打枪，听说是您的小少爷？”玉璧说：“不是我的，是另外一个弟兄的，他父母都死在杨森手里，我就收养了。我的还小，一儿一女，在外面读书。”叶济听了这话，不开腔了，停了一会儿才说：“廖大哥，您也知道，我是端人碗受人管，身不由己啊。”玉璧说：“我知道，廿军是杨家的天下，你不是嫡系。别看杨汉印大字不识两个，糊涂蛋，他比你这个没实权的副旅长管用。你再替杨森卖死力，恐怕到时候还是和雷忠厚一样，丢在一边晾起来。”

提起雷忠厚，叶济不开腔了。他俩是好朋友，心情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停了一会儿，听见玉璧又说：“叶旅长，你也是穷苦人出身，你也曾下过力，当过兵，过了多年的流浪生活，受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的狗气；如今你当了官发了财，怎么就忘了本，反拿起枪杆来耀武扬威地屠杀像你过去一样的穷朋友？要知道，你们的兵多是穷苦人出身，穷苦人是不愿打穷苦人的。你们在华蓥山“围剿”我们这么多年，结果怎样？我们的人越打越多，你们

的人越打越少。这一次你们在广安招募新兵，连鬼也没有上门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叶济听了这番话，不断地用手巾抹着脸上的汗珠，忽地站起来说：“廖大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说。”玉璧紧接着说：“能够率部起义，公开倒向我们，当然是我们最欢迎的。不然，也希望你能保持中立，不要助纣为虐，这对人民对你们都有好处，希望你三思而行！”

叶济背着手，闷着头，在屋内来回地走着。忽然，他站在玉璧面前说：“廖大哥，你说的都在理。不过，我目前的处境，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地装聋作哑，我不会妨碍你们就是了，但也希望不要对我有影响。在可能范围内，我可以替你们做点事，但这事要严守秘密，否则，会大祸临头的。”玉璧说：“我们了解你的处境，希望互守秘密。我们这边队伍的情况，我和你在这里相会的事，也希望你不要向杨汉印和其他任何人谈。不然，引起误会，今后都不好。”

水开了，夏林有事出去了，我提着水壶，又拿了两包大炮台香烟进去。玉璧是不抽烟的，今天破例燃了一支，把烟夹在手指上，见我把水壶放在一边，转身要出去，就喊：“把茶泡上！”

我瞪了他一眼：“你喊谁？”

玉璧一愣，有些尴尬。叶济忙问：“这位是——”玉璧说：“是我内人。”

叶济连忙站起来，说：“原来是大嫂，你怎么不早介绍呢！”说完就抢上一步，提起茶壶倒水，边倒边说：“我来我来，廖大哥你也是，为什么不用个人。”

玉璧说我们这个队伍里就这样，什么都自己做。叶济听了直摇头，说：“你们共产党的作风，难得难得，我那屋里，用了好多人。”

天已经黑尽了，我点燃了洋油灯。郑涛和郑宁帮着把两桌席摆好，叶济无论如何要我同桌吃；我不干，叫夏林去。夏林说明明是叫我去给他们斟酒，我才不去。

唐俊清说：“斟酒怕什么，只要对革命有利，有啥关系。”郑涛也在一边帮着说，结果夏林还是和唐俊清去了。叶济警惕性很高，起初滴酒不沾，玉璧说：“叶旅长，我过去一杯也不吃的，今天特别陪你吃点。”说着就先喝了一口，叶济才端着酒杯咕噜噜地喝下去。玉璧一看，大笑着说：“看喝醉了，过河跌在水里哟。”叶济放下酒杯，也笑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下席了。郑涛把洗脸水端进招待室去，走出来对我说：“哈！今天我们旅长也向大哥学了，过去他一吃完饭就二郎腿一跷，纸烟一烧，”郑涛倒在椅子上学着做了一个样子说：“今天啊，大哥给他谈了话，规规矩矩的，从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规矩，真的。”

吃了饭，大家坐在一起，摆龙门阵。玉璧从衣包里拿出一块苏维埃的银元给叶济看。叶济把钱捏在手里仔细看了又看，又用一个手指敲敲，听着银币的声音，惊异地说：“你们这洋钱成色还不错啊！”接着把洋钱翻了一面，指着上面的图案，问这是刻的什么？

玉璧说：“这是我们苏维埃的符号。这镰刀是代表农民，斧头是代表工人，现在这两个阶级最受压迫，也是最革命的，他们联合起来，力量最大，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接着，他就喊我把组织上送来的银元拿了十块出来，交给叶济说：“我今天没有什么东西送你，就把这几块银元送你作个纪念吧！”

叶济把银元接在手中，又翻来覆去的看了，非常高兴的样子。郑涛凑过来说：“哎呀，这么好的银元，我们也要几个。”玉璧又叫我拿了几块，给了郑涛两弟兄，叮嘱说：“这种钱，目前可不能在广安露面哟。”

叶济说：“我晓得，现在还不是用的时候，我带回去一定要好好保留作纪念。”说着叫郑涛把钱收拾好，看了看表，说：“已经一点钟了，我要过河去了。”

玉璧说：“我送你。”就挽着叶济的手出来，我们一起送他走到河边。叶济握着玉璧的手，突然说：“廖兄，你和我一起回去，我们再谈谈怎么样？今天同君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玉璧想了想，看看老刘政委，又看看大家。叶济忙说：“还有大嫂，老夏，你们都去玩一玩，有郑涛他们，可以保证不出问题。”

老刘政委说：“去吧，不打不相识，你们都过去陪陪叶旅长，明天早点回来，我守屋。”

叶济的公馆在广安后街，是原来杨森军部驻过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起床，就有人来会他。叶济怕露了马脚，就给家人打招呼：任何人来，都说不在。接着又叫郑涛两弟兄陪夏林、唐俊清打牌，叫他太太陪我摆龙门阵，他自己和玉璧在内房继续谈话。

眼看都快小晌午了，唐俊清进来，看看我。我起身去内房，走到门口就听见叶济在问：“这么说来，将来买的田土也没有用处了？”

玉璧见我进来，又说了两句应酬话，就站起来告辞。叶济一定要挽留吃饭。正在拉扯，杨汉印闯进来了。叶济没有料到，有些惊慌，又不得不介绍：“这位，是，是廖大哥……”

玉璧站在那里，很谦和地说：“廖简文。”

我马上凑过去，挡住杨汉印的视线说：“旅长，你来了，正要去找你呢。我们的军需，条子都上来好久了，还没发齐。

弟兄们没有铺盖，都病了好几个了，您恐怕要催着点啊……”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杨汉印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我，忙回过头来，啊啊地应着听我说。玉璧趁这当儿，悄悄地溜走了。

叶济松了口气，也过来打帮凑，说：“陈营长怕旅长一时凑不齐，正在找我想办法呢。

我跟她说，杨旅长这个人讲义气，答应了的事情一定会办，我插在里面，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杨旅长？”

印瞎子坐下来，说：“就是，陈营长你是见过大场合的人，急也不在这两天。军需品，我都交代了，一样一样会给你们清点清楚，通行证嘛，已经到军部催去了，他们要你们上前线，不比你们急？你看你，瞧不起我嘛，有事直接来跟我说嘛，我不在找余儿和老太太也可以，她们成天说你的好话……”

我看他又纠缠不清，应酬了几句就要走。他连忙起身拦住，果真要留我在叶济家吃饭，要不就上他家去玩。正在拉扯，夏林和唐俊清急吁吁地跑进来，说：“陈营长，营房里有事，叫你快回去。”

杨汉印一挥手，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找你们刁团长嘛。”唐俊清碰了夏林一下，夏林结结巴巴地说：“是弟兄们打架了，就你才招呼得到。”

我叹了口气，说：“旅长你看嘛，无事就要生非！我巴望早点开起走，有仗打就非得这些麻烦，失陪了，改天再到您府上拜望。”

当天晚上，叶济就派郑涛两兄弟给我们送来一打手枪，五千发子弹。

我问玉璧这人到底怎么样，玉璧说：“跟他摆了这么久，从全国形势到刘湘和杨森的矛盾，还有他个人的利害，都说清楚了，把他分化出来，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帮助。”玉璧的话，后来得到了证实。

夏林订婚

新街头口上，有一家卖豆腐的店子，店主姓徐，老两口五十多岁了，几辈人都做豆腐为生，是对老好人。家中没有儿子，只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儿，粗眉大眼的，倒也精灵活泼。我们驻在新街，队员们常去他店里买豆腐，找徐大娘浆补衣服。空了我也常去看看，怕有些人欺侮人家母女，不规矩，一来二去就混熟了。徐大娘娘屋里也姓陈，我们认成了姐妹；她女儿徐大妹，叫我嬢嬢。

每次我去，徐大娘都亲热得很，说：我们活了几十年，哪里去找你们这样好的队伍啊，买豆腐从不赊帐，帮我们推磨，过豆腐，挑水……像自己人一样；喊我们徐伯伯、徐伯母，进屋来，不乱说，不乱动，洗洗补补是小事情嘛，也要给钱；你看你嘛，大小是个官儿，也常来我们穷人家摆谈家常，像亲姐妹一样；自从你们来了，我们这个穷店子，都增光了好多哟。正说着，徐大妹给我们营盘的同志送衣服回来，我对她说：“大妹，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若有人对你不礼貌，就告诉我。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处分他。”

徐大妹笑着说：“没有的事，你们的人都很好。”我对徐大娘开玩笑说：“把你女儿拜给我，我带她到重庆去读书，要不要得？”

徐大娘一拍巴掌说：“啊呀！那才好哩。我女儿就是想读书，你们每回送豆腐条子来，她认不到字，不识数，要拿去问别人，真是苦死了。你喜欢她，就跟你好了。”我把徐大妹拉在身边坐下，摸着她的发辫子说：“我喜欢这女儿，大方能干又蛮得，不像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徐大娘有点感伤地说：“我们穷苦人家的女儿，就只晓得勤耙苦作，浆衣洗裳。

这女娃命苦没有读到书，粗野得很。唉，这几年，人长大了，不敢到街上乱走，甘军那些军官丘八，尽是他妈的一些怪物，他们要是看上了哪家女娃，就要来抬人，经常逼出人命案啊。唉，要是你们能长住这里就好了。”夏林经常去端豆腐，帮助推磨，混熟了，像一家人一样。徐大妹常常说：“夏叔叔，你把衣服拿来洗嘛！”开初夏林不好意思，以后缝缝补补的也找她。夏林会说笑话，经常向他们摆我们过去在山上打游击的故事。徐大妹简直听入了迷，就是徐大娘夫妇俩也喜欢听。过去这个三口儿的小家庭整天忙着糊口食，总是愁眉苦脸的，自从我们驻扎在这里后，特别是夏林常去他家里走动，就常听见屋里的笑声冲破了天。

有一次徐大妹问夏林：“游击队里有没有女的？”

夏林说：“咋没有女的，你的嬢嬢还是个队长哩。”“嬢嬢会打枪打仗吗？”

“怎么不会，你嬢嬢还会两手打枪哩。她带我们打了多少次仗，把杨森这个耗子精打得叽里哇啦的。不然，我们的队伍会开到这里来驻吗？”

“我想去，行不行？”

“行呀，只要你爸爸妈妈答应，向你嬢嬢一说，准行。”

夏林这一说，徐大妹更高兴了，我每次去，她总是挽着我问这问那的，硬要跟着我走。

虽然我顶喜欢这孩子，再说身边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也有很多好处，但是人家老两口就靠这个孩子磨豆腐维持生活，将来还靠她养老，怎么能随便带走，所以不过说笑而已。

一天晚上，徐家来了许多年轻妹子。我们一去，徐大妹就要夏林唱歌，夏林不好意思地唱了几句，徐大妹说：“夏叔叔，你唱得好，教我们唱嘛。”

夏林说：“我不行，去找陈仁勇来，我都是向他学的。”徐大妹问：“哪个陈仁勇？”

我说：“要攀这门亲，你要喊舅舅。夏林，去喊他过来。我们好久没有听他唱歌了。”

不多一会儿，陈仁勇来了，一进门就问有啥事情。“要你来教唱歌。”

“教哪个？”

我指着徐大妹：“就是这些妹子。”

徐大妹拍着手说：“欢迎，欢迎，舅舅唱一个嘛。”其他的女孩也跟着拍起手来。

我说：“你是舅舅，说话要有个分寸，唱歌要有个高低，不要乱唱啊。”

陈仁勇一向是个厚脸皮，我这一说，他倒不好意思了，想了一下，说：“那我就唱个新编的山歌吧。”说着清清嗓子，就唱起来：

青杠叶，青又青，

妹送我郎去当兵，

郎呀郎！当兵你莫投错门啊，要当就当自卫军，自卫军……妹子们听了，捂着嘴直笑，有点害羞的样子。

我说：“他过去总是爱唱妹呀妹的，今天又唱起郎呀郎的来了，怪难听，另外换一个调门。”

陈仁勇做了个怪相，又唱起来：青杠树，皮皮儿薄，

买个花猪儿养不活

……

不等他唱完，妹子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直不起腰来，我直喊换一个再唱一个。陈仁勇又唱，又教，小小的豆腐店，差点没把房顶闹翻了。

第二天，陈仁勇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地说：“大姐，我看夏林和徐大妹两个有点那个意思。”

我说：“不要乱说。”

“啥子乱说，明摆着的嘛，这个媒该你去做。”

我说：“怕不好，别人说我们看到好妹子就要带走。”

“怕啥子？我们闹革命，难道要当一辈子和尚不成？”我说：“好像听她妈说过，要放有钱的。”

“有钱的？地主就有钱，放地主就好？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多可惜。再说，二天我们把地主打倒了，当个地主老婆，有什么好？不行，叫夏林胆大点，去求婚。”

陈仁勇就把夏林拉到我面前来。夏林一本正经地说：“不行，现在我们革命这么艰难，还要弄个包袱背起干啥？”陈仁勇说：“啥子包袱哟，人家这样勤快能干，不要你养。”“不，这不行，我们队伍不知哪天开，我走了丢

下人家谁管？还有她的爹妈怎么办？”

“那先订婚，二天有机会再结婚嘛。”

“二天，什么时候？我们开到什么地方也不晓得。要是我牺牲了，别人年纪轻轻的守活寡，那才问心不过哩。”陈仁勇眼睛一瞪说：“嘿，鹅颈子那么长也有个下刀之处，你咋简直像根四季豆不进油盐，连水都泼不进？”我笑着说：“夏林，咋这样没有志气，还没结婚就说死。怕啥子？叫徐大妹上山打游击，同我们一道，由我负责。”夏林不开腔了，低着头，半天才说：“反正我做不了主，看大哥大姐你们怎么说，都行。”

陈仁勇指着夏林的鼻子说：“嘿，你这成啥话，又不是包办婚姻，你们自由恋爱嘛！”

大姐，你说呢？”

正说着，唐俊清也进来了，一听说这事，抓住夏林的手直说：“嘿，夏林，莫稳起，这下子我们要巴到大姐当老辈子，好好生生吃顿喜酒了。”

我说：“你莫乱闹，事情还没成，闹开了多不好。”唐俊清说：“大姐，莫说得那么严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正大堂皇，怕啥子？我们不说，过两天他们自己都会说。

你看，夏林一天不去推磨，那徐大妹就要来找他。”

夏林说：“老唐，你莫乱说，我没那个意思。”唐俊清说：“嘿，没有哪个意思？人家对你那么好：‘夏叔叔，你的衣服我给你洗了，你换不换？’还有，那天你同徐大妹到河边去洗衣服，洗了那么半天，都说些啥子？”我说：“大家莫在这里说七说八的了，依我看，夏林今年二十八了，上回我给周辉同说媒的时候就答应过他，现在既然大家都认为徐大妹合适，就一起设法成全了。其实我看徐大妹也有意思，背后里可夸她夏叔叔呢。我开她的玩笑，她说莫乱说，人家是干革命的，当队长，还瞧得起我们磨豆腐的小户人家？我看没问题。”

唐俊清立刻拍手打巴掌地说：“要得要得，我来当这个媒人。”我一听，就说正好，那你就去跑一趟徐家吧。唐俊清一看说真了，连忙伸了一下舌头说：“我才不敢啊，那老婆子厉害得很。”

陈仁勇说：“你这个人想吃猪脑壳，又怕做媒，想当泥鳅啊，又怕泥糊眼。这样怕狼怕虎的，你还革命呢！”“唉呀，你莫说得那么深沉，我去！”唐俊清沉不住气了，说着就跑了出去。

一顿饭工夫，他兴冲冲地跑回来说：“她老人也没问题，成功了。”

大家都问他是怎么说的，唐俊清又比又划地说：“我刚走出门，就碰到徐老头来了，我就约他到营房隔壁的一个小酒店去吃酒，七说八说就扯到了他女儿的婚事上。我说：徐老伯，你家大妹要说个什么样的人户嘛？”

他说：我倒没有什么说的，我们穷人嘛，怎敢高攀。就是我那个老婆子，她要放个有钱有土的。

我说：我们队伍里那个夏队长，你认为如何？徐老头说：是夏老弟？很好嘛，他常时来帮我们推豆腐，子弟倒不错，不知他家里怎么样？”

这时夏林和陈仁勇从外面进来了。唐俊清望了夏林一眼，仰头笑着说：“头炮打响了，就不能错过机会。我就对徐老头说：夏队长家里是个大地主，有一千多担租谷，他又是个独生子……”

夏林生气了，当胸掀了唐俊清一掌说：“撞你的鬼！”我和陈仁勇也禁不住地笑了。

唐俊清对夏林说：“我逗你玩的。我对徐老头说：没有问题，他虽是个穷人出身，但很成器，又是我们廖大哥最好的兄弟，情如手足。大哥为人义气，卖田革命，做事用钱从没分过彼此，大哥的家就是他的家，你用不着愁……徐老头吃了两盅酒，听我这一说，醉醺醺笑呵呵地走了，他说今晚上要和老婆子商量再回话。”

我决定和夏林一同到徐家去。夏林说不去。陈仁勇说：“你不去哪行？说不定人家还要多心，以为是我们和大姐包办的呢。”

正在拉扯，陈亮佐进来了。陈仁勇拍着夏林的肩膀说：“亮佐，你来得正好，我们的外侄儿，要办喜酒呢。”接着便把说媒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吹了一遍。

亮佐说：“好好，我赞成。我们在山上呆了这么多年，这些光棍再不找个老婆，我看年纪大了都要到宝顶寺去削发为僧了。再说，我们快要同红军会师了，热闹热闹也是时候。”

亮佐这么一说，大家的兴致更高了。他本来是叫我去会邻水县那边来参加我们队伍的人，见我们正商量要去徐家，就说：“那我去陪客，你们要说成啊！”然后转身走了。

我们一大群人，拉拉扯扯地到了徐家门外，夏林就连头都抬不起来了。我说：“看你平时的嘴像丫雀子一样，今天咋这么没出息？你和陈仁勇推磨去吧，我和唐俊清去说。”

走进大门，就听见老两口正在商量。徐大娘摇着头说：“我们都几十岁了，还推得了几年磨？光是人好，没得点田产，大妹过去要吃苦的。”徐老头说：“光有田产有什么用，要放个不成器的败家子，再多的田产也要除脱。”

徐大娘一抬眼，见我来了，连忙起身让坐。我接过一根小板凳坐下，说：“徐大姐，你不要愁，夏林是个有作为有志向的青年人，他为穷人打天下，干的是有出息的事。再说夏林从小和玉璧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我们有饭吃他就有饭吃，等革命闹成功了，分田分土，大家都有吃有穿。你两个老人家，还怕没有人养老吗？”

徐大娘听得眉开眼笑的，一拍我的膝头，说：“我这个妹子，就是会说，说的我都爱听。要得，你的见识广，老姐子我听进去了。唉，也好，早点了结这件事，好放心。这个世道，真不成话啊，没有出阁的姑娘放在家里，硬是提心吊胆的。”

说笑了一阵，我对着她的耳朵说：“人生的大事，还是要大妹本人同意，你问问她。”

徐大娘嘴朝外面一努，说：“这么好的女婿，她有啥说的？”我以为她问过了，就说：“这样吧，他们双方都没意见，你们老的也同意，我们队伍一向都忙，眼下难得有这么一段时间的空闲，事情我们就抓紧办。今晚上吃订婚酒，你们看要不要得？”

老两口眉开眼笑的，只是点头。我摸了两块钱出来，叫唐俊清上街去买点菜。徐老头说这咋个使得，我去我去。唐俊清抓起个菜篮子，和他一起走了。

徐大娘到灶房去准备晚饭，我站在窗子边，看夏林他们推磨。

夏林勾起个脑壳，不开腔。徐大妹拿起木饭瓢儿添磨。陈仁勇一边推，一边跟她说笑。

徐大妹看夏林不说话，就说：“夏叔叔，你唱个歌嘛。”

夏林说：“我唱不来。”

陈仁勇却故意说：“啥子唱不来哟，他是不高兴。”徐大妹莫名其妙：“夏叔叔，为啥子不高兴嘛，怎么气呼呼的？”

夏林把头掉在旁边，一脸通红地说：“找你舅舅唱嘛，我真的唱不来。”

徐大妹走到夏林的身边说：“你唱不起，是不是饿了？我来推吧！”

我在窗口说：“哪里是饿了，是你夏叔叔犯了军法挨了手板，受了处罚。”

徐大妹用双手在脸上划一划的：“羞啊，羞啊，这么大的人还挨手板。”

我看徐大妹像平时那样随便大方，倒半信半疑起来：徐大娘是不是还没跟女儿讲？

他们东说西说的，一面飞快地推着磨。徐大妹一不小心，手被磨桩打着了，木瓢儿也打在地下了，一下子便撒起娇来：“哎呀，把我的手打出血了，不给我医好不行！”

陈仁勇说：“是你夏叔叔打的，叫他给你医。”

夏林东摸西摸找不到东西包。我喊过夏林，把手绢给了他，悄悄对他说：“她老人同意了，她本人也同意了，你自己也跟人家谈一谈啊。”

夏林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一样：“我咋个说嘛？”

推完了豆子，我帮着烧火，徐大娘点豆花，徐大妹舂海椒，夏林和陈仁勇摇豆腐。陈仁勇说：“徐大妹过来，今天夏林高兴，给他个好差事，叫他舂海椒。”

夏林说：“我来舂都要得，不要乱说。”

陈仁勇笑着说：“对，对，不乱说了。我来打个谜子你们猜：十人挽手上雪山，八人辛苦二人闲，只见雪花满天飞，面带愁容心喜欢。”

徐大妹眯着眼想了一下说：“舅舅，我猜不到。”陈仁勇说：“我说给你听嘛，一个癞子。”说完后，望着夏林头上把嘴巴一努。

徐大妹望了望夏林的头：“夏叔叔？头发那么深，有啥子癞子？”

陈仁勇说：“你听嘛，癞子头上发痒，用双手去抓，两个大拇指不是闲起来吗？你看癞子搔起癞子头来，眼睛眯一眯，额头皱一皱的，面带愁容，其实心里多舒服多高兴啊，我看你夏叔叔今天就是这样。你说他不高兴，其实他心里倒顶高兴哩。这叫‘乐在其中’。”

徐大妹还是莫名其妙，问夏林：“真的？夏叔叔，你有啥子好事嘛？”

我在一旁想：糟了，这事情她妈没跟她说。女娃子还懵懂的，等会儿要想个办法，莫让人家脸上过不去。

豆花点好了，我们正要开桌，玉璧找来了。唐俊清说：“一席恰恰差一个，今天大哥来得这么遇缘。”玉璧刚入座，金积成又进来了，徐老头叫徐大妹下席。夏林说：“我让。”陈仁勇拉住夏林说：“让不得，让了我这台戏就唱不成了。”我说：“我让，我让。”说着就站起来把玉璧喊在一边，将这件事简单地向他说了。玉璧听了，直是点头，说这件事做得好，就和我一起回到桌边，在又添的一个板凳上坐下来。陈仁勇看人都齐了，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们自从下山来，还没有这样热闹过。今晚上就是……”

我怕说穿了，徐大妹害羞，就一口接过去说：“今晚上都是自家人，我们特地来吃徐大妹亲自点的豆花。”夏林提着酒壶对玉璧说：“大哥，你吃不吃酒？我替你斟一杯。”

玉璧说：“今晚上，这杯酒我非吃不可了。”

金积成觉得大家都话中有话的，自己还蒙在鼓里，就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直问今晚有啥子名堂？陈仁勇向夏林和徐大妹瞟了一眼，又笑了一下，金积成恍然大悟地说：“啊，我晓得了，晓得了。老夏，来，我俩弟兄，今晚上要喝个痛快。”说着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接过酒壶向桌上每人斟了一盅，然后说：“我们同大哥一道快十年了，还没有这样欢欢喜喜地一道吃过喜酒。来，大家干杯，祝我们的大事成功，祝夏林永远幸福。”

徐大妹下席端豆花去了，我就把这事公开说出来，大家很高兴，说了一些吉祥话，徐老两口也笑得合不拢嘴。

正说着，大妹端了一满碗豆花出来，听见在说她和夏林订婚的事情，就愣在那里。我连忙起身，将豆花接了，放在桌上，拉过她说：“大妹，这件事情不是我当孃孃的包办，我和你爹妈都想你一定是同意的，对不对？”

大妹低着头，不开腔。我回头看看夏林，他盯住大妹，紧张得不得了。我摇摇大妹的肩膀，轻轻说：“大妹，你莫害羞，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要是同意呢你就点点头，不同意呢就……你说你同不同意？”

大妹的头，埋在我胸前，半天，才点了一下。

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陈仁勇和金积成把夏林拉起来，就要他给大妹斟酒；接着唐俊清稳坐在那里，直喊“过来过来，谢媒人！”陈仁勇又摆出架子，说：“这事是我先提的头！”

夏林你过来，喊我声舅舅就是了……”

吃完酒，已经深夜了，当时也来不及买贺礼，总得有一个纪念。想来想去，还是玉璧的主意，叫夏林解下系在腰上的一根红绫撕成两条，一条留给夏林，另一条留给徐大妹。我说：“这根红绫是我们在紧急时请救兵用的，你要好好保存，就是撕成渣渣，也不要掉了！”徐大妹提过红绫，毫不迟疑，立刻就拴在身上。

鸡叫了，我们尽欢而散。

事后，我问徐大娘：“喝酒以前，你没有跟大妹讲吗？”徐大娘说：“祖辈辈的老规矩，娘老子说了就算，要是事先同她讲，不把她羞死啦。”

我也很高兴。夏林跟我这么多年，总算为他成就了一桩好事。

借佛化险

这些天，各地的游击队拿到了通行证，陆续向广安集中，分散驻在广安城四周的乡场上。雷忠厚派他的弟弟雷忠信带了一部分人，驻扎在恒兴场一带；李荣华派他的手下钱公武，带了一些人，驻扎在代市场；渠县的唐虚谷也来了，驻在转洞桥；陈伯斋把他的一个营从代市场开过来，编入了我这个支队。另外，郑起和有一两千支枪，也是一支很有势力的队伍，只是党员太少，我们就派夏林去联络，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必要的时候策动起义。后来郑起和果真起义了，这说明夏林的工作是有成果的。

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天天都有人来总队部联系工作，每顿煮稀饭都要煮一斗米。要和红军会师了，大家都成天说说唱唱的，兴致高得很。

一天，玉璧和老刘政委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穿长衫子的人。我一看，

原来是杨云禄，许久不见，不晓得他又从哪里钻了出来。杨云禄要在我的营部里协助整军工作，我一听，心头就起了个大疙瘩。果然没几天，在门口负责警卫的李仲生就不断给我反映，说这个人不守制度，天天都要出营门，不晓得在什么地方逛。

我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人，总是干工作嘛，管他到哪里逛。又过了一天，李仲生又跟我说：“大姐，不对啊，这两天我看见苏连清和杨云禄，成天叽叽咕咕的。”

又过了一天，邻水的队伍开来了，杨云禄突然跑来问我：“你们的部队，总共有多少人？”

我很诧异，心想你是来做政治工作的，这么多天了，怎么还不晓得有多少人？于是就说我只管我这一摊，具体数字，你去问老刘政委。

他说：“邻水那边的人不够。”

邻水的同志今天才来汇报情况，都没谈到这个问题，他凭什么说邻水的人不够？

他见我没开腔，又说：“邻水那边很重要，那边作根据地，比这边好。”

这哪里像什么组织上派来的人？尽开黄腔！邻水那边，哪有这边富足，哪有这边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这一片苦心经营了整整十年，如今扯起了这么大的阵仗，多不容易。再说我们把队伍集聚在这里，是要借路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连邻水的人都开了过来，还说邻水比这边重要？

他像发命令似地说：“你们这部分人，要立刻开到邻水去。”

我问他开到邻水去做什么，去攻城吗？他盛气凌人地说：“你别管，我指挥。”

我盯着他，真想吐他一脸口水。

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指着我说：“你们这支队伍困难多啊，你知道吗？都是各县调来的，团不拢！不调出去要出问题的！”

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是姚生荣的队伍出了问题？是叶济的态度有了变化？金积成和唐俊清天天都在下面转，怎么就没听他们说？我立刻把他两个找来，把杨云禄的话说了一遍。

金积成说：“撞到他妈的鬼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哪里来的谣言！”

这事过了没两天，又出了一件事。我们的队员刘子雄到叶济那里办事吃饭时，和叶济的一个叫陈厚儿的兵，因为几句话打了起来，陈厚儿一枪打掉了刘子雄半边耳朵，刘子雄捂着耳朵在广安城里撵了两条街。我立即叫人把刘子雄找了回来，又派唐俊清去给叶济解释。刘子雄很委屈，说：“那家伙侮辱我，说看我们饿得造孽，赏块肉给我吃，居然还开枪打我！”

我宁输脑袋不输耳朵，非打下他的耳朵不可！”我说：“我们堂堂正正不受人家的欺侮，这当然是对的。只是怎么能打架，在城里撵了两条街，人家会怎么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就是说我们纪律好，和军阀的兵不同，你咋能破坏这个印象……”正说着，郑涛带着陈厚儿过来了，说是叶旅长叫来道歉的。

我说道什么歉，我们的人也有不对，现在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说得清楚的，打架多伤和气。

陈厚儿嬉皮笑脸的，上来拍拍刘子雄的肩膀，说：“就是嘛，你哥子我兄弟，都是出来混口饭吃，你为你的老板，我为我的老板，大家都穿一色衣服，当丘八。”

刘子雄一听又毛了：“谁跟你是一色人物？你才是丘八，老子当的是自卫军！你是为军阀，我是为老百姓，不要扯在一起！”

陈厚儿说：“你为老百姓？那你们投靠我们杨军长做什么？你这衣服，这枪，这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发的？等两天，你们就要跟我们一样，开上前线去填红军的炮眼儿，一样当炮灰……”

刘子雄眼睛一瞪，当胸就掀了陈厚儿一掌：“你说什么？”

老子今天要打就打烂，非割下你那耳朵不可！”我们赶紧把刘子雄招呼住，一回头却看见杨云禄来了，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看嘛，我说要出事就是要出事嘛！人家是主人，我们现在是人家招募的队伍，你刘子雄是什么人？你要跟他撞，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他这话一说，陈厚儿气焰更盛。刘子雄眼睛瞪得鸡蛋大，呼呼地出着大气，看样子马上就要发作。我赶紧盯了刘子雄一眼，唐俊清一把把他拉走了。郑涛也斥责陈厚儿，一边向我道歉，把这家伙带走了。我心里冒火，转身就走。唐俊清赶上来说：“这杨云禄搞啥名堂？组织上派他来干啥的？不但不主持正义，反在一边看笑话，还要来火上加油，这简直是胡闹！还把我们比成什么鸡蛋，把军阀比成什么石头，放他妈的屁！大姐，我看这家伙，要坏事，我们恐怕要向组织上汇报。”

第二天，我正要派人回长生寨去请几位领导过来，江万顺就来了，说要带着队伍回武胜。

我觉得奇怪，说：“老江，你好好的，为啥又想要回武胜？”他很不高兴地说：“为啥子？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打土豪，打地主，打军阀，可是队伍开出来这么久了，我们一次也没打仗，成天在敌人鼻子底下磨皮擦痒的，憋得慌。”说完转身就走。

江万顺的女人江胡氏自从跟我从监里出来之后，就一直跟着她男人，这回也跟着来了。

我把江胡氏喊来，问她：“老江这几天发什么疯，怎么又要带队伍回武胜？”她说：“大姐呀，哪里是他要回去，他是为难。这几天杨云禄和苏连清他们过来，老跟他叽叽咕咕，要老江跟他们到邻水。老江说到邻水不如回武胜，冲着气就来找你了。”我说：“这老江也真是糊涂，这种事情怎么能冲气？队伍调动要等上面的命令才行，哪能随便乱动，否则要犯错误的。”

江胡氏连忙说：“大姐你放心，我会挡他的。”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亮佐，亮佐说几个领导都不在这里，出了这么多事情，要赶快去汇报才行。我说你要在这里负责接待，就我去吧。

我连夜赶回长生寨，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汇报了。刁大哥听说自己的部下要回武胜，很冒火：“这个江万顺，还了得，无组织无纪律！当初生怕不要他来，现在又要做过场。这杨云禄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到处戳烂事啊？上次在三块石我们要打叛徒，他来阻拦，这次正在关键时刻，他又来泼冷水。我要把江万顺弄回来对质，看他到底放了什么烂药。”老刘政委问：“江万顺过去表现怎么样？”

刁仁义说：“表现一直不错嘛，是个贫农，打仗很勇敢，还在争取入党，他女人在余家场事变中和大姐一起被捕，坐了一年的牢，都没有影响情绪。”

老刘政委说：“那就这样吧。江万顺，马上调回长生寨。杨云禄的情况，王老师你写个报告给组织上反映一下，要快，今晚上就写。”

王道纯点头答应了。玉璧对我说：“你回去对他说，叫他放规矩点，不

要乱跑，出了事情我们不负责。还要注意监视他的行动。”

我笑笑说：“这事怕做不到。他现在架子大得很，要不是我忍性好，夏林、金积成早把他撵了。”

果然，江万顺调回长生寨后，杨云禄就不住这边了，只是托人带了个信过来，说住苏连清那边，了解情况方便些。我想，苏连清现在是姚生荣二营的人，住在城边负责广安城内的治安，我管不了，就把陈亮佐叫来，把老刘政委和玉璧的话给他交代了。他在姚生荣那里当支部书记。

第二天，陈伯斋来跟我说，他要请两天假，把留在代市场的一些后勤人员带过来，免得兄弟部队的人去了，磕磕碰碰的起摩擦。我叫他带两个人一道，路上要小心。谁知他刚出去了一会儿，就转来了，神情紧张地对我说：“大姐，出事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我刚走到河边上，就看见几个人在打架，把一个女人往河里拖。下去一问，才知是钱公武手下一个叫李芬的兄弟伙，女人被人拐走了，‘拐子’就是杨森手下一个局长何鲜的亲兄弟。这边李芬不肯罢休，钱公武就派人去办交涉，那边何鲜的兄弟不肯交人，两边就在河边打起来，钱公武的人要把那对男女掀下河去。我怕影响不好，就把人带回来了。这在我们的治安范围内，出了事情，我们要负责的。”

他停了停，又说：“钱公武是李荣华李大哥的部下，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也对李大哥不好。”

陈亮佐说：“这事还是请钱公武来，我们商量一下再说。”

等了一阵，钱公武来了，李芬的女人也被带了进来，后面跟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我把看热闹的人轰出去，关上门，这才发现，李芬的女人妖娆得很。

钱公武见了我，一抱拳说：“大嫂，给您添麻烦了。这个女人，坏得很，看不起我们，想去当官太太。何鲜的兄弟仗势欺人，两个都不是好东西，要不是你挡住，我的人早把他们掀下河了。”

我走到那女人面前，说：“你到底愿意跟哪个？”她撇着嘴，说：“李芬又穷又歪，经常不落屋，还通共，我就是不跟他。”

我瞪了她一眼，心想这种眼浅皮薄的东西，留下来一定是祸害，陈伯斋真不该管这个闲事，于是就对钱公武说：“钱大哥，对不起，因为这五十里之内，属我们的治安范围，所以把她挡回来了，现在人交给你，随你去处置。”

第二天，陈亮佐来告诉我，钱公武把何鲜的兄弟捶了一顿，又叫他出了一百二十块钱，一对银戒指，写了张保状，把那女人领走了。

我一听就说糟了，这事恐怕要扯大。

果然，当天下午，何鲜的兄弟就去广安县衙门告状，说土匪把他女人抢了，敲了一百二十块钱和一对银戒才放出来，还告我们把土匪窝起来。县府就派了四个法警，指名来要钱公武和陈伯斋。

我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两个人。

杨云禄说：“怎么没有？这关系到我们部队的荣誉，有没有都该让人家清嘛。”

我气极了，在桌子上大拍一巴掌：“你说什么？让人家清？清谁？谁是土匪？没有我的命令，看谁敢进我的营门！”

李仲生把腰间的两支枪一下子扯出来，守卫的队员们哗地散开，在营

门口站成一排，全都把枪举起来。杨云禄怔了怔，灰溜溜转身走了。那四个法警不敢造次，也走了。

我松了口气，转身叫金积成赶快把陈伯斋找来，连夜送走。金积成找了一转，没找到，我正在着急，陈亮佐气喘喘跑来说：“大姐糟了，苏连清找了两个人，悄悄把陈伯斋绑了，听说已送过河，要送县衙门。”

金积成一跌脚，说：“唉呀，送进城就麻烦了，大姐，赶快想办法。”

我说：“老金，快追，不准他们过河边的卡子。”说罢就带了夏林和十几个人追去。谁知追到河边，才知道人已经过河了。金积成毛了，朝守卡子的队员大吼：“你他妈的饭桶！”

你不晓得那苏连清是坏人？咋让他把陈伯斋押过河？”那队员嚅嚅地说：“我们也看着不对头，可是一看杨……杨云禄也跟着，说他是领导，出了事他负责。他们又那么多人……”

夏林一下子跌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摇着头说：“完了完了，陈伯斋完了！都怪大哥当时手软，在三块石没一起毙了苏连清这个混帐！”我说：“莫说泄气话，赶快设法救人。亮佐，叶济在没在城里？”

亮佐想了想，说：“不在，好像连杨汉印都不在，只有他女人和老太太在家。何鲜的兄弟和衙门都勾结好了，陈伯斋这一去凶多吉少，说不定还要坏我们全局的大事。”

我一听杨汉印的老岳母在家，突然想起李希白给我说过这老太太爱管事，就说：“这样吧，都过河去。亮佐你去叫姚生荣来，你们几个去挡住不准他们动手；夏林、老金跟我去找余老太太。唐俊清，你赶快到长生寨，把几位领导请来。”

我带着三个人，直奔杨汉印的公馆。杨汉印的女人和余老太太正在床上吃鸦片，见我急冲冲的进来，忙起身迎住，问：“陈营长，你出了什么事吗？”

我坐下来，把事情的大致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说：“老太太，陈伯斋是我的参谋，我在这里用脑袋担保，他不会去抢人。老太太你是吃斋信佛的人，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今杨旅长不在广安，我又是客位，奈何这县衙不得，不晓得他们会干出什么名堂，只有来求您了……”老太太从烟床上坐起来，说：“杨旅长不在，就无法无天了吗？这些畜生！难怪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糊墙壁，上面糊得光光生生的，就是下面糊不住，原来是他们在下面给我捣乱。”

我说：“老太太，事情很紧急，麻烦您老人家这就走一趟，去晚了说不定我的人就没命了。他们会夹着仇气黑打了的。”说完和余太太就扶着老太太往外走。刚转过一条街，就听见前面乱哄哄的，过去一看，正是跟我进城门的几个队员拦住了苏连清和杨云禄，后面是押着陈伯斋的那四个法警。杨云禄一见我，就直往后面躲。苏连清躲不住了，索性一昂头，不理我。

老太太问：“陈营长的参谋在哪里？”

五花大绑的陈伯斋一下子站了出来。

老太太一指那四个法警：“把人给我放了。”

那四个人看看苏连清，不敢动手。苏连清不认识老太太，昂着头说：“人是我绑的，衙门里的传票来传的，人家有公文，哪能说放就放？”

老太太走到苏连清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你是什么人？”苏连清还是昂着头，说：“姚营长的人，专门负责这广安城内治安的。”

老太太又说：“你们那个姚营长，归不归杨旅长管呢？”

苏连清一听这话，噎住了，这才放下眼皮，好生看着眼前这位傲气十足的老太婆。余老太太盯住苏连清，慢慢地说：“你晓不晓得，杨旅长又属哪个管？”

苏连清打了个愣：“杨……杨军长。”

老太太又说：“还有哪个？”

苏连清不敢说了，后退一步，只摇头。余老太太逼住他说：“你咋连这点都不晓得？还有我嘛。杨旅长不在，他的一切事情都归我担代，你把人，给我放了。”

苏连清还想说什么，只听得一阵跑步声，姚生荣来了，后面紧跟着陈亮佐。姚生荣推开众人，看见陈伯斋被五花大绑绑在那里，伸手一个耳光，把苏连清打得倒退了好几步：“你这个东西，尽瞒着我干这些事！来人，把老陈的绳子解下来，将就把他给我绑了！”说着转过身来，对老太太一抱拳说：“对不起，余老太太，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惊动了您老人家，还望您在旅长面前，替我美言。”

余老太太一笑说：“哪里哪里，都是何鲜这个蠢东西，纵容他那二流子兄弟。等到旅长回来，会好好教训他的。”

我们把老太太送回府上。我心里实在感激这位浑身鸦片烟味的老太婆，说了不少感谢的话。老太太接过女儿递来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说：“陈营长，我看出来了，他们准是欺侮你是女人家，才敢这么放肆。我们女人不帮着女人说话咋行？今天这事，莫说是你占到有理，就是没得理，我也要帮你扳过来。”

我说：“依得老太太的威风，真好比余太君再世，也只有您才镇得住今天这个堂子。”老太婆更得意了：“你这话说得没志气！我看你镇不住，就是煞气不够！拿出我们女人的威风来嘛，这世界上的哪个男人不是女人管住的？是不是余儿？”余儿掩住嘴，只是吃吃地笑。

走出杨府来，夏林不服气地直哼哼：“什么女人管男人，分明是被我们大姐捏在手里耍弄了，还得意，这个鬼老太婆！”

功败垂成

第二天，老刘政委和玉璧都跟着唐俊清来了，一来就叫把苏连清叫来。一会儿，苏连清被五花大绑地推进来了，后面跟着姚生荣。

老刘政委说：“把绳子给他解了，叫他说清楚。”苏连清昂着头，说：“解了？不说清楚就解了？怕没得那么撇脱。”

金积成抽出把亮晃晃的刀，上去两下就把绳子割断，然后把苏连清按到板凳上坐下，说：“你莫不识抬举，大哥有话要问你，为啥把自己人绑去喂给敌人？”

苏连清说：“什么敌人？我们现在是人家招募的新兵，要服人家管。陈伯斋和钱公武招惹了人家，弄得县衙里出了公文说我们窝藏土匪，这不是坏了我们的名声吗？不绑了他，事情还要闹大，我这是顾全大局。”

老刘政委说：“照你的话看来，人家陈玉屏陈大姐还做错了，还是不顾全大局？”

苏连清看了我一眼说：“她的错，还多得很。上回刘子雄跟人家打架，也是她包庇下来，背地里还表扬说是不向军阀的兵低头，这不是怂恿我们的人出去闹事吗？依我看，她才该受处分！她这个支队长的职务，早就该撤了，人家上面有规定，女的就是不能当领导。”

老刘政委问：“女的不能当领导，这是哪个说的？”苏连清说：“是杨云禄说的！人家从上面来，晓得这些规定。只有我们才不晓得，把我们瞒到。”

老刘政委又说：“把她撤了，你说这个支队长谁来当呢？”苏连清半天不开腔，突然一挺身站起来，说：“杨云禄说……”

话还没完，陈亮佐跨了进来，说：“莫把你那个杨云禄挂在嘴巴上了，他实在不够义气，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自己偷偷跑了。这下子，你要拿话出来说了。”

苏连清听说杨云禄跑了，眼睛就直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老刘政委一听，脸都气红了，说：“这还了得，戳了这么多烂事，一跑就完了吗？亮佐，夏林，还有你们，啊，马上分别去通知，开党员和干部大会！”

吃过午饭，人都到齐了，黑压压坐了一屋，刁大哥也从城里赶回来了。老刘政委把事情的大致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说：“当前形势很好，红军已经打到了川北，人人都身负重任。

可是我们的队伍里却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刚才又报告杨云禄逃跑了。人跑了，可是事情要弄清楚。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请大家来，首先要辨明是非，都可以发言。苏连清你先说，把你上午说的那些话，都向大家说出来。”

苏连清听见喊他的名字，就发抖。同志们都吼了起来：“苏连清拿话来说！你要检举陈伯斋，你这不是给敌人当龟儿子？你要把我们的人往敌人那里送，你这不是出卖同志吗？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苏连清见大家吼凶了，忙说：“不是我，不是我，是杨云禄喊我绑的。他说借这事把人心搞乱，然后把大姐撤下来，让我去当支队长。”

范永安的哥哥范老大站出来说：“啥子杨云禄支使你，分明你们是一伙的。那天你和杨云禄来串我，说上面的规定，女的不能当领导，要想办法把大姐推翻，你当支队长；再把夏林拉下来，我来当中队长；还说老刘政委的官也当不长了，杨云禄要做政委，好多领导都要换下来。还说队伍到通南巴，有什么好，还不是跟人家当尾巴，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就拉到邻水去，自己打天下。”

苏连清更慌了，忙说：“范老大，你不要往我身上推，诬赖好人！”

江万顺站出来，指着他说：“你是好人？这些话我也听你和杨云禄说过，你还委了我官做，说这次整军主要是撤换那些不称职的领导。我说我们的领导都是对革命巴心巴肝的，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没有私心。你说没有私心，为啥子叫陈玉屏做支队长？这不是廖玉璧的私心是什么？当时我就不同意，说陈大姐作战，有勇有谋，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的女人同她坐了一年的监，她吃了那么多苦都没向敌人屈服，她当领导是我们大家心服口服地推选，也是上面委派的。他们见我不肯掺和，就想支我走。又来跟我说刁大哥当了团长，不打土豪，不革命了，也不要弟兄们了。又说队伍想到通南巴根本办不到，不如拖到邻水去，这里不自由又很苦，到了那边打游击，打土豪很痛快。这一点倒把我蒙住了。但是我不想到邻水，不想跟他们一伙，又

怕介入是非，伤了两边和气，就向大姐提出要回武胜去。这是我的不对，我什么情况都晓得，就是没反映，我对不住大姐……”

先前跟着打和声的几个小队长也站起来，说：“苏连清对我也是这样说的。”

“苏连清还说不处分大姐，就要闹事。”

“他还说不枪毙陈伯斋，就要把队伍扯出去干。”姚生荣对老刘政委和玉璧说：“几个大哥都在这里，请处分我，怪我用人不当，闹了一场风波。”

刁仁义站起来：“要说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尤其是我整天同杨汉印他们打交道，少管部队的事，幸亏玉屏和你们撑持。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还不晓得。”

老刘政委说：“怎么样？苏连清，你还有什么说的？”苏连清低着头不开腔。老刘政委就叫范永安带了几个人，把苏连清押下去了。接着招呼大家静一静，现在把杨云禄的情况给大家说清楚。

老刘政委说：“杨云禄这个人，原本就是想到红军里来当官的，没想到红军部队里又苦又累，又不大受重用，就要求下地方，被派到这里协助工作。他一来，就发现我们这里的同志们不听他的，硬是把苏同久和徐月路枪毙了，于是就想把领导权夺过去。他先收集我们几位领导同志的材料，向上面打报告说我们在三块石闹宗派，乱枪毙人。另外还附上苏连清写的一封控告信。后来组织上经过了解，觉得那次枪毙叛徒是对的，否则我们的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杨云禄见领导权夺不过去，就到这里来伙同苏连清捣鬼，想先把水搅浑，再把队伍拉到邻水去，占山为王……”

下面哄地一声炸了堂，有人大声说：“那不是要拉我们去当土匪吗？枪毙他狗日的！”

老刘政委挥挥手让大家静下来，说：“这件事情，请大家放心，等抓到杨云禄，一起再做处理。只是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要从这件事里汲取教训……”

会又开了一阵，大家都发了言，几个领导都讲了话。最后由玉璧重申了整军的计划和纪律，并派范永安去接管苏连清的队伍。同志们个个都很高兴地离开了会场。

这些天，营山传来消息，说李家钰、罗泽洲两支军阀队伍进犯仪陇、巴中，杨森耐不住了，又向红军发起进攻，在巴河的兰草渡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个团长一个营长当场被打死，四个混成旅官兵伤亡了一千多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起来，都说这下好了，一定要调我们上前线了，我们快和红军会师了。各支队伍的领导人，成天忙于开会，发军装，准备干粮，打草鞋。各个营房都严密封锁了营门，盘查进出人员，不准走漏风声，以免节外生枝。

一天深夜，我突然被守卫在门外的李仲生叫醒，叫我赶快去团部开紧急会议。我穿上衣服赶到团部，见各路干部都神情紧张，互相打听出了什么事，是不是队伍要开拔了。过了一会儿，玉璧和老刘政委来了，玉璧往桌子旁一站，说：“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看守苏连清的卫兵也叛变了，已经在昨晚同苏连清一道投到杨汉印那里去了。刚才叶济派人来说，杨汉印已经急电杨森正在调兵，准备要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按照苏连清提供的名单，逮捕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然后强行改编我们的队伍，开到前线去打红军。叶济很惶恐，叫我们马上撤退，不然，他也无能为力了。”

同志们，我们不能拖延了，大家准备赶快行动吧。”

大家都愣了，你看我，我看你，半天开不了腔。一个人说：“未必我们就这样撤退了？不跟红军会师了？”马上就有人说：“就是嘛，现在广安城内外都是我们的人，连城内治安都是我们在管，杨汉印那点人，怕他个s*！”又有人大声说：“现在就敢冲进他的公馆，把印瞎子一窝窝端了，然后押着他作人质，开动我们全部人马，杀出一条血路去跟红军会师！这里到营山，才多少点路……”

大家闹麻了。老刘政委生气了，说：“你们咋个像细娃样，想得这么简单。大家睁开眼睛好生看看，这是在哪里？在广安，在杨森的军部，在敌人的心窝里！现在，杨森的队伍在渠县，刘湘的队伍在长寿，王陵基的队伍在邻水、大竹、开江、万县，都在我们周围，我们即使把广安占了，能守得住吗？我们要突破敌人这么强大的后方部队，容易吗？当然，也不全怪同志们，有些情况没给大家传达。前不久，徐向前徐总指挥开会决定，红军将很快集中主力，先突破下川东万县一带，封锁长江咽喉，这边的防地要退缩。我们即使杀出血路，赶到通南巴，也赶不上红军了。那时候，我们又怎么办？”有人站出来，说：“红军就这样把我们甩了？不要我们了？哪有这样不讲义气的老大哥？！”

玉璧往桌上一拍巴掌：“不准乱说！今天传达的这个精神，我们作指挥员的首先要理解。红军打这么大一战争，当然要有大的谋划，图的还不是解放全四川，解放全中国？！”

又不是打败仗。会师嘛，总会有机会的，红军还在四川嘛，再说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军事秘密都透给大家。现在情况这么紧急，大家要赶快回去动员部队做准备，刚才那种牢骚，决不能带下去传播。”说完，就布置了撤退方案。

天已经亮了，我回到团部，忙着派人上街清查，办理对老百姓的除欠和未了手续，自己抽空到徐家豆腐房去拿洗的衣服。徐老头徐大娘听说我们要走，眼泪婆娑地只是摇头叹气。

徐大妹拉着我，非要和我一道走。我说：“夏林一时还不会走，你们的亲事快点了结，结了亲才好在一起，免得别人有话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说完就告了别。

大妹一直送我回团部。团部门前围着许多老百姓，一些小伙子跟着我们就进了队伍，不回去了。有些老头子、老婆婆提着鸡蛋挂面之类的来送行，还把红绫搭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拿着鞭炮要放，我们怕把敌人惊动了，劝了好半天。可是我们才出场口，后面就噼噼叭叭地放了起来，一直放了两里多路才停。

队伍按着事先的计划分散了，夏林、唐俊清、陈伯斋带了一部分人扎在代市场一带，刁仁义的人依然扯回武胜，唐虚谷把队伍撤回渠县，我带了一部分人回长生寨。

眼看就要成功的这么大一件事情，却因为内部的几个败类而功亏一篑，大家心里都憋气得很。玉璧成天阴着脸忙这忙那的，连梦里也在叹气。我心里明白，眼下不但借路去和红军会合不可能，要等红军的主力队伍再从万县杀回川北也不现实，而最危险的是我们这些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支队伍，却很可能被抽出手来的军阀队伍反手围住，成为瓮中之鳖。眼下的局势严峻得很呢，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安排没有。

这天吃过晚饭，玉璧破例没有出去，闷坐在床边，不说话。

我说：“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玉璧点点头，对我说：“这次撤退后，要和红军会师就不容易了，我们今后要做长期打算。组织上做了研究，决定派你到重庆去建立军需物资的供应站。重庆有雷忠厚和李荣义，通过他们与刘湘、范绍增的关系，派人打入敌人的部队，了解刘湘与蒋介石勾结的情况，设法策动刘湘的下级军官。还要多找些购买枪弹的门路，以保证今后枪弹的供应，同时决定徐清浦也住在重庆，和你共同负责。”

我想了一下，说：“你呢？”

玉璧笑笑，看了我一眼说：“怎么？还想把我也带上啊？”

我看他笑的时候，很吃力，一脸憔悴的样子，真叫人心疼，就叹了口气，说：“我又不是小媳妇，怎么会处处都想跟着你。只是我在你身边你都累成这样，我要走了，谁来管你啊？”

玉璧伸出手来，为我拂去脸上的一络头发，看着我说：“我又不是纸糊的，男人家嘛，再说也比你们女人家经得累。我倒是不放心你。你看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如花似玉的，现在什么病都有了，又要担心两个孩子，要是真有个什么闪失，叫我哪里再去找这么能干的夫人啊？”

我一听，不高兴了，说：“搞了半天，你是叫我去重庆享福啊？我不去。”

玉璧说：“享福？怎么会是享福？为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建军需站，我还担心你拿不下来呢。再说，你以为我就舍得你走？不说别的，就时常听听人家夸夸我的夫人，心里也舒服嘛。”

这个人，别看在人前怪老实的，一句话没出口就脸红，一关上门这张嘴就没个正经的。

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扬起巴掌就给了他一下……

正在打闹，就听见有人敲门。我连忙站起来去把门打开，一看却是老刘政委来了，看看我们俩，笑着说：“怎么样，玉璧都给你说过了吧？有意思吗？”

玉璧看了我一眼，说：“她不想去。”

我说：“他乱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分配。”老刘政委坐下来，接着说：“玉屏，这工作担子重，也很艰苦，又是在敌人心窝里作隐蔽的斗争，好在你已经有些经验，可是也不能疏忽大意啊！俗话说：久走夜路，总要撞回鬼，撞到了，脑壳要下地哟。”

我笑笑说：“怕什么，对敌人来说，我也是个鬼嘛。”大家都笑起来。老刘政委点火烧烟，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一个任务，也要你坚决完成。”

我说：“你说嘛，不管再大困难，只要是你说的，就没得问题。”

刘政委说：“困难倒不大，在你有没有信心。这几年来，你太辛苦了。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刚从监里出来，就当支队长带兵，又处理这么多矛盾，更见操劳过度。虽然你从来没叫过苦，可是玉璧和夏林他们都对我说，你晚上失眠，吃不得饭，心口痛的病经常发作，也确实比过去瘦多了。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啊！身体拖垮了怎么行？我们决定你到重庆，也要你一定把病治好，注意休养，不能过分操劳。”

我听了，看看玉璧。他转过头去，悄悄叹了口气。我晓得，他一直心疼我，当初我当支队长，他就不同意，一是想避嫌，二是我刚从监里出来，身体很不好，怕我担不了这个劳累。让我去重庆的这个建议，多半是他和老

刘政委共同的意思。

我说：“老刘政委，我没有病，你们才辛苦。”说完，狠狠地盯了玉璧一眼。

老刘政委心里明白，哈哈一笑说：“都辛苦，都辛苦！我还有点事，你们继续谈吧。”

老刘政委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此时此刻，我才真的觉得自己好累，只想靠住他，清清静静地靠一会儿……“砰”地一声，门被撞开了，八儿一头冲了进来，后面跟着没有拉住他的老刘政委。八儿一把抱住我：“妈妈，陈仁勇叔叔说，你要到重庆去呀？我要去，我要去，爸爸说的，以后长大了，还要送我出国到苏联去哩。”

这孩子懂事得早，也很聪明，又正是读书的年龄，我倒有心带他到重庆，就和玉璧商量。玉璧说：“这次不忙，先把工作安排好再说。”老刘政委也说：“望远镜走不得，现在还有用处呢。”

八儿瞪着眼望望这个，看看那个，知道是没希望了，一赌气跑走了。

王道纯同陈亮佐、金积成也一道来了。王道纯拿出一张布告稿子交给老刘政委，说：“老刘政委，你看看，我们这次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这布告要写得像个样子，才好让这里的人民永远记得我们。”

老刘政委笑着还给他：“怎么我一个人看啊？酸秀才，念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过去给组织上的报告和处理外边的信都是陈亮佐和我代笔，自从王道纯上山后，这些事都交他专办，他的旧学底子好，又教过多年的书，说话有些咬文嚼字的，所以大家都喊他酸秀才。

王道纯把稿子念了一遍，我们讨论了一阵，修改了几处就分头抄写。王道纯写布告，陈亮佐刻钢板、油印传单，搞好后，派人连夜送出去，用鸡蛋清贴好。第二天李仲生转来说，广安四城门、过街要道和新街上，一堆一堆的人围着看我们的布告。

布告是这样写的：

华蓥农民自卫军布告：照得 岳池广安，人民勤劳勇敢。终年勤耙苦做，难得饭吃衣穿。可恨军阀杨森，广岳被他霸占。刮尽民脂民膏，惨杀同胞无算。地主租重押重，又逢年年干旱。天灾人祸齐来，人民苦不堪言。吃尽草根树皮，逼得妻离子散。我军为民起义，抗粮抗税抗捐。首在除暴安民，人民秋毫无犯。转战川北十年，敌人闻风胆寒。消灭杨森匪徒，我军责任攸关。为了人民安全，暂时撤出广安。凡我广岳同胞，不要误信谣言。我军越战越强，杨森日落西山。大家同心协力，配合我军作战。不与杨森合作，不受杨森欺骗。不当壮丁差役，不缴田粮捐款。活捉杨森前来，奖赏大洋一万。砍掉夏炯狗头，定赏大洋五千。杨森部下官兵，赶快回头是岸。不要作敌帮凶，立即起义哗变。若再执迷不悟，人民决不姑宽。我军说到做到，从不纸上空谈。特此布告通知，尚希广为宣传。司令员：廖玉璧

政委：刘元贞

生离死别

重庆，还是跟原来一样，乌烟瘴气的，城墙边上小巷子里到处都是流浪儿和乞丐，街上徒添了许多穿着制服的警察。

回到李子坝，曾三姐拉着我的手只是埋怨，说岳池那鬼地方还没把你害苦么，咋个现在才下来！看你关了年大牢，人都瘦成了这个样子，你的两个娃儿硬是把你想死了。正说着彬娃跳着回来了。孩子七八岁了，一进屋就跑过来抱着我的膝头，舍不得离开。宁儿从学校回来，紧紧跟着我，怕我又走了，好几天不去上学。李大哥、雷忠厚和一些熟人听说我到了重庆，都来看我，这个要给我接风，那个要给我洗尘，三姐的五妹杨敏言也来了。我出狱之后，敏言就和雷青成结了婚，一直盼着我来重庆，见了我就拉着手说：“你再不来青成就要见外了，明天到我家里吃饭，我们给你压压惊。”

第二天，我和曾三姐备了礼札，到雷青成家道谢。他和敏言住在黄家垭口一个小院子里，院里养了些花草，很幽静，三间屋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天没请多的人，曾三姐在厨房帮忙，席上除了雷青成、杨敏言和我，还有一个叫陶冶民的人，很斯文的样子。一开席，雷青成首先站起来，向我祝酒，其他三位也站起来祝酒。我答谢的时候说：“我陈玉屏是才从大牢里出来的人，承蒙诸位如此不弃，实在是感谢得很。”雷青成立即说：“屏姐，你不能这样说话，我们在座的除了敏言之外，都是清一色坐过军阀大牢的人。现在年轻人但凡有些头脑，想要往前走的，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这对我们算不得什么耻辱，反而觉得是一种激励。”

接着坐下来吃饭。谈起我出狱的前前后后，雷青成很不了然，说：“刘湘毕竟还是四川的‘剿匪’总司令吧，上次杨森在他的军师刘神仙脚下还叩了头，未必就一点面子都不给吗？我找刘湘给杨森打了五次电话，还是关了一年，未了总算放了出来，还这样搞明放暗吊线！”杨敏言忙说：“莫说那些了，出来了就好。屏姐你这次到重庆，多住些时候，我三姐那里乱糟糟的，你就到我这里来住，清静得很，好养病。”正说到这里，曾三姐来上菜了，在一旁说：“玉屏啊，这次回来了，莫说走不走的话，在敏言这里养好病，再让青成找个轻巧的事情做，好好照看你的两个娃娃，当妈的就要有当妈的样子，那些男人家的事情再莫去掺和，等他们自己去捣弄。”

大家一阵喧笑，都说曾三姐话丑理端，说得在理。雷青成说：“今天我没请外人，却是一桌酒菜办两件事，一是为屏姐洗尘接风，二是为我们陶先生饯行，好在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不会见外的。”

陶冶民听了这话，很斯文地笑笑。我也笑笑，心想这个雷青成，又跟共产党好，又跟军阀好，又是国民党的人，看样子有点名堂。这时，雷青成问陶冶民：“你在四川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你回南京去？”陶冶民说：“我也不清楚，或许是我劝刘湘不要投靠蒋介石，叫他们知道了，要查办我吧。”说罢看看我，又笑笑。我听见他们说到刘湘的事情，想起玉璧临行时叫我打听刘湘动静的话，想问又不知深浅，就只听着。第二天晚上，陶冶民要上船，我们说要送他；他说不用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以后再也没见到他。听说过南京以后，他就被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夫人带着孩子，被逼得跳了江。

我当真在雷青成家住了两个月。他家里平时没有来客，只有我和敏言在家，没事就请了隔壁王太太过来，搓几圈麻将。有时候，徐清浦的侄儿徐明生也过来搓麻将，他是刘湘手下的参谋，是雷青成的同学，又是我们的关系，见面说话都很随便。听他们在牌桌上的谈话，现在蒋介石派人来游说刘湘，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南川北两面夹击，光靠川军可能抵挡不住，

最好让中央军进川来。可是刘湘还是不想让蒋介石插足，只想把红军逼出四川，自己好继续一统天下，做他的四川王。不过看现在红军这个阵势，恐怕刘湘是抵不住的。

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不知道雷青成在国民党里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从前跟着共产党走过一程，后来在万县被军阀抓去坐了大牢，出来之后不知怎么就进了国民党，好像做了个挺管用的什么官儿。后来国民党进川了，他在大特务康泽的别动队里当了主任，再后又到泸州做专员，反正官儿越做越大。但他也一直实行了他的许诺，多次救过我，也救过不少共产党员。

在雷青成家住了两个月，我的身体基本复原了，就改用了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名字陈联诗，由他介绍到西南美专去教书，教古典文学。这期间金积成来过几次，叫我在学校里不要显山露水，尽量把自己隐蔽起来，接头的地方也改在千厮门陈文玉的船上。还说平时多在雷家出入，别让人家摸透了底细。

这段时间，重庆的报纸上热闹得很。红军在万源城口打了大胜仗，又回过头来在通南巴地区痛击了杨森和罗泽洲的部队，据说伤亡敌军两三千人。至此，由四川军阀组织的大“围剿”，已被红军全线粉碎。刘湘的日子不好过咯，蒋介石来电责斥，各路军阀趁机发难，成都的地方头面人物聚会，要求刘湘的“神仙军师”自裁，以谢川人。刘湘被迫于八月二十三日通电下野，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和川军军长的职务，由成都回到重庆，在内江柞木镇过渡船时，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霸主大业就这样毁了，几乎去跳了沱江。

一时间人心大乱。成都、重庆的官绅大户，纷纷收缩资金，将大笔大笔的款项汇往上海，炒得申汇暴涨，在重庆寄出二百元，上海只能收到一百元。雷青成干脆连班也不去上了，天天在家里看武侠小说。

快到中秋了。学校的老师都忙着买月饼，备礼过节，我也得找点时间上街去给曾三姐买点礼品，还要为两个孩子添置换季的衣服。这天刚走出教室，传达室的老张就来了，说外面有人找。我出大门一看，是谭老五，脸色很不好，见了我怔怔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心头一紧，忙问怎么了？他咽哽着说：“夏林遭了。”

真是平地一声雷，震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问：“怎么遭的？”

他叹了口气，说：“回李子坝再说吧，陈伯斋有信，缝在我衣领里。”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手往前面一指：“快点，出城。”

车子飞一样往前跑，我心里重得像堆满了石头。夏林跟我们一起都十年了，一向机敏，不晓得打过好多仗，连脚拇指都没破过皮，这次是怎么遭的呢？还有徐大妹，他们结婚没有呢？夏林遭了，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散了，变了，还是在我们手里？我越想越多，冷不防车夫停下来，大声问我：“你到底要到啥子地方，都拉到化龙桥了。”

我一看，忙说到李子坝，怎么拉到化龙桥来了？车夫很不高兴，转身又拉起往回走，嘟哝着：“你又不早说，冤枉多跑了三四里路。”

到了家，谭老五已在门口等我。曾三姐一看我的脸色，就问出了什么事情，我说是母亲生病了，说着就进了屋，关上门，用剪刀把谭老五的衣领剪开，取出一张二指宽的白连纸，上面密密地写着两行字：老夏不幸于八月十日病故，一切后事由我二人负责，请放心。余无他事，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陈唐

八月十三日

我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谭老五好一阵才揩干了眼泪，说起夏林牺牲的经过。

“我们的队伍撤离之后，夏林带着郑起和的人，仍然驻在代市场一带，唐俊清调去协助他的工作，陈伯斋也带着队伍驻在他附近。这时营山前线正吃紧，敌人死守广安，根本抽不出人手来对付我们；加上我们和老百姓关系好，消息灵通，在代市场和新街一带很活跃；前一阵夏林和陈伯斋他们，还带着我们的人在新街帮助农民打谷子，连河对面广安城里的守兵，都看得清清楚楚。

“离新街不过十一二里，有个夏家院子，立着夏家的祠堂，说起来也算是夏林家的老屋。夏林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生活无着，在这里帮他的一个寡妇婶娘夏周氏家里跑腿；夏周氏没有儿子，见夏林精灵，想收他来继承家业。可是夏家的族长夏三公，一心想霸占夏周氏的财产，几次想谋害夏林，时值王尧又威逼夏林的二姐做小，夏林只得离开婶娘家，把二姐送到合川，自己到重庆下苦力。”

我听着，点点头，说：“这些事，我都知道。”谭老五又说：“我们的队伍驻在新街之后，夏三公心里害怕，几次来请夏林吃饭，夏林都不理他。这次听说夏林订了婚，他三公又找来，说你成年在外面漂泊，结了亲总要有个落脚处嘛，我给你把房子都收拾了，你带着大妹过来住。夏林还是不理他，说现在忙得很，不想结婚。夏三公就去找徐家两老，又找来夏林的姐姐，都去劝夏林，我们的一些同志也觉得现在时局不安定，不晓得什么时候大部队都要撤，不结婚徐大妹怎么好跟你一起走。特别是夏林手下一个叫李仲凯的小队长，跑上跑下地热心得不得了，说是新房收拾好了，席桌也订好了，就只等花轿抬人。

夏林想想大家的话，觉得也有道理，勉强同意了，只是提出不准声张，一切从简，免得出意外。当天，陈伯斋和唐俊清都有事不能去，就叫夏林多带点人去，夏林大咧咧地说没事，都是自家的亲戚，最多明天就回来。可是我还是跟着去了。

“下午，夏家用一乘小轿，把徐大妹抬到夏林家院子，只办了五六桌，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李仲凯说是夏家徐家的亲戚。拜了堂，又入洞房，就有许多人往屋里挤，先还以为是闹洞房的，可再一看怎么都是眼生的壮汉，我们几个人就急了，又挤不进去。就在这时候外面啪啪啪响了三枪，埋伏在四面的敌人一听枪声，全都扑进来，把夏林的房子包围起来。我这才看清楚，夏林的洞房原来是个口袋屋，没退路的，这才知道上了他三公和李仲凯这个叛徒的当。

“敌人的枪声很密，我们几个人根本没办法，子弹也没带够，三下两下就打完了，哪想到会出事！就赶快叫两个人回去给唐俊清报信，我在这里守着。这时候，夏林房间的墙上到处都是子弹孔，敌人使劲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夏林偶尔打出几枪，一定就有人挨枪，他的枪法你是知道的。可是我晓得，他身上毕竟只有两夹子弹，而敌人却有这么多，二三十个！突然，我听见轰地一声，后面的一堵墙垮了，我看见夏林拖着大妹就要跳出去，可是哪里晓得外面也有人。他一点枪，子弹没有了，就被敌人捉住了。

“满院子吃喜酒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堂屋里那对大红蜡烛还烧着。夏林和徐大妹被敌人推推搡搡地往外走，我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喊声。原来

是八儿，八儿哭着喊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抱着夏林的腿不放。一个家伙上去，扒开他的手，一脚把他踢了丈多远；八儿飞快地爬起来，喊着夏叔叔，又扑上去。夏林双手被扭着，看着八儿，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看见他突然碰了大妹一下，大声说：‘八儿你还不回去！’大妹一听，趁着混乱，随手解下身上的红绫丢给八儿，八儿突然不哭了，站起来，抓起红绫转身跑了。”谭老五说到这里，停住了。

我问他：“后来呢？”

“后来，敌人赶快把大妹和夏林押走了，等唐俊清带人追来，人都已经押过了河，听说当天晚上就审，要夏林把队伍带过来投降。夏林一阵乱骂，当时就被推出去打了。那夏三公又带着人来，说大妹都是夏家屋里的人了，要把她接回去，重新嫁人。大妹哭了一天一夜，等夏三公带着人贩子来抬人，才发现她已经吊死在梁上。”

我和谭老五哑坐在屋里，直到曾三姐来喊吃饭，才发现天都快黑了。我没去开门，又问：“八儿呢，八儿找到没有？”谭老五摇摇头，说：“没有。只是第二天在河边碰见个老头，说昨晚黑有个几岁的娃娃，沿着河边哭喊，要哪个送他过河，说要去喊人来救他叔叔。”

老头说这么晚了，哪里还有船，那娃娃哭喊着又跑了。第二天，唐俊清带着人，沿着河打捞，也没捞到八儿。有人说，这娃儿历来有心计，恐怕是跑到南部那边，找红军去了。”

我没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起我从监里回到山上八儿抱着我喊妈妈的样子。他的那双清亮亮的眼睛，那冻得红扑扑的圆脸儿，还有那双长满了冻疮的手。他用那双小手，捧出一支不知道在包里放了多久的红梅花，那花儿已经皱了，他小心地抚平，给我插在头上，说是妈妈戴上了这花，就不会走了……

在监狱里，我曾无数次设想过和玉璧的见面，和见了面说什么。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说，只说了八儿。玉璧告诉我，八儿是烈士的后代，将来把他送到重庆去读书。我说我知道，就当尔多给你生了个儿子。

第二天，我头痛得厉害，请曾三姐到学校去帮我请假。她坐在我床边，问是不是玉璧出了什么事？我摇摇头，说是我的一个亲兄弟死了，和兄弟媳妇一起，死在新婚之夜。夏林呀，你太大意了！

十月初的一天，金积成到美专来找我，说他们几个和玉璧一起，五月份就到南部去开会，完了又到城口万源去转了一大圈，今天才回重庆。我很高兴，问开什么会，他神秘地说：“这次的会，重要得很，我们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了呢。现在我们的队伍，算是正式红军了，第一路，第一军，大哥任了总指挥。”

我一听，几乎要跳起来，连忙喊了两部黄包车，赶回李子坝。

黄锡成和唐俊清一起，到磁器口找他那个姓路的连长表哥去了；玉璧坐在桌边，正和曾三姐说话。几个月不见，他更见黑瘦，见了我，只是憨憨地笑。我叹了口气，说：“你们这次来，该要多住几天吧？”

他不笑了，摇摇头，说：“明天就走。”

我不大高兴，想说：跑了几个月，歇这两天有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回去了。我知道，他现在不比我，更不比从前，担负了这么重要的担子，许多事情都顾不得了，包括我，也包括这个家。

可是又想，要是真的不顾了，他还来吗……正想着，玉璧转过头来，

问：“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把从雷青成、雷忠厚那里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他，说蒋介石的势力要伸入四川，刘湘恐怕还是心有余悸，只是现在很为难。红四方面军打得这么厉害，军阀内部又勾心斗角，尤其是杨森，听说在前线每次打败了，都要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秘密条约，还送医送药送军需，让红军腾开手去打刘湘的嫡系。刘湘为此气得不得了，已经下了密令，要邓锡侯以“私通红军”的罪名，解决杨森的廿军。时局这么紧张，看来投靠蒋介石，最终只是个时间问题，听说刘湘最近要去南京。

玉璧用手轻轻地敲着桌子，不说话。这些年，他的话越来越少，和当初在南京简直是两个人。老是爱皱眉头，不过三十一二的人，额头上就起了密密的皱纹。

“你呢，这次去南部，收获很大吧？”

“当然很大，我们要把红军的招牌，正式扯出来呢。川北十几个县都归拢来了，我们是第一路。”

“听说你当司令了？”

“你咋知道的？又是金积成说的，嘴巴长。”

“他说的又怎么样，正儿八经的事情嘛，我又不是外人。谈谈吧，开会，都说了些什么？”

他不回答，喊声：“积成，你把那两个盒子拿来，让你大姐放好。”

金积成答应着，拿出两个盒子来。盒面镶着玻璃，里面装着糖果。我说：“糖果嘛，放着干什么？倒出来大家吃。”说着就去解麻绳子。

玉璧挡住我，说：“莫忙莫忙，里面有东西。”说着自己动手解开，把糖倒出来，从底下拿出一叠巴掌大的纸。他轻轻地摊开来，我看清了这是一张地图。

他指着地图对我说：“你看，这是我们会上制定的战略，这里是下川东，这里是川北。

伸出的两个箭头这样一包抄就围住了重庆。这边呢，是川西，再和川北的这一块一联合，就包住了成都。我们要稳住这三个据点，把道路打通，等到时机一成熟，就把这两个城市拿下来，整个四川的问题，就好办了。”

我听了很高兴，说：“怪不得你们跑了这几个月，怎么样，要动手了吧？要不要我回去？”

他摇摇头，重新坐下来，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最近，江西那边的仗打得不好，中央红军已经撤出来了，可能要来四川。可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刘湘真的和蒋介石勾结起来，事情就很麻烦。四川军阀的力量太大了，我们搞了将近十年，虽然有了很多群众，可是并不稳当，许多人是动摇的。我们现在要紧缩队伍，选出那些坚定的骨干。打胜了，就继续干下去；如果打得不好，就可能和红军一起走出川，甚至可能到大西北，到新疆去。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备的，走就走吧，跟党中央一起，早就巴望了，再苦也不过像在华蓥山上，怕什么。”玉璧笑了，说：“别想得那么严重。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听了不要激动。”

我瞪了他一眼：“我又不是细娃家。”

玉璧凑近我，轻声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学军事，时间也不长，一年半载就回来。”我一听说：“真的呀！那你呢？你去不去？”

他瞪着我说：“怎么？又想把我带上啊？我当然想去，可是运气不如你，怎么走得了？已经说了，等你回来我再去，我们轮流去。你先别声张，等组织上的通知。”

吃饭了，曾三姐摆好桌子，宁儿和亚彬也都回来了，见了玉璧喊了声爸爸，就上桌子抢汤里的粉条肉丸子吃，连话也顾不上和爸爸多说几句。玉璧不转眼地看着他们，干脆放下筷子，像是在欣赏什么似的，弄得曾三姐直说：“你们这两个孩子，怎么一点规矩也没有？”唐俊清和黄锡成，说好了今天不回来。金积成喝了几口酒，话多得很，说：“大姐，你猜我们跟着大哥，一天走多少路？”

我问：“多少？”

他张开两根指头：“两百多里！我的天，他真不愧是飞毛腿，把我们拖惨了。路不好走，尽是山，城口那边的天气又糟得很，好好的，吼两声，就下雪弹子，这么大一个个的，打得我们顶着石板走路。没有吃的，就摘路边野果子吃，红的黄的都摘，管它有毒没有毒。

难怪那回夏林从城口回来喊恼火。”

我一听说夏林，手下一抖，把一瓢汤泼在桌子上。玉璧连忙捡起汤瓢，说：“这汤，不烫嘛。”

我忙说：“是不烫了。韩嫂，快去锅里舀点热的来。”金积成夹起一大块回锅肉，放进嘴里。我问：“老刘政委呢，咋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玉璧说：“他也许不回来了，组织上派了唐庆余来。我不在，王道纯和刁大哥就负责队伍上的事。”

金积成说：“王道纯这人，干劲大得很，就是走不得路，有一回我和夏林还抬了他一截。”

又是夏林。我心里一阵难过，放下筷子不吃了。

晚上，叫老金早点睡了，又把两个孩子安排好，我和玉璧关了灯在床上坐着。玉璧看着我，突然问道：“怎么刚才说到夏林你就……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点点头，把夏林、徐大妹、八儿的事全都说了。又说：“就在夏林牺牲之后，我们牺牲了十三个同志，其中有八个党员，五个骨干，姚生荣、朱老么都牺牲了。听说杀夏林，也是夏三公勾结夏炯的人干的。”

玉璧沉默着，突然一转身，摸出了枪，哗地上了红槽。

我连忙按住他，说：“玉璧，你要冷静，要冷静啊！”

玉璧松开了手里的枪，一拳头砸在自己的腿上，仰天长叹，半天才说：“夏林他跟我，整整十年了啊！”……

月光从窗口流进来，照得跟白天一样，玉璧俯下身来，给两个孩子掖好被子，长叹了口气说：“当初我不该挡着你，要不然八儿今天就睡在这里了。”

我点点头，说：“还有徐大妹。我原来说好要带她在身边的。”

玉璧说：“没办法，革命就是这样，形势好的时候，什么人都要来；一有变化，就动摇，就叛变出卖我们。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在干啊，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他把我的手拿下来，握着说：“怕什么，这话我十年前就跟你说过。记得不，那张照片？那是我在顺庆转组织关系时照的。”

我点点头，说：“那时候我还不懂，现在亲眼看见这么多同志牺牲，我

都有点迷信了。”

他拍着我说：“好吧，说点别的。明天我要赶回华蓥，先安排一下，然后经大竹、邻水、渠县到武胜、顺庆，一路清点队伍。组织上给了我三个月，时间太紧了。要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我看了他一眼，笑着说：“算了吧，有你的这句话就行了，我不拖你的后腿，你现在是司令呢。”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送玉璧上路。已经是初冬了，一出门，就是大雾，我们沿着江边慢慢地走，白茫茫的浓雾中，隐隐传来船工的号子声。我说：“重庆就是这雾太讨厌，一到冬天，叫人透不过气来。”

玉璧却说：“雾好呢，我们的好多仗，都是在雾里打的。”我斜了他一眼说：“也不知道苏联有没有这样大的雾？如果没有，那我学回来的本领不是就用不上了吗？”

玉璧听了先是一愣神，接着醒悟过来，笑了笑，用手悄悄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就晓得拿我的过错，调皮捣蛋的！”我叹了一口气，说：“去苏联以前，我们还要见一面吧。”他说：“当然，不论是你回华蓥，还是我下来，要到时候再说。如果实在不行，也没关系，组织上会帮你安排好，时间也不长，一年半载。”

我又说：“那两个孩子呢？是送回去还是留在重庆？”他想了想说：“算了吧，这么多年来，敌人都闹着要斩草除根，躲都躲不了，还往虎口里送什么，就放在这里，请曾三姐代管吧。只是我没法来照看他们，现在孩子们看见我都不亲热，二天恐怕认不得我这个当爹的了。”

我没说什么，心里只是想出门由路，如果我也一年半载地回不来，孩子们也会认不得我的。

太阳出来了，浓雾慢慢散开，我才发现已经到了化龙桥。时间不早，不能再远送了。我喊了两部黄包车，叫金积成和玉璧坐上。车都走了好远了，玉璧突然想起什么，跳下车急急地跑回来，对我说：“黄锡成住在磁器口的表哥，姓路，是个连长，工作已经做好了。有什么要紧事，你也可以找他。”

我点了点头，他跳上黄包车，和金积成一起走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分离，竟成了永诀。

初涉商界

冬月间，谭老五从山上下来，带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王道纯的笔迹，上面写着：“会议决定你在重庆设法经商搞运输，做经济支援，徐清浦来合川另有任务，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我看了这张条子，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心只想去苏联，怎么又要我改行经商？

谭老五说：“大哥回来之前，我们上面都没动，这回一听说真的成立红军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大队伍又调回山上了，决定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大竹后山作后备，等大哥从广安、邻水那边回来再动作。敌人没有兵，不敢到华蓥来，就派了些便衣特务在乡里活动，路上的卡子也查得紧了。如果要

行动，就得变装，穿敌人的军服，所以要你想办法打两百套军服出来。再说我们现在扯得这么宽，又要孤立军阀，就不能老去打地主，打土豪。组织上开会研究了，让你先想办法搞点钱，对山上作些经济支援，起码每次的军需品，不要山上拿钱下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苏联暂时不去了，该不会是场梦吧？无凭无故的去打成百套军服，别人不怀疑吗？再说，我手边存着的薪水，一共不到两百元，自己要用一点，百多元也只能打几十套……越想问题越多，搞得我昏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十全之计来。

第二天，我找一个老师把课对调了，一大早就去找徐清浦，传达了组织上要他去合川的事，同时把山上要军服的事情说了，希望他能出些主意。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子问题，开个服装铺自己搞。”

我说：“哪来这么多的本钱啊！”

他又笑着说：“要不了好多本钱，佃个铺子就行了。”

我们就认真地商量起来。徐清浦是个细心人，一个上午下来，连那些细节都设计得周周全全的，临走时我对徐清浦说：“怪不得人家喊你叫智多星，我昨夜想了一夜都没想出个妥善的法子来，你一说我就开窍了。”

我兴冲冲地步行回校，走到七星岗，看见一个服装铺里坐了一个女工，正在缝纫机上打衣服。我想女的好摆龙门阵，就借打衣服与她搭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就知道了这家铺子的老板姓黄，是女工的哥哥，要去眉山做事，这铺子正想顶出去。

我一听，连忙找到了黄老板，问他打算要多少钱？

黄老板说连租金、押金、机器在内，只要千多块钱。我看他铺子上摆着六部机器，铺面两丈多宽，三个套间，两楼一底，地方也还适中，就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吧！”接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急急地告辞出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在隔壁布店里扯来七尺阴丹布，找他做一件旗袍，给了一块银元的定钱，约定后天来取。

我回来就对谭老五说：“你回去告诉你大哥，说的事一定照办，先打上几十套军服没有问题，要是有款子带点下来。”谭老五说：“现在队伍扯得那么宽，到处都要钱，要款子有困难，恐怕要你自己想办法。”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隔了两天我去拿衣服，那女工说，他哥哥到眉山去了，顶铺子的事要开了年才能决定。

离寒假还有十多天，我提前把课考试了，领了五十元薪水。我一个子儿也不敢花，揣上就往七星岗跑。正好，黄家老板从眉山回来了，我把五十块钱交给了他，算作定钱。腊月间，他的账主很多，又要忙过年，这五十块钱虽然为数不大，却是雪地送炭，他直是点头，说：“这铺子一定顶给你，其他的款子好商量，分期付款就行。”

虽然铺子有些眉目，没有拿到手总是不放心，就说不会变卦，也要开了年才行。再说开个铺子，要机器要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还要去讨些见识。学校放假了，我就退了聘，天天在城里遍街跑。听人说机房街盛家公司是专门卖缝纫机的大铺子，还附设了几个缝纫厂，我就跑去看。满屋子的缝纫机，一架一架地摆着，我站在机器旁边，心里正盘算，公司里的一群女工下班出来了，其中一个叫徐志群的认识我，招呼说：“陈老师，你买机器啊？”

我随意回了一句：“是的，我想买机器，开个铺子。”这些女学工听说

要开铺子，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打听。

我说：“怎么？你们学出来，还要自己找铺子？”

徐志群说：“是呀，不自己找，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快要出师了，就在愁没有地方去呀。”

我想这些女学工，一个个都是十多岁，多单纯，就说：“愁啥子？求哪个？我们二天开个女子服装店，欢迎你们出来参加。”

她们听了，高兴得直跳，当时就围了十多个人过来，家也不回，饭也不吃，就围着我在机器边讨论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很热闹，最后决定有钱的出钱，有机器的出机器，一百元一股，我负责找房子，当时就凑了五六部机器和三四百元钱。谈完了，我招待她们去吃小面。我是个急性子，她们比我还要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服装店开起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的，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的缝纫机声。

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啊。这法兰绒衣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

一长串车子一直停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办法啊。”

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识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

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1300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一百块，够不够？”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取。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

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哗叽制服。

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哗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个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

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买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除！”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

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从邻水那边回来了，有信。玉璧在信上说还要两百套军服和一些药品。我看完了信，高兴地说：“老五，这回好办，你大姐刚赚了一笔钱，你好好歇两天，衣服打好了就让你带上去。”谭老五也很高兴，说：“大姐，你打的军服，解决大问题了。现在敌人的卡子守得紧，穿起这些鬼皮方便得多。才不久，我们在广安永兴场打了‘德兴正’栈号的张必成，就是那个卖洋碱的大商人，抄了他的小洋楼，硬是把他活气死了。后来，又在代市场打了恶霸地主方敬贤，硬是过瘾得很。

陈伯斋和唐俊清都说，这里面有你大姐的一份功劳。”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得意，又问：“老五，你大哥还说了什么没有？”

谭老五说：“大哥叫你尽快把缝纫社安排好，万一通知来了，也交得出去。可什么通知，他没说。”谭老五当然不晓得什么通知，可是我心里明白，是通知我到苏联去。

谭老五在重庆等了几天，我把两百套军服打好了，又买了些电筒电池和药品，还拿了八千块钱，叫陈文玉在千厮门找了几个自己人，送上山去。临走时我嘱咐谭老五说：“听说向廷瑞出了三千块大洋，悬赏捉拿你大哥？你们叫他小心点啊。”

谭老五听了一笑：“那点钱算什么，我们也出了布告，捉拿军阀杨森，悬赏大洋一万，拿到向廷瑞的狗头，悬赏大洋八千，布告都贴到岳池、广安城里去了。我们比他们要大方得多呢。”

我也笑了，可是觉得又不能不担这份心，听说红军已经开始紧缩川陕地区的阵地，杨森的部队也撤回来休整，他们又腾出手来了。不过又一想，这一向上面也真的没出什么事情，河东七场还是我们的地盘，渠河沿岸也还在我们手中，十年里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风平浪静的还能翻了船？可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了，玉璧已身兼重任，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敌人知

道了……过年前后，生意忙，一忙这些事情就想得少了。二月二十四日，我一大早就到了铺子上，刚打开铺门，外边就有人来买枕头。我站上板凳，把玻璃柜打开正要取货，就看见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疲惫不堪地走上街沿，抬头一见我，就定在那里，脸色铁青。我仔细一看，这人竟是玉璧的弟弟廖玉喜。

玉喜？他怎么来了？我一脚踩空，就从板凳上栽下来，哗啦一声，玻璃片打碎了，把我的手划破一大块皮，血滴到了衣服上。里面李士民听见响声，跑过来扶起我，直问：“大姐，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玉喜已立在我面前，刚喊了声“嫂嫂”，就泣不成声。

我心里全明白了，脑袋里嗡地一声，人就要倒。李士民慌了，连忙扶住我，我定了定神，一把拉住玉喜，进了会客的小屋，反手关上门，盯住他问：“是不是你哥哥遭了？”

他抽泣着点点头：“人被逮了，还没有消息。”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玉璧过去常说，我不被他们拉去罢了，拉去了就只有一个死。我眼前一黑，什么都迷糊了，只隐隐听见玉喜在喊嫂嫂。好一阵我才醒过来，咬咬牙站起来，对玉喜说：“走，回李子坝去，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回到李子坝，曾三姐看见玉喜，又看见我脸青面黑的样子，全明白了。我把玉喜带到屋里坐下，问他：“我们那么多队伍，你哥究竟是怎么遭的，在哪里遭的？”

玉喜哭起来说：“在黎梓卫街上遭的。”

我说：“上次来信不是说河东七场是我们的吗？又怎么会遭？”

“曾洪泽 叛了，出卖了哥哥。”

我又恨又急地在桌上拍了一掌，说：“人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拉进城了？”

“我们的人一听说哥哥遭了，都埋伏在四周，准备在敌人押走的时候把他抢回来，可是等了好久都不见人，不知道他们把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回过一口气来，说：“玉喜呀，你哥哥身边都有人，怎么会……”

他点着头说：“哥哥刚从邻水回来，身边随时带了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都是死人？”

“我也弄不清楚，他们叫我下来给你报信。”

“谁叫你下来的？上面还有谁？”

玉喜说：“唐庆余叫我下来的，他们在黎梓卫打了一仗，没抢到人，退出来了，现在正在调队伍，叫你也调人。”他这才把信拿出来，递给我。

我一看，眼前竟是黑乎乎的一片，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闭上眼睛定定神，再睁开一看，上面写着：“大哥病在危急，希望快去请医生，设法抢救。”

曾三姐也进来了，一听这情况，拉着我就说快去找雷青成。我想不容易啊，敌人捉了他整整十年，他比不得我啊。可是又想，现在刘湘和蒋介石勾结得很紧，说不定可以缓一缓，就站起来跟着曾三姐走了。走到半路上，遇到徐清浦，互相对望了许久，他才咽哽着说：“玉屏，你知道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说：“清浦，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面来信了。”

我再也忍不住，哭着说：“清浦，我要回去一趟，我马上就走。”

清浦说：“你不能动啊，你回去正好中敌人的计，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甚至孩子。”

我说：“人要送进城去就晚了。”

清浦说：“送进城光枪毙的手续也要一星期。”我说：“恐怕不会，他是敌人悬赏捉拿的对象，是敌人早就知道的华蓥山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这么多年来，敌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想谋害他，这次捉到了，是不会放过他的。也许他们当天就要下毒手！”

清浦一听急了，挥着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地说：“不，他们要活的，他们不会马上就……”

我也站起来说：“不研究情况了，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我要立刻回去。”

“你不能立刻回去！听说敌人布置得很严密，黎梓卫一带整整一团人，罗渡溪也是一团人，你赶快开张条子，调李仲生、周辉同去营救。”

我说：“不行，我非回去不可。清浦，我不能坐在重庆躲着，我可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清浦坐下来，放低了声音说：“玉屏，你要冷静一些，为了革命，你绝对不能上去，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我们不能再牺牲人了啊！”

我的心比刀绞还痛。可是仔细一想，清浦说得也有道理，再说时间不等人，等我真的从重庆赶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狠了狠心，就撕了一张纸写条子，调余家场李仲生和山上的周辉同赶快营救。我把条子递给清浦说：“时间很紧，叫玉喜白天黑夜走，抄近路回去，一天一晚送到。”清浦接过条子，沉重地说：“话是那么说，事情恐怕还得两头办，赶快去找雷青成设法。”

我跑到雷青成家，他看见我急得不成样子，忙说：“屏姐，你啥子事？”

我前后看了看没人，就说：“玉璧在上面遭了。”“怎么遭的？”

“廿军逮的，进城只有死。”

他一把拉住我就走，嘴里说着：“快，赶快，我们找刘湘打电报去。”

我们刚走到七星岗口子上，就碰见徐清浦，他一下子从黄包车上跳下来：“玉屏，你们到哪里去？”

“去找刘湘打电……”

他摇摇头，眼睛看着地下，声音嘶哑地说：“不用了，上面又来了信，人已经遭了，二十三日九点钟遭的，人头已经示众了……”

他话还没落音，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头一晕就打起偏偏来。徐清浦一把拉住我说：“玉屏，你要站住，要站住啊！”

我听了清浦的话，咬咬牙，站稳了。一看，雷青成还扶着我，一边大声喊着黄包车，要我到他家里去住。我摇摇头说：“青成，你先走吧，清浦扶我回去，歇一会儿……”雷青成把我托给清浦，说明天来接我。

我哪里还走得动路啊，站都站不稳。清浦看我这个样子，就把我扶进街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小房间。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哭了一阵。清浦说：“玉屏，你要想开一些，这是敌人的阴谋。内部叛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现在重庆只有我们两个人，玉璧这一死，山上就倒了根擎天柱，上面一时也可能来不了人，敌人很可能要来个屠杀，形势会很紧张。

你现在千万不能倒下去，我们还要报大仇啊！”我点点头，说：“清浦，

我知道，我不急了，人死都死了，我不想他，我要站起来，山上还有那么多队伍……”说着说着又倒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玉璧的死，很快就有了反响，成都《新新新闻》、重庆《蜀报》都以大黑体字为标题，登出了《岳池共匪廖玉璧斩决》的消息；岳池、广安的城镇乡间，都贴了行刑时的照片。二月二十七日，我们一个叫刘老大的队员，到李子坝找到了我，拿出了玉璧临刑前给我写的一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

玉屏吾爱，我已遭不幸，病入膏肓，一无救药，再不能活着来见你了。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完成的任务，望你继续完成。

我粗枝大叶，死于敌人的阴谋陷害，望你们以我为戒，不要蹈我覆辙，更不要仅仅为我，为报仇而盲目行动。我之死，是有代价之死，是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求得自由解放而死，也是为爱你而死，无数种死法中，此为最优也。

我的仇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报，今日杀我者，他日亦有还我血债之时，你切勿为我而伤其自身。我死之后，宁君、彬儿靠你抚养成人，快带他们往西北方走，他们是继承者，家中母亲，也托你照应。

永别了玉屏。

玉璧于岳池万寿宫狱牢内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我捧着这封信，哭得昏了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醒了过来，隐隐约约地觉得身边围着几个人。一个声音哭着说：“大嫂，大哥已经不在，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

我猛然想起，这人是刘老大，连忙一下子坐了起来，拉着他问：“你说，老大，你告诉我，这封信是怎么来的？”

刘老大用袖子揩干了眼泪，坐在我身边，慢慢地说了起来。

“那天我下山去买盐，被夏马刀的人捉住了，说我是山上下来的探子，就把我捉进了岳池县里的万寿宫里关起。二十二号那天，一个人上了重镣，五花大绑地被一大群人推了进来，我一看，才晓得是廖大哥。那天夜里，阴冷得很，廖大哥神色自然地坐在那里，跟我聊天。我说：‘廖大哥呀，你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说。我已经都托了保人，他们没抓住我什么证据，说不定很快就要被保出去的。只要我一出去，就是拼了这条小命，也要去山上报信，让周辉同、李仲生他们下山来救你出去……’”廖大哥笑了笑，说：‘不用了，他们等不得的，他们抓我这么多年，好容易抓到手了，还会等我们的人来救我？我也没有什么事情麻烦你。要是方便，你给我找支笔来，我写封信。’

“我前不久才找人写了保状，纸笔都还放在屋角里，就连忙给他找了出来。可是他的两只手都绑着，只好用嘴含着那笔写。我看他写得那么吃力，心里想天下哪有这样的罪，再说深更半夜的，想必那些兵也不会进来，就悄悄地给他把绳子都解了。廖大哥拿起笔，刷刷地只管写，不一会儿就写好了，他把信折成这个样子，然后对我说：‘我这辈子只求你帮一个忙，请你把这封信交给陈玉屏。当然咯，这是要杀头的事情，你要是不愿意可以早说，要拿去向敌人邀功也可以……’

“我忙说：‘廖大哥呀，我刘老大哪里是那样的人，那不遭天打五雷轰吗？好歹我也跟你这么些年啊。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刘老大在，也就会有这信在！’”没想到，我没想到啊，天一亮，也就是写了这封信没几个时辰，廖大

哥就被押出去了，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那两天，牢房里都传遍了，说是廖大哥从牢里一押出去，就由向屠户亲自审问。其实谁都知道，像廖大哥这样的人，有没有口供都要杀的，什么审问不审问，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

可是廖大哥自己当成了一回事。听说在大堂上，向屠户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反口问道你们不是到处出起大布告，要抓我这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闹明白啊？向屠夫又问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你？廖大哥又说怎么不知道？不就是因为悬赏的那三千块大洋吗？……向屠夫不耐烦了，就喊押出去！廖大哥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一路喊着口号出了衙门。他挺着胸膛，面不改色，一路上高呼着‘我们的共产党万岁！’‘我们的红军万岁！’‘打倒军阀杨森！’‘苏维埃政府万岁！’，一直到了刑场上，也没停下来。那天，天气阴冷得很，由监狱到刑场的路上，站满了默默无言的群众，一点声音也没有。”刘老大停住了，过了一会才说：“正街上照像馆的老板，大嫂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岂止是知道，还是和我常来常往的熟人，他的女人还和我拜过姐妹，这些年的关系一直不错。“那天，老板被敌人押到刑场，被枪逼着为大哥照像。他不知道是真的心慌，还是想多拖延时间，照了一张，说没照好，照了第二张，还是说没照好，大哥还在不停地喊口号，敌人把那老板掀在一边，就喊用刑……“大哥的头，用竹竿穿着，在城里游街示众，后来又挂在南门城门洞上的木笼里。敌人不准收尸，扬言收尸者同罪。那些天，满城里阴风惨惨的，城里的人家连娃娃都不敢哭。”

这一天，正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

我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不知道多久，每一次醒来，都见到身边有山上下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告诉了我玉璧牺牲前后的情况。

自从敌人发了悬赏通缉廖玉璧的布告，组织上就很警惕，给玉璧身边配了十六个人，都是双枪，跟着他先到广安转洞口找到唐虚谷，商量的贯彻南部会议的情况，然后又找到陈伯斋、唐俊清和郑涛了解情况，还给大竹后山的伤员送了五十张行军床去。当时廿军又在招兵买马，罗渡溪有些吃紧，玉璧就把周辉同调回山上带队伍。不久罗渡溪就被敌人占了，玉璧打算调黎梓卫的人上山，守黎梓卫的曾洪泽不愿意，赌咒发誓地保证不会出事情。

曾洪泽这个人，我有些印象，原来在姚生荣的队伍里，新街整军时他就和苏连清是一伙，后来又悔过又检讨，就没有深究。在黎梓卫表现还好，还打过敌军的军船，都认为他改邪归正了。

玉璧这次从邻水回来，已经是二月十几号上了。曾洪泽上山来说，向廷瑞派人来讲和，愿意把河东七场划给我们，他们只守河西，两不侵犯，河下行船协商解决。玉璧没理睬。过了两天，曾洪泽又上来，说向廷瑞愿把河东河西资马十二场都给我们，如果还不同意，只要我们同意不攻城，广安、岳池的治安都由我们负责。玉璧还是不同意，唐庆余却被他们麻住，来和玉璧商量。玉璧说：“老唐，你不知道，他们这一套来过几回了，一面谈判一面杀人，其实他们心中也清楚我是什么人，怎么可能互不侵犯？”唐庆余还是主张谈，说：“河东七场都是我们的人，最近我们在广安、岳池各个乡场抗丁抗粮闹得很厉害，又在渠河沿岸专打廿军的船，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谈判，是很自然的。另外据说杨森的军队要开拔了，说不定最后这段时间求

个平安呢。”

当时玉璧觉得老刘政委不在，唐庆余又是组织上派来的参谋，不听人家的意见不好，就说：“那么老唐你先带人下去看看，要谈判也可以，叫向廷瑞的人上山来谈。”唐庆余就带了些人下去，其中包括我们十六个警卫中的四个，这样玉璧身边就只剩下十二个人了。

唐庆余下山去了两次，回来说我们的条件敌人都同意了，就等玉璧下去拍板。玉璧说叫他们有本事上华釜山来。唐庆余说人家怎么敢来，还是你下去的好，坝上全是我们的地盘，敌人虽然占着罗渡溪，扑过来还要过河。玉璧还是不放心，说：“老唐，还是小心好，我们内部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多的是，已经有不少教训了。”

唐庆余当时还不高兴，以为玉璧怕事，说：“我都下去看了两次，平平安安的，老百姓听说你要回去，都高兴得很，连鞭炮都买好了。我们借这个机会在群众中扩大一下党的影响，也好嘛。”

玉璧下山那天，曾洪泽带了二十多个人来迎接。有人叫玉璧再多带点人，曾洪泽说不用了，人家只来了一个人，还带上了向司令的亲笔信。玉璧说那把信给我吧，曾洪泽又说那人不肯，要亲自交到你手上。走到阳台场丁鹏武家里，有两个姓左的党员说他们才赶场回来，黎梓卫平平安安的，没事。玉璧这才下山。走到街上，都快散场了，玉璧带着人不动声色地悄悄从街背后到了约定的茶馆里。当时茶馆的人也不多，一些亲戚熟人见他进来，都亲亲热热起来握手打招呼。曾洪泽连忙招呼大家坐下，又给玉璧递上一杯茶，我们的十二个人一字排开，站在玉璧的身后。

玉璧左右看看，街上的人也不多，就问人呢。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双手递上一封信，玉璧站起来，一只手端茶，另一只手伸出去接信，谁知一个趔趄又坐了下去，原来他的长衫被曾洪泽踩着。那家伙趁着玉璧一闪神，两只手又不空，一下子就把他腰间的枪下了。

这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扑进来那么多敌人，两个三个扭住我们一个人，就在茶馆里打了起来。茶馆里顿时一片混乱，玉璧当即被几个人扭住，动弹不得。他气得一跺脚大声喊道：“曾洪泽，你干的好事！你这个叛徒！”

敌人还在不停地涌进来，我们的十二人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双枪手，但毕竟寡不敌众，全被敌人扭住，下了枪，只有陈仁勇挣脱了敌人，从茶馆后门逃走了。

群龙寻首

夜，静极了，我拿着玉璧的信，心里清醒了许多。我想起清浦对我说的话，想起玉璧死了，其他的人生死不明，山上不能群龙无首。周辉同、金积成都是急性子，要真的拖着队伍去和敌人硬拼，那会坏大事。又想到玉璧死了，现在身首异地，铁马金戈拼战了十年，总不能连个收尸的亲人都没有……我扶着床头，把着柜子，挪到桌边坐下，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玉璧牺牲的情况，要求对今后的工作做个明确的指示。

写完信，才发觉天已经亮了。我梳了两下头，挣扎着站起来，披上衣服就要出去。刚刚把门打开，就撞着徐清浦。他说：“这么早，你到哪里去？”

我怔了一下，把他拉进门来，说：“我正要去找你。”说着就把玉璧的绝笔信和写给组织上的信交给他。等他看完了，我才告诉他，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清浦放下信说：“你现在更不能走了。我才得到消息，昨天晚上曾洪泽来了，显然是来抓你的，因为这里不是杨森的地盘，才不敢进城来乱抓人，现在住在千厮门的栈房里。”我一下子站起来，说：“好哇，曾洪泽，我正要找他。”清浦拉我坐下，说：“玉屏你不要冲动，现在不是你找他，而是他带着人在找你。铺子上这几天你不要去了，交给李士民，你要赶快到雷青成家里躲一下。还有，听说玉璧死了之后，敌人对我们已经开始了大屠杀，我们的人现在乱得很，要赶快想个办法。”

上面的情况这么乱，我不能回去，可又不能不管。叹了口气，只得又拿起笔来，给周辉同、李仲生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赶快把队伍调回山上，凡是在当地扯红了的人都要撤走，没有暴露的要隐蔽好，切不可乱打一气，上敌人的当。写完了，又盖上了我的印章，和我给组织上写的信一起，交给了清浦。临分手的时候，我嘱咐他说：“清浦，你也是上了名单的人，要小心啊！”

清浦说：“我不怕，我住在明生家里，他大小还是刘湘的参谋。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叫李士民给你准备点钱，随时好走。”

我看徐清浦出门就往上走，忙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到千厮门啊。”

我说：“你走错了，那头是化龙桥。”

他抬头一看，顿了下足，转身往城内走去。

我起身到店里，准备向李士民交代一下，再到雷青成家住几天。李士民一见我，连忙把我拉到里屋，说：“大姐，你……是不是大哥他……？”

我咬咬嘴唇，说：“士民，是上面出事了。我要走几天，铺子里的事情都交给你和晓兰，一定要做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千万不能让大家起疑心。”

我把店里的事情交代了，要走。李士民一把拉住我，说：“大姐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看看你成了什么样子。”

我走到穿衣镜前面一照，发现才几天的光景，我已经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皮泡脸肿，脸色发青，连眼睛都深深地凹了下去。我站在镜子面前，心里说：陈玉屏呀陈玉屏，你不能像这样形露于色呀。你应该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不能这样陷于个人感情里不能自拔！你还有大仇未报，就是天塌下来，也应该顶住啊。

王晓兰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默默地给我端来了一盆水。我用冷水洗了脸，又好好梳了头发，整好了衣服，就匆匆出来，准备到雷青成家去。一出店门，就碰见徐清浦，他皱皱眉头说：“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我没回答他，问：“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上面下来了四个人。”

我忙问：“在哪里，是谁？”

他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小旅馆。

我跟在清浦后面，到了旅馆楼上的一个房间，把门一打开，我顿时惊呆了。屋里四个人，一个个都是脸色苍白，身上糊满了泥巴，头发像乱草一

般，衣裳裤子拖一片吊一片的，呆呆地看着我。我再仔细一看，天哪，原来是金积成、唐俊清和另外两个队员！

四个人一看清是我，立即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呜呜地大哭起来。店老板听见了连忙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他们的船打烂了，货全部掉在大河里了，还淹死了人，小孩也淹死了，人家怎么不哭！”

老板摇摇头，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说：“真是天灾人祸啊！”

我们坐在房里，大家哑哭了一场，好一阵我才问：“你们几个人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们上面的队伍怎样了？”他们只是哭，我说：“不要哭了，说吧。”

金积成恍恍惚惚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党！我们都有枪，没有使，使不出来，我们看着把大哥抓走的……”

我说：“不谈这些了，你们四个人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泪水长流的，金积成哭得更伤心，话都说不出来。歇了好一阵，唐俊清才说：“还是我来说吧。那天，我们十二个人和大哥一起遭了，只有陈仁勇跑脱了。晚上，他们不知道把大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却把我们十一个人押在一个大院子里，吊起来。曾洪泽说：‘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可惜没有捉到陈玉屏。你们都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两个娃娃在哪里？’我们都说不知道。曾洪泽就指着唐老六说：‘唐老六，你过去一直跟她跑，你说她在什么地方？’唐老六气极了说：‘老子知道，老子就是不得说，你把老子吊死也不得说！我们上了你的当，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军阀的走狗……’曾洪泽就用棍棒狠狠地打，唐老六没有呻吟一声，说：‘横竖是一死，打死了也不得说！’金积成当时也破口大骂，说：‘大姐的地方我晓得，要从我口里掏出一句话来，除非牯牛下儿！’曾洪泽就用杠子压他，用刀把他的脚手都戳烂了，他还是骂。最后曾洪泽对我们没有办法了，就说：‘好吧，你们不说，把你们解到城里去。’

“敌人把我们十一个绑着拉出来，说是送进城去，可是走到拢中码头河边就停下来。我们一看，河边一条船也没有。敌人说要等船，却又在搬石头，这明明是要把我们沉河。我就悄悄对他们说：‘快，往河里跳！’大家一下都跳到渠河里。敌人拚命地朝我们打枪，我们拚命地往河底下钻。我伏在河底顺着流水冲了很远，才冒起头来，一看，枪声停了，敌人以为我们都被打死了，全走了。

“又冲了一阵，冲到罗家垭口才上了岸，恰好金积成他们三个人也冲过来了。唉，我们四个要不是水性好，也就像那七个同志一样，没有人了。”

屋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金积成的抽泣声。

唐俊清接着说：“敌人的卡子封锁得很严，白天不敢走，我们摸到一个岩洞里躲了一天，晚上才敢出来。刚走出不远，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头子，他见我们全身浇湿，穿得又单薄，就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快走远些，赶快离开这里啊，黎梓卫、罗渡溪都已经被兵围起来了！’我们假装问他出了什么事啊。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还不知道，杨森派了一团人，昨晚在黎梓卫捉了很多人，我们的廖大哥都遭了，现在还没得到消息。’金积成认出来，他就是牺牲了的朱老么的老人，就对他说了实话。朱大伯说：‘唉呀，你们不晓得，敌人都穿的便衣，早就埋伏在茶馆周围的，我们遭了好多人啊！现在不知道廖大哥怎么样了，我就在这里守，看敌人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也好送个信嘛。’“我们听说大哥可能还没有弄走，就要赶回山上调人，朱老

伯说这边山崖上也满是敌人，去不得。我们就沿着走马岭上了山，听说唐庆余已经调人下去，打了一仗，敌人把黎梓卫封锁很紧，进不去。我们又去找周辉同，照实把当时的情况向他谈了，他就怀疑起来，很气愤地说：“大哥遭了，你们是保大哥的，你们还活着？哼！看你们怎么说。”当时就叫人把我们绑了。我们都说：“周辉同，周大哥，我们死了不要紧，赶快调人救大哥啊！”他还是不信，最后才说：“现在大敌当前，我暂时不理睬你们。你们要是变了，逃到天涯海角也跑不脱；要是没有变，放你们几个到重庆去，请大姐回来开会，不然在大姐那里拿个信转来，我就相信你们。现在队伍不能再由你们带了，关于救大哥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我们想：带队伍不带队伍都是小事，我们要找到组织，要报仇啊！我们就是这样下来的……”

唐俊清说完，摸出周辉同的信给我，我看信上写着：“唐庆余带人在黎梓卫没能救出大哥，我们准备打岳池劫法场，不知你意见如何？”

我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才抬起头来对唐俊清说：“这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等我的信？你们大哥不在的时候，不是老唐一直在上面负责吗？”

唐俊清说：“老唐他刚来不久，谁肯听他的？再说这事又是他闯的祸，大家恨他还来不及呢，要不是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又立马带着队伍跑去救大哥，有人当时就会把他当成叛徒打了的。现在我们上面的人，只相信你，只有你说的话，现在才管用。”

我找清浦要了根火柴，把信烧了。显然辉同写信的时候，还不知道玉璧牺牲的消息，现在我也不想让这几个人知道，就说：“你们先换衣服，再吃饭，好好睡一觉，晚上我再来看你们。”

看样子，他们好几天没吃没睡了。

我和清浦安排完了，出来商量了一阵，觉得他们有些可疑。这么多天了，玉璧牺牲的消息，怎么还不知道？现在非要我回去，岂不是刚好进敌人的圈套？

晚上，我和清浦又到旅馆。金积成昏睡不醒，一个劲地说胡话，我去一摸额头，烧得烫人。唐俊清说：“大姐，我们四个已经商量好了，马上就要回去，非要把曾洪泽打死不可，我们要拚这条命，给大哥报仇！”

我说：“你别瞎说了，就你们四个人能报什么仇。你们大哥不是常给你们说：革命不是为少数人么？”

“不，我们这仇非报不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想，这几人都是队长，跟着玉璧十年了，一直都是忠心不二的。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又不能不提防，如果他们真的叛了，回去对我们的损失会更大，不如留住几天看看动静再决定。

于是我就给他们付了两天旅馆的食宿费。

可重庆也不能久住，我和清浦决定把他们四个送到合川交给刁仁义，叫刁大哥严密注意他们的行动。可是金积成病了，大烧大热疯疯癫癫地，说起疯话来。我们只好叫其他三个先去合川，金积成等病好了以后再说。

三月初二，唐俊清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李仲生下来了。他一看见我就揩着眼泪叹气，说：“大姐，我们这次对不住你。信送迟了，没有把大哥救出来。”

我摇摇头说：“仲生，不谈这个问题了吧，人死了，算了。”仲生说：“我非谈不可，不谈憋在心里更不好过。大姐，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一些，你们是什么时候得到信的？”仲生说：“我们是二十二日深夜才晓得的。那天深夜，曾洪泽手下一个叫王志高的同志从黎梓卫跑到余家场找到我，说曾洪泽叛了，昨天在黎梓卫把大哥卖了。他在鲁班庙雷铁匠那里躲了一天一夜，才化妆逃出来给我报信。接着陈仁勇从阳合场赶来，说是唐庆余带了四十多个人到黎梓卫去救人，哪晓得敌人驻在罗渡溪的两百人早已埋伏在黎梓卫，此时已在场头场尾架起机枪。唐庆余看没办法，只好退了出来，调周辉同和我的队伍一起去打岳池。陈仁勇说：唐庆余急得捶胸顿足的，后悔不听大哥的话，是他麻痹大意，害了大哥。唐庆余还说：‘这不是大哥他们几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关系我们整个队伍的前途生存，拚命也要救出来。’我们听到这消息后，心急如火，马上集合队伍，鸡叫头遍出发，准备找机会混进城去，打了岳池监狱，把大哥救出来。我又把大哥留给我穿的一件灰布滚衫脱下来，交给王志高，叫他拿着马上到合川，去给刁大哥报信。这时鸡都叫了，我带着队伍拼命地跑，赶到离岳池只有三十里路的时候，就听说大哥已经被杀了。我们二百多个弟兄，一路哭着回来的……”

仲生话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我没说什么，擦干了眼泪，哑坐了一阵，对仲生说：“同你大哥一起的十二个人当中，除了陈仁勇之外，又跑脱四个，其余的都绑上石头沉河了，这个情况王志高知不知道？”

李仲生非常吃惊地说：“谁跑出来了？陈仁勇说他们不是同大哥一起都被敌人捉住了吗，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就把金积成他们逃脱的情况说了一遍，李仲生问人在哪里。我说就在前面的旅馆里，有三个调走了，金积成还在。李仲生听了，一定要去看看。

金积成正躺在床上，看见李仲生就一下爬了起来，抓住他的手说：“仲生，你来了！大哥，大哥呢？”李仲生没有回答，眼泪长流。金积成一看李仲生在流泪，死死地盯着他说：“李仲生，你说，大哥呢？”李仲生颤抖着声音说：“大哥，大哥死了。”

轰的一声，金积成一下就倒在床上。李仲生连忙把他扶起来，不断地喊他，只见积成呼噜呼噜的出大气，两脚不断地在床上蹬着，说：“我要杀杨森，我要杀曾洪泽……”

仲生把他抱住，喊着：“积成，积成，你疯了吗？”金积成大声武气地喊：“我没有疯，我没疯啊！”一下就把衣服撕烂了。他紧紧盯着我们，两个眼球充满了血，突然一把抓住李仲生说：“你是敌人派来的走狗，我要打死你！”

老板听见我们房间里打得乒乒乓乓的，就到门口来问：“喂，你们里边在干啥子？”

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疯了。”

金积成一见老板进来，就大声的叫：“我没有疯，我没有疯啊！”接着就抓起床上的枕头向老板打去，一边还扑上去又抓又咬的：“你是杨森派来拉我的，我非打死你不可！”老板看他疯成了这个样子，吓坏了，连忙挣脱逃走了。

我看事情不对，忙和清浦商量，去找和我们有关的刘医生来给他看病。谁知医生刚一进门，金积成就用鞋子打过去，还是乱吼乱说。徐清浦上去帮助李仲生按住他，他把清浦的手都抓烂了。

我问刘医生：“他是不是真疯？”

刘医生说：“是真疯了，你看他的眼神不对，眼睛都充血，认不清人了。”

医生开了一副药，我们买来给他熬好，灌进他嘴里，他全都吐了出来。这样闹了整整三天，一点东西也不吃，连我给他送点咸菜去，他也端起碗朝我砸过来，拍着胸脯说：“这是些地主军阀的东西，我不能吃你们的东西，我是个共产党员！”

两个守他的同志吓坏了，一下就把他的嘴蒙起来：“你怎么乱说呀！给人家听见了，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查号的知道他是疯的，也不来过问，可是这样闹下去，一定要出事。我同清浦商量个解决办法，清浦说：“他是为大哥急得疯疯癫癫的，只要哄他说大哥没死，也许有点作用。”于是就笑着去对他说：“金积成，金老弟，大哥来了，大哥来了。”金积成就一下爬起来坐着，紧紧盯着我们说：“大哥，大哥在哪里？”

清浦拍着他的肩膀说：“大哥叫你安静些，不要闹，他有事，隔两天来看你。”

金积成马上就要下床，说：“大哥来了，我要去看他。”清浦按着他说：“不行，像你这样闹，不是又把大哥暴露了吗？”接着又在他耳边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阵，他才稍微安静下来。

第二天，金积成还是哭，不吃饭，伤心地边哭边说，“大哥，我跟你这么多年，我没有离开过一步，我们受了敌人骗啊！出生入死，我没有私心啊，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们看嘛！”他边说边扯开衣服，双手在心口上乱抓，又大叫大吼地说：“我要报仇啊，我到南部去，去找老刘政委……”

刘医生天天守着，给他诊病服药，他还是不睡觉。我们就想了个办法，买了些安眠药给他吃。可是药吃得多了点，第二天都还没醒，只见鼻子在微微翕动，浑身都变得僵硬起来。

我们都着慌了，刘医生赶紧替他摸脉，说不要紧不要紧，再开点药给他解一下。把药灌下去，又过了一夜，他才醒转来。我看他清醒了一些，就给他冲了一碗藕粉。他喝了两口就吐，一下就吐了半痰盂。然后两只眼睛转了转，看着我们眼泪汪汪地说：“大姐，我的大哥呀！……”

刘医生说，他是心里一急，痰迷了心窍，吐出来就好了。我们大家见他确实不乱说了，这才松了口气。

这几天，重庆城传遍了，说刘湘投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开二十万中央军来打共产党。知名人士张澜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川人治川”的文章，反对蒋介石进川，四川好多人都赞成这个主张。可是蒋介石早些时候就派了贺国光带着参谋团进川来了，还有大特务康泽，他们的势力勾结起来，看样子是挡不住了。

一天早上，全城忽然戒严了。一会儿警察挨门挨户地喊挂国旗。保长走来问我们为啥不挂，我说：“才开的铺子，没有国旗。”

保长说：“你们去买嘛。”

我说：“街上不准通过。”

警察说：“拿钱来，我帮你去买。”

我说：“生意不好，没有钱。”

保长说：“这成啥子话？今天蒋委员长来，全城要盛大欢迎。”李士民说：“那有啥关系，隔壁挂了是一样，我们站在门口来欢迎还不行呀？”

警察说：“不行不行，不准站在外面，要关铺门。”李士民说：“啥子了不起啊，要关铺门，我们咋个做生意，找饭吃？”

保长说：“做s*的生意，街上都不准人过。”

警察不由分说，用警棍逼着我们进了屋。我们上楼打开窗子，不多一会，一群穿黄军服的骑着摩托车过去了，接着是几辆大卡车，车上装着兵，架着机枪。忽然一辆卡车抛了锚，后面的小汽车停下了。我们看到一部车子上一个全副武装的光头，还有一个女人白白的脸，打的摩登红。工人们都在指指戳戳地说：“那不是那个什么宋……宋美丽吗？”许多人都挤过来看稀奇，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理会下面的警察。

这一天，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

正当刘湘为他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把红军“赶”出了四川而洋洋自得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了重庆，亲自指挥围追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并以一纸手令，夺走了刘湘的全部权力，开始着手他“改革四川政治、整顿四川军队”的行动，在四川住了前后半年之久。四川被划成了重点“剿匪”省份，康泽的“别动队”在省内全面铺开，大肆发展特务，在监视刘湘的同时，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尤其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为“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第二大红色根据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华蓥山的形势，更加严重了。重庆街头又多了一些穿黄呢制服的军官，宪兵白天黑夜地在街上巡逻。旅馆的查号严格了，盘问时对答若是慢一点，或者发现手上有长期摸枪的茧疤，就要抓去关起来，我时刻都在担心从山上下来的同志们安全。

一天中午，李仲生慌忙地跑来对我说：“大姐，我原说下来向你谈谈情况，商量个办法后马上转去，可是昨天突然下来很多人，他们都是从余家场冲出来的。”

“是怎么回事，有伤亡没有？”

“有呀，又牺牲了四个同志。我走后不两天，夏马刀开了一团人包围了余家场。”

“为什么不扯上山去？”

“敌人把山边封锁得很紧，上不去了。”

“来了有多少人？”

“有一百多个。”

“现在什么地方？”

“住在千厮门河边一带。”

我听到这消息又气又急。我们与重庆地方党组织又没有直接联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想安排在磁器口一带吧，路连长的队伍又扯走了。铺子里安不下，人多也害怕出事情，再说他们的生活费用又如何解决？光是每人两角伙食费，每天就要几十元，铺子里热销的门市货，也只够维持工人的伙食，哪里去找钱呢？我同清浦商量后，决定再去李荣华家，看看他从泸州回来没有。

碰巧李大哥上午刚刚回来。看见他，我又想起了玉璧生前和他的友情，忍不住形露于色。李大哥见了忙问：“玉屏，有什么事吗？”

我镇静了一下，看了一眼他的女人，说：“没事。”李大哥就打发那女人进了厨房，然后说：“听说上面紧得很，我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廖大哥呢？他的情况怎么样？”我说：“遭了。”

他的脸色一变，正要递给我的茶杯一下子掉下去，“啪”

的一声打碎了，接着就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那女人听见声音跑出来，一见他这样子，忙问出了什么事。

李大哥像没听见一样，一头冲进屋里，嚎啕大哭。那女人跟着跑进去，没问出个名堂，又跑出来问我：“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他屋里头哪个穷亲戚死了，报丧来了？”

我厌恶地看了她一眼，顺势说：“是的，是李大哥的一个老伯死了，衣裳棺木都没有，他侄儿找我来跟李大哥说一声。”那女人两眼一翻，拍着巴掌说：“我说嘛，又是来要钱的，我们这屋头，哪来的这么多钱打发死人？”

我想有这女人搅和，什么话都不能谈，就大声说：“李大哥，他侄儿在千厮门等着，我们去看看怎么样？”

李大哥听了，走出来，就要跟我一起出去，谁知那女人也要去。我知道她是怕李大哥多给了人家钱，只好说：“那我先走一步，你们后边来吧。”说着就走出街口，在悦和旅馆对面的一家书店里等着。

一会儿，李大哥出来了，我们刚走到七星岗口子上，见徐清浦也跟在后面来了。我们一到清浦的侄儿徐明生家里，把玉璧牺牲的经过一一谈了。李荣华听了，气得顿足，泪如泉涌。

我反倒过来安慰他，说：“李大哥，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也不要过分伤心。你现在还是个立得起的人物，玉璧在的时候，你们情如兄弟，帮了我们不少忙，现在玉璧不在了，你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许多事情还是得靠你帮忙。现在敌人开始‘围剿’，昨天有百十来个弟兄从余家场撤下来了，现在衣食无着，只好找你想点办法，出出主意。”正说，仲生也来了。李大哥从身上摸出四百块钱来，说：“你们先拿去用，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仲生，你住到我那里去，就说是我的侄儿，看谁敢动你。你们的人交一部分给我，另一部分，可能要动员你们的关系，安插到贫民中间，找点下力活路隐蔽起来。”

徐清浦说：“这个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工作，可以设法安排。只是曾洪泽在千厮门住起还没走，还有那个出卖夏林的李仲凯也来了，带着人跟他住在一起，得提防。要不然千厮门陈文玉的船上还可以安排一些人。”

李仲生听了，桌子上一捶，说：“这两个狗日的还敢干什么？”就带帮人到千厮门的遂荣旅馆去查。曾洪泽听说有人来问他，当天下午就跑了。

我们把工作重新安排了。四百块钱交给李仲生，他住在李大哥家里，以叔侄相称，专门负责从山上撤下来的同志们的生活；李士民还回铺子上，帮着仲生搞接待和联络；这一向空气松动了，我又回到大白楼，常到铺子上去，两头顾着。

金积成的病有了起色，成天闹着要到南部去找老刘政委。我一来怕他闷在旅馆里，病又犯了，再者这里是重庆，不是乡下，成天这么闹，早晚要出事情。想想刘老大去了这么久，没有音信，金积成又跟玉璧多次去过南部，情况熟一些，也就同意了。不过我还是叫李仲生派了两个人跟他一起，一来安全一些，二来还是有些不大放心。

金积成走了没两天，一天晚上我正要关铺门，突然跑进一个水淋淋的人来，我一看差点没叫出来，是陈亮佐！

我连忙找了套干净衣服，叫他换了，又到隔壁饭店里打了半斤酒，端了几个菜来，催他吃了暖暖身子。陈亮佐一仰头喝下了两杯，说：“三姐，我这次好险，差点就见不着你了。”我点点头说：“你慢慢吃，慢慢给我说。”

亮佐说：“大哥牺牲之后，我们的人都气昏了头，一阵地乱打，唐庆余也牺牲了，我们死了不少人，老百姓也遭了殃。大家都等着上面来人，一等

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硬是忍不住了，都要想同敌人拚。这次我就是下来找你商量个主意，看究竟怎么办。谁知船到了磁器口，一上岸，就碰到曾洪泽、李仲凯两个叛徒，带了十多个人在河边一个茶馆里吃茶。一条独路，茶馆在路旁，我装做忙赶路的样子，勾起脑壳往前走，哪晓得几个家伙就跟我后面。我在街上转来转去，他们紧跟着不放。我穿过一个巷子，进到一幢熟楼房，想从后门逃走。谁知刚刚一出来，就被他们捉到了，今天早上把我弄上船，准备押回广安，向夏马刀和向屠户邀功。

“曾洪泽知道我们在城里有许多人，他们不敢进城，就一路上来套我，叫我把你和李仲生暗杀了或者骗出来，捉到广安去，不但保我不死，给我三千块钱，还保我在夏马刀手下做官。我当时就想吐他一脸的口水，可是又想，死在这个坏东西手里值不得，还是得跑，只要下水就有办法。我说我要拉肚子，把绳子给我松一下。他们不干。我说你们也是，这船上就我一个，你们怕什么？要不然就帮我脱裤子。那个守我的兵烦了，就把绳子解了。我一掌掀了他个仰八叉，然后两足用力向船边一蹬，一下子就钻到河里去了。只听李仲凯在喊快打！

快打！又听到打了几枪。我钻进一个大漩涡，一下就冲了好远，抬起头来一看，那船上的家伙一个个像乌龟一样，伸长脖子干着急。我看他们远了，就浮到水面上来顺流而下，漂了一阵，又遇到救济会专捞死人的红船。船上的人直喊有死人。快拿钩来捞。我一看不对，又是一个猛子钻下去了。我在河里又漂了一阵，想上岸，但身上是湿漉漉的，要是曾洪泽他们追下来，或是碰到别的熟人怎么办？就又在水上漂了一阵，然后才在一个无人的河边上了岸。

我又饿又冷全身发抖，刚好前面黄桷树边有一个崖洞，是叫化子住的，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去就躺下。水里泡久了，全身软绵绵的，一倒下去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太阳都偏西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衣服撕烂了，装成要饭的，找进城来。”我屏住气听完了，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真是千层浪里翻身转，百尺竿头一命还。这群叛徒真是太没心肝了，整死了我们这么多人还不罢休！”

亮佐很气愤地说：“三姐，个人生死都是小事，可是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我们革命十年了，死了这么多人，这么多老百姓，难道红旗就这样倒了不成？现在大哥不在了，唐庆余也牺牲了，老刘政委也没回来，大家都不听招呼。尤其是郑涛、郑宁两弟兄，把队伍从叶济那里扯出来了，带着人见土豪就打，见夏马刀、向屠户的人就杀。夏林的那个三公被他们砍成块块，丢下河去了；李仲凯跑得快，不然也喂了鱼。这样做倒是一时痛快，可是没有章法，要出大事的。我们要很快找到组织才行啊。”

我说：“亮佐，我们也很着急啊。你看，刘老大去了南部，这么久都没有消息。昨天我又叫了两个人，跟着金积成一起，去找老刘政委去了。听说路上卡子很紧，又听说南部的党组织也被破坏了，也不知能不能找到。前几天，仲生也下来了，也是商量这个事。明天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吧。偏偏我们的组织关系，又在南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手里，跟重庆的地方党组织没有联系……”

陈亮佐听说李仲生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我站起来，准备安排亮佐在铺子里搭个铺休息。突然想起了什么，就问唐俊清他们到了合川没有？陈亮佐点点头说：“来了，他们的事情我找人

调查了，是真的，有那么回事。”我感到一阵轻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李士民把徐清浦和李仲生找到太白楼来。陈亮佐一见到仲生，悲喜交加，抱在一起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说到这次遇险，李仲生有些意外，说：“曾洪泽不是被我吓跑了吗？这家伙欠了这么多血债，还敢在这里逛荡？”陈亮佐说：“他是怕你，可他更怕回去。

这样回去不但我们的人不会放过他，夏炯夏马刀也不会饶了他。不然他咋会来套我，叫我来把你和三姐哄出去，让他捉了去向夏马刀交差啊？他以为满天下的人，都和他一样臭狗屎呢。”

谈到找组织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很迫切，可又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亮佐说：“听说中央红军已经到了贵州，南部找不到，我们就到贵州去，直接去找党中央。”大家都沉默了。我想，贵州离这里几千里，山山岭岭的，光凭走路要走多久啊。再说我们手里没有党的关系，就是找到了，人家也未必肯承认，肯跟你接头。

亮佐见我不开腔，就说：“三姐，我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形势这样紧张，就碰一碰吧。万一找到了，不就多了一条路？”

清浦也觉得可以试试：“两头进行嘛，等几天南部没有消息，我们就再派人去；贵州这边，亮佐回去和刁大哥商量，也带些人去。如果找到了党中央，只要说明了情况，他们不会不理睬的。”

我又仔细想了想，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就同意了。第二天，我又找李荣华拿了三百块钱，交给亮佐，他转回合川，和刁仁义一起带了几个人，到贵州找党中央去了。

血海深仇

陈亮佐走了之后，我们几次派人上去了解情况，都因敌人封锁很严，半路折了回来。得不到山上的确实消息，心里很着急。

这天，吃过中午饭，我去找清浦商量事情。刚出铺门，陈文玉就急急忙忙地跑来，对我说：“马福林来了，在后面。”我站在铺门口，远远望见马福林挑着草鞋，朝这走来。我想马福林这也太大意，大城市里谁买草鞋？一时竟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招呼。停了一下才问：“嘿！卖草鞋的，你那草鞋卖了多少了？”

马福林把脱了边的破草帽掀了一下，说：“生意不好，卖不得啊！”

我说：“七星岗口子上有个草鞋市，你往那里去卖嘛。”马福林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说：“要得要得，多谢大姐提醒，我就是找不到地方卖呢。”

马福林挑起担子和陈文玉往前走，我紧跟在他们后边，对马福林说：“你把草鞋就放到这里，交给陈文玉，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马福林把草鞋放下，却不肯放下扁担，凑近我小声说：“听说敌人到处都在捉你，我拿着它方便些，碰上两个的也好对付。”

陈文玉看着他，笑也不是气也不是，说：“这里是大城市，又不比乡下，哪里容得你打？快放下再跟大姐走。”

我把马福林带到太白楼，问他上面的情况怎样了，还有他的女婿周辉

同。

他叹了一口气说：“撤了，撤下山来了。”

“他没有得到指示，为什么就撤下来？下来送死呀？”“他有信。不好藏啊，我缝在裤裆里的，路上周身都要检查。”

我在徐老太婆那里借了一把剪刀递给他，他把破裤子脱了，拆开裤缝，才把信取了出来，不够巴掌大的两块鱼塘纸上面写着：

大姐，大哥牺牲后，敌人派了一师人包围了华蓥，放火烧山，山上山下一带的房屋大部被烧毁，居民被杀死不计其数，猫儿寺的和尚也牺牲二十余人。我们从大哥牺牲的第二天起，就和敌人打，老唐在战斗中牺牲，陈伯斋被俘，李希白等九人被夏炯杀于广安南园。杜仁杰也牺牲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们已经分散队伍，撤退下来。现在我退到罗渡溪，住在地窖里，生活困难万分，真是白天不敢见人，夜晚不敢见鬼。今后如何进行，急待指示，迫切之至，火急！其余情况，由岳父面谈。

周

我轻轻地把信叠起来，看着马福林。他拿出一匹烟叶子，慢慢地裹起，打燃火吸了一口，才慢慢地说：“老辈子，你不晓得，自从廖姑爷牺牲后，夏马刀、向屠户两个大鹰王，把我们整得好惨啊，光是在罗渡溪沉河的就有四十多个，周辉同也很危险啊……我这次下来都是准备牺牲的，差点见不到你老辈子了。”

我听了心里很着急，直问华蓥山上的情况怎样了？马福林说：“老辈子，你莫着急嘛，让我一点点地讲给你听。”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唉！我不想说了，说起来心头痛。”我说：“你讲吧，慢慢地讲。”

“老辈子，毛垭口灵牌坡你知道嘛，夏炯在那里用马刀砍死的就有二十八个人。他们不用枪打，他们说打枪浪费子弹。夏马刀的人可恶得很，他们穿的都是便服，你在走路做活路，他就来跟着你，突然把马刀抽出来，就砍人。一进院子，就是大人细娃一齐杀，有好多人都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华蓥山下光是全家杀绝的，就是一百多家啊！孙老么你晓得嘛，他和他的女人小孩，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娘都被杀了。华蓥山上的徐老和尚被绑在柱子上当成靶子来打。周围一二百里杀去杀来，几乎绝了人烟了啊！”

马福林吸了口烟，又说：“老辈子，还有那向屠户，在岳池、广安、邻水一带，也杀了我们好多人啊。活埋、沉河……这些都是血债啊！”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说：“这些人都是死人吗？就让他们杀？”

“老辈子，难防呀，叛徒出卖，敌人整得也凶，又是十家联保。我和别人家都是联保的，如果我的栈房出了事，十家人都脱不了手。他们把街上的二流子、烟鬼都组织起来，每十家人放一个，叫做他妈的啥子挨门丁，来监视老百姓的活动，谁家来了人他就来清查。有一个挨门丁朱二娃把向屠户的爪牙引到唐裕德的家里，唐裕德跑了，就把他母亲吊起来，要她交出唐裕德。他母亲不说，朱二娃就说他家里藏有苏维埃银元，要他母亲拿出来。他母亲不肯，大骂那些家伙，被乱棒打死了，半夜沉下河去，还编了谣言说他母亲跟着别人跑了。

五六十岁的人了，大儿大女的，谁还会去跟着谁跑？……”

提起苏维埃银元，我又想起很多往事。一九三二年底，组织上送来一口袋中央苏区流通的银元和铜元，上面刻着镰刀斧头。玉璧在广安的甘鸡

场、六马铺和观音阁、界牌等地痛创敌人后，回来开了个热热闹闹的庆功会，就将这些银元和铜元奖给四十多个有功的战斗者。我因为历次运枪任务完成得好，也得了十个银元，惹得多少同志眼馋。那时候，谁都把这东西当成宝贝。记得有一次我到唐裕德的家里，他妈妈见了我很高兴，拿出一个小镜箱，又从小镜箱里取出一个绸包，她慢慢地打开红绸，现出两块很光亮的苏区银元，笑眯眯地说：“廖大哥说的，现在这个银元，只是作纪念，等以后在市面上通用时，穷人就不受苦了。只是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啊。”

我告诉她：“快了，通南巴不是用起来了吗？她听了笑眯眯了眼，拍着巴掌说：“我苦了一辈子，也想过两天伸展的日子，我一定要等到这银元在四面八方都通用的那天。”当时我对她说：“唐大娘，等得到，等得到的，你还不到五十岁的人，好日子在后头呢……”

谁知我们革命还未成功，唐大娘就被这群野兽害死了……

我从枕边拿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取出一支，抽起来。自从玉璧牺牲后，我也开始抽烟了。

吸了两口，我又问：“辉同呢，他藏在家里吗？”马福林点点头：“是藏在我们家的地窖里。里面铺上些谷草，上边用石板压住，出气都困难，又怕挨门丁来清查，晚上也不敢出来。”

徐世群的母亲给我们端了两碗醪糟开水来。马福林端起碗又放下，摇摇头，吃不下去。

徐老太婆看看我：“陈先生，出了啥子事情？”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人，家里出了事，敌人为了派款，把我的老人拉去了。”

徐老太婆一边往外走，一边摇着头说：“这些天杀的，哪辈子才杀得尽啊。”

我端起醪糟开水，送到马福林面前，他却摇着头说：“我活了几十年，还没有见过杀这样多的人。老辈子，听说红军退了，我们通南巴的人也走了？”

我死劲地抽了口烟，掐熄了，叹口气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组织上没派人来，敌人的报纸上倒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们在罗渡溪，这次怎么牺牲了这么多人？”马福林说：“老辈子，你不知道，罗渡溪是个水陆码头，我们有些是大竹、营山、渠县的人，驻扎在罗渡溪。敌人一见外地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打二杀三沉河，我们牺牲了不少外县的同志啊。有的打死在路上，尸首都无人来收，这次我们从山上回来就埋了六七个。老辈子，你晓得罗渡溪场口上的黄桷树嘛？敌人在那里挖了一个大坑，活埋了一些人，有的连头和脚都没盖住，我们这次才用土盖好了，免得人家骂我们的人死了，还遭猪拉狗扯的。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啊，哪一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心肠好毒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队员蔡老大，和赛龙场李木匠的妹子李腊香才结婚不久。这次蔡老大被向屠户捉进城去，在猪市口砍头示众。李腊香去领尸的时候，抱住蔡老大砍下的头，晕过去了。向屠户的爪牙就把李腊香抱去想强奸。李腊香不从，抽出身上带的小刀要和敌人拼命，敌人把她绑在柱子上，割去她的奶子，用乱刀刺死，还将她的尸首丢在官山上，听任猪拉狗扯的。李腊香的母亲知道后，气疯了，现在在城里讨饭。夏马刀和向屠户叫他们的爪牙在四乡乱抢乱杀，我们游击队员和老百姓家里的妇女被强奸的不计其数，许多人都寻了短路。”

徐清浦和李仲生，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坐在一边，听马福林说。

我站起来，走到窗子边，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出神。我听不下去了，我会发疯的！

马福林叹着气，慢慢地说着，声音疲惫得很，也沉重得很。

“老辈子，这么多天了，我憋在心头也受不了啊。他们的恶事还多得很呢。刽子手杀了我们的人，把心肝都挖出来，拿到城里的馆子炒着吃，说是大补品，吓得那几天饭馆都关了门。他们不甘心，砸开王家馆子的门，么师不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挨了一顿好打，说他通共产党，么师就只好炒了。那么多，没吃完，就说放到下顿吃。么师悄悄到你坐过的班房里，捉了半酒杯虱子来，倒在肝子上盖上，等到他们再来吃，就说人肝变虱子了，这事在岳池城里都传开了……他们还把我们的人的大腿和手膀子上的肉割下来，包包子吃……”

徐清浦一拍桌子，茶杯都跳了起来。李仲生用头死死地抵着墙柱子，半天才咬牙切齿地骂了声：“这些畜生！畜生——！”

马福林边说，边抽烟，我们大家都在抽烟。满屋子烟气腾腾，一缕一缕地从窗口飘出去。

马福林又说：“廖姑爷死了，我到新场去报信，半路上遇到王道纯带了些人撤出来。我把廖姑爷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个个都气得哭。走到山边黄龙寺，敌人追来了。恰好黄龙寺有一个戏班子，班主跟我熟，知道我能唱几句，忙叫我扮花脸，王道纯也能唱，扮须生，其他的人当吼班儿。人凑齐了，正在化妆，敌人进来了，见班子里人多，就起了疑心，进进出出搜了两道，最后把庙里的老者抓去审。老者熬不住打，就说有些是山上退下来的。这时锣鼓都响了，我们正要出台，见事情不好，就跑。我和王道纯跑脱了，听说后面的遭了二十来个人，还有戏班子里的人。老辈子，徐大哥，我这条命都是捡来的呀，我马福林，差点儿都见不到你们了……”

马福林说着，泣不成声，屋子里一片哭声。好半天仲生才说：“马伯伯，我们不说这些了，现在辉同他们是怎样打算的？我们要商量个办法，下一步怎么办。”

马福林把烟锅巴敲了，把烟杆收起来，用袖头揩干了眼泪，使劲点点头：“辉同也是这个话。廖姑爷被捉去的第二天，敌人在四处贴了布告，说廖姑爷讲和了，当了河东七场的民团大队长。和什么侦缉队长，叫我们的人出来，集中在罗渡溪、黎梓卫听候调遣。可是我们的人没有一个受骗的。以后知道廖姑爷在城里头牺牲了，就在四处打起来。弟兄们都气红了眼，见到敌人就打，河东七场打得最凶。敌人的伤亡也不小啊。现在我们的人都分散隐蔽了，最大的困难是廖姑爷死了，没有一个总领头的，不知怎么办。现在又缺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有的只留下最后一颗保身用，有的一颗也没有了。老辈子，华蓥山上的红旗插了十年了，不能倒啊！你们要派人上去领导，最好运点子弹去。我们要报仇，把那些恶霸地主和军阀杀光，不然，廖姑爷他们死也不瞑目的！”我们四个人，坐在屋里，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我说：“老马，叫仲生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回去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商量。”

马福林站起来要走，我又叫住他，说：“你廖姑爷被抓住后，随身的十二个人中间有四个扑河跑脱了，这事你听说了没有？”

马福林点着头，说：“有这事，有这事。听说里面就有金积成和唐俊清，只是不晓得他们跑出来没有。”

过了些日子，我和徐清浦都听到风声，杨森怕刘湘暗算他，率先投靠了蒋介石，把队伍调到了川南宜宾一带，围阻长征的中央红军去了。华蓥山的形势松动了一些，只是金积成、刘老大还没有消息，陈亮佐也没有回来。我们就商量，叫仲生和马福林带些人，先回去。

我把服装店可能抽出来的款子都拿出来，买了一些开山斧、棕绳子、锯子之类的，准备让我们的人上山去砍些木头，马福林撑船，由渠河运到重庆来卖，既可掩护，又能赚些钱买些枪弹回去。另外，又找李荣华买了五百发步枪子弹和二百发手枪子弹，打了五十套军服，还买了一些必需的医药品、电筒和电池，找雷忠厚开了一个护照运走。

临别时，我对李仲生他们说：“这次牺牲太大了，你们在山上处境困难，生活很苦，要沉住气，没有指示，不要乱动。把得力的人员集中起来，万一有个什么响动，就得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啊。”

李仲生说：“大姐，你放心，天垮下来我们顶得住，我们吃泥巴也要活出来。你们找到组织，快送个信来，我们来接你。”

端阳一过，天气热了起来，刘老大和金积成还是没有消息。我们又派了一个叫唐荣先的同志出去。没多久和他一起去的人就跑了回来，说唐荣先在顺庆被敌人捉住了，砍成了几块。

我还是住在太白楼徐老太婆家里，间或回李子坝看看孩子。一天我和徐老太婆正在歇凉，王晓兰兴冲冲从铺子里跑来了，一上楼就喊：“大姐，陈亮佐回来了。”

我一听，就要下楼。陈亮佐已经跟着上来，穿了一件汗渍渍的白布汗衣，人也瘦了许多，一见面就说：“大姐，你的铺子又发展了。”

我说：“是啊，大姐学会做生意了。”说着忙叫王晓兰回铺子里拿套衣服来给他换，又叫徐老太婆去割点肉，招待远客。

她们走后，我忙问陈亮佐：“你们到遵义的情况怎么样？”陈亮佐摇了摇头说：“这次跑了一趟冤枉路，没有接上头，党中央带着红军走了。”

“向哪个方向走的？”

“听说向云南方向走了，到了四川。又听说是北上抗日去了。得不到确实消息。”

“留守的人呢？”

“哪里还有留守的人啊。他们刚一走，国民党军队就开进城，还不是像通南巴一样，红军走后，老百姓遭殃，杀了不少的人啊。”

我叹了口气。天天等，夜夜盼，结果还是落空了。好在人都安全地回来了，再想办法吧。”

亮佐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盅，一口喝干了里面的凉茶说：“大姐，我们这次也难啊。白天黑夜地赶路，走了二十多天才到遵义，听说党中央走了，心就冷了半截。我们去的时候，敌人正在大屠杀。我们只得装成做小生意或者逃难的，混进城去探听消息，晚上又偷偷地出城来在山坡或路边过夜。后来敌人清查得严了，就去买些地黄来泡成水，涂在脚上，等脚肿了，再买些膏药来贴起，装成叫化子到城外一些农民家要饭。那些本地人都被杀怕了，常常连水都要不到一口。”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换洗衣服，贵州的天气也像华蓥山一样，四五月间还很冷。下雨天，我们在山林里连个遮盖的也没有，晚上只好背靠背地坐着。敌人四处搜查红军，老百姓也不敢收留我们。一次我们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农民，摆了一阵家常，他看我们老实，就悄悄说：“你

们年轻力壮的，还不如去投红军。’我们问红军哪里去了？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听说到四川去了。去找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和刁大哥商量，觉得这样乱撞也不行，说不准就撞到敌人手里，就回来了。刁大哥带着人由赤水河回了合川，我到重庆来找你汇报。”

亮佐叹了口气，又说：“大姐，像我们这样一点关系也没有，要找到组织是困难，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去找。我们这么多人，没有组织就像无娘的孤儿。无娘的孩儿要长大，不容易啊！”

我点点头，说：“那老头子说得对。我们还要派人去找，组织也会来找我们，我们这么多人，组织上不会不管的。”接着我就把这段时间的情况给他谈了。亮佐听说上边松动些，仲生都带着人回去了，也忙着收拾打点，第二天也回合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部还是没有消息。各方面消息都证实，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往川康地区去了。蒋介石的部队一批批开进四川，今后的情况一时还很难预料。好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山上和台川的人不断在我这里进出，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终于有一天，李士民给我带了个人来，我一看差点没跳起来：是吴绍先！吴绍先是铜梁人，余家场和广安整军时都在，一直带着铜梁的队伍，还是我们的一个支队长，后来随老刘政委一起撤到南部去的。我赶紧把他引进房里，又拿烟又倒茶，说：“天哪，你到底来了！”

吴绍先笑着说：“怎么，不高兴吗？”

我说：“是呀，就是不高兴咯，眼睛都望穿了，望得我们好苦啊！”

吴绍先说：“你们这么多人失去联系，我们也很着急，派了几次人来都没走通。南部那边很紧啊，从顺庆来的那条路已经断了，我是从营山、壁山那边转过来的。”见了老战友，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知道。我要他先告诉我南部那边的情况。

他说：“那边情况变了。红军已经走了，我们准备一齐走的，但是没有走成。我们派了几次人来同你们联系，三月份就想调华蓥山的队伍，强渡嘉陵江，打剑门平武，可惜派的人都在半路折回来，敌人在顺庆一带的口子，堵得太紧了。”我听了惋惜得不得了，说：“我们也派了几次人，也是走到半路又转回来了。现在金积成又到南部去了，还没有转来，不知是凶是吉。”

吴绍先听了这话，避开我的目光，愣了愣，没说话。我当时很兴奋，也没注意，又说：“你们和徐司令不是在一起吗？怎么红军走了你们没跟上？”

吴绍先苦笑着说：“大姐，有的事情你不知道。苏区那边也复杂啊。张国焘这个人，骄横得很，跟徐司令和好多领导都闹矛盾，后来中央开会解决，还叫他作了检讨。这次撤退，听说也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主张，退得太突然。敌人的卡子又紧，我们过不去，组织上让我们暂缓一下，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走远了。根据地的干部和队伍，能跟上的全都走了，敌人就掉转来打我们，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们在南部听说廖大哥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老刘政委当时还哭了，没想到他随后也牺牲了。”

“你是说老刘政委也牺牲了？”

“是呀，在一次战斗中，他掩护同志们突围牺牲的。”老刘政委也牺牲了！我伤心地摇摇头，又想要抽烟。吴绍先接着说：“自从老刘政委牺牲后，我们的领导都接二连三地牺牲了，现在和你们一样，也和组织失掉了联系。我

们现在不能消极地等，要联合起来，串联起来，一边找组织，一边想办法，否则会等着挨打的。”

我马上叫王晓兰和李士民去通知仲生和清浦，说南部来人了。他们当即就赶到太白楼来，见了面都亲热得很。说起这一段时间两边的情况和牺牲了的同志，大家都不由得掉一阵眼泪。最后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确定了目前总的任务是保存力量，整顿组织，等候指示。

各处的人马，扯红了的都要调到华蓥山上去，没有扯红的暂时潜伏下来，还要把隐蔽在各处的枪支集中起来运回华蓥。重庆的人，能回山去的尽量回去，不能回去的就留下来，一些人当流动商贩、码头工人什么的，打进贫民区，多建立一些联络点；另一些通过雷忠厚、李荣华的关系，打入范绍增、刘湘的部队，潜伏下来。服装店当然得开，可是得另外找个人来负责，我得趁杨森和刘湘换防之机，回去整顿队伍。运枪运子弹的事，就交给徐清浦和李荣华负责。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个通宵，然后就行动起来。李士民和两个同志回山上去传达我们的决定，我到合川和刁大哥商量工作，吴绍先到遂宁那边去联络队伍，然后和我们联系。吴绍先临走时，我送他，分手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姐，我给你说个事情。金积成找到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打了几仗，表现很不错的。你不该怀疑他。”

我摇摇头，苦笑说：“是啊，积成和夏林一样，是个老同志了，跟着玉璧鞍前马后的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的，我是不该怀疑他，可是当时的情况也太复杂。算了，不说了，他的事情，现在也弄明白了，如果他不怪我，就叫他回来吧。”吴绍先叹了口气，说：“他不会回来了。”

“他还生我的气？”

吴绍先摇摇头。

“他想留在你那里？”

吴绍先还是摇头。

我一下子盯着吴绍先的脸，不动了。

吴绍先说：“他牺牲了。”

真是平地一声雷，怎么金积成也牺牲了？我还没来得及……我突然抓住吴绍先的手说：“他是怎么牺牲的？他是不是疯病又犯了？他还记恨我是吧？我真是，我怎么怀疑起他来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夏林和玉璧！”

吴绍先看我捶胸跺脚的，连忙安慰我说：“大姐，你听我说，积成他没怪你，他只是说他很委屈，他说不清楚，他的确没有做对不起你和大哥的事，没做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直有些恍惚，口口声声说不信我死给你们看，一听见响枪，就没命地往前冲。他的病，时好时坏的。”

吴绍先走后，我一直都没有平静下来。玉璧牺牲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已经流干了，可是现在我又为金积成伤心地哭了一场。

转眼就到了冬月，华蓥山上又下起了大雪，刘湘的部队打算清乡。山上的同志们情绪不大稳定，仲生和辉同叫李士民带信下来，要我一定回去一趟。

我也决定回去，可是服装店怎么办呢？这两个店开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两万多元，给山上送去的现款一万二千元，军服三百五十套，子弹六千多发，供给一年多由山上下来的百多人的伙食费用，同时还新结识了一些关系，建立了好些联络点，要是丢了确实很可惜；可是继续办下去吧，

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手。最后同大家商量，觉得还是上山要紧，不能把人陷在这里。

于是我们就忙着清理往来的帐目，该收的收，该还的还，本来冬天是旺季，也不敢接大批的货了，只是接点门市生意来维持工人的伙食和工资。

关掉两个铺子的打算，我没给工人们说明，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一天，陈树安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帮了这么多年的人，走了十几家铺子，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我到这里，算来有一年多了，你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全城的服装店没有一家像你工资这样高，又照顾我们，还经常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许多事理。你的铺子不能关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有点事，最多一个月就会回来。”正说着，李士民过来了，陈树安转向他说：“喂！李士民，你这次到哪里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李士民笑着说：“你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你呀，你到那又高又远的地方去了，你到华盖山去了。你站得高望得远就把我们丢了。”

“谁说的？”

一个叫老邓的技工在旁边说：“不要装模作样地哄我们了。我们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好孬也分得清楚。走，跟你一道，我是个单身汉，说走就走，又没有拖累。”陈树安叹息一声说：“唉！我就是有五个孩子，不做这针线行，就要饿死。他妈的，要不然我就和你们一起走。”我说：“祸从口出，大家不要乱说啊。”

老邓说：“怕啥子，你们干都干得，我们说不得呀？”我转过话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陈树安说：“我晓得不好做，那些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的人都喊难，莫说你这样对我们工人慷慨大方的老板了。有难有啥关系？大家设法家解决嘛。”说着一招手，就把工人们都喊了过来。

大家闹闹嚷嚷的，有的说：“我们三个月不要工钱。”有的说：“我们自己拿饭来吃……”接着这个几十元那个几百元，看样子凑个千把块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大家，不住地摇头。服装店的事，真让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徐清浦引来一个人：三十四五的年纪，矮胖矮胖的，团团脸，光着头，穿一套灰布中山服，说起话来很幽默。他见了我朗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开口就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相见，不胜荣幸。”随后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林竹栖。”

过去经常听到清浦谈起有关林竹栖的情况，他是云阳人，同清浦在杨森办的万县军事学校同过学，当时朱德、陈毅正在那里当教官。毕业后他当了本县团练局长。时值北伐，他经常带着队伍到四乡去打土豪劣绅，不顾情面地杀了几个大恶霸，震动了全县。老百姓说他有胆量，封建老头子骂他是“疯儿”，土豪劣绅更是恨之入骨，骂他是“危险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四川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劣绅们联合起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他关进了万县监狱。经人保出来后他又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暴动，又坐了一年的牢，其中几次都险遭杀头。幸亏他的几位要好的同学身居要职，从中周旋，才幸免于死。

林竹栖生性开朗大度，在官场混了一场，自己两袖清风，连惟一的儿

子也养不活，寄在妹妹家里。后来给雷忠厚当了参谋长，这时就与玉璧认识了。以后雷忠厚、李荣华靠拢我们，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军入川时，他当时是下川东民团总指挥。一看红军占领城口、万源，就准备带领下川东四十几个中队的民团到开县杨柳关起义，与红军会师；后因被内部叛徒告密事败，又几乎被捕。清浦和我会到李荣华和雷忠厚时，就经常摆他的龙门阵，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万不想在今天见了面。

林竹栖的到来，使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接替服装社的最佳人选吗？这人生性爽直，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也多，同雷忠厚、李荣华又是老交情，再加上个徐清浦，重庆的事情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当下我们就商量，清浦觉得很合适，林竹栖也满口答应。我们高高兴兴到隔壁“四海丰”吃了顿饭，我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

腊月，我回李子坝，陪两个孩子好好玩了两天，就起程回华蓥山了。

宝顶宣誓

正是腊月十几头上，天气很冷。我穿了一件旧的青布棉袍，头上包了一根青丝帕，装成一个病人，同李士民一道，喊了一乘滑竿，赶到太平场，住到我们一个老王同志的家里。

这里是罗平精的老家。谈起罗平精牺牲后的情况，老王只是叹息，说他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手下的人大多上了山，这次也有少数逃回来的，都被夏马刀的人捉住杀了。我问起他的女人和孩子，老王摇摇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由得想起罗平精临刑前托给我的事情，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清晨，老王喊来短程滑竿，我们走一截，换一乘，经过赛龙场、肖家场、罗渡溪……都是走的场背后的小路。过去在这些路上，总是大摇大摆的，现在革命失败了，路上冷清清的，见到的都是些生人，偶尔一两个熟面孔，有的把头转过去，有的站着想喊我，又不敢开口。我干脆用铺盖蒙着头，闭着眼，想那些难忘的往事……到了罗渡溪场背后，把滑竿打发走了，我和李士民步行，赶到太阳坪家里，已经夜深了。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手抖抖的，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她老人家在桌边坐下，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

玉喜来了，哑坐了一阵。才把我引到了门前的黄桷树下，指着树前的一块平地说：“哥哥的尸体，二姐夫他们几个偷回来了，暂时浅埋在这里，怕敌人知道了，不敢堆坟。”

我一看，这哪里是坟，分明是一块刚播下种子的松土。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腊月的寒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沙沙地摇动。我站在这里，就像站在玉璧的面前，我在心里对他说：你拿着枪杆和他们斗了一辈子，难道死了还躲他们不成？

玉璧在我心里微笑，不回答我的话，却说：“玉屏，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

我坐下来，捏了一把松软的泥土，就像捏着他温暖而宽厚的手。我在心里说：“玉璧，我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那封信刻进了心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玉璧仍然微笑着，说：“玉屏，你成熟多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的坟上，喊着：“玉璧，你英雄一世，怎么会死在这姓曾的手里？总有一天，我会提着叛徒的脑袋来见你。”

玉璧仍然很平静：“玉屏，你回过头去，看看你身后站了多少人啊……”

我捏着一把眼泪浸透了的泥土，慢慢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吹得更紧，玉喜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嫂嫂，莫受凉了，回去吧。”

回到屋里，母亲坐在孤灯前，泣不成声。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有我在，就有为玉璧报仇的那一天。”说着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和李士民一起上山了。玉喜拿了一把燃着的香火，送我们一程。

十年来，白天黑夜，上山下山，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也记得清，数得出。走了一截，叫玉喜转去，把香也弄熄，丢了。下了雪，路上滑溜溜的，黑夜里对面不见人影。我沿着荆棘丛生的毛狗小路，攀着枯藤，抓着小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李士民在我后面跟着。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密林，进了乱草丛生的背静的山弯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问：“谁？”

我立即听出是李仲生的声音。脚步声乱了，还夹杂着笑声和呼喊，李仲生、陈仁勇、范永安带着人把我迎住，七嘴八舌地说：“大姐，我们在这里，等了两天啦！”

大家拥着我，把我们引进向老大的家里，我却在这“家”门口愣住了。这是什么家啊：几根竹子搭着人字架。上面盖了些杂乱的茅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石头搭的灶，灶上搁了一个半边锅。一个烂箩筐里铺了些棕丝，里面放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裤子也没有穿，坐在火堆旁边。

我心里很难受，向老大却笑着说：“大姐，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仲生也叹息着说：“是呀，敌人把山边的房屋都烧光了，老向的大女儿大毛为了去抢一床破铺盖，也被烧死了。这是临时搭起的一个茅草棚。前些时候敌人搜山，向大嫂才生产三天，只好带着婴儿躲在崖洞里，又冷又饿，得了产后寒，前几天也死了，留下这两个孩子。

老向也够受啊！大姐，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山后慢慢地谈吧！”

天亮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猫儿寺庙前。庙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嘴巴，被子弹打烂了；前面那块过去同志们下操的草坪，长了齐人深的杂草。一进庙门，法智跑上前来，连连喊了两声“大姐”，就不做声了。我望着法智，又想起法慧他们往年练武的情景。

法智引我到大殿上，指着一根柱头，说：“徐老师父就是被绑在这上面，被敌人当靶子打死的。”我看柱头上，还留着无数的枪眼和黑黑的血迹。

我们在柱头前站了一阵，抬眼望见宝顶上的那一杆大红旗，仍像十年前一样随风飘舞。

这旗子，是夏林到广安买来的一匹大红绸，由我亲手缝制的。当时玉璧看了，说：“第一次起义时，叫你缝镶白边的杏黄旗，你不高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现在，玉璧牺牲了，夏林牺牲了，还有许多保卫过这面红旗的同志都牺牲了。可是这面红旗还在。

我们站了一阵，走出猫儿寺。庙前庙后的山坡平地上，长起了绿油油的青菜萝卜，在雪地里分外醒目。我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根刚破土的麦苗，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竹林地，陈仁勇站住了，说：“请进屋。”我四处看了一阵，说：“屋在哪里呀？”

陈仁勇笑笑，领我走进竹林，将面前的一排竹子像拔筷子一样轻轻拔去，面前就出现了一个两尺多宽的门洞，里面是足足有两丈多宽的一间竹棚子，两边的竹尖连拢，就成了棚顶，四周都绑上了茅草和竹叶，在密不透风的竹林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棚里的一间小床，也是竹子搭的，上面铺着厚厚的茅草，还有一床草席，一床补丁重补丁的毛蓝布的铺盖，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草席上。竹棚里还有一盆燃着的火炭，一进来就觉得暖洋洋的，和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陈仁勇说：“怎么样，大姐，这屋子比你在重庆的洋房子舒服吧？热天不用电扇，冬天不用炉子，晒不了太阳，淋不了雨，四面八方都可以开窗子，东南西北风任你吹，空气新鲜，光线充足，早上有麻雀闹林，晚上听虎豹叫吼，要大要小，随你修盖……你看，”他领我从棚子后面出去，这里紧靠一片石崖：“居高临下，易守不易攻。前边呢，靠着小路，可进可退，这就是大哥说的……”

有人捅了陈仁勇一下，他突然停住了话头，只是看我的眼色。

这时候，外面闹嚷嚷的来了许多人，谭老五提了双麻窝子草鞋，递给我说：“大姐，快穿起，山上冷，谨防僵脚了。”向老大和唐俊清端来一沙罐闷锅饭，一盆野猪肉萝卜汤和一碗豹子肉，放在我的面前说：“大姐，你好久没尝过山珍野味了吧？这些东西补人得很呢。”

我站起来拉着唐俊清的手，说：“大家这样苦，还把我当客？来，一起吃！”说着就拉这个又拉那个，大家坐成了一圈。谭老五说：“同志们听说你要上山，都高兴得不得了。听李仲生说，你在重庆又累又急，身体坏了。大家就商量，你这次上山来，一定要叫你心情愉快，要把你的身体养好。”陈仁勇接着说：“我们商量定了，来了一个分工。你看这屋子，是谭老五领着人搞的；床呢，是向老大绑的；吃的野猪肉是范永安打的……”

范永安补充说：“你这床铺盖，是唐二嫂送来的。”唐俊清说：“提起这床铺盖，又要想起大哥了，这是徐老和尚将他的一床铺盖借给大哥盖的。大哥下山时，是我抱去请唐二嫂洗一下，准备大哥回来盖，谁知铺盖洗干净了，大哥不能回来了……”

本来都高高兴兴的，唐俊清这么一说，大家又不说话了，有人长叹一声，背过脸去用手揩眼泪。

我四处看看，问仲生：“唐二嫂呢？”

彭医生摇了摇头说：“大姐，你还不知道，唐二哥一家人死得才惨。今年春天，大哥死了不久，敌人来搜山。唐二哥和他的孩子、父母在家里吃饭，夏马刀的人进来了，把唐二哥拉出去，一句话也不问就杀了，他的父母去拉，也被杀了。唉，还有那个三岁的孩子，抱着唐二哥的尸首，也被砍成两块……唐二哥革命十年，一家人都死绝了啊。”“唐二嫂呢？她遭没遭？”

“没有，她当时正为一个伤员送药上山来，逃出来了，现在她和唐满妹在服侍伤病员，明天会来看你的。”我没说话，只觉得身上的血在往头上涌。

晚上，竹林地里燃起了几堆火，老战友都围着火堆，摆不完的龙门阵。自从玉璧牺牲后，敌人就放火烧山，老百姓们死的死逃的逃，山边成了一片

废墟。同志们没粮吃，没柴烧，天寒地冻的，也没有棉衣穿，连吃盐也困难。后来，大家各自捡起了自己的手艺，划腊蔑、编背篋、编箩筐、打席子、纺竹绳，有的还用棕丝编蓑衣，用蓑草打草鞋。百子洞的炭厂，自从把龚静之撵了之后，一直是我们的人在经营；敌人搜山停了些时候，现在又搞起来了，新近又开了几个炭洞子和石灰厂。山上的草药多，彭医生带头领了一个草药组，自己搞了一个药铺，还弄了很多药下山去卖，特别是大黄、半夏，又多又好又值钱。

我对几个党员说：“这么多同志的生活安排，多亏得你们苦心筹划。”

周辉同说：“住惯了也没啥。只是大哥牺牲后，敌人对我们更加狠毒，我们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想打又不敢打。大姐，我们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就是怕没有个主宰啊，现在好了，你来了，我们有依靠了。”

谭老五说：“当时，我们要去万源城口，和红四方面军一起打，他们几个头头把我们吼住；后来我又说干脆找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他们又说是没有得到指示；我们派到各处去联系的人都没有消息。大哥在时说我们要成立正式红军，准备同四方面军会合；现在红军走了，大哥死了，组织又没有找到，不知今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在这山上蹲一辈子不成？”李仲生说：“我们还有一个组织管着，心里不安逸还不敢乱说，有些人的怪话可多呢。他们说，我们过去是牛马，革命就要革掉牛马皮，现在军阀和土豪恶霸整我们比以前还凶，难道我们就不革命了吗？我们在山上住竹林钻崖洞，同野兽在一起一年多了，再要守到什么时候？……”

我碰碰只顾拨火的范永安说：“今晚上，你怎么不开腔？”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姐，我看到你，就想起了大哥。唉，我们在华蓥山蹲了十年，跟大哥没有分过左右，情如手足。我们过去只晓得不愿意受地主军阀的压迫剥削出来造反，另谋生路，是大哥教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引导我们参加了共产党，教我们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大哥常说苏联革命起初是如何的艰苦，后来终于胜利了，他说我们也会胜利的，哪怕有天大的困难……那天大哥下山时，我们送他，他说不送了，我顶多六七天就会回来的。可惜大哥回不来了，大哥没有看到胜利就死了……”

我说：“永安，不谈这个了，咱们谈谈别的吧。”范永安接着说：“大姐，听说蒋介石进川了。他的人要开到广安来，和刘湘勾结起来整我们，我们就这样等着挨整吗？我们怕什么？只要你大姐站出来，华蓥山上下马上就会涌来成千成万的人。敌人杀了我们的大哥，还有你；杀了我们那么多父老兄弟，还有我们，我们就是种子！这样苦的日子，我们以前也有过，不稀奇。只要你今天说一声，我们明天就敢把队伍扯下去，把龟儿子些打个屁滚尿流……”陈仁勇把范永安往后一扯，挤进来说：“老范，你的苦诉完了，该我来说了吧？唱戏嘛，也该一人一板地来嘛。”

仲生嗔了他一眼：“你这个快乐神，还是这么吊儿郎当的。”

陈仁勇不服气了：“什么叫吊儿郎当？你们都要学学我。我们自己不快乐，岂不是快乐了敌人？我都是差点死过一回的人了，老天爷不收留我，就是留着我跟他们作对！”

大家正说得热闹，山下忽然出现了一溜火把，向我们这边过来。李仲生高兴地对我说：“一定是刁大哥，他们约好昨天就要来的。”

火把到了跟前，我一下子愣住了：火把下站着刁仁义、陈亮佐、徐清浦，而站在最前面的，竟是李荣华！

我迎上去，握住李大哥的手：“李大哥，你也来了？”大家在火堆边坐下，李大哥说：“我早就该来了。当年我就跟廖大哥说，我要上来，我能和他搭伴。你们这么多人，只有我走路走得过他，一天二百里。我们又谈得拢，打仗的事情也好商量。可是他不同意，他说我有声望，在重庆又有关系，不上来起的作用更大。唉，现在我上来了，可他又不在了。”

我说：“李大哥，你上来，恐怕大嫂她……”

李荣华一摆手：“玉屏，你别大嫂大嫂的，那女人，就像廖大哥常说的，是为了面包问题，她就是为了面包，为了钱才跟我的。她怎么会真心爱我？我为什么又要万事都依着她？我现在只要你，只要你们在座的各位弟兄了解我，只要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我就死而无怨。”

从现在起，我不住重庆了，回广安老家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们只管说，我拼了这条命也要帮忙！”

大家一阵掌声。又摆了一阵，眼看快天亮了，仲生、辉同他们和刁大哥说了几句什么，刁大哥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站起来，把我拉到一边。说：“玉屏，大家有点心事，要我来问问你。”

我说：“刁大哥，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他长叹了一口气：“现在廖大哥不在了，你拖着两个娃娃，人又还年轻，你会不会、会不会……”

我一听，什么都明白了：“你是问我会不会再去嫁人？”刁大哥点点头，支吾说：“玉屏，我们都晓得这是你自己的自由，你一个寡妇家拖着两个娃娃是艰难，可是大家怕万一你要是嫁了个不跟大家一条心的，会不会……就不革命了？你要晓得，我们这里的这么多人，都是把你当成了廖大哥的人，现在也只有你才统得起来，要是你不管了，这支队伍就真的完了哟！”

我转过身来，看着火堆边的同志们，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他们都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和革命联在了一起，和他们的廖大哥连在了一起。如今玉璧不在了，他们就这样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像玉璧一样，带领他们，把这条路走到底。

我能担起这个重任吗？就像刁大哥刚才说的，我，一个才三十五岁的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我目光扫过他们一个个的脸，扫过这些满是沧桑的脸。这支队伍，这支由我和玉璧，还有刘铁，还有许多人一手拉起来的队伍，这支在华蓥山区转战了十年的队伍，这支面临着绝境的队伍，在等待我的回答。

十年了，该走的走了，该散的也都散了，就只剩下了这些人。可就是他们，在人们心中播下了那么多充满希望的种子，他们相信了共产党，他们愿意跟着我们共产党走，不管路有多么艰难，也不管这些共产党人是男人还是女人。难道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在这关键时刻不管他们？可这还是有这么多人的一支队伍啊。现在红军北上了，领导们走的走了，牺牲的牺牲了，全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长期带着这么大一支队伍，往哪里走？

篝火熊熊地燃烧着，火光把每一张脸膛都映得通红，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我又想起了当年我和玉璧在那只小船上说的话。是的，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完全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场面，可是我说了，我要和玉璧一起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不管前面有多么艰难。还说了，我们这一代走不完，还

有孩子，我们祖祖辈辈走下去，看谁能斗得过谁。

如今玉璧他走在了我的前头，难道我就……

我咬咬牙，一转身走到大家面前，说：“刚才刁大哥跟我说，大家愿意推我出来领这个头，好继承玉璧的事业，和大家一起革命到底。我现在给大家表个态，我陈玉屏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不嫁人，我要和大家一起，和军阀反动派斗争到底！”

火光中站出了一排排墙一样的身影，爆发出一阵欢呼。因为我要回来，仲生他们把该通知的人员都通知齐了。大家聚在猫儿寺内，开了两天的会，作出了六点决定。

一、提高警惕，加强团结，防止坏人破坏，在山上坚持等候上级指示。

二、不增加枪支，只增加子弹，将枪械修理厂恢复起来，搬上山，没有吃的，也不能变卖枪弹。

三、在山上生产自救，打土豪，开仓济贫，解决生活问题。

四、恢复山边的联络站，打通邻水、大竹的交通要道，帮助附近农民干活，建立广泛的群众关系。

五、派范永安带领一部分人转移到大竹后山，建立根据地，作我们的退路，并把伤病员迁去，彭医生、唐二嫂负责照顾。

六、将山上队伍整编成一个大队，由周辉同、李仲生负责，其他领导人分赴附近各县清理队伍。

最后，决定集中山上全体战斗员，在宝顶寺前的欢喜坪宣誓。

清早起来，我和刁仁义、李荣华、徐清浦一行二十多个人，朝山上走去。天气很好，遍山遍野都是雪，白得晃眼，长长短短的冰棱子挂在树上，透亮。前面开路的同志，把雪都铲干净了，露出了清清爽爽的一条路，远远看去，半山腰里一抹云雾。仲生见了，说今天要出太阳。

走到欢喜坪，太阳果然升上了宝顶寺的塔尖，阳光透过云雾，折射出一道隐隐的彩虹，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欢喜坪上燃着许多火堆，周辉同、陈亮佐他们和大家一起，正忙着往火堆里添柴，摆凳子，一见我们来了，都跑过来拉的拉，扯的扯，让我们上前排坐着。陈亮佐说：“几位大哥大姐先到台子上看看，布置得要不要得？”

那面红旗，挂在一根大楠竹上。红旗下是用九张方桌搭成的台子，四棵刚砍来的大柏树，栽在台的四角上，沿台口还立着一排松枝柏杈。台上的方桌上，点了九支大烛，并排放着三支大香，一把雪亮的马刀系着红绸，放在香的旁边。我问陈亮佐：“台口为什么不朝着东方？”

亮佐说：“我们中央红军都到陕北了，当然要朝着西北方。”

我们下了台子，看见唐俊清抱了一大卷白纸上，压在台口，白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烈士们的名字。我逐一看去，第一张写的玉璧、老刘政委、刘铁、金华新、唐庆余、王道纯、刘昆仑……都是一些主要领导人；其他几张就是夏林、陈伯斋、僧法慧、僧法能、谭之中，杜仁杰、唐老六、何明轩、唐裕德、李老么、罗平精、徐老和尚……我知道，这些名字都是这几天山上的同志们凑出来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大纸，足足有上千人。他们中间有参加起义的战斗员，有支援我们的群众，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刑场上，有的被沉河，有的被活埋。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有群众，有世代做牛马的长工，有终年辛苦不得一饱的农民，有长年累月在活棺材里的炭厂工人，有在烈日暴雨中拉船的纤夫，有石匠、木匠、泥水匠、染匠、剃头匠，

有裁缝和医生，也有博学的知识青年，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有刚出世的婴儿，有卧病不起的老妈妈，有打富济贫的好汉……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牺牲了多少人，这密密麻麻的几张大纸，抵不上敌人杀害华蓑人民的十分之一啊！

我转过身来，向山下望去，开会的同志一个个从云雾中走出来，有的穿着很旧很烂的长袍短褂，还有的披着蓑衣，脚上大都穿的用蒲草打的草鞋，见了我都围着说长说短的。李仲生突然碰碰我，说：“唐二嫂来了。”

我连忙拨开众人迎上去，只见唐二嫂扶着一位老太婆，后面还跟着一些披麻带孝的女人和孩子，向我走来。唐二嫂一见我，就背过脸去，眼泪像珠子一样落下来，浸湿了衣襟。我拉着她冰冷枯瘦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擦擦眼泪，抬起头来，对我吃力地笑笑，把身边的老太婆推到我面前说：“大姐，这是李老七的母亲。”

李老七是夺了一把马刀，砍死了几个敌人之后才被乱刀砍死的。他的妻子、妈妈和妹子躲在粪坑里才逃出来。她们看见我，都哭。她们身后的孤儿寡母们，顿时哭成一片。我说了些安慰的话，让唐二嫂带着她们在前排先坐着。山边的一些老农民和炭厂的工人也来了，五十多岁的张老大走到我面前，很激动地说：“大嫂啊，廖大哥死了，我们大家屋里都死了人，我们都拥护你，你要带着大家报这个仇啊。”

云雾散开了，太阳照到欢喜坪上。陈亮佐招呼大家安静下来，请烈士家属在前面的几排竹凳上坐着，其余的同志站在后面，接着把手一挥：“奏乐！”

由陈仁勇临时组织的一支乐队，把庙里拿来的锣鼓敲了起来，其中还夹着笛子、箫之类的，一群队员朝天鸣放火药枪，枪声在山谷间荡起回声，惊起一群雀鸟，漫天飞舞。过了几分钟，喧闹声平息了，陈亮佐又喊：“全体肃立，向烈士敬礼，向党中央领袖毛泽东、朱德敬礼！向中央苏维埃政府敬礼！向廖大哥、老刘政委和其他死难同志敬礼！”在场的人都默默地站起来，向着西北方恭恭敬敬地鞠躬。

陈亮佐主持会议，说了些鼓舞人心的话，台上台下口号声响成一片。最后他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的大哥死了，但是大姐回来了，现在我们请她表示态度！”说完就跳下台来。

台下噼噼啪啪地拍起掌来。我走到台口，向烈士名单鞠了一躬，然后站上台去。

台下稀稀落落站着两三百人。我们这支整整战斗了十年，打得罗泽洲、杨森焦头烂额的队伍，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人，其中还包括一大群孤儿寡母。他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他们手中的枪，或许只有一颗打算留给自己的子弹，或许连这最后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都站在这里，像一尊尊雕像，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的面前。冬天的山风撩起他们草一样的头发，背后是一堆堆燃得很熊的篝火，火光上空弥散开来的烟雾，将他们身后的山景幻化成迷茫的一片。

我站在那里，停了好一阵才大声说：“同志们！我今天在红旗面前，在死难烈士的面前，在你们的面前宣誓：我带着玉璧留下的两个孩子，孤儿寡母也要闹革命，决不半途而废。我请在座的同志们监督我，今后若有三心二意、背叛革命的行为，就有如此香！”说着拿起马刀，把三根大香一下斩成两段，又指着刁仁义、徐清浦、李荣华他们说：“我请几位大哥监视我，今

后若有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志、对不起玉璧、对不起后人的行为，也有如此香。”说着又是一马刀，把剩下的三根半截香，也斩成了两段。

刁仁义挥着手大声说：“加香来加香来！”

陈亮佐抱来一大把香放在桌上。没有风，烛燃得很好。刁大哥向着烈士名单行了三个礼，然后跳上台去，大声说：“……这多年来，廖大哥、老刘政委和其他许多同志同我们在一道，风里来，雨里去，敌人的刺刀架在颈项上，也是英勇不屈。他们是英雄、是好汉，死得光荣，死得值得！他们死了，我们还在，大姐还在。大家都看到了，大姐是女的，还这样和我们一道同甘苦共患难，我刁仁义虽然还不是党员，也决心自始至终革命到底。今天我也在此，对天盟誓：天昏昏，地冥冥，如我今后有反意，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死难的同志、对不起大家的事，也有如此香。”他一马刀斩下去，香头在空中跳得老高。

李荣华脱下身上的毛皮大衣，穿一套呢制服，站在台前很激动地说：“弟兄们，我很惭愧，十年来我只是在后方做些枪弹的供给工作，没有同大家一样，上山打仗。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也要革命，我请在座的各位大哥和全体兄弟们监督我，今后我李荣华若是三心二意，不跟共产党走，死无葬身之地！”

李仲生也代表全体战斗员上台宣誓：“不管天大的困难，我们决不下枪杆，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住华蓥山的红旗！……”

接着徐清浦、周辉同、陈亮佐他们都一一跳上台去斩香盟誓。唐二嫂最后跳上台去，举着拳头高喊：“我们要报仇啊！——”

台下一个叫邓大爷的老头子站起来，抖着双手颤巍巍地说：“你们大家都说要报仇，我也要报仇啊，我一家人被杀光了，我活到八十岁也要把仇报了才死！……”

起风了。山风卷动着竹竿上的红旗，满山的松柏竹树，隐雷一样轰鸣。

晴天惊雷

宣誓的第二天，大家就行动起来。范永安和唐二嫂、彭医生一起，带着伤员向大竹后山转移；周辉同和李仲生着手组织山上的同志，一边生产，一边准备对付敌人的“清剿”；我和刁大哥带着一批人，下山到各县清理失散的人和枪。

天气晴和得很，就是冷。我们大家都化了装，谭老五和唐俊清还是扮成鸡鸭贩子；刁大哥穿了件质地很好的马褂，成了一个富富泰泰的地主；陈仁勇成了我的长年，这个角色以往都是夏林扮的，现在交给了陈仁勇。我也扮成了一个男人，上穿一件海苍蓝的长衫，下着一双剪口布鞋，头上戴了一顶灰色的博士帽，还拄了根山藤做成的拐棍。我人矮，又面嫩，他们都说我像刁大哥的大少爷。临行前，李仲生给我们送行，端着鸡血酒的手抖抖索索的，半天才说：“大姐，你要保重，我们没有了大哥，可不能再……”

陈仁勇一看，又想说笑话，可是话到了嘴边，没说出来，只是伸手摸了摸腰上拴的红绶。我们每个人不但都带了枪，还都拴了红绶，大家心里都

明白，这一去生死未卜，开不得玩笑。

我盯住每个人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遵守一个原则：保存力量，不准蛮干！完了之后，到陈明宣的栈房里等我，他那里是个小场，背静，还没有驻兵。”

大家分散着出发了。我和几个同志到处走了一圈，赶到陈明宣那里，已经是大年三十了。谭老五把我带到陈明宣的栈房里，自己当天就去了铜梁。陈明宣夫妇是自己人，可是不认识我，只是听从谭老五的吩咐，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等人。

晚上，陈仁勇回来了，一进屋直喊着饿坏了，跑进厨房端出两大碗稀饭，唏里呼噜就吃了个风卷残云。我坐在旁边等他吃完了才问：“你跑了这么几天，情况怎么样？”陈仁勇说：“杜仁杰牺牲之后，他的那个当乡长的恶霸叔父就倒向了军阀，把肖家场和赛龙场的口子都扎起来，抓了我们近百人，好多人牺牲了。但是杜仁杰的枪都藏在几个贫农家里，没被发现，他手下剩下的那些人也都潜伏下来了。我悄悄找人把窖里的五十多支枪都起了出来，找了几个可靠的人运到山脚下，仲生派人来接的。肖家场的同志们都要跟我们上山，正发展人呢，说要跟着你去报仇。”“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唉呀大姐，你莫要考我了，跟了你这么多年，这点原则性还不晓得？我跟他们说，坚决不准乱动，等候上级指示。”接着又小声说了一句：“只是不晓得，这上级的指示好久才来得到哦。”

我没理会他后面的那句话，想了想说：“不知道现在罗渡溪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这一片，可是我们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根据地啊。”

陈仁勇说：“大姐，要不要我回去看看？”

我叹了口气说：“算了吧，你差点在那里死过一回了，不要去了，犯忌讳。”

陈仁勇嘿嘿一笑，说：“大姐，你还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呢，还迷信！阎王不要命，谁还敢要我的命？留着我跟他们作对呢，这是天意！只是……”

我说：“只是什么？”

他嘿嘿一笑，支支吾吾说：“只是我的枪丢了。”“你怎么会把枪丢了？咋不把脑袋丢了？”

“我没办法，如果当时不丢枪，恐怕只得丢脑袋。大姐你别乱猜，我是看见敌人来了，到处抓人，连那些出门人手腕子上拴的一根避邪的红丝线都说是共产党的暗号，你说容得我的那支枪？我灵机一动，就把枪丢进了水田里，心想等他们走了再去捞。可是没想到那些龟孙子就是不走，我又不走，等到天黑了摸回去，硬是找不到了……”

当时我们有规定，就是丢了脑袋也不能丢枪，这个陈仁勇他……可是又一想，难道真的让他去白白丢了脑袋不成？可是我们的枪，尤其是有子弹的枪这么缺。出来的人，带着枪是很危险，可是少了枪，又怎么行？

陈仁勇一咬牙：“大姐，我保证从他们手里去搞支枪来，将功折罪好不好？”说着一转身，就要往外走。我说：“回来！”接着就从腰上抽出一支枪来，掂了掂，递给他：“这是李大哥给我的一支枪，这么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从没离过身，你就先拿去用吧，什么时候有枪了，就还给我。”陈仁勇接过去，也掂了掂，一下子插进腰里说：“大姐你放心，要不了十天半月的，就会完璧归赵。”

说完一猫腰出了门，哼着小调走了。

我摇摇头，这个陈仁勇啊，什么都不当回事，既讨人喜欢，又让人担心。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吃过了早饭，陈明宣家的老太太邀约我们上街去转转。我心里有事，不想去，却经不住老太太半拖半劝的，转念一想，老在屋里呆着也闷得慌，再说这个清清静静的小地方，想来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跟着上了街。

这个场镇，确实小，就一条街，除了两间杂货铺和一家茶馆之外，只有几间破草房。这一向风声紧，有钱的人都躲进碉楼去了，街上除了穿红着绿的娃娃们，就是些妇女和老人，见我都有些诧异。一个戴毡帽的人问一个老头：“张大爷，您看这小伙子是哪里来的？”

那老头含着叶子烟杆骂了一句：“不晓得，倒男不女的样子，活像一个怪物。”

我一听这话不对，连忙回到了陈明宣的栈房里。晚上，和陈明宣一家人吃过年饭，夜已经很深了，我和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到往年的今天，虽然不一定全家团聚，但总还有个家，总还有个人在；现在玉璧死了，两个孩子托给了别人照管，今后这个家，也就名存实亡了。又想到当年和玉璧恋爱的时候，山盟海誓的，以后这么多年出生入死，从来就没想到……没想到他却真的走在了我的前头。我想着想着，眼泪又浸湿了枕头，不禁长叹一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朦胧中，觉得好大好大的太阳，晒得我浑身燥热；突然又听得几声枪响，我翻身坐起来，透过山墙，发现隔壁厨房火红一片，接着噼叭爆响的火苗轰地窜上了房顶。我急了，一手抓过帽子扣在头上，就跑去打陈明宣夫妇的门，一边扯开嗓子高声喊：“火烧房子啦，快起来救火啊！……”

尖声尖气的喊声惊动了巴掌大的乡场，场头场尾的人都赶来救火，三下两下就把火打熄了。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陈明宣感激得不得了，到处磕头作揖地道谢，直是怪自己做了年饭没把灶里的火闭好。我却听见有人在一边悄悄地说：“这小伙子不就是白天逛街的那个少爷吗？好像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了？”又有人说：“少爷？声音咋这么秀气？”我心里一惊，连忙退回屋里，才发现事情要弄糟。咋办？走吗？大家都要到这里来找我；不走吗，出了事咋办？要不然改成女装？不行，面貌和声音都没变，别人更要怀疑，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犹豫之中，上午过去了，没有人来；眼看下午又要过去了，还是没人来。我正在着急，李大哥手下一个叫张二娃的来了，说广安那边郑宁、郑涛两弟兄和敌人冲杀得厉害，已经牺牲了不少人了；雷忠信也被敌人杀红了眼，正在集合队伍。李大哥招呼不住，叫我赶快去一趟，晚了说不定就会出大事的。

我正要说什么，就看见陈明宣一头冲了进来，喘着气说：“不好了，保长跑去报了官，说我的栈房里住了个倒男不女的人，可能是华蓥山上下来的，现在上面来了十几个兵，都进了场口了……”

张二娃一听，忙把枪摸出来，两眼盯住我。我说：“莫慌，往河边跑。”一边给陈明宣交代：“我们的人来了，叫他们到广安李大哥的家里来找我，其他的你说统统都不知道。”

冬天天气短，虽说离渠河只有十五里，我们赶到河边时天已经黑尽了。沿河坝跑了一段路，找到一只船，跳了上去，一路催促赶到合川周家花园，到了唐俊清家。俊清到营山、渠县清人清枪去了，他的女人彭德敏在家。我

怕人多了影子大，叫张二娃先走，然后自己和德敏一起，打扮成两个农家妇女的样子，到广安去找李大哥。

李大哥的家，离广安城不远，我和德敏到了广安城外，叫了两部黄包车，就喊到金家花园。

那车夫一声吆喝，就起了脚，一边跑一边问：“您二位也是奔丧去的吧？”

“奔丧？奔谁的丧？”

“李荣华李司令呀。”

“李司令？！李司令他怎么啦？”

“你们还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李荣华李司令，死啦！就前天的事。”

我犹如五雷轰顶：“李大哥死了？怎么死的？”“我们也不清楚，听说是……唉，狠毒莫过淫妇心啊。”

是他女人陈素英？一定是这个坏女人干的好事！我早就听说这东西不正经，李仲生在重庆住李大哥家的时候，她就想勾勾搭搭的，仲生一气，就搬出来了。李大哥知道了，当时就大发脾气，把她撵回了老家来。

我连忙喊住了车夫，愣在那里。

车夫莫名其妙：“先生娘，你们走不走啊？”

德敏看着我，嚅嚅地说：“大姐，还是去看看吧，他是俊清的舅舅啊，再说俊清也是说好了在那里等的，要是……”

是的，是得去看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大哥出了意外，我不能不管，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同志。于是我一路催促，赶到了金家花园。

李大哥家的大院子里，人来人往，他的侄女儿陈玉珍一见我就哭得像个泪人儿：“三嬢啊，大爷天天都在念你，你咋才来嘛？”

李大哥还停在床板上，眼睛都没闭上，一脸的怒气。我想起不久前，他还在华蓥山上的宝顶寺前和我们一起宣誓，说从今后他要回广安来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几天前他还在广安地界上上下下地跑，一边清理队伍，一边托人给我带信，要我赶快到广安来，说许多同志太冲动，要是不及时做工作，还要牺牲人……我越想越痛心，一头扑在了床板前，叫了声“李大哥呀——”

旁边有人把我扶了起来，我擦干眼泪一看，是李荣华的弟弟李荣群。这是个非常忠诚的党员，因为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性情又耿直，被大家叫做“小张飞”。他哥靠近我们，他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荣群把我扶进内屋，一问，果然是他那嫂子陈素英作的孽。她从重庆回来之后，就和李大哥的一个隔房侄儿李文清勾搭上了。这次李大哥清理队伍回来，听说了不少闲话，就把她喊来审。她见事情败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当时就和李大哥吵了起来，说：“我就是和李文清好，又怎么样？你要是来挡，我们就去告你李荣华通共！李大哥那性子，怎么听得这样的话，心头一股火起，当时就气得口吐白沫，中了风。第二天李荣群带了人赶来，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了他兄弟一眼就断了气。”

我不由得仰天长叹：“李大哥呀，你英雄一世，豪杰一世，还有多少事情需要你去做，怎么会死在这个贱妇人手里……”

正说着，陈素英进来了。一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声“是玉屏来了吗”，就嗲声嗲气地叫李荣群去给她烧烟泡子。李荣群一瞪眼睛说：“大嫂，大哥尸骨未寒，你还是自重些好！”那女人一扭腰，白了我一眼就要往外走。突然看见德敏，就说：“德敏你来，你来给我烧。现在你舅舅不在了，你总

不会就认不得我这个舅娘了吧？”

德敏愣住了，看着我。我点点头说：“你去吧，她是你舅娘，应该的。”

她们出去了，沉默了一阵，我说：“荣群，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荣群说：“要按我的脾气，自然是一枪打了这贱货。可是我哥和我商量好了的，要等你来，我们的好多同志都要在这里会合。再说来吊丧的人这么多，事情决不能闹大了。按乡里的规矩，一般人停丧要停满三天，像我大哥这样有地位的人得停满六天。这六天中我们许多同志要来，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等，一定要出事的。再说人来了，你也好做工作。至于警戒，我带了三十多个人来，步哨一直放到了广安城里，一有什么事情，再撤也来得及。那贱妇，我叫玉珍看着，现在再加上个德敏，只要她敢乱动一下，就毙了她。”我说：“要是李文清……”

荣群把张飞眼一瞪：“他狗日的敢！现在广安城里都在说我哥冤魂不散，正要找他呢，吓得他请了端公道士成天在屋里做道场消灾。”

晚上，我们里里外外放了哨，几个人关在里屋研究情况。觉得李大哥死了，那李文清一定急着要和陈素英做长久夫妻，只是现在碍着荣群带着这么多人在这里，死人又没入土，不好动手。可是他既然起了这个心，就不会放过这个得人又得财产的机会，如果我们久在这里停留，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看来李大哥的丧事要赶紧办，办完了我们的人就撤，不然会出事，说不定这丧事还会给敌人造成把我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大约起更时分，哨兵引进两个人来。我一看，原来是谭老五，后面跟着马福林，一身衣服挂得稀烂，一见我就老泪纵横地说：“老辈子呀，陈仁勇他，他遭了！”我们都大吃一惊。

马福林直是摇头，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都是他看错了人，咋会想到亲亲的堂兄弟，一屋长大的亲骨肉，就看上了他的那支枪，那支快慢机，值三百多块啊。我记得他原先带的不是……”

我听得到着急，直说：“你别罗嗦了，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陈仁勇一到罗渡溪，就住在他那隔房兄弟陈从荣家里。陈从荣看上了他的那支枪，就起了心。先是好好招待，又是酒又是肉的，陈仁勇这几天走得辛苦，吃了点酒，一上床就睡死了。那陈从荣就、就找来一根棕绳子，把他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活活地勒、勒、勒……”

马福林老泪纵横，说不下去，只是摇头。我桌子上一拍：“陈仁勇那么大的个子，陈从荣怎么可能……”马福林说：“老辈子，我也打听了的，说是那该死的坏东西把绳子一头拴在门柱子上，一头他自己拉着，硬是黑了心地勒呀！听说陈仁勇也惊醒，可是已经迟了，憋着劲地挣扎，那么牢实的床横梁，都蹬断了两根。”

“那陈从荣呢？”

“他也没得好下场，他的女人听见响动，起来一看自己的男人竟然做下这样黑了良心的事情，就拿了把斧头，趁他在屋后的竹林里挖坑埋陈仁勇，一斧头就把他砍死在那坑边。接着他女人也疯了，在屋前屋后又哭又笑地闹了两天两夜，最后抱着那支枪，跳了渠河……”

多日的劳累，加上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气急攻心，两眼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急得大家好一阵着忙。我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拖不得了，要尽快发丧！”

第二天，李荣群就主持着办丧事。来往的宾客川流不息，祭幛挂满了

院里院外，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拖了好几里路长，引得广安城里城外的许多人都出来看热闹。同志们却在我的安排下，一个个分散着走出了李大哥家的后门。已经是初春，薄薄的雾气从青油油的麦土里袅袅上升，看来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只是因为兵荒马乱的，路上却没有一个人影。我和德敏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一个个慢慢消失在大路的尽头，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安排。

卖枪救人

根据大家带回来的消息，刁大哥已经把金滩丈八滩的人员安排好了，现在赶回了合川钓鱼台，守住渠河这条黄金水道，否则我们这些弟兄不但生活有困难，连生命也没有保障。再听说合川要换县长了，还得去抓紧做工作，不然今后会有很多麻烦。铜梁那边的情况不大好，有的人见大势已去，叫着要散伙，还想把枪拖走，幸亏谭老五及时赶到，才截了一部分枪下来，现在已经埋好了。马福林跑的顺庆那边看来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小坝子游击队毕竟是支很成熟的队伍了，很听招呼。李荣群的广安这边，他和李大哥本来都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加上这两天广安不少同志来奔丧，我们又安排了一些人进厂去烧炭烧窑；郑宁、郑涛两弟兄，总算是说通了，把他们手下那些扯得太红的人，一部分拉到渠县去，一部分拉到梁山去，没有组织上通知坚决不能乱动。罗渡溪那边，看来是不能再去人了，好在群众基础还可以，将来一旦有个什么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另外陈亮佐在邻水和大竹那边还没有消息，不过事情交在他的手里，十有八九是可以放心的，原来就说好他办完事情之后回刁大哥那里，不到这里来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通知已经送出去，所有的人都将不会再到这里来，只有唐俊清还没从营山、渠县那边回来，什么原因不知道。

我咬咬牙对德敏说：“敌人很可能要动手，看样子我是等不到俊清了。不过我想只要我们的人都撤了，敌人来搜不到什么，就会罢休的。你和玉珍千万要小心，这两天一定要到远一点的路上去拦住俊清，见了叫他赶快转移。这次便宜了这对不要脸的东西，帐留到以后再算。”

德敏抽泣着，不说话。

下山来这些日子，接连受些劳累风寒，加上这几件意外的刺激，我一回到屋里就两眼发黑，再也站不起来。我病了，发冷发热，头疼得要命，实在走不了了。李荣群看我这样，赶紧叫玉珍去给我拣药，决定再守我一天。

睡到半夜，突然听见一阵嘈杂，接着就是两声枪响。我翻身爬起来，跑出去一看，李荣群站在那里呼呼地出着大气，正指着陈素英骂着：“你个荡妇，老子这就打死你！”说着当真又举起了枪。

我一步上前，一把将枪夺了下来，说：“荣群，你要冷静啊，在这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你怎么敢……”

荣群说：“大姐，你不知道，刚才那李文清翻墙进来，就是她挡住我，把那狗日的放了的！”

我一听，心里叫声不好，连忙把荣群拉进屋里说：“你要赶快走，这里不能呆了，要出事。赶快把你的那些人都集合起来，不然就晚了！”

正说着，在外面放哨的人一头冲了进来，说：“不好了，房子都被包围起来了，好多人啊，都拿了枪……”

枪声已经噼噼叭叭响起来了，李荣群一边集合队伍，一边指挥着大家往外冲，我也扶着德敏一边还枪一边往外跑。敌人从大门插进来，我们连忙往后门跑，眼看天都亮了，才在一个背静的山湾里停了下来。人一急，出了一身的汗，反而觉得病轻松了许多，这才发现，我们和李荣群他们已经冲散了。

枪声停了，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对望了一阵，德敏突然拉住我说：“大姐，你不能丢下俊清，万一他回来，撞在他们手里……他跟你和廖大哥那么多年，你可不能不管他啊！”

我不知道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就说：“你别着急，我们回去看看再说。”

我们绕过山梁，悄悄爬上李大哥家后面的土坡，看见院子内外全是兵，围着房子转来转去的。我想了想，拉着德敏顺着山梁绕了好大一圈，到了玉珍的家里。我说：“德敏，任何人不会想到我们会躲在这里，你弄点东西来吃，然后赶快到大路上去，拦住俊清。”

玉珍和她的丈夫，李大哥生前都很喜欢，后来带到重庆，由我安排和陈文玉的船上做裁缝活，最近才和李大哥一起回来，打算处理了自己的一点田产就回重庆去。这房子处在山湾里，独门独户的，背静，因为也是要卖的，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玉珍也就没管它，加上李大哥出了事情，现在连晚上也住在金家花园，不回家。

可是这天晚上，她却回来了，一见到我就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三嬢啊，我就知道你们要是没跑脱，就会躲在我这里的。我给他们说：现在人都下葬了，我也该回去卖我的房子了。”

我问她白天是怎么回事，她愤愤地说：“就是李文清那个死砍脑壳的，几天没见到那婆娘，就等不得了。见我大伯的丧事办了，就不怕冤魂鬼来找他了，连忙去把那些兵都带了来，说金家花园里都是华盖山下来的共产党，有好多好多人和枪。可是一走拢，又怕打起来伤了他的心上人，就爬墙进来，想把那女人先弄出去，谁知道又被幺叔打伤了手膀子，差点连命都丢了。他现在气得咬牙切齿的，塞了些钱给那带兵的连长，叫他们在房子周围都放了暗哨，说总要等到两个共产党来垫背。”玉珍说到这里，拉着我的手说：“三嬢啊，唐大哥还没来，咋办嘛？”

德敏一向没有主张，听玉珍这么一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要哭。

看来如果唐俊清回来，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我一咬牙，说：“等吧，我们一定要等到他。”

一连两天，唐俊清都没音信，德敏天天到路上去等，夜深了才回来。玉珍按照我的吩咐，白天还是去“服侍”陈素英，晚上就回来给我们通报消息。我吃了玉珍给我熬的草药，觉得好了许多，只是走又走不了，急也没有用，只得成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据玉珍说，敌人那天和李荣群他们打了起来，荣群带着队伍撤到天池那边去了，还牺牲了两个同志。他们会回来找我吗？最好别回来，敌人在这里守得太紧了，回来等于自投罗网。唐俊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连音信都没有，他那么老练的人，该不会……唉，现在这种时候，还说什么老练不老练的，陈仁勇不老练吗？多少生生死死的关口都冲过来了，最后却……他临走的时候，还在哼小调！……

我越想越迷糊，夏林、唐老六、金积成、陈仁勇和许多人一个个从我眼前晃过，最后突然看见唐俊清血淋淋地站在我的面前，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大姐——”我惊醒了，一看，抓住我的却是德敏。她的脸色惨白，摇着我说：“大姐呀，俊清他遭了！”

我这几天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唐俊清落到了敌人手里。

唐俊清一路上听说李大哥死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不敢走大路，绕着小道来到金家花园。结果没碰上等了他几天的德敏，一头就撞了进去，一进大门就被几个人扭住。他一看事情不对，就说是来给舅舅吊孝的。可是陈素英和李文清躺在床上悠悠闲闲地烧着鸦片烟，口口声声说不认识这个人，于是敌人就认定唐俊清是华蓥山上廖玉璧的残部，把他吊起来打，打得死去活来的。玉珍看见人都快不行了，一下子跪在地上，求陈素英发发善心。陈素英把眼睛一瞪说：“你现在不听陈玉屏的话，成天来盯着我啦？这男人是你的什么人，你这么心痛他？那天放走了陈玉屏，还没找你算帐呢，你又来管闲事！”

我咬着牙，问：“现在呢，现在唐俊清怎么样了？”玉珍眼睛都哭肿了，抽抽答答地说：“敌人审了他一天一夜了，腿都打断了，可他一口咬定是李荣华的外甥。陈素英是后来才接的舅娘，是认不到，其余的什么都没说。敌人看实在是问不出个什么来，今天早上把他送县城了。人都瘫了，昏迷不醒的，还是用滑竿抬走的。李文清和陈素英现在高兴得很，亲亲热热跟两口子一样，我实在是看不得他们那个样子，我再也不回去了……”

德敏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的，非要去探监。我想新去的犯人看得紧，白天又怕遇见熟人，就让玉珍先去看看。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玉珍，叫她给俊清买点鸡蛋，还要买点狗皮膏药治伤，再去给他接一碗童便，受了重刑的人要吃点童便才好。我叮嘱玉珍说：“现在是人要紧，不要顾惜钱，他要什么叫他尽管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出来的。”

玉珍眼泪汪汪地点着头，然后转身要走，我又把她喊回来：“还有，你拿五块钱给典狱官，不然会不到人；另外还要买两条烟给狱里的难友，请他们多多照看。”

德敏在一旁噙着眼泪说：“大姐，你想得真周到啊。”

我苦笑说：“这还不是坐了一年牢房讨来的见识。”

下午玉珍回来，说都按我的吩咐去做了，灵验得很，当时就见到了人。唐俊清的伤很重，叫人扶着出来的。玉珍对我说：“俊清他没有口供，一口咬定自己是做小生意的，来给舅舅吊丧。俊清还说这里危险得很，随时都可能出事情，叫你赶快走。”

这个俊清呀，这么重的伤，还在想到我，我要是一走，他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剩下这几星火苗子，都是以一当百的英雄汉，怎么能够不管？只是现在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我手边又是一个人也没有，怎么个救法？

我想了一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心一横，把德敏和玉珍喊过来说：“你们两个把胆子放雄点，特别是德敏，你明天一早就到衙门口去喊冤，告他们。”

德敏吃了一惊：“告他们？告谁呀？”

“告李文清和陈素英。”

德敏一听，连忙伸出手来摸我的额头：“大姐，你是急糊涂了吧？”

我说：“德敏，你听我说，这样做是有些冒险，可是也不是没可能。现

在敌人是很猖狂，可是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介石进川之后，就想削弱以至吞并刘湘的势力，一直和刘湘在争权，越争越厉害。现在驻军保甲这一摊子已经被蒋介石抓在了手里，派了许多特务，搞了许多培训班，中心的任务就是限制刘湘的地方势力，抓共产党，怕的就是我们和刘湘联起手来，我们的弟兄大都是这些家伙勾结起来杀的。可是政府这一摊就是像衙门公务之类的，还是属于刘湘管，也办了若干的培训班，中心任务就是反蒋介石的吞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反蒋介石的就行。他们现在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你们想，李大哥是在地方上有声望和势力的人物，还挂着杨森委派的什么司令的头衔，现在他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只要舆论起来了，谁还会去护着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德敏一个柔弱女子，去沿街喊冤，告他们栽诬好人，看衙门里怎么说。”

德敏看着我，死劲点着头说：“大姐，你都是为我们好，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我听你的。”

于是我连夜做了一个呈文，里面说明唐俊清是受人陷害，遭了冤枉。第二天上午德敏前胸挂着这张状纸，后背上贴着一张黄裱纸，上书斗大的一个“冤”字，由玉珍扶着，在县城里的大街小巷一路喊冤。凄苦的喊声惊动了城里形形色色的人们，李大哥头天出殡、第二天就被抄家的消息，早已成为广安城里的街谈巷议。现在又听说他的侄儿被无辜拷打关押，侄儿媳妇蓬头垢面地出来喊冤，一下子就把德敏围得水泄不通，跟着她一路到了县衙，要看看这桩冤案到底怎么了断。

德敏在县衙门前击响了大鼓。法官闻声升堂，穿着黑衣服的法警站了一长串，把前来看热闹的人们挡在了大堂下面。德敏在大堂上喊着：“青天大老爷啊，你要给我作主啊！我那男人可是个老老实实的小生意人啊，听说他舅舅死了，天远地远地来奔丧，不过是尽他的一片孝心，哪里晓得一来连舅舅的面都没见到不说，还被无缘无故地打断脚杆，被关进了你的衙门啊！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晓得啥子叫共产党，只晓得老人们从小就教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那陈素英和李文清勾搭成奸，害了我舅舅这样的大好人，占了他的房产业，又来害他的侄儿，他们就真的不怕上天来报应？伤天害理的人，落井下石的人，都不得好死的啊！”……

德敏声嘶力竭的哭诉，引得大堂下面一片唏嘘之声。人们奔走相告，围的人越来越多。

法官把戒方一拍，就开始问案。

法官先说：“彭德敏，你说你丈夫受人诬陷，可有证人？”德敏一指玉珍：“这就是当场的证人。”

玉珍一五一十地把当时敌人怎么拷打唐俊清，俊清是怎么说的，李文清和陈素英两个人又是怎么说的，以及这其中的亲戚关系都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顿时堂上堂下一片喧哗。有两位老者递给法警一张纸条，请他传上堂去，然后转身走了。

法官看了看条子，点点头，然后一拍戒方：“照你的意思说来，他们真的是亲戚咯？”

玉珍一挺胸回答：“我敢拿性命担保。”

法官对德敏说：“那好，限你三天之内，交三百块大洋来，把你的男人保回去。三天之后，本法官概不过问。”德敏一听，当时就说不出话来。直到旁边有人说：“你还不快谢谢法官先生？你男人有救了！”

下得堂来，有人悄悄对德敏说：“你还该谢谢刚才那两个递条子的老先生，他们都是李司令的老朋友，在地方上说得起话的人物。”又有人悄悄地说：“还有这个李法官，也和你那舅舅要好，一贯称兄道弟的，得道多助啊！”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第一步算是胜利了。可是要三百块大洋啊。三百块现大洋，现在叫我到哪里去找？那陈素英特别是李文清知道德敏把他们告了，一定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一时找不到钱把人取出来，远走高飞，所有的人都很危险。情况这么急，我们又都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我气得一跌脚，只恨当时不该拦住李荣群，让他一枪毙了那个烂婆娘。我突然碰到了腰上的枪，玉璧留给我的枪。

我轻轻地抚摸着这支“德国造”，想起当年我从玉璧手上夺过它来的情景。唉，那时候啊，真是孩子气，和他赌着气要学打枪；他只要一有空就教我，结果真的把我这个娇小姐教成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神枪手。现在，他不在了，见枪如见人，这枪就成了我的命根子，更何况跟着我随身不离的另一支枪，那支李大哥送给我的快慢机，已经随陈仁勇去了……

可是枪再重要，也不如人重要，我们就只剩下这么几个骨干同志了，我要是见死不救，玉璧他在天之灵也不会饶恕我的。

卖了它吧，玉璧，我把你留给我唯一的纪念物卖了救人，救一个十年来跟着你鞍前马后，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唐俊清，从今以后，你就留在我的心里吧！

德敏在一边看着我，知道我心里难过，就说：“大姐，要不然就当吧，少当一点钱，以后还可以取出来的。”我摇摇头：“少当一点钱？那不够的钱又上哪里去找？如今这世道即使是当了，我还能取得回来吗？玉珍，我听你大爷说过，有个什么叫金三少爷的人想买枪，你打听打听。”玉珍想了，想说：“是有这么个人，只是不怎么正道，公子哥儿一个。”

我说：“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他肯出钱就行。你就说是你的一个亲戚，急着差钱用，托你来问的。如果他要买，叫他明天中午十二点带上钱，到官山上的那棵大槐树下见面。”

玉珍点点头，走了。

官山，就是历来由官家划定的坟山，专埋死人的地方。那里坟包多，地形比较杂，那金三少爷要是起了坏心带了人来，我可以不见，要是真的打了起来也好隐蔽。第二天中午，我独自一人到了官山上的一个坟包后面坐着，远远地看着那棵老槐树。过了一会，玉珍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穿马褂的年轻人，气喘吁吁的，在老槐树下面看了半天：“人呢？”玉珍四面看看说：“还没到呢，等等吧。”

又等了一阵，我看清了后面确实没有人，那金三少爷已经有些不耐烦，我就从坟包后面走了出来。金三少爷见我是农家妇女打扮，也没在意，还在一个劲地往山下看，一边对玉珍说：“你的那个亲戚，到底来不来啊？”

我走到他面前说：“是你要买枪吗？”

他一愣，看着我说：“是啊。”

我把枪拿出来，当着他的面下了子弹，递过去说：“你看看货吧。”

他的那双眼睛还盯着我，半天才回过神来看他手里的枪，一惊：“哟，德国造！你、你这枪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你到底要不要？”

他忙说：“要要，你喊个价钱。”

我说：“四百块大洋。”

他一笑，一比指头：“四百块？没听说过。我看你这枪，好像有些年辰了？我听说，这方圆远近，有这种枪的人不多哟。”

我伸开手掌，摆弄着手里的子弹说：“告诉你吧，我只是个卖枪的，你要，我们就讲价，不要我们就各走各的路。我想你即使忘了李司令的交情，也没有这么快就忘了他的弟弟李荣群，和他手下的那帮兄弟伙吧？”

那家伙哑了，红着脸说：“万事好商量嘛，我没那个意思，只是说……实话说吧，我今天，就只带了三百，不不，三百五十元。”

我说：“三百五十元也行，讲价归讲价，不要东说西说的，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金三少爷忙从腰里掏出一个钱袋来说：“都在这里，你点数吧。”说着接过枪，就要走人。

我说：“别忙，你等等。”接着就从里面选出了七块假银元来，丢在他脚下说：“金三少爷，你这人，就这么不值价吗？”

那家伙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连忙又摸了七块银元出来，连那些假的也不去捡，就跑了。

我没开腔，等他走远了才说：“玉珍，你赶快去卖你的田土和房产，我和德敏现在就去县衙门办俊清的事情。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

玉珍看着我说：“三嬢，你要小心啊！”

我提了个竹篮子，里面装了些吃的用的，一张帕子在头上缠得矮矮的，几乎遮住了眉毛，然后和德敏一起揣上那三百五十块钱，去县衙门。广安城里认得我的人很多，我们沿着城墙边，从南门进城，走进衙门直接往左拐，就进了看守所。那典狱官不要我进，我笑着说：“熟人熟事的，昨天都来人看过。”边说边就往他手里塞钱。那家伙一招手，就有人转身进去，把唐俊清扶了出来。

才好久不见，一个壮壮实实的汉子，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唐俊清瘦得皮包骨头，身上到处都是青紫的伤痕，肿得多高的脚上还铐着脚镣。我连忙又给典狱官塞了十块钱说：“你老人家行行好，把这脚镣给他取了吧。我这兄弟是遭了冤枉，二天出来见了青天，一定要重重谢你老人家的。”那典狱官掂着银元一笑，一边叫人下镣子，一边说：“我晓得你们是遇到了青天大老爷了，要给钱现在正好，二天真的出去了，只有骂我的，还重谢？”

俊清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大姐，你、我好想你啊……”

我替他抹去眼泪说：“俊清，我们也想你啊，你遭了冤枉，大姐不会不管你的。钱我们都找到了，等德敏办完交涉，我们就一起回家去。”

俊清摇摇头说：“不，让德敏在这里陪着我吧，你要赶快走，你要照看、要照看那么一大群儿女，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咋个对得起死去的……爹妈。”说着就泣不成声。我眼睛一湿，泪水也滚了出来，停了一会才说：“好兄弟，你莫说这样的话，这么多年来你堂堂正正地做人，没有做任何昧良心和对不起爹妈的事情。老天爷有眼的，都看着的……你这次出去做生意，还顺利吧？”

他连连点头说：“顺利，顺利！好多人都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这样买卖做不了，就做别的，总会有翻梢的那天。”

我们正说着，德敏回来了。我看她脸色不大对，问怎么了，她说：“法官说的，管手续的那个什么师爷出城了，要明后天才得回来。”

有人在喊吃饭了，典狱官一边叫我快走，一边去吆喝那些犯人。俊清连忙抓住我的手，小声说：“大姐，你一定要赶快走，不能再来了。他们正在追问你的下落，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和德敏回到玉珍家，她都在屋里等着了。说房子的买主都找好了，三天之后来办交接。她看看我和德敏，问：“三天够不够？”

我叹了一口气说：“只怕等不到三天啊。”

第二天，德敏又到县衙去等，半下午慌慌张张跑回来，语不成声地说：“大姐，不好了，衙门口正在贴布告，指名道姓要抓你，说是昨天有人看见你进了城，一晃就不见了。布告上还说，你是华蓥山上的女共匪，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要小心缉拿。”

我问：“俊清的事情有着落了没有？”

德敏说：“那师爷还没回来。大姐，你不能在这里等了，你为俊清已经担了这么大的风险，你的恩德我们今生今世也还不清，万一要是出了事，可就是我的罪过了，俊清就是好好地出来了，也不会饶过我的。你要赶快走，玉珍姐也要走，我留下来陪着俊清。他爹娘死得早，我们又没有孩子，我是他在这世上惟一的亲人。他要是出来了，我就和他一起回去，养好伤，还来跟着你；他要是不出来，我就在这牢房外面守着，守它个天荒地老，死也要死在一起！”

德敏边说边哭，哭得我心慌意乱的，正打不定主意，玉珍回来了。她一看这情景就说：“你们都知道了？大姐，你赶快收拾走吧，我留下来陪着德敏。”

德敏擦干了眼泪说：“你怎么能留下来，你是这里抛头露面的人物，又给我当了证人打了官司，一有风吹草动，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还会饶过你？我求你了，你也快走，和大姐一起走，我的男人我自己来管。我彭德敏一贯软弱，可是这一次大姐你教会了我，这世道，真是把善人也要逼成恶人……”

我和玉珍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眼看天就要黑了，玉珍把她的房地产契都交给了德敏，说：“如果俊清的事情有什么波折，这些钱就留给你们打点官司用。”然后就和我一起出了门。我一路走一路在想，这事到底是谁告的密？说那姓金的吧，不像。他要是去告了，这私自买卖枪支是犯法的，告我等于告他自己；是陈素英和李文清吧，也不大像，他们要是知道我还城里，一定猜得到玉珍这里……我想起昨天进城去的时候，脸都是遮了的，一定是有人从身影上认出来，却不知道底细。于是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把几件换洗的衣服叠好，用一个布包袱皮拴在腰上，装成一个快要临产的孕妇，坐在一乘滑竿上往城外走。我在滑竿上唉哟连天地叫唤，玉珍在一边直是对轿夫说：“麻烦你们两位大哥搞快点，她都快要生了。屋里老人突然生病，说是她犯了血光之灾，一定要她到城外的娘娘庙里去生，要是生在路上，冲了你们二位也不好。”一边说一边往轿子上拴避邪的红布条。

轿夫听了，一路吆喝地跑，到城门口直喊：“快让快让！莫让血光婆冲了，大家都不好！”说着一阵风就出了城，把我们丢在城边的娘娘庙，拿了钱就转身就跑……我和玉珍等他们走远了，连忙把身上的衣服都解下来，赶到一个土地庙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收拾上路。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不知不觉就到了仲春时节。虽说清晨的风吹来还冷飕飕的，但是路边的麦苗

都已经齐腰深了，挂满了亮晶晶的露水珠儿。我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我带着几个农民弟兄从马盘山运枪回山，躲在麦土里被露水淋得透湿的情景，连自己都忍不住好笑。唉，不管怎么说吧，这一次又总算逃出来了，如果真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不牵涉唐俊清他们的话，也许他和德敏在今天，最迟不过明天也会出来的。

正想着，冷不防路边窜出两个人来，手里的枪一横，就喊：“站住，干什么的？”

我把玉珍拉到身后说：“不干什么，我们是到前面六马铺走亲戚的。”

其中一个看看我，又看看玉珍，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说是姐妹。

那人一摇头：“不对，你们不像姐妹俩，你的口音不对，不是本地人。”几个人一听这话，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我们拉到了乡公所的一间房子里，关了起来。

这一下我可急了。这个地方叫甘鸡场，离广安城不远，现在通缉令正在到处张贴，要是被人认出来了可不是开玩笑。我拉拉玉珍，叫她沉住气，一边四处张望，发现这屋里关的都是些女人，其中还有两个显然是做“暗门子生意”的妓女。一个在说：“抓女共党，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又没少给他们占便宜。”另一个说：“我以为他们就真的天不怕地不怕了，一个女共党就吓成这样？”

我一听，知道事情不妙，想了想，就问旁边的一个暗门子：“你们这里的乡长姓什么？”

她把嘴一扁，瞟了我一眼：“姓谢。”

姓谢、姓谢……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堂姐，叫陈菊君，嫁给了甘鸡场一个叫谢宁西的地主，他父亲曾经当过广安县长，在这一带很有些势力。于是我就大起胆子走过去，扬起脖子问看守的乡丁：“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谢宁西的人？”

看守一惊：“怎么不知道？他是乡长的叔爷，我们乡长还是他保举的呢。”

我笑笑，写了一张条子给他，又给了一块钱，叫他赶快送到谢家去。

那家伙拿了条子，飞一样跑了。不一会，又气呼呼地跑了回来，说：“乡长的大娘来了，坐滑竿来接你来了。”接着就听见有女人大声武气地在外面骂人，一边骂一边喊：“三妹啊，你大姐来了。”说着那女人就威风八面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乡长。我一见正是多年不见的菊君大姐，就一脸的委屈迎过去说：“大姐呀，你要是再不来，他们就要把我关死在这里了……”

乡长一听，连忙过来，亲自给我开了锁，直是说：“对不起，对不起，三姨妈，我大娘都骂我了。我已经在屋里吩咐了饭菜，给您老人家赔不是。”

菊君大姐还是气呼呼的，坐在那里发了一阵脾气，最后拿了一件衣服出来，瞪了我一眼说：“看你穿些啥子名堂，你不晓得他们这些东西只认得衣裳认不得人吗？”那乡长忙说：“大娘你言过了。不过三姨妈，要是你老人家真的穿上了这号衣裳，说不定就没事了。你不晓得我们昨天黑了才接到广安打来的电话，说是要抓一个才从广安城里跑出来的叫陈玉屏的女共产党。”

陈菊君冷笑一声：“陈玉屏都叫你们抓到了，还叫陈玉屏吗？三妹，我们走。”

一到谢家，菊君大姐“三妹前三妹后”地不绝口，一屋人都直是给我赔不是，那位老县太爷还摆了酒席给我压惊。吃完了饭，她见我急着要走，眼一瞪，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以为我不晓得你是干什么的吗？现在到处都贴起大布告要捉你，你出了事怎么办？别忘了，你还有两个娃娃！别说了，就在这里住两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我没办法，只好住了下来。

第三天，我无论如何要走了。菊君大姐没办法，叫了几支枪要送我们。我说：“这怎么行？”她却反问我：“怎么不行？现在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用几支枪送送是常有的事情，又摆了威风又保了安全。我也不问你要到哪里，你自己说个地方好不好？”

我本来还打算到合川看看刁大哥，可觉得她也是一片真心，再说现在到处都在捉拿我，是不能再在路上去抛头露面的，太危险。想了半天，一下决心就说：“那好吧，要送就送到底，你把我们送到重庆吧。”

就这样，我没有到合川，错过了和刁大哥的最后一面。一年之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苦苦血战突围无望，最后自杀身亡。

赴苏之行

重庆的天气，已经暖和了。我一回到李子坝，曾三姐和韩嫂就是一阵埋怨：“看你都瘦成啥样子了？还要命不要啊？丢下乖乖的两个儿女不当回事，哪有像你这样当妈的？宁儿、彬儿，这回莫让你妈跑了，看着她点！”

彬儿到底是男孩子，一玩起来，就忘了给他的任务；宁儿却当成了一回事，真的成天像个尾巴一样跟着我，寸步也不离。我没办法，只好趁三姐她们不注意，带着宁君出去，去找服装店的工人们。大家一听说我回来，邀邀约约地都来了，乱哄哄地说：“陈先生啊，你这一走，可把我们苦了！重庆现在失业这么严重，有的大服装社都垮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活路，这日子咋过嘛？”

我问：“林先生呢？我可是托过他的啊。”

陈树安一愣：“陈先生你还不知道啊？你刚走了没几天，重庆的卫戍司令部就来抓人，说你是……还把我们的铺子封了，林先生差点也被抓了去。后来我们听说，他去了万县，李司令和雷旅长也不在重庆，我们的铺子就这么垮了。”

我听他提到李大哥，心里一阵难过，连忙转了话题说：“我当然是想把服装店再开起来，可是我现在是扯红了的人了，不能再出面，你们大家想想办法，说该咋办？”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这有啥子问题，你明地不出来，暗地给我们当老板不是一样的吗？”一个女工说：“现在满街都是服装店，我们不做服装了，做另外的好不好？比如化妆品、雪花膏之类的，成本低，工艺简单，又赚钱。”另一个接口说：“还可以染色嘛，现在重庆敢接这种活路的店家不多，我们这里染过，有信誉的……”

陈树安等她们闹过了，才慢吞吞地说：“看你们这群鸦雀子，闹够了没有啊？就晓得摩登红、雪花膏，我们这些老裁缝不做衣服，还吃不吃饭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最后决定由我起草个简章，名字还是中亚实业社，老牌子，在重庆有信誉，只是不打我的名字就是了，业务呢，仍然有服装缝纫，兼营染色做化妆品什么的，生意由我来总管，能用的关系都用起来，大家也想办法出去找活。这样没几天，我们的中亚社又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隔几天去一下，剩下的时间都要用来处理山上的善后工作。

不几天，陈亮佐下来了。他说从山上和我们分手之后，一路都是敌人的卡子，他在邻水没有找到人，就赶紧到了大竹后山去看我们的伤员，帮着安排好了就去了刁大哥那里。亮佐很感慨地说：“我们走了这一趟，把同志们的情绪都基本安定下来了，大姐你的功劳不小啊。”

我叹了口气：“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我算了一下，自从你大哥牺牲，刘湘迎蒋介石进川以来，华蓥山区就成了他们的‘剿匪重点区’，我们的党员和主要干部牺牲了近四百人，枪支损失了大约两千多支，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多的队伍，基本上都打散了。十年了，一切要重振旗鼓，不容易了啊。”亮佐说：“大姐，这是大形势，红军走了，党中央和所有的关系一下子都找不到了，所有的根据地都被敌人杀得血淋淋的，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啊。我们群龙无首，只得自己摸着干，能够这样去清理人枪和安顿人心，已经尽力了。现在要紧的是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我已经给吴绍先去信了，约他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又说起唐俊清的事，问亮佐知不知道他的消息，亮佐摇摇头。我实在放心不下，说：“这么久没音信，怕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你干脆去一趟，看看吧？”

亮佐点点头，说行。

不久，谭老五又下来了，说：“刁大哥把渠河的水道都疏通了，我们山上和大竹那边的伤员同志缺吃少药的，能不能再搞两条船，在渠河上跑运输？”

我想了好久，才说：“船的费用太大，实业社才开张，不可能拿出许多钱来。干脆这样吧，华蓥山上多的是竹子和树子，你们能不能砍些下来，扎成筏子放漂下重庆？”

谭老五说：“当然可以，只是过滩的时候很危险。”我说：“这事你去找找刁大哥，看他能不能找两个可靠的滩师，要好脚手，工钱不少他的就是了。”

谭老五又走了，唐俊清还是没有消息。我找人带信去找玉珍来一趟，回信说她回家清理财产去了。

七月十几上，吴绍先才来了。我把清理队伍的情况给他谈了，问他找组织关系的事有没有着落。

绍先摇摇头说：“据我们了解，现在整个四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连原来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同志的关系都没接上，都是自己根据党的大方针在行动。我们几方面的领导人都碰了头，有些事情现在来和你商量。”

我点点头：“你说。”

吴绍先擦了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接着说：“现在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步步进逼，从东北打到了华北。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这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党已经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成了逼蒋抗日，看来我们现在不能和他们打了。再说他们在统治区的兵力这么强大，我们遭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也没有

力量和他们硬拼。”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只抽烟。

吴绍先看看我的脸色，停了一下才继续说：“老大姐，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认输了。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隐蔽起来。我们就这么一点人了，抛撒不得啊，现在分散开去，好好保存下来，将来一有什么事情，才有人的。那时候，我们照样要在战场上和他们相见。”

我点点头说：“你放心，你大姐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了，懂。”吴绍先笑了：“晓得你懂，还给你说个事情，你听了要沉住气哟。”

“又出什么事了？”

吴绍先摇摇头：“廖大哥在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过到苏联去学习的事？”

“是说过啊，只是后来……”

“后来廖大哥出事了，这件事就放下了是不是？现在形势平静下来，我们一清理，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还在，你就动身吧。同志们都说在这些年的武装斗争中，你已经显示了自己很高的军事才能，希望你到苏联去好好学习军事本领，回来我们还有得仗打的。这月二十四号，你到千厮门新新茶社，有人和你联系。”

“谁？”

“车耀先同志。”

这辈子还能去苏联，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玉璧的身影。当初我们约好，我先去学个一年半载的就回来，他再去；还说好临走时要见上一面的，要么是我上华蓥去，要么是他下山到重庆来，没想到那次分离，竟成了永诀……记得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我们相偎在床上一直谈到天亮，谈到牺牲的同志们，谈到眼前的斗争形势，也谈到了孩子们。我说我走了，孩子怎么办，送回家去吗？玉璧说这些年来敌人斩草除根，孩子们躲都躲不了，还送回去做什么？还说他天长地久不和孩子们见面，现在孩子见到他都不亲热，将来恐怕会认不得他这个爸爸了。

现在，我要继续他的事业，真的要去苏联了。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眼看又要离开我这个本来就不称职的妈妈……还有山上那么多的同志们，吴绍先虽然说他们会安排，可是……唐俊清为什么还没有消息？是出事了还是隐蔽起来了？去苏联，那么远的路……第二天，我一大早起来，正要去和徐清浦商量，急冲冲走进一个人来。

我一看，是玉珍，连忙一把将她拉进里屋：“玉珍啊，可把你等来了，快说，你唐大哥怎么样了？”

玉珍呆呆地说：“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德敏呢？她怎么样了？”“也死了。”

“玉珍，你别问一句说一句，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走了之后，李文清他们到处说这件案子是你在教唆德敏闹，硬说唐大哥是从华蓥山下来的共产党，是廖玉璧的贴身跟班，那法官就软了。德敏拿着我留给她的那笔钱，到处磕头作揖说好话，又在衙门口摆地状，加上我们走了，敌人抓不住证据，地方上的士绅们又都出来议论纷纷的，最后才把唐大哥放了出来。李文清和陈素英做了亏心事，害怕，就去算命。城里那个叫刘神仙的瞎子故意气他，说他们总有一天要死在仇人手里头。于是他们

就不做二不休，拿钱买通了那连长，在唐大哥和德敏回合川的路上拦住了他们，把他们打死在、打死在一口堰塘边……”

我紧紧地捏着拳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玉珍抬起头来，看着我怯生生地说：“大姐，荣群和亮佐他们还要我给你说个事，他们一气之下，拿枪把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了，说是没有征得你们那个组织的同意，要惩要罚他们都愿意。”

我挥着拳头大声喊：“谁要罚他们了？打得好！要罚就罚我，要不是我当初拦着他们，早就把这两个祸害打了，还能让他们来害人？都是我姑息养奸，是我害了他们俩口子，是我害了他们啊……”

玉珍看我直打自己的头，吓坏了，连忙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拉着我的手泪水花花地说：“三嬢啊，你别这样，这不能怪你啊。广安城里那么多的人捉你，你都没跑，你卖了三姑爷留给你的枪去救唐大哥，你还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到牢里去看他，你是在用自己的命去换唐大哥的命啊！唐大哥是好人，德敏也是好人，还有三姑爷和仁勇大哥他们都是好人，可是如今天下大劫，恶人当道，好人也是在劫难逃啊！”玉珍越哭越是伤心，伸出双手，仰天大嚎起来：“老天爷啊，你不公道啊，你连这样的好人都不放过？唐大哥和德敏，连个孩子都没有，你就忍心让唐家一门绝了后啊……”我喊了声玉珍，一下子抱住她，也哭了起来。

窗外的月亮，悄悄地躲进了云层中。

转眼之间，七月二十四号到了。我按照吴绍先的嘱咐，早早到了千厮门新新茶社，等人来和我接头。我选定一个靠河边的位置坐了下来，按约定的暗号，穿着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青裙子，还放了一把白绸的折扇在面前的桌子上。吴绍先告诉我，会面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如果过了时间还没有人来，就不能再等了，两天之后再在原地方见面。

我看看表，才十点，心里觉得好笑，这么早来坐在这里，这两个钟头怎么过啊？我买了一包瓜子慢慢地嗑，快嗑完了还没有人来；又买了一张报纸来看，看着看着突然想到约定的暗号没有看报纸这一条，要是错过了怎么办……就这样心惶惶的，一直等到了十二点，正在四处张望，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人四十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脚有点跛，外穿一件蓝色的长衫子，里面是白色的上衣和裤子。他一只手拿了根深色的拐杖，另一只手拿了一只没装上烟丝的烟斗，正和我要对的暗号相符。

我站起身来，正要喊“舅舅”，他却先跟我打招呼：“玉屏，你来得早啊。”

这就是大家非常敬重的车耀先同志。

我四面看看，茶客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茶馆里很清静。我们面向河边轻轻地交谈着，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说起玉璧，车耀先同志也很难过，长叹一声说：“要不是老廖牺牲，你们现在早就到陕北了。”接着又对我说：“玉屏，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经过多年实际锻炼的老同志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我们才让你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我听了这话，鼻子一酸，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车耀先沉默了一阵，等我冷静下来才转了话头说：“现在去苏联，从陕北这边走很困难，你只能和一位叫老汪的同志一起，从万县到宜昌换船去上海，然后从海上经朝鲜再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你可以带个小铺盖卷，再带一口皮箱，沿途要尽量少露

面，一切都由老汪负责，连船票都不要你管。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派人回来联系。”他说着，就从衣包里拿出五十元钱说：“你去做几件衣服，打扮得漂亮些，最近路上很紧，装成阔太太好掩护。记住，二十八日，老汪会来找你。”

我接过了钱，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车耀先又说：“玉屏啊，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哟，我们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呢，以后不管是跟谁打，都非常需要军事人才，希望你能在短期内学有所成，胜利归来。”

我看着他，说：“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希望。”他笑了笑：“这几天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哟，两个孩子怎么安排？”

我迟疑了一下说：“舅舅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他点点头说：“你放心地走，我们组织上晓得照顾他们的。”说完就出门坐上一辆黄包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又想起了我自己那个厚道而又细致的亲舅舅，只觉得眼睛有些发潮。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这一幕。

我出了茶馆，就去了都邮街，买衣料。说实话，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尤其喜欢穿那些质地好的面料。这一去，不知道要去多久，单的夹的都得准备一些。我选了半天，最后选定了一截枣红的印度绸，一截豆沙色的华尔纱，另外买了一截绿色的细毛呢料，准备做一件夹短大衣，其它的只有等到了上海再说。眼下正是大热天，衣服做多了，别人要起疑心。

选好了衣料，我就去了服装社，只说是有个朋友，在上海有一批化妆品原料，愿意和我们一起做，很赚钱的，得赶快去进货，赶在秋天旺季做出来才行；另外顺便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服装面料，现在重庆市面上的秋冬面料缺得很呢。

大家听说我要去上海，都高兴得很。陈树安赶着给我量尺寸，一边说：“陈先生，我还没有正正经经地给你做过衣服呢，你这么好的身材，真该好好做几套穿穿。”女工们在一边叽叽喳喳，都说：“大姐，你是最有办法的人，我们可是等着你回来大赚一笔啊。”

我听了，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李子坝，宁君已经在门口张望，亚彬见我回来，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扑在我怀里喊妈妈，嘟着小嘴说韩嫂不给他买洋画儿。我拉着他那脏脏的小手，轻轻地拍打着说：“看你成天在地上拍洋画儿，脏得像个小小叫化儿，还不快去洗……”一边却从包里摸出钱来。亚彬见了，一把抢了过去，欢呼着跑去买洋画儿了。我一抬头，看见曾三姐倚在门口看着我笑，说：“这么多年了，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这一夜，我张了几次口，话都没说出来。脑子里老是曾三姐的那句话：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第二天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是没开腔，曾三姐看我闷闷的，问了几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都岔开了。睡到半夜，一算明天就是二十六号了，万一老汪提前来了，这一去天长地久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给三姐说清楚怎么行。正想着，有人把灯拉开了，我一下子爬起来，曾三姐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前。

“玉屏，你有心事没给我说。”

我一把拉她在床边坐下，长叹了一口气说：“是有事，我要到上海去一

趟，去进点货。”

她说：“不对，进货哪里犯得着这样，你是要出远门。又要去干他们男人的那些事情。”

我不说话了，半天，点点头。

我们相对无言，好久她才说：“玉屏，我是个无能无志的妇道人家，我不懂你们的那些事，可是我知道你和玉璧都是了不起的好人。现在玉璧不在了，可是他的那些事还在你心里牵肠挂肚的，既然这样，我就不拦你了，你把两个娃娃都交给我，就放心地去吧。好人总是应该有好报的，老天爷睁着眼，清清楚楚的。”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喊了一声“三姐”……二十八号晚上，老汪来了，说是票已经买好，今晚十二点上船。先到万县，然后换船去宜昌，跟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和我很熟的刘老太太，要去宜昌看女儿，在一起有个照应。

晚上十点，两个孩子睡得甜甜的，我不敢惊动他们，轻轻地亲了一下他们的小脸蛋，就和老汪一起出门了。走了好远，忍不住回过头去，还看见曾三姐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老汪是船上的工人，把我们安排好，就下机房去了。这是间三等舱，上上下下一共十六个人，除了四个女客之外，其余的全是男客。七月重庆的天气，热得不得了，船老板为了多卖钱，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地下到处都是痰、油泥、瓜子皮，男人都只穿一条短裤，满舱里又脏又臭。刘老太太年纪大了，好睡，我却闷得不行，干脆到外面船头上去乘凉。江上的风大，吹着我的头发，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玉璧抛下新婚燕尔的我独自去了成都。

我和玉洁还有远光大哥他们，也是乘这样的船去南京读书。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满脑子的幻想，什么读书救国啊，体育救国啊，一副“看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傻模样。如今真的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了，真的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拿起了枪，才晓得“救国”这两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她是要儿子女儿用鲜血去祭奠的啊。

下午三点多钟，船到了万县，我们要在这里换船，再买票到宜昌。

老汪常来常往的，对这里很熟悉，带着我们从杨家街口上岸，边走边说：“南津街有一家叫‘茂生祥’的旅馆，老板姓熊，是自己人，我们的人常常住他那里，没出过事情。”

说话间，旅馆就到了，我举头一看，怎么招牌上写的“茂林”两个字。老汪一看，也愣了。正在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喊：“玉屏呀，陈玉屏——你在哪里……”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东看西看地迷了路，一路喊着在找我。

陈玉屏这名字在川北一带扯得太红，我早就不用了，可是老太太记着，改不过口来，真拿她没办法。

老汪回过头来对我说：“来都来了，先就在这里住下来再说吧，反正只住一晚上。我得先去看看明天的船票，迟了就买不到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帐房里一个老先生，看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伙计把我们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又是送茶又是送水的，接着就拿来了一个登记簿子说：“先生娘，你登个姓名。”

我接过来，写上了陈联诗三个字，然后写上由重庆来，到宜昌去教书。那老先生接过来，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我关上门，正准备洗脚，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一边喊着陈联诗、陈联诗。我一愣，没开腔，却又听见那人在喊“诗姐”。我连忙趿上鞋，跳过去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林竹栖。他又惊又喜地一把抓住我说：“哎呀，诗姐，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会面，真是难得难得！”

这人真是，大庭广众之中，口口声声想你想你的，也不怕人笑话！我连忙让他进屋来，说：“你怎么到万县来了？”他说：“诗姐，说来都不好意思……”

我说：“快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差点替我进了卫戍司令部，真是连累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看看门外，悄悄说：“原来这里开旅馆的熊老板被捕了，可是这里我们来往的人太多，没个地方不行，于是我就顶了下来，改成了‘茂林’字号，当上了老板。”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热。我知道林竹栖还不是党员，可是这些年来他舍生忘死地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真是难得啊。

林竹栖要招待我吃饭，去买菜了。老汪过来，提了一个大包说：“这是刘老太太的东西，放在这里你看着，她要跟我去看船票。”

我说：“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哪里是去看船票，又想去挤热闹吧？”

老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

老汪刚出去不到十分钟，突然闯进来四个宪兵，指着我问：“你是岳池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重庆人。”

其中一个酸溜溜地一笑：“别哄我们了！陈玉屏，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我和刘老太太的东西全部收在一起，推推搡搡往外走。

刚到大门口，就碰到老汪急冲冲地进来，一眼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我连忙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悄悄一缩头，往侧边的小门溜走了。

我被带到宪兵营的稽查室，几个家伙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墙有人在问：“人拉到没有？”

“拉到了，可是她说她叫陈联诗。”

“陈联诗？不对吧？报的是陈玉屏啊。”

“她这种人，本事大得很，没听说过吗？双枪陈三姐呢，在川北一带，只要有她的一张片子，就会畅通无阻，换个名字有什么稀奇？”

“不对，陈联诗我认识。”

我心里一沉。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这人是谁呢？

第二天，我被叫到隔墙审讯室，抬眼一看，上面坐的人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一见我，嘿嘿一笑说：“果然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个宪兵说：“这是我们陈营长。”

那人笑笑说：“我叫陈有先，那年你在梁山教书，我的儿子是你的学生，你的国文教得很好，他现在还记着你呢。”

他这么一说，我果然记起来了。我在梁山教书时，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孩子成绩不错，时常受到我的表扬。陈有先说：“我晓得你在梁山教书的情况，他们这些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是弄错了。你自己写个口供，我帮你转上去，转到万县县政府，到时候取个保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既然是弄错了，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还要取保做什么？”

他笑笑：“本来就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又陷囹圄

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

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兮的躲在角落里，泪花花的，牢房里倒马桶之类的杂事全由她来做。我仔细看过她，很年轻，眉清目秀的，就是脸色不好，有时她稍稍梳一下头，郝疯儿就要骂：“贱货，还想去卖呀？”

我问郝疯儿：“你既然见不得她，为什么又要她住在这里？”

那女人把头一昂：“是我把她从那边牢房里要过来的，没有她，这屋里倒马桶、扫地下的杂事，我们几个去做呀？”

这是一个妓女，因为第一次接客时用一把剪刀刺伤了嫖客，被关进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竹栖不断地在外面给我跑关系，也送了不少钱，回话都说是快了快了，却一直不提审，也不过问。老汪来来往往来了好几回，见我老是出不来，又走了；眼看秋去冬来，我急也没用，一颗心渐渐淡了下来。我在万县举目无亲，竹栖每天上午管管旅馆里的事，下午都来陪我。每次都带着水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杂糖什么的，要不就是一罐罐肉或者鸡，然后用一把扫把垫着屁股，坐在风洞口，一说就是半天。玉璧牺牲之后，我就学会了抽烟，现在成天没事，眼看去苏联这么大的事情落了空，心里头烦闷得很，烟抽得更厉害了。竹栖本来不抽烟的，因为陪着我摆龙门阵，也学会了，每次都要带烟来。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边吃着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一边打趣地说：“陈先生，这是你的相好吧？”

我笑笑，不说什么。竹栖在外面听见了，也笑笑。

竹栖的父亲是个小货郎，他从小就摇着货郎鼓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地叫卖。后来他的父亲不幸中风瘫痪了，他就每天端茶喂饭，倒屎倒尿地守了两三年，一点怨言也没有，亲戚朋友和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真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后，他带着几件衣服、两双草鞋和三块银元，远走天涯了。先是在杨森的队伍里当了几年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考进了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和陈毅在这里任教官。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信徒，加上一副喜欢豪侠仗义的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学校毕业的当天晚上，一些学员深夜还在酗酒狂闹，教官一气之下，吹了紧急集合哨，把大家集中在雨坝坝里，说是如果不把闹事者交出来，全体同学就一直站到天亮。雨下得正大，大家站在那里，冷得发抖。却谁也不愿背上个“叛徒”的罪名，都不说。竹栖见大家都冻得脸青面黑的，忍不住了，突然站了出来：“是我，是我在闹事。”

那教官见这么多人都不认错，正在冒火，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五十军棍，关了十天才放出来。事后别人说他何苦呢，他却说自己吃了点苦，那么多人不淋雨，值得。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天，竹栖来了，听见牢里又打又闹的，就问怎么了。我说：“她们无缘无故的，又打那妓女了，我拦也拦不住。那郝疯儿，真是疯子，一点道理也不讲。”

竹栖听了，半天没说话，突然说：“诗姐，我走了，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竹栖没有来；第三天上午也没来。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空的，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这些日子，竹栖每天都来陪着我，怎么一旦他不来，我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不是那种成天要人陪着的人，那些年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重庆，我大多是一个人打江山，玉璧他想陪我也没办法，走上了这条路，顾不得了。

怎么一下子又想起玉璧来了？看来人在寂寞中，就是爱东想西想的。

下午，竹栖来了，从风洞口递进来一张纸，说：“诗姐，你念念，你念给她们听。”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首打油诗，很长，我看了几句，不禁念出声来：“野鸡吟。”

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听，都凑过来。那个妓女迟疑了一下，也凑了过来。

于是我轻轻念了下去：门口站站，街上巡巡凄风苦雨，夜色沉沉

怕的是警察与宪兵

妈的几声“滚滚滚”

吓得胆战心惊

有话向谁云

今晚有客明朝饱

整整八夜无人问津

揩干油

扯横筋

前门来流氓

后门来“拖神” 有的三元或两角有的通宵无一文

低言细语，不敢高声

伤心咯，谁知我们苦

谁把我们怜

食可无肉，衣可无襟

不得不买胭脂粉

画画眉，点点唇

依门好卖笑，怀中好言情可笑啊，笑那些大人先生说我们，骂我们

不是脸厚，便是畜生

君不见，

娘在痛哭，儿在呻吟

啼饥号寒，惨不成声

什么是羞耻

何处是人生

肚儿饿，才是真

……

我还没有念完，屋里便哭成了一团，郝疯儿和几个官太太泣不成声。那妓女一边哭，一边往墙上撞，拉都拉不住。第二天，郝疯儿突然说要和我

结拜姐妹，接着不由分说，就把牢里的另外两个女人拉了过来。然后又去拉那个妓女，说：“我们都是女人，都是苦命，从今以后，谁也别欺侮谁，不然就遭天打五雷轰！”说着就点起了香，换金兰帖子，然后对我说：“陈先生，你是知书识理又见过大世面的人。今后只要是你说的，我们都听，你就当我们的大姐！我呢，做事有决断，出了天大的事情我来担当，我就当老二吧；吕太太年纪大一点，当老三，何太太你就做老四吧。”然后对那妓女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老五了，我们也不叫你野鸡了。你说，叫你什么？”

她低声说：“叫我桂花吧。”

那郝疯儿说：“什么花儿草儿的，一听就是贱命！叫大姐给你起一个吧，起个扬眉吐气的。”

我想了半天，说：“就叫桂华吧。青春年华，你自己要珍惜。”

旁边的几个都拍着手直说要得要得。郝疯儿挥挥手：“有一点我们要说明白，我们这排行，只是排大小，不是排尊卑，今后不管哪个有了难处，都要拔刀相助。来，点香！请大姐坐上首！”

我推辞不得，只好顺着她们答应下来。刚拜完了香，那桂华喊了一声大姐，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下午竹栖来听说了，搔着脑壳只是憨笑。桂华怯生生地说：“林先生，你怎么会晓得我们的这些事啊？”竹栖说：“那天晚上，我到大桥头去了，跟你的那些小姐妹们摆了一晚上的龙门阵。”

我听了，心里感慨了好久。竹栖这个人啊，真是厚道。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了，外边的事情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心里越是烦躁。一天，竹栖突然买了些纸啊笔的，拿到牢房来说：“诗姐，你好久没画画了吧？现在反正没事，你与其成天闷闷的，不如画几笔来混混时间。”

牢里的姐妹们没想到我还会画画，一时间都惊诧的。郝疯儿大声喊：“狱婆子，快给我大姐抬桌子来！”那狱婆子是郝疯儿拿钱养起的，一听是她在喊，不由得一阵忙乱，最后竟然把狱里正房上供菩萨的桌子上摆的供品撤了，把桌子给我搬了过来。好久不画了，有些手生，我沉吟片刻，涂抹几笔，就在纸上画出一朵牡丹来。郝疯儿等人见了，一阵惊呼，等我画好了叶子，又是一阵惊呼。

竹栖高兴得直是搓着手说：“诗姐，你画，多画几张。我有一个朋友，字写得好，我让他好好给你写上几个字。你这画，说不定就派了大用场了呢。”

竹栖说的这个人，就是万州城里很出名的人物刘孟伉，他从小师从他那个中了晚清进士的堂兄，不但文史皆通，还习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金石篆刻，此时已经名噪川东，万县城内但凡有些根底的大商号门上的招牌，多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在万县城里开了一家名为《艺藪》的苏裱店，成天求印者不绝，求书者盈门。听说笔资颇高，万县街上的银行楼前有一块大匾，其中那“四川省银行”五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收了二百块大洋。即使这样的高价，还要看他是否看得起此人的人品，否则就不得下笔。

竹栖悄悄对我说：“别人求字他要钱，只要说是你要，他不但不要钱，还会亲自送上门来。”

我问为什么？

竹栖说：“那年你们在华蓥山上刚刚打了罗泽洲，他和刘伯承他们就在顺庆泸州起义，他给刘伯承当书记官，那一年就有‘关系’，可是后来乱世之中又掉了。眼下他正在找你们的人，找你们的组织呢。”

果然，竹栖送去我的一幅《荷花图》之后，刘孟伉就亲自到牢里来了。郝疯儿一声招呼，那狱婆子连忙把会客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安排我们见面。我看这刘孟伉，果然是气宇轩昂，谈笑风生，一见我就抱拳说：“久仰久仰，联诗先生的为人，我已听竹栖说过许多，真是相见恨晚啊！”说着就展开画来，请我指教。

我一看，画已经用全绫裱好，右上有两句题词，诗云：格调自高洁自好，荷花袭人人亦香。左下是一颗朱红的大印。那字，笔法流畅大度，印章则藏拙于巧，秀丽处显出苍茫厚重，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我说：“刘先生，联诗惭愧了。”

他哈哈一笑：“哪里哪里，能为陈先生这样的女中豪杰效劳，孟伉我不胜荣幸之至啊。”

就这样，但凡我觉得拿得出去的画，都由孟伉为我写诗题字，然后竹栖拿出去分送给有关的人。一时我在万县城里名声大振，许多人知道万县的监狱里关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画只能由刘孟伉配诗题词。于是来要画的人多了起来，连专署里主管司法的那个姓蔡的司法官，也托人来找我要一张。竹栖一听，说：“好、好、好，鱼儿上钩了。”连忙将我的一张“岁寒三友”用上等的全绫裱好，亲自送去。那蔡司法得了这张画，高兴得不得了，玩赏良久，然后高挂在他的客厅正中说：“难得呀难得，平时想尽办法要想求刘先生的一幅字而不可得，今天不但得了他的字，还得了这么好的一幅画，真是双喜临门。”

竹栖在一边说：“蔡先生，这个画画的人，还在你的监狱里关着呢！”

那蔡司法一边看画，一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陈女士的案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来早就该放的，只是有人说她可能还有什么政治问题，报上还登了消息，那么大的字。只是也没有证据，不要紧嘛，先放一放，稍微搁一搁，到时候自然会解决的。”

以后，这个蔡司法还到监狱里来看过我，后来又通过典狱官，找我要过两张画。

牢里的几个姐妹看我和这些人打得火热，都羡慕得不得了。一天，老四何太太背地里对我说：“大姐，我求您个事，您和蔡司法那么熟，帮我说几句好话，求他把我放了出去吧。”

我们两口子都押在这大牢里，屋里两个孩子没爹妈照看，总不是个办法啊！我的那口子这一年来老是生病，听医生说是肺病，连个在外面寻医拣药的人都没有……”

我想了想说：“这事我也没把握，试试吧。”

我就给她写了一张呈子，说了一大堆两口子的难处，请求让何太太假释出去，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和丈夫。然后又附上一封信，请典狱官给蔡司法送去，当然还随信带去了何太太的一些礼物。不想过了一个星期，呈子批准了，何太太马上就收拾东西，假释回了家。

何太太回去之后，三天两头来看我，不是送吃的用的，就是扯些衣服料子，还硬要洗我换下来衣服，说：“大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的情。”

又过了一阵子，她又来找我，能不能把她的男人也想个法子弄出去。我又试着写了一封信，让她带上四百元钱去见蔡司法。第二天，那姓蔡的叫典狱官来问我：“这陈吉庆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我娘家的一个叔伯兄弟。不几天，又准了。

就这样，通过我的这个渠道，前前后后一共帮了男监女监的十多个犯人的忙，把他们都活动出去了，其中当然包括郝疯儿她们。临出去之前，我给郝疯儿立了一条规矩：出去之后不能乱来，要信佛教，不然我就不认她这个妹子。她和吕太太跪在我的面前，只是磕头说：“大姐啊，你真是这世上的活菩萨，你二天，一定要进天堂的。”

官员们也因此都发财了，光是蔡司法就在这些交易中收了两千多块银元、两件狐皮大衣和一些贵重药品。得好处的还当然少不了典狱官和有关人员，可是不管我自己多着急，却一直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这其中的奥妙，直到我出狱后才明白。

一天竹栖来说，经人介绍，他要到成都刘湘办的社会军事训练班去受训。这是刘湘的武德学友会办的，出来就会有事干了。

这武德学友会，我知道，是刘湘组织的一个团体，又称“核心团”。自从刘湘在冯玉祥先生和我们党的争取下，决心把自己从前的反共方针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之后，这个核心团就在各地利用同学同乡和亲戚关系，广招人马，培养亲信，除了川军中那些刘湘的贴心将领之外，还渗入了一些各地决心抗日的地方军官，其中很多和我们有关系。现在他们之所以要办这样的培训班，就是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同时培养自己的骨干，出来之后掌握地方军权。竹栖能够打入这里面，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是竹栖却很犹豫：“诗姐，你还没有出来，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我听了，心里一阵地发热。竹栖是个胸有鸿鹄之志的人，开旅馆不过是一时之计，而且大半的时间和收入，都用来为我奔走了。眼下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对他的志向和自己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可是他却为了我，还在这里犹豫不决，这片真情对于举目无亲又身陷囹圄的我，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可是我总不能为了自己，让他成天在这里陪着，于是硬起心肠瞪了他一眼说：“你在这里，我也没出来呀！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以后会后悔的；再说你老是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说不定出去了，眼界一开，办法就出来了呢。”

竹栖想了好几天，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来对我说：“诗姐，你放心，我走了，一青会代我来照顾你的。”

竹栖真的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风洞口，一阵阵地发呆。

幸好，竹栖的儿子一青，每天都来看我。一青是竹栖惟一的孩子，按竹栖的嘱咐，不叫我伯母什么的，却古古怪怪地叫我诗伯，竹栖说是对我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对女人的称呼，就像人们总叫我先生一样。一青出生才三天，他母亲就死了，父亲出去闯荡，将他从小就寄在姑妈家里。这一年才十七岁，已经是《万州日报》的访员（即实习记者）和校对。当时的《万州日报》，已经由刘湘接管，成了刘湘在下川东的喉舌，社长是刘湘的警备区司令刘光渝。可是他出身行伍，不通文笔，就从重庆找来他的老师李春雅当总编辑。这李春雅，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把许多进步人士甚至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也弄到了编辑部来工作。这些人把个《万州日报》办得爱憎分明，锋芒毕露，在当时的万县简直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心，一青便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晚上校对，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来狱中看我，一来就给我讲外面的抗日形势，让我看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火辣辣的一派热

血心肠，真是令人为他担心。当时虽然万县是刘湘的地盘，但也有国民党的势力，把《万州日报》恨之入骨，弄不好就会出事情。

果然，一青突然不来了，孟伉也没有消息。我关在牢里，只听说外面在抓共产党，抓万县的“抗日七君子”，其中一个叫“光头”的人跑了，正在全城搜捕。我一听，可急坏了，这“光头”就是一青发表文章的笔名。竹栖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出什么事情。

没几天，一青来了，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你这孩子，到处都在抓你，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嘿嘿地说：“诗伯，你放心，他们抓得着我吗？我躲在刘湘的警备司令部里，有那么多的兵给我站岗呢。再说他们只知道有个叫光头的，又不知道这个光头是谁。”

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又想起我们年轻时在南京参加“五卅”运动的情景。人啊，一辈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万县城里的年轻人，忙着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着，来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将近一年了，苏联没去成，外面的活动又无法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们怎么样了，宁儿和亚彬还以为妈妈……正在胡思乱想，老汪突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叫刘剑国的人来。老汪说：“陈大姐，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够出来，就和老刘一起，从上海走，他负责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来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会吃紧的。”

老汪走了，刘剑国每天都来陪我。这是个挺和气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在重庆很多。他给我讲他们国内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人民做亡国奴的滋味，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祖国；他还说他这次不是到苏联，而是要回国去，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没多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接着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战区烽火连天，敌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这样紧张，刘剑国不走是不行的了。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两个月。临走时刘剑国对我说：“大姐，眼下国共已经合作，许多共产党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没什么证据，一定会很快出来的。到时候，你就到宜昌东山铁路坝，找一个叫刘海清的人接头。上海不好走了，他会送你从延安那边走。”

我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地址，和这个人的名字：刘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出狱的事还是没有眉目。郝疯儿和陈吉庆看我着急，就又备了礼信财物，找了一个叫王大爷的去问那个蔡司法，说国共都合作了，即使陈先生真的是共产党，也该放出来了，还关着她干什么？那姓蔡的收了东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里说快了快了，又不见行动，气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在着急，竹栖回来了，一看我还在牢里，就急得跺脚：“诗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么关节了？”

我说：“先不说他，还是说你吧，你毕业了？”他说：“就算吧。这回呀，刘湘下了决心，要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原来各地的保安团，都被蒋介石叫康泽派了特务，这回刘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国民自卫队，队长由县长亲自兼任，副队长等于副县长，大多是我们这次培训班出来的地方军官，专门和蒋介石对着干呢。”

我说：“那刘湘封了你个什么官啊？”

他笑笑说：“还可以，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队长。”我说：“好啊，叫

孟伉来，我们为你饯行！”

他说：“可是，诗姐你……”

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就这样儿女情长，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栖一听，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诗姐，我到重庆去看了亚彬和宁君，听曾三姐说，你上次出来，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帮的忙？我这次在成都，听说这个雷青成当了泸州的专员，说话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给他写封信去？”我说：“算了吧，这年月，形势这么乱，谁知道谁是怎么想的？再说他是康泽的大红人，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复杂了。”竹栖说：“可是再不把你弄出来，我走了谁来管你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怕麻烦别人，你不写，我来写。”于是他背着我给雷青成写了一封信，就上任去了。不久，听说泸州来了电报，查问有没有关着一个姓陈的女教师。陈吉庆听说了，连忙叫那个王大爷跑到蔡司法那里说：“叫你放你不放，这下子人家追问来了吧？你知道这雷青成是什么人？蒋委员长的红人，刘湘刘省长的好朋友，你以为这位陈先生，当真是寻常人物吗？人家外面都在说，你留着陈先生是拿她当财神了，只要有她在牢里，就有人来给你进贡，你吃饱了还想吃，就不怕被胀死啊？”

那蔡司法连忙说：“哪有这回事，陈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弄清楚了，就是没雷专员的电报，也要放她的，国共都合作了嘛。”

就这样，青成的电报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由一青给我找了个保人，放我出来了。事后听说那姓蔡的老是关着我不放，果真是王大爷说的那个原因：有我在牢里，就会有人给他送字、送画、送钱。就因为这个贪官，我不明不白地在万县监狱里被整整关了十五个月，而且没有提审过一次。

万州烟云

出狱那天，天气晴朗。一大清早，郝疯儿就托着一丈多长的红绫，在大牢外面等候。我一出牢门，她把我手中的那些换洗衣服抢过来，又丢回牢里说：“给她们那些没有衣服的去穿，大姐您别把晦气带出来了，我给您买新的！”然后就陪着我一起走出大门。等在门外的何太太连忙捧着一朵大红的绸花跑上来，挂在我胸前；她男人陈吉庆亲手点燃一挂鞭炮，炸得纸花儿到处乱飞；许多我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看热闹，轰动了半个万县城。

我被他们不由分说地拥着往前走，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从大牢里出来，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陈吉庆说：“是说不上什么光荣，是喜庆！你不明不白地坐了一年多的黑监，今天算是无罪释放，不该庆贺庆贺吗？让天下的人都来看看，好是有好报的！”

就这样，我身上挂满了红花红绸，前面由陈吉庆亲自举着鞭炮一路放着，身边由郝疯儿、何太太和一群女人拥着，后面跟着一些由我从牢里救出来的男男女女以及陈吉庆的几十个兄弟伙。从衙门出来，在城里绕了一圈，然后过万安大桥，上百步梯，到了广济寺的一栋两层楼房前。楼前早已站了一大群人，拍着手说：“吉人天佑，欢迎欢迎！”然后随我一起进了屋。楼下的客厅里，摆了四张方桌，桌上放了几十个茶碗，旁边摆满了长长短短的凳

子，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地沏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郝疯儿她们一群女人又不由分说把我拥到了楼上，只见一张挂着真丝罗纹帐的大花床，上面放着崭新的缎面被子、绣花枕头和毛毯，屋里桌椅板凳、写字台、梳妆台一应俱全，一套全新的楠木家具，连桌上的温水瓶都是新的。

郝疯儿一边带着我参观，一边唠叨：“这套家具是陈大哥送的，床上的东西是我买的，灶房里的家什是姐妹们送的，这房子是陈大哥的一个兄弟伙专门给你腾出来的，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看，还缺什么，我去给你买。”正说着，何太太拉过一个中年妇女，说：“大姐，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你就叫她牟嫂吧，是我专门从老家请来的，为你做做饭洗洗衣服还将就，人很勤快呢，有哪点不对的地方，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第二天，陈吉庆正式为我办了一桌席，请了几个他最要好的袍哥大爷到场，说是为我贺喜。酒过三巡，陈吉庆站起来说：“今天诸位大哥都在，听我陈某人说一句心里话：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在江湖上闯了大半辈子，见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可是像陈先生这样的人物，别说是在女人中间，就是在男子汉中也是少见，实在是豪杰中的豪杰。老天有眼，让我陈吉庆这样一介武夫，结识了这样的贵人！我已经和几位兄弟商量好了，这码头上大爷的位置，是给陈先生留着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让位，今天一定要请你赏这个脸，不要嫌弃。”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喝血酒、结兰交我都干过，可是下海“操袍哥”，这可没想过，还当什么大爷，我自己的事还干不干了？陈吉庆见我犹豫，一仰头喝下了一大碗酒，说：“陈先生，陈大姐，你不要推辞，我不但知道你现在的为人，连你过去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你一定知道我在刘湘的队伍当过团长，开到前线去打红军吧？我的那些兵，哪里是人家红军的对手，一上去就兵败如山倒。当官的说我作战不力，把我撤了，我一气之下就回了家乡。本想解甲归田，却又被弟兄们拥了出来，坐上了这把交椅，当了这一方的总舵把子。这一回，我被仇家陷害，要不是你从中搭救，解我两口子于囹圄之中，我这个家，我的两个娃娃，还有重病的我，都不晓得成了啥样子了。唉，人世险恶，情薄如纸，难得像你这样大仁大义的人啊。我现在，也心淡了，把这个码头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手下的弟兄们也个个服你。你若是再推辞，就是看不起我们袍哥，看不起我们大家！”陈吉庆的话越说越多，何太太连忙扶住他说：“吉庆，你喝醉了，哪能这样对大姐说话啊！”

看来是推脱不得了。我又仔细想了想，要是真的当了这袍哥，说不定今后也有好处。于是就端起酒碗来，对大家说：“陈大爷和诸位弟兄们，我联诗一个教书先生，落难于贵地，承蒙各位如此看重，实在是惭愧得很。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领了陈大哥的这份情义，可是不能坏了袍哥的规矩，大爷我是不能当的，听说你们袍哥中间兴八姐九妹，我就当个八姐吧。”

大家一阵摆手：“陈先生，你怎么能当什么八姐，像你这样的才能，听说从前……”

我连忙打断说：“那些流言听不得，诸位不要乱说。”郝疯儿却说：“大姐，你硬是小气，都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他们男人干得，我们女人就干不得呀？就当了这个大爷又怎么样？让长江沿岸都晓得，我们万县城里东门上，出了个女大爷！”

推了半天，还是陈吉庆出来解围：“这样吧，大爷你若是高矮不当，听

说原来有人叫你陈三姐，你就给我们当个三爷吧。再说这三爷在袍哥里是个闲大爷，可以不管事，你想做什么，还是做你的什么去，好不好？就这样定了！牟嫂，把那只大红公鸡捉来，我们要喝血酒！”

这个陈吉庆，真是善解人意。

出了监，我又想到去苏联的事。只是在牢里关了一年多，身体很弱，一青他们无论如何要我好好歇歇，等竹栖回来再说。再说刚刚出来就不见了人，人家也会怀疑。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在陈吉庆给我安排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每日里有牟嫂精心照顾，又有郝疯儿她们几个姐妹问寒问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起来。

没几天，雷忠厚来了，一见我就说：“天哪，可把你找到了，才听说你在万县牢里被关了一年多，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捎个信来？我和这里的警备区司令，熟得很呢。”

一年多没见了。想起原来在重庆的时候，一有事情，就找他和李大哥，每次都是化险为夷。而到了万县，人地两疏，就只有个厚道的竹栖为我奔波。我连忙拿烟倒茶，口里说：“我到哪里去找你呀！竹栖到处打听，听说你做生意去了，你当着旅长去挣大钱，还记得我啊？”

他嘿嘿一笑，坐在椅子上说：“钱当然是要挣的，可是我雷忠厚哪里会只想到钱，大丈夫人生一世，总要做点事情嘛。告诉你吧，我要出川抗日去了。杨森给了我一个旅的编制，要我去招新兵，招够了就出川。”

我说：“那你动手了没有呢？”

他说：“托你的福，不但动手了，而且招够了。我要是当上了民族英雄，有你的一份功劳。”说着哈哈一笑：“等一会儿，我让你见两个人。”说着凑近我，低声说出两个名字来。

我一听，几乎跳了起来。雷忠厚连忙把我按在椅子上：“别忙，他们现在不会来的，你总得先听我把此事说个明白吧？”

我说：“那好，你就赶快说。”

去年九月，抗战全面展开。杨森率领的廿军从当时的驻地贵州安顺出发，经过长途行军，到了硝烟滚滚的淞沪前线，一打就是两个多月。由于遭到日寇的重兵攻击，伤亡惨重，就派人回四川广（安）合（川）师管区来，补充兵源，给了雷忠厚一个旅的番号，让他去招兵。雷忠厚多年受杨森的排挤，一肚子的气。可是大敌当前，抗日救亡毕竟是当务之急，于是就在广安、岳池、合川、大竹一带，打出抗日旗号，招募新兵出川。川北历来是兵源之地，一听说是抗日，各县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报名的络绎不绝。这一天，来了两个人，口口声声要见雷旅长。雷忠厚出来一看，一下子就认了出来，这两个人就是李仲生和陈亮佐。

雷忠厚长叹一声：“玉屏，你出来一年多了，不晓得你手下的兄弟们，现在有多难。廖大哥死了，你又走了，他们好像和上面失去了联系。蒋介石在各地培植的爪牙，清共清得厉害。他们群龙无首，东躲西藏，牺牲了不少人啊。活着的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干脆又拉上山去当了土匪，几个骨干也招呼不住。李仲生一听说是我在招兵，连忙就和大家商量，愿意和我一起，出川去抗日，打日本鬼子。我一听，连忙说好好好，先委你们做营长，拿着我的委任状和旗帜，去招兵吧。他们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不到一个月，就给我招来八百多人，其中好多都是你和廖大哥手下的人。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的这些干将，能干得很呢。”

我一下站了起来说：“快把他们叫来，我要见他们。”雷忠厚说：“别忙，我还有事和你商量。”

“你说。”

雷忠厚坐下，喝了一口茶，继续说：“玉屏，你我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载了，想来我的为人，你是清清楚楚的。这些年来，我不愿意给杨森卖命，参加军阀混战，加上和你们来来往往，杨森对我心存芥蒂，一直让我坐冷板凳，我也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行伍，出去做点生意，也无非是想留条后路。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连杨森这种惟利是图的人，都在淞沪战区浴血奋战，全国上下闻之，无不为之动容。而我却至今栖居在此，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身为军人，不想打内战情有可原，可是如果不去抗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这次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三千川军子弟带上战场，杀出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来。”

我沉吟了一阵说：“好倒是好，只是你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现在是被逼上战场的，是否真心要抗日，还要看看才知道。而杨森这个人，更是心狠手毒，疑心也重，你我过去都吃过他的亏，要谨防上当啊！”

雷忠厚说：“这你放心。要是他们真心抗日，我就服从指挥，开到前线去作战；要是他们假抗日真反共，我就把队伍拉走。我都打听过了，现在川军开赴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山西，那里有朱德为首的八路军。朱德是我当年的老师，多年来我们一直有往来。第二是江浙一带，那里也有陈毅为首的新四军，陈毅也是我的老师，对我一直都很好。到时候我就带人带枪过去投他们，想来不会不受欢迎吧？”我说：“那好，祝你成功！”

雷忠厚眉毛一扬：“不忙祝我，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啊？”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玉屏，真的还有一件大事求你。我知道廖大哥牺牲之后，你最不放心的还是华蓥山上的这些弟兄们，现在他们大都跟着仲生、亮佐归到了我的手下。我闲居多年，手下的将领们大多失散，现在要指挥这样一支队伍，也有许多难处。我思虑再三，想请你出来和我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们交往多年，我很清楚你的为人，更佩服你的才干，希望你看在我和廖大哥多年朋友的份上，千万不要推辞。我委你做团长，指挥仲生他们召来的那一批人，你看如何？”

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下午三四点钟，仲生和亮佐来了，两人一见我，就哭。过了一会儿，我才说：“都别哭了，现在山上的情况到底怎么了，说说吧！”

仲生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来接头，我们到处打听，才听说吴绍先在遂宁牺牲了。现在防区制没有了，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人，保甲里成天开会，杀人放火拦路抢劫都算不了什么，抓住共产党就得往死里整，对我们恨之入骨啊。郑涛和郑宁都牺牲了，刁大哥在合川沙鱼溪被保安队包围，突围不成，最后开枪自杀。他的人现在野性大得很，又大都在水上来往，我们也不大管得住。亮佐只好带着几个愿意跟我们的人一起上山来找我。范永安那边情况不大清楚，听说大竹后山的伤员们缺吃少穿的，又没有药品，一次次被敌人围追，死的死了，散的散了，连唐二嫂和彭医生也牺牲了……我们不甘心你和廖大哥一手带起来的这支队伍就这样散了，听说雷旅长来招兵买马上前线抗日，心想与其死在蒋介石手里，不如去打国仗，和日本鬼子拼个死活，也不负了你和廖大哥教育我们一场……”

不等他说完，我早已泣不成声。十多年了，玉璧和我，还有刘铁和刘政委，他们为这支队伍出生入死，付出了多少心血，眼看就要和红军会师，成了大气候，怎么最后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两个人见我难过，一下子跪在了我的面前，哭着说：“大姐，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廖大哥，我们没把队伍带好！”

我仰天长叹：“不，是我对不起你们的大哥。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们，也对不起你们，我陈玉屏无颜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啊！……”

天黑了，我留他们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商量。说实话，带兵打仗，又是去打日本鬼子，我没说的，愿意。可是我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还得去苏联，去学习军事。我这一关，就关了一年多，现在上海失陷，长江沿岸吃紧，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朝鲜的刘剑国临走时告诉我，出狱之后赶紧去宜昌找关系，争取从延安走，我得赶快动身才行。如果事情有什么变化，走不了，其余的事再商量。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的确是更要紧的事情，于是决定雷忠厚带着队伍先走，到了那边就给竹栖来信，把情况及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我再三叮嘱雷忠厚说：“你一到驻地，就要争取杨森先把枪支弹药发下来，队伍一定不能拆散了，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不然会吃亏的。我们华蓥山的这支队伍，就剩下这点人了，交给你去抗日，也算是你我对玉璧有个交代，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雷忠厚一一答应说：“玉屏，你等我的消息。”仲生和亮佐也说：“大姐，下面的人我们都打了招呼了，一切都听雷旅长的，你放心好了。”

送走了雷忠厚他们，我就忙着准备，要去宜昌。突然看见报上登了条头号字标题的新闻，说刘湘于一月二十日在武汉暴病身亡。这天刚从外面回来，就听见一阵楼梯响，接着就有人大声喧笑：“诗姐在上，小弟贺喜来了！”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来人竟是竹栖！

竹栖坐下，我连忙递上一盒“大炮台”香烟，他一看就说：“哟，诗姐你发财了吗？抽起这种烟来了。”我说：“哪里是我的，是郝疯儿她们为我买的。听说一青当天就给你打了电报，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抽出一支烟，在鼻子边嗅嗅，然后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诗姐，只要你出来，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事情，一封电报就解决了，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姓蔡的就吃这个。这种东西，也能不明不白地把你这样的人物关上十五个月，如今的世道，也真是糟透了！”

我说：“竹栖，我们不谈这个，谈谈你自己吧。”“我这次回来，是去保安司令部办点事情。对了，那保安副司令，姓肖，叫肖中鼎，是孟伉的好朋友，刘湘武德学友会的会员，他说还要来看你呢。”

我一听忙说：“你又去乱说什么了？堂堂的保安司令，亲自来看一个才从大狱里出来的犯人，别人会怎么说呀？”竹栖说：“诗姐你呀，在里面关了一年多，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现在不像你在山上的时候了。日本人逼得这样紧，蒋介石被迫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可是他的队伍在抗日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到处都在说他还不如共产党八路军行。更何况刘湘在武汉死得不明不白的，都在传说是老蒋害死的，他手下的人正和老蒋势不两立呢！人家就是要结识你这个共产党，你还顾虑什么？”

第二天，竹栖就带着那个肖中鼎来了。我一看，这人个子矮矮的，卧蚕眉，厚嘴唇，穿一件青哔叽的马褂，头戴一顶博士帽，还架了一副金丝眼

镜。我觉得奇怪：身为保安司令，为什么不穿军装？他嘿嘿一笑说：“这年头，老百姓讨厌穿军装的，我还是穿这一身的好。”

大家坐下来用茶，只有孟伉不坐，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然后说：“你这屋里的陈设都还不错，就是缺点字画，稍嫌有点俗气。”

我说：“刚刚出来，不过在这里暂住一时，哪里想到那么多。孟伉兄若是肯帮忙，就再赐一幅墨宝如何？”孟伉一听哈哈大笑，“你怎么也跟我咬文嚼字起来了？凡是你要的，我什么时候推辞过？你等着，明天叫竹栖过来，画上一幅好的。”

于是大家都坐下，喝茶。肖中鼎放下茶碗说：“我和孟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听说了陈先生的身世为人，十分佩服。我是一个军人，说不来客套话，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为有一事相求，还请陈先生赐教。”

“肖司令过谦了，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

肖中鼎说：“陈先生虽然在狱中多日，想来对眼下的局势，也是知道的。现在上海失守，南京危急，我们川军三十万将士出川抗日，却是败多胜少，实在令人着急。我身为一个军人，虽然只是驻守后方，却也和竹栖、孟伉他们一样，想为抗战出几分力气。可是现在万县的抗日活动，只是一些学生在游行演讲，表面热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加上刘湘死了，川军群龙无首，为了个省主席的位置，竟然争着去讨好刘湘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老婆，闹得乌烟瘴气的。再看国民党，心思也不在这上面，反而你们平型关一仗，大家对八路军共产党有了好印象。我看哪，这抗日的希望，恐怕要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咯。”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肖中鼎又说：“陈先生，我们这一群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可心是向着你们的。孟伉不说了，早年也是共产党人，只因时局变迁，失掉了联系；竹栖呢，这几年也帮着你们做过不少的事情。我自己虽然身在行伍之中，却也不想作燕雀之辈。我们都想和陈先生一起，干点于国家民众有利的事情，不知道陈先生愿不愿意领这个头？”

我看看竹栖和孟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相信共产党，也因为我是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可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接上关系，就是有了关系，也还要急着去苏联，不可能在万县呆多久。我沉吟片刻说道：“要我领头我实在不敢当，不过要说抗日，我倒有条路，不知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接着就把雷忠厚招兵出川的事情说一个大概。大家一听，立即来了兴头，你一句我一句的，都说是条好路子。

肖中鼎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你来带，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当年哄杨汉印一样，借一条路，出去了再说。”我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实在是担不起这副担子啊。我坐了一年的牢，和上面的关系已经断了，现在也是风雨飘泊中人，老是这样下去，会有负各位重望的。”

他们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肖中鼎才说：“那么陈先生下一步打算如何？”

“先到宜昌去，找到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了组织，就像孩子没有了亲娘。”

“那好，我们先动作，一面静候你的佳音。”

连肖中鼎这样的保安司令，都想找共产党，就别说我这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只是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年初，南京已于头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失守，

中国军队对于长江沿线的封锁尚未最后完成，日军频频轰炸这一地区，安庆、武汉等重镇处于危急之中。加上汉奸造谣生事，人心恐慌，湖南、湖北的人潮水一样涌进夔门，哪里还有向外走的。可是我想，如果找不到组织，以后时局再一吃紧，就更没希望了，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之去拼命。于是我谢绝了大家的劝阻，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时局动乱，旅客很少，船上的一个姓王的大领班是陈吉庆的弟兄伙，一路上殷勤照顾，第二天就到了宜昌。我在王大领班家里吃了饭，把行李也放在了他家，稍事休息，就去找铁路坝。这时正是上午十点。

刚走到中山公园，突然警报大作，街上的人纷纷喊着“拉紧急警报啦！”一阵地乱跑。

我随着人流，跑回停在河边的一条船上，还没站稳，日寇的飞机就来了。一时间，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城里立即腾起浓浓的黑烟，浓烟中还夹着火光，还没等人们叫出声来，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浪夹着呛人的浓烟迎面扑来，一个踉跄，就被压在人堆里。接着就听见船上窗户的玻璃哗哗地往下掉，周围一片哭爹喊娘的喧嚷。等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敌机还在轰炸，不少人指着火光冲天那片地方在说：“唉呀，铁路坝，铁路坝今天完了……”

我心里一惊，等飞机一走，就往岸上挤。可是还没等我走上几步，敌机又飞来了，我只得又随着人流躲到岸边的小山坡后面去，等到警报解除，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一切都顾不得了，口里念着刘海清、刘海清，急忙往铁路坝跑。

天啊，一路上到处都是死尸，连树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残肢半腿，在没有散尽的烟雾中摇荡。许多人一边哭，一边喊着亲人的名字，使劲地扒着瓦砾。我逢人就打听铁路坝28号，一个老头往旁边一指：“喏，那就是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号的瓦堆上坐着，打听刘海清的下落，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着铁路坝一路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我在宜昌前后找刘海清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三月天气，尸首一时收不完，都发臭了，宜昌城里瘟疫开始流行，加上汉口吃紧，敌机随时都可能再来大轰炸。王大领班劝我说：“陈大姐，你还是抓紧时间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后就难了。”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宜昌的这次大轰炸，炸掉了我去苏联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回到万县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上关系，一来是想安慰我，二来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这里来得更勤了。只是这广济寺，地处繁华地段，门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几个官太太成天来来往往，不是拉我去买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陈吉庆也常来找我摆龙门阵。他们再说是对我好，也毕竟是外人。再说刘湘死后，蒋介石的势力正在加紧渗入四川，很多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于是我就打算着搬家。

一个星期天，一青陪着我去西山公园，在公园里碰见我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同事李维清。几年不见了，她亲热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这公园里的九五图书馆里。我们摆了些闲话，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谢

少安，是刘湘的参谋，在万县驻了几年了。现在刘湘死了，人员都有变动，他要调往重庆，正打算搬家。她住的这个图书馆，原来是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国的炮艇炮轰万县时酿成的“九五惨案”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现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这里很宽敞，除了厨房厕所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天井里是个小花圃，种了些菊呀兰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静得很。我想到公园里人来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随口问道：“你们搬了以后谁来住呀？”

她说：“就是没有人住呢，空起的，陈老师你要是看得起，就过来住吧。我们把房钱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还有些家具一时也搬不走，正愁没人照看呢。”

就这样，我从广济寺搬到了西山公园，一青也从印刷厂他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的这个新住所，也就成了万县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聚会的一个秘密场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带了各种人和我认识。

大家凑到一起，无话不谈，总是说搞武装的事。竹栖和肖中鼎都是军官，手里不用说是能够拉出一批人来的；刘孟伉当年有些旧关系，可以去联系；《万州日报》的主编李春雅，还有一个失掉了关系的红军党员欧阳克明，都说可以动员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来参军……大家觉得就凭借这些人多年来集聚的关系，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巫山、巫溪、云阳、万县等川东九县的抗日救亡军，不管是和延安联系，还是借雷忠厚的关系，像当年“借路”那样先开上前线再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号，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说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护，由他和竹栖分头来负责招兵买马；同时和我一起来对这支人马进行武装训练；有的则因为身上兼有职务，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们《万州日报》的人负责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

一个月后，雷忠厚来信了，说队伍已经平安到达安徽安庆，士气高，军纪好，没有逃兵，正等待上面发放给养和武器装备，还随信寄来一千元，说是给我做些准备。另有五百元，请我买些药品，说是有些新兵到那里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曾三姐写信。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然后说我现在要出川抗日，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有了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就托给她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不称职的爸爸和妈妈，做个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给我的一千元钱也随信给她寄去，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样他们会受婶娘的气。更何况我们在家乡打了那么多年，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对孩子斩草除根的。

然后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书店去买书。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带兵，但都只不过几百人，而且都是在山里坝上打游击，和小股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当团长了，带着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规战争，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射程好远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打仗。好在当时书店里的书很多，一青也帮我选，买了一些有关作战的书籍，尤其是对前线战况的报导，我半夜半夜地看，总希望能有些帮助。

有时候，肖中鼎也来，半真半假地说：“联诗，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好，

露一手给我们看看？”于是我们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练打枪。

我说：“好久没摸枪了，说不定都忘了呢，你说吧，打什么？”

肖中鼎气盛，说：“打香火吧。”

我也不推辞，接过肖中鼎递过来的那支二十响，在手里掂了掂，就让人点起香来。自己走到百步之外，一抬手，枪响香灭。大家一阵欢呼。我换了左手，又是一枪，那香火头又灭了。我打得高兴，再走远点，又打。肖中鼎一面看一面直摇头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是怎么练就这一手好枪法的，怎么会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啊？”

空下来，我也教一青，把枪拆散了装在布口袋里，一边数着步子走，一边在口袋里摸装，后来就在被窝里，装拆散的冲锋枪。一青笨手笨脚的，一边满头大汗地装，一边说：“诗伯，你当年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是啊，当年在山上，玉璧和夏林他们也是这样教我。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娇小姐，只凭着一股子争强好胜的脾气，练得手膀子都抬不起来，连玉璧看了都心疼。今天，我又在这里教一青，难道命运注定，我们要这样一代一代地教下去？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雷忠厚没有信来，坏消息却不断。我们天天看报纸，日军在长江一线来势凶猛，川军在浴血奋战中连连败北；五月中旬，日军已攻占合肥，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直逼安庆；六月十日，日军出动主力部队三千人，并多门重炮和九架飞机助战，向杨森布防的二十公里战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六月二十日，安庆被日军三面包围，日军派出的大批军舰炮轰安庆，两千敌兵在重炮的掩护下登陆，安庆失守……国民党在主战场的节节败退，在国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加上日本侵略者加紧了诱降活动，一时各种汉奸言论纷纷出笼。有人散布“抗战必败”，还有人散布什么应该“全部或局部休战”。当初被逼上抗日战场的蒋介石，此时仿佛才知道日本人的厉害，对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耿耿于怀。不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竟通令全川，禁止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集会游行，一时舆论大哗，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联合抗议。人们对国共两党的印象，更是天渊之别。正在着急，雷忠厚突然回来了，一见我就哭着说：“玉屏呀，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我带去的七千人，全被炸光了……”

大家一听，登时呆若木鸡。我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说你在安庆很好，武器装备就要发下来了吗？”

他说：“是呀，杨森见我带了这么多人来，高兴得很，请我吃饭，还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我把人都安顿好。可是一等二等，就是不发枪下来。我去催，杨森只说是在淞沪战场上武器损失太大，一时还没补充。后来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才悄悄对我说，淞沪战场一下来，蒋介石说杨森立了大功，就立即为他补充了枪械，每个团都有一个迫击炮连，每个营增配重机枪连，怎么会没有武器。杨森是见你招来了这么多的人，起了疑心，说他们在广安、合川的时候老是招不到兵，怎么这雷忠厚一去就招了这么多来，这其中会不会有名堂……”

雷忠厚叹了一口气：“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大好。可是又一想，现在驻在他的营房里，局势又这么紧张，一时是走不掉的，再说不管走到哪里，没有枪和装备怎么能行，就再等等吧。我们这么多人，总不能老是不发枪，只要他的枪一发下来，我们就另打主意。谁知道没过多久，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大轰炸，那炸弹就指着我的营房丢，七千人一枪没发，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事后我一清点，死伤大半，陈亮佐也被炸死了。还有些人跑散了，听说

跑到新四军那边去的人不少。”

我的那么多人交给他，竟然一枪没发，没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就被炸光了。这个雷忠厚，怎么这样不中用，他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

雷忠厚的队伍被炸之后，是不敢回来见我，就带着李仲生和剩下的几个人，辗转去了延安。说到这里，他小心地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声音有些发抖地朝大家挥了挥，然后拿到我的面前说：“认识吗？这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八路军的总指挥；这是彭德怀，你们的副总指挥。他们见了我，和我一起吃了饭，照了像。他们说积极抗日是对的，他们还说要把四川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我说朱教官，我不回去了，我就留在你们这里，和你们一起抗日，我不去受国民党和杨森的气。朱德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在四川的中上层军官中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共产党中的许多人也是朋友，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抗日报国的机会，你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不好吗？再说蒋介石已经宣布要迁都到重庆，你回四川去和你的那些老朋友一起，作用大得很呢。”

雷忠厚看着我：“玉屏啊，有了朱教官的这些话，我才回来。我要回来和你们诸位在一起，重振旗鼓，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大家听了，一阵高兴，肖中鼎一拍巴掌说：“就是嘛，杨森被日本人打败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日本人打败了。姓蒋的不喜欢我们打日本人，我们还有延安这条线嘛，干脆，我们自己来搞武装！”

这时，万县地区的党组织已经恢复，原来是党员的都接上了关系。欧阳克明是书记，孟伉他们都成了委员，肖中鼎和林竹栖也正式入了党。我因为原来的关系不在这里，又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按当时的规定，要报上面审查一段时间，就暂时放一放。只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手续而已，有什么事情还是在一起商量。雷忠厚带回来一本叫《新西北》的杂志，上面有毛主席才发表的《论持久战》。我们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印了四十多份，分发下去。欧阳克明他们拿着，立即就全文登在了《万州日报》上，当时就轰动了下川东。不久，下川东各县的保安干部在万县城里集训，身为保安司令的肖中鼎干脆去讲《论持久战》，接着他又先后到万县、开县、忠县、云阳、奉节等七个县的农村去“检阅”自卫队，到一处就讲一处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号召各阶层人士加入我们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搞得热火朝天。他回来一说，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都说：“老肖啊，你这个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形势很好，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各处的武装力量正向我们靠拢，大家的行动越是有些肆无忌惮起来。这几天，一青他们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问他，他却说：“诗伯，您先别问，我们做好了，自然是要告诉你的。”然后小声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搞武装，没有钱怎么行啊？”

我刚问他要到哪里去搞钱，他却神秘地一笑，跑开了。一连几天，我都没看见一青的人影。这天，肖中鼎来了，我问起一青这两天在干什么。肖中鼎说也不知道，只是今天一青来找他借过两支枪，还说是诗伯说的，用过了就还给他。

我一听就急了：“我什么时候叫他来找你借过枪？”

肖中鼎听了，一愣，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突然停下来看着我：“糟了，杨汉印！”

我莫名其妙：“杨汉印怎么了？你怎么又想起他来了？”肖中鼎看着我：“是的，是杨汉印的事情，快去找一青，这娃娃要出事情！”

原来杨森的队伍出川之后，杨汉印留守四川，没事成天就到处走走，这两天正在万县。

一青听到这个消息，就四处打听，听说杨汉印又有钱又有枪，就约了几个年轻人，要绑架印瞎子。他不但找肖中鼎借枪，还暗地里找好了一个地下室，几个人统一了口径，要杨汉印拿出十万元钱和一百支枪才放人。我和肖中鼎在地下室找到他们的时候，几个愣头青正在地下室里擦枪呢。

我铁青着脸说：“一青，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说清楚？”

他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好，半天才嚅嚅地说：“诗伯，这是好事嘛。我们要了钱和枪，是要组织队伍去抗日，去打日本鬼子，又不是去干坏事。再说那些年，他们这些军阀还没把你和廖伯伯害苦啊？”

我说：“一青呀，你怎么这样糊涂！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杨森和他的部下都是抗日将领，在守卫安庆和长江沿线的战役中都是有功之臣，大敌当前，抗战要紧，你这样做，会在民众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说即使是当年，他杨汉印也只不过是借我们的人凑个数，去升官发财，又没有直接和我们作对，和夏炯、向廷瑞他们杀人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也不想想，杨汉印带着人，又毕竟是正儿八经打过仗的军人，你林一青才玩过几天枪，邀约几个小年轻就是他的对手？要是事情败露，不但你们几个跑不掉，还要连累你刘伯伯和肖伯伯这些在地方上有威信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进行？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将他绑架到了手，你敢去接他的钱和枪？这么大的事，难道你就瞒得住？现在刘湘死了，蒋介石已经宣布迁都重庆，我们这段时间活动得这么厉害，国民党的县党部正拿不到我们过错呢。你是不是要想拿些把柄给人家抓住，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我越说越气，话也越说越重，说得一青脸上挂不住，眼泪牵线一样往下淌。正说着，一个小伙子一头冲了进来，大声说：“一青，快！他们要过来了！”

我一瞪眼：“快什么？快给我撤出这个鬼地方！”

一青他们几个冒失鬼的事刚处理完，肖中鼎又急急找来说：“联诗，竹栖出事了。他那里的一个年轻的党员也是被大好的形势冲昏了头，住在他那个自卫队的司令部里，却不守规矩，到处乱说乱动的。人家就去密报，说林竹栖有共产党的嫌疑，幸好报告打到了我这里，我才通知他连夜走了。这一向，风声有些吃紧啊，你看是不是叫一青也出去避一避？我们好多同志，都下乡去发展组织去了。”

又过了不久，我有一次从外面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说国民党派的人在西山公园大搜查。我想起肖中鼎跟我说的风声有些吃紧的话，连忙到了江边，上了一只小船，连个信也没来得及丢，就离开万县，去了重庆。

渠河驾舟

一到重庆，我就去李子坝，谁知曾三姐家里已经人去屋空。这下子可把我给急坏了，四处打听，才知道我走后不久，吴绍先就来了，把宁君送到了一所当时很有名的精益小学里读书，托给学校的冉校长代管。不久玉喜也

下来了，说母亲发话了：亚彬是玉璧的亲骨肉，是他留下的一条根，我这个当妈的不管，就接回去让她这个当奶奶的管，总不能让廖玉璧绝了后，叫外人耻笑。后来雷青成到成都去做官，杨敏言也要跟着去。三姐自从男人死后，祖上留下来的那点房产根本顾不了母子俩的生活，时常靠着青成夫妇接济，自然也得跟了去。于是我寄来的钱也不知下落，加上后来吴绍先再也没有来，宁君在学校里孤孤单单一个人，连学费伙食费也赊欠着付不起。一个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自己就跑到千厮门河边上哭着跟船老板说好话，回她叔叔家找弟弟去了。

我在曾三姐的邻居家里愣愣地坐了半天，起身去找徐清浦，可是他早些时候也回了罗渡溪；到雷忠厚家，没有人，说是他最近在筹办一家绸缎铺，到顺庆办货去了，一时也回不来。眼看天都黑了，我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碗小面，决定回家里去看看两个孩子，就先到千厮门码头找到了陈文玉，打听上面的消息。

陈文玉和玉珍一见我回来了，亲热得不得了，说周辉同下来好多次了，还去万县找过我。

我忙问：“又出了什么事了吗？”

文玉说：“三娘，我们的人，哪里离得了你呀。除了那些跟着雷旅长出川抗日的，我们还有好多走不了的人，都在山上等你回来。现在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重庆修园子，国民党的许多机关都迁到了北碚，听说就有一股山上下来的土匪，来了北碚。那头目姓黄，在这里作乱，喊明了要打国民党蒋介石，闹得人心惶惶的，国民党正要派北碚的三防司令陈兴奇去剿匪呢。”

我一听说北碚的陈兴奇，心里吃了一惊。这个陈兴奇是我当年运送枪弹时做了工作过来的，不久就入了党，这几年一直是我们从重庆到山上的中转站，怎么他也听了国民党的要去剿什么匪？这样喊明了要和国民党对着干，里面一定有我们的人，陈兴奇莫不是变了？我越想越气，心想这世界真是没好人了么？我就要去找找他，看他拿啥子话来说。于是我在陈文玉处拿了一支枪，径直去了北碚。

陈兴奇一见我，喜出望外，一把拉住我说：“唉呀，大姐，你好久回来的，我听说……”

“你听说我回不来了是吧？我死在外面了是吧？华蓥山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晓得你的底细了，你好当你的三防司令，去华蓥山剿匪了？”

他听了急得一跺脚：“大姐，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不上去叫他们的人上去？我就是听说上面有土匪也有我们的人，就给他们打了个报告，说要去把这股土匪招安回来，收在我手下总比他们到处游荡的好嘛。”

我听了，这才松了口气。看来我是错怪兴奇了。这也怪不得陈文玉，由于当时兴奇对于我们这条地下通道非常重要，除了我们运枪小分队的几个同志之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而现在这些人除了我之外，都牺牲了。

我说：“那好，你报了多少人？”

他说：“我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报了一百人。”我说：“你别忙，多报点人数吧，我回去清理一下，把我们的人都拉下来，一来是有个安身之处，二来也好好休整一下。”

他说：“好，那我先报三百人。”

陈文玉当即就叫人带信回去，没两天周辉同下来了，我又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说：“辉同，你赶快回山上去，还往大竹后山那边走一趟，看范

永安他们到底怎么了。如果还有人，就都带下来，编到陈兴奇队伍里去。”临行前，我还叫住辉同，要他跟同志们说清楚，现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在联合抗日，大敌当前，不要在这里打来打去的，给党中央找麻烦。”

辉同点点头走了。不久陈兴奇就回来跟我说，那个姓黄的愿意受招，带了一百多人下来，里面果然有我们的人。又过了一阵，周辉同也下来了，把山上没有着落的二百多人全都带下来了，安置在陈兴奇队伍里。我问他去了大竹后山没有，他说去了；我问他情况咋样，他摇摇头，半天才说：“范永安牺牲了，唐二嫂和彭老么也牺牲了，现在队伍由一个叫冯老二的同志在主持。这么几年了，活下来的伤员即使是残了的，也好歹都活下来了。他们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等都等了这些年了，跑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做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也不能说这些同志对或者不对，只是想着唐二嫂。临下山的那个夜晚，我们两个寡妇围着玉璧用过的那床薄被，坐了一夜。她说：“大姐，廖大哥不在了，可是你还有两个娃娃，我就是孤单地一个人。今后这日子，好长哦！”

我说：“二嫂，你和我不同，你再找一个可心的，我们还要等到翻身的那一天。”

她摇摇头，说：“大姐，不容易啊，人一辈子，找个可心的人不容易。我那唐老二，人老实，说不来个啥，可是做事情实心实意的，没得半点虚假。跟了廖大哥这么多年，再苦寒再艰难，从来没说过半句二话。我们成亲后，好多年没得娃娃，他家老人说过好多闲话，连媒人都托了，给他另外找一个黄花女子，说那家人屋里穷，愿意让女儿来填房。可是我家老二高矮不干，一来说要是再生不出娃娃来，自己且不是作孽误了人家姑娘；二来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两口子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即便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如今跟着廖大哥这样为老百姓受苦受累积善积德的，也算是功德了，我就不信老天爷当真不长眼睛？后来我们真的有了山娃子，满月那天，我家老二打了两斤酒，硬把廖大哥和夏林、金积成请来喝了个够。说这都是廖大哥积下的恩德，积在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身上，我这辈子就看在我这个儿子的份上，也要跟廖大哥跟到底，让他们这一代过过好日子……”

两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唐二嫂这两年中又找到可心的好人没有？现如今唐二嫂也牺牲了，像她这样的好人，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又和周辉同、陈文玉商量回去的事情。辉同说：“大姐，你是该回去看看。现在上面的保长甲长都换了，连徐清浦回去，都弄了个乡长来当起，情况的确好了许多。可是你也不能就呆死在那个地方，总要想个活泛一点的事情来做，将来有个动静也好起身。”

我说：“好吧。辉同，你跟我一起上去，我们和清浦一起商量一下再说。”

就这样，一九三八年的冬月间，我又回到了家乡。

这是个寒场天，街上人少。我一身阔太太打扮，在黎梓卫下了船就喊了乘滑竿，大摇大摆从街上过，周辉同在我后面跟着，一路上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眼睛。我们径直到了太阳坪，早有人报了信。母亲昏花着老眼在门口张望，一见我的滑竿就颤巍巍地迎上来，拉着我半天才说：“屏儿，你是屏儿吗？你是魂还是鬼，早点给我说清楚，初一十五我都叫他们给你烧了纸的哟。我晓得你心头苦，你死了男人，我又把你的彬儿接起走了，你不明不白地被日本人炸死在外头，大白天来显形，是杨森那个挨千刀的害了你和我的儿，

我晓得你心头苦……”

我连忙把母亲扶回屋里，说：“妈，我没有死，真的好好的，我在外头做生意，上海被日本人占了，我就到了万县，这次是专门回来看你 and 彬儿的。”

母亲这才信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了一阵才像是醒过来，四处一张望，从门角里拉过一个像叫化子一样的娃娃说：“彬儿，快，快叫你妈。”

我一看，天哪，这哪里是我的彬儿，穿得稀烂，都冬月间了，还打着一双光脚，脚背冻得红通通的，肿起多高，溃烂处起了黑乎乎的血痂，一张脸糊得眉毛眼睛都看不清楚。我一下把他拉在怀里说：“彬儿，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姐姐呢？姐姐在哪里？”

彬儿愣愣地看着我，哇地一声扑进我的怀里，哭喊着：“妈妈呀，我们好想你啊，他们都说，你不要我们了。他们还说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是伯娘，要说你是妈妈，人家就会把我和姐姐拉去关起……姐姐她，她在二姨妈家。”

晚上，宁儿从二姐家回来了，看着我泪汪汪的。女儿长高了许多，手里拿着一双鞋，说是给弟弟做的。我接过鞋来一看，碎布拼的鞋面子，底子扎得长一针短一针的；彬儿穿起长了一大截，却高兴得走来走去的。我忍不住又想哭。我长叹一声说：“屋里就穷得这么恼火吗？这娃儿好歹是廖家的一条根，就连一双鞋都穿不起了？”

我那兄弟媳妇听了，在一边不阴不阳地说：“你这娃儿，麻烦事情多得很呢。那回人家听说廖玉璧的独儿子在这里，派了十多个兵来捉，还不是你那个憨痴痴的兄弟背起他跑了好几里路才躲脱？不晓得内情的，当然要我说我两口子待不得自己的亲侄儿，哪里知道我们在其中担了好多惊吓？敢给他穿好吗？穿好了人家一下子就会认了出来，我们那个背时鬼又背起他去跑趟趟儿？”

正说着，玉喜回来了，一张脸蜡黄，一身的鸦片烟气味，见了我高高兴兴地说：“嫂嫂，我们都以为你……”我盯了他一眼说：“你的鸦片烟烧舒服了？”说着站起身来，拉上两个孩子去看玉璧的坟。

我和两个孩子坐在老黄桷树下，看暮云四合，群山消隐，漫天的晚霞渐渐化成了苍茫的夜色。哪里有坟？还是老黄桷树下当年的那一方平地。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是在这里，在这一片新土面前来看玉璧。腊月的寒风，吹得黄桷树叶刷刷地响，我在心里对他发誓，要提着叛徒曾洪泽的头来见他。可是现在，他坟上的草都长得这么深了，我却两手空空。苏联没去成，队伍也散了，党组织不知道在哪方哪地。连我们的两个儿女也没管好。没有了玉璧，我怎么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呀飘的……星星出来了，晚风轻轻地吹，两个孩子在我的怀里静静地睡去，我又在心里悄悄和玉璧对话。玉璧的声音，很轻很柔：“玉屏，我知道你受的苦。我不在了，你一个人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是很难，可是你千万不能退下来啊。人生如逆水行舟，要退下来太容易，可是要再赶上去往前走，就更难了。”

我不在你的身边了，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我们好多好多的人都不在你的身边了。我们现在只能看着你，却帮不了你，只指望着你能够走完这条路，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那个新的世界里。”

我说：“玉璧，我好累啊，真的好累。我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走不走得到那一天。”

玉璧摇摇头：“玉屏，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来？你不是历来都很自信的吗？你不是历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要记住，天助自强

者！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你对我们所有牺牲者的责任。在这条路上，你是幸存者，你幸存下来的意义，就是要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所有在九泉之下的人，才会真正安息，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华盖山牺牲的那么多父老乡亲，才会衷心地感谢你。”

我偎在他的怀里，说：“我不要他们感谢，我只要你满意。”

玉璧轻轻地拍着我，用他那满是胡茬子的脸擦着我的鬓发：“玉屏啊，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心。”

.....

第二天，我和周辉同一起到了罗渡溪，去见徐清浦。老朋友一见面，惊喜中又有些难过。清浦说：“玉屏，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也晓得你在万县坐牢，是雷青成救你出来的。”

你走了之后，朋友们一个个都散了，刘湘的那一伙人也各奔东西，明生也走了。我在重庆没有了关系，只好又回到家乡来。好在自己多少有些根底，他们又摸不透我这几年在外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一年来形势松了些，我就趁机把这里的乡长抓到了手里。手里多少有点权力，许多事情要好办些。”我说：“清浦，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宣传抗日，也没有什么活动。据吴绍先当时跟我说的，红军走后四川的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如果一时还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消极地隐蔽下去，总得找点事情来做。更何况都晓得他蒋介石的心不在抗日上，以后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定呢。现在我、你加上辉同、陈文玉一共有四个党员，我们就成立一个党支部吧，陈文玉负责跑联络。我们按期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商量工作，你看好不好？”

清浦和辉同都同意，当时就决定我来做党支部书记，接着研究下一步工作。我说：“我和辉同商量了一下，想在渠河上去驾船，从这里运点生姜和土产之类的到重庆去卖，将来万一有了什么事情要召集人马，没有钱怎么行？这样我们的人也可以乘我的船，来往于重庆做点小生意糊生活。辉同呢，不同于从前了，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又在当地扯得很红，我想他和诚贞也干脆去重庆，可以在船上开个水上旅馆，一来挣生活，二来又可以把大家联在一起，一有了动静就好行动，你看行不？”

清浦说：“倒不是不可以，只是这驾船，沿途的风险大哦，你一个女人家.....再说要买呢你买不起，要做你到哪里去找木料？”

我想了想，最后一咬牙说：“廖家的坟山上那么多的树子，遮天蔽日的，我去砍几根。”

第二天，我喊上几个本家的弟兄，拿了斧头就往坟山上走。母亲听说了，慌慌张张奔出来，拉住我的手死活不放，口里直喊着：“屏儿，你莫去惹事啊，砍了祖坟上的树子犯了先人，廖家屋里的那么多人，你咋得罪得起呀！”我说：“犯什么先人？我原先没有砍树子，先人咋也不管我？我现在男人死了，田也卖完了，两个娃娃吃不起饭，连鞋都没穿的，我要去驾船做生意，不要我砍，成心要饿死我们吗？”

一个廖家的老叔说：“玉屏啊，我们都知道你的难处，可是这常言说得好：穷不登山，富不驾船。你一个妇道人家，再难也不要走这条路啊，弄得不好谨防在那金滩、丈八滩上有个三长两短，你的两个娃娃就惨罗。”

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突然听得一声枪响，人群里一惊，哗地两边分开。我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穿件对襟棉滚衫，梳着个偏分头，肩上斜挂着一个枪盒子，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还在冒烟。在他的后面，站着我那兄弟媳

妇。

我从土坡上走了下来说：“哟，这不是段贡武段大哥吗？听说你在国民党里当官了，怎么得空到这里耍威风啊？”他把手里的枪一挥，说：“我怎么不来？我妹子也算是廖家的人，你要坏廖家祖坟上的风水，我这个娘屋里的人不说话怎么行？你们两口子，把自己的田土卖光了去闹共产，闹得廖家这十多年不得安宁。你男人自己愿意把一条命搭进去，活该；你不要自己的儿女在外面到处乱跑，我们也管不着，可是不能又回来生事嘛，啊？你看我妹子，当初凭什么嫁到你廖家来？还不是看着有那么点家产！现在家让你两口子败了，你还不满意？她一天做到黑，还是吃没到嘴上、穿没到身上。你把一个要吃要穿的娃儿丢在这屋里，回来还说东说西的……你要砍这祖坟上的树子，我们就大家都来砍，砍回去当柴烧！”

不等他把话说完，我早已气得头昏脑涨的，一步抢上前去，挥起巴掌“啪”地就是一个耳光，然后右手卡住他那鸡爪样的手腕，左手一使劲，就夺下了他手里的枪。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姓段的，廖家屋里的事自然有廖家屋里的人来管，你算是什么东西？用得着你在这里又是枪又是炮地耍威风？告诉你！我陈玉屏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我一直就是个教书的，廖玉璧干了什么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就是廖家的媳妇，廖亚彬就是廖家的子孙，我回来是投靠我的婆婆，关你什么事？这岳池县里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当初廖家屋里的家产被江豪元他们封了，母亲也被拉了‘绅士’，要三千块大洋才放人，是哪个冒着生死去争了回来的？是你还是我陈玉屏？后来母亲又被夏马刀拉去关在广安城里，又是哪个去救了出来的？还不是我陈玉屏！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一个寡妇家，要养家要糊口，在外面正正经经做点生意，我怎么是乱跑了？我跟着谁乱跑了？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休想走路！”

我婆婆一听段贡武说出这些话来，也气得不得了，上来一字一句地说：“姓段的大哥，你说话要摸着良心哟。你说我的儿死得活该，你看你自己不得好死哟。今天当着我们廖家屋里的老老少少，我也来把话说清楚。你说我廖家屋里亏了你的妹子，请问当初分家时你也在场，少了她一分一厘没有？彬儿是我接回来的，我眼睛看不见，说了好多好话请她帮着做双鞋都不干，连累她什么了？她是看着我们廖家屋里这点家产才过门的，难道你今天不是看着这点家产才来吵架的？这多年就是你在其中挑唆，我屋里才不得安生。去年你出面，在我这里拿了四十担谷子，直到今天连个‘还’字都没提；你又哄哄骗骗拉着我家玉喜去吃鸦片烟，好让他成天把钱呀谷子的往你屋里搬。你恨不得要把我这个家捏在你的手里，还怪我的儿和媳妇把家败了的？”

几个支持我的本家弟兄，看见这姓段的拿着枪在我们廖家的坟山上耀武扬威的，都气不打一处来，乱哄哄地嚷着：“他刚才说的什么？他要来把我们廖家坟山上的树子砍来当柴烧？问他是不是活够了？大嫂，与其让他砍不如你来砍去修大船，你当了船老板早点发财，免得人家咒我们廖家屋里的人死得活该……”

刚才那个挡我砍树子的老叔叔听了这些话，也气得不得了，走过去用烟杆指着段贡武的鼻子一下一下地说：“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话也说得太多毒了，你以为靠着你这个在这四乡八场只有你弟兄两个的啥子国民党，就可以欺侮我们廖家的黄泥巴脚杆了？玉屏，你砍！你那男人死得堂堂正正的，我相信老天爷长了眼睛，廖家的祖宗会保佑你们娘儿母子的。”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帮着我砍树子。那姓段的一看大势已去，连忙说：

“大表嫂，你砍你砍，我不说了，只是你总得把枪，还给我嘛！”

我看看手中的枪，哗地把子弹和撞针都退了出来，然后一扬手，那东西就飞过几根田坎，落进远处的一块水田里。我在坟山上砍了九根大树子，叫人抬到黎梓卫码头边，在茶馆里与“水木匠”们说好了价钱。第二天正好是个黄道吉日，掌墨师燃香烧纸，拜了鲁班祖师爷，接着杀了“开墨鸡”，就在“龙头枋”上弹下了第一根墨线。半个月之后把船做好了。

下水的那天，我摆了二十桌“开航饭”。掌墨师杀了“收墨鸡”，那只红公鸡只叫了一声，大家都说大吉大利。陈家和廖家的亲戚一百多人帮我把船推下了水，场上的袍哥大爷们也来为我捧场。段家兄弟觉得势单力薄，再也不敢吱声。

几天后，我借母亲的钱买来的一万斤生姜，准备运到重庆去赚个对半。正要开船，清浦来了，哭笑不得地说：“你呀，还是那个毛德性，这船没有营业执照，你都敢走？辉同，把执照和号牌给你大姐钉上。还有，沿途的码头公口我设法都给你打了招呼，你尽管放心去，只是船上有些老规矩，要好生弄清楚，不要犯了走不到路。”

常言道：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请的掌舵师，是一个叫朱望和的老艄翁，早在岸上就跟我交代清楚了，船上忌讳所有同“沉”的音，只叫我老板就是了。朱师傅还叮嘱我说，欺山莫欺水，欺水变成鬼，行船一路上险恶，忌讳无论如何是要遵守的。比如不能端着碗上岸吃饭，不能先盛饭后舀汤，看舱时不能说话等等。我一时都记不住，也没有心思去记。我站在船头上，看着两岸熟悉的风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才多久，我居然从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成了船老板，又在渠河上开始做生意了。

船到重庆，商人们见我运的黎梓卫生姜，一轰而上。却欺我是个生手，联起手来压我的价，三块钱一百斤的市价，他们只给一块五，还说如果不卖，就叫我的姜烂在这船上，以后也别想在重庆做生意。我一听，心想哪有这么怪的事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姜搬到陈文玉的船上，一放就是一个多月。眼看要过年了，正是卖姜的好市口，他们手里的货卖完了，上边的货又下不来，这才慌了。我趁机抬高了价钱，一下子赚了一大笔。后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对陈文玉说：“你的那个三娘也太厉害了，以后这重庆城里的码头上，恐怕没有哪个敢和她作对。”

我听了这话，冷冷一笑，心里想，不敢和我作对的，岂止是你们这些奸商。

漫漫求索

一天，我的船刚靠上千厮门码头，陈文玉就领了两个人进来，万万没想到竟是竹栖和一青爷儿俩。大家又说又笑地寒暄了一阵，我才知道竹栖暴露后离开万县，就通过组织上的安排，到了江油，现在已经在江油做了国民兵团副团长，还兼任了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的军团联络办事处主任。一青呢，我离开万县后，他就入了党，奉命去协助刚刚进川的孩子剧团到云阳等地作巡回演出。这个孩子剧团，是我们地下党在淞沪战场上组织的一批

难童，后来就归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他们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些孩子们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到了四川之后，走一路演一路，沿途掀起了一浪浪抗日的热潮，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一青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段生活，眉飞色舞的，兴致高得不得了。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宁君。当时我已经把宁君送到了合川的廉溪中学读书。这个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有点名气，可是宁君这孩子，我和玉璧从来就没好好管过，连小学都没读完，上初中很是吃力，女孩子家又喜欢唱唱跳跳的。一青既然和孩子剧团这么熟，我就和他商量，让他把宁君介绍进去，一来有组织管着，二来也好让她在里面好好锻炼锻炼。

一青听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去说一声就行，只是不晓得宁君妹妹……”

竹栖横了他一眼说：“宁君妹妹怎么了？孬了吗？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你诗伯的女儿，要个人来比！”我和一青都笑了，我说：“一青，你这么喜欢这孩子剧团，看样子是不想走了，要去当娃娃头儿了吧？”

一青看了他爸爸一眼，嘟着嘴说：“人家倒是想，就是我爸不干，他要我跟他去江油，当少爷。”

大家又是一阵笑，我说：“好啊，看样子你爸爸是个当官的料，干脆我也去沾点光，你去当少爷，我就去给你们当老妈子，混碗饭吃。”

竹栖说：“这怎么敢当，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就联起手来，一起干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竹栖说：“我就是要和你商量。现在汪精卫投敌卖国了，国民党今年一开年，就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把他们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方针是对共产党实行防共、限共和溶共，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得作准备啊。组织上觉得我现在处的位置不错，就决定以我管辖的四县民兵为基础，在北川搞一个游击根据地，准备培养一批基本队伍作为今后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应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可是又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对外就只能说是办农场，烧碱、割生漆。只要此事有了眉目，我就来请你，你在华蓥山上打了多年的游击，有经验，我们一起来办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问：“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佺、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

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

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织问题，我们都研究了，决定这次就给你解决了。喏，我们的李明，现在是县委的组织委员了，找个时间，他和你好生谈谈。”

我高高兴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定个时间吧！”李明想了想说：“明天晚上吧，我来，就在你的船上谈，清静些。”

第二天吃过晚饭，李明到了我的船上，文玉把船驾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就和竹栖一起上岸去放哨。李明顺手把门带上了，我热情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问他要我说什么。他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又问了一句，他才像醒了过来，说：“你先谈谈个人历史吧！”

于是我就从华蓥山上谈起，一直说到在万县坐牢，每到伤情处，都禁不住眼浸浸的。可是越到后来，我怎么越是觉得他对我说的并不在意，一会儿给我散支烟，一会儿又给我倒杯水，后来干脆说：“你先别谈了，这么多我也记不清楚，你干脆给我写下来吧。”

我听了一愣，反问他：“都写吗？”

他说：“当然要都写，把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都给我写下来，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不说话了。他吐了一口烟，移过来说：“怎么，还信不过我吗？我知道你和林竹栖好，他那副傻眉傻眼的样子，能比得上我？”

我简直没想到他会这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李明见我不说话，胆子竟然大了起来，一张鬼脸凑近我说：“我晓得你也不容易，廖玉璧死了好几年了，你这么年轻地就做了寡妇，有个相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只是要注意影响哦……”

我只觉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猛地一下子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把这家伙吓坏了，往后一退，轰地绊倒了桌子，跌坐在船板上。竹栖在外面听见响动，连忙跑进来。我瞪了他一眼，大声对那姓李的喊道：“你给我出去！”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也没想到竹栖就在外头，红着脸头也不敢抬，就跌跌绊绊地跑了。

竹栖莫名其妙，转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冷静了一下，才说：“我信不过他，他要我把所有的关系都写出来交给他，这怎么行。以前我们为这事吃够了苦头，牺牲了多少人，这都是血换来的教训，我不能忘记玉璧在遗书上叮嘱我的话。”

竹栖一听这话，跺着脚连连说：“诗姐，你这人怎么这样自高自大的？他可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能……”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说：“这种人都能代表组织？玉璧死了这么几年了，有谁敢在我面前说半句轻浮话？他李明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你这个昏虫！”

竹栖听了，立在那里呆呆的，突然抡起拳头，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拳。

夜深了，一弯冷月照着无语东流的长江，我和竹栖坐在船头上，谁也不说话。初春的清露如蒙蒙水雾一般撒落下来。竹栖进舱去拿了件衣服出来给我披上，长叹一声说：“诗姐，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我默默地看着涌动的江流，木雕一样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半天才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俩能不能、能不能一起过？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作为玉璧的好朋友，我也应该……保护你，你一个人，太难。”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说：“诗姐，我知道，当初你在山上当着大家宣过誓，说你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可那是同志们怕你找到个不革命的外人，结了婚就不管大家了呀。我们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了，难道我是那种不革命的人吗？难道同志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们和大家一起，一起来完成玉璧留下来的事业，等到办起了农场，我们就把山上剩下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一旦国民党要想打内战，我们就一起把队伍拉出去干。我们一起，把彬儿和宁君拉扯大，这才对得起玉璧……”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可能。”

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

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

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多。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病。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揪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

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肉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一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

大家笑了一阵，宁君得意了，说：她在孩子剧团年纪虽小，可还总是受表扬。有一次在苍溪演出，她爬上高高的竹竿去挂大幕，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就立了个二等功！她还挺神秘地对我们说，在武胜演出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师悄悄把他们几个叫到屋里，拿出他珍藏的一颗红五星，说这就是红军留下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红军是好人，你们也是好人……

我听着，不禁又想起当年在合川、武胜声震一方的刁大哥。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夜深了，我打发宁君和亚彬去睡了，自己好和一青说正事。

一青说：“诗伯呀，我爸爸给你写了信，就等呀盼的，还以为您……”

我说：“别说那些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摇摇头说：“没干成，我爸那个人，太那个，又暴露了。他那么大的一个官，管了四个县的地方军团，却成天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那些民兵一起跑步操练，一边跑还一边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唱这样的抗日救亡歌曲！这就算稀罕的了，可是他还带着士兵们到江油城里去扫大街，去运渣滓，引得县城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不就得罪了好多人了吗？后来上级派个领导同志来，掩护身份是给他当勤务兵。可是他却对这个勤务兵太客气。人家给他倒洗脸水，他不让，给他倒洗脚水也不让，那些本来就嫉恨他的地头蛇们就放出风来，说这林团长倒是挺体恤下情的啊？哼，放着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人不用，却去外面找些思想左倾的人来当官，总要出事的！你看看，本来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事情都有了眉目，派去的几个党员和十多个基本群众也已经开始了生产，

可是这样一来，我爸又被省政府撤职查办了。”

我叹了一口气。竹栖这个人啊，太厚道，这既是他的优点，又是他的缺点。这么一件大好事，就这样失去了机会，真是太可惜了。要知道这事若是成了，我也不至于……一青说：“诗伯，你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嘛。这回我爸说的还是请你去当老板，只不过是船老板换成了板车老板。你还记得邓伯成这个人吧？”

我点点头说：“记得，当年余家场事变，就是他设法给你廖伯伯送的信。”

一青说：“当时杨森听说是他走漏的风声，也要抓他，结果他跳墙跑了出来，就到了绵阳。我爸这次到绵阳找到了他，在绵阳的‘民食供应处’找了个事务课长的职务。官虽然小，可是道法大，管着涪江流域各县的军民粮食，还负责这些粮食的外出运输。我爸就向组织上建议，可以利用这个运送军粮的机会，一来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一批工人骨干，将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拉出来打游击；二来也可以掩护很多同志的工作，还可以为组织上筹集活动经费，很有干头。现在组织上都同意了，爸爸叫我来问你去不去？”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去呀，只要是组织上说的，为什么不去？”

一青又说：“组织问题，我爸也为你做了工作，江油县委已经决定为你接上工作关系，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对一时掉了关系的同志采取的特殊措施。”

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皖南事变”之后，四川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进入了潜伏期，没什么活动。可是竹栖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挂着什么，对于他，我真是无以回报啊。

板车老板

第二天，我就忙着收拾，四处奔走。先是去和清浦和辉同告别，说好了那边若是有了什么着落就和他们联系。接下来又是清理货物和财务上的往来，还决定把宁君和亚彬一起都带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得跟我学着干点事情，不能老让他们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和亚彬坐汽车；宁君让一青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来是他们俩愿意，二来也是为了省两张车票。再说一青这孩子骑车的本事好，不会出事的。我们从岳池经南充、遂宁、三台，整整走了四天才到绵阳。见到竹栖，叙了一夜的旧，第二天就去见邓伯成。邓伯成向来很佩服玉璧，和竹栖也熟，对我的情况很清楚，见了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就商量怎么运送军米的事情。

当时正值成都“抢米风潮”之后，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的一担米才四十元，可是到了七月就涨到了九十多元。工商百业纷纷倒闭，失业的人多得很，有点什么活都抢得厉害。第一批由乐至到遂宁十二万担军米的运送就要开始，我们得很快找到大批的工人，否则就可能被人家抢了去。当时和官仓打交道的这种活路，必须由正儿八经的运输行出面来接，可是我不愿去投靠那些运输行，干那种既担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的事

情。于是决定又像当年在重庆开服装店那样，由我们自己组织个运输行来干。

我将亚彬安排在绵阳读书，由竹栖和一青照顾；又匆匆到了成都，让宁君去考上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自己就打扮成一个老板娘，到文殊院外面的一个小茶馆里去吃茶。这里是成都板车行谈生意找活路的“窝子”，到处都是人，有的整天都泡在这里，还是找不到活干。

不到两天，我的身边就集聚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一批成色不错的胶轮板车，随时听候调遣。

从接受任务算起，前后不到十天，我就把和工人们签订的协议拿回绵阳。竹栖和邓伯成大吃一惊，老邓说：“我这两天正在着急，政界军界里的好多头面人物听说了我这里有这个美差，不是来条子就是来人，又是送礼又是送红包的，我和竹栖正担心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没办法拖延了，只得把这好差事拿去换酒钱咯！”

我们把运输行定名为“联昌”运输行，我来兼管全部业务，奔走于成都、绵阳和各地之间。当下就由绵阳的民食供应处开了一个介绍信，又由邓伯成给乐至粮食仓库的主任兰可甸去了一封私函。我拿着到了乐至，没遇一点麻烦就把一份运送十二万担军米的合同手续办好了。我立马赶回成都，一天之内就集合了八十辆板车，星夜赶到乐至。

正在库房装车，就有一个穿长衫子的人走过来，自称是乐至运输公会的张会长，愣眉愣眼地说：“你们是哪来的？没听说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没加入我们板车行公会，就要在这里找饭吃？”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这军米原来都是他们运的，因为出了不少纰漏，又因为竹栖他们做了工作，这碗饭才被我抢了过来。我说：“您先生没听说过吧？这是军粮，军粮和民运不同的。我们都在绵阳邓主任那里入了公会的，不信你问问兰主任。”说完就不再理他，招呼大家起程。

人人都说下力人苦，只有干上了板车这一行，才知道最苦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四川，是军粮和壮丁的大后方，这运送军米的事情一点都耽误不得。不管天晴下雨，工人们都要在路上走，一部车装一两千斤米，配上两三个人，还得一路小心。其中有一段路，太烂，我多次叫县里修，他们都不理，结果刚上路不久，我们就有两部车在那段烂路下陡坡时，侧边的边杠拉不住，车子七歪八扭地冲下来，压死了我们前面的两个拉中杠的工人。为这事我叫工人们把死人和车子都拉到乐至的县衙门前摆起，最后硬是叫县里出了一千块钱抚恤金才罢了。

不过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拉壮丁。当时四川城乡各个保长手里都有送壮丁的任务，大多完不成。而我们的板车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家里多有老小，常常走在路上就被拉了去，一去就没了音信。于是我就将他们编成组，二十部车一组，选出一个人来负责，不能有掉队的。接着我又去找乐至的县长赵永林，说：“赵县长，我们运送军米，可是抗日的大事，要是工人们被拉了壮丁，你可是要吃官司的。你得给我出个布告，不准沿途的保长们拉我的工人。”

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哪有这样对县长说话的？赵永林半天没回过神来，第二天城门上就真的贴出了布告。

可布告归布告，没出几趟车，我的工人在乐至和遂宁交界地方，就被拉了好几个。我对领头的工人蒋林桂发脾气说：“不是叫你们大队人马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吗？”蒋林桂说：“陈大姐，陈老板，我们这么多的人，

总有个先后嘛。我们走在前面，他们专门拉后面的人，一来就是十多个高高大大的打手，腰里还别着硬火。这次我专门让曹大哥断后，可是要不是他体质好挣脱着跑了，连他也被拉了，你说我们这军米还运不运了？”

我一听，就径直往外走。蒋林桂连忙拉住我说：“天都黑了，你到哪里去？”

我说：“天黑了正好，我到赵县长家里去，他要拉我的工人，我就要他在家也不得安生。”

来开门的，是赵家的佣人，问我找谁。我刚说找赵县长，就听见里面有人在问是哪个。

我一把推开佣人，就直闯进了房间。正在床上吞云吐雾的赵永林没想到会是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赵县长，你堂堂一个县长，说话总要算数嘛，大布告上明明说的不拉我的工人去当壮丁，怎么下来又偷偷摸摸地拉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谁拉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工人从乐至到遂宁，走那么长的路，怕是他们遂宁的人干的事吧？陈老板，我赵永林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吗？你看你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来说了一声，我就专门出了布告，这周围团转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人啊，还是要知足，不要动不动就到处支使别人，我好歹还是这里的一县之长嘛。王妈！二天来人要问清楚，不要随便哪个都放进来，办公事自有办公事的地方，有话叫他们都到办公室去说……”

没想到这一仗，我竟然输了，因为没有拿到证据，输在了这个老奸巨猾的赵永林手里。

我气冲冲地回来，对蒋林桂说：“下次要是再来拉，你们先给我把人绑起来，然后给我来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天，我的人又被拉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那个姓何的保长正被工人们五花大绑地绑在那里，等候发落。

我坐在乡公所的竹椅子上，问他知不知道县里出的布告。那家伙把脖子一昂，不答话。

我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奇怪，就说：“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拉了板车工人以破坏抗战论处，你知不知道啊？”

他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话。我站起来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巴掌：“这何保长看样子是没把我们运军米的放在眼里，干脆把他丢在这板车上，拉到成都去游街，然后押到省政府去报案，以汉奸论罪，枪毙！一个小小的保长就敢这样无法无天的，我们还敢运送军粮支持抗战吗？”说着几个工人就七拉八扯地动了手。

这一下，那姓何的才怕了，一脸发青地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县里给我们下了这样大的数字，我们实在是到处都拉不到人，就只好来拉你们的……”

我说：“怕没有这样简单吧？你就不怕我们去告了县长，治你的罪？”

他又支支吾吾的，工人们一看，就知道有名堂，一哄而上又要动手。何保长连忙喊着：“我说我说，就是赵县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说这条公路上成天有成百的壮汉子在拉米，你们就不晓得打主意吗？你们拉你们的，就当不知道便是了。”我说：“这就好。你呢，受人支使，我们也不难为你，你就挨个给这些受了惊的弟兄们磕一圈转转头，就算饶了你。不过要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回县城去走一趟。”

大家一看，都要跟我走。我抬头一看天要下雨，就转身对大家说：“这么百把人围着，窝了工还是大家吃亏，林桂，你带着大家赶路去，我们就留下十来个弟兄吧。老曹你来点将，其余的还是去干你们的活路，这种场面我见过，不怕的。”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说：也好，留下来的弟兄们，活路和工钱都摊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叫人搭车送个信来，这里到遂宁，前后也不过那么点路程。

送走大家之后，我们刚刚上路，迎面来了当地的一群地痞恶棍，都拿着锄头扁担，为首的一个手里还挥着一支二十响，冲着我一阵地乱叫，叫我把他们的“何大哥”放出来。十多个工人弟兄没见过这场面，一时都不知怎么办了。我看来者不善，赶快叫老曹把那姓何的绑好，自己跑到镇上的乡公所里，一看那乡长正在着急，就说：“你别怕，借个东西给我，我保你一点事情都没有。”

乡长问我要借什么？

我说：“枪，把你的这枪借给我。”说着一伸手，就把他腰上枪盒子里的那支枪抽了出来。接着一转身，看见他身边的一个乡丁腰里还有一支，一伸手又抽了下来。然后一趟子跑到场口上，端把椅子一坐，说：“谁放过来？过来我就不客气，这枪子儿不长眼睛，谁敢来试试，叫他老婆娃儿今晚上就披麻戴孝！”

那乡长一看我这阵仗，吓得不得了，跑到我面前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地说：“陈先生，陈老板，都是江湖上的人，啥子事都是说得清楚的嘛。你老人家火气这么大，伤了身子也不好，你看是不是我来做个东，请诸位吃、吃顿饭……”我说：“乡长你是个聪明人，咋这点办法都想不起？你赶快给这些人说清楚，要是挡着我们，他们的‘何大哥’九死一生；要是放了我们呢，保他一点事情也没有。他们若是不信，你这位乡长大人就出面担保，出了事情我们大家负责。”

这样的保，乡长大人当然是不会担的。我就拿着枪，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到后半夜，我心里突然一阵阵地难受，老曹说：“陈老板，你这是累的，又累又饿，今天可是连中午饭也没吃啊。你去歇一会，吃点东西，我们来看看着吧。”我说：“不了，老曹，你们没见过这场面，有的事情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你去给我找点吃的来，来两个人在我身边守着就行。”

老曹在街上找了半天，结果只找到了一点糊饭锅巴，让我就着点冷开水吃了。

我靠着椅子迷糊了一会，天就麻麻亮了。我一看，那一群地痞都悄悄地散了，就和大家商量，要拉着那姓何的上路。不料有人直扯我的衣服，我一看，是那个乡长，嚯嚯地说：“陈老板，我的枪，把我的枪还我吧？”

我这才想起，说：“李乡长，你忙什么，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到县城走一趟，当个见证人。”

我们拉着何保长回到县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姓赵的，却见县里粮政科的许科长迎了出来。我说：“许科长，赵县长怎么不来呀？我们好不容易拉了个人证又找不到他的人影，是不是硬要我把这个人证拉着满城满街地找啊？也好，许科长，也委屈你一下，我们没汽车，可板车多的是，选两架最漂亮的，你和何保长一人坐一架，再找两个标标致致的小伙子来拉，要不然对不起您老人家亲自出面来迎接。”许科长忙说：“陈老板，您别……本来

赵县长是要亲自来的，确实是公务在身，就全权委托给我了。”

我说：“是全权委托吗？”

他说：“当然。”

我说：“那好，你今天看着办吧，人证物证都在这里。赵县长的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的，若是拉了我们板车工人的壮丁，以破坏抗战的汉奸论处。这破坏抗战的罪，可是大罪哟。今天是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就走得脱，要是这里定不下来，我们就到成都去说。我陈联诗是个小人物，可是在各处也有几个朋友；赵县长呢也不是说不起话的人，我和这些拌脚板的板车工人陪你们这些当官的打这场官司，成都打不下来就上重庆，一直打到蒋委员长名下，问一下他老人家，前方抗战的将士还吃不吃粮食了……”

我身边的工人们一听就都闹起来，说：“要得，要得，把这官司打它个四季花儿开，越是闹热越好！”

那姓何的一听这话，吓得拉着许科长直是说：“我冤枉啊冤枉，要不是赵县长说了话，我哪里敢……”

许科长也慌了，说：“陈老板，你大人不记小人过，这事情的确是何保长的过错。”

我横了他一眼：“嗯？”

他连忙说：“不、不，是、是我们赵、赵县长爱吃点酒，酒后失言，这些底下的人就拿来当了真。我们马上想办法，想办法通知各保，要坚决保证板车工人的安全，若是再犯，一定……”

我说：“不说那么多了，这件事看在你许科长这么大的岁数上，就算了吧。叫何保长立个字据，写个保证，再找个保人来。一是保他今后不能再犯，二是证明我们今天一没打他二没骂他，不要二天又找话说。”

那姓何的一听就像死囚犯人遇了大赦，连忙四周乱窜，一下子就把那乡长拖了出来，说：“许科长，这是我们的李乡长，让他来给我作个保，今后若是再有这些事，我遭天打五雷轰！”许科长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就要打回转，我说：“许科长，你请留步，在下还有话要说。平时难得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面，你今天既然是赵县长的全权代表，有些话就一起都说了吧。你看我们运军米，一车米一里路算的是四角六分钱，可是到了我们工人手里就只剩下了三角二分，这乐至到遂宁这么远的路，跑一趟下来每个工人也不过一百多元，如今这么高的物价，这点钱连伙食钱都不够，哪里还有钱拿回去养家小。更何况你们一直都在拖欠我们的工资，叫我们吃什么？我早就跟县长说过，要给我们的工人长工资长工资，可是他老是东说南山西说海的，就是不给个答复。今天既然委了你先生做了这个全权代表，你就干脆做了这个主，给我们大家把工资长了怎么样？只要你这里开了腔，我马上就到绵阳民食供应处去说，事成之后，我们大家给你办大席，请你吃九斗碗好不好？”

大家听了，一阵地起哄。那许科长一见事情不好，连忙说：“好好，我这就回去跟县长说，给大家长工资！支援抗战嘛，肚子不吃饱怎么行……”

我们让那姓许的留下了字据，送他走了。字据上写着每车军米一个来回加价八十元，连同以往欠我们工人的工资，在十天之内付清。大家正高兴，我却那姓李的乡长拉住，指着老曹说：“陈老板，我的、我的枪。”

我说：“李乡长，您受惊了。老曹，把枪还给他。”

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老曹和我肩并肩地拉着车，看看左右没人，神秘地说：“陈老板，我看你，不平常啊！”我一笑说：“有什么不平常

的？只不过这两年，比你们多走了几个地方，奇奇怪怪的事情多见了些而已。”他听了只是摇头：“不，不，我这人再没眼力，这点还看得出来的，看你从李乡长腰上抽枪的那麻利阵仗，啧啧，我们这些男人都要大吃一惊。今天也只有你，才把这些当官的降得住，我们大家靠了你这样的老板，硬是福气啊！”我看了他一眼，说：“老曹，你莫要高兴得早了。这么大的一件事，那赵永林不会甘休的。”

果然，第二天乐至的板车行业公会里就传出话来，说：“联昌行逼着县里涨运价，哪里是为了什么工人，陈老板在里面吃肥了。我们多少也在县里运了些官仓货，难道就他们涨得，我们就涨不得吗？”于是就都去扭着县里闹。许科长见了我，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陈老板你看，都要涨价，我们县里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看是不是放一放再说？”

又过了几天，运粮到简阳的工人又回来说，那边粮站卸货的时候，发现一些粮包里的米都发了水，起了霉，要我们赔钱。

这下子不得了了，一路谣言四起，说联昌行的女老板太心狠，又要县以涨工钱，又要往米里发水，要晓得六担发了水的米，就会多出整整一担米的重量，现在米价这么高，她不是吃肥了么？敢在抗战物资里来捞钱，这女人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不是破坏抗战是什么？县里要是不喊她出来说清楚，我们就要告到省里去……几个工人代表听说了，着急得不得了；蒋林桂和老曹连工也不出了，成天守着我，生怕我出了意外。我说：“你们守着我也不是办法，关于涨运价的事情完全是说得清楚的，现在关键是要弄清楚谁支使人在米里发了水。林桂你带两个人，赶快再去给我把那条线索有个水落石出，然后把人给我押到这里来。”

他带着两个人前脚刚走，就来了几个兵，说县长要我走一趟。工人们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我说：“大家都别着急，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我去去就回来。”说着就叫老曹把帐簿子拿来，跟着我一起去了县府。

一进县府的大院，就看见到处都是人，行会的那个穿长衫子的张会长带着一大群工人围在那里，里面竟然还有我们的一些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像要打碗水把我一口吞了下去。我笑笑说：“张会长，你不是说你的工人都被我拉走了么？看样子你今天还要报这个仇哦？”

他气得一扭头，对院子里的人说：“大家不是都说她陈老板一向宽待工人吗？不是说她的运行里风气也好，团结也好，不打牌、不赌钱、不嫖女人吗？那都是哄你们的！我今天就请你们都来看看，她是怎么吃你们工人的血汗钱的，你们叫她把帐拿出来亮亮！”

我说：“帐嘛，好说，都明摆着的，老曹你给他们念念。”于是老曹和帐房先生就一五一十地念帐目，一直念了两个钟头，把我们这几个月的开支都全部公布了出来。还没有念完，下面就闹哄哄的，都说：这样说来，人家运行里真的只提了百分之五的费用，其余的全都发给工人了嘛。

我放下帐本说：“张会长，我的帐完了，是不是把你的拿出来我们也听一听呀？我们接这项差事之前，这军米你们也多少运了些，我们也算都吃了点官粮嘛！”

他的工人一听，就在下面说：“这怕是办不到哦，他的帐，都见得天么？我们好久都没拿到钱了，他的地方倒是买得不少，没听说他上个月才拿了五万多元，在简阳那边买了一大块好田土吗？给他的那房外室买的，要不然他那大婆子咋会闹得这么凶嘛……”

那张会长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一跺脚说：“这个赵永林怎么……”

正说着，那姓赵的就出来了，一摆架子说：“陈老板，我昨天接到人家简阳那边的公文，说你们运的军米怎么都是掺了水的霉米，这样要不得哟。好，好！我们退一万步说，这不是你陈老板干的，我晓得你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平时里口口声声一口一个抗战抗战的，这点大道理一定是晓得的；可是你得把你的工人们都教育好嘛。你说你们工资不够，我们就答应涨；你看看这里这么多的人，都对这事有意见。人家张会长是我们的老朋友、老交情，都没得到一点好处，偏偏就给你们涨，可是现在你不是叫我们作难吗？现在人家喊要处理，我看你恐怕要给个说法，要不然就像你说的，我们到成都、重庆去说……”

我说：“赵县长，我到这乐至没几天，可是怪事倒遇得不少。才不久你县太爷的大布告刚贴出来，就有人偏偏要顶风作案，拉我们运军米的工人去充壮丁。我来找到你，你却说是我没证据来胡闹；后来拿到了证据，你又不露面，只派了个全权代表许科长来处理。结果是你赵县长贪杯，说了些见不得人的酒话，下面的人拿着就当真了；现在许科长签的字据正要兑现，又闹出了个军米里掺水的事情来。我这回要是拿到了人证，你不要又东说西说的哟？”

正说着，蒋林桂就来了，他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拖着一架板车，那板车上五花大绑地绑着一个人。姓赵的一看，眼睛就直了，转身就想溜。蒋林桂见了，一把上前拉住说：“赵县长，请留步，这件事情，请你给我们大家说清楚！”那王保长一见赵永林，嚯嚯地缩成了一团。

林桂见他不肯对质，一下子跳到了板车上，一挥手大声说：“弟兄们，我来帮他们说：往军米里掺水的事情，就是赵县长支使王保长他们干的。这家伙找到赵县长哭穷，说是送军米又劳神又没油水，不想干了，赵县长却说你们就不晓得想办法啊？往军米里掺水嘛，那多出来的斤两，不就是钱吗？王保长说要是别的人拉还可以，陈老板联昌运行里的人精得很，怕不得行。赵县长就说，你就不晓得动脑筋啊？人家来拉米你们殷勤一点嘛，烟啊茶的递到手上，让你们自己的人上货，再不行呢就偷偷塞个红包儿，只要拉的人不开腔……那些米反正都要运到外地去的，霉呀烂的都在路上，哪个说得清楚？”

人群里哄地一声炸开了。我站到板车上，大声说：“看看这米，大家都来看看这米，农民兄弟都是交的上好的米，湿了一点他们都要大大地打折扣，可是他们就拿来发水，还硬说是我们的人干的，这不是丧尽天良吗？这么热的天，粮包运到简阳就沤得发烫，打开来一看，全都起了霉。大家想想，这才多远一点路？而我们前方的将士，还在千山万水的夔门之外，等到他们碗里的那一天，这些米还吃得吗？这些军米，都要运到重庆去装船，装大轮船，一个船舱里的米，何止千包万包，到那时候，这些霉米就会在仓里发烫，变质，霉烂蔓延……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最恨的是什么人？是汉奸，是破坏抗战的汉奸！而他们往军米里掺水，一图中饱私囊，二图栽赃他人，不惜祸害前方将士，这与那些敌占区的汉奸，有什么区别？！……”

坝子里一下子就闹翻了天，我们的工人把车子停在县府的院子里，整整两天没有出工。

这时候，到处的军米都催得急，赵永林又叫那许科长来给我说好话，让我叫工人们快上路，一切事情都好说。我说：“我们当然要出工的，要不然吃什么，好在一切事情都弄清楚了。赵县长好歹是个父母官，也给我们道了歉了，我们哪能不知足？只是这县里欠我们工人的钱，可是你许科长老早就说好了的，不晓得啥子时候才兑得到现呢？”

他说：“陈老板，我这回拿性命担保，县长都派人到省里取款子去了，就这一两天的事情。你就赏我一个脸，莫叫我老在县长面前交不了差，我也还有一家人，要在他手下吃饭呀！”

我说：“那好，有这么一个县长，我看他手下的人也实在着难！今天就看在你许科长的面子上，我们的工人出工。”

于是工人们又拉着军米上了路。我刚刚把人发配完，许科长就来说，款子备齐了，叫我到简阳那边一个叫施家坝的乡上去拿。

我说：“乐至县发给我的款子，怎么叫我到简阳去取？我不去。”

许科长说：“现在县上的款子紧得很，这是简阳那边原来欠我们的一笔钱，你就直接去取了，该发给你们拉那一路工人的钱就直接在那里发了，免得我们又多跑一趟，费一道手续。”

我想了一下问道：“那施家坝离简阳县城好像还有一段路吧？这几个月，你们的工资都只发了一半，现在欠的款子大约有二十来万法币，我一个女人家怎么敢去拿？要不然你们给我派几个人护送。”

谁知那姓许的听了嘿嘿一笑说：“你是女的又有什么关系？没听见现在满世界都在说，像你这样的女人，不多哟。”说完竟然自己转身走了。

我站在那里，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回头看看，实在是没有人了，只得喊上帐房先生说：“我们走，我就不信，现成的钱我都拿不回来。”

我到了施家坝，就叫帐房先生去乡政府送个信，请他们把钱送到茶馆里来。帐房先生去了不多一会儿，回来说：“陈老板，这里的乡长说的，没这个规矩，自古以来公事都在衙门里办，哪有到茶馆里办的。”

我摸出自己的一张名片说：“老先生，麻烦您再走一趟，就说我陈老板是袍哥出身，万县东门上水码头的陈三爷，从来都是在茶馆里办公事，请他乡长老人家委屈这一回。”这一次还没有一杆叶子烟的工夫，就急急地来了一群人，为首的见了我，没有料到把他召到茶馆来的这位陈三爷竟是一个女人。连忙一打拱说：“不知陈三爷大驾光临，快快请茶请坐。”

寒暄了几句，我知道这人姓肖，是这里的乡长也兼袍哥的五爷，专门接待外来的客人。

我说：“这几年日本人逞凶，我从万县流落到此地，干上了车行的生意，也还多承各处弟兄们的关照。如今要我到这里来拿款子，我手边一个人也没有，肖五爷是否能帮个忙，找两个弟兄送我一送？”

那姓肖的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身后确实是没人，眼珠子转了两转，沉吟了半晌，不开腔。

我一看，知道这其中有名堂。一般的袍哥公口上，只要手续齐全，哪有这点小事都不认帐的道理。我说：“看来肖五爷也有难处，君子不强人所难，我也不勉强了。”说着就拿过那只装钱的口袋，三两下解开绳子，抓住底下的两只角倒过来一抖，那法币就哗地倒了一桌子。我指着满桌子的钱，大声对茶馆里那些目瞪口呆的茶客说：“诸位都看好了，这里是钱，二十万元法币，是我们联昌车行几百个工人几个月来运送抗日军粮的血汗钱，拿回

去要养家小谋生活的。今天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们乐至县要我到这简阳县来拿钱。眼下时局不大好，一路上饥民遍地，匪盗丛生，我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要和这位年过半百的帐房老先生一起把钱送到县城里，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果谁要是起了心，干脆现在就把这些钱拿走，不要等我们走到半路上又来背后打炮，害了我们妇老两条性命。”

偌大的一个茶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王大爷来了。”说话间只见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手里端着支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由人簇拥而来。

一进茶馆就问：“哪位是万州来的陈三爷？”

我站着没动，说：“我就是。”

那老者一惊，忙说：“我得信迟了，有失远迎。不知陈三爷远道来此，有何见教？”

我说：“不敢打搅，若是方便，想请贵码头的弟兄们送我一程。”

那王大爷听了，手一挥说：“老五，派三个人、两支枪，把陈三爷送到简州城里！还有你老三，快去打乘滑竿。都是袍哥中的弟兄，哪有到了我这里还走不了路的道理？”那位肖五爷有点尴尬地走了。王大爷瞪了他的背影一眼，说：“陈三爷，您难得来一趟，请到寒舍坐坐，用了饭再上路。”我还了个礼，说：“实在是事务在身，不敢久留。王大爷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明了，但凡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三爷，您别见怪，我的人怠慢了您，我自自有处罚。下个月，我还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到万县去办，还请您……”

我说：“王大爷，这点小事请尽管放心，我姓陈的虽是一介女流，规矩还是懂的，我这就给我们陈吉庆陈大哥修书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袍哥中像肖五爷这样的人，不多。”

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总怀疑是那位姓肖的和乐至的赵永林有什么勾结，要不是后来的这位王大爷有求于我，事情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赵永林好几件事情都败在了我的手里，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服气，就放出风来，说这陈联诗是个女的，可是那么多工人都听她的，一定有问题。于是县城里一时又满城风雨，有人将我上次从乡长手里夺枪的细节编得活灵活现的，说我当时双手一扬，就叭叭两枪搁倒了两个，那些地痞才不敢上来的；看她平时那不睬祸事的样子，莫不是在哪里犯了案的女响马？还有的人说不像，哪有像她那样的响马，经常给工人讲抗日救亡什么的，又对工人那么好。工钱高不说，看她手下的那些工人，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偷鸡摸狗，四不打老婆，还敢齐着一条心来抗丁，我看哪，恐怕有点像共产党。

谣言越传越多，后来发展到有人晚上盯我的梢，还有人悄悄在工人中收集我的言行材料。我看事情不好，就去到绵阳找竹栖商量。竹栖想了半天，说：“反正这军粮运得也快差不多了，你就交给另外的人吧，尽快撤到成都去。”

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船老板之后，又当了两年的板车老板，然后去了成都。

春江水暖

我拿着地址，找到了成都纯化街七十八号。

一个老佣人来开门，一听我说了姓名，连忙说：“原来是陈三姨妈，先生太太老念着你，怎么现在才来。”说着就领着我往里面走。

这里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廖海涛的房子，廖师长住重庆，这房子空着，就让给雷青成和杨敏言一家住着，曾三姐也在这里。我跟着老佣人进了二门，迎面就是一个好大的花园。正是春夏之交，园里花褪残红，绿叶成阴，几个孩子正围着那些桃树李树，在数藏在绿叶下面的青果子；回头一下子认出了我，全都扑了上来，陈三姨妈陈三姨妈地喊成了一片。曾三姐和敏言听见了喊声，连忙迎了出来，大人孩子一大群，拥着我进了屋。

我们在客厅里的一大排沙发上坐定，早有老妈子捧上香茶，我喝了一口放下，这才开始打量这房子。这是一幢大宅子，门前宽敞的房檐下，一排合抱粗的红漆大柱子；房子四面的半圆拱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我推开一扇窗户，窗外又是一个花园，月季、牡丹衬着满园春色，开得妖妖娆娆；远处一个精精致致的八角亭里，一个老花工正在打扫残叶。

我指着八角亭边上一座平房间：“那房子那么堂皇，是做什么的？”

敏言一笑说：“是小舞厅，星期天有客人来，除了我们这样打牌的老古董，还有些爱摩登的，就在那里跳跳舞。”曾三姐一扁嘴说：“玉屏，你还没看见，后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大池子呢，男男女女脱得二光二光的，大热天跳进那池子里去洗澡，真是不成样子。”

敏言的几个儿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都说我们三姨妈晓得啥子嘛，人家那是游泳池，再热的天气也不准我们去游泳，真是老封建。

大家笑了一阵，才开始拉家常，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她们便问起我现在的在干什么。我说：“没办法咯，日本人占了上海，我呆不住了，就回来。先是在渠河上驾了两年的船，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太厉害，就跑到绵阳当了一阵子板车老板，运军粮。现在军粮也运完了，只好又回这里来，向我侄女儿的婆婆娘，讨口饭吃。”

曾三姐一听，往我背上一拍巴掌说：“这个背时鬼，只晓得说这些怪话，只要老老实实呆在我这里，还少得了你的一口饭吃？人家青成，现在红得很，听说你们两派冤家现在又合起来对付日本人了，你还躲着我们干什么？”敏言笑着，一边喊：“陈妈！快给陈三姨妈把右边的那间大房间收拾出来，她不走了，要在这里长住！”

于是我就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住了下来。不久，宁君在艺专里言行过于激进，被班上一个三青团的学生告发，连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学也上不成了；再后来，一青父子俩暴露了，也来到了成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由当时成都市长陈离的秘书长刘弄潮帮忙，在成都中山公园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此时的成都，空气还宽松。市长陈离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川军军人，身边又有像刘弄潮这样的人士做参谋，抗日空气颇为活跃。不久，由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中华戏剧社来蓉，竹栖出面担任了前台主任，将剧社安排在春熙路的“三益公”园子里，每日由秦怡、张逸生、金淑之等著名演员出演《天国春秋》、《孔雀胆》、《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桃花扇》等进步戏剧，一时轰动了整个成都。宁君毕竟进过几天孩子剧团，一听说就成

天扭着竹栖闹；竹栖哪有不管的道理，给中华戏剧社的社长应云卫一说，就让宁君进去当了个演员。

时局稍稍安定了，我就和竹栖商量，给两个孩子把婚事办了。本来我们都是不大讲究的人，可是竹栖心疼宁君，觉得这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爱俏，又在演艺界和大明星们一起抛头露面的，再说又是我和玉璧唯一的女儿，即使不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也不能过于草率。于是就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了一笔钱，给她打了一串金项链，又买了几样首饰，让他们到当时很有点名气的小天竺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结婚照。下来竹栖还请德高望重的张表方先生在一幅红绸斗方上写了几句祝福勉励的话，裱好贴在喜堂里，婚礼办得也算有点新意。

婚后不久，宁君就有了身孕。这时竹栖和一青又奉命去了离成都不远的彭县，宁君也跟了去。临走时，竹栖对我说：“诗姐，你身体不好，这几年又过于劳累，就在这里好好享几天福吧，千万不要东奔西走的，有事我自然会通知你。”我点点头说：“也好，我就暂时‘寄人篱下’，听你的调遣。”

儿子在绵阳安安稳稳地读书，女儿又嫁了，我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住在敏言家，每日里银耳燕窝地吃着。她们知道我向来不爱打牌，闲下来不是陪我在花园里画画，就陪着我去剧院看戏，这样养尊处优的日子没过多久，身体也就大大复元了。只是竹栖老是没有消息，我心里日渐烦闷，一有空就坐在花园的八角亭里，东想西想的。曾三姐见我有心思，也到八角亭里来乘凉，说：“玉屏啊，我们都是居孀守寡的人，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你漂泊半生，也苦了半生，又不是像我们这样没见识的女人，该有个长久打算了，找个事做吧。”说这话没两天，青成过来找我，问：“屏姐，你想不想当官呀？”

我说：“我这个人，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没那么好的命。”

青成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不是没好命，就是太能干，没听说这女儿生成男儿命，一生一世不清静？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大家一起抗日，好多当年的共产党人都不那么认真，政府里也容得下那些脚踩两只船的，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怎么样？你爱跑，就到省党部里去做个视察专员，高兴就下去走走，不高兴呢就在成都随便做点什么，每月里月薪五百元。还可以给你找一个独院儿，专门配一部私包车，车夫和厨子的费用都由公家承担。如果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我再去给你争取。”

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不是挥霍民脂民膏吗？怪不得你们国民党的官都要挨老百姓的骂。”

青成说：“屏姐，当官的也不都是坏人，有了机会，就做好事，一时做不了好事，也不去做坏事，这也算是做人的一种方式吧？听说你当年，也曾去县训班考过县长，而且中了全省惟一的一名女县令？”

我说：“那是有人和我打赌！进去一看那些题算得了什么，考上了也没当回事，自古以来官场黑暗，我避之还来不及，哪有自投罗网的道理。”

青成说：“屏姐，你这话过激了。我也晓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可是常言道，时候不到啊。再说只要当了官，有时候做事会方便许多。要不然，我能救你和你们共产党里的那么多人出来吗？”

我一听他说这话，脸一下子绷紧了。青成一见忙说：“屏姐，我失言了，我也没别的意思，自从你这次到我这里来，敏言两姊妹就时常给我说起你的事情。当年我们素昧平生，我都极力将你从杨森手里救了出来，只要是你说了话，我也没有不办的事情。现在我们朋友之上又加了亲戚，哪有不管你的

道理？这次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到这个差事的，也是为你和儿女们长久着想。当然如若朝一日你不想做了，再干别的也不是不可以。你不要意气用事，好好想想，想好了再给我回话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确实也好好想了一夜。可是想来想去眼前全是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好多好多牺牲了的战友们，还有玉璧。是啊，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共两党是合作了，我们的许多党员也在川军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里有个位置，也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和别人不同，我的那么多亲人和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这口气我今生今世也咽不下去。我要是贪图自己的安适当了个官，怎么向我的玉璧和华蓑山上那么多还眼巴巴盼着我的同志们交代？再说眼下我还是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党并没有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我将来又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当然杨氏两姊妹和雷青成也确实是一番好心，只是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前些时候宁君带信来说她要生了，我早就打主意要去看看，如今正好做个借口。

过了两天，趁青成上班去了，我草草收拾了一下，就对曾三姐说：“宁君快要生了，两个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呢；那一青又是大而化之的，懂什么！我这个当妈的还是得去看看才好。”说着就出了门。这一去，我再也没进过杨家，多年的患难朋友和亲戚，就这样断了关系。事后我听说，青成对我的不辞而别很不高兴，说：这个屏姐，怎么全然不拿人家的好心当回事！我真是这头不讨共产党的好，那头又不讨国民党的好，看来好人是难当。

全国解放前夕，我听说他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以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

我到了彭县关口，宁君都已经生了女儿。竹栖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华。宁君一见我，就撒娇，哭着说：“一青一点也不管她，都要生了，还在茶馆里和人家谈工作，连接生婆都没来得及去找，自己就把孩子接下来了。结果孩子在忙乱中掉到了地下，他居然顺手拿了个装菜用的笊箕将孩子捡了起来，这孩子命贱，居然没有感染！这还不说，孩子生下来才三天，他丢下我们娘儿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重庆。还有这名字！妈妈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不好，林伯伯偏要起个这么苦的。‘冰华’，叫人家冰天雪地里，还华呀花的……”

我抱起我的外孙女儿，看着她那甜甜的样子，只顾了逗着她咯咯地笑，边逗边说：“什么命贱哟，是命大！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命大，像山石缝里的小草儿，霜打雪压也要长大，冰天雪地里也要开花，要开给那些坏家伙好好看一看，是吧？……宁君啊，你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以后是要多多自己担待哟，再不要又像我这个当妈的。一青嘛，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德性，要不然我怎么会不放心。夫妻之间，哪有不管你的，要不然他那么慌张地跑回做什么？”

宁君一听，不高兴了，说：“妈妈，我就晓得你从来就不袒护我，只护着你的这个笨女婿！”

竹栖听说我来了，连忙从什么地方赶了回来，我说：“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怎么就不管管你那笨儿子，看我的女儿受委屈了是吧？”

竹栖和一青都只是笑，我说：“你们爷俩啊，真是城隍庙里的那对鼓槌儿，一模一样！”

当时一青在关口镇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同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我们党的重要人物。一个叫胡春圃，当时是我们党安排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

员黄季陆身边的秘书，第一次被敌人发现，被黄季陆保了出来。可是不久敌人又要抓他，只好转移到了彭县，做了当时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在关口的煤炭转运站的主任。另一个叫陈于彤，竹栖从小的毛根朋友，一九二七年竹栖在云阳当团练局长时，他就在竹栖身边做中队长。一九三五年，陈于彤在上海入了党，此时是我们党南方局派往川西的特派员。因为和竹栖沾着亲，一青和宁君都管他俩夫妇叫表叔和表婶。

同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党内的同志。不久，一青的叔伯妹妹梅侠也来了。这是个很逗人喜欢的姑娘，圆脸，大176双枪老太婆

林梅侠：解放后重庆博物馆工作。曾参与陈联诗口述记录。陈于彤：当时南方局派驻川西地区工作负责人，后任董必武同志秘书，中国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等职。一九八九逝世。胡春圃：四川渠县三汇镇人，年轻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入党后，即去中共中央“特科”接受极严格的情报工作训练，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策反。因活动频繁暴露，被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逮捕，后转入统战工作。解放后，历任“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印度组组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部长；中央外宾接待室主任等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三月病逝于成都。682

眼睛，说起话来甜甜的，早年就拜给竹栖做了女儿，也管竹栖叫爸爸。竹栖说：“既然成了我的女儿，总不能一点也不管。这孩子是姑娘中最聪明的一个，把她放在家里，最多长大找个富足人家嫁出去，出来跟了我，说不定有了出息了呢。”

一时间这个偏僻的小镇，成了我们地下党在川西的一个重要掩护点。

我和竹栖说起青成要我去做官的事，竹栖说：“诗姐呀，你老说你的命苦，我就说你的命好，你看你一有了难处，不等开腔就有人来帮忙，不是要送小洋房就是要送你做大官，你怎么就是不领情啊？不过幸得好你回来了，你看我们这里正商量呢，于彤要找你谈话，有要紧的事情。”

我一听，忙问：“什么时候？”

竹栖说：“看你又高兴了吧？你这个人啊，真是享不来福哦。”隔天，我和陈于彤见了面。

陈于彤，和竹栖年龄差不多，只是白白净净的，要斯文些，看上去一副教授模样。因为在外面的时候多，说起话来居然没有一点云阳的土腔。他依着竹栖，也叫我诗姐，寒暄几句之后，就说到正题。于彤说：“诗姐，对于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组织上都了解，南方局建立之后，组织上曾好几次派人到华蓥山上去找你，老廖留下这么大一支队伍，我们党怎么会不管。可是你总是不在，又不敢随便找别人。大约是皖南事变之后吧，周副主席和董必武同志派了熊阳和另外两个同志沿着渠河、大巴山和陕北走了一趟，任务是利用我们的一切关系开辟一条秘密通道，为南方局应付突然事变作准备。可是后来熊阳同志回来说，他走到合川的山边就被一支绿林队伍拦住了，问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要到华蓥山上去找廖玉璧。那些人一听，迟疑了半天才说：廖玉璧早就牺牲了，队伍也散了，先生您就别往前走了，现在这一路乱得很，我们不要您的东西，再帮补您点路费，您就请回吧。熊阳同志回来说起，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要知道这华蓥山离重庆这么近，是块很好的

根据地，我们党花那么大的气力建起来的一支队伍要是真的就这样散了，多可惜。”

我长叹一声。熊阳遇上的这些人，一定是刁大哥手下那些失散了的弟兄们。

于彤又说：“后来听竹栖说起你的经历，才知道这些年你也一直在找党，带着那么多的同志一直在找党，真是不容易啊。安排你和竹栖一起到北川办农场和后来绵阳运军粮，都是我们组织上决定的。至于一直没有正式与你接上组织关系，是因为我们党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对于暴露了的党员，一般都不再接转党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希望你作为一个老同志，能够理解。”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哽地说：“我知道，竹栖跟我说过。在重庆的时候，我多次在曾家岩和红岩村外面转，可是我没有进去。

我一直都在等，我晓得党总有一天要来找我的，党不会不管我们这么多的人……”

于彤也有些动感情，说：“诗姐，我们这不是就来找你了吗？不过我还是批评你。李明这个人，作风上是有问题，可是他是代表一级组织来为你接关系。你当时不是向上面反映事情真相，而是意气用事，以致延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同志，这是不应该的。”

我长叹一声，点点头。

于彤松了口气，笑着对我说：“不过诗姐你也过于谨慎了，你看看，当时如果大起胆子闯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说不定就和上级把关系接上了呢，也省了上上下下这么找来找去的！”

于彤这次决定以组织上的名义和我谈话，主要是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这时候蒋介石弃守衡阳、桂林等大片国土，致使日寇长驱直入，直逼贵州的独山，重庆城里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打算退守西康。于彤对我说：“如果日寇攻入四川，我们得作游击战的准备。最近上面有指示，游击根据地全部选在地形复杂的川东北地区，其中华蓥山区是块老根据地了，你和玉璧同志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多年，党的威信高，群众基础好，所以被南方局确认为游击区的重点。再说，蒋介石打日本人不积极，对付我们倒一直是煞费苦心，我们也不得不防。上面管这叫做‘应付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诗姐，这话你懂吧？”

我心里痛快极了，一拍膝头说：“懂，我怎么会不懂？这么多年来，我们心里憋气，就等着这一天呢。”于彤也笑了：“懂了就好，现在就请诗姐你先回去一步，争取以合法的地位立住脚跟打好基础。我们很快就要派大批的青年同志下来开展工作，你看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没叫过困难。何况我和山上的同志们这些年来憋得好难受，现在好不容易党组织交了任务下来，还能叫困难？”于彤一听就笑了，说：“诗姐呀，你这个人，真是名不虚传！现在你就别为组织关系着急了，回去好好等着，自然有人来找你的。”

于是我就赶快着手准备，要回家乡。

宁君和一青他们都不放心，说：“妈妈，你这么多年没回去了，当年那么多对头，不会放过你的。”

我笑笑说：“是我不放过他们，还是他们不放过我，还要看看才知道呢。我先回去打前站吧，你们后面跟着，快点来。”

就这样，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终于接到南方局驻川西特派员陈于彤同志的指示，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华蓥山下，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徐清浦在我走后不久，就去了贵州他女儿那里，听说也真的去过遵义。可是这时日本人已经占了柳州，铁路线一时不通，他回不来，不久就得了重病，死在了那里。周辉同和陈文玉，一时都没了音信，有人说他们都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在长江里了，也有人说不知道到哪里做生意翻了船，或者是遭了抢……我回到家里，乡上的保甲长都换了，许多人都不认识我。一些老人一见我回来，都悄悄地来打听：“不是听说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华蓥山上吗？我们的队伍，怎么样了？”我说：“没有的事，这些年我不是在外面教书，就是做生意，现在人上了岁数了，落叶归根嘛，还是回来种田，吃口安稳饭。我一个女人家，不干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情，早在万县就皈依了佛门，没事就上庙里去打禅，眼不见心不烦。”

那些人听了，都半信半疑的。我想这空气不压压看来不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到一个叫“居士林”庙里去“打七”。那庙里的正庆法师，是原来华蓥山上徐老和尚的徒弟，没想到会在这时见到我，连忙把我引到禅房里，说：“大姐，好多年没见了，你一向可好？”说着就眼浸浸的。

那一年，敌人血洗华蓥山，也杀害了华蓥山上的几十个和尚。就在徐老和尚被绑在石柱子上当成枪靶子打的时候，正庆法师自己的几个徒弟，也都牺牲了。他因此好多年没敢回华蓥山的庙里去，就在这山脚下四处游方，每每有了空闲，就为自己的师父和徒弟们念经超度。他说：“大姐，你回来了就好，我们华蓥山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华蓥山的佛门之内遭了那么大的劫难，这笔血债总要他们还的。大姐你放心，我这佛门之地还和当年一样，是你们的藏身之地。”

于是我就跟着正庆法师去佛堂。还在门外就听见里边吵吵闹闹的，一个女人正惊诧的大声说：“唉呀，怎么能让她到这里来？当年她两口子在华蓥山上闹得天红，结果她倒是跑脱了，她男人被五花大绑地在南门外校场坝砍头示众，那血淋淋的人头在城门上挂了三天哪，你们大家都忘了吗？”正庆法师一脚跨了进去，正色道：“阿弥陀佛！是谁在菩萨面前说这些不干净的话？我们佛门弟子，慈悲为怀，不要再在这里搬弄是非。”

我接过正庆法师递过的蒲团，在前排打起盘脚坐下，闭上眼睛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修行”。人心静，则万籁俱静，窗外萧萧的风雨声，又将我带回那个难忘的年代。袅袅香烟中，晨钟暮鼓里，飘起了漫天花雨，法慧和徐老和尚，还有玉璧、夏林和陈仁勇，都在花雨中向我走来……哦，天地悠悠，英魂归宿何处？是我忘不了你们，还是你们忘不了我？

正庆法师的声音，沉缓缓地传来：“陈玉屏，你看见什么了吗？”

我闭着眼睛，也缓缓地回答：“是的，我看见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莲花宝座，光芒四射……”

佛堂里满座哗然。正庆法师双手合十，朗声说道：“阿弥陀佛，心诚则灵，心诚则灵啊！吉人自有天佑，大家都要像陈玉屏这样一心向佛，积善积德，万万不可对别人起歪心。”

于是，无论周围的人们怎么大惊小怪的，我从此就成了个正儿八经的佛婆婆。

转眼就是五月，我才开始四处走动。这一天，我从街上回来，一个人跟上来，问我知不知道陈玉屏住哪里。我问他找陈玉屏做什么，他不说；我

又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大竹后山来的。

我一听，不问了，让他跟着我回了家，然后在堂屋里坐下，说：“你说吧，是谁叫你来的，来做什么？”他四处看看说：“陈玉屏，他在哪里呀？”

我说：“你别找了，我就是。”

他听了，一愣，半天才说：“你就是啊？我们大竹后山的老百姓们，都说陈玉屏是个男人，不但那一手枪法没说的，还会飞檐走壁。要是站在山口上吼一声，就会地动山摇的。”我一听笑了，说：“我又不是老虎！”

他长叹一声，说：“我姓易，是当地人，和老冯认识，这次受他的托付，下来找你。这些年，老冯叫人来找了你好多次了，说这次要是找到了你，就无论如何请你到我们大竹后山去一趟，大家盼你，盼得很呢。”

我说：“那好，我这就去一趟，你们上面，现在缺什么？”“缺钱，我们现在苦得很，吃的穿的都没有，也没有子弹。”我说：“枪啊子弹什么的都不忙，我给你想办法搞点钱，你等我几天。”

田里的庄稼，还要两三个月才收获，可是我哪里等得到那么久，就去借，借四十担谷子。那些地主就打听我又要干什么，我说：“看来种田没啥收入，我又要筹一笔钱去驾船做生意，眼下正有一个朋友要来合伙，不能错过了机会。”于是那几个地主就说：“玉屏，你急着要钱，我们也不是不帮忙，只是这时节上要借谷，利钱要高些哦。秋后还谷时，四十担要还成六十担。”

我咬咬牙说：“行。”

卖了谷子，我就上了路。这大竹，地处华蓥山东面，和邻水县紧紧相连，全县地势山多沟深，素有“三山两槽”之称，也被我们称为后山。虽然山高林密好掩护，却自古就是个苦寒之地，我们的同志在这里近十年了，也实在是不容易。只是要去，就要从阳合场过。这阳合场，在华蓥山脚下，是我们的死对头王尧的老窝，眼下他还在这里当团总，要是被他发现了，就会平生出许多麻烦。我想了想，就带着老易，绕过大道，找到我们当年山上的一个小队长丁鹏武，由老丁送我们。老丁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大姐，你走了这么多年，不大晓得现在的情况。我们这一路直到老冯那边都是连起来的，好多保甲长都是自己人，和农民的关系也好得很呢。也还有些枪，就是缺子弹，一有什么动静，号召个上千人我看没问题。”

我说：“你们别说大话，上千，那么容易？”

老丁听了把眼睛一瞪说：“你还不信？这些年来，你以为我们当真就老老实种地做庄稼了？他国民党欠了我们那么多的血债，就这么算了不成？我们的人，从来就没心静过。国民党拉我们的壮丁，我们就逃回来；保长把我们的人抓去卖壮丁，我们就敢找机会打他狗日的。我们要留得青山在，日后好报仇！不是在这里给你老大姐夸口，只要上面一有动静，我们这一路，嘿！就会打出个样子给老天爷看看！”老丁一直把我送到邻水县的新场，说要回去又不放心，就又从新场翻过重重叠叠的大山，一直送到了大竹后山，见到了冯老二。

这也是一个山风萧萧的晚上，就像当年我从重庆回山的那个晚上一样。我来到同志们住的山洞里，又想起当年陈仁勇、向老大和范永安他们把我迎进竹林棚的情景。四面一看，当年熟识的面孔还多，只是老了，瘦得不成人样，身上的衣服还是那样襟襟吊吊的，一个个就像是多年没见过天的野人。许多人一见我，就哭。冯老二指着身后的一个山洞说：“大姐，说起来你别难过，老范范永安，就是在那个洞子里，被老虎拖了去的。当时我们刚刚摆

脱了敌人的一次追击，大家都累了，老范安排了岗哨，自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那个洞子睡着了。不想后半夜，老虎回洞来，我们却谁也不知道。天亮了，我们找不到人，又不敢喊，后来才发现他的衣服鞋子连同……连同手啊脚的，都被老虎拖得满山散落着！我们大家都气得不得了，心想老范九灾十八难都过了，没想到竟会死在这个畜生手里，几个人拿着枪在山上找了好几天，硬是把那东西浑身上下打成了筛子，将心肝肚肺挖出来摆了一大堆，祭了范大哥。”

我也哭，哭着说：“同志们，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大家。这多年我一直在外面，没有找到党组织，没有脸面回来见大家。可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你们的。那一年我从万县回来，就叫辉同上来找你们，让大家先下山，到北碚陈兴奇那里暂避一时，也好有个安身之处，你们怎么就……”

冯老二说：“大姐，你别怪大家，是我不同意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在这荒山老林里，也要等到我们穷人翻身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信，共产党会不管我们！”我说：“要管的，真的要管的，现在不就找我们来了吗？上面说这些年，也好几次派人来找过我，只是我成天在外面跑，都错过了……”

大家听了，禁不住一阵唏嘘，好一阵冯老二才问：“大姐，上面这回，说什么了？”

我说：“现在苏联都出兵打日本鬼子了，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国民党总算是又腾出了手，还是一心要打内战，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好一家独霸天下。我们的党中央说，这回要打就要把他打痛，要在他们的大后方，就是我们云、贵、川地区的农村，打烂他们的坛坛罐罐，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必要的时候，公开打游击战。”

冯老二一听，一下子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抓着石壁，仰天长嚎，喊着：“廖大哥，刘大哥，老范啊，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的深仇大恨，该报了！”

整个石洞里，一片嚤嚤的哭声。

……

我从大竹回来的路上，又一路到广安、邻水甚至合川一带都去看了看，回到家里，已经快要秋收了。早谷子一收起来，催着要帐的就上了门。我说：“忙什么？这谷子还没晒得干呢。”说着就将刚刚打出的四十担谷子连夜装船，运到重庆码头上，抢着城里人想吃新米的市口，卖了个好价钱。回来除了还这六十担谷子的债务之外，还赚了三十担谷子的钱。

几个想看我笑话的地主和商人气得一愣愣的，说这女人几年不见了，没想到生意上这样精通！

没几天，日本投降了，全国上下都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阵子。接着亚彬和一青、宁君带着小冰华回来了，还带来了竹栖的一封信。信上说眼下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毛主席也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要打内战已经是路人皆知。因为华蓥山区所处的有利地形和二十多年来奠定的群众基础，组织上决定将这一地区作为我们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重点。孩子们奉了组织上的指示回来搞群众工作，还望多多指点。

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把河东七场的敌、我、友三方的情况都做了一个分析。此时，当年与我为仇的段贡武，已经做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他的弟弟段成帆做了乡长。这是两个死硬分子，不能抱什么希望。可是另有一

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平时的言行举动，只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与其让这种人成为敌人的基层力量，不如我们去争取过来。于是我就让一青去找一个曾跟着玉璧到旺苍、苍溪等地开辟游击区的老党员李成，逢场天就到茶馆去串联那些地方实力派，很快就拉起一个叫“好人团”的灰色组织。到一九四八年华蓥山大起义之时，这个“好人团”的很多成员都保持了中立，有的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一青还联络了一个叫刘怀钦的进步学生，动员他将自己的《新华日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大堆禁书拿出来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办了一个“梅林书报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人。这时候，国民党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四川作为兵粮重地，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就和一些当年的老队员一起，到各乡各场搞农会。拿起锄头扁担甚至火药枪到地里守庄稼、抗壮丁，很快就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发展了一百多农会会员，抗丁抗粮搞得遍地开花，热闹非凡。渐渐地，我们党派下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多了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下一带，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敌人慌了，就派了罗广文的队伍下来“清剿”。段贡武一见时机到了，就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有《新华日报》，我和一青都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竹栖从重庆寄来的信，说是“旧日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我一见，知道是党组织要找我了，心中大喜，连忙叫一青先走一步，我交代一下工作，随后就到。

烽火燎原

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

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究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认识的刘弄潮，他此时已是重庆市一中的校长；还见到了万县的那一批朋友们，其中最为难过的，当然是孟伉了。后来孟伉还专门为竹栖写了一首《哀林季子》的诗，诗中有：“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读过之后，抚卷长叹，这世上知竹栖者，还有孟伉也！

前来吊孝的人川流不息。梅侠戴着孝，和她的对象、一个叫陈作仪的年轻人也在守灵。

这年轻人，高高的，瘦瘦的，话不多，可是挺精神，一有空就忙这忙那的，对梅侠也很关心。我悄悄问：“一青，你爸同意不？”

一青点点头说：“作仪也是云阳人，三八年就入党了，工作一直很不错的，爸爸很喜欢。”

我点点头说：“你爸，也算是把你们兄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柩，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

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

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

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敲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

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

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天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不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徐庶生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

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粩。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

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啦啦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啊。”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

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

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稳镇一方

不久，黎梓卫街上新建了一个警察所，就驻在街上的关帝庙里。这显然是敌人要想守住黎梓卫这个重要的码头，打开他们由重庆从水路上华盖山的通道。我和刘石泉一商量，觉得这一步不能让他们得手，这个警察所即使建了起来，也要把它捏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我就上了街。

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只听说这个所长姓赵，年纪轻轻的，好像是个才从警官学校出来的学生；一到街上，就被段家两弟兄拉到家里去吃饭喝酒的，见不到人影。我想这怎么行，正着急，就听见有人在喊“三姐”。

我一回头，见是一个背枪的，穿一身制服。他见我迟疑，就说：“三姐，你老人家好健忘啊，我是魏远荣，魏家沟的。”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人是我二姐夫的堂弟。

我迎上去说：“是好久不见了，怎么你也背上枪，吃官饭了？”

他说：“三姐，你不要取笑我，吃什么官饭啊？还不是来帮丘二的，帮这里的赵大哥背枪。”

我问：“哪个赵大哥？”

他说：“新来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嘛。他是我妹夫，我的妹子魏远秀，在顺庆读书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很快就要结婚了呢。”

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口里却说：“好啊，妹夫当了官，舅子来背枪，你时来运转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什么官哦，他造孽。光杆司令一个，人也没得，枪也没得，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么乱的世道，他自己都还没长醒呢，当什么所长。我不想来，是我妈硬要我来，说自己屋里的人可靠，好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妈也是，咋不跟我说一声？好歹我是个亲戚嘛。跟你那个妹夫说，他和远秀的喜事我包了；缺背枪的人，我去给他找；只要这场上有我这个三姐在，包他汤圆不得散。”

魏远荣一听高兴得很，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见赵文俊。我一看，真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国民党真的是找不出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打了两个哈哈说：“赵所长，你到这里来当官，眼睛就高了吗？听说你城隍土地都拜完了，咋就不来看我这个老姐子？”赵文俊一听忙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才说要和远荣一起来看你老人家呢。”

我手一挥说：“哪里用得着你动步，今天我老姐子正街上请客，给你接风！”

我不回乡下，成天都在街上张罗，今天叫亚彬派来几个年轻人给他背枪，明天又把倾向我们的保长乡长们拉来和他打牌，没两天四乡都知道新来的赵所长是我的亲戚。段家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赵文俊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连个空都插不进去，就急了，不知道从中捣鼓了些什么，赵文俊就叫魏远荣来找我保枪借子弹。

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有枪？”

魏远荣说：“三姐，你就帮了我们这个忙吧，人家都说你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个警察所，光壳壳一个，上面又不发枪呀子弹的，要是真的出了什么

事情，咋办……”我想了想。

就说：“好吧，我去给你想办法。”于是我跑到段成帆家里，说：“段乡长，上面叫成立警察所，又不出经费，明说了要由地方上负责筹办，可是你们乡长书记这样的公事人都不管，不是硬叫人家所长为难吗？人家年轻，又是初来乍到的，拿你们这样老辣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要到上面去说嘛，我又怕他伤了大家乡里乡亲的和气。唉，没法啊，谁叫我是他的老姐子呢？只好厚起脸皮来求你，求你看在我这么一大把岁数，又是亲戚的份上，赏个脸，算是借给我几支枪几颗子弹好不好？我叫文俊给你打个借条。”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他家的堂屋里，不走了。

那姓段的听了，气得两只眼睛鼓得多大，最后只得拿了八颗子弹和一支破枪出来。我拿起枪，拉开枪栓一看，就还给他，说：“段乡长，这枪，怕是哄细娃儿的吧？要是真的有了什么事来，警察所的枪都打不响，怕是要追究责任的哦。”

他实在拿我没办法，只好又换了一支好枪。我把我们自己坏了的六颗子弹拿出来换了，然后才一起交给赵文俊。我坐在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里，长叹一声说：“你看，这段家两弟兄，有多坏。我去说了半天的好话，还许了你给他们打借条，结果借的枪是烂的，我硬叫他换了；没想到借来的这八颗子弹，又有六颗要不得！你虽然年轻，却好歹是上面下来的嘛，不把我的脸面子当回事也就算了，这样不尊重你，你在这里怎么做事情？”

赵文俊拿着那颗烂子弹，摇着头说：“三姐，我真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坏。他们当着我的面只是说你的坏话，说你怎么又歪又恶，硬要人家给你磕转转头；又说你和廖大哥从前都是共产党，是地下的异党分子；还说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鬼点子多得很，从来就不会安分守己的，廖大哥早就背时了，总有一天你也要背时。”

我听了一笑，说：“小老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咋就听不来话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知识分子啊，他们是在警告你，凡是知识分子，就不会安分守己，就是他们的对头！你也不想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明摆着一个地主，一个商人，愿意拿我的田土钱财去给人家共产？哼，当年他们一心要想占我家的那点财产，被我骂了个落花流水，这多年一直不安逸我，却只是拿你那个不明不白地死了几十年的廖大哥来东说西说的。今天的事情你该明白了吧？你是上面下来的一个堂堂的警察所长，他们都要哄你，我一个寡妇不歪不恶，那还不早就打碗水把我吞了？至于异党分子嘛，我既不晓得是啥子东西，也没见过。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给我说清楚，我就会给你注意着，说不定哪天，我就会给你逮一个真正的异党分子来，让他们看看谁真谁假呢。”

起义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我们的人不断从城里派下乡来，宁君和一青都回来了。一青装作一个买药的商人，宁君穿着高跟鞋坐着滑竿，一回来就将乖乖的冰华放在魏家沟我二姐那里，自己将八卦丹、万金油在街上摆了一大摊，然后以药材商的名义到合川、广安到处去“推销药品”。许多同志成天在我家里来来往往，我自己就在街上守着赵文俊。眼看他的喜期到了，我又是为远秀操办嫁妆，又是找木匠来做家具，忙了一大阵子，然后邀约了一大群人，吹吹打打把一对小夫妻送进了洞房。

我只图着热闹大操大办的，把赵文俊的积蓄花去了大半。婚后一缺钱用，赵文俊就想也学着打烂条。正好，街上一个贩卖吗啡的大地主被人告到

了他手里，他就连忙来找我商量。

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如果要树你的威风，就秉公办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在你的面前东说西说的；你如果不想树敌呢，就睁只眼闭只眼，还可以做个人情。”

赵文俊听了，支支吾吾地说：“三姐，人情倒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能就这样白做啊。”

我一听就说：“那当然，这事好办，你开口说个数，就交给我吧。”

他连忙说：“三姐，我刚上任，可不能有什么事捏在人家手里，再说街上的段乡长他们又……你可千万要为我保密啊。”

第二天，赵文俊把人放了。晚上由我经手，找人给他挑了两担黄谷加上五十块银元，了却了这桩公案。刘石泉听了，哈哈一笑说：“这下子，背枪的、打牌的、办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眼下这两担谷子和五十块银元一进门，这位赵所长就死死被你捏在手里了。老大姐你松不得手啊，我们要在这里活动，你要在街上去为我们稳住阵脚，要不然，就可能露马脚哦。”

我笑笑说：“老刘，你放心，当年连杨森的那么多师长旅长都不在话下，这赵文俊，算什么？”

说了这话没过两天，黎梓卫街上就出现了三三两两卖针头、麻线、毛巾、袜子的小商贩。我也不去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了，也到茶馆里坐着，跟茶馆的老板摆龙门阵。我说：“这一向不知道啥子货好卖啊，我想再去重庆做趟生意。”

老板说：“三姐，做米吧，米好卖，一趟米运到重庆，至少七成利呢。”

我一边应着话，一边偷眼看那个卖针线的，突然发现他包头的布帕子下面，有一圈戴过军帽的痕迹。我站起身来，一趟子跑到赵文俊那里，把他从牌桌子上拉起来，悄悄说：“你不是要抓什么异党分子吗？我给你在茶馆里看到一个，你赶快去一趟，保证没错。”

赵文俊一听，连忙喊：“来人，快去把人给我拉来。”

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吵吵闹闹地进来一群人，那卖针线的不服，一路上日妈倒娘地骂。

这边的乡丁毛了，只听见有人喊打，就拳头脚尖地打了起来。那人直是喊：“打不得啊，我是上面派来的……”打的人说：“上面派来的，我们所长为什么不晓得？分明是来捣乱的异党分子，不打你不得说实话！”那人被打得遭不住了，说：“我真的是上面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我包包里的‘派司’。”

赵文俊叫别打了，搜他的包包。又过了一阵，那个家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被送了出来，赵文俊还直说，“慢走慢走，对不起啊……”

我跨出房间门，拉住赵文俊问：“你咋把他放了啊？”赵文俊哭笑不得地说：“三姐，搞错了，人家真的是上面派来的，那‘派司’是蓝本本，直线联系，不消和下面通气的。”

我打断他的话头说：“他们这样真真假假的，谁弄得清楚啊，说不定真正来了异党分子，也要被蒙混过去了呢。看来这个忙我给你帮不了，我不晓得啥子蓝本本黑本本的。”赵文俊说：“三姐，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免得你又去闹笑话。这回啊，重庆一共下来八十多个人，我们这一带有二十多个人，他们是打前站的。你这一向看到那些一伙一伙的做小生意的人，就不要过问。”

我说：“那他们这就不走了哦？”

赵文俊说：“不得不得，他们不过是过个路，今晚上就去住新场一家姓王的旅馆里，然后一起到广安。”

又说了几句别的，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告辞出来，装成一个卖纸烟的，连夜赶到新场，找到了那家旅馆的王老板。王老板说：“这些人，是有些怪，一伙一伙的，又不图做生意，听说明天就要去广安。”王老板看看四周，悄悄对我说：“他们身上都带着枪，还有一种这个样子的铁家伙。”他一比我就知道，是催泪瓦斯。

我连忙回来，对老刘说明了情况，赶快通知我们的人这几天都不能上街。男人一律马上都把头发剃了，该躲的都躲一下，要买东西都叫女人来，尤其不要去和那些卖洋线毛巾的打交道，不能出问题。

没两天就听说敌人一到广安，就逮了我们十来个人，其中就有我们的上川东地工委员、广安工委书记骆安庆。我们一听这消息，估计这几十人一定会马上经渠河送往重庆，就连夜布置人马，在渠河沿岸罗渡溪、肖家场、马头溪甚至金滩、丈八滩一带都布置了人，一定要把被捕的同志抢下来。一切安排好之后，我去对赵文俊说：“既然你们上面催你捉异党分子催得这么紧，你怎么就没在河边上设卡子？”于是我带着我们那几个给赵文俊背枪的人，连夜连晚地河边上守着，搜查来往的船只，防止敌人连夜偷运。

一直等了三四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又听说敌人已经从旱路把人送走了，我们只好把人撤了回来。可是刚刚撤回来的那天晚上，敌人就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把人抢运去了重庆。我和刘石泉听到这个消息，后悔得不得了，只怪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

骆安庆被押到重庆后，立即叛变，供出大批上川东的同志。重庆的敌人调兵遣将，大批军警特务涌进华蓥地区。王璞同志来到罗渡溪召开会议，决定将起义提前。紧接着，曾霖同志和已经在广安暴露的杨玉枢，被迫带领人马在代市场和观音阁起义，打响了华蓥山地区起义的第一枪。我们各处的队伍都准备动了，亚彬和老刘都在组织人马，修理枪支，形势已经半公开。王尧和一批死硬分子乘机出动，逮捕了阳合场的丁鹏武和左国政，先送到县城后来又送到了重庆渣滓洞。敌人到处都在捕人，只有我们黎梓卫街上还没动静。

一天，赵文俊找到我说：“三姐，有个事我想问问你，我们这周围，有没有异党分子啊？”

我说：“你又听到什么了？你看看到处都乱七八糟，只有我们这里轻风雅静的，哪里来的异党分子？”

说着就随手在他的桌子上乱翻，一下子从他的公文堆里抽出一份印着“机密”的文件来。赵文俊一看事情不好，伸手要来抢，我一转身，顺势抖开，一眼看到那文件上写着“……立即抓紧调查，逮捕共党嫌疑分子陈玉屏……”我一笑，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说：“看不出来你啊，表面上三姐三姐喊得亲亲热热的，暗地里却在调查我，要抓我。也好，我送上门来了，你抓吧。”

赵文俊一见事情败露，连忙声明说：“三姐，你莫生气，我哪里是要抓你，你看我这上面连章都没盖嘛。我们是亲戚，我哪样事情不是先跟你讲？”

我把手里的文件一扬，说：“你先跟我讲？今天若不是我看到了这个，你会先给我讲？实话说吧，抓了我，你也跑不脱，我就说啥子事情都是你叫我干的，我是头子你就是下手，你是头子我就是下手！哼，我还在帮你你抓

异党分子呢，没想到我自己倒成了你要抓的异党分子了。”

赵文俊连忙说：“三姐，这事是上面下来的，只是喊调查，又没什么证据，我就拖他们一下，你赶快走吧。你去重庆赶紧把你的那些米呀盐的卖了，免得人家说东说西的。”我说：“我的米又怎么了？我卖米又不是一回两回，犯到哪个了？我早就晓得，段贡武那两弟兄不安逸我，就是因为我事事都帮着你，他们钻不到空子了。比如说枪的事情嘛，那回不就是因为去帮你借了那些烂枪烂子弹，他们就气得到处说我的坏话吗？对了，还有那两挑黄谷，硬是眼睁睁地看到挑进了你的屋里，原来这些甜头都是拿给他们吃顺了嘴的呀。唉，我这个人，就是过于热心，结果看来，还要连累你，你又偏偏老是这么不醒眼。你想想，抓了我，这满场上我的亲呀戚的，会饶了你吗？我的儿呀女的，会饶了你吗？而段家兄弟到时候，再去雪上加霜，说你是我的亲戚，说你和我同谋，说你包庇我这个共党分子，然后好把你一起除了，再安上他们的人。那个时候，你倒是自作自受，可是我那远秀妹子咋办？她肚子里的娃娃咋办？那才把人家高兴死了呢！”赵文俊一听，一时不知咋办好。

我说：“看你那副窝囊相，还当什么警察所长，远秀真是瞎了眼睛。告诉你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才不得去什么重庆呢。我这就去县上，就要到县衙门里去问问，是哪个去报的我陈玉屏是共产党。”

赵文俊听了，一把拉住我说：“三姐，你去不得啊，只要我在你这黎梓卫，我就保你没事，你要是一出这块地盘，我就没办法了。”

我一听，心里全明白了。

可是老刘一听，连忙说：“大姐，现在我们是被迫起义，许多工作都很仓促，你一定为我们争取时间。再说，同志们现在都在你家里来来往往，还有的同志在你家里养伤，只要赵文俊不敢抓你，你就得在这街上守住，拖住他，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一定要守到最后。”

我咬咬牙，说：“好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中旬，华蓥山大起义的前夕。

八月十四日，我陈家的妹子被她公公逼死了，于是我声扬要打人命官司。在街上摆出几张大桌子，扯了几匹白布，叫了些裁缝来做孝衣；又叫来我们陈家娘屋的人和我妹子婆家的人，在茶馆吃茶打官司。还扭着赵文俊和段家两弟兄，要他们这些公事人来给我作主；接着把宁君也叫到街上来，为她的姨妈哭丧，闹得满街上鸡飞狗跳的。这时候风声更紧了。有个地主跑到街上来到处说：“陈玉屏在这街上和人家打人命，她家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一升豆子的豆花儿，筷子碗一响就没得了，不晓得在干啥子名堂。”我一听，趁着气头上把他拉了来，大吵大闹地说：“我在这街上脚都没动过，怎么会家里成天人来人往的？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不给我说清楚就走不到路……”

闹完了，远秀拉我到赵文俊家里去吃饭。赵文俊说：“三姐，我这才晓得为啥子那些人那么恨你，你也是太恶了，怎么动不动就要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磕转头？三姐呀，你也不要只顾了你的这头，还是要帮我想想办法哟。广安那边都已经打起来了，我这里的枪还是东一支西一支的，人也不齐，连子弹都没有，要是真的打起来，咋个办嘛？”我说：“你不是说你的枪都是些烂枪，叫亚彬找人为你修理去了吗？只是我想，我们这街上又没有什么大商大贾大财主，那些饥民打过来有个什么图头啊？不过退一万步说，若是真的打了起来，你这几支烂枪也抵不了什么用，不要打不死老虎，反而和老虎

结下了死仇，那时候才中了人家的借刀杀人之计呢！反正上面也晓得你和段家兄弟不和，你呀，就说枪都捏在段家两弟兄手里，叫上面要找就去找他们，这叫做顺水推舟，你一不劳神二不得罪人，也好给你自己留条后路。我晓得他们一看到到处都在捕人，手就痒，巴不得把平常得罪了他们的仇人都一下子杀绝了。”

八月十八日，我这头的官司正打得热闹，七工委书记徐庶生就召集党内的同志，在太阳坪我的家里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全体武装人员在我家里和周围的几个院子里集合，起兵攻打走马岭，然后夺取山下各乡的武器，将队伍拉上华盖山打游击。会议还决定宁君和几个女同志都不参加起义，一青因为熟悉整个华盖地区上上下下的情况，就和我、宁君一起做后勤联络工作，亚彬此时已经是我们这个纵队的中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要带兵出去打仗。

八月十九日是个逢场天，街上人多，我没敢露面。等到二十一日，起义的人都开始到我家集合，眼看就要正式扯开，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下午了，还是到街上去看动静。没走几步，就碰到段贡武手里拿着两根红甘蔗，迎面向我走来，见我先是一愣，立即说：“是大表嫂啊，我正找你呢，听说你家廖亚彬把乡里团防的枪都拿走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段家大哥，什么我家廖亚彬，难道亚彬不也是你家的？你好歹也是他的表舅舅嘛！他为乡上的团防管这几支烂枪，还不是承你们段家的抬举？那天我听保长说，现在土匪闹得凶，叫他把枪都拿去修理，这几天你们都看见的，我在街上打官司，好多天连家都没回，这亚彬也不来给我帮个忙，我还正要找你们要人呢。”

段贡武看着我，阴笑着说：“大表嫂，我说不过你，不过我真的有点事情要求你，今天请你吃夜饭怎么样？”

我一看他那样子，就晓得是不怀好意，可是此刻他身边没有人，谅他也不敢立即就动手。我一回头，看见几个挑柴的农民大汉正朝我走来，就伸手将他手里的甘蔗夺过来，叭叭地就在膝盖上掰成几截，随手分给后面上来的那几个大汉，一边说：“请我吃夜饭我不敢当，就请我吃这几节甘蔗吧。”说完就和这几个人一起走了。

段贡武以为这几个挑柴的农民是我带的人，一犹豫，我已经转过了街口。正想下一步怎么办，突然看见段成帆带着两个人朝乡公所走，我连忙又转身赶到河边，上了渡船，到了河对面的罗渡溪。

我从罗渡溪抄小路回到太阳坪家里，天都快黑了。我们的人已经在四面放了岗哨，附近的几个院子里人来人往闹哄哄的，很多人都背着枪。刘石泉一见我就说：“老大姐，你看都要打响了，准备工作还没做好，阳合场、天宝寨的人说好早点来集合，可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打起来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到今天晚上队伍还没到齐，你就在家里等，然后把他们带到走马岭来。我们的人算来，也不过一两百人，要是再有人掉队，被敌人分而治之，就糟了。”

他急急忙忙的，走了几步又回来，补了一句说：“你不能再到街上去了，太危险。”

这天晚上，我们附近的八个院子一起埋锅造饭，直到大家出发，我连和亚彬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天还没亮，保长就慌慌张张跑来找到我说：“三娘啊，你家亚彬把我们这一保的枪都拿到哪儿去了？人家赵所长说，上面喊人要集中，我跑了好几

个地方，人影子都找不到，连几个甲长也跑得没影了……”

我说：“你这当保长的，就晓得吃鸦片烟，就不怕那些土匪饥民打到你的烟床上来了？亚彬早就让段乡长调去守卡子去了，赵所长他还不知道？”

过了一阵，一个和我一起做过小生意的人跑来说：“陈三娘啊，听说走马岭那边打起来了，开仓放粮，口口声声说什么打土豪打恶霸的，都说不像是土匪，像是共产党呢。”我心里一愣，说：“不会吧？我听说是饥民，吃大户。”那人说：“什么饥民啊，人家喊的都是打倒蒋该死，解放全中国呢，还喊共产党万岁，这和饥民有好大个关系？听说张家院子和王家院子粮仓的后壁墙都被打烂了，下粮的人像牵线线的蚂蚁，好多人没得箩筐，就脱下裤儿来装……”一个小媳妇在一边听了，忙说：“管它啥子党，只要是分粮给我们穷人吃，就是好党。搞快点，大家都快回去拿口袋，装好多算好多！”说罢转身就跑了。

我听了这番话，心里暗暗着急。这一片到处都是敌人，怎么能够公开喊出我们自己的口号，这下子想盖也盖不住了。正在想下一步怎么办，我放出去的暗哨回来了，急急地说：“大姐，你赶快走，段贡武两弟兄从县城里带来了十多个兵，都过河来了，指名说的是要捉你们全家。”

我想了想，问：“我们阳合场那边的人，好久能到？”来人说：“不晓得，你怕是等不得了。”

我说：“你慌什么，他那头不是才过河吗，还有一阵，我再等等。”

又过了一阵，我听见保长在下方的几个院子里惊呼呐喊地叫着：“张老二，王老三，都快点去各处守卡子，要不然一会儿土匪从走马岭打过来了，大家都跑不脱……”

我估算时间，段家两弟兄带的人很快就会到了，要是再不走，我就走不出去了。再一想，走马岭这一边打起来了，敌人很快就会扑过去，我只有从黎梓卫过河，顺渠河而下，按照和刘石泉事先约好的第二方案，到马头溪杨巨白家去等他派人来接头。

我从屋背后的坡上绕了一圈，又到了黎梓卫。

街上静悄悄的，到处都关门闭户。我正在想，难道这些家伙都抓我去了吗，就一眼看见走马岭那个被人叫做王棉花的保长在街上东奔西窜的，后面跟着他那披头散发的老婆。我说：“王棉花，你两口子一大清早不去打你的早谷子，跑到这里干什么啊？”

他一脸的哭相说：“不好了，走马岭打起来了，还把乡长张蜀俊都拉走了。我来找段乡长他们，能不能帮我一把……”

王棉花一边说一边走了，他老婆一把拉住我说：“陈三姐啊，你没看到那个阵仗，好吓人哦，我现在脚杆都是软的。”我把她拉到一边说：“你那老公，硬是不醒眼，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还有心去管人家。”

那女人一听，恍然大悟地说：“三姐，我晓得了，我这就拉他到我娘屋里去躲祸事。他这个保长，不过是为人家那些大户人家跑腿的，又没打到我屋头来，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见他两口子那慌里慌张的样子，心里暗自好笑。我们的人在走马岭下谷子，这不假，可是说乡长张蜀俊被我们当成土豪拉了，这就是假的了。那张蜀俊早几年前就是我们“好人团”里的人了，前段时间张伦又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都成了我们游击队的纵队司令了。

我赶到河边，一眼看见魏远秀戴了个草帽，在那里站着。我老远就招

呼说：“远秀啊，你是有身子的人，不去好生将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远秀一见我，泪汪汪地说：“三姐，你没听说吗？走马岭那边都打起来了，上边喊要设卡子，文俊找人去了，叫我在这里先给他站着。”我叹了口气说：“远秀，你怎么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我只听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听说男人要女人家来为他办公事的！见了文俊，你跟他说我到县上打官司去了，说不定还要拉他去给我当证人呢。”说着就上了船。

我坐的船刚走出码头不到五里路，就听见走马岭那边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起来。船到了罗渡溪，我看见岸边上站着六七个戴草帽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文俊为什么要叫远秀也戴个草帽站在河边，看样子这些人都是特务。我不敢在罗渡溪上岸，一眼看见河边上的另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个叫田老么的船老板，就打了个招呼，一脚跨了过去说：“老么，你是到重庆去吗？正好搭个方便。我有一船货在重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叫我去算帐呢。这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我还是去躲躲的好。”

船到了马头溪，我找个借口下了船，到了杨巨白家里。老杨一见我就说：“大姐，你的胆子好大啊，没看见这渠河边，一路都是兵？”

我说：“怕什么？他有七算，我有八算，他有烧酒，我有罐罐，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和他们转吗？就是不晓得我们阳合场那边的队伍，到了没有？”

老杨没想到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出什么烧酒罐罐之类的话来，禁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跟着老杨，到合川冯家牌坊一个姓赵的同志家里，见到了刘石泉。他问起战斗情况，我说：“还不晓得，不过这些年轻人，连山上的情况都不熟，就要拖队伍上山，而且粮食也没运上去，我实在是有些不放心，老刘，你就让我上去吧……”

刘石泉说：“先不说这个，再给你一个任务。听说我们一打响，县长就亲自带着两个警察中队二百多人往我们这里来了，另外还派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去重庆绥靖公署告急，搬救兵去了。现在岳池城里，到处都在修工事，怕我们去攻城，听说还在向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师长杨什么借迫击炮。”我说：“这个人叫杨赛宣，我认识。”

老刘说：“认识就好，你去叫他把他的三十门迫击炮收回来。还有，我们这一打起来，很快就要攻城，你再去把城里叫门的乡长的工作都做一下，叫他们把兵都撤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我们打的时候就不留情了。”一路上都已经设了密密的卡子，老刘给我把任务交代了，一想起路上的情况就犹豫。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危险，我要是不去，一旦打起来又不晓得要牺牲多少人！”说完转身就走。

这一去，又是十恶九险，等我从敌人的通缉令下逃出来，又见到刘石泉时，他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说：“石泉，工作我都去做了，可是四道城门只打通了两道。”

老刘说：“两道也可以。只是现在敌人的兵力太强，我们的同志又大多没有火线作战的经验，一时还是不去攻城为好。亚彬他们已经在山边上和岳池、广安两县的警察队伍交了火，从山上扯了下来。准备拉到肖家场来和这里的队伍会合后，再拉到金子沱去和大队人马会师。”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敌人正从四面围过来，这么多的人拉到平坝上来

打，一定会吃亏的，这是当年我们作战的大忌啊。”

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建立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响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们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的情况，并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四十五人；在岳池县被捕后送往重庆渣滓洞关押并牺牲的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和亲人。

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

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啊。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

子，我要好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我长叹了一口气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箴片而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的，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

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大问题的。”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X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

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 he 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

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

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

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

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

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

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熬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

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管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

一青说：“诗伯，你猜人家希一现在做什么？”我说：“他的本事大，当年连蒋介石都被他瞒过了，我怎么猜得到？”

一青说：“人家现在是交警大队的中队长了呢。”我看着希一说：“哦？那你平时干什么？”

希一笑笑：“不干什么，站站岗。”

“在哪里站岗？”

“就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青和希一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青说：“诗伯，希一现在的这个交警队，又叫‘志农部队’，这个‘志’，是取的交通局长马志超的一个字；这个‘农’字，就是戴雨农，也就是大特务戴笠。这下子你知道不一般了吧？这是一支专门负责中美合作所警卫的部队呢。”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我们的同志们有救了！

希一也说：“诗姐，我也着急啊，可是和地方上的同志们没有联系，也不敢乱动作。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打进去几个人吧？”希一说：“那好啊，现在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正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明白大势已去，准备培训一批反共特务，待全国解放之后潜伏下来打‘游击’。我们那里面，正在办‘干训班’，招募小特务呢。你们赶快找渠道，送几个可靠老练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该行动的时候，我知道处理。”

于是我们就赶快研究人选找关系。第一个是一位叫张平和的同志，通过他的一个同学的亲戚打了进去。不久小杜杜文举也进去了，都当上里面“交警一旅干部训练班”的勤务兵。“训练班”设在中美合作所里面原来的一座小学内，连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都经常到这里来讲课。这个地区防守森严，设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杜文举和张平和进去之后，拿到了通行证，不多久就把敌人在这里的地形道路、岗哨关卡及守卫部队番号等等情况绘成了很详尽的图表，送到了一青手中。

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

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

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新闻。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那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

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

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点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与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啊。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

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的时候，还在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

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

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

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

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

走进黎明

重庆解放了。满街都是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游行队伍，满街也游荡着乱七八糟的散兵、流氓、妓女。地下党的同志们，一瞬间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驻进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里。我则带着孩子们，到临江门的介中公寓，挂出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报上发了消息。一青他们找来了十多个人，有的当勤杂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到被服厂去找来了衣服，还有的到什么地方去找来了奶粉、鱼肝油之类的补品。梅侠负责接待，亚彬负责警卫，一青负责对外联络，我管内务。我号召大家先凑了点钱，去办伙食，脱险的同志们找到了这里，没饭吃怎么行。

正在铺排，来了一个人。这人隔着桌子，看了我半天，然后才上来说：“你，你还认不认得我啊？”

我一看，是个勾腰驼背的小老头，蓬头垢面的，浑身上下襟襟吊吊，没一块好布。我想，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脱险的同志了，可是看了老半天，实在是认不出是哪个来。那人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联诗啊，是我，是老肖、肖中鼎啊！你不认得我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天哪，我活出来了，我又见了天日了，我见到解放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肖中鼎，没想到我会见到这个样子的肖中鼎！当年在万县的时候，他还是个英英武武的军官，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小老头！我连忙扶他到里面坐下，说：“老肖啊，你真是死里逃生啊，晓不晓得我们

还有哪些同志逃出来了？陈作仪？刘石泉？丁鹏武？还有谁逃出来了你快说啊！”肖中鼎一边喝着梅侠为他冲的一杯奶粉，一边喘着气说：“不晓得，不晓得啊。当时耳边全是枪声，好多人就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往下倒，直到我们冲垮了那堵墙，跑出好远了，还有人在倒……我躲在歌乐山上的树林子里，躲了三天三夜啊，听见农民们都在说城里解放了，我才敢出来的。我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到了这里，这几十里路，也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逃出来的还有，我们都跑散了。我都找到你们了，他们也一定会找来的……”

梅侠听了她肖伯伯这一说，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又出去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老肖，你听说了刘石泉的什么消息没有？”

老肖停下来问：“谁？刘石泉？让我想一下。对了，是不是那个关在牢八室里的老刘、刘石泉？不错，这个人不错，有骨气，也有办法，既不吃软也不吃硬，敌人把他吊在梁上打啊，也没说出半个人来。”

我说：“是啊，只要说出半个人来，我们全家就也会进了渣滓洞，也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了。”

老肖听了，看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他好像没有跑出来。大屠杀那天，下着雨，天都黑了，敌人才开始点名，第一批就有他，和蔡梦慰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的。蔡梦慰你不熟吧？诗人，在牢里还在写诗。”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乎乎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 and 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

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紧将她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摧残了外婆的健康，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她晚上想，白天讲，不停地讲了好几个月，直至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便因淋巴癌与世长辞，享年仅六十岁。这个时候，华蓥山游击队的斗争还没有被承认，外公的“身份”尚未确定，许多游击队员及亲属还在蒙冤受屈，连外婆最疼爱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成了“右派分子”，在她临终前也未能见上一面。外婆拉着我们母亲的手说：“你爸爸的血，还有你那么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吗？”“难道我这个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那部书稿，你们一定得整理出来，要不然就对不起我和你爸爸，也对不起华蓥山的那么多牺牲的人……”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外婆去世后，正当省作协将整理外婆的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四川组稿，副社长韦君宜同志决定由该社组织出版。于是由四川省作协的负责人沙汀和艾芜两位老作家主持，将我们的父母借调到作协，整理这部书稿，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刚刚“摘帽”的“右派”作家扬禾。这期间，父母还多次去华蓥山地区采访，收集到不少宝贵的文物资料，如当年作为联络暗号的破毡帽和手杖，苏维埃农协会成员的名单……最珍贵的是当年的老交通员魏银安保存的外公一九二五年的照片的底片。他取出来交给母亲时，含着眼泪说：“这是一九二八年陈三姐交给我的，现在物归原主，我也算对得起廖大哥和陈三姐了。”

春去秋来，两年过去了，一九六四年一月《华蓥风暴》初稿终于完成。由父亲和扬禾这两个“摘帽右派”整理一位被“劝退”的“老革命”的回忆录，其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书稿初成，其魅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

正当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准备修改的时候，“四清”来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风暴，将一切都搅得变了样。加上江青的一句“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不但书出不成了，我们本来就倒霉的这个家，又因为这部书稿雪上加霜。家里多次被抄，材料大多散失。母亲牢记外婆临终前的话，四处奔走告状，最后忧愤成疾，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为此伤透了心的父亲，从此也就断了念头，再也提不起笔来。

时间到了一九九五年，我们也到了当年父母整理书稿的年龄。抢救这部书稿，恢复华蓥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应有的地位，为外公外婆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树起一座精神丰碑，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肩上。好在这些年来，许多人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文革”中，茅盾先生曾暗地托人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出《华蓥风暴》书稿，寄还给我们，并嘱之“幸原稿尚

存，当俟诸它日”。“文革”后，岳池县、重庆市、四川省的党史研究室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华蓥山游击队和牺牲的烈士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为我们的外公补发了烈士证书；同时重庆市委也为外婆公开平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六年，由岳池县政府和重庆市文联出面，在家乡为外公外婆举行了隆重的合墓仪式，前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和许多老同志都专程到会，表示祝贺。

于是我们又拿起了笔。除了全家在十年浩劫中拼死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 and 那套由茅盾先生寄回来的《华蓥风暴》，年逾古稀的父亲还日夜兼程，赶写出十多万字材料，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指导我们参阅大量的党史、文史资料，完成了这部书稿。书稿带到北京之后，立即受到老作家陈模同志的支持，将它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并从全书的立意、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增删等方面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这部书还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陈浩增同志的重视；副总编郑一奇和责任编辑刘艳丽同志，对该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为我们的创作和修改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相信这部在许多人的关怀和希望中产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人们了解华蓥山区革命斗争史、了解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精神风貌，都会大有益处。

鉴于时代久远，事件人物繁杂众多，尽管外婆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我们也查阅了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还采访过许多人，仍然难免疏漏，此书也一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好在这本书的魅力，在于书中女主人公本身的真实性，在于她的那些传奇感人的故事，在于她那令人钦佩的百折不挠的超越了历史局限的崇高精神，因此我们相信会得到读者谅解的。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代表九泉之下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也代表我们全家，谨向在写作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向曾给予我们指导和关心的茅盾、沙汀、艾芜等文学巨匠；向张秀熟、漆鲁鱼、李维、肖泽宽等老同志；向罗广斌、刘德彬、胡康民、高缨、王志秋、沈伯俊等老作家和专家以及许许多多提供过资料、给予过帮助的同志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林雪林民涛

1995.7.

